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勇

学术著作

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下）

◉主编　周勇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简介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100卷)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档案文献、学术著作、普及读物组成，其中，档案文献占丛书总量的70%，以大陆和台湾保存的档案文献合集出版为特色。

本丛书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具有相当规模，代表现阶段思想政治、文学艺术、科学文化最高研究水平”、“具有很高史料价值，集学术之大成”的目标要求，由中外学者共同编纂而成，以期全面反映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面貌。

ISBN 978-7-229-11865-5

定价：146元
（上、下）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学术著作

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下）

◉主 编 周 勇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南明中学的同学显得更为活跃，该校高中学生秦天真、丁树奇、饶博生、孙师武，初中学生徐健生、李策、孟昭仁、吴绍勋等人，经常在一起聚会，以“国家前途怎么办？”、“我们青年学生怎么办？”为题，商讨抗日救国的办法。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步伐的加快，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更加广泛地发动起来。这些抗日运动的消息传到贵阳后，使贵阳的爱国学生更加振奋。他们从前一段抗日救亡活动的实践中，认为成立一个领导青年学生救亡工作的团体非常有必要。于是贵阳几所中学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召集各校学生代表举行联席会，通过联络，于1931年冬成立贵州学生救国团。贵州学生救国团成立后，便以各种形式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贵阳各大商店日货充斥。为抵制日货，1932年初，以秦天真、丁树奇、饶博生、顾建中、刘子溪、贺登发、何广键、蓝运臧、寇述彭等为首的“学生救国团”骨干力量，在贵阳掀起了“抵制日货”、“检查仇货”运动。参加这次运动的除贵阳中学、贵阳一中、达德学校、贵阳女师的爱国学生外，还有一部分小学生。学生们在市中心中华路举行游行，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号召有日货的商店自动交出仇货。这一爱国行动得到市民的赞扬和支持，但却遭到部分奸商的抗拒和反对。“恒兴益”、“协成”两家商店，自恃与军警有勾结，不仅阻挠学生验查，而且毒打了进入店堂的爱国学生，激起了群众和全市学生的义愤。爱国学生冲入各大商号进行搜查，把货架下仇货摔出店铺，并封闭了大量贩卖和私藏日货较多的商店，奸商们被爱国学生的抗日行为吓得纷纷躲藏起来。事后，学生们还包围了省政府，要求当局惩治奸商，查办军警头子。省主席王家烈慑于爱国群众的抗日声势，被迫出面公开道歉，下令没收奸商资产，并撤职查办了宪兵营长。之后，省政府又不得不下令通缉一些倾销日货、民愤极大的奸商。

1933年12月，省教育厅按国民党教育部颁发《中学生毕业会考规程》规定，中学应届毕业生除参加本校毕业考试外，还要举行毕业会考，企图以会考束缚学生，转移学生抗日救国的注意力，削弱抗日救亡力量。对此，进步学生又发动和组织了反会考斗争，揭露会考阴谋，迫使省主席王家烈宣布取消了会考。

除了抵制日货和反会考外，贵阳学生抗日救国团还经常利用星期日，组织宣传队在六座碑（今贵阳市民生路）搭台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主办了《救国旬刊》，由丁树奇任主编，该刊以宣传抗日反蒋，揭露蒋介石的卖国投降阴谋为主要内容，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口号。《救国旬刊》虽然只出版了两期，但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抗日救国团的骨干还组织了读书会、讲读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书籍。

在贵阳光懿女子小学、达德学校的女教师和省立女子师范的学生，也组织了“贵州妇女救国团”。她们一方面积极支持和参加学生救国团的各项活动，一方向还在当时的《新黔日报》上开辟《惊蛰》专栏，大力宣传抗日救国。1934年5月4日，贵州妇女救国团与部分青年学生在贵阳联合召开五四运动纪念会，以大量事实揭露日军的侵华行径，号召人民团结起来赶走日本侵略者。

与此同时，省内其他地区也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遵义各校学生宣布罢课，全市学生、工人、商人和市民共3000多人，举行了示威游行。独山爱国师生在九一八之后组织“夜呼队”、“夜哭队”，沿街道痛哭大呼。“要求政府出兵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情其景十分感人；赤水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

爱国青年学生积极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贵州军阀政府对之采取的态度是由起初的不合作、不阻挠发展到后来的阻挠、破坏。在贵阳，他们利用收买少数学生散布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爱国学生对这一卖国论调予以了严厉的批驳，指出在关系到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必须动员全国力量一致抗日，御敌于国门之外。教育厅长陈公亮为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亲自召集学生开会，强制学生放弃抗日反蒋，少数被收买的学生还对爱国学生进行要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爱国学生气愤地痛打了陈公亮，并冲散了这次压制学生抗日救国的会议。

青年学生的这些爱国行动表明，大敌当前，无论反动当局如何压制人民的爱国意愿，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仍会不断高涨。同时显示，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救亡运动，

即将在贵州全省掀起。

1934年1月，中共毕节支部建立后，积极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方面团结进步青年，在原“女子初中班”和“抗敌后援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抗日救亡团体“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的工作；一方面为进行抗日斗争，准备在滇黔交界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打算在军阀犹禹九的部队中拖出一部分武装组建抗日武装。不久，毕节党支部成员转移贵阳后，继续组织“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文艺研究会”等团体，秘密学习进步书籍，提高思想觉悟，坚定抗战必胜信念。

1934年，中共党员周守如（周济）从重庆脱险后转移到遵义，以办“女子职业社”作掩护，在知识界进行抗日和革命宣传。1933年至1934年中共党员曾慕琴、周雏群（周司和）也相继从四川转移到遵义，在他们的宣传引导下，遵义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和社会知识青年，以遵义三中、女中为基地，成立了遵义“学生自治研究会”，通过购进和秘密阅读进步书籍开展进步活动，激发了遵义学生的抗日爱国热情。1934年，以遵义二中、女中和社会上的一些进步人士为基础，建立了“反日反帝大同盟遵义总部”，把遵义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受贵阳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安顺一些中小学教师及部分文艺爱好者也成立了“晓鸡声文艺社”的文艺团体，出版了《晓鸡声半月刊》，发表了《醉中》、《香麦面》等宣传革命的文章，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后来，党组织在安顺还组织了“三乙读书会”，创办了《安顺文艺半月刊》、《安顺三日刊》，安顺中学也创办了《安中校刊》，大力宣传抗日救亡，成为安顺进步力量进行抗日宣传的重要阵地，有力地推动了该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救国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各地学生、工人、市民以及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和支援，抗日浪潮席卷全国。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爱国学生提出了建立学生抗日救亡组织的要求。1936年5月29日，中国学生联合会（简称全国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并发表成立宣言。宣言号召“一切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全国各地的学生，在民族解放的大

旗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到底”。1937年元旦，全国学联创办的《学生报道》正式发行，在创刊号上登载了《全国学联工作报告》，指出了学联成立以来组织工作方面的不足，决定在全国各地筹组学联，并派代表到各地进行联络。不久，全国学联的代表即分赴各地。

1937年6月，全国学联派杨蕴清从北平到贵阳负责筹组学联工作，杨蕴清在贵阳的活动得到了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支持，由中共地下党员李策主持，在贵阳第三小学和高家花园分别召集学生党员和星光读书会、文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的部分成员，听取杨蕴清介绍一二·九运动和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杨蕴清在会上号召全省学生联合起来，成立学生抗日救国联合团体。地下党组织同意了杨蕴清关于筹组全省学联的意见。7月2日，经过筹组，召开了贵州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委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贵阳师范学校、贵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贵州省立女子中学、贵州省立高级中学、贵州省立贵阳中学、贵阳县立中学的代表，会议选举朱世芬为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省学联）主席，陶信镛负责组织，黄奇鑫负责宣传，王锡桢负责联络。会议还决定除贵阳县立中学外，其余5所学校均成立学联支部，分别由党员周树楹、黄奇鑫、聂奇慧、乐恭彦、王锡桢等人负责，各学联支部下设若干小组，以各校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和读书会员为骨干，利用各校学生自治会为学联的活动阵地，通过各学联小组去串联进步学生。

这时，在都匀、惠水、贵定、瓮安、凯里等地也组织成立了抗日救亡社团，通过张贴传单、演剧、歌咏、办刊物等多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这一时期，红七军、红八军、红三军、中央红军、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先后转战贵州，除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和地方军阀，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外，还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共同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在征战沿途刷写了许多标语，画了很多的漫画，散发了大量的传单，发布了各种文告等等。红军的广泛宣传及革命实践，对唤起贵州民众觉醒，宣传和团结动员各族人民起来抗争，积极加入抗日救国行列，推翻反动政权，进一步促进贵州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以及释

放政治犯等条件，从而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初步实现了国内和平，中国局势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受全国大形势所迫，国民党贵州当局在公开镇压中共组织、破坏群众抗日救亡活动上，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于是，贵州抗日救亡活动出现了进一步高涨的形势，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团体相继成立，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蓬勃开展。

从1935年中共贵州省工委的成立开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是贵州地下党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省工委成立后，积极开展了配合红军长征的工作，为红军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也是在这一时期，年轻的贵州地下党人，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他们在开展秘密工作和武装斗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英勇的尝试，即使是在遭到严重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也不退缩，而是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更加勇敢地战斗。贵州地下党组织在艰难的斗争环境下成长、发展，逐步地成熟了起来。

（二）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重新组建

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有利形势下，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中共贵州地方组织建设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于1937年9月派黄大陆以中央特派员身份由延安回贵州负责党的工作。

黄大陆，号振东，字孑生，1904年1月生于云南省文山县城关镇一个教师家庭。1919年考入云南讲武堂工兵科十六期，1922年毕业后至1929年在滇军历任见习排长、少校参谋、旅参谋长，1930年部队在滇西下关被龙云击溃后，黄大陆辗转于滇桂黔，1931年11月到贵阳，广交社会名流。1932年，黄大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驻贵州）三师参谋长，1934年秋，经邓止戈介绍，黄大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9月，二十五军一师师长何知重邀请黄大陆任该师少将参谋长，黄借机将邓止戈介绍到该师任参谋。1936年4月，

何知重师改编后调四川，黄大陆等被送到南京国民党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1937年，黄大陆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以“探亲”名义，经西安转到延安，与先期到此的邓止戈见面，向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了情况，并受到朱德同志接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中央决定派他回贵州负责党的工作。

黄大陆回到贵阳与李策见面后，随即着手组建中共贵州省工委，并及时向贵阳地区的党员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派人到毕节、织金、遵义等地清理、整顿党的组织，恢复党员的发展工作。

李策，又名李策良、李智卿。1915年旧历11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少年就读于著名教育家黄齐生曾任校长的贵阳达德学校，1930年就读于贵阳高级中学初中部，1933年升入高中部后，即被推举参加全省学生救国团的领导工作。1934年冬经秦天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同孟昭仁等组成中共贵阳高中支部，领导学校党的工作。1935年7月19日中共贵州省工委遭到敌特破坏后，李策隐蔽在贵阳郊区从事地下工作。西安事变后，李策受组织指派，于1937年春秘密到达黔桂边的六寨，向转移至此的秦天真汇报工作，并接受了秦的指示，携带党的有关抗日方面的文件返回贵阳，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李策的积极组织和推动下，于1937年7月，组建了贵州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社会各界抗日救亡活动在贵阳不断兴起。

为指导全省的工作，省工委印发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的纲领》、《实践上的几个问题》、《关于小组生活》等文件。

《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的纲领》对什么是公开工作，什么是秘密工作，在若干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外，并重点强调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关系，指出两者“是矛盾的，性质上是绝对的不同”，但又是“活的辩证法的”，认为“这两个方式不能配合就不能成为革命的力量”，“公开工作是革命的策源地的工作，秘密工作是革命的资源地的工作”。要求“在公开环境里，争取领导作用，供给秘密工作的情报和材料，受秘密工作支配……秘密工作要完全明了公开工作情形”，“秘密工作在‘里的面’帮助公开工作的开展，公开工作在‘表的面’帮助秘密工作的开展”。并严格规定：“负公开工作的同志，就不

应该负秘密工作的责任，负秘密工作的同志，也不必跑去争取公开。”[①]

《实践上的几个问题》则是就如何开展地下活动，在时间、地点、说话、情报、态度、生活、通讯等实践中碰到的问题提出了严格的规定和要求，特别强调了一个革命者应遵守党的原则和纪律，要有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人生观，“临难不苟免”、“至死不屈服”，经受住敌人各种物质的诱惑，即使牺牲个人生命，也不能丧失气节，背叛组织。

《关于小组生活》着重阐述了党小组是什么样的组织，过好党小组生活对于党员自己的革命修养、理论的学习探究、处理问题的能力、指导革命活动等重要意义。

这三个文件是贵州地下党组织根据以前组织遭到破坏，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敌特逮捕，全省停止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及党员的实际，为重新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党员并避免被破坏，减少牺牲，规范党组织和党员行为而制定出来的纪律原则和行为、工作准则，是从贵州当时党的建设、抗日救亡活动的实际情况和地下斗争的需要出发制定出来的，十分详细具体，便于操作，对今后全省党的组织建设和公开活动、秘密活动的开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此时的省工委组织机构尚不健全，为充实省工委的力量，更好地领导贵州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黄大陆化名李瑞卿给中共中央写信，报告了贵州的工作情况，报告说：“为着清理核查的便利，在九月下旬产生工委会”，并且特别说明：“为着慎重提拔干部，工委会只李策和我负责。”同时强调：“贵州工作，目前感到缺乏，就是干部，许多事的推动迟缓，主要是干部问题没有解决”。[②]为推动贵州党的工作，他请求中央派人到贵州加强领导力量。1938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贵州清理、整顿党的组织、恢复党员发展工作取得的成效，为使党在贵州的活动有更大、更进一步的发展，遂派邓止戈、秦天真回贵州充实和加强省工委的领导力量，由邓止戈任省工委书记，秦天真、黄大陆、李策为委员（邓、秦抵筑前，黄、李二人已于2月21日被敌特逮捕）。

① 省工委文件《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的纲领》（1937年12月20日），《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2期（总第3期），第52页。

②李瑞卿（黄大陆）：《贵州一般情况》（1937年11月10日），见《贵州历史档案》专辑（一），1983年7月，第10页。

对于贵州的工作，在邓止戈、秦天真离开延安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代表中央进行了部署，指出：贵州进步力量比较薄弱，开展工作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抗日的形势是会影响贵州的。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有利条件下，应放手发动群众，利用各种公开的社会团体及合法的群众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民众运动。贵州是国统区，与敌后情况不同，不要在蒋管区搞武装游击活动。

省工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确定了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加强贵州地下党组织的建设，巩固清理、整顿党组织所取得的成果，恢复党的组织，发展新的党员；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和发动各界各阶层民众起来抗日，实现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并结合贵州1935年七一九事件以来，党的组织先后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和暂停党员发展工作的实际，一方面立即着手清理整顿、恢复发展全省各地党组织的工作，另一方面，停止了直属军事小组的武装活动，将已掌握和建立的武装分散隐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党的抗战纲领、主张，发动一切爱国力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形式进行斗争，领导和推动全省各地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开展。

（三）各地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省工委组建之初，为全面开展党的活动，使各项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迫切需要有充分的组织保证和充足的人员保证，于是，省工委把恢复和发展全省各地党组织工作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经过大量工作，很快恢复、建立了一批党的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为进一步开展全省党的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然而，这项工作的开展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则是在此之前清理、整顿党组织的基础上进行的。

为摸清情况，理顺关系，纯洁组织，1937年10月，黄大陆派徐健生以省工

委特派员身份到毕节地区清理整顿组织。徐健生到毕节后，很快便建立了清理委员会，徐健生任主任，邱在先、熊蕴竹、葛发声、邱在模为委员。该委员会把重点放在清理工作上，在毕节等县开展清理，主要措施是：(一)对该县原有的党员逐一进行清理登记；(二)对党员发展对象和在党的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进行认真的审查。经过一个月的工作，于11月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1938年2月，建立了由邱在先、熊蕴竹、邱在模、葛发声4人组成的中共毕节县工委，邱在先任书记。县工委下辖4个支部。

1938年1月，黄大陆派由织金到贵阳工作的党员方献祥回织金清理关系，建立党的组织。根据黄大陆的指示，方献祥回织金后，以织金"寒假学生农村工作团"负责人身份为掩护，白天组织学生在织金县城及近郊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夜间则秘密进行党组织的清理工作，经过充分准备，他与谌志经、赵百川、黄典伍、张宗玉等人于1月27日建立了中共织金县工委，方献祥任书记，谌志经任组织部主任，张宗玉任妇女部主任。

与此同时，省工委通过丁树奇指派原中共遵义县委书记杨天源回遵义清理地下党组织，开展组织建设工作，不久原遵义县委委员谢树中经组织营救由四川巴县监狱出狱回到遵义，他们一起为恢复中共遵义县委及其活动作准备。

通过清理、整顿党的组织，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加上对以前贵州党组织的工作的总结，为后来全省党组织的恢复、建立及党员发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这一时期，全省党员的思想水平有了提高，地下斗争经验通过不断积累得到进一步丰富，党的组织有所发展，在贵阳、毕节、思南、安顺、遵义、湄潭、织金等县先后恢复建立了县一级党组织，还直接领导了凯里、镇远、平越(今福泉市)等地的党支部或党小组，并在学校、书店、交通运输单位等建立了党支部。据统计，自1938年至1940年4月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建立止，全省共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32个，其中县级以上组织14个。

1938年3月，省工委在对贵阳地区党员作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恢复了中共贵阳县委，由谢凡生、丁树奇、高言志、熊蕴竹组成，谢凡生任书记。县委恢复组建后，即按省工委的布置，把清理、整顿组织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对党员

进行了重新登记，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5个党支部、2个党小组，至6月，清理、整顿工作结束，贵阳县委随之停止了活动。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贵阳党组织也得到不断发展，党员人数日益增多，特别是在文化、职工、青年、学校等方面的党组织发展较快，鉴于新的情况和工作的实际需要，省工委于1938年9月决定再次恢复组建中共贵阳县委，并在其之下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职工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分别领导贵阳地区各党支部的工作。1939年2月，县委书记谢凡生因身份暴露而转移重庆，省工委遂调陶信镛任贵阳县委副书记。4月，为加强贵阳县委的领导，省工委从平越调吴绍勋任贵阳县委书记。两个月后，吴绍勋又调往省工委在安南（今晴隆）举办的党员训练班学习，周辛农继任贵阳县委书记。同年12月，周辛农被调离贵阳县委，县委工作即由陶信镛负责。1940年2月，省工委为加强贵阳地区党的工作，决定由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兼任贵阳县委书记。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为减少损失，保存力量，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贵阳地区党组织作紧急疏散，贵阳县委由此停止了活动。

1938年元月建立的中共织金县工委，下辖工人、市街、学生、农民、妇女5个党支部。县工委为有利于开展党的工作，县工委负责人及各支部党员都分别寻找社会职业，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例如方献祥到城关第二男子小学任教，张宗玉到城关第一女子小学任教，等等。党员们以学校为阵地，积极组织歌咏组、话剧组，教唱抗日歌曲，公演《放下你的鞭子》、《凤凰城》等剧目，印发《抗日十大纲领》等文件，领导进步师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同时，县工委还加强对各个党支部的领导，通过组织“农会”、“职工会”，办农民识字班和妇女识字班，提高他们的思想和文化水平，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1940年4月以后，由于省工委进行了疏散转移，织金县工委与省工委失掉了联系，县工委也因为组织城区各学校部分小学教师向当局要求解决食米补贴问题，被国民党当局设计陷害，工委成员被迫疏散转移，但县工委仍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坚持开展隐蔽斗争。

1938年2月，中共毕节县工委建立后，除加强党的建设，着力培养入党对

象，发展党的组织外，主要抓了两件事：第一，利用1937年6月开办的“群益书店”作为宣传阵地，购进和销售了大批进步书刊，如《列宁选集》、《鲁迅全集》、《论持久战》、《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新华日报》等。书店由于得到了省工委和贵阳“生活书店”的支持，每次进货都优先购得很多畅销书，这些书不但在较为偏僻、闭塞的毕节畅销，书店还以发行教科书为名，将这些进步书籍、报纸推销到毕节地区各县和云南的镇雄、昭通、彝良等地，既扩大了销售渠道，增加了书店收益，更重要的是使马列主义和我党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对地处西南边陲，国民党势力控制较严密的贵州，特别是相对落后的毕节来说，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第二，1938年秋，国民党第八补训团政治处驻毕节，县工委促其成立了“孩子剧团”，并利用该剧团到大定、黔西等地沿途开展抗日宣传，演出抗日节目，张贴标语、漫画，散发传单，大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当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8年12月，“群益书店”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经常派特务到书店进行监视，检查书报。为防止敌人的进一步破坏，根据省工委指示，县工委书记邱在先转移大定，王芸生接任县工委书记，继续开展党的工作，组织“读书会”，开办学校，对群众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组织学习马列著作，培养进步青年，使不少人后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骨干。1941年1月，由于叛徒的出卖，王芸生等县工委委员和邱在陵等党员及进步积极分子相继被捕，中共毕节县工委遭到严重破坏，停止了活动。

1938年4月，中共遵义县委在杨天源、谢树中等人的积极努力下恢复，杨天源任县委书记，谢树中任副书记。县委首先同国民党遵义当局展开争夺青年知识分子的斗争，决定派谢树中、傅邦瑞打入国民党遵义县党部组织的“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抗”），团结爱国青年，加强我党对“青抗”的领导，把国民党控制的“青抗”争取、改造过来。通过地下党组织的号召和发动，在进步教师潘名挥等的支持下，一些进步青年积极参加到“青抗”的工作中来，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激发了人们的抗日热情，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培养和发展了一批骨干分子和党员，从1938年到1940年，中共遵义县委先后

发展了20名党员，壮大了组织力量。

中共遵义县委为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经过积极筹备、并得到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同意，于1939年9月底开办了“快读书店”。书店开办之初，为了增加保护色，县委委托政界、文化教育界、商界的朋友出面牵头，联络各界知名人士集资入股筹办书店。书店经理是中共党员刘星洲，书店明里是销售中小学校教科书和科技书，暗中则在贵阳“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和重庆的“读新书店”、“生活书店”及重庆新华日报的支持下，购进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解放》周刊、《军事杂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文艺战线》、《列宁选集》、《资本论》、《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报刊，采取后门进、后门出的销售办法在当地销售，购者甚众，销量可观，仅《新华日报》每天的发行量就超过当时遵义销售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一倍。书店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惶恐不安，省党部主任黄宇人到遵义指责“快读书店”是共产党的基地，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来遵义时，也对该书店的开办向遵义当局提出了警告。国民党遵义县当局的警察、宪兵、特务于是经常以出版检查制度为由，开列“禁书”单，加紧对书店进行搜查，任意拿走书架上的红壳子书籍，对经理刘星洲进行跟踪监视，企图寻机逮捕。由于书店被邮检扣留的书报太多而无法继续营业，被迫转让他人，另租铺面以“合力文化教育用品社”的名义经销文具，代销《新华日报》，直到1941年完全停业。

1939年夏季前，省工委派陈光型、夏思明、李知群、李绰然等到遵义县工作。为充实县委力量，8月，省工委决定陈光型任中共遵义县委副书记。次年6月，陈光型调离，李知群接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1940年秋，县委书记杨天源转移到乡下隐蔽，县委工作即由李知群和李绰然暂时主持。

1939年冬至1940年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贵州当局大肆破坏中共组织，抓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省工委遂采取紧急疏散措施。省工委书记邓止戈转移途中离开桐梓时，派隐蔽在桐梓的地下党员赵促成去遵义，同隐蔽在遵义的地下党员陈光型、李绰然、唐贵等接上组织关系，李绰然以省工委名义组建了中共黔北特区委，李绰然任书记。中共黔北特区委的主要任务是联络遵义、桐梓、仁怀、湄潭、金沙、思南等地的党组

织，疏散隐蔽干部，筹集活动经费，转送《新华日报》等，负责领导黔北各县党组织开展活动。由于此时仍处在疏散隐蔽时期，黔北特区委的人员大都转移他地，陈光型根据省工委指示去思南，因此时思南地下党组织遭破坏，旋即返回遵义时留在湄潭；李绰然转移至老家湄潭隐蔽；赵促成则转移到仁怀。黔北特区委实际只有唐贵一人活动在遵义与贵阳之间。1941年3月，唐贵调任中共贵阳县委书记，同年8月及次年3月，李绰然、赵促成相继被捕叛变，至此，中共黔北特区委活动终止，组织解体。

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气焰日甚，继1939年冬至1940年春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又于1941年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遵义当局也加紧了对中共地下组织的侦查破坏，大肆跟踪逮捕中共党员，加之中共地下组织内部相继出现叛徒，造成中共遵义县委的处境更加困难，活动受到限制，党员的安全也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转移敌人视线，杨天源在受到叛徒严密监视，并妄图通过对其监视而抓捕到更多中共党员的情况下，于1941年3月只身转移到湖南常德隐蔽，遵义县委再次停止活动。特别是曾主持过遵义县委工作，任过中共黔北特区委书记的李绰然于1941年8月被捕叛变，给中共遵义地下组织造成严重危害。国民党遵义县党部于同年9月对全县中共党员进行大搜捕，逮捕了傅邦瑞、徐继芙等5名中共党员和傅邦荣、潘名挥等爱国青年。至1942年春，中共遵义县地下组织机构解体，停止活动。

这一时期，省工委还在黔北地区成立了中共桐梓城市工作支部和中共桐梓支部，批准在湄潭成立了中共永兴支部即中共湄潭支部，不久又建立了中共湄潭县总支。该总支下辖7个支部，即湄潭支部、城区支部、永兴支部、七七支部、德隆支部、协育支部、水文支部，这些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当地以及黔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早在1935年4月建立的中共安顺县工委，在谢速航的领导下，一直在安顺地区坚持斗争。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积极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根据安顺地区地下斗争的实际，县工委于1938年1月28日创办了《烽火》杂志，先后发表了《发刊辞》、《加强我们的斗争》、《我们需要健全

的——救亡组织》、《全面抗战与贵州土匪》、《一·二八六周年》等针砭时弊、号召全民抗战、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政策的文章。这本杂志不仅发送给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阅读,还在书店里出售。由于刊物文章观点鲜明,言辞犀利,具有较强的号召力、鼓动性,因而成为人们争相传阅的读物。正因为这样,《烽火》成为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要求国民党贵州当局将之取缔并逮捕刊物主办者。至此,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烽火》被迫停刊。

由于地下党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县工委从敌人内部获知当局准备以"勾结土匪"的罪名逮捕谢速航等人后,经省工委决定,1938年10月谢速航撤离安顺,转移外地,县工委工作移交给杨斌毅负责。1939年春,安顺的形势愈来愈不利于地下活动的开展,杨斌毅遂调离安顺,县工委由朱桂林负责。为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需要,经省工委批准,1939年3月成立了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由朱桂林、刘英泰、张恒兹3人组成,负责领导安顺、紫云、镇宁等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争取和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投入抗日救亡活动。

安紫边区领导小组成立后,旋即进行了全面的社会调查,并讨论决定了七条工作意见:1. 大力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发动紫云师资训练班的学生,把他们培养成革命骨干;2. 做好社会失学失业青年的工作,灌输革命思想、引导其走上革命道路;3. 加强对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宣传,争取到各基层小学任教,推动阅读进步书刊,扩大对教师和学生的影响;4. 到农村去动员群众,组合民间枪支,建立革命武装,作好抗日游击战的准备;5. 注意吸收有武装的财主子女参加,只要求他们有抗日反蒋的思想,不过分强调家庭成分;6. 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那些主张抗日和倾向革命的地方人士及政府职员,并在他们中间建立情报耳目;7. 利用地方派系矛盾,尽力争取那些受官府或封建豪强势力欺压的地方武装,为我所用,求得武装力量的发展。

根据上述意见,地下党全面开展工作,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号召,以紫云合作金库和师训班为据点,联络地方爱国人士及学校师生,在县城与部分乡、镇开展了抗日宣传,举办"读书会",组织阅读进步书刊和革命理论读物,促使一批青年迅速觉醒。同时还加紧了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准

备，以便日军入侵贵州时开展游击武装斗争。认为武装斗争必须扎根于农村，依靠农民群众，组合民间枪支，建立由党领导的革命武装。1940年4月，安紫边区领导小组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他们一边寻找党组织，一边独立作战，坚持斗争。1942年6月，朱桂林在镇宁双目乡被捕，之后，刘英泰等也相继被捕，安紫边区还有一批党员和革命骨干遭敌通缉，党的活动处于非常艰难阶段，边区的领导工作由张恒兹一人负责。次年春，从外地转移来的地下党员胡博与张恒兹接上关系后，也参加了安紫边区的领导工作，在艰难的环境中，他协助张恒兹坚持开展党的各项活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此后数年，安紫边区地下党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依据党的一贯方针政策和针对形势的变化，历尽艰难险阻，同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活动区域扩大到了长顺营盘一带，影响很大。他们还创办了《大众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国民党的腐败，激励人民起来斗争。

1938年上半年，长期隐蔽在思南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肖次瞻等，认为此时正式建立思南地下党组织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便起草了《思南地下党组织大纲（草案）》、《工作大纲（草案）》两个文件，并派商学礼带到贵阳请示省工委。6月，省工委即派党员宁起鲲（宁汉戈）到思南，传达省工委关于筹建中共思南县委的决定，同时组建了中共思南临时工作委员会，由肖次瞻任书记，熊大瀛任组织委员，宁起鲲任宣传委员。思南县临工委成立后，派肖维亮专程赴贵阳将中共思南县委的筹组情况报送省工委。8月，省工委正式批准建立了中共思南县委，肖次瞻任书记，熊大瀛任组织委员，宁起鲲任宣传委员，由于宁的职业必须常下乡，因此肖维亮也分管宣传，金贵昌管青年统战工作。县委成立后，其首要任务是把经过多年培养、已够党员条件的同志吸收进党内来，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先后发展了22名党员，建立了机关、思南中学、农村（塘头）3个支部，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广泛地团结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抗日声势日渐高涨，其活动范围覆盖了邻近几个县。

1938年冬末，根据省工委指示，思南的工作划归黔北领导。1939年春，李宗泽经熊大瀛介绍入党后也参加了县委。1940年2月肖次瞻奉省工委指

示调贵阳工作，之前，宁起鲲亦离开思南，这样，思南县委委员的分工也进行了调整，熊大瀛任书记，肖维亮分管组织，商学礼和李宗泽共同分管宣传，金贵昌分管青年和妇运，思中支部改由肖维亮领导，塘头支部仍由金贵昌负责，机关支部还是由熊大瀛任支书。这时，正值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党在思南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也受到国民党县党部压制和破坏，思南地下党组织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揭露了他们的恶劣行径和反动阴谋。但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也为敌特所侦知，1940年7月12日，在刚刚纪念七七事变3周年之后不几天，国民党军警就包围了思南县委所在地——城区小学，逮捕了熊大瀛、商学礼、李宗泽3人，思南县委遭到破坏。同时，敌特还在全城追捕中共党员，思南及其附近几个县都陷于国民党反共恐怖之中。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严峻形势，为避免更大的损失，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其他党员和进步人士迅速进行了转移，有的转到贵阳，有的转到重庆、湖南、昆明，在新的环境重新投入战斗。

新场原为黔西县的一个重要集镇，早年建场时，由于方圆数十里老百姓打着鼓前往赶集，因而得名打鼓新场。1938年10月，省工委委员秦天真秘密来到新场，在分别听取了新场一小校长蓝芸夫（蓝运富）和李绍夫（四川人，曾参加过地下党后失掉关系，在黔军中任过营长）等的情况介绍后，经过考察，首先介绍了蓝、李二人入党，再由他们两人介绍并经秦天真逐个审查同意发展了20余人入党。在此基础上，秦天真代表省工委宣布成立中共新场总支，李绍夫任书记，廖明星、林正良、蓝芸夫分别任组织、宣教、统战委员。新场总支成立后，按照省工委的安排和部署，积极团结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地方贪官污吏的罪行，主办了《铁血》墙报，宣传《新华日报》文章等。之后，新场总支为加强力量，还派党员廖明星、王承云、余宗铭和进步青年蒋学正、肖济华等到清池小学任教，建立了清池党支部，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入党。支部建立后，即采取各种形式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成立了“抗日救亡话剧团”，通过公演话剧宣传进步思想和党的抗战主张。

1939年初，国民党黔西县党部对新场一小的动向有所察觉，蓝芸夫被调离到黔西城区一小任校长，以便监视其活动。为避免更大暴露，总支立即采

取应对措施，及时将党员林正良、罗学敏转移到石场教书，并成立了中共石场支部，对其他党员也进行了妥善转移，有的调离原地，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则到外地隐蔽，转移范围主要在黔西、大定、仁怀3县，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新场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

1939年春，由于蓝芸夫到黔西城区一小任职，新场总支的活动中心随之渐次转移到黔西县城。不久，省工委派李绰然到新场检查工作，针对总支前段的工作提出了两条意见：第一，在国民党后方不要搞武装斗争；第二，宣布建立中共黔(西)、大(定)、仁(怀)3县中心县委。指定蓝芸夫任书记，廖明星为委员。同年3月，李绰然又从贵阳来到黔西，向蓝芸夫传达了省工委有关中心县委的工作安排、中心县委与省工委联系的地址、省工委和中心县委及所属各组织的代号以及有党员3人以上可成立支部等7条指示。中心县委根据省工委的指示，于3月底在黔西东门外河滩上秘密召开会议，研究了下步的工作计划，确定了蓝芸夫、廖明星、张有民3名县委委员的分工，明确了中心县委的工作，主要是领导3县党组织积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革命力量，广泛开展以抗日救国为中心的革命活动。

1939年冬到1941年，由于蓝芸夫等的活动又引起国民党黔西县政府的注意，蓝芸夫等遂转移去了延安，黔大仁中心县委的工作由蓝芸夫指定周自达负责。此时，正值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猖狂的反共高潮，地方反动当局也加紧了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监视、侦破，动用了各种卑劣手段，大肆搜索、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加之周自达等人叛变，导致黔大仁中心县委及所属总支、支部遭到破坏，其党员一批被国民党杀害，一批投降叛变，一批则及时进行了转移，有的还奔向了延安，还有一部分没有暴露的同志，他们在极其困难的环境、条件下，积极寻找党组织，继续坚持斗争。

1938年11月，中共党员田伯萍受省工委派遣到沿河县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工作。田到沿河后，由于他所依靠的社会关系，沿河县长陶某(其女陶浩为中共党员)被地方土绅排挤而离开沿河，省工委根据这一情况，通知他转移镇远。镇远城当时是镇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贵州有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抗日战争开始后，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先后来到这

里活动，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曾一度使镇远的抗日救亡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田伯萍到镇远后，通过镇远邮局职工、中共党员陶涵春结识了进步青年陈法轼，并结下了亲密的关系，之后田很快介绍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镇(远)遵(义)师管区补充团新兵到镇远集训，田伯萍即通过谢速航的关系到该团任上士文书。谢速航此时在补充团任中尉军需官。经秦天真密信介绍，田伯萍与谢速航接上关系。1938年12月，田伯萍、谢速航、陈法轼组建了中共镇远支部，受省工委的直接领导。

镇远支部成立后，其任务一是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二是注意从活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三是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发展“民先”队员；四是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支部首先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通过组织读书会、歌咏队、音乐研究会，发展“民先”队员等，先后团结了近百名爱国青年、学生，形成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骨干力量。支部除了在镇远建立读书会以外，还在施秉、台江、黄平等地也建立了读书会。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支部利用田伯萍、谢速航在补充团任职的有利条件，使用补充团的钢板、蜡纸、油墨、纸张，秘密创办了油印小报《海燕》，报道各地“民先”的抗日活动，激发爱国青年的抗日热情，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由于这份小报办的内容多样、形式活泼生动，深得青年、学生的喜爱。之后，陈法轼被调省邮局，谢速航也因身份有所暴露，按省工委指示随补充团离开镇远开赴湖南，田伯萍仍留镇远坚持工作。他经人介绍在镇远民众教育馆谋得刻印钢板、抄写资料的差事，便利用这一合法阵地，通过馆里进步青年公开办起抗日壁报，成立歌咏队，教唱抗日歌曲，排演《放下你的鞭子》、《娘子军》等抗日剧目，散发抗日传单，不仅在街头演出，还到第二战俘收容所(和平村)演出，场面感人，情绪激昂，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1939年6月，陈法轼被调回镇远邮局工作。7月，陈与中共党员谭科森组织成立了镇远邮电员工俱乐部，配合镇远党支部的工作。实际上，陈法轼早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监视，回镇远后又以“贵州邮务工会镇远特别组”的名义发出函件，支持湖南常德邮工加薪的要求，更引起敌特的注意，两月后即将其调到土城，1941年7月，旋又调到松桃。11月20日陈法轼被国民党松桃县党

部逮捕，次年6月20日被杀害于贵阳。

1939年10月，由于谢速航、陈法轼已离开镇远，田伯萍与被吸收入党的宋大鸣、欧阳德风成立了新的支部，田伯萍仍任书记，宋大鸣、欧阳德风各任组织、宣传委员。支部把镇远师范作为活动的大本营，成立读书会，组织会员阅读进步书刊，将会员中的积极分子发展为“民先”队员，经过培养锻炼，把其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党。

镇远爱国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从一开始就被国民党当局、敌特机关所监视，并尽其破坏之能事，派人混入读书会、歌咏队，找碴子，干涉阻挠，寻找共产党员的线索。1939年下半年，随着蒋介石抗日态度的日趋消极，反共反人民的倾向日益增长，镇远各特务机关迫不及待地暴露出敌视共产党、敌视人民、敌视抗日救亡活动的狰狞嘴脸。当特务一次从邮局查出一本进步图书后，便开始了搜捕镇压。对党支部的秘密联络点、进步学生聚会处周公馆进行突然搜查，宋大鸣、陈学联和一些“民先”队员、读书会会员分别被特务机关审讯或传讯，党支部的活动也已被敌特注意、监视。鉴于形势严峻，处境危险，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田伯萍按照省工委的指示，于1940年春转移贵阳。田伯萍离开镇远后，宋大鸣任支部书记，张文锐任组织委员，继续领导镇远的抗日救亡活动，仍然在学生中开展工作，不因为特务的破坏而停止发展读书会会员和“民先”队员，并先后发展吸收了宋大辉等人入党。后来，由于镇远当局的授意，宋大鸣被镇远师范学校除名，迫于形势，宋大鸣亦疏散到了外地，支部书记由欧阳德风接任。1940年7月和10月，支部先后吸收发展了一批党员。同年11月、12月，张文锐、欧阳德风先后被捕，其他党员也陆续离开镇远，至此，镇远支部停止活动。

在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的党组织中，还有一个党的小组，这就是凯里党小组。凯里党小组始建于1935年冬，李光庭、李长青为负责人。党小组直接受省工委领导。

1938年春，凯里党小组根据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停止针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后，小组成员相继离开凯里分散到各地活动。李光庭打入国民党镇(远)、遵(义)师管区任连长，喻雷赴安顺等地活动，王毅(王芸生)

先在中共贵阳县委工作，后受省工委派遣任中共毕节县工委书记，李长青则留在凯里继续活动一段时间后，也于1938年8月转移到了省立黄平谷陇加巴小学。1940年李光庭、李长青、喻雷先后回到凯里，根据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转入隐蔽活动，分别在凯里、麻江等地开办“荣通酒精厂”、“开斯米”烟厂，种植烤烟，开设“食盐代销处”等，广交社会朋友，培植革命力量，为党组织筹措活动经费。1940年4月，秦天真奉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撤离贵州去重庆南方局，凯里党小组与省工委失掉了联系。但他们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仍然坚持斗争，开展工作。后来，党小组派李长青到重庆与南方局接上了组织关系，党小组努力贯彻南方局的指示精神，认真执行中央国统区工作方针，从黔东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地下活动，重点是做统一战线工作，广交社会各界朋友，积蓄革命力量。

这一时期，除了上述党的组织和活动外，为了加强对贵州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经省工委批准，黔大仁中心县委还于1939年初成立了大定党支部，邱在先任书记。黔大仁中心县委还于1939年3月指派党员廖明星到仁怀县筹建仁怀党组织，同年5月1日成立了中共核心小组，刘敦矫任书记，次年1月，中心县委将核心小组改建为中共仁怀支部，周礼明任书记。与此同时，省工委还注重在学校和文化社会团体中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党的领导。抗战爆发前，在学校已建立了贵阳高中、女师、男师、达德等学校党支部，1938年3月，为便于领导贵阳中学、省立高中、省立师范、省立女师、省立女中几个学校党的工作，成立了中共学校总支联。5月扩大为中共学校总支，李进忠任书记。此外，还在贵阳医学院、大夏大学、平越交通大学，以及贵州农村合作人员讲习所等学校和文化、社会团体中也建立了党支部。生活书店、邮电及公路运输部门亦相继建立起党支部。

从抗战爆发到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建立前，贵州中共组织的建设发展很快，特别是在贵阳，党的活动十分活跃，整个抗战期间，先后建立了22个党支部，其中学校支部9个，社会团体中的支部4个，政府所属部门中建立的支部8个，文化支部1个。全省党员人数，由抗战前的150余人发展到500

余人，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组织建设不断巩固加强。这些党组织在省工委的领导下，遵循中共中央的抗日方针政策，充分利用公开合法的社会团体及群众组织，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分开，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使全省党组织的建设出现了一个高潮。

省工委在逐步建立健全全省各地党组织，有力地推动了贵州抗日救亡运动的普遍开展，切实加强了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的同时，还特别注意了思想和干部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为了获得和占领抗日宣传教育阵地，省工委在贵阳建立了《新华日报》分销处，在生活、读新书店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另外，各地党组织还分别在平越建立了“八一三书店”，在遵义建立了“快读书店”，在毕节建立了“群益书店”。通过这些书店或分销处，大量地销售和赠送马列著作、抗战书籍及进步书刊，向广大党员、群众介绍前方抗战、后方救亡的真实情况，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鼓舞民众起来抵御侵略，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为加强干部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以适应复杂多变和环境恶劣、条件艰险的地下斗争的需要，省工委先后分别在贵阳、紫云、湄潭、晴隆等地举办党员训练班，着重学习党的历史、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政策，联系贵州实际讨论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行“反共、溶共、限共、反共”政策、枪口对内的反动方针的情况下，白区的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应采取的策略。还在党员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关系的教育，进行形势、纪律、气节的教育等，要求党员在新的斗争形势下加强对政策及理论的学习、掌握，提高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坚定革命信念，经受住实际斗争的考验，从思想上巩固党员队伍，提高执行党的政策的坚定性。

二、党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的全面高涨和贵州各族人民的英勇抗战

贵州地处国民党统治的抗战大后方，中共贵州地方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党在国统区工作的方针，在十分复杂的环境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通过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用各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展抗日进步力量，组织领导了有一切爱国群众参加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成为团结全省人民抗日的中坚力量。在党组织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省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在贵州高原展现了一幕幕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抗战斗争画面。

（一）党领导下的爱国学生运动

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活动

1937年7月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省学联）成立后，利用各校学生自治会在校内外广泛开展抗日宣传，采取的主要形式有办墙报、成立歌咏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游行示威等。省学联还秘密创办了《贵州学联》，发表了《告同学书》，号召全省学生在民族危机之时，挺身而出，组织起来，掀起全民族抗战

的新高潮。《贵州学联》在贵州学生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指导全省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工具。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黄大陆从延安回到贵阳，主持贵州党的工作。中共贵州地下组织一方面加强党的建设，一方面加强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也同时加强了对省学联的领导。同月，文艺界爱国人士发起组织了贵阳文艺界抗敌救国会，成立大会在国民党省党部礼堂举行。国民党当局为了控制这个群众文艺团体，派遣了大批青年阵地社分子到会，企图掌握该会领导权。中共地下组织获知情报后，决定由学联动员进步学生参加，学联与文艺界进步人士占了优势，会议选举了爱国进步人士刘方岳任主席，使这个抗日救亡团体没有被国民党当局所掌握。10月，学联还利用女中校刊，为纪念辛亥革命26周年出版专刊，所载文章通过阐述分析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指出了当前日军压境、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号召广大青年学生奋起抗日。此外，学联还根据中国共产党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的精神，印刷各种宣传品，组织各种读书会、讲演会，动员爱国学生起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以造成抗日救亡的热烈气氛。省学联所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通过一系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的工作，从而打破了自1935年七一九事件以来贵州学生运动的沉闷局面，成为中共组织领导下的贵州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的开端。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发展，在中共组织的引导教育下，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抗日救亡是全民族的神圣事业，仅凭学生界的力量是远远不能完成这一使命的。必须深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人中去，到军队中去”，把学生运动发展为广泛的民众运动。正在这时，国民党贵州当局由于不积极组织群众宣传抗日，引起贵州人民的极大不满，迫于全国抗日形势，不得不于1938年初组织了寒假学生农村工作团。省学联利用这个机会，决定运用平津学生扩大宣传团的经验，组织学生在寒假期间到城乡、到民众中去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于是，各校的学生寒假农村工作团纷纷成立。由于学联几个月来的出色工作，在广大学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不少党员和学联骨干被推选为工作团的分团团长及干事。由于这些分团团长都是各校学联

支部的负责人，因此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贵州省学联便完全掌握了寒假学生农村工作团的领导权，国民党贵州当局企图控制寒假农村工作团的目的没有达到。

寒假农村工作团成立后，学生们即着手进行下乡的准备。为了扩大抗日宣传的影响，各校工作团于1938年1月18日在省民众教育馆联合举行“省会各中学扩大抗敌宣传大会”，会后，学生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同时散发张贴标语，刊登壁报，组织歌咏队等，晚上还进行话剧表演。演出《九一八以来》、《血洒卢沟桥》、《青纱帐里》、《大海中的孤军》、《打鬼子去》、《扬子江暴风雨》、《张家店》、《烙痕》等剧目，并连续演出3夜，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寒假开始后，各校分团按计划奔赴农村。学生们深入乡间后。与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向他们宣传抗战形势，动员大家起来保卫国土，誓死不做亡国奴。省立高中寒假工作团的学生们步行几十里，来到修文县属的山区，他们走村串寨，向贫苦农民讲述抗日救亡的道理，直到除夕才返回贵阳。在贵阳市郊农村，同学们白天作宣传调查，夜间演话剧，短短的时间里，市郊农村到处贴满了宣传抗战的标语，村村可以听到抗日救亡的歌声。寒假学生农村工作团在不长的时间里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它不仅为沉寂的山寨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而且推动了全省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向前发展。

各校寒假学生农村工作团除了在乡间广泛进行宣传外，春节返回贵阳后又联合在贵阳城区开展宣传活动。贵州民众教育馆位于市中心中华中路，它是各校学生集中开展练习唱歌、排演剧目和演讲训练的场所，每天从早到晚都有上百名学生到这里参加活动。学生们的活动吸引了不少群众，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称赞和支持，一些进步教师、文化界的进步作家、音乐家也直接参加了这些活动，运用他们的特长配合学生的抗日救亡宣传。

当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国民党内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势力刮起了一股反人民、反民主的逆风，扬言即使实行民主也应在抗战胜利之后，目前只能实行军事统治，有的人甚至高叫“一个党，一个主义”。这种与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格格不入的反民主声音，在贵州也

有反映。由于省学联活动的影响不断扩大，遂引起了国民党贵州当局的注意。2月19日，贵阳各学校寒假学生农村工作团的成员正在民众教育馆排练话剧，准备举行联合公演。然而，就在这天下午，国民党贵阳县党部突然通知召开各校学生寒假工作团分团长会议，将于蕴、王栻、聂奇慧3人诱骗到国民党贵阳县党部，先是围攻毒打、游街，后是予以逮捕。同时，一群全副武装的军警将在场的爱国青年全部包围，30余名学生被驱赶到民众教育馆前广场，并在民教馆附近街道上逮捕了李德邦、饶元祚、方为策3人，随后特务又到青岩周树楹的家里将其逮捕。这样，国民党当局在2月19日这一天，共逮捕了7名学联领导成员，制造了震惊贵州全省的“学联事件”（亦称二一九事件）。

二一九事件的当晚，省工委成员黄大陆、李策和省工委机关工作人员严金甡等，在高家花园召集各校学联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营救被捕人员，并制定了营救办法。次日，数百名学生高擎着“要求释放无辜被捕同学请愿团”的大幅横标，高呼“团结起来，共赴国难”等口号，唱着“枪口对外，齐步向前”等救亡歌曲到省政府门前请愿示威。但直到天色近黑，省主席吴鼎昌仍拒而不见，使同学们更为气愤，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遂忍饥挨饿，聚而不散，并不断向围观群众愤怒揭发国民党贵州当局破坏抗日，无理逮捕爱国学生的丑行，引起围观群众义愤，纷纷质问“抗日救国，何罪之有？”为怕事态扩大，当局迫不得已，才传出话来，要学生们先回家，然后省政府放人。同学们见目的已达到，才有秩序地散去。但是贵州当局并不真正打算放人，从事件一开始，他们便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并给逮捕的学联领导人捏造了“汉奸”、“托派”、“王公度余孽”等罪名，准备血腥镇压爱国学生。

2月21日，贵州当局又逮捕了黄大陆、李策和严金甡3人。这样，他们便完成了通过逮捕省学联负责人进而破坏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罪恶计划。

黄大陆、李策、严金甡被捕后几天，省工委书记邓止戈、委员秦天真受中央派遣，从延安经武汉到达贵阳，他们到贵阳后立即投入到领导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中。经省工委和社会人士的多方营救，甚至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也出面交涉，国民党贵州当局才不得已于3月4日释放了于蕴、聂奇慧、李德邦、周树楹、饶元祚、方为策6人，但仍

以种种无理借口将黄大陆、李策、严金甡、王栻继续监禁，不予释放，并于皖南事变后将他们秘密杀害。

二一九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省学联被迫停止了活动。但全省广大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热情并未被扑灭，他们迎着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逆流前仆后继，勇敢地继续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贵州的活动

1936年2月，平津学生扩大宣传团的团员们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精神，发起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这一革命青年组织，并发表了成立宣言。该组织以“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和“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为自己的斗争纲领，号召发动全民抗战，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次年2月，“民先”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很快把“民先”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华北及全国各地，贵阳以及贵州一些地方的“民先”组织和活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和开展起来的。

1.“民先贵阳地方队部”的建立与活动

1938年初，武汉“民先”总部派遣张益珊（中共党员）到贵阳开展“民先”工作。张益珊到贵阳后，通过黄齐生介绍结识了李良康、饶元祚、凌毓俊等人，商量了建立贵阳民先地方队部的事。李良康曾在北平师范大学附中读书，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加入了“民先”组织。北平沦陷后，李良康转学贵阳高中，继续在青年学生中宣传“民先”的性质、活动及其斗争经验，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队部”的建立作必要的准备。张益珊还经黄齐生的介绍，到贵州农村合作委员会助理员讲习所与那里的学员接触，并发展了杨斌毅等10多人加入“民先”。1938年3月，省工委在贵阳大马槽9号（现都司路）召开会议，省工委书记邓止戈在强调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指出搞青年运动必须采取多种多样形式之后，告诉大家“民先”总部已派人来贵阳，着手创建贵州贵阳“民先”。因为“民先”是公开的组

织，进行的是公开的活动，省工委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遂决定派一部分党员以群众身份加入“民先”，同时，还动员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民先”组织和活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可以公开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4月，贵阳民先地方队部正式成立。张益珊任队长，凌毓俊任副队长，李良康任干事，队部设在丁家祠堂（今贵阳冠生园所在地）。队部下设区队和分队，分队是以各校各工作部门为单位而建立，由几个分队组成区队。贵阳高级中学、贵阳女子师范学校、贵阳男子师范学校、贵阳女子中学4个分队组成一个区队，饶元祚任区队长，李德邦任副区队长；贵阳中学分队和邮电分队组成另一个区队，方为策任区队长。

“民先”在贵阳的活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参加者非常踊跃，队伍发展十分迅速，自贵阳队部成立到6月底，“民先”队员就发展到了300余人。他们怀着“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忠诚和坚决”，以“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民族；救我们的国家，救我们的民族”为己任，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在贵阳及省内其他地区开展内容丰富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经常采取印发传单等方式宣传抗战，宣传“民先”的性质、任务和特点，通过宣传。加深了群众对“民先”的了解。积极进行军事技能的学习训练，运用各种可能的形式来实现全民抗战。因此，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的学习训练，成为“民先”队员的一项重要课程。为配合贵阳地区抗战文艺宣传，贵阳队部组织队员，到筑光音乐会和沙驼话剧社等文艺团体中演出进步剧目，还把演唱、教唱抗战歌曲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学习宣传抗战理论，传播爱国思想。通过组织队员和青年学生学习，既丰富和提高了他们的理论知识和水平，又能使这些理论和进步思想得以传播。举办时事政治报告和讲演比赛、歌咏比赛、篮球比赛等活动，以加强“民先”与爱国群众之间的联系。

贵阳“民先”在公开的群众活动中扩大了抗日宣传，特别在青年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随着“民先”抗战活动在贵阳地区的开展，队伍的不断壮大，不仅影响了整个贵阳山城，而且对全省的抗日救亡活动，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使活动范围延伸扩展到其他地区，贵阳地方队部决定派遣骨干队员到一些县、区发展组织，扩大力量。经过这些队员和当地抗日救亡积极分子

的努力，“民先”组织像火种一样，很快播撒到了湄潭、沿河、安顺、郎岱（今六枝）、盘县、镇远、平越（今福泉）、铜仁等地，这些地方均先后建立起“民先”组织。各地“民先”组织的工作在本地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尤以湄潭、安顺、郎岱“民先”组织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地方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2. 湄潭、安顺、郎岱等“民先”组织的建立与活动

七七事变后，在全国抗日的怒潮中，地处黔北的湄潭，一批进步青年学生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秋冬之际，湄潭中小学爱国学生发起组织了湄潭学生抗日救国团，并立即开展了抗日宣传、募捐等。10月，抗日救国团通过斗争赶走了阻挠抗日的县长，湄中校长也被撤职，原在北平读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加入“民先”的共产党员乔光鉴接任了湄中校长职务，各校学生的爱国活动变得更加活跃。

1938年春，乔光鉴与进步教师顾诗灵、严林心等人，在湄潭中学秘密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湄潭地方委员会”，先后发展了队员40余人。在“民先”组织的带动下，湄中分别组织了读书会、实验队、青年抗日同盟会、妇女会、歌咏队、话剧队等，使湄潭城区的抗日救亡气氛十分浓厚。读书会名义上是组织一些学生认真读书，实际上经常由“民先”队中的中共党员辅导会员阅读革命进步书刊，组织会员座谈、交流学习心得，提高大家的理论水平。实验队下设纠察队、宣传队。纠察队专门负责维护救亡宣传的秩序，防止发生破坏行为。宣传队一方面通过文艺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抗日觉悟；一方面通过募捐活动和社会服务，支援前方的抗战。青年抗日同盟会则主要发动全校师生开展献金、募捐活动，给抗日将士写慰问信等。

1938年暑假，湄潭“民先”决定将活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永兴“民先”队为主，组成暑期学生抗日宣传团，从永兴出发，沿湄潭四周乡村开展活动；一部分为了与贵阳“民先”队部建立联系，以湄中学生为主的“民先”队员，由乔光鉴、顾诗灵率领，组织了“飞鹰步行团”，由湄潭经遵义到贵阳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抗日宣传团共50余人，在严林心的率领下，于7月下旬从永兴出发，在县城周围10多个场镇进行宣传，演出了街头剧、打花鼓、铁竿（民间曲艺形式）、金钱板等，每到一地还组织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抗战歌曲，晚上除演出节目外队员们还分头到群众家里作抗战宣传动员。

“飞鹰步行团”也沿途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出发前，大家订立公约：（1）拥护国共合作，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开展宣传活动，不畏强暴，不怕迫害，坚持抗日救亡宣传活动；（2）全体团员按军事编制，坚持不乘车，不宿民房，不损害群众利益。并宣誓：“我们要像飞鹰一样，展翅飞翔。”出发后，团员们意气风发，沿途开展了高唱抗日救亡歌曲、书写抗日标语等救亡宣传，在遵义和贵阳都得到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接待。在贵阳期间，步行团与贵阳“民先”联合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取得了积极的宣传效果，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然而，国民党当局却极端仇视步行团的活动，不断派特务流氓、军警找步行团无理取闹，捣乱破坏，当“飞鹰步行团”完成宣传任务，返回湄潭后，当局以行动危险，诱惑青年为由，撤销了乔光鉴湄中校长职务，解聘了大部分进步教师。接着，中统特务组织还加强了对湄中的监视，大批特务分子被调到湄潭，专门从事破坏群众爱国活动。

进步师生们并没有被国民党当局这种恶劣做法所吓倒，为了挽留乔校长，反对当局的倒行逆施，湄中进步师生组织全校罢课，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学潮，印发罢课宣言和传单，在街上刷写标语，并举行了示威游行。

湄中学潮使国民党当局更加恼怒，为此，他们加紧进行了镇压。开始是将部分进步学生强行禁锢在校内，并没收了他们订阅的进步书刊，从而激起了广大学生的强烈不满。11月3日夜，湄中学生黄培纪、冯开显、刘其华、廖清廉、张永政、肖士梁、梅位宾7人，不顾当局禁令，翻墙出校，沿街用粉笔书写了“反对湄潭党政联合检查处非法没收进步报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提倡爱国自由”、“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湄青年学生联合起来，打倒阻碍抗日救亡运动的一切混蛋”等标语。11月4日上午，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陈世锡率领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了湄中，逮捕了中共党员黄培纪、冯开显、廖

清廉和“民先”队员周极成、张永政、梅位宾、肖士梁7人，制造了震惊全省的湄潭“七人之狱”。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除了给这7人戴上脚镣手铐，分别进行严刑逼供外，还到处散布谣言，对他们诬以“汉奸”罪名，妄图予以杀害。为了保护这7名爱国青年，揭露反动当局的阴谋，中共湄潭地下组织发表了宣言，用大量事实证明被捕的7名学生是爱国青年，并强调指出这次事件完全是湄潭当局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蓄意制造的事端，强烈要求立即释放。不久，《新华日报》以“贵州来客谈”为题发表消息，《新民报》也发表了关伯庸用“舒靖”笔名写的《乡愁》一文，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湄潭当局破坏抗战的卑劣行径。

“七人之狱”是国民党湄潭当局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害爱国进步青年学生制造的一起恶劣事件。由于湄潭地下党组织散发的宣言和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国民党当局不敢按照他们事先策划的以“汉奸”罪名杀害这7名爱国青年，但除廖清廉因患伤寒症获“取保外医”外，其余6人均被扣上违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分别被判处2至3年的徒刑。这一事件后，湄潭“民先”为保存实力，免遭破坏，停止了公开的斗争活动。

1938年6月，贵州农村合作委员会助理员讲习所结业，张益珊派杨斌毅到安顺建立“民先”安顺县队部。杨斌毅到安顺后，按照省工委委员秦天真的安排，先与中共安顺县工委书记谢速航接上了组织关系（杨在贵州农村合作委员会助理员讲习所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汇报了组建“民先”安顺地方队部的计划，得到了中共安顺县工委的积极支持。县工委决定由杨斌毅负责筹建和具体领导“民先”安顺县队部的工作，并派李运亨协助他组建“民先”组织。他们在安顺城乡青年中散发了一封署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公开信，号召安顺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推动下，以原安顺“学联”成员及安顺县合作室、合作金库的部分职员为骨干，于6月底正式组成了“民先”安顺县队部，工作地址在西门外火神庙。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成立宣言。之后，为进一步扩大“民先”组织，安顺队部把工作继续向农村和外县推进，在么铺发展了几十名队员，在鲊陇发动了小学校长赵

白屿和部分进步青年教师，还有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家长参加“民先”，在南门外蔡家官小学，校长黄相时联络了附近村寨的布依族青年参加“民先”，同时，还在相邻的郎岱县也发展“民先”组织的队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安顺“民先”组织迅速扩大，队员发展到了100多人，在安顺各学校及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38年8月，国民党在贵阳制造了八一三事件，形势危及安顺。1939年3月5日，国民党安顺县党部以“汉奸嫌疑”为借口，逮捕了安顺“民先”队员董汝诚（中共党员），杨斌毅、李运亨、傅文华等骨干成员先后撤离安顺，安顺“民先”地方队部停止了活动。

在安顺“民先”队部筹组的同时，中共安顺县工委书记谢速航对郎岱“民先”的组建也给予了及时的指导和支持。1938年6月，谢速航介绍受张益珊派到安顺工作的“民先”队员尹克恂同郎岱的刘定华（刘藩栋，中共党员）认识后，尹、刘两人于6月底回郎岱组建了“民先”郎岱县队部，队长刘定华，组织部负责人尹克恂，刘鹤皋任宣传部负责人。郎岱“民先”队部建立后，根据“民先”工作纲领，确定郎岱县队部的工作方针是：在抗战建国的目标下，团结各界青年，动员民众，教育民众，支持政府推行各种对抗战有利的新政。还研究了初期的发展对象和工作方法，鉴于郎岱交通不便，工作主要在农村，于是明确了负责交通联络的人员，来往于郎岱、折溪、苦竹林、二塘等地之间，发展“民先”队员，开展抗战活动。

在贵州各地“民先”组织中，郎岱“民先”队部活动的时间最长，即使是1938年8月贵阳“民先”地方队部遭破坏后，郎岱“民先”队部仍继续进行活动，一直坚持到1939年夏。虽然郎岱“民先”队部队员不多，活动的声势没有贵阳等地大，但在发动、教育和组织民众等方面作了不少工作。

在宣传抗战上，郎岱“民先”向群众指出“中华民族的命运已经走上了空前的危机的路上了”。号召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团结起来，“抗敌、救亡！”还开办壁报、简报，举行大型讲演会，演出抗日话剧，高唱抗日爱国歌曲，并通过利用同业关系、公共集会、串门子、个别交谈、创办《民先队报》等方式进行宣传，使当地人民对时局及“民先”组织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因而这里的抗日救亡气氛日渐浓厚，不少人就是在这种宣传号召下参加“民先”组

织的。

《民先队报》是郎岱“民先”队部所办刊物，半月或一月1期，共出版17期。该报除摘要转载文件，综合报刊评论外，还经常登载分析形势，进行政策观点教育，探讨“民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方法的文章，同时，通过创办这一刊物，为“民先”的同志开辟学习、发表文章的园地，给“民先”队员提供宣传资料的一个重要渠道，为指导“民先”队员工作，推动郎岱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更进一步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郎岱“民先”注意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克服“口号式、公式式”和形式主义、关门主义倾向，通过阅读书报，研究理论，讨论问题，开展军事训练等方式，加强自我教育，提高自身素养，加强与当地抗日救亡积极分子的联系，吸收广大爱国青年参加“民先”组织的各种活动等，坚定自己的信念，激发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

1938年冬，因为赤威公路的伙食费迟迟没有发下来，郎岱县政府发行马路借款5万元，规定按户进行分摊。由于官吏与富户相勾结，按户其实就是“有钱有势者不出，起码是少出；无钱无势者多出”，加之该区区长借机敛财贪污，结果凉水井的李盛光、刘体成两家贫困户，本应不分担“借款”，反而被各加80元。由于李、刘2人无力缴纳，被地方当局拘押，为此激起民愤，将2人抢回。地方当局于是恼羞成怒，调集了各联保的壮丁“围剿”凉水井，除将李、刘两家抢光外，还洗劫了周围村寨的人家，当局的野蛮无耻暴行更激起了群众愤恨，终于在1939年4月18日爆发了凉水井抗暴事件，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附近湾寨等地的群众纷纷赶来支持，打得壮丁们弃甲曳兵而逃。

事件波及到周围的马场、纳柳寨、白泥屯等地，并发展成反抗国民党地方政府强征兵役的抗暴斗争。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郎岱“民先”以鲜明的态度，坚决站在受压迫剥削的劳苦群众一边，通过《民先队报》谴责了地方官吏对人民的残酷镇压，指出酿成这一事件的原因，一是区长的贪污，将钱加在不该出款人的身上；二是由于政府收款的畸形方式所致；三是区公所动辄便抢人拘押人，导致激变；四是区公所动辄便采取围剿手段。因此认为，“李盛光和刘体成是没有什么‘罪’的”，有罪的是那些“动辄便滥用威权，维护其贪污

行为(的人)”。同时提出了6条改革政治的强烈愿望,这些严正要求,反映了国统区人民的强烈愿望,针砭了国民党贵州当局的时弊。通过这些斗争,郎岱“民先”在当地群众中得到积极支持,为抗日运动的开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3. 八一三事件

贵阳“民先”地方队部从1938年4月成立到8月上旬3个多月的时间里,开展了大量的积极的抗日活动,其活动范围广,形式多种多样,生动活泼,很适合广大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要求和需要,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而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但是,正因为如此,引起了国民党贵州当局的注意和仇视,认为贵阳“民先”就是共产党,至少也是听命于共产党的。为了在抗战大后方的贵州清除异党,他们开始策划破坏“民先”组织的阴谋。

为摸清“民先”底数,了解其活动规律,以寻机进行镇压,国民党贵州当局在贵阳“民先”尚处于秘密活动阶段时,即派人打入内部,搞到了“民先”活动的情况。随着国民党压制和破坏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嘴脸的暴露,贵州当局也加紧了对贵阳“民先”的镇压。

1938年7月,国民党贵州当局在省党部机关报《贵州晨报》上发表通告,要求一切组织与团体必须于8月1日前办理申请立案手续,逾期即视为非法组织,将“依法取缔”。很明显,这是国民党贵州当局设立的圈套,玩弄的花招,其目的是限制和禁止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为了争取利用公开“合法”的地位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不给反动当局以借口进行迫害,贵阳“民先”先后召开3次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派张益珊、周兴仁为代表,到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申请登记立案。

7月30日,张益珊、周兴仁带着“请求立案”的有关材料前往省党部,就如何进行登记问题与当局进行交涉。“民先”的主动出击,使国民党贵州当局大感意外,按照他们事先的估计,“民先”不可能按通告的规定前来登记,这样就可以“拒不登记”之罪名予以取缔。张益珊、周兴仁的到来,打破了他们原来的计划,于是,在张、周走后,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镇压“民先”的新方案,作出了几条秘密决定:(1)“民先”不是一般的民众团体,而是抱有特殊目的、负

有特殊政治性组织，不符合《民众团体登记办法》，不予登记立案；(2)秘密逮捕张益珊等“民先”骨干分子，瓦解“民先”组织；(3)口头上允诺“民先”的申请，通过召集会议现场勒令“民先”解散组织；(4)发动青年阵地社社员打入“民先”内部，掌握情况，实施破坏。之后便加紧了镇压“民先”的步伐，准备实施强行解散“民先”的行动。

8月1日，贵阳“民先”队部根据国民党省党部“民众团体登记应有名单”的要求，开具了四五十个队员名单送呈国民党省党部，而省党部却以“名单缺少详细地址和简要履历”为由不予登记，要求补交，“民先”也按其要求予以补交。8月6日，国民党当局又派人通知贵阳“民先”地方队部负责人张益珊、凌毓俊、周兴仁、乐恭彦一起到省党部“谈话”，公开提出要“民先”停止活动，从而公开暴露其镇压“民先”的真实面目。8月7日，贵阳“民先”地方队部针对国民党贵州当局的无理要求，为揭穿其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镇压“民先”的罪恶阴谋，以全体队员的名义发布了《为请求立案争取公开告社会人士书》，向社会披露了当局自要求各种团体必须公开登记以来，“民先”与国民党省党部交涉的真相，呼吁社会各界予以支持。

这份共有159名“民先”队员签名的《告社会人士书》，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广大人民群众对“民先”的爱国斗争及所处遭遇纷纷表示了同情、支持、援助。但是，国民党当局却视“民先”的正义要求为大逆不道，跟他们唱反调，必欲剪除以绝后患。紧接着，国民党省党部又于8月12日通知“民先”队员于次日下午2时到贵阳民众教育馆集中，“听候训话”。当天，《贵州晨报》也刊登了这个通知。

接到开会通知后，贵阳“民先”队部决定按时到会，并通知了在贵阳的部分队员。这时，国民党省党部在社会上广泛散布言论，诬蔑“民先”是破坏抗战的组织，要予以处罚。国民党特务也四下活动，对“民先”队员的家长进行威胁恐吓，要他们管好自己的子女，不要去民众教育馆。对此，“民先”队员十分气愤，他们聚集在大十字丁家祠堂，赶制队旗，赶印大批传单，准备大会发言稿，决心与当局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揭穿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阴谋。

8月13日下午2时，“民先”队员按贵州当局的通知，集中到省民众教育

馆开会，队员们刚进入会场，军警立即包围了整座民众教育馆，断绝了交通。接着，省党部执行委员、贵州特务头子陈惕庐即在会上公开宣布：奉上峰命令，贵州贵阳“民先”应立即解散。“民先”队员们临危不惧，为争取抗日民主自由，与国民党贵州当局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不接受这个解散命令，国民党当局理屈词穷，便撕下伪装，大打出手，指挥军警抓捕“民先”领导人及“民先”队员，到晚上8时，30余名“民先”队员遭到逮捕，关押在省保安司令部，国民党贵州当局制造了镇压“民先”组织的八一三事件。

事件发生之前，中共贵州省工委获悉国民党当局准备镇压“民先”的消息后，曾派人劝阻“民先”队员勿落圈套，注重斗争策略，以保存有生力量，但仍未能阻止事件的发生。事件发生后，党组织立即动员被捕人员的家属及社会舆论谴责反动当局破坏抗战的恶劣行径，并组织各方力量进行营救。最后，“民先”队员大部分获释，而张益珊、凌毓俊却被长期关押、严刑拷打，皖南事变后被杀害。

贵州贵阳“民先”的抗日救亡活动和国民党贵州当局镇压“民先”的八一三事件，进一步教育了人民，使贵州人民看清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同时看到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伟大的爱国力量，只有动员民众，才能争取抗战胜利的前景。

（二）省城贵阳文化艺术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

贵州“学联”、“民先”组织遭到破坏后，省城贵阳抗日救亡活动便转移到了文化艺术界。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贵州文化艺术界的力量是比较薄弱的。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贵阳文化艺术界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与繁荣，群众通过文化艺术宣传抗日的活动更加积极活跃，抗战的音乐、话剧团等文化艺术团体大批涌现出来。利用文艺来进行抗战宣传，有着极强的渗透力和感召力，中共组织紧紧抓住这一强

有力的武器，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抗战热潮，引导和团结广大民众投身到抗日救亡活动之中。

省工委为了充分发挥文化艺术团体在抗战活动中的作用，通过大量的工作，积极地影响、团结、引导贵阳的“筑光音乐会”、“沙驼话剧社”和“合群体育会艺术部”3个群众团体，利用其“合法”地位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筑光音乐会

筑光音乐会原名“筑光音乐研究会”（简称“筑光”），是一些音乐爱好者于1937年4月创建的公开音乐团体，川军二十军军长杨森担任名誉会长，青年音乐爱好者刘佩南为会长。该会成立后，由于它可以使青年学到一些基本的音乐知识，对一部分人很有吸引力，因此不久便发展了一批会员。1937年9月，黄大陆受中央派遣由延安来贵阳与李策一道主持贵州地下党的工作后，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国统区争取公开社团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精神，决定把“筑光”作为首先争取的团体，发动了部分党员和进步学生50多人参加到“筑光”中去。同时，还动员思想进步的音乐教师常学镛到“筑光”担任艺术指导，从而使“筑光”开始由单纯的娱乐团体转变为抗日救亡的进步组织。

二一九事件后，“贵州学联”被破坏，省工委采取果断措施，将“学联”成员大量转入“筑光”并指派中共党员谢凡生以艺术指导身份进入“筑光”，加强党对“筑光”的领导。同时被聘为艺术指导的还有吴夔、王启霖、刘才雄、李良广、肖家驹等中共党员教师或进步教师。1938年5月，常学镛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吴同尘、吴夔与常学镛组成了中共文化支部。八一三事件后，“民先”贵州贵阳地方队部被破坏，省工委为进一步加强对贵阳地区工作的领导，建立了中共贵阳县委，“筑光”也建立了党小组。1939年2月，“筑光”地下党支部建立，聂奇慧、黄奇鑫、尹克恂先后任支部书记。

在省工委的领导下，“筑光”除了通过音乐会、电台广播、街头演讲和集众教唱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外，还演出抗日戏剧、绘制抗日宣传画、举办木刻展览、张贴救亡情报等，广泛开展抗日宣传。

1938年4月，“筑光”组织了百人大合唱，演唱了《流亡三部曲》、《游击队歌》、《慰劳歌》、《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歌八百壮士》等抗战歌曲，激昂而悲壮的旋律回荡在山城上空，极大地激发了观众的抗战情绪，一时间，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场面热烈感人。5月，“筑光”与黄钟音乐研究会等5个艺术团体在贵阳群新电影院联合举行音乐演奏大会，并在《贵州晨报》上公布了节目单、部分歌词及说明。这次演出，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规模很大，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

6月，日军进攻武汉。为支持前方军队浴血奋战，保卫武汉，中共贵阳县委部署了“筑光”与“沙驼业余话剧社”联合组织一次“保卫大武汉”的宣传活动。在活动中，“筑光”除了举行演唱外，还在民众教育馆开展了形式很特殊的抗战歌曲教唱活动。在几十把火炬照耀下，歌词事先用大字一句句写在报纸上，由会员一人手持一张，教唱到哪一句，拿着这一句歌词的人便将报纸高高举起，通过这种方法，使到场群众很快便学会了这首歌曲。教唱完毕后，又组织了群众沿街游行，大家手挽手，高唱着“我们臂挽着臂，手拉着手，用我们的最后一滴血，争取民族的自由……踏向真理的战场，向着光明的路上走！”游行队伍精神抖擞，步伐整齐，歌声嘹亮。

同年12月，“筑光”还在贵阳举办、参加了两次活动。一是举办义卖音乐会。省工委委员秦天真为此次演出特刊专门撰写了题为《前奏曲》的发刊词，途经贵阳的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杭州音乐专科学校音乐系的部分师生以及武汉、长沙等地的音乐家胡投、张权等人也参加了义卖演出。音乐会连演两场，皆座无虚席，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引起听众的热烈反响；二是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在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在这次会上，“筑光”会员演唱了《抗敌歌》、《保卫中华》、《新中华进行曲》等悲壮激烈的歌曲后，又高唱了《国际歌》，这是第一次在贵阳公开唱出无产阶级的战歌，除演员心潮澎湃，情绪高昂外，观众也深受鼓舞。

除了在城里宣传演出外，深入农村下乡演出，也是“筑光”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号召下每年寒暑假期间，“筑光”都组织会员到清镇、平坝、定番（今惠水）、龙里、息烽等县和贵阳的乌当、青岩、花溪、

中曹、北衙、倒岩等区乡演出，演唱了很多救亡歌曲，其中特别受欢迎的是贵州山歌剧《送郎打日本》，吸引了当地广大的观众。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由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坚决还击，于1940年3月宣告失败。但在贵阳地区，贵州当局的反共活动不仅没有收敛，而且正酝酿着一场扼杀进步组织及其活动的阴谋。由于“筑光”的抗日宣传唤醒和团结了广大群众，因此国民党当局将其视为眼中钉，多次派特务进行捣乱破坏，并以莫须有的罪名称“筑光”的活动为“非法”秘密集会。1940年6月19日，省党部登报宣布：勒令“筑光”解散。为应付这一突发变故，“筑光”地下党支部紧急决定，召开会员大会，声明虽遭“勒令”解散，还要再接再厉，搞好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同时散发了《告别会友书》，及时将部分同志、会员进行了疏散隐蔽，并密切注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筑光”虽被迫解散，但是抗日救亡运动是解不散的。“筑光”会员纷纷以新的形式，或转移到外地，或加入到其他进步团体，重新投入战斗。“筑光”从成立到觉悟，到发展，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由单纯娱乐团体走上了一条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之路，并迅速茁壮成长。它的会员，发展到了大中学校的学生、教师，书店店员，邮局和工厂的职工；它的宣传活动，影响到了整个贵阳地区以及贵阳附近的十几个县、区、乡镇，团结了进步力量，教育唤醒了群众，对贵州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沙驼业余话剧社和合群体育艺术部

贵阳沙驼业余话剧社（简称“沙驼”）由参加过“左联”的贵州遵义人肖之亮发起，于1936年12月在贵阳成立，主要是用这一艺术形式来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由群众业余戏剧团体转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戏剧组织。1935年夏天，肖之亮由上海回到贵阳，在省工委委员秦天真的支持下，以贵阳毅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男子师范学校、贵阳中学等学校爱好话剧的部分师生为骨干，积极开展进步的话剧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成立了“沙驼”业余话剧社。

当时，国民党在贵州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控制极严，对成立社团也有严格

的规定，要求凡成立社团，必须有发起人30人以上，且发起人必须是具有固定“正当”职业的成年人。肖之亮为了在贵阳地区组织剧社，通过积极与贵阳知名人士田君亮、聂膺识、李俶元等人及话剧爱好者联系，在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终于使“沙驼”争取到了“合法”地位，继而成立了这一团体。

“沙驼”由肖之亮任社长，另有理事数人，社员100多人。随着话剧活动的开展，“沙驼”的队伍发展很快，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剧社已发展社员236名。为便于开展活动，又在“沙驼”之下，先后成立了毅中剧社、黔灵剧社、电讯演剧社以及学生剧团等10多个分团。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战形势的蓬勃发展，“沙驼”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变化。除社长外，还设有总干事，下设组织、总务、宣传、演出、音乐等部。中共贵州地下组织十分重视这一抗战文艺团体的成长，加强了对剧社的领导，一些中共党员先后加入到剧社，并成为其骨干。1938年3、4月间，省工委派党员于蕴、冉隆英、吴同尘等进入“沙驼”，建立了党小组。于蕴在“沙驼”还担任了组织干事，中共党员黄奇鑫和进步教师肖家驹分别担任宣传、音乐干事。同年7月，建立了中共沙驼剧社支部。在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沙驼”运用戏剧作武器，面向城市，面向农村，面向广大群众，从舞台到街头，从城市到乡村，以群众喜爱和易于接受的形式，紧密配合实际斗争需要，演出街头剧、活报剧、茶馆剧、广场剧以及组织化装游行和故事表演，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其影响除贵阳外，还扩散到息烽、修文、遵义、平坝、安顺、镇宁、龙里、贵定、黔西等26个县，为贵州抗日救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作出了积极贡献。

“沙驼”没有固定的演出场地，主要利用民众教育馆广场和街头空地进行露天演出。先后演出了《有力出力》、《死里求生》、《生死关头》、《打鬼子去》、《二升米》、《九一八以来》、《炮火中》、《察北的风》、《烙痕》等10余出独幕剧和《升官图》、《狐群狗党》等多幕剧。由于演员深入角色，感情投入，演出效果很好，受到观众欢迎。一次在铜像台（今喷水池）街头演出《省一粒子弹》，当剧情演到汉奸向水井投毒，帮助日本侵略者残杀人民的卑劣行径时，观众义愤填膺，因表演逼真，竟有一青年冲入场内，愤怒地抓打汉奸的扮演者。

此外，“沙驼”还组织了流动街头演剧队，在贵阳城区和乡间巡回进行演

出，演出了多出话剧，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沙驼”除了演剧进行宣传外，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歌咏活动，成立了40余人的歌咏队，该队队员都是一些既能唱又能演的多面手，他们演唱的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长城谣》、《九一八》、《太行山上》、《洪波曲》、《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嘉陵江上》、《东北——我们的家乡》、《流亡曲》、《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等优秀抗战歌曲，都曾在听众中广为传唱，引起很大反响。为加强联系，扩大演出宣传效果，“沙驼”还与“筑光”多次联合演出。如为纪念抗战一周年，在民众教育馆广场举办了“千人大合唱”，演唱了20多首抗战歌曲，阵容强大，气势恢弘，令观众很受感染。这样的活动不止一次，1938年冬，在群新电影院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举行的义卖公演，都有“沙驼”歌咏队队员参加。与此同时，“沙驼”歌咏队还经常利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组织小分队到大十字、铜像台等闹市区向群众教唱抗战救亡歌曲，深受群众欢迎。剧社的演出也得到群众的支持，每当“沙驼”社员晚间上街演出，附近的居民和店铺往往自动将家里的电灯拉出来照明，支持剧社的活动。

除了上述抗战宣传外，“沙驼”还利用美术形式进行宣传，开办了木刻训练班，培训了青年美术爱好者30余人，举办了几次抗日宣传画展，在剧社下乡流动演出时，美术人员便经常在沿途书写抗战标语，绘制宣传画。同时，“沙驼”结合抗战形势，也开展了慰问伤员、发起募捐等活动。1939年春节，剧社专门组织社员到图云关“荣军招待所”慰问伤员，他们给伤员送慰问品，帮助写家信，洗衣补被，讲述抗战形势，演唱抗战歌曲。一些社员则专门到贵阳南厂兵营进行慰问演出，教唱抗战歌曲，鼓励士兵们到前线去杀敌卫国。

1938年，是“沙驼”最为活跃的一年。由于有了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讲究了斗争策略，使国民党当局难以责难。但是随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和贵阳政治形势的日益恶化，国民党当局对“沙驼”的监视、限制和破坏也加强了。他们先是采取了瓦解“沙驼”群众基础的办法，企图使“沙驼”不攻自溃。贵州当局明确宣布，在校学生只能参加三青团组织，其他组织均属非法，并通过其党团组织或学校当局对学生采取诱骗、开除等办法，阻止学生参加“沙驼”的活动。但由于“沙驼”的影响和其活动的进步性，学生们不被诱

骗，不怕威胁，毫不畏惧，“沙驼”的活动在学校反而更加活跃。这样，国民党当局便采取罗织罪名、强行制止的办法，阻止“沙驼”活动。1939年秋，“沙驼”参加了贵阳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募捐公演，因门票收入短少法币一角钱，国民党贵阳县党部即以“账目不清”为借口，勒令“沙驼”停止活动半年。半年期满后，剧社与当局几经交涉，虽然争取到了复社，但当局却处处设置障碍，使“沙驼”难以开展活动。1940年6月30日，反动当局以“账目有问题”，在演出某剧目时“天幕上竟有意出现一轮红日”，歌颂了共产党等罪名，勒令“沙驼”立即解散。

还在“沙驼”的活动受到限制的情况时，中共贵阳县委即决定加强“合群体育会艺术部”（简称“合群”）的工作，把“沙驼”、“筑光”的部分中共党员、戏剧音乐骨干充实到“合群”中去，以开辟新的活动阵地。

“合群”原为杨森所办。1937年9月杨森调离贵阳后，“合群”面临改组。中共贵州地下组织决定利用“合群”的“合法”地位，借“改组”之机派一部分党员和进步群众加入“合群”，并建立了中共“合群”支部。“合群”就此被改造成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业余话剧团体。

从1937年9月到1940年6月，“合群”开展抗战文艺宣传近3年时间里，除在城区开展活动外，也像“筑光”、“沙驼”等文艺团体一样，经常深入农村进行演出，其内容和形式丰富、生动，节目有团体大合唱、男女高音独唱、相声、魔术、话剧等。1940年1月，“合群”在民众教育馆礼堂上演了大型话剧《台儿庄之战》，由于“沙驼”、“筑光”的多方支持和帮助，加强了演员阵容，该剧上演后，场场满座，演出非常成功，使当时一度趋于沉闷的山城，又重新活跃了起来。在这次成功演出的鼓舞下，全体“合群”成员热情倍增，短时间内，又赶排了《中华民族的子孙》。当这出剧顺利公演完毕，正积极筹备第三次公演时，国民党当局公然不顾社会舆论的谴责，于1940年6月初，突然发出“合群体育会艺术部”立即解散的通令，迫使“合群”停止了活动。

“筑光”、“沙驼”、“合群”这3个群众性的抗日文化艺术团体，作为贵州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在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以文艺为武器，宣传抗日，唤起民众团结抗战，为贵州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贵州革命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同时，“贵州大夏歌咏队”、“贵州文艺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新文字学会”等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也为推动贵州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贵阳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共贵州地方组织在领导贵阳文化艺术团体开展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组织社会各界、各阶层开展了轰轰烈烈、形式多样的救亡活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论社会名流、商人，还是工人、店员甚至学生都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行列之中。

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

1938年，贵阳大、中学校的抗日活动十分活跃，教师们根据抗战的形势发展，为团结中上层知识分子，扩大和推动抗战时期贵阳的文化运动，组织了“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简称“社座”），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发起人为贵阳生活书店的经理邵公文，中共党员王启霖负责联络工作，主要成员大都是贵阳文化界的著名进步人士，如贵阳医学院的郭一岑、何战白、白午华，大夏大学的梁园东、吴澄华，贵阳师范的蒋蔼如、赵毓样，贵阳高中的刘方岳，贵阳中学的蒲定安、王启树、肖家驹等。“社座”每月集中活动1至3次，主要进行时事座谈和讨论，内容包括抗战形势、国际形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社会科学理论。会员们还经常采取把《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对照阅读的办法，从中找出国民党方面对抗战局势的片面报道。除了座谈和学习，“社座”还参加了一些公开的社会活动。1938年贵阳教育界召开千人大会，宣传抗日，反对投降，“社座”成员不仅参加了这次大会，刘方岳还担任了会议主持人。1939年9月，贵阳大专学生在中共贵州

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召开了有200多人参加的争取民主“宪政运动”大会，刘方岳担任大会主席，郭一岑作了专题发言。当徐特立从湖南赴重庆路过贵阳时，“社座”邀请徐老讲述了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方针政策以及《资本论》的学习方法。1940年《资本论》中文译者之一的王亚南路经贵阳，“社座”亦特请他就《资本论》的翻译经过、全书的主要内容作了专题报告。参加“社座”的教师们通过学习、讨论，接受了正确的观点和进步的思想后，又直接或间接地传授给学生，扩大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

生活、读新书店与《新华日报》分销处

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新闻、邮电、出版物等受到禁锢，人们迫切希望了解抗日战争进展的真实情况，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其方针政策。在中共贵州地下组织和一批进步人士的努力下，生活、读新书店的总部在贵阳设立了分店。1938年4月，生活书店贵阳分店在中华南路开业，中共党员邵公文担任经理。1939年2月，读新书店贵阳分店也在贵阳黑神庙左侧开业，沈静芷任领导。业务上，生活书店贵阳分店是由重庆的生活书店总店领导，读新书店是由重庆的读书出版社总社和桂林的新知书店总店领导，但在对外的重要活动，特别是针对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所采取的对策，都是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为加强对书店工作的领导，中共贵阳县委指派熊蕴竹担任生活、读新书店的支部书记。在书店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这两家书店通过公开发行或秘密销售的渠道，在《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的密切协助下，向读者供应《新华日报》，定期发行《群众》、《解放》、《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刊物以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帝国主义论》、《论左派幼稚病》、《论反对派》、《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马列、毛泽东著作，还公开发行了一批深受读者欢迎的理论读物，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薛暮桥的《经济学》、徐懋庸、何干之等集体编著的《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等。

此外，两家书店还举办了定期的读书会，通过推举辅导员，联络读者，解答题难，讲解时势，宣传革命思想和理论。同时，除了在一系列的抗日救亡宣

传活动中进行工作，书店还掩护和接待了一些过往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帮助传送秘密文件。

中共贵州地下组织为配合生活、读新书店贵阳分店开展工作，先后在平越筹办了“八一三”书店、“新新供应社”，在镇远开设了“新光书店”，在遵义开办了“快读书店”、“合力文化教育用品社”等，用以作为宣传抗战、开展活动的阵地。

书店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惶恐不安，他们利用国民党政府关于出版品检查制度，经常开列“禁书”单，禁止书店出售，并派人到书店查抄没收。1940年底，两家书店都接到了总店关于紧急撤退的指示。1941年元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特务开始监视两家书店，2月22日，生活、读新书店贵阳分店被查封，遭到查封的还有贵阳自力书店、新知书店，一大批工作人员被逮捕，一度与这几家书店有往来的协同书店也受到特务监视。

1938年10月，《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设立，吴同尘负责分销处工作。它是中共组织设立的一个公开机构，仅有3名工作人员，承担每天分送和零售400至500份报纸的任务。为畅通发行渠道，尽可能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盯梢、搜查，分销处与邮局管库房的地下党员和重庆海棠溪管运输的工人建立了秘密联系，使《新华日报》这份共产党的报纸在运送过程中从未被国民党特务查禁、没收，每一期均让贵阳读者及时看到，从未误期过。此外，分销处还按省工委的指示，为解决香港印刷工人组织的“反汪工友回国服务团”的困难，发起捐助运动，参捐人数达1000人以上，收到捐款1000多万法币。事后，分销处把捐款及捐款人名单通过《新华日报》转交香港工会，并写了一封公开信，鼓励工人们不屈不挠，坚持斗争。《新华日报》发表了这封信，使国民党当局恼怒万分，由于在国共合作期间，不敢马上采取措施予以破坏，但却暗中盯梢，造谣诽谤，并以“应征”为名抓走了分销处工作人员郎德服，以图破坏削弱分销处的工作。1940年底，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国民党当局对分销处采取行动，中共地下组织得知情报后，为保存力量，立即果断地停止了分销处的工作，人员和物资都进行转移，从而挫败了国民党当局破坏分销处的阴谋。

农村助理员讲习所

1938年4月，贵州省农村合作委员会举办了农村助理员讲习所（简称“讲习所”），这是一个官办的机构，本意是培养农村合作人才。其所长于永滋（又名于树德，河北人，中共党员）对抗战前途十分关心。省工委认为这是一个进行公开工作的有利场所，决定抽派贵阳和外县的一些党员并动员一些进步青年考进讲习所，培养骨干力量，以便今后到各县去开展农村工作。参加进去的党员有李运亨、宁起鲲、杨斌毅、丁酉成等，他们在所里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团结进步学生，因此，“讲习所”里充满了关心国事，积极向上的气氛，抗战文化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

“讲习所”开学不久，进步学生便创办了抗战壁报，首期除发表了富有革命精神的《发刊辞》外，还登载了《时事述评》和宣传抗战的文章。为使学员了解全国抗战形势等，“讲习所”特聘请由延安回筑的黄齐生给学生作报告，讲述西安事变、国共合作、抗战形势及延安新风，使学员们深受教育和鼓舞。“讲习所”里还组织了歌咏队，由张益珊教唱抗战歌曲，并在贵阳卫生大宣传时，被特邀参加演出，发挥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在张的发动下，“讲习所”成立了“贵州民先第一队”。经过3个月的学习训练，学员们被分配到各县合作室工作，一方面宣传组织合作社，一方面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分别在桐梓、思南、石阡、安顺、兴义等地组织了歌咏队、话剧队，开展慰问前方将士的义卖宣传活动。通过积极的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农民们将农产品义卖，并把所得收入寄给《新华日报》社，捐赠给前方的抗日将士。

贵阳工商界的抗日救亡活动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贵阳工商界也积极投入到抗战热潮中，建立起抗日救亡组织，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等。早在1936年以前，中共党员孟昭仁便在邮电职工中建立了读书会，秘密组织青年工人阅读进步书刊。抗战爆发后，贵阳电信职工在孟昭仁和读书会会员的鼓动下，迅速成立了“贵阳电信职工抗日救亡歌咏队”和“贵阳电信职工抗日救亡话剧队”，在市内和城郊

向群众进行宣传。为了支援前方抗战，职工们还积极申请上前线工作，先后有千余人奔赴抗战前线各电信局工作。1938年后，又相继建立了“贵阳市电机业职业工会”、“贵阳邮务工会”、“黔邮歌咏队”等工人阶级救亡组织。工人阶级的加入，使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增加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这场运动向前发展。

同时，由贵阳商人及店员于七七事变后发起成立的“贵阳青光话剧团”（简称“青光”），也使贵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发展壮大。“青光”从成立到解散不到半年时间，作宣传演讲100多次，演出话剧30多场，深受群众欢迎。1938年12月汪精卫投敌叛国，“青光”举行了抗日游行，痛斥汪精卫集团的卖国丑行。为支援前线抗战，“青光”在铜像台设立献金台，动员过境难民以亲身经历，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诉者悲痛心酸，听者伤心流泪，行人纷纷掏出钱物捐献，不到一个上午，捐款就达1000多元。此外，“青光”还到新添寨、鹿冲关、花溪以及息烽、黔西、大定、毕节等地演出抗日话剧，揭露日军的暴行。1939年2月，青光话剧社改名为“贵阳青光抗战工作团”。

少数民族、宗教界的抗日救亡活动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中共贵州地下组织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工作。早在1935年1月，省工委成立后即在毕节、安顺、紫云和黔东南等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了一定的工作基础，那时的工作重点是组织武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党组织把工作重点转向在群众中特别是少数民族中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团结各民族同胞起来抗战。1938年5月，省工委建立了“苗夷工作委员会”（当时对贵州各少数民族习称为“苗夷”），由秦天真、高言志、唐植民3人组成。中共党员唐植民是苗族青年，入党前积极参加中共组织领导的抗日宣传活动，用少数民族语言向贵阳近郊的少数民族同胞宣讲，深受欢迎。他了解民族习俗，通晓语言，从事宣传教育易为少数民族同胞接受，又十分有利于他的秘密身份的隐蔽，可更好地执行党的指示。“苗夷委员会”重点在贵阳近郊的少数民族青年中组织学习，以扩大抗日救国的群众发动工作，并通过唐植民与威宁、毕节、黔东南以及从云南、西康来贵州的少数民族青年取得联

系。同年夏天，秦天芬在省工委的介绍下随党员王醒华到黄平加巴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同任该校教导主任的党员李长青一起，在少数民族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不仅在学生中教唱抗日歌曲，还组织学生到群众中去演唱，由学生用少数民族语言向群众讲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国民党制造民族分裂的危害，深得少数民族同胞的欢迎和信任。

在宗教界，贵阳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也积极开展了爱国救亡活动。设立了“学生救济会”、“伤兵之友社”、“难民同乡会”等机构，在救助学生、伤兵、难民上做了很多有利抗战的事。女青年会为流亡在贵阳的职业妇女办了一所宿舍，以低廉的收费，协助解决了一些职业妇女的食宿问题。1940年10月，女青年会为给前方抗日将士募捐寒衣，发起了义卖自制点心的活动，等等。

1941年8月13日前后，贵阳天主教妇女会为纪念八一三抗战日，制作宣传、慰问品到医院慰问抗战伤兵。她们还发起慰问募捐，每人3至5元，共捐出2000多元，并设立了贵州天主教战时妇女服务会，为抗日救国积极作贡献。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贵州省分会，也积极动员会员参加爱国活动。在佛教界，许多佛教徒也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

（四）全省各地广泛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与黔东事变

全省各地的抗日救亡活动

国民党贵州当局顺应抗战的形势，也表现了一定的抗战积极性，贵州省各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贵州省动员委员会协济委员会、难民救济会贵州分会、贵州省会地区出征抗战军人家属优待委员会，贵州战时妇女职业训练所等机构纷纷成立，号召全省人民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参加

抗战。国民党贵州当局还组织了贵州省战地服务团，组织青年学生和社会青年到抗日前线进行战地服务。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出现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大好形势，贵州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从城市到农村，从学校到各行各业，从学生到各界群众，得到声势浩大的全面发展，抗日的浪潮席卷了整个贵州高原。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这一时期是贵州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省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普遍展开，其中尤以遵义、湄潭、安顺、凯里、镇远、都匀、平越、独山等地的救亡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推动了全省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向前发展。

1938年春，中共遵义县委为加强对遵义青年抗敌救国会（简称"青抗"）的领导，派宣传委员谢树中参加"青抗"的领导工作，通过一段时间的积极工作，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使"青抗"真正成为中共组织领导下的名副其实的抗日救亡团体。之后，"青抗"成立了歌咏队，编印了《抗战歌选》，排练了《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抗日歌曲，并在白天晚上进行巡回演出，很受群众欢迎。为让群众了解抗战形势，"青抗"还在遵义城中心办起了壁报《活路》，每天一大张，以《新华日报》社论为立论依据，发表时局评论，报道抗战消息，指明抗战前途。这些活动，大大激发了遵义人民的抗战热情。

1939年春，冯玉祥将军带领的巡回歌咏队第二巡回演出队到达遵义。他们邀请了教育界、戏剧界的人士座谈，希望把遵义的音乐活动开展起来。中共遵义县委认为，这是建立公开组织的好时机，但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要切实加强统战工作。经过筹组，成立了"遵义音乐教育促进会"（简称"音教会"）。该会除接纳原"青抗"成员外，还吸收了城区13所中小学的音乐教师和其他音乐爱好者，同时组织了"青年歌咏队"、"店员歌咏队"、"儿童合唱团"等。

1939年寒假至1940年暑假，遵义中学教师黎恒章、刘铭坤等人组织了"农村抗日宣传队"，先后到老蒲场、礼仪坝、火烧舟、深溪水、三岔河、冷水坝、

尚嵇、团溪等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向群众讲述抗战形势，坚定大众抗战必胜的信心。

湄潭“七人之狱”后，湄潭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了影响，但他们并未屈服当局的高压政策。地下党组织根据斗争形势，将湄潭的抗日救亡运动由县城转到了广大的农村、集镇。首先在农民中开办了识字班。在教字过程中，给农民讲解他们之所以贫困的根源和当前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在此基础上，秘密组织了农民协会，发展了党员。通过农协的活动，团结了大批农民，会员很快发展到3600多人，分会达60多个。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觉悟也有了提高。1938年冬，为八路军募寒衣，规定不要穷苦人家捐献，但许多人却非捐不可。一些女会员还拿出备以自用的棉花、碎布面赶做了棉背心、棉鞋等，积极支援前线抗战将士。

1938年4月20日，来自华北、中南、华东20多个省、市460多所学校的1600余名流亡学生和800多名教职员工，经过艰苦跋涉来到铜仁，创办了国立三中，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国立三中组织师生与社会各界一起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学校组织小分队分赴城镇、农村，教唱《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大义灭亲》等抗日剧目，书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标语，还创办了《三中电讯》油印小报，传播抗日前线消息，铜仁老百姓知道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就是从该报中读到的。学校和社会各界一起还举行了抗日书画义卖活动，全部款项交救济总署转沦陷区人民。通过这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黔东百姓抗日救国热情。

在黔西、大定一带，爱国师生以蓝芸夫任校长的新场一小为据点，成立了秘密组织“文艺研究会”和公开组织“乡村教育团”，每逢集日，便组织学生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抗日宣传，如上街演说，表演街头剧等。1938年10月，省工委在打鼓新场建立了中共黔西新场总支，党组织继续组织学生利用文明戏和街头演讲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1938年冬，蓝芸夫等到了黔西，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又由新场转到了黔西县城。此外，大定爱国学生以“星星小组”、“读书会”为核心，掌握了“大定学生抗日救国团”、“大定职工学生自

治会”、“中国童子军3572团”等公开组织，并通过其积极开展抗日宣传。

1939年秋，安顺地下党组织根据当时抗战形势，结合本地工作实际，在请示了省工委后，决定将党的活动转向紫云，并成立了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全面的社会调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调动各阶层群众抗战的积极性，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力开展抗日民众运动，培养革命骨干，团结基层群众，发展党的组织，为建立抗日游击武装作准备。

1940年春，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以紫云师训班为重点，利用各种机会接触学生，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通过工作，师训班的进步学生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办起了墙报，组织演讲会、作文比赛，开展文娱活动等，宣传全民抗战，号召同学们奋起救国。

在工作中，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十分重视抓统一战线工作，积极争取地方上层人士和机关团体中的职员参加到抗日救亡中来。1940年春，中共党员张恒兹利用紫云县中一区区长职务之便，结识了合作金库经理曾昭荣、合作室主任陆企恒。在张恒兹的动员下，曾、陆两人积极进行抗战宣传，主动为一些党员和进步群众介绍职业，协助党组织作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为地下党组织筹集活动经费，提供工作场所，同时还说服一些地方人士和机关职员参加抗日活动。省参议员刘聘臣，在当地颇有声望，经地下党的同志多方工作，他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并多次给“读书会”的会员讲课。当县长刘锡珍镇压学生运动时，他出面当众指责，据理力争。

在黔东南、黔南及黔西南等地，也先后成立了各种社团组织。

1938年初，中共凯里党小组根据省工委传达中央关于不要在国统区搞武装斗争的指示后，随即停止了军事活动，小组成员分散到各地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救国主张，争取和团结爱国力量一起抗战。李长青在凯里首先组织了“青年读书会”，1938年冬，他又与陈松禄、顾永样等几十名青年骨干，联合进步团体及人士，发起成立了凯里“青年抗日救国后援会”，李长青被推举为临时会长。在短短的时间里，参加者近百人。但国民党

当局为控制这一组织，进而压制抗日救亡活动，指派了顽固派人物、凯里小学校长王启型担任“青年抗日救国后援会”会长。王任会长后，不仅不过问抗日工作，而且散布消极抗日言论，使该会徒有虚名。为此，李长青领导该会青年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走上街头高呼口号，张贴标语，发表演讲，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王启型等假抗日的真实面目。王启型恼羞成怒，便动用保警逮捕关押了顾永样等人，并借机准备杀害，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抵制抗日救亡运动的真实面目。“青年抗日救国后援会”发动群众进行的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响应，在群众的压力下，王启型不得不释放被押青年，凯里的爱国进步力量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在黔南地区的省立师范学校、省立都匀中学、都匀县立中学，广大师生也积极组织起来，以多种形式投入救亡活动。1938年2月，在贵阳读书的都匀籍学生王鼎尧、许必果参加了中学生寒假抗日救国宣传团回到家乡，他们发动和组织了一支50多人的抗日宣传队，从早到晚，走街头到茶馆，向群众宣传抗日，激发群众参与抗日救亡的热情。

1938年10月，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西迁贵州，在平越县复课办学。在交大中共党员徐大德等人的领导下，学生们以极大的热情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组织了越光社、山城社、犀沅社等进步社团，在校内外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创办了壁报《呼声》，介绍各地抗日游击战的消息，成立了歌咏队、街头宣传队、话剧团、漫画学会等团体，演唱抗日歌曲，排演《血溅九一八》、《凤凰城》、《前夜》、《这一带》、《塞上风云》等救亡剧目，举办画展，以抗战为主题在街头绘制了许多宣传画。还发动群众义卖、募捐、献金，支援前线抗战。为支持地方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交大与地方群众合办了“民众夜校”，每晚有六七十名青年前来学习。

当平越的抗战文化蓬勃发展之际，地下党组织在平越开办了“八一三”书店，积极销售《新华日报》、《解放月刊》及生活、读新书店发行的进步书刊，并创办了抗战剪报，把平型关大捷等抗战消息剪贴于墙上，使平越群众及时了解抗战形势。

1938年3月，独山县学生抗日救国会成立，随即便组成了暑期农村抗

日宣传队，下到基长、上司、下司、三棒、麻尾等地进行抗日宣传。1939年7月，独山学生在城区举行话剧义卖演出，得到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持。

三合县（今三都县）是水族聚居的边远县，这里山高路险，消息闭塞。三合小学的师生在这里也开展了积极的抗日救亡宣传，并成为该县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主要力量，他们组织了宣传队、演讲队，抽出了能歌善舞、长于演讲的师生到街头或附近的牛场、苗龙等地宣传，开展募集军鞋、向前线抗日将士写慰问信等活动。

此外，贵定、荔波、平塘、思南、黄平、施秉等地也成立了各种抗日进步社团，影响和推动了当地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这一时期，在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领导下，遍及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各阶层群众普遍参与，各种社团、组织不断涌现，活动的形式多、范围广、影响大，反映出贵州各族人民日益高涨的爱国热情，说明了在民族危亡迫在旦夕的严重形势下，无论是学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除少数汉奸卖国贼外，都自愿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力量，投入到血与火的斗争中去。

但是，皖南事变发生后，贵州的局势日益险恶起来，白色恐怖笼罩全省。国民党贵州当局将罪恶的魔爪伸向全省各地，破坏了一批中共地下组织，扼杀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强令解散抗日团体，查封进步书店，制造了一起起血腥的事件。

尽管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极力压制，百般阻挠，对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及爱国人士进行镇压，然而贵州地下党及全省各族人民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在严酷的斗争形势下，意志更加坚强，他们一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一方面坚定不移地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利用各种形式坚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底，浙江大学由沦陷区迁到遵义湄潭，广大师生在经历了国难流亡的痛苦后，一面在艰苦的环境中读书学习，一方面在国民党的种种限制、严密监视下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成为皖南事变后，在贵州进行公开大规模抗日救亡活动的一支生力军。

1942年1月20日，分散在遵义、湄潭、永兴3地的浙江大学，在遵义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倒孔运动”，掀起了遵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又一高潮。为了抗议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不顾许多名人滞留在香港，却用专机把全家人甚至洋狗装上逃离香港，浙大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中国财阀孔祥熙！”等口号，并在街头书写了“要穿便衣，打倒孔祥熙”等标语，校长竺可桢为使学生免遭不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走在队伍前列。这次示威，显示了浙大进步师生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及高压政策进行坚决的反对和强有力的抵制，从而鼓舞了遵义人民的斗志，引起了各界各阶层的共鸣，许多中学生及群众自发地加入游行队伍。浙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使它同西南联大一样，被誉为国统区的“民主堡垒”。

1942年4月，李晨、赖卫民受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先后到遵义，团结浙大进步学生，充分利用浙大各进步团体如“黑白文艺社”、“铁犁剧团”、“大家唱歌咏队”、“回声歌咏队”等开展抗日宣传和慰劳前线抗日军队的活动，并派人到前方参加战地服务。

黔东事变

正当贵州各族人民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为抗日前线加紧生产、节衣缩食的时候，国民党贵州当局各级官吏却借机贪污勒索、中饱私囊，大发国难财。这样，人民和统治阶级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尖锐起来，武装反抗事件时有发生。这些斗争的主要矛头都是针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消极抗战的政策以及借“抗战”之名，荼毒人民的倒行逆施，要求铲除贪官污吏。黔东事变即是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抗暴斗争。

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到1943年夏，黔东地区的剑河、台江、岑巩、松桃、三穗、镇远等县的农民武装队伍总计上万人纷纷起义，并在公告中列举了国民党政府的种种罪状：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祸及全国，而从（事）政府之各级大小妖魔，假借抗日救国为名，趁火打劫，发国难财。已打（仗）五六年，未见收复寸土，民多流离，野有饿殍。民之憔悴于虐政，未见甚于此者。共举

义旗，决一鼓而扫尽妖气，为民除害，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①]他们攻占县城，惩治贪官污吏，打击国民党地方基层政权。国民党贵州当局先后动用上万人的兵力，才将抗暴队伍镇压下去。

1942年正是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正面战场发动新的攻势的同时加紧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军事扫荡。正处在需要安定的大后方的全国各地的抗暴斗争尤其是黔东事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将各地民变情况均向中央作了报告，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研究，强调抗战必须要有巩固的大后方，必须巩固国内的团结，希望国民政府转变其反共反人民的国内政策，从根本上消除民变产生的社会根源。

1943年5月初，《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了题为《巩固的后方》、《巩固国内团结》两篇社论，指出要想取得抗战胜利，就必须要有巩固的后方，要顺应民意，采取积极措施改善人民生活。社论还分析了产生民变的原因，提出了解决民变的办法。6月21日《恩来关于大后方民变问题致中央情报部的电报》中对有关民变的情况（共计11项，其中黔东事变占了6项）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并指出要妥善处理这类问题。这两篇社论和周恩来的电报，表明了中共中央对于黔东事变和各地民变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了民变的原因，指出了敌伪利用民变破坏抗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性，同时提出了解决民变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贵州各族人民的英勇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坚决反抗。全面抗战爆发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

① 徐则平：《黔东各族人民反抗国民党斗争纪实》，《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第116页。

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共贵州地方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组织动员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大敌当前，国民党贵州当局迫于抗日形势，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政策，表现了一定的抗战积极性。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合作，共赴国难，贵州各族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除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活动外，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感召下，社会上许多爱国人士，包括国民党贵州当局的有识之士，也纷纷行动起来，成立了贵州省各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贵州省动员委员会协济委员会、难民救济会贵州分会、贵州省会地区出征抗战军人家属优待委员会、贵州战时妇女职业训练所等官方或民间机构和团体，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号召各族人民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战。国民党贵州当局还发起组织了贵州省战地服务团，组织青年学生及社会青年开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服务。

在抗日战争期间，贵州人民参军参战，努力生产，节衣缩食，积极支援前线，发挥了抗战的大后方作用。数十万贵州各族儿女奔赴前线，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杨经国、胡畏、罗会廉、陈淑蓉等优秀儿女壮烈牺牲在抗日战场上。陈蕴瑜、邱熙颂、刘眉生、杨家骝等国民党爱国军官英勇杀敌，为国捐躯。八年抗战期间，数万贵州儿女血洒疆场。

在抗日战争中，贵州成为支援前线抗战的重要战略后方。抗战期间，全省出动民工69万人次，修建了兴仁至兴义、玉屏至铜仁、遵义至绥阳的公路以及黔桂铁路，还修筑了清镇、黄平、独山、安顺等飞机场。贵州是向前线运送兵员和抗战物资的重要交通枢纽，滇黔公路上著名的二十四道拐就在贵州省晴隆县境内。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贵州各族人民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广大人民纷纷行动起来，开展募捐活动，为抗战竭尽自己的力量。

全面抗战爆发后东部沿海的许多工厂、医院、学校迁到贵州，为坚持抗战保存了工业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基础和力量，贵州成为战时生产、战时救

护、战时文化教育的基地。

在抗战期间迁到镇远的第二战俘收容所(俗称“和平村”),为改造日本战俘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12月,国民政府第二战俘收容所迁到贵州镇远,“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西南支部”中的大部分成员因“亲共”嫌疑也关押于此。他们在此接受日本共产党员反战作家鹿地亘及中共党员的教育与指导,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负责搜集研究日军侵华有关情报,编印反战刊物,团结帮助所内的其他日本战俘认识日军侵华的非正义性,并从事反战工作研究,提供反战宣传资料,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共镇远支部在其中也开展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1944年底,黔南爱国军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抗战史和贵州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4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其在南洋的颓势,决定在中国战场上打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以连接从中国东北经北平(今北京)、郑州、武汉、南宁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摧毁中国南部的中美空军基地。4月上旬,日军向正面战场的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沿线的豫、湘、桂等地发起新的战略性进攻(日军称之为“一号作战”)。同年11月底,打到广西的日军进攻贵州,一直打到贵州独山、荔波、三都、都匀、丹寨等黔南诸县。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使黔南人民遭受了空前的劫难,这就是抗战后期震惊全国的黔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统治当局张皇失措,畏葸无能,应对失度,日军尚未到就组织纵火焚烧民房、军械库、被服厂、粮仓及各种军用物资,实行所谓的“焦土抗战”,造成重大人员财产损失和社会混乱。然而在这个时候,黔南各族人民包括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却表现出了英勇的斗争精神,他们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奋起抗敌。驻守荔波黎明关、独山黑石关等地的中国军队顽强阻击进攻的日军。独山、荔波、三都等县民众纷纷组织起来,拿起武器,用土枪、土炮、手榴弹、大刀、长矛、滚石、檑木袭击、射杀敌人,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军民的打击下,也迫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穷途末路的日军于12月10日退出黔南。

黔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中央关于开展敌后农村工作的指示,

准备就地抗战，派张立、田伯萍、张光昭等到贵州开辟敌后抗日游击区，准备组织抗日武装，并建立了黔南、黔东南民间武装力量。由于日军旋即迅速撤出贵州境内，原准备打游击的党员又转入隐蔽斗争。与此同时，贵大进步学生车祖尧、刘振武、蔡之诚和大夏大学学生陈启宇也组织了秘密进步团体“群社”，准备团结进步力量开展武装游击斗争，还制定了游击战计划。杨光文、蓝芸夫等人也利用其影响下的地方武装，准备在雷山、关岭进行游击斗争。

黔南事变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都匀、独山、镇远等地设置了医疗点，为群众难民免费治疗。“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也在贵阳、都匀、独山设立了服务站，为难民解决食宿、交通等困难。遵义地区的爱国师生也积极筹集慰问品，支援前线。

三、贵州省临时工委的建立与隐蔽疏散、坚持斗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倾向日益严重，党在国统区的工作进入了艰难的阶段，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中共贵州省工委撤销，建立贵州省临时工委，随之进行了隐蔽疏散工作。在复杂严酷的斗争形势下，隐蔽下来和疏散转移出去的地下党组织和党员继续坚持斗争。

（一）贵州省临时工委的建立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不久汪精卫公开投敌，国民党内的反共势力不断扩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与国民党坚持妥协、分裂、倒退的斗争愈来愈严重。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一方面宣称要继续联共抗日，另一方面又决定依靠英美等国际反共力量解决中国抗战和防共反共的方针，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方针和办法，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并陆续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共文件，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思想上为发动反共高潮作准备。这次会议，表明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而反共反人民的倾向则日益加强。接着，国民党便在全国挑起事端，多次制造反共

军事摩擦，到1939年12月，摩擦升级并达到高潮。

在贵州，国民党当局早在反共高潮之前，就对中共贵州地下组织及其领导下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抗日救亡组织加紧了秘密侦察、监视，为大规模的破坏、镇压作了准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在1939年10月28日给贵州省党部的密函中，命令贵州省党部特务会同当地教育行政机关以及各县党部有针对性地从6个方面进行破坏。(1)凡有各党派活动的学校，务须限期建立各该校国民党、三青团组织，以加强国民党对学校的控制；(2)在各类学校广泛发展国民党的外围组织，拉拢青年学生，以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3)对于一切进步学生，应随时进行反对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理论教育，对革命分子，则策动国民党员坚决进行打击；(4)“调查共党在乡村青年、苗族青年、妇女、文艺、邮工、店员中之各种活动，并摧毁其组织”，另一方面，对以上各种青年，应严格控制，并设法纳入国民党的轨道；(5)注意在学校中培植为国民党所用的青年，以扩大国民党中的反共骨干力量；(6)破坏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宣传，“禁止书店、书摊发售违禁书刊”，要引导青年阅读国民党所主办的书刊等。根据这纸密令，国民党特务在全省制造的白色恐怖便日甚一日地严重起来。主要表现在：一是派遣爪牙或扶植学校中的某些组织，争夺学生运动领导权；各重点大中学校，大都安排国民党特务或党务人员充当训育主任，并采取渗透办法，发展国民党、三青团的基层组织，以实现大中学校“党、团”化；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亲自到学校兼课，派别动队的特务到各校任军事教官。这样，学生的一切活动，都被置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视的控制之下。二是大肆破坏中共贵州地下组织，严密侦察、逮捕和残酷屠杀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到1942年，先后有思南县委、毕节县工委、湄潭县总支、黔北特区委、仁怀支部等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肖次瞻、熊大瀛、陈光型、陈法轼、李绍夫等一批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员先后被敌特逮捕杀害。一时间，贵州上空阴云密布。

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紧急通知，指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呈愈演愈烈之势，时局日益严重，为使党的组织免遭破坏，减少损失，必须立即改变我们党

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基本上转入地下活动，迅速撤离已暴露的党员和干部，把工作的重心放到巩固党的组织上面来，加强对党员的训练和秘密工作的教育。根据当时贵州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斗争形势，省工委一方面加强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一方面对已暴露的党员迅速进行隐蔽疏散。一部分输送去延安或新四军，一部分转省外隐蔽活动，转地不转党，一部分就地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1940年3月，省工委书记邓止戈接中共中央南方局通知赶赴重庆，南方局代理书记博古指示：贵州党组织应作紧急疏散，撤销中共贵州省工委，另建立隐蔽的新的领导机构；已暴露的党员干部要撤走，并要求邓止戈完成任务后去延安。4月，邓止戈从南方局回到贵州，传达了南方局的指示，一是要秦天真和熊蕴竹立即撤离贵州去南方局，到重庆红岩村报到，其他已暴露的党员干部应抓紧疏散隐蔽，保存革命力量；二是撤销中共贵州省工委，成立由邓止戈任书记，陈于彤（邵铭）、张述成（达铭）、肖次瞻、杜守敦（魏铭）为委员的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省临工委”），肖次瞻任秘书长（肖次瞻被捕后由杜守敦任秘书长），省临工委名单已上报南方局审批。省临工委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将已暴露的党员骨干进行转移，并调整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班子；三是邓止戈把疏散党员和干部的工作安排好以后也撤离到南方局去。

秦天真接到通知后，即与邓止戈商量决定：马上通知秦天芬、王天惠、陈理源3人立即动身先去重庆，秦天真则在把党内的关系向陈于彤交接清楚后，再与熊蕴竹撤离贵州赶抵重庆南方局。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使疏散工作能够顺利开展，省临工委成立不久即在龙里县召开会议，将全省党组织进行了调整，把全省划分为4个片区进行领导，即贵筑（贵阳）区、黔北区、黔西区、黔东区。贵筑区由唐席之、胡钦僧、陈济民、张人均负责；黔北区由龙有光（龙绍昆）、陈德忠、张友民负责；黔西区由田伯萍、张立、肖维亮、雷光远（雷正光）负责。黔东区因邓止戈撤赴延安未能组建。上述3区分别由省临工委成员严格执行单线联系，陈于彤领导黔北区和黔西区，张述成与肖次瞻负责贵阳片区。

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及南方局关于隐蔽疏散的方针，省临工委不断总结过去的斗争经验教训，改变了以往建立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做到党的组织短小精干，极端秘密，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实行平行组织，个别联系，转地不转党等办法。在工作方法上严格区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不同性质，并对此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强调：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分开，应以合法活动掩护秘密活动，要发动群众最大限度地利用国民党当局所允许的“合法”形式，继续开展抗日活动，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秘密工作因为是“里的面”的工作，它的组织、活动方式、工作方法等都必须是极端秘密的，不能有丝毫的暴露，组织与组织之间禁止横的联系等等。

按照新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工作方法，省临工委有计划地、周密细致地领导各片区的地下斗争及疏散转移工作。

在贵阳片区，当省工委委员兼中共贵阳县委书记秦天真和县委副书记陶信镛先后转移延安后，县委的工作由省临工委委员、秘书长肖次瞻兼管。1940年7月19日，肖次瞻被捕并于同年12月7日被敌人秘密杀害于省保安处后，省临工委的组织及活动受到一定的影响。为加强对贵阳地区未疏散的党员及党组织的领导，省临工委于1941年3月从遵义调唐培（唐贵）来贵阳，与雷光远、熊寄萍（李明）组成了中共贵阳县委，负责领导隐蔽下来的贵阳地区党组织。

在黔北片区，为加强和领导黔北片区党的工作，省临工委于 1941年初派龙有光到遵义，与陈德忠、张有民等组建了中共黔北特支，以遵义、湄潭、桐梓为中心，负责金沙、仁怀及思南等地党的工作，和省临工委及黔北有关党组织及党员联系，负责组织这里的党员、干部隐蔽疏散。

在黔西片区，省临工委直接领导下的黔西片区党组织于1940年9月开始工作，由田伯萍负责全面工作，肖维亮、张立、雷光远分别负责组织、统战、地下交通工作，涉及范围主要是黔西和黔西南两地区，活动中心在滇黔公路线上的盘县、普安、晴隆（安南）3县。1940年7月，中共党员储兆龙按党组织的指示，由贵阳转移到普安，与1938年7月回到普安开展活动，并以开办实业作掩护为党筹措资金的张立取得联系，张立作为黔西片区党组织的负责人之

一,即安排储到晴隆以民教馆员的身份为掩护,筹建党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在晴隆成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经具备,经黔西片区党组织批准,同年10月成立了中共晴隆支部,储兆龙任书记,黄小穆任组织委员,李友唐任宣传委员,支部的任务主要是负责外地转移来的党员的疏散隐蔽工作。11月左右,田伯萍撤抵普安,这时省临工委已决定张立向四川转移,同时还决定张人均、储兆龙等也撤离。1941年1月,张立撤走。在此前后,隐蔽在晴隆的丁荣端、李中、杨荣昕、黄小穆、陈学敏、何小泉等和盘县的高德藩以及田伯萍等,也按省临工委的疏散计划向四川、广西、云南疏散转移,肖维亮、雷光远亦于同年8月转移云南。

1939年春,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自湖南西迁平越。交大党支部书记徐大德在西迁过程中,与中共贵州省工委接上关系,并向省工委汇报了交大党组织的情况,办理了有关接转党员的组织关系。这样,交大党支部即在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省临工委成立后,支部书记徐大德与省临工委书记邓止戈单线联系。

交大来到平越后,党支部积极组织同学们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活动,办起了壁报《呼声》、创办了进步社团"越光社"、"山城社"等,成立了歌咏团、街头宣传队,组织了"漫州学会"、时事座谈会,开办了"民众夜校",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和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传播各地抗日游击战的消息,讨论抗日战争形势。同时还通过排练演出抗日剧目,发动群众募捐、献金、搞义卖等,以支援前线的抗日将士,使这里的抗日救亡活动有声有色。

1940年9月,邓止戈在省临工委成立后,即到平越视察工作,拟打算视察结束后即按南方局的要求撤回重庆南方局,殊不知在交大参加完交大同学举办的中秋联欢晚会后,于深夜与徐大德一同被平越当局逮捕,分别关押在县警察局和县保警队,后邓止戈寻机逃出,几经辗转,回到南方局后转移去延安。

邓止戈撤离贵州、肖次瞻被捕后,省临工委的工作即由陈于彤、张述成、杜守敦3人负责,鉴于贵州地下斗争的形势,他们继续贯彻执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把工作的

重点放在将已暴露的党员及群众骨干进行隐蔽或陆续转移到省外，作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避免了较大牺牲，减少了很多损失，保护了不少同志。

1941年1月，陈于彤调回重庆南方局工作，省临工委遂决定，陈于彤在重庆、张述成在桂林、杜守敦在昆明负责该地区的疏散、联络工作。1943年7月，张述成完成疏散任务后，与杜守敦在昆明讨论研究了省临工委的全面工作后，也撤回了南方局。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向张述成传达了南方局的决定：贵州转移干部的工作已基本结束，撤销中共贵州省临工委；撤销省临工委在各地设立的联络点；转移的同志，就地长期埋伏，以待时机；今后贵州工作，由南方局直接领导。至此，中共贵州省临工委结束工作。但许多隐蔽下来的党组织和党员，以及南方局和四川、广西等邻省派来的党员，仍在贵州坚持开展活动，进行隐蔽斗争。

（二）南方局及邻省党组织在贵州开展活动

抗战期间，除了中共贵州省工委、省临工委及其所属党组织在贵州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地下斗争外，南方局及邻省党组织也指派人员在贵州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利用各种条件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为贵州的革命斗争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1939年1月3日，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在贵阳达德中学部大教室内宣布建立，袁超俊任站长，交通站在南方局领导下，充分利用其合法地位，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它是我党联接华南、华东、西南与延安的重要枢纽，同时，它又担负着与中共贵州地下组织、中国红十字特别支部等的联系。交通站建立后，在积极转送大批军需物资，转送党的干部、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延安、新四军，营救被捕同志，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界人士，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领导和联系党的地下组织，进行秘密的地下斗争等方面做了大量

的工作，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39年2月，长沙大火后，中国红十字会所属救护总队由长沙辗转迁到贵阳图云关。该总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支战时机动救护队伍，拥有国内第一流的医疗技术专家和教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红十字会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由郭绍兴、毛华强、章文晋先后任特支书记，党员20多人。红会特支到贵阳后，其组织关系直接由八路军贵阳交通站领导，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主要是：利用运输股各汽车队往返于交通运输线上的便利，以合法的形式，发起成立了“红会书报供应社”，公开输送进步书刊；广泛动员大后方医务人员到抗日根据地去工作，共动员组织了20余个医疗队到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医护工作，还组织动员了一批青年医务工作者参加了八路军；通过特支的广泛宣传，一部分高级医学专家，都倾向和赞成我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政治主张，从而扩大了我党在红会的政治影响。

1940年4月以后，省临工委在组织贵州各地党组织及党员主动撤退转移、易地隐蔽的同时，南方局及邻省的党组织也将部分党员转移到贵州，进行隐蔽活动，逐步建立、巩固了一批地下党组织及活动据点。

1942年8月，张黎群受南方局指派到贵阳清理党员关系。张以贵筑中学教师身份为掩护进行活动，并建立了中共贵筑中学支部。不久，唐以荣、李白蕾从重庆到贵阳，3人组成中共南方局直属支部，张黎群任书记。10月，由于贵阳三青团到校对学生进行强化训练，与进步教师发生冲突，张黎群3人等为防不测，经请示南方局后，遂撤回了重庆。

1942年，南方局还派党员李晨（李振铭，原在云南工作）、赖卫民（赖映棠，原在四川工作）到贵州工作。他们的任务是利用社会关系站稳脚跟，把从省外转移到贵州的一批党员的组织关系接上，用单线联系的方法组织起来，按照“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方针，积极稳慎地开展工作，建立中共地下组织。当时，由外地转移到贵州的党员有十一二人，但只有五六人接上了关系。于是，李晨先以安顺军医学校职员的身份在安顺活动，后又考入迁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与先期入校的中共党员吕东明等建立了党在浙大的活动据点，在浙大学生中开展地下活动，

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引导有进步倾向、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学生干部身上，依靠进步力量，利用校方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对当时处于低潮的浙大学生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赖卫民则先以普定中学教师的身份在普定活动，1943年秋，赖卫民转移到遵义县尚嵇大同中学，后到团溪明德中学，以校长身份作掩护，团结、影响了一大批进步师生开展活动。1944年冬，中共党员张光昭受南方局组织部派遣回到家乡遵义尚嵇，与赖卫民接上了组织关系，其工作任务是协助赖卫民主要抓组织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武装斗争和组织联系工作，形成了党在尚嵇的“据点”。在此前后，中共党员朱辛莱、沈丹凤和一批进步青年受组织派遣也来到尚嵇、团溪活动，壮大了“据点”的力量。当日军1944年冬进犯黔南时，赖卫民、张光昭、李晨按南方局的指示，经联系商定拟组织3支武装力量，以抵御日军进犯：一支是遵义城区以浙大为中心，拉队伍上金顶山；另一支是以湄潭浙大为中心，组织队伍到遵（义）绥（阳）湄（潭）边境；再一支是以尚嵇、团溪为中心，把队伍拉下高塞坡乌顶山一带。赖卫民还以家访为名，多次带领大同中学教师和学生到距尚嵇几十里的天子赤田沟、高塞坡等山上察看地形，绘制地图，商讨成立抗日游击队以及筹集枪支、储备粮食盐巴等问题，并起草了关于成立抗日游击队的宣言，当各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时，因日军进犯独山后旋即退出贵州，武装抗击日军的计划也就未能实施。

早在1938年7月，中共四川泸县中心县委派李亚群到赤水清理和发展党组织。并于同年8月建立下中共赤水支部，负责领导赤水的抗日运动。1939年5月，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又派特派员彭红岩（彭维汉）到赤水，以赤水女中教师身份为掩护指导工作。为适应党组织发展和赤水斗争形势的需要，经泸县中心县委决定，将中共赤水支部改为中共赤水特支，领导人为傅方权、张跃龙、赵世咸和田崇尧。特支成立后，明确提出的任务是：积极动员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开展统战工作，号召党员在各阶层人士中广交朋友，注意在上层人士中及地方实力派人物中做争取工作。并通过早年就与我党组织合作的民主人士邹华轩、赵蕴山等的支持配合下，串联和争取了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和公职人员，对他们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影响了国民党赤水县的一些上层人

士，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忱和正义感，以至他们在参与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时积极性高且不怕担风险。在特支的领导下，赤水成立各种抗日组织，进行抗日宣传、揭露国民党当局丑恶行径等活动，显得很有声势，群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1939年12月，受到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影响，赤水特支遭受破坏，特支负责人傅方权、张跃龙等相继被捕，有的惨遭杀害。于是，泸县中心县委决定改组赤水特支，其领导人由田崇尧、沈际昌和刘晏平继任。改组后的特支先后下辖8个党支部，即赤水境内的大同、宝元、商人、赤水女中、公务员和赤水中学6个支部，以及四川境内的先市和五通2个支部。1940年底，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决定成立赤（水）合（江）临时联合县委，单文光任书记，以加强两县党的工作。1941年6月，赤水特支再次遭受敌人破坏，田崇尧、沈际昌被捕，至此，中共赤水特支停止活动，但其下辖的个别支部及党员仍坚持隐蔽斗争。

1943年8月，中共叙（永）、（古）蔺、（古）宋特区委机关转移到赤水县城，特区委书记廖林生以赤水法院缮状生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以党组织的联络员身份领导了川南和黔北赤水县党的工作。同年，古蔺中心县委也先后派万仁慕、王玉升到贵州大定，利用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开展地下活动，建立了地下党支部。从1942年春到1944年6月，中共叙（永）、（古）蔺、（古）宋特区委还相继把一批党员转移到贵州金沙县和遵义县接壤的安底、茶园、马蹄一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地下活动。1944年秋，正式成立了中共茶园支部，陈以承任书记。之后，该支部的中心由金沙县属茶园逐步转移到遵义县马蹄，其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1942年，中共川东綦南工委书记李治平和党员胡晓风转移到贵州省桐梓县水坝塘，以綦江大路工程公司水坝塘办事处职员身份为掩护，与其后转移到此的四川南川合溪特支书记李培根、党员戴克宇等建立了党在水坝塘的“据点”，指导綦江、南川以及黔北的桐梓、正安、绥阳、道真等地党的工作。1943年9月，中共四川省南川县合溪特支书记温凯庭奉綦南工委指示，转移到贵州省绥阳县城活动，不久，中共党员张群英、石仲达也先后奉命转移到绥阳，配合温凯庭开展工作。1944年2月，成立了中共绥阳特支，温凯庭任书

记，绥阳特支受巴县中心县委和綦南工委领导。此外，1949年1月，李治平、李培根到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工作后，南方局钱瑛、于江震决定成立中共绥桐工委，李培根任书记，温凯庭任副书记，属中共巴县中心县委领导，李培根分管桐梓、正安、道真等县的工作，温凯庭分管绥阳县的工作，绥桐工委领导中心在桐梓水坝塘。

在黔桂边区，广西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也十分活跃。中共广西省工委先后建立了黔桂边委、黔桂边特区委、黔桂边特别支部。这些组织在黔桂边区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努力争取团结地方实力派参与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初，中共广西省工委先后派刘登国（化名陈柱）、韦敬礼（化名荆丽）、吴元（化名吴篇）到黔桂边委工作。1938年4月，根据中共广西省工委指示，吴元在板陈秘密宣布中共黔桂边委改为中共黔桂边特区工委，隶属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书记赵世桐，组织委员吴元，宣传委员韦敬礼，军事委员韦运样，委员韦国英、牙永平、黄唤民、黄志新、牙美元，负责领导右江上游黔桂边望谟、册亨和紫云、罗甸部分地区及广西乐业等地的地下党组织，主要任务是为在黔桂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作准备。1939年初以后，由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黔桂边抗日运动渐处低潮，加之吴元到板陈后，公开以“八路军代表”身份出面活动，遂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警觉，因此，1939年秋，经特区工委决定，将特区工委改称中共黔桂边特别支部，其目的是“缩小目标”，后来，由于黔桂边未沦陷，特支认为在黔桂边组织抗日游击斗争不如前段迫切，因此决定吴元去桂林找上级组织汇报请示工作，赵世桐也于1939年底另有任务离开黔桂边，加之1941年初，敌人“围剿”板陈，韦敬礼等转移去广西，这样中共黔桂边特别支部结束工作。

（三）隐蔽疏散　坚持斗争

中共贵州地下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得到了全省各族各阶层群众的积极支持和热烈响应，全省各地争取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共分裂活动的强化，一些贵州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暴露，使公开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部分党员和进步人士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监视，也造成党组织在反共逆流到来之后，处境相当艰难。

贵州国民党当局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不但不顺应历史潮流，反而不断暴露出他们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的真实面目，在1938年一年里，就连续制造了全国罕见的破坏镇压爱国运动的贵州学联二一九事件，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黄大陆、李策等中共党员；制造了“取缔”贵州“民先”组织，逮捕了张益珊等“民先”队员的八一三事件。这两起事件，既充分反映了国民党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同时又表明，贵州地下党组织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中，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各地党组织在反共逆流中艰苦斗争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逆流席卷全国，在此形势下，贵州当局趁机加紧了反共活动。主要表现在：

一是增设特务机构，扩充特务人员编制，使特务组织遍及全省各个角落，特务统治十分严密。早在1935年，国民党的两个特务系统跟随蒋介石均来到贵州，特务头子、黔室肃反专员陈惕庐以贵州省党部设计委员的公开身份网罗特务分子，在所谓“党特合一”的方针下，筹组特务网。1938年底，“军统”和“中统”在贵州分别建立了黔站、黔室，用以与国民党的党、政、军、警配合，破坏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镇压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军统黔站”在各专、县及省会各部门都设有特工组；“中统黔室”亦在各专、县建立了通讯组，

网罗和培植骨干。他们还通过建立半公开的外围组织“青年阵地社”,对进步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搜集刺探情报、寻找线索、收买人员、破坏抗日活动。

贵州特务组织采取以“组织对组织”的策略破坏中共贵州地下组织,大肆进行监视、搜捕、屠杀中共党员。用“以工作对工作”的战术,瓦解中共组织所领导或影响的团体,压制民主运动,争夺抗日救亡运动领导权,控制中共地下组织所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对中共地下人员采取恐吓、绑架、殴打等手段,以达到破坏中共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目的。同时,国民党将军统局设立的秘密监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即“息烽集中营”)也迁到息烽县阳朗坝,专门关押被逮捕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另外还设立了特务训练班、军委会特务第二团、中美合作所第10特种技术训练班、军委会无线电第2总台、巡察总队、军械被服库、军统局息烽财产保管委员会、军委会息烽办事处、军委会西南电训班等机构,时常驻有军统便衣队、宪兵队。在息烽的军、警、宪、特人员最多时达15000多人。

二是对共产党进行造谣诬蔑,在思想上毒化社会空气,腐蚀青年学生,压制群众抗日热情,防止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极力宣传蒋介石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极尽反共宣传之能事,为大规模的镇压中共贵州地下组织制造舆论。

三是钳制舆论,禁锢人们的思想,对新闻、邮电和出版物进行严密检查控制,防止进步书刊输入贵州,并从中发现线索对中共贵州地下组织和进步团体加以破坏。为此成立了“贵阳邮电检查所”、“贵阳新闻检查所”、“贵州省出版品审查委员会”等机构,加强对新闻、通讯和出版物的控制,严禁共产党的报纸、刊物、书籍及其他进步书刊传入贵州。

四是蒋介石为了牢牢控制贵州局势,把特务头子康泽统率的别动总队改编为新编28师和29师,任命别动总队队长刘伯龙为新编28师师长,以禁烟、剿匪之名,进驻贵州,对贵州人民实行军事统治、镇压。

国民党顽固派坚持的反共政策以及贵州当局采取的反共措施,破坏了国共合作,破坏了已经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贵州各地不少地下组织遭到破坏。

——由于敌人侦知到了镇远党组织的大量情况，1940年11月，支部组织委员张文锐被捕，12月，支部书记欧阳德风被捕，其他党员被迫全部撤离镇远，镇远党支部及其外围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

——1940年8月到12月，贵阳的局势日渐险恶，在此期间，华侨司机郭嘉、李德富、“筑光”党支部宣传委员饶元祚、贵阳女子师范党支部书记吴直、原中共贵阳县委书记谢凡生、地下党员丁文、陶生民、顾文淑等先后被捕。12月7日，国民党秘密杀害了肖次瞻。这是国民党贵州反动当局进行大逮捕、大屠杀的前奏。

——1940年夏，被派到台江组织读书会的吴云龙、潘昌明、杨崇珍分别在台江、施洞被捕。7月，吴云龙、潘昌明先后在台江被杀害。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开始了疯狂的屠杀。1月16日，铜仁国立三中学生蒋澄斋、庄世泽被驻军28师杀害于铜仁县城关。18日，中共大定支部负责人蔡应达被秘密杀害于贵阳东山。19日，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黄大陆、李策、机要员严金甡、“民先”贵阳地方队部队长张益珊、副队长凌毓俊被杀害于省保安处防空洞内。21日，地下党员王栻被杀害。26日，原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政委欧阳崇庭被杀害于押解途中。

就在1941年1月，国民党当局还逮捕了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贵阳地区公路运输支部书记陈济民、贵阳高中支部书记邱纯和、黔邮歌咏队负责人瓦兆鸿、地下党员邵光勋等在贵阳先后被捕。1月17日，毕节县工委书记王芸生在毕节被捕。19日，原新场总支书记李绍夫在开阳被捕。24日，新场第三任总支书记林正良及党员陈德琪、余宗铭、李亚群被捕。春节前夕，从云南蒙自草坝蚕业新村回新场看望妻女的中共党员寇述彭遭特务跟踪后被捕，不久，其妻蓝运臧与妻妹蓝运铮以及曾同在云南省蒙自草坝工作的地下党员王定一在贵阳一同被捕。

1月21日，全副武装的军警宪特查抄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逮捕了交通站工作人员李配之等7人。22日，特务机关又查抄了“生活”、“读新”、“自力”3家书店，并逮捕了书店经理孙家林等5人。

疯狂的大逮捕后，国民党特务又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全省各地残害共

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的事件不断发生。

在贵阳地区：1941年4月，陈济民被杀害于贵阳大井坎监狱。5月19日，蓝运臧、寇述彭、蓝运铮、王定一被杀害于贵阳东山脚下。6月，李亚群、瓦兆鹓被杀害于省保安处防空洞。1942年3月，郭嘉、李德富被杀害于贵阳照壁山脚。6月17日，原贵阳中学地下党员、被派到望漠从事电台工作的王发善和施秉进步人士、偏桥小学校长邱肇业，同时被杀害于省保安处防空洞。20日，中共镇远支部原宣传委员、省邮务工会理事陈法轼亦被杀害于省保安处防空洞。22日，早年在北平师范大学从事文字改革工作的地下党员傅以平，在贵阳被特务用毒药杀害。1942年冬，思南中学马廷卿在贵阳云南会馆被迫害致死。

在黔北地区：1941年1月，回湄潭老家省亲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共产党员关祖潜被特务暗杀于湄潭县城东门外仰天窝。7月，原中共赤水特支书记傅方权在赤水县城西郊被杀害。8月，黔北特区委书记李绰然在湄潭被特务秘密逮捕，旋即叛变，出卖了组织。9月28日，中共湄潭县总支书记陈光型被特务秘密杀害后，沉尸湄江石牯塘。9月，共产党员徐继英、傅邦瑞和进步青年潘名挥被国民党遵义县党部逮捕。1942年初，国民党金沙、仁怀、湄潭、遵义等县当局又逮捕了一批中共党员，仅隐蔽在仁怀县的各县党员就有40多人被捕。3月，赤水中学党支部书记王国柱被敌特杀害。

在黔西北地区：1941年初，因中共毕节县工委组织委员葛发声变节，致使王芸生、邱在模、邱在陵、阮明伦以及前任县工委书记、现任大定支部书记邱在先等人被敌人逮捕，毕节县工委组织遭到严重破坏。4月至8月，活动于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贵州游击支队副司令员詹绍武，司令员赵文海及其子、游击队员赵银臣，先后被杀害于云南昭通和毕节南关赤水河畔。9月15日，原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司令员、贵州游击支队政委阮俊臣在毕节城关教场被杀害。

在黔东南地区：1941年夏，镇远“民先”队员田维智、王书田在黄平被当地驻军刘伯龙部逮捕，同年秋被杀害于黄平县新州三里湾。

据统计，皖南事变前后近3年时间里，贵州全省被捕的中共党员、革命群

众共281人，63人被杀害，其中被杀害于省城贵阳的就有28人。敌人的大逮捕和血腥镇压，并没有使共产党人屈服，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和险恶的环境中，他们面对凶残的敌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钢铁般的意志，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出卖同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悲壮英勇的革命之歌。

在国民党当局大肆逮捕，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的严酷形势面前，中共贵州地下组织一方面坚定信心，领导和团结人民为争取抗战胜利继续战斗，一方面认真总结了血的教训，在省临工委的领导下，改变了斗争的方式和策略，坚持隐蔽疏散，迅速转移同志，在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的同时，又与敌人展开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省临工委领导下的疏散转移工作

在国民党贵州当局接二连三地制造破坏中共贵州地下组织和进步团体、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的事件，白色恐怖弥漫全省的严峻形势下，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处境愈益险恶，任务更加艰巨。既要同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共反人民行径作斗争，又要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和条件，通过各种渠道，认真贯彻党在国统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最大可能地保存干部，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为了完成这一艰巨而紧迫的任务，省临工委1940年4月成立后，立即着手开展疏散转移工作。开始是组织已暴露的同志进行转移，如本省不能隐蔽下来，就转移到邻近的四川、云南、广西、湖南等省区，也有的安排去新四军或延安。除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外，贵阳的陶信镛、熊蕴竹，黔大仁中心县委的蓝芸夫等，均先后转移到延安。文焕群、孙瑞华、王启霖、刘家样、宋大鸣、李正裕等分别转移去了桂林或新四军。同时，为了使转移异地的同志能够生存，找到职业，便于今后工作的开展，省临工委在作转移安排时，既要考虑把同志转移到能够长期埋伏的地方，又要考虑到每个同志的社会条件和发展前途，分别情况，进行转移。云南当时是国际交通要道，省临工委就把交通运输部门的同志转移去昆明。这些同志大多是技术工人，有驾驶汽车、修理汽车的

专长，去从事运输工作，既可掩护自己，又熟悉了交通情况，广泛结交了朋友，直接间接掌握着车辆，不仅能为党组织工作提供交通方便，还能为党筹集经费。此外，省临工委还对部分同志进行了学校或地区的变换，以策安全。当贵阳中学支部面临危险时，党组织立刻让已暴露的党员及不适宜继续留下的学生转学，先后转移了五六十位同学到修文县城关省立高中就读。

转移工作前期是主动的，到1940年7月以后，贵州形势日益严峻，各县不少人被捕，疏散转移工作愈加紧迫。为适应工作的需要，省临工委曾指派胡钦僧、文宛丽、刘跃能3人组成了特别工作小组，协助张述成负责疏散转移工作。此后，疏散工作由胡钦僧与李铭三负责。他俩来自省外，社会关系广，与学校支部无横的联系，宜于掩护本地同志。

1940年底，贵州当局加剧了对地下党员的迫害，转移任务进一步繁重。在疏散工作中，交通工具是很关键的问题。那时贵州没有铁路，进出省内外全靠公路汽车，而沿途关卡甚多且严，很不安全。为了保证疏散工作的顺利进行，急需建立一条地下交通线。省临工委积极调动一切可靠社会力量，共同解决了这一难题。当时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有中共特支，贵州公路局有中共党员任站长，汽车修配厂有中共党支部，西南公路局也有中共党员作站长，贵州企业公司和西南运输处都有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因此，在他们的努力和群众的密切配合下，红色交通线终于建立起来了。疏散转移的同志乔装成家属或本单位职工去搭车，必要时可以绕过车站特务的盘查，到检查站以外上下车。还可以选择驾驶员或随车人员，使疏散工作做到更安全可靠。这条地下交通线对贵州的转移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0年底，省临工委还在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车务部门内，秘密建立了革命互助会，其领导人为省临工委委员张述成，直接负责人是胡钦僧。为完成疏散转移的艰巨任务，全面掌握车辆运行情况，及时安排人员转移，胡钦僧特意介绍了红十字会运输股的车辆调度张宗麟加入互助会。张不负重托，尽心尽职地为互助会工作，在他的调度室里，经常有“不速之客”找上门来，只要对上约定的暗号，知道是地下党的同志，他都热情接待，妥善安排。从1940年底到1941年底，经张宗麟安排、自助会员协力送走的地下党员

和进步群众就有几十人次。

从1940年夏秋到1941年春，是紧急疏散的高峰时期。除通过上述渠道有计划安排转移外，还有的是经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直接送到延安或皖南新四军军部。也有的是自己设法投亲靠友，进行转移隐蔽。据不完全统计，此期间转移到四川、云南、广西、湖南等地的同志共有120多人，为革命保存了一批重要力量。到1942年初，贵阳地区疏散转移工作暂告结束。

疏散外地的党组织及党员继续坚持战斗

转移到外地的同志，除了找到谋生的工作外，更重要的是如何继续坚持斗争，这是摆在党组织面前的一大重要课题，省临工委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和地下斗争的需要，要求转移到外地的同志，要注意适应当地的社会习惯和风土人情，不要性急，不要冒进，切忌暴露。提出了“四化”、“三勤”，即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群众化；勤业、勤学、勤交友。在新的环境、新的条件下，站稳脚跟，继续开展隐蔽斗争，为党工作。

由于当时的情况十分特殊，省临工委担心转移到外地的同志失掉组织关系，曾向南方局提出建议：凡转移到重庆地区的，直接由南方局审查；转移到桂林、昆明的，由贵州党组织派人联系，条件成熟时再经南方局转给该地；转移省内各地的，由省临工委自行接转。为接转党员的组织关系，张述成往返于重庆、昆明、桂林、贵阳之间，查实核对，将名单送南方局组织部保存。

为照顾隐蔽到各地的党员及进步群众，1941年秋，省临工委决定在贵阳、昆明、桂林组织“革命互助会”，作为疏散在外的同志互相联系的组织形式。1941年底，张述成向南方局领导同志汇报了互助会的工作，南方局指示将互助会改名为自助会，取天助、自助者之意，要疏散在外的同志不要过分依赖组织，要自力更生，去开拓党的事业。桂林分会由张述成兼管，陶涵春、李正裕、李铭三负责；昆明分会由胡钦僧、黄奇鑫负责。通过自助会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以解决就业、升学及生活困难等问题，并组织会员一起学习进步书刊、革命理论，坚定革命的人生观，保持革命气节，增强革命的自觉性。

疏散在外的同志始终不忘自己的职责，换了地方，虽然环境和条件不同

了，但仍然以坚定的信念积极工作。他们广泛进行社会调查，重新开辟新的斗争。从贵州转移到昆明的“公路运输支部”，在1943年3月后与贵州党组织失掉联系，但他们没有放弃革命活动，继续坚持开展工作。龙绍昆、安燕群利用开“满春堂”饭店为掩护，与各方面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结交朋友，并深入到受苦最深的永元井盐场工人当中，与他们拉家常、讲故事，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启发工人觉悟，发动工人搞工运以争取自己的权益。后来，支部派龙绍昆进盐场工作，领导工人运动，为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基层的领导骨干。

转移到桂林地区的宋大鸣，不顾身患肺病，仍深入到大瑶山中开展工作。他通过举办小学教育和成人扫盲活动，在偏僻边远的大瑶山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因长年奔波，致使病情恶化而去世。地下党员高言志转移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利用职业之便和同乡关系，广结朋友，并将获取的情报提供给党组织。

此外，大批疏散在外的党员和进步群众，都积极地学习劳动技能，争取公开的社会职业，站稳了脚跟，长期隐蔽下来，坚持为党继续工作。

省内各地的隐蔽斗争

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加上愈益险恶的斗争环境，许多同志没有转移到省外，这些在省内隐蔽的党组织和党员，也充分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多种形式，积极积蓄力量，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

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在1940年4月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但是党的组织活动并未停止。他们除通过多种形式组织领导这里的抗日救亡活动外，还通过各种关系，使多数党员和积极分子有了合法的职业。领导小组成员张恒兹谋到了保安队分队长、紫云县中一区区长的职务，另一领导成员刘英泰则先任常备队长，后任小学校长、副镇长职务。其余人员有的在学校任教，有的在机关团体任职员，他们勤奋工作，完全融合于群众之中，不但避开了特务的注意，还积极有效地开展了群众工作。此外，党组织还建立了农村活动据点，并及时转移了已暴露的同志，仅1942年前后，地下党组织就将被特务追

踪的10多名党员和进步人士安全隐蔽在这里。1941年1月，中统特务、紫云县长刘锡珍大搞清查“异党”活动，指使特务编造黑名单，盯梢监视，非法拘押了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撤销了张恒兹的区长职务，且关押了月余。针对刘锡珍反人民的嚣张气焰，地下党组织决定利用刘与地方势力的矛盾，采取合法形式，开展反刘斗争，搬掉这块绊脚石。于是，派人搜集了刘的大量劣迹，造成倒刘的社会舆论。同时，通过曾昭荣等人，联络了以刘聘臣为首的地方人士和政府官员，组成了一股反刘的力量，联名控告到省，迫使贵州当局于1942年春将刘撤职查办。倒刘斗争的胜利，不仅有利于保存党组织，而且在斗争中发展了革命的力量，团结了群众包括县里的上层人物、知名人士，这是贵州地下党的斗争史上运用策略取得成功的范例。最后，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的斗争一直不断，并坚持到解放。

中共凯里党小组在李光庭、李长青、王毅、喻雷等的领导下，虽然与省工委失掉联系，但通过兴办实业，采取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斗争方式，筹集资金，积蓄力量，团结革命骨干，发动群众，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一方面开展斗争，一方面保存自己，在艰苦的环境下，较长时间地进行隐蔽斗争，直到凯里解放。

中共织金地下组织从建立到发展，一直都是在秘密条件下进行活动的，其活动具有良好的隐蔽性。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都能根据本地斗争的实际情况，制定灵活的方法和斗争策略，从重要活动的开展到一般工作的布置及人员平时的往来联系，都有严明的规定和纪律要求。会议和碰头地点采取经常变换的方法，每遇情况异常，即立刻进行处置或转移。如1942年2月24日，国民党织金县政府组织人搜捕，而打入国民党县政府的县工委委员赵百川提前获悉了当局要秘密抓人的消息后，立即通知了县工委书记方献祥。县工委为此迅速将所属的5个支部，30余名党员转移到贵阳、安顺以及附近农村，避开反动当局的大搜捕、大屠杀，完整地保存了组织，直到经历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后迎来织金解放。

1940年10月，中共黔西片区负责人田伯萍将省临工委决定由外地疏散一批党员到黔西地区的任务交给中共晴隆支部后，支部为保证任务的完成，

发展了当地知名人士钱培炎为特别党员，不参加支部活动，安排支部组织委员黄小穆与其单线联系。钱培炎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安排外地转移来的党员的职业。皖南事变后，他利用县督学的职权及社会关系，将由贵阳、开阳疏散到晴隆的一些地下党员推荐聘请为城乡小学的校长或教员。这些转移到晴隆的党员在此建立了直属中共黔西片区的党小组，不与晴隆支部发生横的联系，他们利用学校这块阵地，开展抗日活动，继续从事地下工作，直到省临工委安排撤退时，才转移省外。

中共党员张立受省工委委员秦天真派遣，于1938年7月到黔西南普安一带开展党的工作，按照省工委有关指示，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兴办裕民染织厂、梅花箐纸厂、百货商店等实业，为党组织筹措了大量活动经费，先后安排了张人均、储兆龙在该县隐蔽。

1940年春，隐蔽在贵阳民众教育馆民教剧团的中共党员朱克可、潘筠夫妇，与省临工委委员杜守敦取得了联系，考虑到潘筠的哥哥潘壮飞是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副官处长，杜守敦便安排她打入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以“录事”名义担任了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宇人的机要秘书，负责为党搜集情报。第一次执行任务时，就把国民党准备逮捕的10余名地下党员的名单强记下来传递给党组织，使这些同志得到及时转移。

1940年8月，南方局交通局罗迅青受党组织派遣到贵阳，利用贵阳市税局货运登记的公开职业作掩护，与隐蔽在贵阳的中共党员宋至平、周帮之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建立了党小组。他们通过秘密翻印、散发党报、党刊上的重要文件，搜集情报，并与隐蔽在资源委员会的赵彤、生活书店的邓晏如等取得了单线联系，秘密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工作。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贵州地下组织根据不同阶段的斗争形势，采取不同的活动方式和斗争策略，建立发展组织和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群众，组织领导了贵州抗日救亡运动，使党组织、党员、进步群众在运动中经受了锻炼，得到了提高，到皖南事变前，党组织的活动影响面最广，涉及范围最广泛，呈现出轰轰烈烈、蓬勃发展的形势，是贵州地下党组织建立后发展最好的时期。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全省各地的党组织积

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和领导各阶层人士团结抗战，实现了党对贵州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共贵州地下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发动和组织了大批社会团体及群众组织参与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并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贵州当局极力限制、镇压进步的抗日救亡活动，疯狂地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企图彻底破坏贵州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央精神和南方局的指示，贵州党组织成立了新的更为隐蔽的领导机构，继续领导贵州地下党组织与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作坚决的斗争。在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及时疏散和转移了大批已暴露的党员和群众骨干，保存了革命力量，同时领导隐蔽下来的党组织及党员与敌人展开了机智巧妙、富有成效的斗争，揭露和挫败了敌人的一次次阴谋，有效地保存了自己，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和贵州的解放进行了积极的准备。

广　西

一、为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而斗争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广西的形成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制造卢沟桥事变，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从此开始。7月底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接着调动数十万大军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8月13日，又向上海大举进犯，并声称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同仇敌忾，誓死捍卫民族的独立，争取民族的解放。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亡！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家卫国之目的"。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做好开赴前线的准备。同日，叶剑英在西安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宣言》强调"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所

作的四项保证。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又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会谈，这是国共两党1936年春以来就抗战问题多次秘密会谈的继续。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中国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的推动下，蒋介石于当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中国政府抗战的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张云逸来桂进行合作抗日谈判

国民党桂系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程中的重要争取对象。桂系和蒋系，在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根本利益方面是一致的，但他们为了争权夺利，又长期存在着矛盾。桂系从其阶级利益出发，对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是一贯反对的，特别是对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一向采取镇压的方针。但是，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张抗日，在全国人民中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桂系力量不足，它要与蒋系抗衡，要抗日，不得不联合共产党。根据桂系的本质和当时的表现，中共中央对它的基本策略是：既鼓励、支持它有利于抗战的一面，又反对、阻止它不利于抗战的一面，以牵制蒋介石的反共和对日妥协活动，推动全国团结抗战，发展抗日救亡运动。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对桂系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张云逸以中国红军代表的身份到香港指导华南地区的统战工作。张云逸到香港后，确定先以桂林为中心开展工作。在他赴桂之前，中共中央已派党员杨德华（杨必升）到桂林，向桂系当局说明中共中央将派张云逸作为全权代表到广西进行合作抗日谈判。桂系当局对此很重视，李宗仁立即召集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李任仁、王公度、甘乃光等军政首脑和高级幕僚，举行会议，商讨对策。[①]

6月6日，张云逸偕同秘书李实（罗理实）到桂林，与李宗仁、白崇禧会见；

①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

12日，与李、白以及桂系有关军政要员举行正式会谈。桂系对蒋介石不信任，对中共提出的联蒋抗日的方针缺乏信心。针对桂系当局的这些疑虑，张云逸分析了全国的形势，说明了西安事变以后联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紧迫性和可能性，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积极联合各方面力量，联蒋共同抗日的立场和态度。李、白当即表示，赞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愿意团结抗日，一致对外。

几天后，双方进行第二次会谈，在原则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经商定，由张云逸与桂系的几个高级官员，共同拟订一个关于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族团结抗战的具体方案。此时，经李宗仁介绍，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湘派遣的代表张斯可，也在桂林与张云逸见面，并一起参加了会谈。

经过多次会谈，6月下旬，拟订了红(军)、桂、川三方联合抗日纲领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召开国防会议，充分接纳各方抗日领袖的主张；树立抗日旗帜，扩大宣传；开展抗日运动，改善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抗日力量之间彼此互助。

这个纲领草案拟订后，张云逸即电告中共中央。7月14日，毛泽东电复张云逸指出：在国家存亡和国民党、蒋介石转变政策的关头，我党与桂、川各方应诚意拥护蒋氏与南京政府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同时，要求各方做好抗日救亡实际工作，并促请桂方向粤、港、沪联络，推动各方也努力去做。张云逸将毛泽东的复电向李、白作了转达，并与之再次进行商谈，双方意见更趋一致。8月初，张云逸离开广西赴广东工作。

张云逸此行，对促使桂系增强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决心和信心，促使桂系拥蒋抗日，起了积极作用。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抗战决心。21日，李宗仁、白崇禧即通电表示拥护。8月4日，白崇禧应蒋介石电邀，到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不久，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1月12日赴徐州上任。桂军组成第十一、第二十一两个集团军，相继开赴淞沪、徐州一带抗日前线，投入战斗。与此同时，广西空军编入国民政府空军序列，参加战斗。

百色谈判与滇黔桂边区游击队的被骗改编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发生了桂系采取阴谋手段，利用国共合作百色谈判之机，骗走中共桂西区特委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两个团的严重事件。

1937年3月22日，中共南方临时工委直接致函桂西区特委，指示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应加紧动员，向国民党及其军队进行协作谈判”，并对桂西区红军游击队与桂军合作抗日谈判问题提出五点指示。主要内容是：为了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广大群众及地方实力派走上抗日战场，党中央已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成“促蒋抗日”，桂西区红军游击队现时要极力避免与政府冲突，在“促蒋抗日”这个紧急任务和保障安全条件下，与国民党及其军队进行合作抗日谈判；在谈判进行中，丝毫不能减弱我们扩大党与武装部队之组织，同时做好争取桂系民团的工作；要与党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及冒险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4月，黄桂南按南临委的指示，同国民党百色区民区指挥部进行了非正式的联系，提出以承认赤色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并在报上登载国共两党谈判消息两项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国民党百色当局表示接受。

10月初，中共桂西区特委在田东县那浪屯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南临委派往右江地区指导谈判工作的尹林平（林平）、高朗如（高维新），到桂西区特委指导谈判工作的中共广西省军团书记刘敦安，以及桂西区特委及其所属党组织、武装部队的负责人黄桂南、赵世同、徐泽长、黄德胜、黄彪等20多人。会议传达了南方临时工委的指示，研究了桂西区特委与国民党桂西当局举行谈判、实现合作抗日的问题。会议决定，就右江地区赤色游击队和滇桂边革命游击队整编开赴前线的问题，与国民党百色区民团指挥部举行谈判。会议确定黄桂南、高朗如、徐泽长三人为谈判代表。

10月中旬，黄桂南等三人到达百色，与国民党方面的代表百色区民团指挥官黄韬、参谋长罗荪等三人进行正式谈判。国民党方面背信弃义，不承认原来已经同意的两项条件，把谈判说成是“土匪自新”、“招安改编”。黄桂南

向尹林平、刘敦安作了汇报。尹林平指示，要坚持原来已经达成协议的两项条件进行谈判。几天后，黄韬暴卒，谈判中断。

10月下旬，新任百色民团指挥官梁家齐到职，谈判继续进行。梁口头表示同意黄桂南提出的两项条件。黄桂南等人回田东向刘敦安作了汇报。经研究，向梁提出了如下要求：(1)特委领导的所有武装全部改编北上抗日，国民党当局取消对中共人员的通缉令；(2)队伍番号按全国统一编制，军需给养全部由国民党政府供给；(3)除队伍随身携带的武器弹药外，不足部分由国民党政府补充；(4)部队编为一个旅，旅长、团长由原部队人员充任，国民党可适当派副职人员。对此，梁家齐的答复是：(1)同意中共桂西区特委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全部改编，给正式番号，公开登报，保证接受改编部队的安全；(2)部队改编后的名称与全国一样，统称为国民革命军，但是否编成旅，具体番号如何，待请示后答复；(3)军需给养完全由政府供给，先拨给10万元作伙食费；(4)武器弹药不足部分由前方供给；(5)人员配备另行研究。黄桂南即接受1万元经费，拨给韦高振部和黄彪部使用。此时，梁家齐也派人以高官厚禄引诱韦高振和黄彪。

11月，参加田东会议的黄德胜回到云南富州，向中共滇桂边区党委负责人滕静夫等传达桂西区特委扩大会议精神。在关于改编部队的问题上，边区党委内部出现分歧。滕静夫、谭统南、岑日新等认为轻易将游击队交由国民党改编是错误的，应慎重对待。而黄德胜、李修学等人则主张接受改编。韦高振受了梁家齐的利诱，迫不及待地带领随从人员和一路上招募到的新兵，到田州等待改编。

是月上旬，在中共广西省工委两次派黄彰、彭懋桂赴香港向中共南委汇报并请求下，中共南委致信桂西区特委，要求“即刻停止这种谈判”。指出：“这种谈判是不适宜的”，应“把这种谈判移到桂林去”。12月初，广西省工委派林鹤逸赶到右江，指示桂西区特委停止百色谈判，并调黄桂南到延安学习。此时尹林平和刘敦安已不在右江地区，黄桂南便借口谈判已基本达成协议，擅自继续进行谈判改编，致使中共掌握的滇桂边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韦高振部、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二联队黄彪部，共1600多人、600多支枪，被

国民党桂系诱骗过去。

这些部队分别被桂系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第一预备军第八、第九独立团。韦高振、黄彪分任团长，黄德胜、李修学分任团政委。黄桂南被委任为百色区民团指挥部政训组上尉组员，徐泽长被委任为两个独立团那马后方留守处主任（该留守处一直未正式成立），高朗如被送往桂林广西绥署另行任命（高到南宁后逃脱，到香港汇报）。不久，黄德胜发现已上桂系的当，极力劝阻韦高振不要率部参加改编，在田州被韦高振杀害。黄桂南投靠国民党，接受了任命。

翌年春节后，两个独立团奉命开赴安徽，被国民党军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肢解，干部被遣散。仅有朱鹤云、黄国楠等20多人，脱离了国民党军，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转送到延安。另有赵润兰、李修学等在安徽逃离国民党部队后，回到右江地区坚持斗争。

在百色谈判的过程中，滕静夫、黄举平、赵世同等人，坚决反对这一错误的谈判，使广西右江地区和滇黔桂边区得以保存了一部分革命武装和党的骨干。此后，他们继续在当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二）广西党组织在抗战初期的活动

加强党的建设加紧部署抗日救亡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党组织工作的重点，一是调整和发展党组织，二是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部署抗日救亡工作。

郁江地区。1937年7月中旬，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彭懋桂在横县郁江船上主持召开中共郁江区党代表会议，横县、永淳、宾阳、武宣、贵县、来宾、上林、兴业、邕宁、武鸣等县党组织的12名代表出席。会议传达了同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精神，重点讨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等问题。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郁江区特委，陈湖光任书记。

南宁市。9月，中共广西省工委改组中共南宁市委，由区济文任书记。市委改组后，继续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斗争。次年5月，南宁市委被破坏，后成立中共南宁中心县委，书记林鹤逸。中心县委下辖武鸣、宾阳及左右江地区党组织，加强了对南宁及周围地区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

浔江地区。8月，中共广西省工委委员黄彰在北流县梧村主持召开中共浔、梧、玉区党代表会议。桂平、苍梧、玉林、陆川、博白、北流等县党组织20多名代表出席。这也是一次以传达苏区和白区代表会议精神，讨论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题的会议。会议要求：尽快恢复浔、梧、玉区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浔江区特委，黄彰任书记。会后，浔江区特委所属各县通过各种方式传达和贯彻执行会议精神，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中共陆川县委召开党代表会，确定全县党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实现革命的转变，将过去的一些秘密组织，改为公开的群众性抗日救亡组织，广泛团结各界各阶层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冬，日军有从广东南路入侵广西之势。中共广西省工委为了加强玉林五属党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玉林中心县委。次年2月下旬，在玉林召开了有玉林、陆川、北流、博白、兴业五县代表参加的会议。会上陈铁生传达了省工委关于成立玉林中心县委的决定，着重讨论了如何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抗日救亡工作团等问题。会议选举陈铁生任玉林中心县委书记。

桂西地区。1937年8月，中共广西省工委派林鹤逸为巡视员到东兰指导工作。中共东兰中心县委在西山召开所属各县90多人参加的党员和群众骨干会议。会上，林鹤逸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提出了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具体要求。会议决定，在所属各县广泛建立抗日救国组织，利用社会关系，开展合法工作，派党员干部打入

乡村政权各部门，开展统战工作，推动国民党地方政府抗战。会后，中心县委印发宣传材料，在右江上游各县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0月，东兰中心县委在西山水洞举办党员骨干训练班，学习中央关于实行国共合作抗日的方针、任务和策略。

1938年1月，中共广西省工委又派黄孔修（孔克）到东兰，在西山召开东兰中心县委所属各县党员骨干会议，到会100多人。会上，黄孔修作了关于抗战形势和国共合作问题的报告，强调指出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要整顿发展党组织，纯洁党的队伍，党组织要向平原发展，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会后，各县党组织动员全体党员和先进分子，深入发动群众，团结各界各阶层人士，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3月，东兰中心县委在武篆召开了第三次执委会议。此时，东兰中心县委已建立了东兰5个区委，万冈8个支部，河池、南丹、凤山各一个支部，共有298名党员，党的力量有了较大发展。会议经过深入讨论，明确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向国民党投降”等问题。会后，进一步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工作。

桂东地区。1938年7月，中共浔江区特委特派员黄传林到桂东地区开展发展党员的工作。1939年1月，建立贺县中心县委，下辖贺县、钟山、昭平、怀集等县和当地矿区的党组织，书记罗奋平。中心县委成立后，继续进行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并在一些地区成立各界抗日救国后援会，发动群众筹粮、筹款、募捐物资，支援前线。还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1月，中共苍梧县委改为苍梧中心县委，书记陈鋆才。下辖苍梧、桂平、藤县、怀集等县党组织。

钦廉地区。1938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派张进煊、李英敏、赵世亮到合浦开展工作，建立党组织。他们在廉州镇、北海、西场、公馆等地发展了一批党员。4月建立了合浦县特支，书记张进煊。11月，广东省委又派周楠来合浦，在北海召开合浦特支扩大会议，传达省委关于迅速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指示，并将合浦县特支改组为县工委，书记仍由张进煊担任。同月，成立合浦县青年抗日先锋总队。总队部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人，李英敏任政治

部主任。1939年2月，成立合浦中心县委，书记李士洋，下辖合浦、钦县、灵山、防城四县党组织。

广西各地的党组织顺应新的形势，进行调整、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团结各界各阶层人士，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促使各地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全民抗战的情绪空前高涨。

党在第二届广西学生军的活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桂系在派遣部队开赴前线的同时，组建广西学生军（史称第二届学生军），到前线去配合正规军开展战地宣传和服务工作。

桂系当局组建学生军的告示一公布，广大青年学生即纷纷响应，几天之内，报名者达5000多人。经过考核，录取了280人，男女生约各占一半。参加这支学生军的共产党员，有朱澄霞、郑忠（郑少东）、易凤英、莫如珍等十多人。

1937年10月，学生军集中在桂林市郊李家村进行编队训练。全部人员编为一个大队，下设一个男生中队，一个女生中队，广西大学来的学生单独设一个分队。学生军中的中共党员秘密串联，成立了党小组。

12月4日，学生军拔营北上，28日到达武汉。这支全副武装的学生军，特别引人注目，成为中外记者采访的重要对象。学生军的女兵被称为“巾帼英雄”、“现代花木兰”、“娘子军”。在武汉期间，学生军先后请了周恩来、叶剑英、王明、博古、邓颖超、张爱萍、聂鹤亭等人来演讲、作报告，使大家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认清了抗战的形势和任务，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

为了接上党的组织关系，莫如珍、易凤英、郑忠等先后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联系。周恩来、邓颖超接见了他们。在听了他们的汇报之后，周恩来指示他们先组织起来，商量研究工作，开展活动。学生军的党员即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由莫如珍、郑忠、易凤英三人组成党的中心小组，其余党员和党的发展对象，自然形成小组。

1938年2月5日，学生军从武汉出发北上，3月3日到达安徽六安，归第十一集团军总部管辖。这期间，学生军中的中共党员发动群众，机智地对付了

集团军总部政训处主任韦贽唐要大家检举所谓学生军中共产党的阴谋活动，提出了“要求上前线抗日救国，不在六安打雪仗”的要求。得到批准后，学生军开拔到田家庵（今淮南市），脱离了险境。29日，学生军到达田家庵前线阵地。他们在与日军隔河相望的地带，深入战壕，慰问守军将士，昼夜开展宣传工作。

4月17日，学生军从田家庵转移到合肥。这时，李宗仁决定，将学生军分为两个男女混合中队。第一中队归属第十一集团军，第二中队归属第二十一集团军，保留学生军大队部，隶属第十一集团军总部。学生军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共产党员都留在第二十一集团军，并团结争取更多的进步同学留在这一边。签名结果，到第二中队的，共有82人，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由钟少熙任中队长，中共党员朱澄霞、麦世法任指导员。

5月，中共安徽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派谭光廷找到莫如珍，接上了组织关系，批准成立学生军支部，莫如珍任书记，由安徽省工委直接领导。学生军党支部建立以后，先后发展了甘怀勋、赖月婵（王彦）、蒋奎等20多人入党。

7月，抗战一周年时，学生军派一个代表团，回广西宣传前方抗战情况，推动后方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代表团成员共8人，其中中共党员5人，进步群众3人。代表团回到广西后，在各地党组织协助下，到全省各地进行巡回宣传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10月，代表团返回前线时，区济文等3名共产党员随团到了安徽，参加了学生军。

年底，广西学生军第二中队奉命分别从湖北省英山县和罗田县集中到立煌县（战时安徽省会，今金寨县）。此时，根据中共鄂豫皖区党委常委张劲夫的指示，学生军派一部分党员进入国民党的地、县、区政府机关工作，其余大部分党员进入省、县民众战时动员委员会等群众团体和单位工作。这些党员在动员群众，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掩护边区党委和大别山党的地下活动等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

1939年冬，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2月，根据鄂豫皖边区党委的指示，学生军党支部带领全体党员和进步分子撤退到新四军根据地。

桂系顽固派、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兵追捕，下令通缉。撤退到新四军根据地后，广西学生军的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40人，于1940年3月16日，联名发出《为制止反共摩擦，广西学生军致李宗仁、白崇禧电》。该电文通过延安新华社电台向全国广播，揭露了李品仙倒行逆施的罪行，给桂系顽固派以有力的回击。至此，党在第二届广西学生军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组织和发动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奔赴延安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他们仰慕革命圣地延安，纷纷要求到延安学习、工作。中共广西省工委认为，送一些人到延安学习，对培养干部和将来广西党的工作的开展，很有好处。因此，先后选调和帮助1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去延安。在钦廉四属，1938年2月和1939年夏初，也有两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共20多人奔赴延安。这一批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多数是几个人结伴同行，分别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地点出发，通过重重关卡，历尽艰辛，先到达西安，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再由办事处安排，分批到达延安。

他们到延安后，分别进入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学习。他们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学习有关专业知识。学习结业后，有的留在陕北根据地工作，有的分赴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或深入敌后工作，在实际工作和战争烈火的锻炼、考验中迅速成长，大部分人都入了党，成为各方面工作的骨干，在工作中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其中，罗奋平、唐亲政、李祖陵、钟国宁、陈厚三（改名巴斯克）、庞炎（改名庞佳）、宁振邦等先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全国解放前后，李殷丹、黄传林、廖联原等一批当年奔赴延安的党员先后回到广西工作。

(三)桂系制造的反共事件与广西党组织的整顿

广西各地相继发生的反共事件

抗战初期,桂系顽固派依然对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采取残酷镇压的政策,在广西各地制造了多次反共事件。

陶保桓、崔真吾被害事件。1937年8月,桂系的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司令部下令,在桂林、南宁、柳州等地,以托派的罪名,逮捕了广西军校政训处处长王公度等四名桂系党政官员,同时趁机逮捕了中共柳州支部书记陶保桓,中共党员蒋汝志、崔真吾以及一些进步人士。9月14日,桂系将王公度等四人枪决。17日,将陶保桓、崔真吾杀害。桂系诛杀王公度等四人,是由于其内部矛盾引起的。王公度原受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重用,掌管桂系的特务、政训和党务,桂系的一些高级将领对他极为忌恨,非把他除掉不可。桂系借王公度案杀害共产党员陶保桓、崔真吾,则是为了打击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和进步势力。

中共郁江特委被破坏事件。国民党南宁民团指挥部派遣的特务分子刘锋民混进共产党内后,担任了中共宾阳县委书记的职务。他在参加郁江地区党代会时,窃取了机密。1937年9月7日,桂系顽固派下令逮捕了中共郁江区特委书记陈湖光、委员李蔚梁。接着,逮捕了中共宾阳县委全部七名委员和邕宁、永淳、武宣三个县委领导成员各一人。这次事件,使中共郁江区特委受到严重破坏。事件发生后,中共广西省工委立即采取应变措施,切断了与郁江特委的联系,对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整顿。

同月,由于叛徒出卖,桂系当局逮捕了中共桂林县委书记徐敬伍,中共桂林县委及其所属党组织也因此受到了破坏。

那马惨案。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那马中心县委在都安县镇西乡一带深

入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组织了革命武装，领导群众进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37年上半年，国民党都安县政府曾多次派兵前往“清乡”。同年8月，县长陈泰春又带领县警、民团官兵20多人到该乡驻扎，强迫各村群众把私人枪支拿出来烙印，并向每村勒索“罚金”白银一担（1000块光洋），还袭击拿枪来烙印的群众，打死了几个瑶民。镇西乡党支部领导群众进行武装反抗，在两次战斗中，共打死县警、民团70多人，俘虏20多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事后，南宁区民团指挥官率兵2000余人，到该乡进行“围剿”。乡党支部领导群众奋起反抗，双方相持数月之久。乡党支部派人去向那马中心县委汇报情况，请求支援。南宁区民团指挥官看到用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害怕事态继续扩大，只好派人请求国民革命军第八、第九独立团那马后方留守处出面调解。留守处主任、中共那马中心县委书记徐泽长亲自到都安调解处理，与国民党方面谈判达成协议，双方停火，事态平息。后来，群众提出控告，广西省政府被迫判处陈泰春15年有期徒刑。中共那马中心县委因参与处理镇西乡事件而暴露。

1938年6月中旬，南宁区民团指挥部派人与中共那马中心县委负责人会见，制造合作假象。接着，南宁区民团副指挥官黄建元亲自到那马，以商谈处理镇西事件善后工作及合作抗日诸问题为名，电邀“留守处”主任徐泽长、副主任李凤彰、韦成篇（均为中共那马中心县委成员）到那马县城周鹿镇。徐、李到达那马县政府即遭拘捕。韦成篇因病未去，黄建元再次派人催促。韦带病和一名随从人员前去，又遭拘捕。8月3日，徐泽长等四人于武鸣县城东门外惨遭杀害。这是当时震动全省的那马惨案。

国民党桂系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给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活动造成了很大困难。

南委对广西党组织的审查和整顿

由于广西党组织屡受镇压和破坏，上级党组织认为广西党混进了托派，组织不纯，政治路线有问题，群众工作有错误。中共中央长江局遂于1937年12月27日作出决定：“考察广西党的领导机关”，“在思想上组织上严格肃清

托匪的活动”，并指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①]具体贯彻执行。

1938年3月中旬，中共南委派黄松坚到广西负责审查整顿广西党组织。黄松坚到南宁后，宣布南委的决定，对广西党进行逐级审查、重建，对全省党员进行逐个审查，重新登记。首先是审查省工委委员。省工委九个委员中，彭懋桂（省工委书记）和黄彰，不久前已经在广州经过南委的审查，证明没有问题。省工委代理书记陈岸[②]经过审查，获得通过。黄随即报请南方工委批准成立新的省工委，由黄松坚任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陈岸任委员兼宣传部部长，黄彰任委员。彭懋桂因前段工作出了一些问题，自己提出不参加省工委，省工委决定他任南宁市委书记。原省工委的其余六名委员，黄桂南、陈湖光因犯了严重错误，已被开除党籍，不再审查；林鹤逸经过反复审查，保留党籍；省工委委员刘敦安、麦世法被怀疑是托派，不予登记；委员滕雪心，因其恋爱对象被怀疑是托派，被开除了党籍。[③]

审查广西省工委委员工作结束后，接着审查全省各地的党组织和党员。4月中旬，省工委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发出《组织通告》，说明过去广西党组织“非常松懈”，必须“严格整理和改造”，“才能巩固党的组织”。为此，省属各级党的干部，均要“重新调查”，“从中教育”，“分别整理”。《通告》还附有对党员历史、思想、工作等方面情况进行调查的要点，要求各级党组织切实做好调查工作。

省工委委员分赴各地进行审查工作。黄松坚到右江地区，陈岸和黄彰先到玉林，而后陈岸去桂林，黄彰去梧州。南宁市委书记彭懋桂、南委巡视员莫西凡留在南宁。审查工作十分严格。对当地党组织，从上而下逐级审查后，

① 1937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撤销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文彬。

② 1937年11月，彭懋桂赴香港向南委汇报工作时，指定陈岸任省工委代书记。

③ 后来，刘、麦二人去安徽工作，路经武汉时向中共中央长江局申诉，恢复党籍，并由长江局介绍到安徽，与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取得了联系。他们在桂系的第二十一集团军任职，刘敦安还负责中共在该集团军中的工作。他们在统战工作和为新四军收集情报等工作方面作出了重要成绩，得到鄂豫皖边委和新四军领导人的表扬。1943年，刘、麦两人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一批共产党员被桂系顽固派逮捕活埋，壮烈牺牲。解放后已追认为烈士。滕雪心被开除党籍后仍积极为党工作。1983年，经中共南宁市委复查，弄清了当时与她谈恋爱的那个对象并不是托派，而是普通群众。她得到平反后于同年重新入党。

即着手进行整顿。对党员，进行逐个审查，没有问题的，予以重新登记，随即恢复组织活动。被认为有问题的，不予登记或宣布开除党籍。

政治路线方面，经过严格审查，也分清了是非。认为广西党组织对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态度是积极的，工作也是比较广泛、深入、扎实的，在政治路线上是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

在审查、整顿广西党的过程中，5月中旬，黄松坚、莫西凡、彭懋桂等六人在南宁被桂系当局逮捕，省工委和南宁市委均遭到严重破坏。事件发生后，陈岸等即先后赶到广州向广东省委报告（是年4月，中共中央撤销南方工委，成立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广西省工委由广东省委领导），请求进行营救。此时，广东省委指定陈岸代理广西省工委书记。后经周恩来向桂系当局交涉，黄松坚等于年底获释。黄出狱后，调往广东工作。

陈岸从广州回到广西后，检查了黄松坚等被捕事件的教训，做好善后工作，继续进行对党组织的审查、整顿。10月中旬，审查、整顿党的工作宣告结束。

这次审查的结果表明，广西党组织基本上是好的。通过审查整顿，党员的思想认识有所提高，党组织得到健全。但是，也错整了一些人，伤害了一些同志，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①]

① 解放后历次审查证明，广西党组织并没有混入一个托派分子。许多党员是在与托派的斗争中，经过锻炼和考验，成长起来的。1982年，经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上报中共中央批准，对广西党组织的所谓“托派”案作了彻底平反。

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建立和广西救亡运动的发展

（一）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建立及其活动

桂林八办的建立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中国抗日战争逐渐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此后，日本的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性进攻，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

周恩来、董必武等在撤离武汉之前，分析了抗战形势、蒋汪矛盾、蒋桂矛盾以及重庆、桂林的政治环境，做了撤退到重庆、桂林的准备。他们还对分配到桂林工作的同志作了指示：到广西后的工作原则，是要在广西搞好统战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要把大批进步人士吸收到广西去。同时，指示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同志，要向桂系的上层人物做好宣传，促使桂系坚持抗战，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投降倾向。

11月13日，周恩来撤离长沙，在前往衡阳途中，一度与白崇禧同车。周对白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鼓励白放开胸怀，坚持抗战，争取当民族英雄，并向白提出，为适应武汉失守后形势发展的需要，打算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说明旨在支持广西抗日。白赞扬中共的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对周的提议表示支持和协助。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简称桂林八办）于1938年11月中旬成立，处长李克

农。在此之前，中共在桂林的联络办事机构称新四军桂林通信处，处长吴奚如。桂林八办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构，李克农全面负责党内外各项工作，党的组织工作由曹瑛（当时化名石磊）负责。办事处设在桂林市桂北路（今中山北路）138号“万祥醋坊”的一幢两层楼房里，并在城北的路莫村和全家村租用了几间民房，作为机要电台、仓库和过往人员的驻地。

桂林八办的活动

桂林八办成立以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联络、掩护华南各地党组织。桂林八办在党内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肩负着领导广西地下党，联络湘、赣、粤、港和南洋等地党组织的任务。它通过地下交通和电台通讯等途径，向这些地区的党组织传达党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向党中央和南方局汇报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情况，请示解决各种问题。

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西的发展。首先，团结桂系的上层人物。李克农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经常与桂系的上层人物接触，和他们交朋友，谈党的统战方针政策。桂林八办建立不久，李克农就会见黄旭初，坦率地表明了中共在广西的活动，旨在支持广西团结抗战，不干涉广西的内部事务，不挖广西的墙脚。同时，通过在国民党的党政军部门中任职的中共秘密党员和与中共有关系的人士，如谢和赓（白崇禧机要秘书）、侯甸（广西绥靖公署科长）、周可传（三青团广西支团部组长）、左洪涛（张发奎秘书，以上4人均为中共党员）、刘仲容（桂林行营参议）等，在桂系上层了解情况，进行统战工作。

其次，团结国民党民主派人士。桂林八办十分注重团结李济深、陈劭先、李任仁、陈此生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同他们友好交往，保持密切联系，并通过他们做桂系上层人物的工作。在桂林八办的推动下，这些爱国民主人士紧密合作，在掩护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安全，解决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困难问题，以及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再次，团结各界进步人士。桂林八办除了与一些有影响的进步人士直接联系以外，还通过在桂的中共党员夏衍等文化名人做工作，使云集桂林的各界进步人士，分别参加救国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广西建设研究会等进步社团，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桂系原来有一个反蒋的秘密组织，称广西革命同志会。全面抗战爆发后，桂系解散了这个组织，另外成立了一个广西建设研究会，由李宗仁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桂系党政军的头面人物几乎都参加了这个会。李济深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时，也被推举为名誉会长。但是，实际主持会务工作的，是桂系的民主派人士李任仁、陈劭先。桂林八办利用该会进行统战活动，先后引荐了夏衍、胡愈之、范长江等一批中共党员和柳亚子、千家驹、李四光、金仲华等一批进步名流、专家参加该会活动，并担任各部要职，主持该会的日常工作。他们通过该会，坚持同反共顽固分子作斗争，广泛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文化运动，争取民主进步，孤立顽固势力，发展进步势力，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另外，对宗教界的统战工作，也很有成效。在桂林，宗教界有一定力量和影响。通过桂林八办的工作，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组织的抗日救亡团体，不分信仰，都动员了起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控诉日军暴行，出钱出力，坚持抗战。广西伊斯兰教救国会曾组织回民声讨汪精卫的叛国罪行，出版抗战刊物，并在训练青年，成立收容所、救济队，救济难民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领导桂林抗日文化运动。桂林八办通过各种途径，团结云集桂林的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推动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一是通过合法渠道，利用合法身份、场合和合法团体、机构，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和主张，从政治思想路线上实施领导。二是通过基层党组织，实施组织领导。当时桂林的党组织，有外省党组织系统和广西地方党组织系统。两个系统的组织均属“八办”党组织领导。直属“八办”领导的基层党组织，有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系统的十多个总支和支部。其中有《新华日报》桂林分馆、《救亡日报》社、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生活教育社、国际新闻社、抗敌演剧第九队（1941年改为第五

队)、抗宣一队(1941年改为第四队)、新安旅行团、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等单位的总支或支部。广西省工委领导的桂林地方基层党组织,有20多个支部。这些基层党组织,按照桂林八办和广西地下党的指示,积极推动抗日文化运动的开展。三是向社会文艺团体和学术单位,秘密派进共产党员,在不同程度上掌握该团体单位的领导权,使之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工作。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有共产党员夏衍、司马文森、周钢鸣担任理事,中共党员作家和进步作家在会员中占很大比例。桂林文化供应社是中共党员胡愈之以救国会代表的名义,同广西建设研究会合作办起来的,中共党员、进步人士成为该社骨干。

筹运军需物资,输送过往人员。武汉、广州沦陷后,桂林成了抗日大后方在西南对外联系的枢纽。当时,从香港、南洋等地筹集到的华侨捐献的各种军用物资,向国民党军需部门领取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军需品,以及有关过往人员及其家属,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大都经过桂林八办转送到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驻地。如1939年5月,桂林八办派人到新加坡接受华侨捐赠的汽车、电信和医药器材,经香港、越南河内、镇南关(今友谊关)到桂林,再转辗运到陕北,历时3个多月。随车回国参加抗战的,还有20多名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地的华侨。

周恩来、叶剑英在桂林的活动

1938年9月底至11月上旬,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党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方针和任务,重申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坚持抗战。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后,周恩来先后三次到桂林检查指导工作。1938年12月初,他从长沙来到桂林,8日即应邀出席在桂林大华饭店举行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筹备会成立大会,在会上作了关于抗战形势的演讲。周恩来还与郭沫若一起会见了白崇禧,提出《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的问题,白表示欢迎。1939年2月中旬,周恩来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前往皖

南新四军视察工作时，途经桂林。16日，应邀出席白崇禧在桂林行营大礼堂举行的庆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成立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作了关于广州、武汉沦陷后的抗战形势的演讲，宣传毛泽东关于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会后，白崇禧命令广西当局选拔干部到南岳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并要求广西的干部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4月底，周恩来从皖南回来，第三次到桂林。他会见了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对他们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阐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他在接见记者和文化界人士时，畅谈抗战形势，谈到同投降派作斗争问题，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的阴谋活动，并号召大家做好工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此期间，叶剑英也多次来到桂林，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统战活动，并以八路军参谋长的身份，多次应邀作公开演讲。1938年12月初，叶剑英在广西大学向师生讲抗战形势。1939年1月下旬，又给广西学生军团第二团官兵讲《现阶段的游击战和正规战》。4月上旬，出席生活教育社主持举办的演讲会，讲《积小胜为大胜》。5月21日，应黄旭初的邀请，到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给全体师生员工讲《当前战局之特点》。28日，向各界人士再次讲《积小胜为大胜》。叶剑英的演讲，以丰富的材料和生动的事实，讲述了抗战的形势和任务，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和经验，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号召广大青年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周恩来、叶剑英在桂林的活动，对促进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西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时人评论说，叶将军的演讲，“稳定了军心、民心，抵得上千军万马”。

桂林八办领导下的广西党组织

1938年11月下旬，中共广西省工委代理书记陈岸从南宁到桂林，与桂林八办接上组织关系，接着，省工委机关迁到桂林。此后，广西省工委受桂林八办直接领导，由曹瑛负责联系。

12月，南方局在湖南衡阳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经李克农介绍，陈岸率领覃桂荣等6名广西党员干部前往参加学习。学习回来以后，省工委于1939

年2月中旬，由陈岸、黄彰主持，在灵川县雍田村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传达、学习衡阳训练班的精神。参加训练班学习的有全省各地的党员干部十多人。黄彰、黄书光、覃桂荣根据衡阳训练班学习的内容，分别就党的建设、统一战线、青年运动等问题进行讲课。学习期间，曹瑛曾到训练班指导。此后，全省各地的党组织相继举办训练班，传达贯彻灵川训练班的精神和省工委的有关指示，使党员干部和党员更清楚地认识抗战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积极动员各方面力量投入新的战斗。

周恩来对广西党的工作十分关心。1939年2月，他在桂林八办同李克农、曹瑛谈形势，谈党的工作问题，对广西党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指出：要坚决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广西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应放在下层，不忙发展党员，工作重点是认真整顿好组织，建立短小精干的领导机关；要注意宣传好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要利用一切机会，采取一切办法，动员群众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在讲团结抗战时，不要忘记国民党顽固派在搞分裂投降活动；要加强理论、政策学习，时刻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检查党的工作。

4月，桂林八办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中共广西省工委作了调整，宣布陈岸任广西省工委书记，黄彰、黄书光任委员。7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的精神，桂林八办宣布撤销省工委，成立桂林、梧州、南宁三个特支，分别由陈岸、黄彰、黄书光任书记。三个特支均由桂林八办直接领导。桂林特支辖桂林、柳州、庆远、平乐（一部分）三个半行政区的党组织；梧州特支辖梧州、浔州、平乐（一部分）两个半行政区的党组织；南宁特支辖南宁、武鸣（一部分）、龙州、玉林三个半行政区的党组织。

12月，陈岸作为广西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离开广西，前往延安，由张丽贞代理桂林特支书记。

三个特支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力宣传1939年7月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旦日军入侵广西，即组织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时适当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

广西党组织的各项工作，都以秘密的方式，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渠道去进行。如派遣党员利用社会关系，进入广西各地基层政权机关及其所属单位内部，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掩护党的秘密活动；派遣党员参加桂系办的青年、学生、工人、妇女以及学术团体进行活动，发动、组织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团结进步分子，扩大进步势力，从中培养、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派遣党员加入桂系地方当局组建的抗日武装队伍，对其军政人员进行统战活动，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并在工作中起领导和骨干作用，带领这些队伍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培养锻炼军事人才，待条件成熟后，转变为人民的武装。

（二）桂林抗日文化运动

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

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原在华中、华南从事文化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从四面八方云集桂林。据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桂林从事过抗日文化活动的文化人士有1000多人。其中，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教授、学者等200多人。如此众多的文化人士集中到桂林，主要是由于我国半壁河山沦丧，沦陷区的大批文化人士需要往大后方疏散；桂林是西南重镇，也是交通枢纽，进退比较方便；蒋桂有矛盾，日军又步步进逼，桂系既怕蒋系势力渗入广西，又怕日军入侵广西，为了保住广西，它要借共产党的威望招纳人才，扩大它的势力，争取群众对它的信任和支持，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容许抗日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日文化工作战略部署的需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指引和感召。

桂林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原来的文化基础较好。全国抗战爆发前后，

中共桂林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在抗日文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全国各地从事文化工作的共产党员、进步文化人士来到桂林后，同广西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会合，形成了一支抗日文化工作的骨干力量。这支骨干力量，在桂林八办和中共广西省工委的领导下，掀起了气势磅礴的抗日文化运动，形成了驰名中外的桂林抗战文化城。

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兴起

新闻方面。1938年11月以前，桂林出版的报纸只有广西当局办的《广西日报》一家。从1939年至1944年，先后在桂林出版和发行的报纸有数十家，另有新闻机构十来个。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中共领导的《新华日报》社桂林分馆（负责人先后是张尔华、陈晃），《救亡日报》社（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国际新闻社（社长先后是范长江、陈国生、孟秋江，总编辑黄药眠），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1939年春总会迁重庆，桂林设南方办事处）。国际新闻社总社于1938年11月21日在桂林成立，在香港、重庆设分社，金华设办事处。国新社向国内外150多家报刊发稿，打破了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对新闻的垄断，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出版方面。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桂林前后办起来的书店、出版社，共有200余家，出版杂志近200种，各类图书1000多种。当时桂西路（今解放西路）被称为“书店街”。中共直接领导的书店、出版社有：《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南方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以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为骨干的有：三户图书社、科学书店、开明书店、白虹书店、文献出版社、《广西妇女》社等。桂林出版发行的各类图书杂志不少畅销到港澳以至东南亚各国。

文学方面。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等文化名流和作家，根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贯彻总会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组织作家开展社会活动，举办各种座谈会和文艺讲习班，讨论抗战小说写作和文艺创作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等问题，推动作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各种文学作品如潮涌现。《抗

战文艺》、《野草》、《中国诗坛》、《十月文萃》等文艺刊物发表了大量弘扬民族精神、宣传全面抗战的文艺作品。

戏剧方面。在桂林活动过的戏剧团队有70多个，其中话剧团队40多个。如广西艺术馆话剧实验团、国防艺术社、抗敌宣传队、新安旅行团、广州和厦门儿童剧团等。在桂林工作的知名戏剧家，有欧阳予倩、田汉、洪深、瞿白音、杜宣、洪道、熊佛西、焦菊隐等。演出和观看抗战戏剧，在桂林形成了群众性的活动。不少机关、学校和民间团体都组织了业余戏剧团队，踊跃投入抗日救亡宣传运动。他们除了在城里剧院演出外，还深入农村、军营、防空岩洞，以至奔上前线，开赴海外演出。李克农也写了活报剧，并带领桂林八办的同志到街头演出。中共党员领导的新安旅行团是一个宣传抗战的青少年团体。该团在桂林三年，团员发展到近百人。他们深入农村、工厂、学校，演抗战戏，唱抗战歌。1940年10月，他们演出了揭露顽固派和投降派面目的大型歌舞剧《虎爷》，在桂林引起了轰动。戏剧家欧阳予倩对桂剧的改革也取得显著成就。

音乐方面。到桂林的著名音乐家有张曙、林路等人。出版的音乐刊物，有《每月新歌曲》、《新音乐》等几种。桂林群众性的音乐运动开展得十分火热，许多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都组织有歌咏队、合唱团，经常举行音乐会和歌咏比赛，进行街头歌咏宣传。一些进步音乐工作者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带动了群众歌咏活动蓬勃发展。在重大节日，常常举行大型歌咏会，曾举办过场面宏伟的“万人大合唱”。日本飞机轰炸桂林时，举行“反轰炸歌咏大会”，气氛慷慨激昂。《音乐阵线》发表评论说：“抗战开展了新音乐运动，新音乐运动推动了抗战。”

舞蹈方面。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活动，在桂林很盛行。抗宣演剧七队演出的民间歌舞剧《新年大合唱》、《生产三部曲》、《生产大合唱》和音乐舞蹈造型《黄河》，轰动一时。民族新歌剧《军民进行曲》、《农村曲》等，在桂林演出以后，还到广西西江流域各县和粤北巡回演出，后来又到南洋各地巡回演出。

美术方面。徐悲鸿、关山月、特伟、廖冰兄、丰子恺、余所亚、赖少其、陈烟桥等一批著名画家、漫画家、木刻家，团结桂林的美术工作者，成立了中华全

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桂林办事处，举办了艺术师资训练班、战时漫画训练班、木刻函授班等，创办了《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漫画专刊》等多种美术刊物。徐悲鸿、关山月等在桂林举办了画展。有的美术团体还到外地开展活动，以美术作品鲜明形象地歌颂军民合作抗战，控诉日军暴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活动。这些美术作品在激发和鼓舞群众抗日热情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教育方面。桂林的广西大学、逸仙中学、桂林中学、桂林师范学校等都有中共组织。这些学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教学中给学生介绍进步书刊，灌输进步思想，讲授革命道理，领导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不少学校建立了剧团、歌咏队、漫画组，出版小报、壁报，成立抗日救亡俱乐部，举办时事座谈会、文艺研究会。各校师生还跨出校门，走上社会，投入到抗日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去，与文化界各团体并肩战斗。

科技方面。在桂林的科研机构和团体主要有：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所属的一些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工业合作研究所等。著名科学家和学者李达、李四光、丁西林、金仲华、陈翰笙、千家驹等，在桂林开展了科技理论研究活动。如中国工业合作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工业》，刊登了有关工业经济、企业、合作事业、救济问题和民营工业界呼声等方面的文章和资料。这些科研单位和科学家们，在战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科研工作，出了许多重大成果，为桂林文化城增添了一份光彩。

（三）党在各社会团体和学校中的抗日救亡活动

党在第三届广西学生军中的活动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广西形势危急。鉴于广西组织第一、第二届学生军在抗日救亡中的积极作用，广西当局于1938年11月组建了第三届广西学

生军。各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抗日热情高涨，纷纷报名请缨。原定招收1200人，可是报名的有1.9万多人。许多青年学生不顾父母阻拦，放弃学业，投笔从戎，有的兄弟姐妹一同报名参加。经过考核筛选，录取了4200多人。月底，编为三个团。第一团以桂林、平乐、柳州、庆远地区的学生为主编成，第二团以梧州、桂平、玉林地区的学生为主编成，第三团以南宁、宾阳、左右江地区的学生为主编成。由桂系的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兼任学生军司令。

学生军开始组建时，中共广西省工委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分析广西面临日军入侵的危急形势，决定动员和派遣党员并带动广大青年学生参加这支队伍。设想是：在日军入侵之前，利用这支队伍，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扩大党的影响；日军入侵之后，把党所能掌握的学生军挺进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青年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积极响应省工委的号召，报名参加了这支学生军，人数约100名。他们分布在各个团。学生军的29个男生中队中，有23个中队有中共党员，3个女生中队都有中共党员。他们大部分当了班长，有一部分还担任了大队和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基本上掌握了学生军基层活动的主导权。

学生军一组成，三个团即分别成立中共支部，由省工委代书记陈岸和省工委委员黄彰直接联系。陈岸在桂林月牙山召集一部分党员骨干开会，分析形势，交代任务，强调要在斗争中争取党的领导权，发展进步力量。对反特、反奸、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学会做秘密工作等问题，也作了指示。1939年初，省工委根据上级关于不在桂系军队中建立党组织的规定，撤销学生军中的党支部，改为党员个别联系。

1939年1月，学生军集中在桂林进行训练。各个团党组织推动各大队、中队建立学习制度，开展学习活动，并邀请叶剑英、郭沫若、夏衍、范长江等到团里来作报告。通过这些活动，激发了学生军战士的爱国热情与追求进步的欲望，坚定了他们抗日救亡的决心，许多人也由此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初步认识。中共党员还积极带动学生军战士走出军营，到桂林市内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提高了党员在学生军中的威信。

学生军组建时，一些持有托派观点的人也被吸收了进来。在桂林集训时，他们就散布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叛了无产阶级，是向国民党投降等托派观点，企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学生军分赴各地的行军途中，还有人散播谣言，说抗战没有希望，行军很艰苦，煽动学生军战士逃跑。三个团的中共党员分别对这些情况作了调查研究，在取得团长的支持之后，发动学生军战士，召开大会小会，批判了托派观点，鼓舞了士气，团结了群众。

桂系为了把学生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处心积虑地在组织上、思想行动上"管理"学生军。中共组织密切注视这一动向，针对性的进行反控制斗争。1939年2月至4月，学生军在桂林集中整训期间，桂系要在学生军内建立三青团，三个团的中共组织都对此进行了抵制，使它建立不起来，建立起来的，也没有进行组织活动，形同虚设。

4月，学生军集训结束后分赴各地。第一团到桂东、桂中，第二团到桂东南，第三团到桂西南。他们分别在30多个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各团的中共党员认真贯彻省工委的指示，带领学生军战士，切实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每到一地，就走家串户，访问群众，参加各种农事活动，同群众打成一片。然后，通过举办报告会、座谈会，出版墙报，张贴标语，演出戏剧，教唱歌曲，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痛诉沦陷区人民所受的深重灾难，讲述广西面临日军入侵的危急情况，激发人民群众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热情。

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学生军在各地城镇、乡村普遍举办了各种识字班、读书会，开展演剧、歌咏等活动，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提高群众政治思想文化水平，引导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和时局发展。他们还参与地方的民事工作，为民众排忧解难，处理纠纷；协助当地政府处理政务，解决疑难问题；引导和帮助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进行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把青年、妇女，以至老人、儿童，都组织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来。他们所到之处，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兴起，受到了各阶层人士的信任和爱戴。群众誉称学生军是"兵王"。

学生军的良好表现深得民心，却引起了官僚豪绅的恐惧和忌恨。他们纷

纷向夏威告状说："学生军是吃五路军（国民党）的饭，做八路军（共产党）的事"。5月，夏威在贵县召开"思想整顿会议"，要对学生军进行整顿。会上，少数顽固分子攻击学生军中有人阅读共产党书报，传播共产党思想，要求严加取缔。在场的共产党员据理反驳。夏威虽然对学生军"赤化"有所忧虑，但鉴于当时广西形势危急，还需要利用学生军为他进行战备工作，因此没有对学生军的进步活动采取严厉的限制措施，使反动分子的阴谋没有得逞。

夏威为了更好地利用学生军这支队伍，同时分散和削弱学生军的进步力量，下令举办干部训练班，抽调班长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学生军战士去受训。训练班前后办了五期，近600人参加。学员结业后，一部分仍回学生军工作，一部分调到正规部队当连队的政工人员，一部分调到各地的军民合作站进行战备工作。调到正规部队和军民合作站的人员中，都有一部分共产党员。他们发扬学生军的优良作风，在桂南会战中起了良好的作用，扩大了学生军的影响。

由于人员调动和一些队员因故离队，1939年11月，学生军进行了一次整编，由三个团整编为两个团，分别部署在桂东南和桂西南的战事前沿地带。同月下旬，日军入侵桂南，桂南会战爆发。学生军深入战地，发动群众为正规军作向导，找驻地，供应粮草，运送弹药、物资和伤病员；调解军民纠纷，改善军民关系；协助政府收容、救济难民；组织战地农工商贸，缉拿走私，打击奸商；深入敌后，侦察敌情，惩治汉奸，打击日伪政权；配合地方政府组织民工破路，破坏日军的运输线。学生军独立或配合正规军和游击队对日军作战共130多次。12月1日，学生军的一个班配合国民党部队，在邕钦线上向日军的一个宿营地发起夜袭，歼敌近百名，缴获步枪80多支，小钢炮一门和一批物资。在历次作战中，有十余名学生军官兵英勇牺牲。

学生军的良好表现，赢得了国民党一些将领的高度评价，震惊了日本侵略者。日军贴出告示："谁能斩获一个学生军的首级，即赏银一千元，斩获一个学生军军官的首级，即赏银三千元。"后来升格为"缉获学生军一人，赏银二千元"。还一再散发传单，张贴告示，对学生军进行威逼、利诱、挑拨、谩骂。

桂南会战结束后，敌我双方处于相持状态。1940年5月，夏威把学生军

集中到隆安县下颜圩进行整编，从中抽调800人到第十六集团军干训班受训，准备在结业后分配到桂军连队任军官。学生军中有几名共产党员被派进该训练班工作，他们在训练班中建立了党支部。余下1200人组成一个学生军团，编为三个大队，归集团军总部直接领导。学生军中的党组织利用这个时机进行了整顿。经中共南宁特支书记黄书光请示桂林八办同意，在学生军恢复建立党组织，成立了中共总支委员会，归南宁特支直接领导，书记杨烈。[①]接着，在学生军团的11个中队和《曙光报》社，共建立了12个支部，发展了40名党员。此时，共产党员靳为霖被委任为学生军团政治室主任，杨烈任军团部政治干事。这样，党组织的工作意图、计划，就经常以合法的行政方式层层下达布置，贯彻执行。

中共组织还掌握了学生军的宣传阵地《曙光报》。该报原是学生军第二团的机关报，1939年3月在桂平创刊，有靳为霖等多名共产党员在其中掌握宣传导向，报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发行量最高达万份。学生军在下颜整编时，报社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1941年8月，报社进行改组，党的力量进一步加强，报社总编辑、副总编辑和经理，都是共产党员，全社20名员工，有10名是共产党员。此后，报社党支部由中共桂西南区特委直接领导。

整编后的广西学生军团，主要任务是：进行战地工作，加强军民合作站工作，在时机适当时开辟敌后根据地。军团党总支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党在学生军中的根本任务是："巩固学生军团，并争取其进步，以支持广西的进步力量"。这时，在军团中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思想教育，全军团士气旺盛，情绪高昂。

1940年8月底至9月初，参加军民合作站工作的学生军第三大队陆续从隆安下颜出发，奔赴岗位。队员被分配在军民合作站柳州总站及其所辖的忻城、宾阳、贵县、田东县等7个支站、58个分站工作。到军民合作站的党员，都被安排担任支站、分站的负责人。他们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带领群众开展工作。第九中队在邕宁四塘、五塘一带，第十中队在邕宁八尺区还成立了工作

① 杨烈、丘冰：《回忆学生军团党总支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载《党在广西学生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页。

组，发动组织群众，培养青年积极分子，配合当地游击队，开展对日伪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了几名游击队员入党。

第二大队开赴第十六集团军驻防的桂南地区邕宁、武鸣、宾阳等县，发动组织群众支援前线，配合部队坚守防线，协同当地游击队袭击骚扰日军，深入敌占区侦察敌情，鼓励“义民”，劝导“顺民”，调解“义民”和“顺民”的矛盾，争取民心，瓦解日伪政权。他们还在敌占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和各种抗日自卫武装，保护群众，骚扰和打击敌人。

第一大队一部分到龙州一带工作，大部分越过日军封锁线，深入到上思县一带敌占区，进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在中共南宁特支书记黄书光、宣传委员覃桂荣的领导下，他们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宣传发动群众，成立读书会、青年救国会、文化补习班，举办各种训练班，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为后来这些地方革命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0年11月，日军撤出广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政治形势急剧逆转，桂系公开追随蒋介石反共。此时，党总支估计学生军即将被解散，便抓紧时机，深入宣传发动群众，积极举办青年训练班、读书会，讲授科学知识，传播革命思想，启发阶级觉悟，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在学生军内也发展了60多名党员，进一步壮大了学生军中党的力量。

1941年6月，广西当局宣布解散学生军，8月办理结束事宜。在这期间，学生军党总支在桂西南区特委直接领导下，总结了党在学生军的活动和学生军各个方面的工作，审查了在学生军中发展的100多名党员（审查结果，全部合格），布置了今后继续在原来培养的对象中发展党员的任务，安排了党员的去向和党员在新岗位上的工作任务。党员的去向是：大部分到广西合作人员训练班受训，一部分到三青团各县分团部、十六集团军政工队、《曙光报》社、学生军通讯处工作，有的返回原校继续上学，只安排几个人专门从事党的工作。这是一次因势利导，把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播散到全省广大地区去的战略部署。至此，这支被誉为“既是宣传队，又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的广西第三届学生军的历史宣告结束。

党在战时工作团中的活动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面对日军入侵的严重威胁，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遵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全民抗战的路线，积极推动广西当局组建战时工作团，深入城乡发动组织群众，支持和参加抗战，用人民战争来战胜日军。1939年1月，陆川县在中共组织的推动下，首先成立了县战时工作团。1939年春夏，北流、博白、玉林、贵县、兴业等县战工团相继成立。6月，中共玉林中心县委为了统一领导玉林五属的抗日救亡工作，通过民主人士出面成立玉林五属战时工作总团。11月，日军侵入桂南。南宁沦陷前夕，经中共南宁特支做工作，南宁区民团指挥官、爱国将领梁瀚嵩同意成立南宁区战工团。广西省政府迫于形势，于1939年11月下旬，下令在战区附近和日军可能进一步入侵的梧州、玉林、浔州等地区成立战时工作团。

按照广西省政府"饬令"的规定，县战工团团长由县长担任，副团长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县参议会议长、县民团副司令担任。中共广西各级组织在积极推动成立战工团的同时，发动党员带动进步分子参加战工团，掌握实际领导权，通过共产党员的骨干作用，更好地发挥这支队伍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壮大进步力量。陆川县战工团副团长李耿、秘书林克武是共产党员，团部各部门的负责人几乎全是共产党员。全县战工团有15个中队，49个分队，共有脱产团员40人，不脱产的团员3000多人，其中的中队长和分队长，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北流县战工团有专职团员40人，其中共产党员30多人；战工团分两个队，都建立了党支部。博白县战工团有专职团员6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28人，秘书吕仲先和多数部门的负责人，是共产党员，团内建立了党支部。玉林县战工团有专职团员30人，副团长龙明勋是爱国人士，各部门负责人也多是共产党员。兴业县战工团有专职团员28人，乡村有不脱产的义务团员，副团长覃震声是爱国人士，副团长兼秘书覃注礼是共产党员。贵县战工团秘书谭镇邦是共产党员，各部门的负责人也多是共产党员。玉林五属战工团总团秘书金石声是共产党员，各部门的负责人大多数也是共产党员。南宁区战工团100人中有15名共产党员。副团长梁寂

溪，秘书吴光华，以及多数部门负责人是共产党员，三个队的正副队长，都是共产党员或与党有联系的进步分子，团内成立中共支部。

玉林、南宁地区的中共组织把战工团作为党的主要活动基地，团结各民主人士认真做好战工团工作。南宁战工团副团长梁寂溪，同南宁区民团指挥官、战工团团长梁瀚嵩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许多意见得到梁瀚嵩的积极支持。玉林区民团副指挥官、玉林五属战工总团副团长肖道龙，与团内中共党员也合作得很好。

各地战工团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积极组织武装准备抗击入侵日军。围绕这个任务，战工团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活动：

进行全民抗战动员。各地战工团深入到所属地区的城镇乡村，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形式进行抗战宣传。同时，推动各个城镇、村寨、学校，成立歌咏队、话剧队、演讲队、壁报组等宣传组织，兴办政治、文化夜校，宣传抗战，动员民众。抗战的墙报、漫画、标语随处可见。夜校里，群众既学文化，又学政治，还学军事知识和救护知识。有的地方还组织了晨呼队、夜呼队，每天拂晓和午夜，穿街走巷，越野过村，高呼抗战口号，警钟长鸣。陆川战工团出版《动员日报》，兴业战工团出版《抗敌周刊》，南宁战工团出版《瓶山报》，大力宣传抗战形势，介绍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对动员全民抗战起了很大作用。

培训干部。陆川县战时工作团派人参与组建了县抗日救亡战时教育工作团，先后培训了300多人。博白县战工团举办了抗日青年训练班，共培训了100多人。北流县战工团先后举办了三期青年训练班，培训了150多人。玉林五属战工团总团举办了抗日妇女游击训练班和抗日青年干部训练班，培训了骨干100多人。各县战工团培养的人员，充实了战工团、游击队和其他救亡团体的骨干力量。

组织抗日武装。玉林五属几个县的战工团，都组建了抗日武装。陆川县成立了抗日自卫大队，全县49个乡，都成立了游击中队，拥有队员约3000人。各乡游击中队的队长和指导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博白县战工团在向县政府取得武器，武装起来以后，即选择地处六万大山西南面的

官洞、历山一带，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农民抗日自卫军，进行军事训练，准备迎击入侵日军。南宁区战工团在上思等地组织了抗日自卫队，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了准备。陆川县战工团还组建了陆城、西嵇、米冲、山口四支妇女游击队，共160多人。北流县战工团也组建了一支妇女游击队，有队员数十人。女游击队员和男队员一样，打绑腿，扎腰带，扛枪操练，苦练杀敌本领。她们白天扛枪，晚上拿针线，赶做军鞋、棉衣，捐献给前方将士，还为出征军人代耕。当时的《救亡日报》、《广西妇女》等报刊，盛赞她们是“现代的花木兰”、“妇女解放的先锋”、“南国的巾帼英雄”。

组织群众拥军支前。在日军入侵桂南之前，各地战工团即发动群众捐钱捐物，支援前方，组织各界团体慰问当地驻军及军属、烈属。日军入侵桂南后，各地战工团发动组织群众，协助部队运送粮草、弹药，救护伤员，支援部队作战。

发动民众进行备战。为了阻止日军从广州湾（今湛江市）入侵广西，玉林地区各战工团还协助地方当局，组织了浩大的民众队伍，到公路沿线进行破路、拆桥、抢割，坚壁清野，运走粮食，疏散妇孺老幼，准备抗击入侵的日军。同时，广泛开展锄奸工作。普遍成立锄奸小组，组织民众侦查、揭发、检举汉奸，一旦发现线索，就跟踪追查、追捕。陆川县有一次围住一个汉奸的家，捕获了正在开会的大小汉奸十余人。

广州沦陷以后，大量的日货从广州湾流经陆川运至玉林，进入广西内地，转运至云贵川等省。一些汉奸日探扮作商人混了进来，刺探情报，散布谣言，扰乱社会治安。各县战工团组织民众仇货检查团，沿公路布岗设卡，严密检查。陆川县乌石圩一次就查出日本棉纱万余锭，棉布千余匹和大批煤油、火柴等货物。

开展战地工作。南宁区战工团在南宁沦陷的前一天，从南宁出发，到上思集训。后分成三个队，到隆安、扶南、绥渌、同正等几个县的战事前沿地带开展战地工作。由于得到民团指挥部的支持，战工团的几名干部担任督导员，到各县去检查、监督和指导战勤和其他抗日救亡工作。日军占领邕龙线以后，该战工团长期在敌后坚持斗争。

1940年春，敌我双方在桂南形成对峙局面，一些县的顽固派当局强行解散战工团。到1941年1月，所有战工团全部被解散。各地战工团中的共产党员，转到其他岗位继续坚持斗争。

当时属广东省管辖的钦廉地区合浦、防城县，也成立了类似战工团的抗日救亡团体。1939年11月，合浦县民众抗敌后援会战时工作队和县民众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成立，两队共60多人。战工队的领导成员张进煊、谭俊（谭锡裕）等3人是中共党员。他们组织队员看书学习，唱《抗大校歌》，过延安"抗大"式的生活。队员一面学习，一面深入城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上前线进行战地服务工作，还募捐寒衣，慰问抗日将士。1940年3月，防城县成立了战时后方服务团，队员100多人，团长、副团长、总干事是爱国进步知识分子，主要骨干是中共党员。他们举办培训班，培训了100多名青年知识分子，组成几个分队，到各区乡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创办了《青年生活周刊》和《十万大山报》，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还到前线开展服务工作。

党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中的活动

1939年2月1日，广西当局筹办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简称地干校），在桂林城郊成立，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兼任校长，并邀请教育家杨东莼任教育长。杨向桂林八办处长李克农汇报，李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请示，得到了批准。①

为了办好这所干部学校，杨东莼专门拜访了当时在桂林作短暂逗留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徐特立。徐特立详尽地介绍了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办学经验，与杨东莼共同研究确定了广西地干校的办校方针和教学计划。杨东莼把这些设想和计划向李克农作了汇报，得到了同意和支持。李克农还指定周钢鸣作为他与杨的秘密联络员。

杨东莼首先着力招揽人才。他通过桂林八办的关系和自己的社会关系，请了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到校任教。中共广西省工委也派进了一批党

① 杨东莼：《关于干校的回忆》，中共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党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

员。先后在地干校工作和学习的中共党员，共有100多人。

地干校一成立，中共组织随即建立。校内设两个支部：一个是省外党员支部，周钢鸣任书记，属桂林八办领导；一个是省内党员支部，先后由张海鳌、杨江任书记，属广西省工委领导。两个支部不发生横向关系，但互相紧密配合开展工作。在人事安排方面，杨东莼和党组织作了精心部署，把党员都安排在各个部门、单位中担任要职，掌握了学校行政、教学、训练等主要阵地。

杨东莼提出的地干校的训练方针是：提高学生的自动精神，养成学生的自觉纪律，唤起学生的战斗工作精神，实施集体的自我教育，实施战时生活，强调动员精神，注重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在这六项方针指导下，进行政治、军事、工作、生活四项训练，以提高学员对抗战的认识，坚定抗战到底的信念，增强实际工作能力，适应战时工作的需要，养成学员民主团结、友爱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

以这个办校方针和训练计划作为依据，学校的中共组织秘密组织党员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研究工作方式方法，对党员进行组织纪律教育和保持革命气节教育；用“旧瓶子装新酒”的办法，广泛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依靠党员，团结进步分子，引导广大学员掀起学习进步书刊的热潮；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动和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参加校内外的抗日救亡运动，还组织了一个战地工作队，开赴昆仑关做战地服务工作，协助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向日军进行反战宣传。

举办演讲会、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是地干校对师生员工进行教育的一个重要方式。他们通过桂林八办，邀请叶剑英到校作了题为《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讲。叶剑英在演讲中，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分析了战局的态势，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指出抗战必胜的前途，批评了国民党消极抗战的言行。在此前后，还邀请了夏衍、田汉、胡愈之、千家驹、张铁生、刘清扬、沈钧儒、王造时、李任仁、雷沛鸿、程思远以及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负责人鹿地亘等数十名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到校演讲、作报告，举行时事座谈会、专题讨论会，对学员进行

政治思想、形势任务、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杨东莼也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向学员发表演讲，作报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阐述各种问题。

地干校两年间共开办了四期，培训了乡、村长及小学教员、行政职员共1400人。经过学习和一系列活动，师生员工思想政治觉悟得到了提高，增强了适应抗战需要的能力。

地干校办校取得较好的成绩，受到了社会舆论的赞扬，有人把它誉为“南方抗大”。同时，也因此受到了顽固势力的诽谤。他们攻击“地干校的训练方法是共产党的那一套”，叫嚷“地干校是拿国民党的钱，替共产党办学”，攻击“杨东莼要赤化广西”，等等。但是，当时桂系要利用杨东莼主持办学，而杨东莼治校办学有方，又能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巧妙对付各种事态，因此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一时未能得逞。

地干校也混进了一些持托派观点的人，他们以“左”的面目出现，在学员中散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背离了无产阶级，向国民党、向资产阶级投降的言论。还散播“唯武器论”，“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等等。学校党组织决定发动反托斗争。杨东莼就此请示李克农，李同意进行批判，并指示不要公开开展反托派斗争，而是要批判其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破坏训练的言行。据此，杨东莼在每周例行的精神讲话中，对托派散播的破坏抗战的言行进行了批判。党组织也通过党员带动学员进行揭发、批判，使坚持托派观点的人完全孤立，最后被开除出校。

地干校进步势力与顽固势力的斗争，牵涉面最广、影响最大的是“入党”、“入团”事件。1939年秋，广西当局下令，全省公教人员都要加入国民党、三青团。对地干校还作了具体规定：教职员一律入党，学员年满25岁的入党，25岁以下的入团。对此事，地干校的两个中共支部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一致认为，广西当局此举，有两个阴谋：一是使共产党在公教人员中没有了发展对象；二是迫使隐蔽的共产党员暴露身份。为此，他们分别向桂林八办和中共桂林特支请示。桂林八办党组织指示省外支部，为了保存地干校这块阵地和有利于今后开展工作，同意批准部分党员集体参加国民党。桂林特支也同意

地干校省内支部的党员集体参加国民党。同时指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以后，要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要更慎重地开展工作。两个支部分别贯彻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杨东莼提出，省外的党员可以不参加的尽量不要参加；采取集体方式参加；一律由黄旭初和李任仁作介绍人。地干校发展了国民党党员之后，建立了国民党区党部，委员和工作人员都只由本校人员担任，主要工作只是办理集体入党手续，没有开展其他活动，抵制了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派员来校进行破坏活动的企图。在这场斗争中，保护了地干校的党组织，稳定了党员和进步分子队伍，挫败了广西当局的阴谋。

广西当局一再动员地干校年青的学员参加三青团。地干校省内支部对此作了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广西干部很缺乏，各县三青团建立不起来，而广西当局又害怕蒋系势力乘虚而入，所以急切发展三青团员；我们可以趁机派些党员进去，帮助他们组建，日后利用三青团这块牌子做党的工作，这对发展进步势力有好处；但为了避免“为他人做嫁衣裳”，必须先发展条件成熟的学员加入共产党，然后让他们参加三青团。这些看法得到了桂林特支的同意。1939年冬，地干校党组织抢先发展了一批学员入党，然后让他们和其他学员一起集体参加三青团。地干校结业后，党组织选派了其中一些党员，通过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分配到各地去，担任领导职务，打着三青团的旗号，做共产党的工作。

1939年冬，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广西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变化，有的人说杨东莼使用的都是共产党人，并扬言要改组地干校，把“异党”分子赶出学校。此时，黄旭初对地干校也很不放心。这位“挂名校长”，过去很少管地干校的事，此时却频频“夜校训话”。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杨东莼意识到地干校很难继续办下去了。1940年5月，他向黄旭初提出辞呈，6月即获得批准。同月，广西省政府下令，地干校办至年底结束。杨东莼离开学校后，仍住在桂林，继续指导地干校工作。地干校的党组织分批撤退党员。已经暴露的，一部分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一部分转移到省外隐蔽。未暴露的，一部分继续留校坚持工作，一部分到柳庆区、浔梧玉区、邕龙区干部训练班工作。分到三个地区干部训练班工作的20多名党员，分别在训练班中担任各种领导

职务，基本按照地干校的模式办学。这些训练班共培训了村街长约4000人，从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两个中共特支。1940年12月31日，地干校结束时，一部分党员由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派进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和各县分团部工作，其余党员和进步分子，分配到全省各地的基层单位工作。

党在广西三青团中的活动

1938年夏，蒋介石为了压制抗日救亡运动，下令解散了国民党统治区内的进步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决定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在三青团筹建过程中，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中共中央南方局，曾建议和争取使它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体，但被蒋介石拒绝。蒋介石要把三青团办成一个完全由国民党控制的组织。

同年7月，三青团中央团部在汉口成立。此后，它极力向全国发展。蒋系企图趁在广西建立三青团之机，扩展其势力，控制广西。桂系看穿蒋系的阴谋，决心抵制它，但是感到干部缺乏。

桂林八办和中共广西省工委认为，帮助桂系建立三青团，把蒋系的势力顶回去，对发展党与桂系的统战关系，对党在广西的活动，对坚持抗战，都是有利的。因此，都很重视这项工作。[①]

1939年1月，三青团广西支团部筹备处在桂林成立，中共即派出干部给予支持。这时，中共党员周可传从重庆来桂林，由叶剑英介绍到桂林八办分配工作。周是广西上林县人，在日本东京入党，抗战开始时回国，他与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程思远友谊深厚。桂林八办利用周与程的关系，派周到三青团广西支团部筹备处工作。广西省工委也先后从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广西地干校、各大中学校以及各市县，抽调了几批党员，通过多种渠道，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各级组织工作。与此同时，蒋系也派蓝衣社的骨干分子方采芹等人，带领一些骨干到广西来。因此，广西三青团从筹建开始，就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① 陈岸：《我的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2月，三青团广西支团筹备处在桂林举办了一个青年干部训练班，正式名称为中央青年训练班直属中队，队长方采芹。学员中有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也有特务和托派分子，情况很复杂，斗争很尖锐。在学习讨论中，有人公开散播反共谬论。班里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在小组会和全班大会上，机智地批驳了这些反动谬论，并得到爱国民主人士、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李任仁的支持。经过反复辩论，教育了群众，孤立了顽固分子。

三青团广西支团部筹备处主任黄旭初，书记程思远，指导长李任仁。筹备处设政训、宣传、总务三个组，其中的组长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日常工作由政训组组长周可传主持。三个组的共产党员密切配合开展工作。

三青团广西支团部筹备处成立以后，桂林、全县、柳州、宜山、邕宁、武鸣、龙州、梧州、贵县、玉林、陆川等19个县，相继建立了分团部。李云蒿、覃注礼等一批党员分别进入各县三青团分团部工作，分别在其中15个分团部担任主任、书记、股长等重要职务，基本上掌握了这些分团部的领导权。广西支团部的两个直属分团——广西地干校分团和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分团的领导权，也掌握在中共党员手里。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与当地的抗日群众团体互相协作，运用各种方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同三青团内的反动分子作斗争；进行统战活动，团结爱国人士、开明绅士共同抗日；引导广大青年群众阅读进步书籍报刊，走革命道路；掩护党的秘密活动，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

党在广西三青团的活动，引起了顽固分子注意。一些县分团部的反动分子向三青团中央“控告”，说广西三青团内有共产党活动。在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工作的共产党员采取措施，与之进行斗争。如，把三青团中央发下来的一些反动指示文件扣压下来，不往下面传达贯彻，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类机密文件，送交党组织参考；通知在各县分团部工作的党员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撤退已经暴露的党员；利用上层统战关系，帮助同志脱险，营救被捕同志。通过这些措施，挫败了反动分子的阴谋，保护了在各县三青团分团部工作的同志。

1940年10月，周可传被派去重庆国民党中央党政训练班集训。受训期间，他会见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董必武。董必武对他说："你们在广西三青团工作的同志很不错，做了很多工作，希望今后继续把工作做好。"①

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政治形势逆转，中共党员在三青团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周可传即撤出三青团广西支团部，转移隐蔽。党在三青团的活动方式也有所改变，如举办升学补习班，帮助青年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组织青年开展文体活动，继续以进步思想教育团结青年。

1942年7月，桂林发生七九反共事件。1943年1月，玉林、南宁又相继发生一·一三事件和一·一五事件。在三青团工作的中共党员，少数在这三起反共事件中被捕，多数转移隐蔽。至此，党在广西三青团的活动终结。

党在广西妇女工作委员会中的活动

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召开了一个全国各界妇女谈话会，这是一次全国妇女界统一战线性质的会议。会后，成立了中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作为全国妇女运动的领导机构。

1939年7月，广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妇委会）在桂林成立，主任郭德洁。此时，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通过各种关系，派遣了曹国智、张海萍等10名中共党员，进入该会工作，分别担任该会文化组、训练组、联络组、总务组和战时工作组的组长。各组的干事，也都是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中共党员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积极开展妇女运动和抗日救亡工作。

指导市、县成立妇委会。不少市、县先后成立起来的妇委会，其领导成员和骨干分子，也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在当地党组织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宣传教育妇女。各地的妇委会，以举办妇女学习班、妇女联谊会、妇女问题讲座、妇女座谈会等形式，对妇女进行宣传教育。在农村，还举办妇女夜校、妇女识字班，组织妇女学习文化知识，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组织训练妇女。省妇委会举办了妇女干部训练班，培养战时妇女干部。

① 陈贞娴：《回忆在广西三青团的工作》，《广西党史》，1996年第2期。

还先后在桂林举办了妇女的看护、伤兵服务、难民救助、缝纫等专门训练班，指导妇女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以适应战时需要。一些市、县妇委会，也举办了各种训练班，组织妇女参加战时工作队、战地工作服务团的活动，使广大妇女得到锻炼提高。

发动妇女支援前线。妇委会深入城镇农村，发动广大妇女发展生产事业，做军鞋冬衣，捐献钱物，慰问军属，慰劳残废军人，为出征军人代耕、代劳、写家书，积极支援前线。

以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为主导的广西妇委会，广泛团结各界各阶层妇女，建立妇女抗日统一战线，深入发动妇女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在1942年广西的反共事件中，该会的中共党员有的被捕，有的转移，党在广西妇委会的活动结束。

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广西各地的战时工作团、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广西三青团、广西妇女工作委员会，都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由中共党员在其中充当骨干、起重要作用的抗日救亡团体（学校）。这是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国共合作的历史时期和蒋桂矛盾的特殊情况下，创造的一种基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这些团体不但为广西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对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桂南会战与粤桂南人民的抗日斗争

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与桂南会战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控制了我国华南海岸线的大部分，切断了平汉、粤汉铁路。接着，日军又准备入侵广西，占领南宁，企图切断由中国通往越南的国际交通线，缩短轰炸我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两大补给线的飞

行距离，堵死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援助，进而威胁云贵和整个大西南，同时实施对国民党桂系的诱降工作。

1939年1月，日军占领与北海相邻的涠洲岛，随即在岛上设立基地司令部，修建了军用机场。日军飞机从涠洲岛起飞，不断轰炸我钦廉沿海地区和广西内地。11月15、16日，日军先后从钦州湾的企沙、龙门登陆。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行营对敌情判断错误，认为日军进犯广西，是以海南岛为基地，从广州湾水东、电白登陆的可能性比较大，因而把留守广西的桂军主力夏威所部，布防在桂东南和西江一带。因邕钦一线兵力不足，抵抗不力，致使日军长驱直入。旬日之间，即占防城、钦县，24日攻占了南宁，30日占领邕武线上的高峰坳，12月5日占领邕宾线上的昆仑关。

为了保卫西南交通线，12月8日，国民政府军委会电令白崇禧组织桂南会战，反攻南宁。敌我争夺的焦点在昆仑关。参加会战的，日军方面有第五师团、台湾混成旅团共约5万人。中国军队方面，有9个军17个师，共约15万人。18日凌晨，中国军队在杜聿明等指挥下，向昆仑关发起攻击。经过13天的惨烈战斗，于31日夺回了昆仑关。此役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以下官兵共4000多人，俘敌102人，缴获各种炮30多门，轻重机枪162挺，步枪2000余支，战马近百匹，弹药和军用物资大批。中国军队也付出了重大代价，阵亡一万多人。①

昆仑关争夺战结束后，双方调兵遣将，准备更大的决战。中国军队增加四个军，日军从广东调来一个师团、一个旅团，共约3万人，增加飞机105架。

1940年1月中旬，日援军从钦州湾源源登陆北进。下旬，在邕宾线上进行佯攻，其主力则绕道永淳，于2月2日攻占宾阳，中国军队匆忙撤退，日军重占了昆仑关。此后，敌我处于相持状态。从3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桂南对日军作战百余次。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九、十月间，日军先后从龙州撤往越南，从邕钦线撤到海上，中国军队趁机反攻，收复了龙州、南宁。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遂告结束。

日军在入侵桂南的一年时间里，先后占领的县份有邕宁、武鸣、上林、宾

① 据昆仑关战役总指挥官白崇禧1940年撰写《昆仑关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文。

阳、永淳、横县、扶南、绥绿、上思、思乐、明江、上金、宁明、凭祥、龙津、崇善、左县、同正、迁江、防城、钦县、合浦、灵山，共23个县。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凶残暴戾，无恶不作，给粤桂南地区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犯下了滔天罪行。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桂南19个县，被日军杀死的群众有13629人，杀伤的4381人，受灾的111.7万人，被毁房屋4425间。[①]邕宾、邕武、邕龙、邕钦公路沿线，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凄凉。

钦廉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

日军从钦州湾入侵广西后，钦廉地区的中共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抗日武装斗争。

中共北海市组织争取国民党合浦县第五区区长的支持，建立了一支50多人枪的学生武装，由中共党员担任队长、指导员。国民党军队撤退后，他们日夜守卫着北海，监视日军在海上的行动，袭击日军巡逻艇。还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农村抗日据点。

这时，蔡廷锴率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进驻灵山，支持人民抗日，这给中共钦廉地方组织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派一名灵山籍的党员回灵山工作，他和当地进步青年组织青年抗日游击队，后又动员一位爱国人士组织灵山人民抗日敢死队。1940年2月，这两支抗日武装和广东南路抗日游击队一起，开赴泗峡坳前线参加截击日军一个联队的战斗，同时发动当地的抗日自卫队和青壮年妇女共数百人，配合我国军队作战。激战三天，取得重大成果。

钦廉地区人民武装抗日的另一种形式，是参加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队及其组建的地方抗日游击队。当时，蔡廷锴的第二十六集团军成立了政工队，并在各地组建抗日游击队。5月，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派7名党员到灵山工作，和当地的党员和进步青年一起参加政工队，并在灵山建立中共特别支部。6月，又派12名党员到钦县南路第九游击队工作，建立钦县特支。两个特支在灵山、钦县抗日前线开展抗日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和正规

① 邱昌谓：《桂南收复因果的观察》，《学术研究》第四卷第六期，1942年2月。

军一起，对日作战，镇压汉奸，保卫村庄。

1939年2月，日军侵占海南岛，企图把它建成控制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基地。钦廉的一些官僚、地主、奸商竟然为虎作伥，偷运大米及其他战略物资到澜洲岛、海南岛资敌，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怒。1940年3月，中共南路特委常委温焯华，在中共合浦县工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宣言》。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开展反汪反逆流斗争。会后，西场、廉州、小江、寨圩、白石水等地的广大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汪、反资敌大会，向当地政府请愿，强烈要求禁止运米资敌，严惩奸商，还到江边拦截待运的米船、竹校，将没收的大米平价出售给群众。合浦一中、五中及寨圩简师的学生，开展反对汪派分子和反动校长的斗争，斗争浪潮波及全县。

5月，中共南路特委将合浦县工委改组为合浦中心县委，加强对人民抗日斗争的领导。县委书记黄其江获悉国民党合浦县政府即将派兵镇压白石水地区群众的抗日斗争，即赴白石水，与该区区委共商对策。是月下旬，中共白石水区委在栊檬坳召开反击顽固派武装镇压群众和抗日反汪斗争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农民、学生、教师和各阶层人士千余人，武装人员数百人。8月，成立白石水抗日武装大队，由张世聪任大队长。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出兵“围剿”白石水，均被粉碎。1941年9月，国民党顽固派对白石水进行第四次“围剿”。在此期间，县委执行广东省委“把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指示，撤退干部，解散队伍，埋藏枪支，国民党顽固派便更疯狂地“进剿”，抓去群众千余人，并强迫他们“自新”，缴枪罚款。其后，又把40多人关进监狱，其中20多人被折磨致死。尽管如此，在党的领导下，白石水和钦廉地区的人民群众仍然以各种形式坚持抗日斗争。

宾阳、邕宁等地人民的抗日活动

桂南会战期间，昆仑关北麓的宾阳县人民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积极支援我国军队作战。为了防止日军北进宾阳，该县5万多群众手持火把，冒着严寒，执行破路毁桥任务。三天之内，破坏了全县的公路桥梁。同时，组建了县抗日游击大队，共300多人枪，分四个中队，开赴昆仑关，协助部

队作战。全县有6万多名青壮年应征，组成44个运输队，日夜出动，把粮食、弹药运送到前线。全县妇女积极为部队官兵赶做军鞋，先后捐献了两万多双。她们还组织洗衣队，日夜为部队官兵洗补军衣。战地附近的群众组织了义勇救护队，冒着枪林弹雨救护伤员。宾阳中学师生组织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和战地服务团，深入乡村进行宣传鼓动，到前线进行战地服务工作。县军民合作站为新到部队安排住地，筹备军粮、稻草，收集、转送慰问品，传递公文，当翻译，作向导，侦察敌情，解决各种困难问题。

这期间，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南宁、玉林等地的战工团，广西学生军、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战地服务团和各地军民合作站，以及邕钦公路沿线的游击队和其他群众抗日武装，在作战前沿地带和日军后方，发动群众坚壁清野，运送粮食弹药，救护伤员，慰劳军队。同时，组织群众破坏日军必经的道路和桥梁，截击日军的运输车辆，打击日伪的维持会组织，捉拿和惩治汉奸，扰乱日军的后方，使在邕钦线上的日军日夜不得安宁，在南宁和昆仑关的日军弹药、粮食供应受到阻滞，有力地支援了我国军队在邕宾线和昆仑关的战斗。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负责人、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也带队到昆仑关前线，冒着猛烈炮火向日军作反战宣传。

邕宁县的八尺区位于南宁市东南，日军占领南宁后，该区民众成立了游击大队，共500人枪，分四个中队。他们集资买进了一批机造步枪和20多挺机枪，增强了战斗力。在日军占领桂南期间，这支游击队始终坚持游击战，屡创日军。

1940年10月，日军撤出桂南后，广西学生军团第三中队进驻八尺区进行善后工作。该中队的中共支部吸收了八尺区抗日游击队的4名骨干分子入党，建立了八尺区党小组。当月，国民党当局下令解散这支游击队，并收缴枪械。游击队把武器埋藏下来，人员分散隐蔽。1944年11月，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时，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又拿起武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

日军撤入越南后，中共中越边支部书记谭统南，于1941年6月，在靖西县安宁乡组建中越边境抗日游击大队，自任大队长。该大队协同越南独立同盟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中越边境两侧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达四年之久。

三、在国民党反共逆流中坚持斗争

(一)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退

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中共对桂系的方针

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于1938年12月公开向日本投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虽然继续抗日,但是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冬至1941年春,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在安徽省泾县茂林地区,蒋介石集中了国民党军队7个师约8万人,对奉命北上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进行突然袭击,使新四军受到了重大损失。事后,蒋介石却诬称新四军"叛变"。这次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中共中央从抗日大局出发,对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桂系作了全面分析,采取了正确的对策。毛泽东在评价国民党桂系在这次反共中的态度时说:"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介石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①]皖南事变发生之前,中共中央对蒋介石集团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动态,已经有所觉察。为了争取桂系保持中立,在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阴谋消灭新四军的"皓电"后,11月3日,毛泽东即致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3页。

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指出“蒋介石准备投降”，“目前的反共高潮是直接投降的准备”，“应揭露蒋介石的反共投降阴谋，开展统战工作，命李克农速向白（崇禧）之秘书（按：指谢和赓）及黄旭初等建议，不要上蒋介石投降反共的当，迅速停止覃连芳军的东进。覃军现已由鄂中开到商城、固始、立煌一带，如再东进，就有引起冲突的危险。八路军与广西是患难相依的，犯不着受欺骗而伤和气，将来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两军相助之处甚多”。电文还说：“如他们愿意谈此问题，可与一定人员谈判具体办法，例如托故缓开，万一接触时朝天开枪等”。11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南方局、中原局、新四军和桂林八办领导人，指示对桂系所采取的方针政策。电文说，白崇禧与何应钦在对日对共的关系上仍有分别，桂系在现时还要算作中间力量，桂系的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以至一部分中级将领，可能不积极反共或保守中立。对被迫与我发生冲突之桂军，应采取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政策。应通过各种关系向桂军宣传解释：蒋介石、何应钦利用桂军作反共先锋是借刀杀人的渔人政策；白崇禧受何应钦利用一起反共，将断送桂系三年抗战的光荣，如其在反共中受挫，则桂军一半人枪将被蒋系吞并；桂军最好的政策是一面敷衍共产党，求得保存其实力，并在必要时出面调停国共冲突，取得全国信仰。电文还要求调配干部，详细研究桂军的每个军、师、旅、团、营、连、排长的政治倾向、社会关系、个性特点、互相矛盾，以便利用各种可能去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交友工作，争取其同情、倾向我党或保持中立。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就皖南事变发表的声明和谈话，在要求惩办皖南事变罪魁祸首的名单中，只点了何应钦、顾祝同和上官云相的名，而没有点李宗仁、白崇禧的名。

中共中央对桂系策略方针的灵活运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事变过程中，桂系没有直接出兵去攻打新四军；桂军的一些将校和下层军官，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保持了中立；桂系部队的一些高级军官，对蒋介石顽固反共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桂系留守广西的黄旭初，在这期间也没有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指令行事。对于外省来广西的中共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黄旭初只是令其限期离开或“礼送出境”。但是，由于桂蒋合流反共，广西的政治形势从此日益恶化，桂系对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实行更残酷的镇压政策，广西地下党面

临着更为严峻险恶的形势。

桂林八办的被迫撤退

何、白“皓电”发出后，国民政府军政部桂林办事处即派人催逼桂林八办必须于1940年11月19日前结束，并要八办先递送呈请撤销公文。11月12日，李克农就此事致电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中央汇报请示。13日，毛泽东电复周恩来、李克农，指示：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桂林办事处申明，皖南部队准备遵令北移，正商具体事项，在实行北移前有事要办，暂难结束，一俟部队移动，即可结束；如彼方定要马上结束，则请军政部来一正式公文，以便报告总部，并办理结束事宜，若不给公文自动结束，则不能照办；作了上述表示后，彼方如仍不答应，则让其封闭为有利，但我内部须准备安全撤退，以防万一。李克农接毛泽东复电后，即用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叶剑英名义，再次电呈军政部请求缓撤，并致电请李济深疏通，但军政部只准再延长一个月办理结束。其后，李济深电复李克农并转朱、彭、周、叶，说明疏通无效，务希即请通令桂林八办于年终撤销，并限于次年1月将物资转运完毕。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11日晚，周恩来从重庆发来急电，指示桂林八办紧急部署撤退工作，妥善安排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工作，迅速疏散在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士。此时，广西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变化，桂林各报刊奉命登载了国民党诬蔑新四军的电讯，《救亡日报》拒登这些电讯以示抗议。从1月中旬起，桂林生活书店被军警查封，人员被扣，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被迫停业，《救亡日报》被迫停刊，部分进步文化人士被迫离桂。桂林八办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罪行，一面采取积极的应变措施，有计划地将在桂的外来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撤往香港等地。1月20日，桂林八办被迫撤销，工作人员撤离桂林。该处工作人员由处长李克农率领到达重庆后，部分留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部分撤回延安。

（二）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及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继续发展

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桂林八办撤离桂林后，1941年6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先后派李亚群、刘隆华、徐鸣等到桂林，组建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以便继续在桂林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文化工作。8月下旬，该委员会成立，由李亚群任书记，孙士祥任副书记。李、刘自重庆赴桂前，周恩来亲自给他们分析广西形势，布置工作。明确指示：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与广西地下党不发生横的关系，主要通过单线联系领导上层统战和文化界工作；搞好与国民党民主派李济深以及桂系民主派的团结合作，并通过他们做桂系的工作；在柳州与第四战区的张发奎搞好统战关系；组织领导理论、文化、教育界的党员，团结教育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抗日宣传和民主活动；重新组建桂林文化界的党组织，继续开展桂林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对华侨的宣传工作。周恩来还指出，桂林这个文化阵地不能丢，一定要保存下来并发挥其作用；要做好广交朋友的工作；要充分认识和利用广西的有利条件，出版一些好书刊，使这些好书刊不仅能在广西发行，而且能向全国发行。

李亚群等到桂林后，坚决执行周恩来指示，及时恢复了原属桂林“八办”领导的桂林文化、教育界的党组织的活动。同时，成立了由邵荃麟、张锡昌、狄超白组成的文化工作组，协助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开展工作。仍在桂林的张友渔、陈翰笙、司马文森、张兆汉、梅龚彬、萨空了、吕复、舒模等一批单线联系的中共党员，以及田汉、孟超、周可传、侯甸、孙师毅、张云乔等一批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中共党员，密切配合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方面的力量，继续开展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

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的统战工作

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继续做好李济深的统战工作。因桂南战事失利，1940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撤销桂林行营，成立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李济深任主任。9月，李济深从重庆飞桂任职。该办公厅名义上管辖4个战区8个省，实际上只是一个承转机关，没有实权。但由于李济深的地位和声望，他在广西政界仍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南方局指示到桂林做统战工作的干部要充分认识李济深的重要地位，要继续通过李济深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进步人士以及救国会成员做好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通过他联系、影响两广和西南的地方实力派与地方民主派，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起积极作用。

这一工作收到了很好效果。李济深在多方面协助下，在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救济、安置进步文化人士，支持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等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

由于李济深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满，对共产党表现友好，蒋介石对他继续留在桂林不放心，因此，于1943年冬撤销桂林办公厅，把他调回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以便就近控制。但是，李济深没有去重庆，仍然留在桂林，继续进行爱国民主活动。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积极开展对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李亚群等来桂途经柳州时，向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中的中共特支领导人左洪涛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将该司令长官部所属的抗敌演剧第四、五、六、七、九队和桂林新中国剧社中的中共组织交由左洪涛领导。桂林八办撤走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中共特支由八办交给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李亚群领导。根据南方局的指示，该特支主要是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利用张发奎与蒋介石的矛盾，争取张发奎等人坚持抗战。左洪涛是张发奎的随从秘书，他和另一名秘书何家槐（中共党员），利用为张起草讲话稿和文章的机会，宣传团结抗战。同时，特支还做一些中下级军官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站到进步方面来。特支还利用合法地位，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

亡宣传活动，并指导几个抗敌演剧队在柳州、南宁等地区活动达四年之久。

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

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恢复了桂林文化界的党组织，领导全体党员，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分子共同努力，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桂林抗日文化运动逐步恢复了起来。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许多先前转移到香港的著名人士，如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沈志远、金仲华、梁漱溟、陈翰笙、萨空了、杨东莼、陈此生、胡绳等，在中共的积极营救和周密安排下，于1942年春，分批经东江游击区取道粤北和湛江等地到桂林。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想方设法，把他们安置了下来，从而为桂林抗日文化运动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为了推动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继续发展，中共领导的进步势力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比如，国民党顽固派要查封进步书店，查禁进步图书，进步书店就用化整为零、隐蔽精干的办法来和他们作斗争。生活书店在被封前，举行廉价大拍卖，扩大事态的影响，随即把存书和人员转移到三户图书社，照常营业。同时，筹办学艺出版社和致用书店，继续出版原生活书店计划出版的图书。广西省图书审查处宣布，各印刷所不得承印未经送审的文稿，违者严惩。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通过胡希民找李济深出面支持，使多数进步刊物照样刊印出版。新中国剧社上演话剧《再见吧！香港》，演出前已领得了许可证，可是开演时，广西当局下令禁演，只演完了第一场就被强迫停演。后经过反复斗争，该剧更名为《风雨归舟》，重新上演。进步势力在斗争中取得了节节胜利，桂林抗日文化运动不但得到了恢复，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有所发展。

出版方面。据统计，1942年，桂林原有和新开办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共202家，新创办的进步刊物近20种。《文化杂志》、《诗创作》、《中学生》、《自学》、《戏剧春秋》等一批进步杂志，破土而出，占领了期刊阵地。

文学方面。这个时期，桂林出版的文学刊物比前一时期还要多，小说、诗

歌、散文、杂文日益增多，思想内容日益深化，许多作品逐渐“走到人民大众中去”，形成了“暴风的呼啸”。

戏剧方面。这个时期，各种演剧团队林立，业余剧团仍然长盛不衰，还诞生了中共领导的职业剧团新中国剧社。该社名誉社长田汉，社长杜宣，导演有瞿白音、洪深等。剧社还到衡阳、长沙、湘潭等地演出，扩大了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影响。据统计，从1941年至1943年，在桂林上演的进步戏剧共有百余个剧目。

音乐方面。皖南事变后，新音乐社桂林分社的工作仍在进行，《新音乐》杂志照样刊行。后来又创办了《音乐知识》月刊。桂林音乐界举行了各种抗日音乐会20余次。1942年5月28日，进步音乐工作者，在市体育场举行了“万人大合唱”的大型歌咏会，万人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黄河》等抗战歌曲，歌声震动了桂林山城。

美术方面。1941年，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桂林的会址被广西当局封闭，出版的刊物《木艺》亦被迫停刊。但经过美术界同仁的斗争，1942年4月26日又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协会桂林分会。该会成立后立即开展各种活动，多次举办画展。展出的作品，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了豪门官僚荒淫腐败的丑恶面目，使广大观众受到深刻教育。

新闻方面。这个时期，在进步记者和主编主持下，《广西日报》的新闻报导和副刊仍然坚持进步方向。桂林多数报纸的副刊仍为进步力量所掌握，继续坚持进步方向，为广大读者提供健康的精神粮食。在培养青年作者方面，也还有所作为。

教育方面。在许多学校，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校内外的抗日文化活动深入开展。例如，桂林中学一批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从学生军回校复学以后，在校内外广泛开展抗日文化活动，还成立了抗日工作团，深入到桂东南各县进行宣传工作。

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至1944年达到了高潮。这个高潮的主要标志，是西南剧展的举行和保卫大西南宣传运动的开展。

是年，经过欧阳予倩、田汉、吕复、熊佛西、瞿白音等倡议和筹备，在桂林

举行了规模宏大、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黄旭初任会长，西南各省主席和各战区司令长官任名誉会长。担任各部门实际领导工作以及具体指导剧展活动的，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剧展于2月15日开幕，5月19日结束，历时三个月零四天。参加演出、展览的，有来自粤、桂、湘、赣四省的28个戏剧团队和单位，共895人，加上工作人员，与会者近千人。演出的节目，有话剧、平剧、桂剧、歌剧，还有少数民族歌舞、傀儡戏、马戏、魔术等，总计演出175场，观众达10多万人次。同时，举办了戏剧资料展览，观众达3.6万多人次。剧展期间，还举行了戏剧工作者大会，西南各省32个戏剧团队的成员和特邀戏剧专家共千余人参加。大会讨论通过了成立中华全国戏剧界协会西南分会和制订剧人公约等提案，举行了“戏剧运动路线”、“如何创造民族歌剧”、“改革旧剧”等问题的专题座谈。

参加演出、展览的骨干队伍，是中共党员领导的新中国剧社和剧宣四队、七队、九队。桂林文协组织了由中共党员田汉、周钢鸣、华嘉、骆宾基和进步文化人士组成的剧展演出评剧团（亦称十人团），掌握评论方向。剧展大会成立了有中共党员瞿白音等参加的剧展演出检讨会。桂林文化界的领导和中共组织全体党员参加了剧展各部门、各方面的工作。当时在重庆和桂林文化界工作的党的负责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阐明剧展的指导思想，对剧展和剧运中的问题，提出了方向性的意见。《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了30多篇社论、评论、通讯、报道，及时宣扬和大力支持了剧展。在中共组织和党员的策划和引导下，剧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演出、展览的众多节目，其思想内容的主流是抗战、团结、进步。

剧展期间，大会名誉会长李济深、张治中等出席了大会，参观了戏剧资料展览，还捐款给大会作活动经费和奖励成绩显著的戏剧团队。由于统战工作做得好，使剧展取得了合法的地位，避免了反动势力和特务分子的破坏，得以顺利进行。

西南剧展是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化运动的一次大检阅，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强大威力在文化工作中的生动体现。这次剧展规模大，影响深远。当时的美国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这

样宏大规模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举行之外，还是仅见。”

西南剧展刚刚结束，日军南侵，桂林危急，广西当局于5月下旬下疏散令。桂林的文化界又一次动员起来，由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策划，运用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动群众起来保卫桂林，保卫大西南。

5月25日，“文协”桂林分会在艺术馆举行“桂林诗人为保卫中原而歌”的诗歌诵唱晚会。诗人和剧人们满怀抗战激情的诗篇，慷慨激昂，激励了人民群众。接着，由“文协”桂林分会倡议，李济深、郭德洁、龙积之、柳亚子、田汉、欧阳予倩等约百人发起，成立了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周工作委员会，从6月14日至20日，连续开展宣传。李济深以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的名义先后发表讲话，号召八桂子弟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家乡，保卫大西南。李任仁、梁漱溟、金仲华、千家驹等，围绕保卫大西南的主题作了演讲。在重庆的郭沫若、张申府、邓初民、茅盾、夏衍等联名致电广西各界，热烈声援桂林文化界发动的保卫大西南宣传运动，要求采取民主办法，组织人力、物力，保卫大西南。18、19两日，举行国旗献金大游行。李济深、柳亚子等著名人士领头，在桂林的文化人悉数参加。上万人的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口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百万不多，一块钱不少”、“拿出良心来吧，是时候了”，沿街广大群众、商店老板、小姐太太们踊跃捐献。接着，新中国剧社公演特写话剧《怒吼吧，桂林！》。

宣传周和国旗献金大游行结束后，桂林文化界召开联席会议，推选人员将募捐所得的款项、物资，一部分送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转交八路军和新四军，另一部分送交湘桂前线国民党部队。同时，成立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协会，李济深任会长，李任仁、陈劭先、田汉、欧阳予倩、邵荃麟、周钢鸣等9人任常委。7月，成立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队（简称文抗队），由田汉任总队长，华嘉任总队秘书，下分两个队，周钢鸣、陈残云分任队长。队员经过集中学习后，合并为一个队，共70多人，队长陈残云，党的负责人华嘉。接着由田汉带领，从桂林出发，到湘桂铁路沿线的兴安、全县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准备抗击日军。文抗队的活动对前线军民产生了很大影响，却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遭受阻挠和破坏。8月下旬，文抗队被迫

返回桂林，宣布解散，队员们分别转到桂东、柳北等地继续进行抗日文化活动或参加抗日游击战争。

在湘桂战事紧急的7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是年春撤回南方局的李亚群专程来桂林，布置在桂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的疏散、转移工作。9月11日，桂林城防司令部下紧急疏散令。在中共桂林文化工作组协助下，柳亚子、田汉、邵荃麟、熊佛西等人，撤往贵阳、重庆；司马文森、张琛等人，转移到柳北与当地的党组织联合，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何香凝、梁漱溟、陈劭先、陈此生、莫乃群、欧阳予倩、千家驹、张铁生、张锡昌等人，转移到桂东贺县、昭平。至此，持续了六年之久的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结束。

（三）中共广西省工委的重建及其工作方针的转变

中共广西省工委的重建

1940年8月，桂林八办作撤离准备时，指示中共广东省委派苏蔓回广西筹备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苏蔓回桂后，撤销中共桂林特支，建立中共桂林市委，罗文坤任书记。10月，苏蔓派王祥彻到玉林区工作，撤销中共梧州特支，建立中共玉林区特支，黄彰任书记。

12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①]派钱兴回广西，正式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钱兴任书记，苏蔓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黄彰任组织部部长，黄书光任青年部部长，罗文坤任妇女部部长。省工委机关设在桂林。

钱兴于1941年1月到任，2月间到南宁巡视，宣布将南宁特支改组为中共桂西南区特委，彭维之任书记，特委继续领导桂西南地区的党组织。钱兴还与特委成员分析研究了皖南事变后的形势，商定了新的斗争策略。他指示，

① 1940年1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撤销广东省委，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由方方任书记，广西省工委划归南委领导。

今后桂西党的工作，要以城市青年运动为主，适当布置一些农村工作；要大力开展中上层统战工作，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分子；要依靠群众，利用矛盾，对顽固分子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月，钱兴到玉林、博白等地巡视，宣布将中共玉林区特支改组为中共玉林区特委，黄彰任书记，领导桂东南区党组织。3月，钱兴到柳州，建立中共柳州市委，路瑶任书记。

1942年2月，钱兴派罗文坤到广东曲江，向中共南委汇报工作，南委组织部部长郭潜向罗传达南委指示：广西党组织由委员制改为特派员制，实行单线联系。钱兴为中共广西省特派员，苏蔓为副特派员（后来实际上仍称省工委），地区和市一级的党组织也先后取消委员制，改为特派员制。桂林市特派员张祖贵；桂西南区特派员黄书光，副特派员覃桂荣；柳庆区特派员路瑶，副特派员杨烈。1943年春，增设桂东区特派员和玉林区特派员，分别由黄嘉、吴家宜担任。

中共广西省工委重建后，除了对各地原有的党组织进行调整和改组外，还建立和发展了一些党组织。至1942年2月，新建立了中共平治县委、北流特支、龙州特支、明江爱店特支、钟山英家特支、武鸣特支和上思特支。

对桂系制造的一系列反共事件的处置

1942年5月中旬，中共南委组织部部长郭潜抵桂，领取中共中央南方局汇给南委的活动经费，并检查广西党的工作。20日，郭潜离桂，26日在广东韶关被捕，随即叛变，供出了中共南委和广西省工委领导人名单。南委机关被郭潜带特务进行破坏后，广西省工委失去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

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急电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主任委员黄旭初，令其立即着手破获中共广西地下组织。7日，国民党江西中统局特务庄尚之、叛徒郭潜等六人到达桂林。8日晚，特务首先逮捕了中共广西省工委外交通员梁耀宝，梁随即叛变，供出所知党员名单。9日，广西当局开始全面捕人，省工委副书记苏蔓、妇女部部长罗文坤、中共南委驻广西特别交通员张海萍等七人被捕。史称“七九事件”。

事件发生的当晚，省工委书记钱兴即采取紧急应变措施：通知桂林市所有与被捕人员有关系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一律撤退，撤到安全地方后，停止向外通讯；凡留恋职位、家庭、学籍而不愿撤退者，一律开除党籍；省工委机关只留个别干部处理撤退工作；派党员到柳州、南宁、玉林等地，通告桂林事件，要求各地党组织做好撤退准备工作。10日早晨，钱兴派黄嘉到桂林中学、广西大学，彭维之到桂林师院、被服厂、妇女会，陈盛年到柳州、南宁、玉林，通知党员撤退。钱兴亲自到省三青团部、省干训团等处，布置撤退工作。是日，大部分党员安全撤离。11日下午，留在桂林处理善后工作的彭维之被捕。苏蔓、罗文坤、张海萍被捕后，在敌人的利诱和酷刑面前坚贞不屈。桂系当局为放长线钓大鱼，于11日将他们"释放"，暗中派人监视。他们为了保护党的组织，于13日凌晨集体自缢牺牲。至9月1日止，有30余名中共党员在桂林及灵川、临桂等地被捕，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遭到了严重破坏。

7月11日，钱兴脱险后由党员肖雷护送，偕夫人邹冰（省工委秘书）从桂林转移到灵川县城三街镇隐蔽。他在灵川起草了《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派员到桂林及各地散发，揭露国民党特务和桂系顽固派的反共罪行。8月12日，钱兴从灵川启程，先后到桂林、平乐、钟山、梧州、桂平、贵县、玉林、宾阳、南宁、武鸣等地，继续布置全省党员撤退，指定黄彰为广西省工委代理副书记，同时着手建立新的交通联络系统。9月上旬，钱兴到达钟山县英家乡，在听取中共英家特支书记张赞周汇报当地的情况之后，详细考察了该乡白沙井村的环境，认为那里党的工作基础较好，也比较安全，决定将省工委机关转移到该村。10月上旬，钱兴偕邹冰由灵川转移到白沙井村。随后，陆续从各地抽调党员干部到英家，组成新的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接着，钱兴等人分头到各地联络"七九事件"后分散隐蔽的党员，重新建立组织联系。

桂林"七九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中统特务和广西当局继续在全省各地追捕共产党员。由于彭维之（原中共桂西南特委书记）被捕叛变，供出桂东南和桂西南地区的党员名单近百人，桂系当局派出大批特务在玉林、博白、陆川、北流、兴业、容县、灵山等县进行追踪。1943年1月13日，30多名中共党员和20多名进步分子被捕入狱，群生、三友、建国等进步书店被查封。15日，大批

军警包围《曙光报》社和南宁高中、南宁初中、三青团邕宁分团部、邕宁妇女会等十多个单位，逮捕了中共党员50多人。其后又在武鸣、宾阳、横县、龙州等县和邕宁县八尺区那莲乡，逮捕了中共党员28人，进步分子20多名。

玉林"一·一三"和南宁"一·一五"事件发生之后，1月21日，中共广西省工委以"中共桂委"的名义，再次发出《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揭露自上年"七九事件"以来，顽固反共分子残酷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制造白色恐怖的罪行；指出顽固反共分子的反动行径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如不从速制止，则"煮豆燃萁"之痛复现于国共两党之间，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祸害国家民族；申述广西共产党人竭力从事抗日救亡和广西建设的模范行动，声明此立场不变；要求广西当局立即释放被捕人员，撤销各地市县通缉令，制止恐怖事件再扩大，以国法制裁迫害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人的主谋分子，恢复被迫出走人员的职业、学业，并保障其生命安全。2月7日，中共广西省工委向全省党员发出《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全体同志书》，指出：反共逆流从桂林泛滥到了各地，顽固反共分子为了扑灭共产党，实现其一党专政独裁的迷梦，强迫中共党员"悔过"、"自新"，胁迫中共党员的家属、亲友劝降，并利用叛徒、特务，通过地方政权进行跟踪追捕，继续残酷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告诫和号召全体党员：无论局势如何严重，都要信守不渝地坚持党的政治主张和路线方针；要学习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位同志宁死不屈，以身殉党的革命气节，反对梁耀宝贪生怕死、叛党变节的罪恶行径；要坚决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发扬坚韧奋斗的精神；要严密党的组织，遵守秘密工作条例；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加强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要向各界人士普遍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和残酷迫害共产党人的事实真相。

在以上几次反共事件中，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失掉了和党的联系，他们分散在各地，利用各种关系隐蔽下来，一面积极寻找党组织，一面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博白县在"一·一三"事件中被捕的十多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在狱中坚持斗争，1943年4月7日晚，在中共博白县委的周密组织下，里应外合，成功越狱，转移到外地继续坚持斗争。

省工委工作重点的转移

在桂系制造的几起反共事件之后，中共广西省工委一面转移、隐蔽党员干部，一面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并根据情况的变化，采取新的斗争策略。

1943年春，钱兴通过在桂林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庄希泉，与当时属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党员张兆汉取得了联系。钱兴委托张兆汉向上级组织汇报广西党受破坏的情况，张即向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李亚群汇报。李亚群表示：同意把广西党的情况转报南方局，可以向广西党组织传达中央有关指示，双方组织不发生横的关系。张兆汉通过庄希泉的儿子、中共党员庄炎林，把李亚群的意见向钱兴作了转达。至此，广西省工委与南方局取得了间接联系。

3月15日至18日，中共广西省工委由代副书记黄彰主持，在武宣县通挽乡召开桂中南、桂西南部分党员骨干会议。会上交流了各地党的工作情况，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会议吸取几次事件的教训，决定把地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整顿右江老区，开辟越桂边界。会后，根据会议的部署，黄彰等继续留在来宾、武宣，杨烈等到靖西、镇边，区镇等到右江，覃桂荣来往于粤桂边和右江之间，路瑶到柳北。主要任务是整顿、发展党组织，开辟新区工作。这次会议是广西地方党工作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各路党员骨干按照通挽会议的部署，深入农村，深入山区、边区，深入群众，开展工作，开辟新区，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建立群众组织和革命据点，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

通挽会议后不久，钱兴获悉国民党特务已将搜捕中共党员的注意力，集中到桂东的平(乐)八(步)公路和梧(州)桂(平)水路一带地区，于是又将广西省工委机关从靠近公路的白沙井搬到较为偏僻、更便于隐蔽的牛垌。为了掩护党的工作，钱兴、吴赞之化名以叔侄相称，同当地群众上山割茅草烧石灰卖，开荒种地，当挑夫，做小贩，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斗争。省工委机关的其他工作人员，有的在私塾做教师，有的在寺庙当庙祝，有的帮人打工，克服了重重困难，与农民打成一片，终于在这个地区站稳了脚跟，隐蔽了下来。半年后，因国民党平乐区专署要在牛垌办农场，广西省工委机关复迁

回白沙井村。

1944年7月，中共广西省工委在钟山英家举行“七九事件”两周年纪念活动。这次活动通过回顾总结，肯定“七九事件”两年来广西党组织深入农村，坚持斗争所取得的成绩，教育全体党员继续坚持党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在农村做好群众工作，号召全体党员学习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烈士为党献身的崇高精神，坚持革命斗争。1945年8月中旬，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将省工委机关，由钟山县英家迁至昭平县黄姚镇黄姚中学，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1942年桂林“七九事件”后，广西党组织从城市撤退到农村，经过两年埋头苦干，为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到1944年底，党员总数已恢复到“七九事件”前的900多人，建立了4个县委、17个县特支，另有近10个县、市新建了30多个支部。加上南方局派到广西工作的党员和粤北省委撤退到广西隐蔽的党员，以及当时属广东的钦廉地区的党员，广西全省各个系统的共产党员约1400人。

钦廉四属党组织的斗争和从广东转移来桂党员的活动

194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为了在钦廉四属和桂南地区开展敌后斗争，建立粤桂边抗日游击根据地，成立了中共粤桂边工委，周楠任书记。不久，日军从钦廉和桂南地区撤走。翌年1月，广东省委决定撤销粤桂边工委，钦廉四属划归中共南路特委领导，周楠任南路特委书记，特委常委杨甫常驻合浦，领导中共合浦中心县委（辖灵山特支、钦县特支、防城特支）工作。

1943年3月，为了加强秘密工作，防止敌人破坏，中共南路特委一方面组织已经暴露的党员和干部撤退隐蔽，一方面缩小组织目标，撤销了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及其所属钦县、防城、灵山等县特支以及合浦各区区委，分设钦县、防城、灵山特派员及合浦各区特派员，由杨甫兼任钦廉四属特派员，领导四属党的工作。是年夏，杨甫在合浦县城廉州镇开了一间“永信烟庄”，作为党的联络机关。1944年夏，日军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军事行动，逼近两广。杨甫根据上级指示，着手发动群众，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9月22日

凌晨，国民党特务包围永信烟庄，捕去党员和进步分子3人，杨甫化装脱险。与此同时，灵山县国民党当局也派兵逮捕进步分子，搜查协隆号，包围萍塘村，该县地下党同志事先得到消息，早已转移。事件发生后，特委停止了钦廉四属党的组织生活，上下级党组织之间只保持工作上的联系。12月，特委派阮明负责处理这一事件。经查明，事件是由于杨甫遇上熟悉他的特务，没有及时采取应变措施造成的。

当时在南路活动的，还有桂林“七九事件”和南宁“一·一五事件”发生后，从南宁撤退到钦县的广西党组织的党员，他们于1943年夏建立了中共南路特支，书记康浪平。特支有党员10多人，他们在钦县的长滩、小董、大寺、贵洞和防城、上思等县的农村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945年2月，康浪平根据桂西南区特派员覃桂荣的指示，返回邕宁县八尺区那莲乡组织抗日武装，后被反动分子杀害。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广东的党组织也陆续派一些党员到广西活动。1940年冬，中共广东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派几名党员到中越边境的靖西、镇边一带秘密活动，成立了中共平孟支部。1942年6月，原属广东党组织领导的党员罗培元，应邀到柳州任《柳州日报》编辑室主任。该报原来有中共柳州市委领导的支部，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系中共党员。桂林“七九事件”发生后，报社中广西系统的中共党员撤离，罗培元未暴露，不久被任命为报社总编辑。罗陆续从广东等地邀请了张琛、邓楚白、司马文森等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到报社工作。1943年6月，罗担任报社社长，各部门的要职也由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罗培元等联系和团结社会力量，利用该报宣传抗战、团结、进步，并为接济和掩护过往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做了许多工作。1944年11月，柳州沦陷，该报社撤到融县、罗城等地继续出报，报社内成立了中共特支，下辖各分社、分销处、警卫处党支部以及一些单线联系的党员。1944年初，中共广东后北江副特派员魏南金到桂林寻找上级党组织，但没有找到。9月，魏到平乐中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组织进步学生和职工成立秘密读书会，与疏散到平乐的桂林文化供应社、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中的一些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联系，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四、党领导和推动的广西敌后抗日游击斗争

（一）日军第二次侵桂和省工委的“八月决定”

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捷报频传，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为了挽救败局，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发起一场气势汹汹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其目的是急谋建立一条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运输线，破坏设在我国华中、华南的中美空军基地，并以中国为基地作垂死挣扎。为此，日军先后投入51万兵力，战火殃及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6省。

4月18日，日军开始进攻河南，得手后继续南侵，6月17日占领长沙，8月陷衡阳。其后，日军8个师团又2个半旅团，约16万兵力，从湖南、广东两面进攻广西。

守卫广西的国民党第四战区部队，原来只有桂系两个军。经多方征调，来桂的国民党军队共有10个军的番号，加上地方部队，共12万余人。广西当局也采取了一些迎战措施，恢复废弃了5年之久的民团制度，从省、专区到县，设立民团指挥部。但是，国民党军各部队为着自身利益，争相保存实力，消极抵抗。在日军的猖狂进攻面前，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但又压制人民的抗战要求，防共重于抗日。当局组织的民团、自卫队，多由地主、官僚、兵痞把持，日军未到，这些人携家先逃，基层政权大多瘫痪。

9月11日，日军第十一军从湖南入侵广西。驻广东的日军第二十三军，分三路沿西江向广西推进，22日占领梧州，10月1日进占桂平。26日，桂北日

军5个半师团分六路发起进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桂北各县相继沦陷。11月1日，日军包围桂林，又以第三、第十三师团南下奔袭柳州。这期间，国民党爱国官兵在桂平一带反击日军，在桂林进行顽强的保卫战。桂林防守战至为壮烈，官兵阵亡5565人，被俘13151人。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师长阚维雍、军参谋长吕旃蒙殉国。11月10日，桂林陷落。同日，柳州失守。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率残军退守宜山。日军追击，14日占领宜山，21日突入金城江，22日占领河池。其时，在河池、南丹的难民20多万人，在公路上挨饥受饿，日本飞机低空扫射，日军跟踪追杀，百姓死伤累累。这时，蒋介石才把驻在黔南的第九十二军开入广西，但仅打了两天，就溃散了。11月26日，南丹丢失。日军分两路打进贵州省，12月2日，陷独山，4日，撤退到河池固守。

日军不等黔桂线战事结束，便在桂南、桂西发起攻势。11月21日，从贵县进占宾阳。24日，南宁沦陷。紧接着，盘踞在越南的日军，派一特编支队3000人，于11月28日，分三路侵入镇南关、龙州、宁明。南宁日军派1个联队向邕龙公路推进，两股敌人于12月10日，在东门镇会合。至此，日军完成打通大陆干线的作战任务。

此后，留守广西的是日军第十一军统辖的4个师团又1个旅团，约10万人，军部驻柳州。日军的占领区，大体是湘桂铁路、黔桂铁路、桂越公路沿线和西江沿岸，包括桂、柳、邕、梧4市和54座县城及一部分圩镇，约占广西面积和人口的2/3。国民党广西省府从桂林退到宜山，经都安、百色，退到凌云、乐业，只保有桂西和桂东、桂南30多个县。

日军在其占领的地方，极力收罗地痞、流氓、土匪、恶棍，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的民族败类，组织“维持会”。维持会的汉奸为虎作伥，欺骗人民回城当“顺民”，强制人民领“良民证”，为日军刺探情报。同时派丁拉夫，勒收捐税，搜刮粮食、物品和妇女，供日军享用淫乐。由于人民的抵制，回城的人不多，日军也无法成立全省或地区性的伪组织。已成立的伪组织，不断受到抗日军民的打击。

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屠杀。据战后调查统计，日军

在广西抢夺的谷米杂粮共1738万担，耕牛48万头（占全省耕牛的1/3）；广西人民被杀21.108万人，受伤43.3823万人，染病死亡28.3225万人，失踪5.8456万人，被毁房屋31.4394万间。[①]桂林市全城原有房屋47359间，战后只剩下471间，绝大部分被毁，柳州市被毁约95%，梧州、龙州大半成为焦土，全省无家可归难民240万人。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具有反侵略传统的广西人民的坚决反抗，群众性的抗日武装斗争蓬勃兴起。

中共广西省工委的《八月决定》

1944年7月，中共南方局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王若飞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派原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李亚群专程到广西。李亚群到柳州后，将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及党的决策向左洪涛、张兆汉作了传达，然后通过张兆汉，向中共广西省工委的政治交通员庄炎林转达南方局对广西党组织的指示。南方局的指示说，日军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最后挣扎，国民党军为保存实力将不战而退，广西即将沦为敌后。因此，今后应按实际情况布置工作，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宣传抗日保卫家乡，组织抗日武装队伍，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党内同志能上山打游击的，就上山打游击。南方局还要求广西省工委适时再派人到重庆找南方局直接联系。庄炎林火速赶回钟山县英家村，向省工委书记钱兴报告。

中共广西省工委得到南方局指示，明确了斗争的方向。8月，省工委根据党中央、南方局的指示精神，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作出了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决定，即《八月决定》。

《决定》提出，广西党组织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了建立抗日武装”，“一切为了发展游击战争”。要求全省各地党组织，揭露国民党不战而退的政策，揭露桂系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行为，动员广大群众进行抗日保家乡的武装斗争，作好干部、武器准备，到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决定》还提出，为了避免桂系当局的打击，应参加桂系组织的各种武装，从中争取领导权，搞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当地父老绅士支持；在部队中建立政工组织，作

① 广西省政府1946年编《广西省抗战损失调查》报表。

好思想政治工作。《决定》对广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最高要求，是建立与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省工委认为，桂东北、桂东南是日军入侵广西的要道，我党的力量也比较强，有创造根据地的条件。因此，省工委把主要力量集中于这两块地方。考虑到广西沦陷后交通隔绝，联系困难，省工委分工由书记钱兴负责桂东及桂东北，代 理副书记黄彰负责桂东南。同时，要求各特委、县委、特支、支部，根据情况独立作战。省工委派黄嘉（桂东特派员）到桂东，肖雷（桂北交通员）到桂北，庄炎林到柳州地区，黄彰在桂东南，向各县委、特支、支部传达《决定》精神。

（二）党领导和推动的广西各地抗日游击斗争

在桂系顽固派的残酷镇压下，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面临人民受难、民族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肩负起领导人民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按照中共广西省工委的部署，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武装斗争。其中，有的是中共组织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有的是由中共组织建立和领导的队伍，使用国民党地方武装的番号，但不公开党的领导；有的是中共组织派党员和进步分子进入国民党的政权和军事部门，取得抗日武装队伍的部分领导权，或在其中起重要的作用。

桂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斗争

桂东北地区以桂林为中心的10多个县，湘桂铁路纵贯南北，是广西进出华中的走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1943年，省工委就派遣党员加强了这个地区的工作，在部分县建立了特支、支部。1944年6月，日军进攻湖南，省工委估计桂北将成为前线，即部署湘桂铁路沿线的党组织准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并动员兴安、全县、灌阳在外地求学的学生返回家乡，准备参加斗争。省工委作出《八月决定》后，为了创建桂东北抗日根据地，钱兴亲自运筹策划，

在桂东北地区先后创建了几支抗日武装队伍。

桂东北人民抗日纵队临阳联队

1944年9月，疏散回乡的进步学生赵志光按照党的布置，在阳朔县兴坪动员本村青年和逃难来的知识青年组织抗日宣传队，向群众作抗日宣传。11月，吸收一批从桂林突围出来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和几名越狱出来的中共党员，共30多人，10多支枪，改名为兴坪战时服务队，亦文亦武。当时，流窜在敌后的国民党桂林区民团指挥官要强行收编这支服务队，该队被迫化整为零。稍后，桂北党组织通过做阳朔县自卫大队大队长的工作，得到30多支枪和4箱子弹，进一步把服务队武装起来。钱兴决定以这支队伍为基础，把中共党员陆支礼组织的平乐游击队20多人调来，一起组成由省工委直接领导的、以海洋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一支武装力量。接着，抽调一批党员骨干到桂东北，任命黄嘉为中共桂东北特派员，肖雷为副特派员，负责组织领导这个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

1945年2月20日，临阳联队成立。联队长黎偶章，政委黄嘉，副联队长赵志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雷。全队200多人，150多支步枪，3挺轻机枪。仿照新四军的建制，联队编为2个大队和1个民运队，设立5个党支部。5月28日，以中共桂东北特委的名义发表宣言，公开宣布临阳联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临阳联队独立自主，战斗在漓江两岸，活动范围为阳朔、临桂、荔浦、平乐等县，建立了兴坪区天顺乡、大源乡、亨庆乡的抗日民主政权，形成了临阳抗日根据地。联队还成功地收编了当地由广东潮汕难民组成的武装，壮大了力量。在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期间，临阳联队对敌作战11次，毙伤日军30多人，俘顽军40多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长短枪250多支，击沉日军运粮船4艘，击溃船队3支。副联队长赵志光等6人在斗争中英勇牺牲，赵志光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联队的主要战斗有：1945年4月5日，捣毁了勾结日军的秦姓恶霸的老巢蓬山，歼灭顽军4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3挺。5月中旬，夜袭牛尿塘，击沉日军运粮船2艘，毙伤日军10多人。6月下旬，在平乐附近河口伏击日船1艘，全歼船上日军10多人。7月13日，在

古座塘背水作战，击破顽军500多人的围攻。临阳联队发展到300多人枪，纵横于敌顽之间，声威远播，人民爱戴，是桂东北地区最坚强的一支敌后抗日武装。

潞江抗日自卫队和灵川政工队

1944年7月，中共灵川特支根据省工委的指示，着手训练干部，筹集武器，准备一旦沦陷，便在漓江两边的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同时组织桂林师范学生暑期宣传队到兴、全、灌，开展抗日宣传，察看地形，加强同当地党组织的联系。8月，衡阳失守，桂北成了前线，灵川特支即集中30多名党员和进步分子，成立潞江抗日自卫队，队长全昭毅（中共党员），指导员阳雄飞（特支书记）。另派党员到河东镇义山区组织武装。10月末，灵川沦陷，吴腾芳（特支副书记）向国民党灵川县长建议组织武装队伍，抗击日军，保卫家乡。得到同意后，成立了灵川政治工作队，吴腾芳任队长，全昭毅任副队长，并得到县长拨给的经费和枪支子弹。政工队以桂师暑假宣传队为基础，吸收当地青年参加，设政工、民运、宣传、游击等组，还应邀派出5人到县自卫队担任指导员。

这两支由党秘密领导的抗日武装，同日军作战10多次，歼灭日军70余人，缴获步枪数十支，多次打退日军对路西山区的进犯。1945年4月，政工队30多人在灵川甘棠的岭尾渡设伏，全歼日军一小队14人。政工队还摧毁了北障乡的伪政权，捕捉了灵川县维持会副会长等一批汉奸。还出版了油印的《民众周报》。

1945年春，临阳联队准备北上开辟海洋山根据地，灵川特支决定将队伍向东发展，与之配合。经向灵川县长建议并得到同意，即在镇义乡设立东区办事处，在潞江山区建立北障、南藩两乡联合办事处，由中共党员掌握了几个乡政权。当时，桂林区民团副指挥率部闯进镇义区抢地盘，阴谋消灭政工队。政工队英勇反击，赶跑了顽军，缴获了2挺轻机枪。到日军撤出广西时，这两支部队发展到280人，向桂林东郊逼进，并首先开进灵川县城。

全县、灌阳的7支抗日游击队

1944年六、七月间，全县、灌阳党组织在大田召开会议，布置党员和进步青年回本乡发动群众，组织乡、村抗日自卫队，并把外籍干部和铁路西边的干部调到全县南部和灌阳集中待命。8月，省工委交通员肖雷来传达《八月决定》，宣布成立中共灌阳特支，邓崇济任书记，确定全灌地区宜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利用公开合法名义，掌握抗日武装的领导权。后通过灌阳县长的关系，成立了灌阳抗日政工队、立田抗日自卫队，两队共60多人。全县党支部成立了恩德区自卫联队第二中队、独立中队、东山政工队、全县学生宣传队、石塘抗日独立中队，5个队共260人。这7支队伍，都是由中共党员和党员发展对象担任领导。立田自卫队是用红军留下的50支枪武装起来的。全灌抗日武装与日军作战23次，毙伤日军40多人，缴获一批武器和物资，保护了群众的生命财产。这些抗日武装，积极协同友军作战，迫使日军撤出寨屋、马头两个据点，使国民党全县县政府得以在东山立足。他们还频繁袭击全灌公路，致使日军运输中断。1945年3月9日，日军被迫从灌阳撤回全县。在斗争中，特支副书记文良儒英勇牺牲。

在桂东北地区，还有中共党员于1945年1月组织起来的，有20多人的修仁县十锦乡抗日自卫队。该队在保护群众、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

1945年7月，日军撤出广西，国民党汤恩伯第三方面军追击到桂北。省工委获悉国民党军队阴谋消灭临阳联队的消息后，急令桂东北的抗日武装化整为零，保存革命力量。临阳联队将战士疏散回家，干部分批向桂北、桂东转移。灵、全、灌以统战面目出现的抗日武装则从容解散，掩埋武器，安排人员转移。

柳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斗争

柳州北面的柳城、融县、罗城、三江等县，连接湘黔边，山高林密，融江纵贯其间，为柳州的屏障。日军为了警卫柳州和黔桂线，分兵占领柳城、罗城、

融县等县城和少数据点，向湘西、黔南警戒。这时，国民党的地方武装还在争权夺利，抢粮抢地盘。共产党人则挺身而出，领导人民抗战。

柳州沦陷前，中共桂林文化支部书记司马文森率领一批桂林文化界党员和进步青年疏散到柳州，以《柳州日报》社长罗培元为首的一批从广东转移来的中共党员也驻足柳州。这两个党组织根据南方局的指示，都打算到柳北山区打游击，寻找当地的党组织合作。当时，中共融县特支正在贯彻省工委的《八月决定》，工作有了一定基础。三方党组织为了共同的目标，于1945年1月在融县成立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由罗培元总负责，统一领导柳北地区的抗日斗争。融县特支负责发动群众，抓武装斗争；《柳州日报》特支和桂林文化支部负责宣传、统战工作。在内部，三个系统保持相对独立。在桂北临时工委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几支抗日武装。[①]

融县抗日挺进队

1944年12月，司马文森以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的名义，找融县县长陈述发动群众自卫的道理，建议组织武工队，并表示可动员桂林文化界青年参加。县长同意给予“融县自卫队第二分队”的番号，拨给轻机枪1挺，步枪20支，编制30人。该队以文化支部的杨繁、何谷为正副队长，卢起为融县系统的党支部书记，杨繁为外来党员的支部书记。12月15日，日军再占融县，县政府迁入深山，该队则自行转到县南水陆交通要冲的永乐，宣传发动群众，扩大武装。

1945年2月上旬，第二分队得到情报，有一支日军和汉奸武装用13艘木船组成的船队，从古顶运载3万多斤食盐上融县，于是在大扁洲设伏，将敌击溃，缴获木船9艘，食盐2万多斤。这些食盐除留5000斤作军用外，其余分给群众。这一仗，鼓舞了群众，青年们踊跃携枪参军，使该队壮大到100多人枪。为了摆脱国民党羁绊，2月19日，队伍改称“融县抗日挺进队”，代号“北斗”，编为一个政工分队和两个武装分队，独立自主进行抗日斗争。日军遭伏击后，伺机报复，顽军也仇视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多次威迫挑衅。挺进队

① 罗培元：《抗战结束前后柳州日报社的斗争与活动》；路璠：《简谈柳北联合工委》。

团结抗日友军，发动群众组织自卫队，保卫南区。3月初，日军到罗龙等村抢去耕牛200多头，挺进队立即追击，夺回耕牛，归还失主。中旬，日军又出动100多武装和200多人的“箩筐队”，企图洗劫东华一带村庄。挺进队奋起迎击，在友军支援和方圆数十里群众支持下，把敌伪包围在两个小村里。入夜，敌人抛弃掠来的耕牛、粮食，抬着尸体和伤员突围逃回县城。从此，挺进队军威大振，扩大到7个分队800人枪，拥有轻机枪8挺，成为柳北地区抗日武装的一支劲旅。

融县抗日挺秀队

1945年元旦，桂北联合工委派融县特支副书记莫矜率3名党员，到融县北部建立抗日武装，开辟新区，并抽调三江县的党员干部和挺进队的武装骨干去支援。2月下旬，成立“融县抗日挺秀队”。队长黄略（爱国人士），指导员莫矜，辖浪保、昆安、西隅3个分队，分队长均为共产党员，共100多人枪。5月下旬，浪保分队在浪溪河小片伏击向桂林撤退的日军，打死打伤日军20多人。接着围攻逃往盘安乡一带的融县长安镇维持会保安大队残部，伪保安大队长被迫率20多人缴械投降。

柳州日报社警卫队

《柳州日报》原是国民党桂北行署的机关报，报社从柳州撤退到柳北时，社长罗培元要求桂北行署主任尹承纲借枪保护报社的机器物资，尹3次批准拨给枪械50多支和弹药一批，并供给粮饷。1945年1月，以报社职工为主体，在罗城县龙岸成立“桂北行署直属队”，对内称《柳州日报》社警卫队。队长罗培元，副队长骆维强，指导员陈光（三人均为中共党员），全队60人枪，队内设中共党支部。该队活动于罗城的黄金、寺门，融县的和睦，柳城的龙头、大埔、太平等靠近日军占领的地带，多次参加阻击日军的战斗。报社还在上述各地，设立了10多个分社、分销处、办事处，成为党的工作据点，在团结教育敌后的人民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镇国政工队

日军进攻柳州时，桂系第一八八师第五六三团在柳城被冲散，部分官兵流落到罗城。司马文森看到该团长好大喜功，也有抗日热情，便鼓动他扩大番号为纵队，代号为“镇国师”，自任司令，并聘用司马文森为政治部主任。1945年1月，在罗城龙岸成立“镇国政工队”，从中共桂林文化支部抽调党员郑思、吉联抗到该队，先后任队长，司马文森任指导员。队员从30多人扩大到50人，多是柳州中学、龙城中学、融县中学和广西大学的师生。队内设武装组（10人枪）、学习组、宣传组、生活组，成立中共支部。

镇国政工队活动在罗城的龙岸、板丈，融县的永乐、和睦，柳城的古砦、冲脉、六塘等地，进行文艺演出和抗日宣传。还到各村组织自卫队站岗放哨保卫家乡，帮助群众搞春耕。武装组参加了寺门阻击战，保卫龙岸、黄金产粮区的安全。

桂林师范战时服务团

桂北沦陷后，桂林师范学校迁到融县北部三防圩上课。1945年2月，柳城县长陈如平（民主人士）、民团副司令张镇道（中共桂北联合工委成员）、主任秘书覃景秀（中共党员），邀请桂师派师生到柳城前线参加抗战。学校党组织征得校长汤有雁同意，组成桂林师范战时服务团，蔡纯华任团长，李文松（中共党员）任指导员。全团40余人，编为一个文艺队、两个战斗班，开赴柳城县府所在地古砦，县政府授给该团“县督察队”的名义，拨给枪械弹药和给养。此后，服务团武装班积极参加抗击日军的战斗，文艺队深入集镇进行文艺演出，到村屯发动群众，帮助建立自卫队。

1945年5月下旬，日军准备撤出柳州时，其驻长安镇的部队将抢夺的粮食、物资和妇女，装满23艘木船，从长安镇沿融江南下运往柳州。融县挺进队、柳城游击队、各地自卫队等抗日武装联合行动，沿江抗击，击沉、俘获敌船多艘，缴获大米6万多斤，救出100多名妇女，残敌败退入柳城困守待援。融县挺秀队也在日军撤退时冲入敌据点富乐镇，收缴大批食盐、粮食和军用品，

部分充军用，部分救济群众。

日军撤走后，国民党威胁抗战有功的挺进、挺秀队交出武器。中共桂北联合工委审时度势，决定将《柳州日报》警卫队、镇国政工队宣告解散，其成员返回原单位工作。挺进队、挺秀队化整为零，把坏枪还给融县政府，群众支援的枪支还给群众，自己筹集的枪支收藏起来，外来人员离开，农民战士回家，知识分子安排读书或教书，武装骨干分散隐蔽活动。

其他地区的抗日游击斗争

除桂东北和柳北地区外，由中共组织领导或共产党员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抗日武装斗争在其他地区也十分活跃，主要有：

柳江青年抗日挺进队

桂柳疏散时，柳江县的一批进步学生，接受中共党员罗培元、张镇道的指点，回到家乡流山、洛满、成团、三都等地，组织小队抗日武装，夜袭敌营，伏击小股敌人，出版油印小报，使群众受到很大鼓舞。1945年初，这些小队抗日武装，联合起来成立柳江青年抗日挺进队。后队伍扩大到150人，有轻重机枪各2挺，编为大队。青挺队活动在黔桂线与邕柳公路的夹角地带，曾在柳宜、柳邕公路上9次袭击敌军，毙伤日、伪军数十人。

宜山、忻城边的抗日武装

柳州沦陷前夕，中共党员莫加星在马驷乡，与当地的进步青年组织抗日游击队，后成立了马驷乡抗日联合会，推莫加星为会长，各村成立分会，有800多会员。1945年1月5日，马驷乡游击队在达烂坳口伏击日军，击毙日军官伊藤及士兵2名，缴获长短枪各1支。莫加星将马驷、欧洞、思练3支队伍联合起来，取名“第四集团军抗日别动队二支队”。2月28日，该队在柳宜公路那借坳伏击日军军车，缴获轻重机枪12挺和一批军用物资。3月中旬，在忻城县城成立“柳庆区抗日游击司令部”，辖15个大队1500人枪，中共党员王诚与莫江白（后入党）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司令部指挥各大队，围攻都、宜、忻边16个日军据点，3个月内，战斗20次，毙伤敌数十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马驷乡游击队也攻下3个敌人据点。6月中旬，日军被迫全部撤退。

都安、宜山边的抗日武装

1944年11月中旬，宜山、忻城、河池相继沦陷。经都安中学几名中共党员发动，在都安拉烈建立了一支13人的武装小组，在宜山北山建立了30多人枪的队伍，在宜山永定乡建立了60多人枪的队伍。在夷江，由土地革命时期的两名老红军为首，建立了两个乡的自卫队。这些队伍建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不断袭击敌人，攻下京口日军据点和加贵、拉烈、北山等七八处日军哨所。

中共河池特支领导的抗日武装

1944年7月，中共桂西区特派员覃桂荣派区镇到河池工作，9月建立中共河池特支，罗恒新为书记。1945年2月，区镇以县政府民政科科员的身份，在下坳召开下坳、光隆、保平、城区等乡镇长会议，达成了“如果日寇再来侵犯，三乡协同作战”的协议。会后，在长老乡、光隆乡和华山城区先后组织了抗日自卫队。光隆乡自卫队建立了中共支部。这些由党发动建立的抗日武装，在当地放哨联防，组织群众疏散，保护人民生命财产。4月，一股日军从宜山龙头进犯光隆，抢劫财物、粮食。光隆乡自卫队坚守两个岩洞，打死日军2人，伤3人。日军被迫撤走。

横县、贵县的抗日武装

横县县长张树春坚持抗日，比较开明，中共横县县委派了一批党员和进步分子进入县乡一些部门工作，掌握了县战时工作队，队内建立中共支部，有些党员当了乡长、校长。经过艰苦工作，把群众的械斗武装改造为抗日武装，各区、乡、村纷纷成立自卫队、突击队、敢死队。

1944年12月，日军派遣一支由15艘木船组成的运载武器弹药的船队，从梧州上驶南宁。中共贵县、横县两县县委互相配合，组织抗日武装1000多人，协同两县民团沿江阻击日军船队，激战7昼夜，击沉敌船4艘，缴获9艘，歼敌大队长渡部一郎中佐以下约80人，俘日军1人，汉奸4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34支，手榴弹450枚，以及大批弹药和文件、地图等。

1945年1月，400多日军侵入横县，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群众进行抗击，在四排岭把日军包围了3昼夜。日军步骑兵700多人，带多门火炮赶来增

援，才得解围。日军进入县城后，横县自卫队司令部调集自卫队包围县城，日军不敢久留，被迫退走。此役横县共组织了4300多人参加战斗，苦战8昼夜，毙伤敌百余人，缴获枪支、弹药、物资一批。

武宣、桂平边的抗日武装

1945年1月22日，日军一支船队从武宣出发下梧州。中共武宣县东乡党支部连夜组织一支抗日义勇队，赶到黔江北岸红石矶伏击，并派人联络南岸的桂平县武平里各村青年100多人，协同作战。25日晨，5艘满载日军的驳船、12只橡皮艇驶下时，两岸抗日武装歼敌一部，击毙其宪兵队长向井立夫。我方6人牺牲，5人受伤。

宾阳县的抗日武装

宾阳沦陷时，国民党宾阳区民团指挥官梁瀚嵩将指挥部迁到上林县镇圩，指挥宾阳、上林、那马、隆山、都安、武鸣等县的民团武装。他接受中共党员的建议，派指挥部主任秘书周可传（中共党员）等到宾阳东区双桥组织临时县政府，建立了县自卫大队，有七八十人枪，轻机枪4挺。临时县政府任命一名当时失去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为三光乡乡长兼自卫队长，有30多人枪。这两支武装，在东区多次伏击宾贵公路的日军运输队，取得不少战果。

在北区，由中共党员推动组织的抗日同盟会，建立了抗日自卫队，有30多人枪。1945年1月5日，日军第三十七师团60余人押送物资从迁江南下，夜宿邹圩长车村。中共党员率自卫队和武装群众100多人，乘夜杀入村中，当场击毙日军大尉、少尉以下8人，击伤6人，缴获弹药、文件、药品100多箱，内有该师团南进作战计划，以及西南各省军用地图等机密文件。经层层上送，得到国民政府军委会奖给银元5万元。

在南区，一些共产党员也组织了抗日筹备会和抗日自卫队。1945年三、四月间，几位中共党员和原学生军战士，组织南区四乡青壮男子，两次围攻武陵圩几个昼夜，日军伤亡多人，后在夜雨中突围逃走。

上林县的抗日游击武装

在周可传、梁宁（中共党员）等具体指导下，上林组织了巷贤青年抗日自卫队、宾（阳）上（林）迁（江）抗日义勇队、北区抗日自卫队等抗日武装，共200

余人。1945年3月，驻宾阳的日军夜袭巷贤圩，巷贤乡自卫队冲进圩内增援，各村自卫队在外面包围，日军伤亡多人，丢物弃尸而逃。4月下旬，驻上林的日军向宾阳撤退，巷贤自卫队进行截击，抓获并处决了上林县维持会长。4月，宾上迁义勇队在邹圩东桥夜间伏击，击毁日军汽车2辆，击坏8辆。4月下旬，又在恭村、狮螺桥截击从上林往宾阳撤退的日军。四、五月间，北区自卫队调集各乡自卫队先后攻打日军中心据点古蓬、北栏村、红河渡口，共歼敌20多人。日军乘雨夜偷渡红水河逃回忻城，上林北区全境光复。

武鸣邓广抗日义勇队

1944年11月22日，日军占领武鸣县城。中共武鸣特支书记韦宗遗等人到城东的邓广乡夏黄村活动，于1945年2月成立了武鸣邓广乡抗日义勇队。全队120多人，先后对日军进行了香山水坝伏击战、夏黄渡口阻击战、夏黄村巷战等多次战斗，毙伤日军多人（内有军官1名），缴获步枪1支及军用品一批，追回耕牛10多头和大批食物，捕杀汉奸5名。

据统计，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期间，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领导和由中共党员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抗日武装，共有20多支约2000余人。这些抗日武装，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真诚地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抗日，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他们活跃在广西20多个县，共打死打伤日、伪军约1000人，击沉敌船60艘，缴获各种枪械数百支，弹药2万余发，及大批军用物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的武装斗争准备了有利条件。

（三）党发动的抗日武装起义

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由于兵力不足，只能占领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在桂东南和广东南路，存在一块面积颇大的国民党统治区。这里有国民党的地方政权，但没有其正规军，敌情严重，随时都有沦陷的可能。这些地区国民党

的政权不但不积极抗日，而且对中共组织领导的抗日活动常常进行阻挠和压制。在这种特殊条件下，钦廉四属和桂东南地区的中共组织不得不领导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钦廉四属抗日武装起义

钦廉地区在中共广东南路特委的领导下，经过几年艰苦工作，积聚了一定的革命力量，1944年冬共有党员400多人，联系着大批进步分子和工农群众，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坚力量。是年12月，日军独立第二十三旅团一部约1000人，分几批从南宁经钦县、合浦返回雷州半岛，国民党军警让开大路，专署、县府逃避，日军得以从容掠夺物资，奸淫妇女，安然通过，人民对这个仇内怯外的政府完全失去信心。

1944年3月，中共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工作。同年夏，南方局指出，日军很快就打通湘桂铁路，两广将成为敌后，要周赶快回去大力发动武装斗争。12月，周楠召集钦廉四属联络员阮明、政治交通员谭俊，传达南方局的指示，并宣布特委决定，于1945年春节前后，全面发动抗日武装起义。1945年1月，阮明、谭俊将南路特委的决定传达到钦（县）、廉（江）、灵（山）、防（城）4县党组织，并在白石水老区设立武装起义指挥中心，阮明任总指挥。经过短期准备，连续发动了合（浦）、灵（山）、钦（县）、防（城）4县的抗日武装起义。

合浦起义

1945年1月，中共南路特委决定，建立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支队，任命张世聪为支队长兼政委。2月3日，合浦南康区40多人参加夺枪起义，指挥员张义生等5人光荣献身。2月7日，南康、白石水、公馆、白沙等起义部队200多人集中到金街，编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支队合浦大队，大队长李世益，政委陈明景。队伍攻下白石水和张黄两镇以及1个物资仓库。7日晚，小江起义部队400多人分头袭击国民党顽军和物资仓库，与龙门起义部队30

多人合编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支队小江中队。3月12日，西场起义部队70多人，全歼西场镇自卫队和警察90人，编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支队西场大队。大队长王克，政委包恭。3月中旬，国民党维安乡自卫队30多人起义，编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支队灵南中队。以上合浦县的起义武装共有900人，编为2个大队又2个中队。这支武装共攻下乡镇据点9处，缴获轻重机枪各1挺，长短枪200多支及一批弹药物资。

灵山起义

灵山县党组织负责人陈铭金接到南路特委的通知后，进行了传达和准备，秘密部署新圩、乐水、官洞、司练、钟灵、平山等地700多武装人员集结，编为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灵山大队，总指挥陈铭金。1945年2月8日晚，灵山大队袭击灵山县城，因走漏消息，被县长捕杀10人，攻城失败。次日起义部队撤退。15日，起义部队到钟灵整编待命，灵山县长纠集自卫大队和民团1500人追到，起义部队与群众一道奋起迎战数天，击毙顽军数十人。23日，钦廉四属起义总指挥阮明从白石水到灵山指导工作，途中被捕杀害，起义失去统一指挥。3月2日，灵山大队开赴白石水与合浦起义部队会合，留下的少数人在钟灵领导群众坚守村庄，与数十倍于己的顽军激战。后因弹药耗尽，村庄被敌攻破，30多名群众被捕，数人死在狱中。3月下旬，爱国人士梁振威率30多人携枪起义加入灵山大队。

南解二支队增援合灵起义

为了支援合浦、灵山起义，中共南路特委从雷州半岛抽调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800多人，由司令部参谋长李筱峰、支队长黄景文率领，开赴合浦白石水。第三支队长兼政委张世聪随部队返回钦廉领导武装斗争。2月中旬，南解二支队和合灵部队连克旧州、白石水、马栏、龙门等乡，挺进合浦、博白边界，打开了局面。

此时，顽军广东保安第九团从雷州半岛跟踪追来，各县乡反动武装亦加

强“剿匪”和“联防”，退到桂西的国民党军第一五五师两个团置日军于不顾，绕道到合灵镇压抗日武装。3月24日，二支队在武利江谷埠背水作战失利，黑夜撤退过河，大队长洪荣等27人掉下急流牺牲。部队转往西场、钦东，又被顽军追堵，活动困难。4月间，南解二支队和合灵部队200多人，从海陆两路撤退到雷州半岛坚持斗争。张世聪被任命为钦廉四属联络员兼军事特派员，率黄河大队和合灵留守部队继续坚持斗争。顽军“围剿”白石水山区，砍林搜山，并村围闸。张世聪率黄河大队和民兵与之周旋。5月6日，顽军围攻大窝山，激战1天，因力量对比悬殊，张世聪等13人在作战中英勇牺牲。谭俊继任中共钦廉四属联络员兼军事特派员。6月上旬，灵山和小江部队280多人，因环境险恶，与上级失去联系，遂西进十万大山。部队到达钦邕灵边境时，被地方反动武装袭击围堵7昼夜，损失严重，又退回灵东南坚持斗争。

钦县小董起义

1945年1月，钦县党组织负责人卢文到灵山听取中共南路特委关于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随即返回钦县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会议决定在邕钦公路上的重镇小董举行起义，起义部队称“钦县人民抗日解放军”，指挥朱守刚，政委卢文。起义领导人秘密集中小董、钦州镇、板城、长滩、大寺、贵台等地120多名武装人员，于2月17日袭击顽军小董自卫大队。因部队无作战经验，未能攻克小董。18日，退回六虾、那料、八甲等村庄，国民党自卫队和民团500多人追来，起义部队向邕钦边境撤退，沿途宣传“抗日、反投降、反贪污”，破仓分粮。26日，队伍在那了村被顽军冲散，外来干部因语音有异，多在途中被乡兵民团捕捉，参谋长林国兴、政治处主任陈浩等13人（内有党员7人）遭杀害。卢文、朱守刚脱险后投奔灵山起义部队，部分人员转到防城活动，其他同志分散隐蔽。

防城那良起义

1945年2月上旬，中共钦防特派员谢王岗才接到南路特委要求在春节前后举行武装起义的通知，遂决定防城暂缓起义，在那良、那湾、沿海3个党的

力量较强的区，组织20多个秘密游击小组，筹集武器、经费，积极创造起义条件。他们吸取各地起义的经验教训，不全面拔根，只动员部分武装举行起义。经过3个月准备，6月14日，谢王岗等调集那良区的地下武装和沿海区少数骨干共150人枪，轻机枪6挺，在北仑河畔的修尧村编组为“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沈鸿周，党代表兼参谋长陈汉东（黄木芬）。起义队伍在中越边界活动，国民党无力干预。部队径直开入越南海宁省塘花日军占领区，发动华侨抗日。首战攻克伪军一据点，俘敌14人。战斗结束后，陈汉东率政工队进塘花圩宣传，次日被日、伪军包围，陈在突围时英勇牺牲。在日军准备再次发动“扫荡”时，华侨大队撤回那良山区活动。

钦廉四属的抗日武装起义，共有1800多人参加，组建了一个支队和4个大队。各县的起义，都遭到国民党正规军、地方部队和地主武装的镇压，战斗异常激烈。一批久经考验的领导人和忠贞的革命战士，或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或被捕后遭杀害，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是，起义队伍打击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锻炼了干部，教育了人民群众，扩大了党的影响。日本投降后，钦廉地区党组织以这次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为基础，开展武装斗争，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

中共广西省工委作出《八月决定》时，分工由省工委代理副书记黄彰负责在桂东南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桂东南地区党的力量比较强，又有六万大山作依托，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条件较好。1944年10月2日，黄彰在贵县木格社塘村召开桂东南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提出了贯彻《八月决定》的具体措施：第一，调整健全各级党组织，重新任命各县县委书记和委员，要求党员一律参加武装斗争。第二，在各县、乡积极组建抗日武装，千方百计筹集武器。第三，宣传抗战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日军的暴行，揭露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独裁专制、横征暴敛的行径。第四，发动群众，成立“同心会”、“同盟会”、“三抗会”等外围组织。第五，分县举办武装斗争骨干训练班。第六，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引导国民党地方

武装投奔人民。会议还决定成立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黄彰为主任，吴家宜（中共玉林区特派员）为副主任，领导日常工作。

当时，国民党广西当局以一贯反共的梁朝玑为桂南行署主任，各县县长也多是顽固分子。玉林地区经济较发达，地主武装与官僚勾结，借抗日之名扩大势力，不断向人民征兵、加税、征粮，“民众对政府之仇恨，实有一触即发的危险。”[①]他们防共反共甚于防日防汉奸，还特别制订了防范异党分子和李济深分子办法。[②]1944年11月，桂东南游击区办事处调军事干部陈朝英（汤福胜）从博白到贵县前线抗日，路过贵县木格时被捕，中共贵县县委书记谭留科写了一封言词恳切晓以民族大义的信，向县长交涉放人。县长不但不放人，还把陈朝英在自卫队的几个同乡抓起来。12月，贵县、横县抗日武装在郁江取得了击毁13艘日船的重大胜利后，国民党派贵县副县长率保安大队到香江追逼抗日武装交出战利品。

12月15日，桂东南游击区办事处发出通电，呼吁国民党玉林区当局实行民主团结，停止反共，共同对敌。玉林区当局不予理睬，反而调动军队，派警特四处抓人。1945年1月25日，黄彰、胃宜再次发表通电：“本办事处对现存之玉区反动顽固政府已仁至义尽，心至言至，从今以后再有不幸事故发生，所有责任均应由国民党及其政府一肩负责，至于各界开明人士及父老士绅，切望能本抗日高于一切之民族大义，挺身而出制止反共，实现民主保卫家乡，则国家幸甚！”事实说明，桂东南起义是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逼出来的。

桂东南党组织于1944年12月中旬作出武装起义部署时，起义时间定在1945年四、五月间。但春节前后，广东南路特委在高雷、钦廉地区相继领导抗日武装起义，要求桂东南地区配合，因而桂东南游击区办事处便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提前发动起义。起义先后在陆川、博白、兴业、贵县4个县举行，目标是建立六万大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①《中共贵县党员谭留科给黄县长、李区长的信》，见《玉林地区党史资料》第2辑。

② 桂东南抗日游击办事处通电《呼吁制止反共，反对反对政府》，见《玉林地区党史资料》第2辑。

陆川起义

1945年2月，广东南路的抗日武装起义队伍已打到陆川县边界，并派1个营到陆川来协助。26日，陆川起义爆发。起义队伍700多人，370支枪，成立了陆川县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员廖家义，政委温翊俊（中共陆川县委书记），下分3个支队。第一、第二支队联合攻打清湖乡公所，攻不下，遂按第二方案向博白靠拢。第一支队沿途收缴反动武装的武器，开仓济贫，途中宿营于蚊丁村，被顽军偷袭，牺牲24人。因与博白部队联系不上，第一支队又回师陆川，两次强攻盘龙乡公所不下，3月12日，部队化整为零。第二支队从清湖乡公所撤退后，回三水村休整，准备北上攻打乌石，不料被陆川自卫队和广东化县自卫队800多人合击于三水村，第二支队被迫分散隐蔽。温翊俊在分散途中被捕，就义于化县县城。第三支队正准备攻打龙河乡公所，得悉第一、第二支队失利，也分散隐蔽。

博白起义

博白抗日武装于1945年2月27日，在双旺乡周旺村誓师起义，成立了博白县民主抗日自卫军，司令员林执真，政委熊景升（中共博白县委书记），辖3个中队和1个青年支队，共1200人，枪1000支。民抗军先后攻下和控制了双旺、龙潭等24个乡，成立了3乡1村的民主抗日政府，在东平、石角、马田、龙田等地破仓分粮给群众。队伍准备与陆川部队会师，北取县城。3月初，国民党玉林区保安团一个大队，会同博白自卫大队1000多人，分3路南下围攻民抗军。民抗军与顽军周旋多日，东进西征，虽有战果，但扭转不了颓势。3月20日，博白县委决定部队分两路活动，一部在县境中部牵制阻击敌人，一部南下开辟博南地区。25日，中部民抗军70余人被顽军包围在绿吊，激战1天，弹尽突围，熊景升等46人被捕杀害。林执真率部救援不及，其后战斗又失利。4月12日，中共博白县委决定由林执真率200余人枪（内有党员40多人），随南路莫练部开到雷州半岛抗日，编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博白独立营。留在博白的人员分为4个游击组，反击顽军清乡“扫荡”。

兴业起义

1945年3月2日，兴业县抗日武装在城隍、铁城、葵阳同时起义，攻下仁厚、城隍、葵阳、铁城4乡。3日，在寨德村召开军民起义誓师大会，有500人参加，成立兴业县人民抗日自卫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司令员李云蒿，政委张熙和，副司令员覃注礼（中共兴业县委书记），顾问覃震声。4日，自卫军围攻县城一昼夜。玉林行署派补充团和玉林、北流自卫队等顽军，于7日围攻民抗军司令部驻地榜山村。司令部突围到寨德后，派出队伍攻打合浦县六银圩，久攻不下，13日撤回横岗时被顽军袭击，损失10多人枪。余下200多人取道六万山向博白转移，被国民党玉林行署侦知，博白顽军在罗六、双凤卡住去路，玉林自卫队又赶到罗田，将兴业民抗军包围在双凤、罗田一带。15日，民抗军乘雾突围，虽经反复冲杀，仍冲不出重围，队伍被打散。16日，吴家宜、李云蒿、张熙和、覃注礼、覃震声等91人被捕杀害。他们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贵县起义

1945年3月3日，贵县抗日武装200多人在大江乡宣布起义，成立贵县抗日自卫军。司令员谭留科（中共贵县县委书记），参谋长赖志廉。队伍攻下大江、思怀、龙塘3乡后，委任谭振邦为贵县民主抗日政府县长，开仓济贫。7日，起义部队正准备攻打迁至木梓的国民党县政府时，国民党军警和地主武装数百人突然包围自卫军司令部驻地河村，起义军英勇迎战半天，一部分突围回香江隐蔽，一部分被冲散，起义领导人赖志廉、甘松州和随队伍行动的省工委代理副书记黄彰等被捕，分别在木梓、木格被杀害。谭留科率一支队伍转战到兴业，后与兴业起义部队在玉林罗田抗击顽军时牺牲。

桂东南的抗日武装起义，被国民党顽固派血腥镇压下去了。这次起义的失败，使桂东南地区的抗日武装损失了80%以上，280多名起义者惨遭杀害，起义领导人几乎全部牺牲，抗日游击区和人民群众受到严重摧残，损失是惨重的，教训是沉痛的。但是，这次广西规模最大的抗日武装起义，共产党人和

革命群众为国家民族英勇奋斗牺牲的精神，是非常感人的。起义震撼了桂东南地区，也震撼了广西当局，教育了广大人民，锻炼了革命干部，为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四）党支持的桂东抗日民主运动

桂林爱国民主人士转移到桂东

1944年6月，日军继续南侵。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派李亚群到桂林，通过胡希民向李济深转达口信：如果日军进攻桂林，李最好是回到苍梧大坡山家乡，组织民众武装，以民众武装的形式配合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抗日。当月，李济深在桂林广西建设研究会八桂厅召开有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梁漱溟等参加的秘密会议，就蒋介石再度催李济深到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一事商量对策。与会者接受中共对战局的分析，李济深决定以养病为名，先回家乡苍梧组织武装，争取共产党援助，在桂东地区独立自主抗日，把桂林的抗日民主运动转移到桂东去。

当日军逼近桂北时，国民党达官要人鸡飞狗走，李济深指出："逃跑终归不是办法，我能往，敌亦能往，万一敌人进攻桂林，我决心留在敌后与敌周旋。蒋介石不要土地，我们要；他不要人民，我们要。我要和人民一起坚持在敌后斗争，直到胜利。"[①]李济深大义凛然的呼声，得到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赞同和响应，纷纷表示愿到桂东敌后去抗日。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十分嘉许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的大智大勇，但劝告他们在这个时候不宜提出反蒋问题，同时指示桂林文化界党组织负责人邵荃麟、狄超白、张锡昌等，秘密进行进步人士疏散到桂东去的准备工作。7月，再派李亚群到桂林、柳州，检查疏散民主人士到桂东去的情况。

① 李煜平、韩省之：《李济深传略》，载《李济深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

1944年8月、9月，桂林城防司令部一再下令疏散，各抗战团体和文化人士即按既定计划行动。陈劭先、陈此生率广西建设研究会，万仲文、覃展（后为中共党员）率文化供应社，张锡昌（中共党员）、徐寅初率中国工业合作社桂林分社，莫乃群、胡仲持率《广西日报》社部分人员，欧阳予倩率广西艺术馆等单位，还有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柳亚子，民主政团同盟常委梁漱溟，经济学家千家驹，科学家高士其（中共党员）等著名人士，先后乘船沿漓江东下，一部分居住在昭平，一部分转迁到贺县八步。只有李任仁乘小汽车经蒙山去桂东时，遇见白崇禧，被拉到百色去了。

昭平、八步的抗日民主活动

爱国民主人士在昭平、八步居留了近一年时间，在中共的支持帮助下，开展了几项重大的抗日民主活动。

成立昭平民众抗日自卫工作委员会

在爱国民主人士推动下，1944年9月24日，成立昭平民众抗日自卫工作委员会，以辛亥革命元老严端为主任，该县县长韦瑞霖为副主任，千家驹、陈劭先、李卓成、欧阳予倩、莫乃群、何海筹、黎民任为委员，聘请何香凝为顾问，张锡昌为顾问兼秘书。与此同时，建立了县自卫队2个大队和青年教导队。没有武器和经费，陈劭先就以广西绥署顾问的身份前去交涉，将广西绥署运到昭平存放的一批武器、服装拨给自卫队。当时，桂东盐务处长何世庸（中共党员）负责将4万担食盐疏散到昭平、贺县，经联系，他拨出一批盐给昭平县政府变卖，利用官价和市价的差价，为昭平的抗日民主运动筹集了30万元经费。自卫队和教导队成立后，紧张地进行军事、政治训练，曾开赴古营阻击从钟山入侵的日军，又同邻县组织联防，保卫地方安宁。12月，广西民团副指挥官蒋如荃窜到昭平，把青年教导队收为他的警卫队，又撤换了自卫队的负责人，民主人士在昭平的抗日活动受到限制。1945年1月，日军从蒙山入侵昭平，这些民主人士便转移到昭平县东部的山区小镇黄姚，另辟活动基地。

出版《广西日报》昭平版

当时，桂东处于被日军四面包围的状态，与外面联系不便。为了宣传中

共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抗日，张锡昌建议出版《广西日报》昭平版。陈劭先去电百色取得省政府同意后，即组成社务委员会，以陈劭先为主任（后为欧阳予倩），莫乃群为主笔兼总编辑，徐寅初为经理。中共掌握的秦记西南印刷厂提供机器、铅字和工人，文化供应社供应纸张。1944年11月1日，该报正式出版。由张锡昌、莫乃群、千家驹等撰写社论，张铁生、陈此生等撰写专文，大力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如实报导湘桂黔战况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为人民说话，很受群众欢迎。报纸发行量近3000份，除在桂东销售外，还流传到湘南江华、临武和粤北连县、广宁一带。1945年初，日军一度窜陷昭平，报社迁到黄姚镇继续出版，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先派交通员庄炎林进入广西日报社做推销员，继派党员卢蒙坚为译电员，把省工委的意见通过报社写成社论发表。省工委亦从报社的电台中获悉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情报资料，作为决策参考。

建立临江中学、黄姚中学工作据点

另一批著名文化人士何香凝、梁漱溟、肖敏颂、柳亚子、徐旭、周匡人（中共党员）等先后移居贺县八步。八步的临江中学，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都是进步分子，学校爱国民主空气浓厚，成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的据点。梁漱溟在给临江中学师生作“动员与民主”的讲演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蒋介石独裁政治的不满，申明他来八步的目的就是拥戴李济深领导抗日；指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发动群众支援抗战，说明无政治民主则不能发动群众。学校还请何香凝、柳亚子向师生作专题演讲。1944年12月下旬，中共广东省临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派李嘉人到临江中学，同梁漱溟等密谈联合抗日的问题，制定了临江中学战时教育方案，拟在桂岭、公会建立分校（武装据点），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梁、陈等又及时同在苍梧大坡山的李济深信使往来，商议合作事宜。

昭平的爱国民主人士转移到黄姚镇后，为了解决当地青少年失学和外来人士失业的问题，应地方父老的请求，创办了临江中学黄姚分校（后改为黄姚中学），校长千家驹，教导主任刘彦邦（中共党员，后继任校长），欧阳予倩、周

匡人参加校董会，聘请张锡昌为政治历史课辅导，安排了一大批进步人士和中共党员在校工作。由于他们的通力合作，学校教学质量优良，革命气氛浓厚，成为中共和民主人士掌握的工作据点。1945年8月，钱兴把省工委机关从英家迁到黄姚中学，加强了与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

建立民盟东南总支部筹委会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民主同盟，把过去的团体会员改变为个人会员，国共两党的党员都可参加。年底，狄超白（中共党员、盟员）到重庆向中共南方局汇报工作后回到昭平，传达了民盟的决议和周恩来的指示。于是，在黄姚中学成立民盟黄姚支部。与此同时，梁漱溟等在八步临江中学吸收一批进步人士入盟，成立民盟八步支部。1945年初，狄超白、梁漱溟以八步、黄姚两个支部为基础，成立民盟东南总支部筹委会，选举梁漱溟、陈此生、张铁生、肖敏颂、张锡昌、徐寅初、周匡人、欧阳予倩、莫乃群、千家驹、李镇等11人为委员，推梁漱溟总负责。民盟东南总支部的工作范围，包括两广、两湖、云贵、福建和海外等地，狄超白提出“工作公开，组织秘密”的原则。民盟组织成立后，编印《民宪》杂志东南版，举办民主讲座，这些活动使抗日民主理论得以广泛传播，深入人心。

李济深在粤桂边的抗日活动

1944年7月，李济深回到苍梧县大坡山后，派人到怀集、玉林、北流、容县活动；策划掌握梧州、八步、玉林3个专区的武装。他还同回到南路搞武装起义的张炎（原第十九路军将领）联系，并嘱蔡廷锴推动谭启秀（原第十九路军将领）成立罗定、郁南、云浮抗日民众武装指挥部。8月，李济深到八步会见柳亚子、梁漱溟、陈此生等，商谈坚持敌后抗日民主斗争的问题，并邀请进步文化人士到苍梧协助他工作。9月，日军占领梧州，离大坡山只有数十华里，李济深搬进山中居住，组织乡人自卫。

1945年1月，为了推动桂东南和广东南路自主抗日，李济深出巡岑溪、容县、北流、玉林，经茂名、高州、罗定返回大坡山，历时1个月。他每到一地就开座谈会，与当地官绅共商抗日保家乡大计，并参加群众大会发表演说，痛陈国民党政府军事上腐败无能，政治上独裁反动，经济上横征暴敛，造成空前严

重的民族危机。他表明自己不愿与蒋介石同流合污，乐意留在家乡领导民众抗日，推行民主政治。他提醒人民："桂东南十分危急，敌人随时可来，而政府又黑暗糊涂，敌人若来，政府必定逃跑，要保卫家乡不做亡国奴，只有靠人民起来自卫、自治、自救。"[①]李济深沿途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地方官吏、党棍、特务，表面上对李毕恭毕敬，殷勤招待，暗中则散布李济深是半边共产党，对他进行盯梢、监视。

李济深出巡期间，张炎在广东吴川发动起义遭到国民党镇压，后赴广西找李济深、张发奎商议抗日大计，途经博白时被国民党军逮捕。3月22日，蒋介石下令在玉林将张枪决。不久，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也遭到严重失败。李济深及时转移到罗定蔡廷锴、谭启秀的游击队里。蒋介石又派人持其亲笔信到罗定请李济深去重庆，宋子文、陈诚也来电"促驾"。李济深明确地回答说，只要蒋介石放弃独裁，实行民主，发动民众抗战，他便去重庆。

中国共产党始终支持李济深在敌后的自主抗日活动，并派党员胡希民随李从桂林返回苍梧大坡山协助工作。1945年初，狄超白从昭平来到大坡山，向李济深传达南方局的意见，表示支持他领导的抗日民主斗争，愿共同采取一致行动，并把电台密码交给他，以便密切联系。狄留在李济深身边，为其筹划各方面的工作。李济深非常拥护民主党派的建党工作，他认为民盟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应再有一个组织来吸收国民党中上层进步人士参加。狄超白、梁漱溟赞成李的意见，李济深即同何香凝、陈劭先等酝酿成立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这时，广东阳江县盐警队起义，有二三百人。李济深致电军政部长陈诚，建议将这支队伍编为军事参议院警卫队，驻在苍梧广平，保卫大坡山。3月，南方局又派陈残云、黄宁婴、朱江洪等从贵州辗转来到大坡山，由李济深安排工作。李派他们到警卫队做政治工作，整顿军纪，成立政工队，发动群众抗日。

1944年9月7日，周恩来致电中共广东省临委书记尹林平，指出"一旦粤汉路被打通，应坚持广东半独立局面，以响应李济深的民主运动，能如此，我们必予赞助，并切实合作"。1945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指示："上层统战关系及外交工作在华南特别重要，你们应力求

① 中共玉林地下党1945年初印发的《李济深先生莅玉经过》，转引自《广西文史资料》第14辑。

打通南路与李济深（闻在玉林）、张炎的联系”。广东省临委即派李嘉人为东江纵队代表到罗定与李济深会谈，双方表示通力合作抗日。并相约，如果李建立起抗日队伍，东江纵队即代为训练军事干部，并拨给团级军事干部若干人。会谈期间，中共广东西江临时工委派李靖以郁南县抗日民众武装参谋长的身份，到罗定会见李济深，介绍西江的敌情和郁南人民抗日武装的情况。后来，李济深率警卫队回到大坡山时，遭顽固派的武装袭击，郁南人民抗日武装前往支援，将敌击退，并派一支部队常驻大坡山附近策应，还从经济上支持李济深。1945年夏，粤中纵队根据广东省临委指示，派代表杨基赴大坡山向李济深传达中共“七大”的精神，介绍粤中部队的情况，并商定了双方电台的通讯联络事宜，李济深嘱杨基回部队后，立即给周恩来致电报告他目前的情况。此后，李济深一直和中共保持密切联系。

1945年5月，驻广西的日军开始撤退。广西军民开展了积极的进攻。5月和7月，南宁、桂林先后光复。8月，日军全部退出广西。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是近代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领导和推动广西各族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在广西抗日武装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广西各族人民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日军两次入侵广西，当时全省99个县1市中，有77个县1市遭受日军蹂躏，近1400万人口中，伤亡人数达100万。公私财产损失8727亿元以上。[①]桂林、柳州、南宁、梧州等城市和许多县城，被日军轰炸、炮击和纵火焚烧，房屋大部分被毁。交通运输遭到严重破坏，湘桂、黔桂铁路全被破坏，全省公路损坏80%。[②]

战争带来的疾病、饥荒，加上当年水旱等自然灾害，使各族人民雪上加霜。广大群众在欢庆胜利的同时，也热切盼望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和桂系加紧勾结，积极推行反共反人民的独裁内战方针。此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领导各族人民进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阶段。

① 广西省政府1946年编《广西省抗战损失调查》。

② 广西省政府《1945年5月至12月交通施政报告》。

陕　西

一、陕西的抗日救亡运动与西安事变的发生

（一）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5年夏，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以吞并华北为目的的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关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的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数千名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反对华北自治”、“武装保卫华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掀起了空前规模的一二·九爱国运动。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陕西后，西安学生冲破国民党的高压政策，走上街头，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壮举，勇敢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12月24日，西安各校学生和教职员向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国民政府、行政院、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北平学生发出通电，请求政府锄奸救国，维护并领导学生运动，释放被捕学生；请求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彻底铲除汉奸，保护爱国运动；表示誓做北平学生后盾。12月25日，省立一中、省立二中和西安师范等学校的师生4000余人在革命公园集会，之后到陕西省政府请愿。向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递交了请愿书。随后，学生又到梁府街向省教育厅请愿。厅长周学昌对学生的请愿活动横加指责，企图压制学生运动。学生毫无畏惧，向社会各界大声疾呼：我们是读书不忘救国，不把汉奸枭首、国贼铲除，誓不甘休。请愿学生走上大街，呼吁抗日，奋起救亡。在西安学生带动下，华县、三

原等地学生也举行罢课、游行、下乡宣传等活动，声援北平学生运动。

1936年初，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传达了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并通过各种渠道向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进行宣传，推动陕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接着，东北大学中共支部书记、学生救亡工委负责人宋黎等人应张学良之邀来到西安，向东北军和西北军介绍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呼吁东北军、西北军团结抗日。不久，北平部分学生党员随东北大学工学院一同来到西安，进一步壮大了西安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力量。

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西安各界民众以各种形式举行救亡活动，声势浩大，一浪高过一浪。1936年3月7日，西安民众4000余人在革命公园聚会，举行追悼被日本监工打死的上海大公纱厂工人梅世钧大会，抗议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9月18日，西安学生4000余人和旅陕东北军民8000多人在南院门"西北剿匪总部"联合举行东北沦亡五周年纪念大会，群情激奋，使张学良和东北军许多官兵为之动容；10月中旬，西安师范学生开展驱逐反动校长田杰生的斗争，迫使当局罢免了田杰生的校长职务；11月7日，西安学生5000余人聚集革命公园南广场，举行追悼鲁迅逝世大会，驱逐了破坏大会会场的西安警察局局长马志超；11月下旬，西安学生为声援傅作义将军在绥远的抗日斗争，自觉行动起来，半天上课，半天募捐，有的学生携带捐款和慰劳品奔赴绥远抗日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受到傅作义的接见；11月28日，张学良、杨虎城亲率所部官兵，参加了西安各界民众纪念西安解围胜利十周年大会，显示了陕西人民抗日爱国力量的大凝聚、大团结。

1936年12月陕西省委恢复后，十分重视对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使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党组织通过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或"民先队"）西安队部[①]、西安学联、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东称会"）等群众团体，广泛深入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意义。从1936年12月到1937年2月，各地的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公务员等各行业人员，纷纷成立抗

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1936年2月成立于北平。西安队部是它在陕西的分支机构。

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宣传、示威游行和武装自卫等救亡活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铲除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成了民众的一致呼声。1937年1月9日，在中共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西安大华纺织厂、华丰面粉厂、咸丰面粉厂、中南火柴公司及各行业的工人、城郊农民15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接着，蓝田、蒲城、三原、宝鸡、凤翔、山阳、户县等20余县约60多万人参加了当地的游行示威和武装自卫大会。在1月28日淞沪抗战五周年时，西安各界群众团体组织了15万余人，在革命公园召开纪念大会，痛斥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广大群众一致团结起来，抗日援绥，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次日，西安人力车工人2000多人在革命公园举行抗日救国大会，示威游行。

中共西北特支成立

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中共陕西组织屡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又屡次恢复建立。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对重建陕西党组织领导机构十分重视。11月9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派谈国帆去陕北向中央汇报工作。12月初，谈国帆向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张浩做了汇报，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带回了中央给陕西地下党的指示和瓦窑堡会议文件。1936年4月，陕西临时省委负责学生工作的姚权被捕叛变，临时省委有被完全破坏的危险，临时省委书记高克林与孙作宾等又到陕北，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中央决定高克林留陕北工作，孙作宾担任中央交通员。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出现了转机。

在高克林、孙作宾到陕北之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接到在十七路军从事地下工作的谢华的报告，立即亲自复信，对谢华等人的工作给予肯定，并指示尽快重新建立陕西地方党组织，着重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从此，中共中央与陕西地下党的联系开始恢复。

四、五月间，谢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十七路军宪兵营中共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书记谢华，委员徐彬如、李木庵。鉴于陕西省委屡遭破坏，西北特支与地方党组织不发生组织关系，归中共中央直接领导，

其任务是继续做兵运工作，在学生中发展党员，领导和发展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一度负责江苏徐州及鲁北地区党的工作。中共西北特支成立后，首先从西安高中、西安师范的学生运动入手，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接着又在二中、女师、女中、一中、民立中学等校相继成立抗日救国会，同时把西安以外的三原三中、女中和汉中、兰州的一些学校也组织起来，成立了教职工救国会、学生救国会等。各行各业的救国会也都先后成立。6月1日，为了统一行动，中共西北特支把西安各救国会组织起来，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先后由谢华、杨明轩、徐彬如、李木庵等担任。“西救会”在西安建立和领导的救亡团体有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西安妇女救国会、西安学生抗日救国会以及西安近郊和长安县的农民抗日救国会等，七、八月间，在华丰面粉厂和大华纱厂、西北文化日报社组织了工人救国会和回民救国会等，8月又领导成立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中共西北特支的领导下，陕西的学生运动空前高涨。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建立

1935年12月，在陕南“追剿”红军的陕西警备第二旅第四团发生了两起士兵起义。12月7日，第四连的一个班长张子新和士兵王展（王武林）在柞水县营盘带领一个排起义。12月11日，第九连的一个排长何继周在长安县引驾回率领全连百余人起义，进入秦岭山区，请求红七十四师改编和领导。红七十四师因组建不久，无力派人改编何部，于是建议何继周暂时不要打出红军旗号，可以“陕南游击队”的名义进行活动。于是，何继周宣布成立陕南游击纵队并自任总指挥，苗鸿鑫任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何继周改名何振亚。不久，张子新、王展率领的24名起义人员在宁陕、镇安边界与陕南游击纵队会合。1936年2月8日，汉阴进步青年李柏亭打死蒲溪联保主任汤新吾，带领20余人枪参加陕南游击纵队。陕南游击纵队在宁陕、镇安、柞水、石泉、汉阴、安康[①]等县开展游击活动，发展到500多人。

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一直在追击“围剿”陕南游击纵队。在没有和中

① 今安康市汉滨区。

共组织取得联系，又无后方支援、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何振亚采取缓兵之计，有条件地接受了国民党镇安县政府和安康专署的“收编”，同时采取巧妙的方式同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斗争，始终保持着部队的革命性。部队还先后派出五批工作人员，深入各县保安队进行策反工作，并在安康等地设立秘密联络站，掌握国民党军的动向，为下一步起义做准备。为便于部队独立发展，他们借“剿匪”之机，从距安康城10公里的驻地牛山庙移驻到距安康城75公里、位于安康、旬阳、镇安三县接合部的安康县东镇（东沟口）。

5月，原在陕西警备第二旅四团手枪班任班长的沈敏得知游击队被收编的消息后，立即从北平回到西安，与在杨虎城部宪兵营任营长的中共党员金闽生取得联系，经金闽生和共产党员杨江（杨文贤）、杜瑜华向中共西北特支书记谢华请示，西北特支决定派杨江、杜瑜华和沈敏到陕南做何振亚的工作，争取把这支武装掌握到中共组织的手中。6月初，杨江等到达安康东镇，何振亚表示接受中共的领导，待机率部举行起义。

8月9日，根据何振亚与杜瑜华等人的安排，何振亚以“开赴安康进行整训”为名，率部离开东镇，向茨沟进发。此时，杨江带中共党员杜超赶回部队，传达了中共西北特支关于立即举行起义、成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指示。

8月10日，部队从茨沟向五里铺进发，沿途收缴了保安队的枪支。8月13日，部队到达镇安县紫荆乡刘家大院，举行抗日第一军成立大会，宣布：（1）部队正式命名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2）任命何振亚为军长，杨江为政治委员，沈敏为军委主席，杜瑜华为参谋长，徐海山任政治部主任。（3）抗日第一军下辖四个支队和特务队、侦察队、少年先锋队。（4）军内成立陕南抗日救国联合会，杨江、沈敏、何振亚、杜瑜华、徐海山为常委。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后，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围剿”。何振亚、杨江等率部打退敌人的尾追，挥戈北上，在镇安、宁陕、石泉交界处与国民党军周旋。9月1日，部队途经石泉县三官庙街时，一举歼灭大地主贺元山、蔡乐成的寨丁20余人，攻克太平寨。10月中旬，抗日第一军在安康县马坪一带全歼王普三保安队，缴获步枪30余支。接着，又在镇安县杨泗庙乡与国民党军一

部激战，毙伤敌人20余人，缴获部分武器。11月23日，抗日第一军在洋县周家坝夜袭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师运输队，缴获一批枪支弹药。第二天，部队行至迷峰岭山腰，突然与国民党军一个团遭遇，国民党军居高临下，猛烈进攻，部队被压在半山腰，激战数小时后跳崖撤出。突围后，部队经四亩地、海棠园急行100公里，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击。12月初，部队到达宁陕县江口休整。这时，抗日第一军已发展到900余人。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西北特支领导人徐彬如以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宣传部负责人的名义，于12月20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西救会”在“民众武装组织方面的工作，在陕南有抗日第一军的建制”[①]。12月下旬，中共西北特支将陕南抗日第一军的关系交给中共代表罗瑞卿。这时，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尚不知西安事变发生，部队集结在汉阴县双庙子，准备攻打汉阴县城。红七十四师送来中共代表的命令后，何振亚立即率领部队挥师北上。1937年3月初，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甘肃庆阳县驿马关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何振亚任团长，李雪三任政治委员，沈启贤任参谋长，杜瑜华、张英勃负责政治处工作。

铁佛寺起义

1936年8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人崔廷儒先后派吕剑人、刘庚、张涛、李特生、谈国帆等人去乾县地方民团开展工作，相机发动起义，铁佛寺保安中队成为他们工作的目标。铁佛寺保安中队原是国民党西北民军的一支地方武装，其首领是张科科、张熬娃。在此之前，为了争取这支武装力量，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派二张的同族兄弟、共产党员张庚良前去工作，张庚良担任了这支武装的头目。保安中队虽然成分复杂，组织纪律性差，但成员大多出身贫苦，不满现状，并受乾县保安大队的威胁压迫，早已心怀怨气。刘庚、张涛、夏飞等人通过保安中队长张庚良和一些队员、头目的同乡关系，广泛结交朋友，在士兵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保安中队逐渐有了武装起义的思想基础。10月7日，张庚良、刘庚等发动铁佛寺保安中队起义。起义部队攻进永

①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1日。

寿县城，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10月8日，部队转往麟游山区，宣布成立陕甘边抗日联军，总指挥张庚良，政治委员兼参谋长刘庚，下设3个大队和特务队，共200余人。后来，起义部队在与强敌战斗中兵力不支，分散隐蔽。

（二）西安事变与中共陕西省委的恢复

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抗日

1935年9月，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率领东北军由鄂豫皖地区来陕甘地区“围剿”红军，任西安“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从9月到11月，在不足三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军与红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交战中，连续被消灭近三个主力师，南京政府不但不给予补充，反而取消了被歼灭师的番号。东北军在陕甘“剿共”接连失利、损兵折将的事实，深深触动了张学良和东北军官兵，他们看到红军是消灭不了的，“剿共”不是东北军的出路，要解国难、报家仇必须另寻新路。于是，张学良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寻求与共产党联络。

鉴于张学良和东北军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广大官兵要求抗日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从瓦窑堡会议后就开始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20位红军将领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反蒋抗日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打红军是东北军的绝路，表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作为全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为了与张学良建立直接联系，1936年1月，中共中央派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思想有很大变化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返回东北军驻地面见王以哲和张学良。高福源向张学良讲述了他在苏区的见闻，说明共产党诚心诚意主张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是东北军可靠的盟军,如果愿意合作,可以派正式代表谈判。张学良为之感动,随即指定高福源去陕北,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谈判有关事宜。1月16日,高福源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会见张学良的经过。中共中央即派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去洛川,同王以哲、张学良谈判。

2月26日至29日,李克农与王以哲等就第六十七军与红军的合作问题进行了谈判,最后达成口头协议:(1)为共同抗日,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2)恢复六十七军在肤施至富县公路上的交通和通商。(3)肤施、甘泉的六十七军所需粮草可向苏区民众购买,恢复正常交易。(4)恢复红、白区通商,双方均有保护对方安全之责,双方采购人员均着便衣。3月4日和5日,李克农与张学良等围绕对蒋介石的态度、对抗日战争的看法、关于红军派代表去苏联等问题继续进行谈判,最后,双方在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总目标下取得了一致,达成了几项协议:(1)应张学良要求,中共在博古、周恩来、彭德怀三人中推一人做全权代表,与张学良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会晤地点在东北军驻地肤施,时间由中共确定。(2)去苏联问题,红军派代表经新疆出国前,张学良先和新疆盛世才商量并探听飞机航线情况。(3)中共派一相当负责又非声名显赫的人,由张学良给以灰色名义常驻西安,和各有关方面利于开展筹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工作。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有了一些初步认识,促使他在联共抗日的问题上迈出了一步;通过会谈,中共和张学良彼此增进了了解,为后来周恩来、张学良举行肤施会谈铺平了道路。

洛川会谈结束后,李克农于3月16日赶往红军东征前线山西石楼,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中共中央当即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肤施与张学良谈判。在此期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也派刘鼎到东北军中做统战工作。

4月9日晚,依照洛川会谈的协议,中共派周恩来、李克农以及刘鼎为代表,与张学良、王以哲在肤施城内天主教堂举行会谈。会谈中,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赞成中共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意见;赞成红军集中河北抗日;对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表示欢迎,并承

诺如果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他可以公开和红军联合抗日。张学良还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如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蒋介石会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据他两年的观察，蒋介石可能抗日，蒋介石的嫡系高级人员中也有主张联俄、联共、抗日的。蒋介石错在“攘外必先安内”，如果把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从外边逼，内外夹攻，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道路。周恩来表示，待认真考虑后再作答复，这是促成中共中央在后来作出“联蒋抗日”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周恩来回到山西前线后，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中共中央任命刘鼎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常驻西安，与张学良继续谈判；派白坚任驻张学良处联络员；派李克农继续保持与王以哲的密切关系；在延安、洛川、宜川、店子、西安建立中共与白区的交通机关。

5月12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举行了第二次会谈。9月22日，毛泽东、张学良分别代表红军和东北军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

在争取张学良抗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说服和争取工作。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不属于蒋介石嫡系，是典型的地方势力。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杂牌军，所以杨虎城与蒋介石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再加上中共与杨虎城长期合作的基础，联合西北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

1935年10月间，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住在天津的南汉宸约十七路军驻北平办事处主任申伯纯秘密会晤。南汉宸向申伯纯介绍了中共《八一宣言》的内容，并安排申伯纯去南京，向正在出席国民党五大的杨虎城说明中共的主张。11月初，申伯纯到南京向杨虎城做了汇报，并向杨虎城介绍了《八一宣言》的内容，杨虎城希望南汉宸到西安，双方制定详细的联合抗日办法。经党组织研究同意，以南汉宸的名义向杨虎城提出了六条具体意见：(1)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2)在现有的防区内(可商定)，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进退，或放空枪、打假仗。(3)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4)甲方(十七路军)在可能的条件下掩护乙方(红军)往来人员的交通进出。(5)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其他物资。(6)双方在适当地

点，建立秘密交通站，以加强联络和便利往来交通。12月中旬，申伯纯由北平到西安，把南汉宸的意见转达给杨虎城。

12月初，汪锋带着毛泽东、彭德怀给杨虎城的信和毛泽东给杜斌丞、邓宝珊的信，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系。汪锋与杨虎城进行了多次会谈。杨虎城对毛泽东信中提出的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汪锋向杨虎城表示，今后双方如果不相互攻击，就能保全实力，这对十七路军的发展壮大，对抗日救国事业都利的；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发展，防止损失，大家起来，共同抗日。之后，杨虎城指定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与汪锋继续会谈，双方达成了“抗日友好”、“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做抗日准备工作”协议。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曾在十七路军工作过的王世英等人从华北来到西安，就联合抗日的具体问题与杨虎城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王世英希望杨虎城：(1)与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2)加紧内部团结，培养青年干部。(3)与其他反蒋派别联合一致，以推动全国反蒋抗日新局面。杨虎城希望红军：(1)维持原防，互不侵犯。(2)交通运输方面尽可能地予以帮助。(3)对他的部队不要策动哗变。(4)绝对保守秘密，可以建立电台联系，不要写信或派人来。(5)红军对井岳秀保持与他同样的关系。王世英表示同意杨虎城的上述意见。后来，王世英到达陕北，又转赴山西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了与杨虎城谈判并达成口头协议的情况。中央同意王世英与杨虎城初步商定的四项原则：(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虎城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3)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4月底，王世英由晋西经瓦窑堡、延安、西安到达杨部行辕驻地韩城，向杨虎城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杨虎城完全同意上述原则，并答应立即设法建立交通站。

8月26日，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持毛泽东8月13日给杨虎城的信由陕北

到达西安。9月上旬，杨虎城会见张文彬，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口头协议：(1)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杨虎城负责抑制民团，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2)取消经济封锁，设专门贸易站保障苏区贸易，十七路军负责掩护。群众自由通商，苏区不禁止群众供应十七路军物品。(3)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供给南京等各方情报，如有纠纷，双方磋商解决。

张文彬与杨虎城会谈后，常驻西安，代表红军与杨虎城和十七路军保持联系。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杨虎城任命他为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此后，秘密交通站建立，西安城内设有三处，苏区边境设有淳化、洛川、宜川等处。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在张学良、杨虎城之间进行工作，促使他们团结合作。经过多方努力，张、杨开始了日趋密切的合作。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结束了敌对状态，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实现了大联合。后来，叶剑英作为红军联络处负责人常驻西安，进一步开展联合抗日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西北实现，从而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

正当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实行停战、合作抗日，逐步形成“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局面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调遣重兵入陕，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10月22日，蒋介石在平息了“两广事变”后来到西安，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宣布进一步“剿共”的计划，遭到张、杨的反对。接着，蒋介石又以避寿为名去洛阳，积极进行内战准备，并于10月31日颁布了对红军的总攻击令。

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全局出发，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46名红军领导人名义致书蒋介石及国民党西北各将领，指出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形势下，不容再有“萁豆之争”，一切问题都可以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下求得解决。张学良也上书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北上

抗日。杨虎城发表告民众书，主张毁家纾难，舍身卫国。蒋介石无视中共为团结抗日所做的努力，对张、杨的规劝也无动于衷，在洛阳等地完成了一系列“剿共”部署后，于12月4日再度来到西安，驻节临潼华清池。蒋介石分别召见东北军、西北军师以上将领讲话，要他们服从命令，彻底“剿共”，然后对张学良、杨虎城摊牌，提出两个方案供张、杨选择：一个是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围剿”红军，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另一个是张、杨如不愿意“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剿共”。这两个方案显然是张学良、杨虎城都不能接受的。继续“剿共”，不但张、杨不愿意，两军广大官兵也不会接受。事实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已与红军实行停战，两军调离西北并互相分开，这就为蒋介石分别吃掉两军提供了方便。因此，张学良、杨虎城下定决心，一不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北，并且秘密商定对策：第一步“苦谏”——尽量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设法扣蒋，逼他抗日。

12月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面见蒋介石，向蒋介石痛陈国家民族的危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言抗日。蒋介石非但不听，反而斥责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并气急败坏地说，即使把他打死，“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12月8日，杨虎城也去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同样遭到蒋介石拒绝。

12月9日，西安万名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旋即奔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严令张、杨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伤学生。对此，张、杨深切认识到，“劝谏”已不能改变蒋介石的主张和决心，除了发动“兵谏”外，别无出路。12月12日凌晨，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指挥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在临潼和西安行动。东北军一部迅速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十七路军在西安解除了中央宪兵第二团、公安局、别动大队和驻西安的中央零散部队武装，并在西京招待所拘禁了随蒋介石来陕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蒋作宾、朱绍良、陈继承等10余人。同日，张学良、杨虎城以及所属高级将领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发动事变的原委，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

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确定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张学良也于当夜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当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共商大计。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西北特支及时向中共中央发出急电，报告了事变的经过。在中共代表到达西安之前，西北特支在十七路军的支持下，以西北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名义接管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宋绮云负责接管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西安分社、广播电台、西京日报社和秦风日报社。西北特支还派人到工厂、学校、机关，协助成立基层救国会组织，并以“西救会”的名义，请进步学生进工厂、机关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支持张、杨义举。

面对西安事变后的错综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从民族大义出发，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为抗日救国而发动的，“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①。西安事变采取了扣留蒋介石及其一部分主要将领的方式，从而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中国各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所欢迎的前途。但是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创造条件，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所欢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要力争避免前一种前途，实现后一种前途。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所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中国共产党也准备在军事上、政治上给张学良、杨虎城以积极援助。

根据这个方针，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为中共代表，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同时通电全国，表明中国共产党和

①《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

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明确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19日，再次向南京和西安发出通电，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四项具体建议。与此同时，应张、杨的请求，红军主力集中于西安以北的泾阳、三原、富平和陕南的商洛等地，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12月17日，受张学良邀请的中共代表到达西安。当天晚上，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张学良认为，现在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最大，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周恩来赞扬了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并表示赞同张的上述看法。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实力原封未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于对立地位。因此，对蒋介石的处置需要慎重。事变的处置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了蒋介石，团结抗日；二是蒋介石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宣布罪状，这样势必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灭亡中国提供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应该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还拥护他做全国的抗日领袖。

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张文彬的陪同下，去西安城内止园拜会杨虎城，商谈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杨虎城一是怀疑蒋介石能否抗日，二是怕蒋报复。周恩来对杨虎城的疑虑表示理解和同情，对杨虎城做了解释，指出现在不但全国人民用极大压力逼迫蒋介石抗日，就是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力量在争取他抗日。蒋介石除了抗日这条大路以外，其他的路都走不通。因此，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现在，蒋介石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他的抗日可能性增大了。至于将来蒋介石是否报复的问题，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实力派，蒋介石想报复也报复不成。

除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外，周恩来还广泛接触了西安各界人士，出席各方面举行的座谈会、报告会等，同时，还分别同南京方面派来的端纳、宋子文等进行了会谈，为同蒋介石谈判的顺利举行打开了通途。

12月23日、24日，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周恩来代表中共和红军，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在西安城内张学良公馆举行谈判。周恩来首先提出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1)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民主建国会召开前，苏区名称不变，但可加上抗日或救国字样。(5)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议。(6)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两天的谈判，基本上围绕周恩来提出的六条主张进行，在此基础上达成了如下协议：(1)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子文绝对负责并保证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2)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绝对负责，蒋鼎文即携蒋介石手令飞往洛阳，办理停战撤兵手续。(3)蒋介石回京后释放"七君子"[①]。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理释放事宜。(4)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5)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大会。(6)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7)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8)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9)蒋介石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10)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此外，宋子文提出，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就放他回南京。

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宋子文、宋美龄的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同意接受六项条件。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抵洛阳，26日同去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了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被军中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又重新出现。在最困难的环境中，周恩来进行了艰苦和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巩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① 指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27日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战之新阶段的开始。[①]从此，国共两党对峙十年的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创造了条件。

中共陕西省委恢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陕西地区首先出现了和平的局面。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正式取消，国民党的"剿共"活动也在陕西地区暂时停止；驻防延安的东北军陆续撤离，红军遂驻防于此。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由保安迁到延安。

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新形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1936年12月25日，中共代表博古在西安二府街谢华家中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指示，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撤销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恢复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新的省委以贾拓夫为书记，张德生为组织部部长，李一氓为宣传部部长，彭加伦为省委秘书长。同时，省委设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西北军工作委员会和民运指导委员会，分别由朱理治、欧阳钦、赵伯平任书记。1937年1月，省委又设立青年部和妇女部，分别由王俊、危拱之任部长。省委机关先设在西安二府街，后迁到纸坊巷，1937年初迁往泾阳县云阳镇。

中共陕西省委恢复后，开始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地下组织。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由于叛徒的出卖和国民党的疯狂镇压，陕西国统区的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与组织失掉了联系，到西安事变前，仅有极个别的党组织在活动，坚持下来的少数党员零星分散在各地。因此，省委重新建立后，把恢复全省各地、各级党的组织作为最紧迫的任务。

1937年初，省委成员贾拓夫、张德生、惠子俊、崔廷儒以及谢华等人在西安及附近地区寻找老党员，发展新党员，到1月底，西安已有党员60多人。1月下旬，中共西安市委成立，惠子俊任书记。3月25日，省委决定将中共西安

① 西北大学历史系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01页。

市委改为中共西安市工委，张德生兼任书记，直接领导西安市的组织发展工作。其间，市委先后在西北文化日报社、泾阳东部地区工人和学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与此同时，中共陕西省委还派出党员领导干部分赴全省各地，考察老党员，发展新党员，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省委在直接恢复了一批老党员的党籍后，选派一些党员干部分赴各地，帮助恢复和建立各级党的组织。3月25日，省委“依照地域便利，依照工作基础”，将所辖区域划分为西安、渭华、蒲白、韩合、三原、北路、关中、邠长、平泾、泾阳、乾县、扶风12个区，实行分区领导。在省委领导下，各地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已恢复和建立了21个县、市党的组织，国统区共产党员有900多人，连同省委领导的国民党军队中的党员，全省共有党员1350多人。

省委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要求全省各地党组织学习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教育，掌握统一战线工作的艺术。

1937年5月22日至2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代表会议，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参加会议并先后讲话。贾拓夫做了题为《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的报告，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和领导千百万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为和平民主抗战而奋斗，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党的政策和工作方式要从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中转移到民族统一战线上来，要停止武装暴动与没收地主土地，改苏区工农民主专政为民主共和制度；要以和平、合法、民主的工作方式代替过去的武装斗争方式。

针对当时党内不少人还习惯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斗争方式，对于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不够理解的状况，省委在党内刊物《党的生活》发表了《谈谈斗争方式的新变化问题》等文章，指出斗争不单是黑铁和赤血的敌对行为，这只是斗争发展的最高限度的一种形式。无产阶级为了达到自身阶级利益所要求的目的，除武装斗争之外，还有和平的、合法的、批判的等各种斗争形式。如果只是把斗争狭隘地局限于生杀决战上面，就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不能完成党促进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因此，我们不是要取消斗争，而是

要加强群众斗争力量，团结全民族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保证党在群众斗争中能够始终起到核心领导作用。

为了深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领导，中共陕西省委将军事部改为统战部，由省委常委欧阳钦、汪锋先后担任部长。省委通过西北青年社、八路军留守处、联络站等公开和半公开组织，推动国民党陕西当局和各阶层民众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省委统战部初期工作对象主要局限在上层人士中的进步分子，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进步的中下层军官，省、县级公务人员及教育界进步名流等。后来，省委将统战范围扩大到国民党政权的上层人物、中间人士和广大乡村。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历经艰难曲折的陕西省委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更加成熟和坚强，领导陕西人民以高昂的姿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中去。

二、陕西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

（一）中国共产党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

中共中央为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努力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宛平县城搜查。日方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地方政府的拒绝。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日本侵略军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实施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同时，中国军队奋起抗战，标志着中国人民全国抗战开始。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中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掠。同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毛泽东并致电在天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南汉宸，要南汉宸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与国民党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

7月14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要红军做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并致电在西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叶剑英，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随时准备出动抗日，已令各军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征；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唯红军特长在运

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特长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方。

为了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于7月中旬再上江西庐山，同国民党谈判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问题，并将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希望国民党能予实行。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愿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是，直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才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提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洛川会议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文章指出：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其前途就一定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中国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就国共关系、战略方针和出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提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实行的是片面的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并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日的根本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防止人民

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反对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这一路线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必然招致严重的失败。因此，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许多不利的情况。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把千百万群众组织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去。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善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

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在全国抗战到来之际党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主要是：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保卫、巩固和建设陕甘宁边区，使其成为抗日民主的模范区。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的正确方向。

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8月上旬，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此时，北平、天津已经沦陷，上海的形势也日趋紧张，蒋介石因急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办事处。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产党在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

立自主的原则下，也做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治训练处等。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第一二〇师以原红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下辖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①]、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全军编制共近4.6万人。

中央军委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中央军委的命令，保证红军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为了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前方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10月，八路军重新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处）。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关于陕北红军改编和驻防的决定》，决定：原七十四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五师炮兵营、辎重营，驻防富县、甘泉一带；原独立二师改编为第一二〇师工兵营，驻防神府；原独立一师及陕北独立团改编为第一二〇师特务营，拟驻防靖边、横山一带；原二十七军改为第一二〇师辎重营、炮兵营，拟驻防安边、宁条梁以南地区；原三十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炮兵营，驻防庆阳、镇原一带；以陕甘宁第三团之二、三两连及关中警卫营合编为第一二九师辎重营，驻防宁县一带；陕甘宁之一、二、四团合编为第一二九师工兵营，驻防环县、合水一带；原二十九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特务营，驻防定边、盐池；第一二九师留下之一团，驻防同官或洛川；第

① 旅长卢冬生未到职。

一二九师留下之一团，驻防淳化、旬邑、正宁之线。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全国海陆空军战斗序列，将第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红军改编完成后，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分别在三原县云阳镇（今属泾阳县）、桥底镇和富平县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广大人民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大会，为出师抗日的子弟兵壮行。誓师大会后，八路军各部于8月底至9月初分别从驻地出发，开往抗日前线。

中共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民运部部长赵伯平前往东府，在八路军经过的沿途各县发动群众，迎送八路军。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也给沿途各县下达命令，由地方政府负责迎送和支应事宜。

八路军途经各地，严守纪律，秋毫无犯。他们通过文艺演出、书写抗日标语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的道理，也加深了群众对八路军的了解。八路军每到一地，群众奔走相告，犹如欢庆盛大节日，杀猪宰羊，箪食壶浆，慰问子弟兵。有的地方群众搭起牌楼，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夹道欢迎。在黄河渡口的芝川镇，由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名流参加的韩城各界迎送八路军筹备委员会，在黄河渡口筹集了百余条渡船，调集了数百名船夫。在群众的大力协助下，数万名八路军将士顺利渡过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二）陕西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

中共陕西省委就卢沟桥事变发出告各界同胞书和党内工作指示

西安事变后恢复的中共陕西省委，一方面加强自身建设，派出多路巡视员整顿和健全各地党的组织；另一方面，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陕西省委于7月10日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

告西北各界同胞书》，指出：卢沟桥事件“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外交烟幕，说明日寇对华新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就在我们面前。平津正陷于日军重围之中，整个华北处于第二个‘九一八事变’的前夜”，“六年来血的教训证明，这种‘退让’政策绝不能减轻日寇的进攻，相反只能增加日寇的贪欲与蛮横”[①]，号召全西北民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从工厂、农村、学校、兵营出来，到街道上去，参加示威！到华北去，参加抗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西安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示威，开展了空前的反侵略宣传周和“捐献一日所得”运动，支援前方抗日将士。

7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发出《关于日本进攻平津与党的任务及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全民族实行抗战抵御日寇对平津、华北进攻的总方针之下，各地党部及党团应坚决进行下列工作：(1)加紧开展抗战的宣传鼓动，广泛深入地向广大群众宣传解释中共中央通电和省委告同胞书的内容与立场，经过各救亡团体、群众组织发表宣言、通电，张贴标语口号，街头讲演、演剧、唱歌，把报纸、刊物、图画等一切可能利用的宣传工具及方式，用到我们手中，或在我们的影响之下，为抗战而宣传鼓励。(2)立刻开始援助第二十九军运动，鼓励第二十九军将士抗战到底。(3)加紧组织抗日人民的工作。把一些只有机关没有基础、只有干部没有群众的救亡团体，转变为有群众基础的救亡团体。(4)争取抗日救国的民主自由，用民众的力量，要求地方当局立即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给民众以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反对检查与扣留救亡刊物及新闻，反对压迫民众爱国运动。(5)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从各种实际的宣传与组织工作中拥护国共合作，以实现全民族抗战。(6)保护群众利益，要发动千百万群众走上抗战的道路，首先必须改善群众的生活。群众饿着肚皮，何能要求他们去抗日。(7)加强党对于一切民众运动的领导，肃清党内一切关门主义与尾巴主义的倾向。

同一天，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西安工委并报中共中央，卢沟桥事变扩大，西安应即进行下列工作：(1)动员各救亡团体、各学校、各界人民，发起平津抗战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1—72页。

后援会，组织抗日示威运动，向陕西省当局举行请愿运动，慰劳坚持平津抗战的第二十九军。(2)由各团体致电第二十九军，请再坚决抗战，保卫平津、华北，并通电国民党最高当局立即派大军北上援助第二十九军。(3)动员各报纸、刊物加紧抗战宣传，组织宣传队到街头、近郊宣传，标语、口号、传单应广泛，扩大保卫平津与抗战宣传。(4)由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动员各界救亡团体及回家学生推动各界救亡运动。(5)肃清汉奸、日本侦探的反动口号，并发动群众予以打击。(6)以上工作与扩大巩固抗日救国会及争取民主运动密切联系之。

陕西省委发布的《告西北各界同胞书》和两个党内指示，对于动员组织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和支持群众抗日救亡运动

在中共陕西省委的具体领导和坚决支持下，陕西国统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广泛地开展起来。

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他们首先以满腔的爱国热忱迅速投入抗战宣传的行列。7月13日，在陕西省委学生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发布《告各界同胞书》，指出："值此平津危急，中华民族最后生死存亡关头，只有全国同胞总动员实行对日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誓死不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为保卫祖国的完整愿流最后一滴血！"接着，西安各青年团体负责人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商讨陕西国统区青年学生推动和壮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具体措施。15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和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分别发出《为日寇进攻华北宣言》和致国民政府电，表示誓死保卫国土完整，武装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失地，要求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日作战，支持第二十九军英勇作战。为扩大抗日宣传，从1937年9月开始，以"民先"队员为骨干的各校学生在西安郊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宣传，随后连续组织了150多个农村工作团和寒假回乡工作团，分赴关中和陕南各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统一战线政策，帮助人民群众建立各种救亡团体。在西安各救亡团体的影响下，许多县的中小学生也迅速采取同

样的形式到农村开展宣传组织工作。

在国难当头之际，陕西妇女界也奋起救亡。1937年8月16日，由中共陕西省委妇女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的陕西妇女慰劳分会在西安成立。陕西妇女慰劳分会成立后，随即组织了工作团，深入农村，向广大妇女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分会创办的《西北妇女》，深受妇女界的欢迎，是陕西国统区影响较大的刊物之一。经过妇女慰劳分会深入细致地工作，陕西国统区有35个县建立了妇女慰劳会支会，她们为前线募集现金折合银币5000多元，金银器100多件，募到10万条棉被和大量的鞋袜。她们还救护伤员，慰问抗日军队，广大妇女成为抗日救亡的一支重要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到1938年，中共陕西组织领导建立的较大的抗日救亡团体有15个，成员近4万人。抗日团体创办的和在中共陕西组织影响下的报刊有《西北战线》、《老百姓》、《学生呼声》、《大团结》等20多种。这些报刊对于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宣传抗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6月15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恢复，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陕西省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安市各界救国会等14个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于16日书面请求其领导，并要求参加更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提出组织抗敌后援会，中共陕西省委于19日致函表示赞同，并要求其开放民众运动，增强抗日力量，扩大救亡运动，促使陕西抗日救亡活动进一步扩大。但是，坚持蒋介石片面抗战路线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对抗日救亡团体采取了敌视、限制、打击、取缔的方针，以省抗敌后援会要“统一指挥，整齐步伐，合一意志”为名，诬蔑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为“非法团体”，并于8月24日在《西京日报》刊登了取缔14个抗日救亡团体的第13号通告，不准青年学生上街为抗日募捐，不准下乡宣传，不准组织战地服务团，不准上街讲演、演救国戏剧，不准召开群众大会，不准出版和销售进步书籍、杂志，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

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社会各界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8月28日，被下令解散的14个抗日救亡团体联合发表《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一封公开信》，申述各救亡团体为群众爱国热忱所结成，批

评陕西省党部第18号通告“实为自抛其卵，自覆其巢的政策”。9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快邮代电，支持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的合理要求，建议由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包办的抗敌后援会实行改组，允许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各团体全体加入抗敌后援会，以求集中抗敌力量，统一救亡运动。

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陕西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等救亡团体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据理力争，通过谈判、斗争和必要的让步，在省抗敌后援会实行改组的条件下，停止了活动。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改名为省抗敌后援会西安学生分会，各县学生救国联合会也相继改名为合法的县抗敌后援会学生分会。

各地的学生分会运用合法地位，广泛地开展各种救亡运动。10月1日，西安学生分会呈文国民党陕西省当局，要求实施战时教育，实行抗日自由和开放民众运动。19日，在中共西安市工委学生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西安学生万余人在易俗社广场召开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高呼“开放民众运动”、“实施国难教育”等口号，各界代表纷纷发言，严厉谴责国民党压制民众运动的错误政策，会后进行了游行请愿。经过斗争，陕西省中等学校的学生基本上获得了半日上课半日参加救亡活动、到农村去做抗日宣传等抗日民主权利。

为了团结抗日，中共陕西省委在领导和支持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积极支持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成立的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简称“西北教盟”）开展活动。共产党员杨明轩等积极加入“西北教盟”，杨明轩还被选为“西北教盟”的主席。

“西北教盟”成立后，首先起草了《国难期间青年学生之任务》，并附《寒假工作提纲》，由省教育厅铅印成册，分发全省使用；继而又编拟了《国难教育方案及实施办法》，以中学、师范、小学和大众教育（社会教育）等分别提出各类学校在国难期间的教育目标、实施原则、课程设置和教育方法。“西北教盟”还借省教育厅名义在三原县设立陕西省教育厅初等教育人员训练班，并由杨明轩任所长，对原陕西省小学教师训练所进行改组，对教师进行国难教育的集训。1938年7月23日，“西北教盟”在西安举行代表大会，杨明轩、李寿亭、车

向忱、张寒晖、张耀斗等当选为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杨明轩继续当选为主席。由共产党员领导的“西北教盟”为西北地区抗日救国宣传教育作出了积极贡献。

保卫陕西和支援抗日前线的斗争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日军侵华战争的战略重点是占领华中及华南，但同时也妄图以山西为基地，强行西渡黄河，进犯陕西及西北。11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全陕紧急动员保卫陕西通电》，及时向陕西各界提出“保卫陕西及西北”的口号，要求国民党陕西当局及一切民众团体，为保卫陕西及西北紧急行动起来，组织陕西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迎击日军进攻。随后，省委派巡视员到黄河沿岸各县国统区，恢复和发展中共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做好抗击日军的准备。

1938年3月初，日军占领风陵渡，进逼潼关，疯狂炮击陕西河防阵地。陕西直接处于日军的进攻之下，形势骤然危急。3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保卫陕西宣言》，号召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最高原则下，为保卫陕西而奋斗，并提出加强潼关及沿河防线，划分适合战时的行政区域，建立全省、县、区乡动员民众机关，巩固陕西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力量的团结等具体主张。同时，省委还以省妇女慰劳分会名义发起组织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平津同学会、西安抗协总会、东北救亡会等20多个救亡团体，先后赴黄河沿县宣传抗日，动员民众保卫陕西，保卫西北，并到黄河防线的国民党军队里进行慰问。

在保卫陕西的斗争中，中共组织积极进行民众武装建设，随时准备支援前线。中共沿河特委与驻防沿河的国民党第三十八军第一七七师相配合，成立了沿河九县动员委员会，各县都成立了战时工作团，发动民众协助部队守卫河西防线，并举办军事训练大队，对沿河各县的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各县成立了抗日民众自卫队，朝邑、合阳等县的民众自卫队渡河参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动员300多名队员到前线参军参战，还在西安城南举行了四五千人参加的军事演习。西安500多名进步学生组织的19个战时工

作团，在共产党员带领下，奔赴华阴、潼关、合阳、富平、澄城等10余县，组织动员武装群众。

陕西各界群众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投入保卫陕西的战斗。

支持“陕军”开赴抗日前线

中共陕西组织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努力扩大统一战线范围，推动驻陕国民党军队抗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驻扎在陕西国统区境内的国民党部队陆续离开陕西，开赴抗日前线。各地党组织积极组织、动员群众进行慰问和欢送。

1937年7月10日，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率部从驻地绥德东渡黄河，首战参加平型关战役。

7月21日，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师长赵寿山率万余将士在三原县城举行北上抗日誓师大会。各界代表及数万群众热烈欢送。24日，十七师抵达河北省深县，与日军初战于保定。

8月14日，第三十八军教导团团长李振西率2800余名壮士在西安北校场举行抗日誓师大会，会后，在各界群众的热烈欢送下，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8月28日，第三十八军第一七七师在三原县城举行欢送第五二九旅开赴抗日前线参战大会。李兴中师长、许权中旅长、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及群众代表讲话。9月1日，第五二九旅从三原出发，10日与日军激战于山西忻口。

12月，驻榆林的第八十六师和驻晋绥边的第三十五军各一部合编为伊东游击纵队，计7000余人。第八十六师师长高双成兼纵队司令，高部团长高致凯任副司令、代司令，与日军战于陕晋绥边。

1938年1月1日，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司令张飞生、副司令张介臣在武功县宣誓就职。义勇军是由有志于抗日的回乡退伍军人和劳动青年自发组成的，下辖5个团，5000多人枪。不久，张飞生改任参议，何文鼎为司令。该部出省后与日军首战于晋西南永济县。

5月3日，第一七七师师长李兴中率师直属部队及第五三〇旅东渡黄河，

与日军激战于晋西南。

6月，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洲率部东渡黄河，坚守永济县，阻挡日伪军进攻陕西。

由三秦子弟组成的“陕军”，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陕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在陕西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下，开赴抗日前线，屡建战功。这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当属由十七路军改编而成的第三十八军。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三十八军中长期、广泛、深入地开展团结抗日工作，也由于部队中广大党员不怕牺牲、英勇抗战的模范带头作用，使得三十八军成为抗日的一支劲旅。在八年抗战中，三十八军率先参加了保定战役、娘子关战役、忻口战役，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进行了空前惨烈的永济战役，坚守中条山两年多，打退日军11次进攻和扫荡，使得日军视中条山为中国战区的“盲肠”。卫立煌称赞三十八军为“中条山的铁柱子”。在守卫洛阳至郑州段黄河防务期间，三十八军发动了广武战役，开展了豫北游击战，将日军围困在黄河桥头，两年不得挪动。在河南战役中，坚守巩东阵地，血战虎牢关，后又拒敌于洛宁、卢氏一线，保证了西安及关中的安全。三十八军成为抗日战争中最坚强的抗日部队之一。

三、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上)

(一)陕甘宁边区的形成和巩固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建立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中提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之指导"。随后,陕甘宁苏区开始了更名改制的准备工作。

苏区更名改制的准备工作,是从苏区内部和苏区外部两个方面进行的。

在苏区内部,1937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工作,负责筹备苏区的更名改制工作。4月26日,西北办事处决定成立选举法、政府系统组织法、文化建设计划、经济建设计划等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由蔡树藩、谢觉哉、徐特立、蔡子伟负责,起草有关条例和计划。5月,新成立的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发出"关于工会工作"、"关于改造赤卫军"、"关于改造贫农团"、"关于妇女组织"等指示,决定在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面前,对边区工作中的政策作必要的调整。所有政策方面的调整,都是为苏区的更名改制做准备的。

在苏区外部,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为代表,到西安、上海、庐山、南京等地,就苏区改制后的名称、辖区和行政长官人选等问题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并要求国民党发表公开文件,承认更名改制后的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3月8日,双方代表意见趋于一致: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委任"。但顾祝同在向蒋介石

上报由起草、经双方同意的书面条文时，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分属陕、甘、宁三省的“地方行政区”，并称此为中共代表单方面所提出。3月下旬，周恩来对蒋介石表示：陕甘宁边区为整个区域，不能分割。蒋介石说：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由中共推荐南京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派人任副职。5月25日，中共中央提出，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由九人组成，中共方面的是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南京方面的是张冲、杜斌丞。7月18日，周恩来提出12条谈判意见交蒋介石，其中有：迅速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称，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中选择一人担任边区政府正职，林伯渠担任副职，其管辖范围是现在所辖的18个县（延安、甘泉、富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旬邑、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盐池），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8月29日，国民党代表康泽转告叶剑英：陕甘宁边区公署主任内定丁惟汾，副主任林伯渠。9月2日，周恩来致电康泽转蒋介石，拒绝丁惟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任。中共坚持以林伯渠、张国焘为边区政府正、副长官。

由于国共双方代表在陕甘宁边区的名称、行政长官人选和管辖区域等问题上的谈判难趋一致，为了适应全民族全面抗战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不得已先行实践关于苏区更名改制的承诺，于9月6日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组成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

争取陕甘宁边区合法地位的斗争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为使边区合法化，中共中央继续派出代表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

1937年9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林伯渠、秦邦宪、叶剑英等：在谈判中，应向南京方面提出下列六项要求，速为发表，以保障红军在前线安心杀敌。甲、承认特区的民选制度，特区政府经人民选出后可以由南京委任。乙、委任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

为特区政府委员，以林伯渠为行政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坚决拒绝丁惟汾）。丙、民政、建设、教育、农工、财政五厅（反对设处）及保安司令部。丁、特区范围包括宜川、富县、洛川、淳化、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西峰镇、镇原、预旺、环县、盐池、定边、安边、靖边、横山南中部、安定（包括瓦窑堡）、米脂、绥德、清涧、佳县、吴堡、神府苏区、延川、延长在内。戊、特区经费每月15万元，另善后遣散费60万元。己、保安师编制9500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林伯渠将此电原文抄送蒋鼎文。但是10月12日举行的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却通过了军事委员会的函请，决议“简派丁惟汾为陕甘宁边区行政长官，林祖涵[①]为副行政长官，丁惟汾未到任前，由林祖涵代理”。会议虽然通过将陕甘宁26个县划为八路军募补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但未明文公布。此后，国民党出尔反尔，拒不兑现承诺。

11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敌人侵入山西、绥远，整个陕北已成直接抗战区域，又是八路军直接后方，故绥德、米脂、清涧、佳县、吴堡、宜川及原有神府苏区必须划入特区方利抗战；三边及横山南部亦为我们抗战必要，盐池、预旺亦然；镇原、西峰、庆阳、合水、正宁、宁县、淳化、旬邑原为八路军补充区，现各留有营底，洛川是通往西安的大道，延安被轰炸，机关即须移往该处。上述各县，连同苏区各中心县与27个整县，加上神木、府谷、横山3个半县，再加安边、西峰2个市镇，必须为陕甘宁边区的管辖区域。

在1938年进行的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陕甘宁边区管辖区域为23个县；边区政府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国民党坚持：边区所辖区域限于18个县，不允许增加；丁惟汾为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为副长官；不允许边区政府设立农工厅，并向边区政府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厅各派两人任职。谈判竟年，没有结果。

1939年2月1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就边区的行政区域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1）陕甘宁边区现在实际管辖者为下列各县：肤施、甘泉、富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旬邑、正宁、宁县、庆阳、

① 即林伯渠。

合水、环县、盐池，另有神木、府谷之一部。(2)查民国二十六年[①]十二月签呈陕甘宁边区所辖范围，除上列县区外，原因洛川、镇原、固原、海原、靖远等五县环绕边区，而各县之内亦多原有苏区，故曾将此五县一并划归边区管辖，今为行政管理方便计，该五县请仍隶原省，不必改划。惟另请将清涧、米脂、吴堡、绥德、佳县等五县划归边区管理，此则因该各县早已划归八路军河防部队驻守，且与边区有历史联系，为此可便于指挥和管理也。"[②]并附陕甘宁边区管辖区域图，要求行政院予以备案。但是，林伯渠的签呈仍然石沉大海。

1940年1月9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叶剑英谈判时提出，改陕甘宁边区为专员区，将原定的18个县划去淳化、旬邑、正宁、宁县，为14个县。7月2日，国民党中央提出，改陕甘宁边区为陕北行政区，辖15个县，行政区公署隶属行政院，归陕西省政府指导；第十八集团军留陕甘宁部队一律撤至陕北行政区。1941年2月25日，在重庆的周恩来向张冲提出，国民政府必须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

时隔三年，国民党又在1944年4月16日拟定的《中共政治问题解决办法草案》中，再次提出"改陕甘宁边区为陕北行政区，陕北行政公署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领导，辖18个县(内3县系一部分)"。5月9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又托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以书面形式转告在重庆的林伯渠：陕甘宁边区的管辖区域，"以原有区域为范围，并由中央派员会同勘定"。林伯渠将"以原有区域为范围"改为"以现有区域为范围"，签字后退还雷震。此后，国民党再无下文。

国民党和蒋介石虽然曾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由于他们畏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壮大，所以坚持"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始终不予公开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其所辖的行政区域。1944年6月，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说："边区这地方，原来由军委会划给26个县，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同时经国民政府行政院333次会议通过。当时没有明文公布。到以后我们知道，这是他们的骗局，以便不实行诺言。""因

① 即1937年。

②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166页。

为是一个骗局，虽然承认了，但不实行诺言，以后我们屡次提出，他们不能否认。”①

“双重政权”局面的结束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初期，管辖的区域里情形复杂，大致有三种情况：(1)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辟的苏维埃区域。(2)一部分是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撤出的驻防区。(3)一部分是西安事变和平谈判中国民党给部分红军指定的驻扎区。因此，半数县份存在着国共“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共产党领导的由苏维埃政权更名改制后的抗日民主政权，其县政府大都设在农村集镇；国民党领导的县政府大都设在县城里，也有两个县政府都设在一个县城里的。

在边区的国民党政权中，反动的顽固分子居多。因国民政府行政院迟迟不公开承认边区及其行政长官的合法地位，加之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和陕西省党部推行《推进陕甘宁边境党务办法》，诬蔑边区为“恶势力盘踞”，将边区划分为四个督导区，由国民党中央派员进行“秘密调查分化工作”。因此，反动的顽固分子有恃无恐。他们指示部属公开进行反共宣传，制造谣言，假冒八路军进行破坏活动，挑拨离间八路军与群众的关系；唆使一些原先逃离苏区的地主分子返乡，同在乡的反动地主相勾结，一起进行反攻倒算，向农民夺土地，收旧租，要旧账；唆使反动民团、土匪袭扰民主政府辖区，解散抗日救亡组织，以至枪杀民主政权的工作人员。其中绥德的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何绍南、洛川的第三行政督察区专员钟相毓、安定县长田杰生等更是反共、破坏统一抗战的“摩擦”专家。

陕甘宁边区境内的国民党政权已成为破坏国共合作抗战、欺压群众的恶劣势力。“延安县有两个县长，一个是月饷2块钱，一个是月饷180块钱，拿2块钱的是共产党员，拿180块钱的是反共专家。然而反共专家管的地方，只有窑洞一个，做的事情，就是反共，破坏，搞特务工作。他们这样反共下去，一定要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天下没有不走之狗，也没有不降日本帝国主义的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18页。

反共专家。”[①]因此，中共中央、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强烈要求国民党撤出他们派在边区境内的行政专员和县长。

1940年2月3日，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要求撤职严办国民党委派的贪赃枉法、纵兵为匪，扰乱后方的富县县长蒋隆埏，该县行政应完全受边区政府节制，洛川专员不得干涉。后边区政府委派罗成德为富县县长。2月18日，罗成德颁发《富县县政府布告》，宣告富县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区域。

2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天水行营主任程潜、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在陈述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何绍南的七条劣迹后指出：为地方计，为人民计，为抗战团结计，拟请将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提请绥米佳吴清警备区司令王震兼理专员一职，并将绥德警备区五县行政划归边区管辖。

2月19日，萧劲光再电程潜，要求陕西省政府将陕甘宁边区内的淳化、旬邑、甘泉、肤施、延长、延川、清涧、吴堡、绥德、米脂、佳县、靖边、定边13个县的县长撤走，以杜绝纠纷，巩固团结。程潜回电同意撤销国民党委派在边区13个县的县长。

国民党设在陕甘宁边区境内的绥德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和13个县政府退出了边区。在13名县长中，除自愿留在边区民主政府担任公职外，或潜逃，或被驱逐出境。边区境内的双重政权局面结束了。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形成了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的行政区域。全区设5个分区，下辖1个市，30个县。延属分区辖延安市及延安、甘泉、富县、志丹、安塞、子长、延川、延长、固临9个县，人口约38万；绥德分区辖清涧、绥德、米脂、佳县、子洲、吴堡、神府7个县，人口约56.2万；关中分区辖淳耀、赤水、新正、新宁4个县，人口约12.1万；陇东分区辖庆阳、合水、环县、镇原、曲子、华池6个县，人口约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26.2万；三边分区辖定边、盐池、靖边、吴旗[①]4个县，人口约10.5万。其中延安市和固临、子洲、神府、淳耀、赤水、新正、新宁、吴旗是边区政府新设置的县。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虽然一直没有公开承认陕甘宁边区，但边区政府辖1个市、30个县的实际行政区域一直延续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

（二）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

党组织的发展沿革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西北根据地由地方根据地转变为中央根据地，中共中央开始直接领导根据地的工作。为了适应工作需要，中共中央决定设立陕甘宁特区党的委员会，统一领导根据地党的工作。1937年5月15日，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特区党委正式执委17人：高岗、林伯渠、吴亮平、马明方、李富春、周兴、李建贞、郭洪涛、王达成、习仲勋、白治民、刘长胜、崔田民、张秀山、刘景范、崔田夫、李维汉；候补执委6人：罗梓铭、蔡畅、马锡五、王世泰、张邦英、马佩勋。5月17日，第一次执委会推选郭洪涛为书记。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抗战的需要，特区党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中共陕北省委，分别成立陕北东分区委员会（书记张达志）、西分区委员会（书记马文瑞），原归陕北省委管辖的神府特委（书记张秀山）改由特区党委领导。1937年9月，陕甘宁特区党委改称陕甘宁边区党委后，边区党委撤销了中共陕北东分区委员会和西分区委员会，其所属县委由边区党委直接管辖；撤销中共陕甘宁省委，成立庆环分区委员会（书记马文瑞）。10月，在定边中心县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三边特委（书记白如冰）；改中共关中特委为关中

① 今吴起县。

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此后,边区党委还在八路军驻防的绥德警备区和边区南部洛川一带,分别成立秘密的中共绥德特委(郭洪涛兼书记)和洛川工委(书记高克林)。1938年4月,郭洪涛调往山东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由高岗接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陕甘宁边区以外的陕、甘、宁、青、新、蒙等西北各省党的秘密工作。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边区党委抓紧有利时机,大量吸收新党员,至1939年底,边区党员由1937年5月的3.2万余人发展到5.4万多人。

1939年11月13日至12月17日,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塞举行。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指出边区党的各级组织要"提高自己,帮助别人",再次号召要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抗日民主模范区。高岗、陈云分别做了题为《关于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边区党委,高岗为书记,王观澜为副书记。

1940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边区党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副书记谢觉哉。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5月17日,中共中央任命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西北局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谢觉哉为副书记,统管西北地区党的工作。1943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为西北中央局常委。1944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陈云任西北中央局委员。

西北中央局成立后,撤销庆环分委,成立中共陇东分区特委。1941年11月,洛川特委并入富县县委。1942年底,西北中央局决定将陕西省委与关中分委合并,成立中共关中地委,隶属西北局,统一领导关中分区和陕西国统区的党组织。这一时期,西北中央局对边区党组织的机构和职能进行了调整:陇东、三边分委分别改为陇东、三边地委,成立延属地委;地委书记兼任警备

区司令部或军分区政治委员。

截至1941年春，边区各县都成立了县委，基层党组织遍布乡镇、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

1943年以后，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人民武装逐步对日伪军展开反攻。新形势需要进一步壮大党的队伍，发展革命力量。1944年4月，西北局召开党务工作座谈会，决定“吸收各个战线上发现的积极分子到党内来”。发展党员的主要对象是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反顽锄奸和减租减息的积极分子，有威信的青年、工人和学生。会议还规定，凡符合党员条件的青年，满15岁不满18岁者，可以吸收为预备党员；18岁以上者，可以吸收为正式党员。会后，各级党委及时制定发展计划，努力培养积极分子，经过严格审查，广泛吸收党员。

加强党员干部的理论和文化学习

在发展组织的同时，陕甘宁边区党组织还注意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政策教育，并加强文化学习，以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文化素养。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向全党发出关于开展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竞赛的号召。1939年6月，陕甘宁边区党委根据边区广大党员干部的实际情况，将边区党、政、军干部按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学习《联共(布)党史》；乙类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问题；丙类学习《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的社论、重要文章等。同年11月召开的边区第二次党代会特别强调，要以全力提高党员尤其是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指出这是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巩固党的关键，号召在全边区党组织中来一个深入而普遍的学习动员，领导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而努力地学习，并规定了干部教育、普通党员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具体办法和要求。

1940年春，边区党委对全边区在职干部的学习进行检查、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取组织措施，明确规定党、政、军机关均增设干部教育科，建立干部学习日制度，定期组织干部进行学习讨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

育的指示》和边区第二次党代会的决议，边区党委在对党的干部和党员进行政治教育方面，有计划地选调干部到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边区党校轮流训练区级干部及乡级主要干部，各分区及中心县设立干部训练班，在职干部实行每日两小时学习制；由边区党委提供以“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怎样开展支部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教材；由边区干部和小学教师中的党员担当训练班教员。在干部文化教育方面，为改变干部不识字的状况，动员他们参加识字班、夜校、冬学及其他补习学校。

1941年5月，毛泽东在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出“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马列主义基本原则。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据此，中共西北中央局号召把理论学习与研究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9月，西北局组织农村考察团到固临进行调查研究，并写出《固临调查》一书。12月，林伯渠率边区政府考察团去富县、甘泉，深入区、乡实地调查研究。与此同时，高岗也率领一个农村考察团赴绥德、米脂进行调查，写出《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随后，边区政府经济指导处各研究组分赴各县，对边区的工农业生产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实地考察。

经过两年的学习和调查研究，边区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对边区的实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边区党的组织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有了明显的改进和加强，党的政策较好地得到贯彻执行。

组织党员干部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1942年到1943年，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顿党的作风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由于这次整风运动发端于延安，又以延安为典型，所以一般称之为“延安整风运动”。

1942年2月，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演说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发表。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明确规定，这次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在新的基础上

新的团结。

陕甘宁边区整风运动是按系统进行的。4月14日，在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领导下，边区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其下设立党、政、军三个学习委员会，领导各个系统的整风学习。

4月21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边区总学委召开有2000多名干部参加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对整风学习、讨论、总结、考核等做了具体安排。会后，边区各系统、各单位分层次、自上而下地陆续掀起了整风学习的热潮。各系统的1.2万名干部和学校师生认真学习整风文件，检查个人思想、工作和历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清算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从而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党性，较好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深化了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一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准则的认识。经过整风，干部和党员的思想状况、精神面貌、工作态度和作风都有了明显的转变。

在全党整风期间，鉴于干部队伍迅速扩大，国民党加紧了特务活动，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部分机关、学校于1942年12月开始了审干工作。但在审干过程中对国民党特务活动作出了过分的估计，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或历史上尚未弄清楚的问题，轻易怀疑为政治问题以至反革命问题。身为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兼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在审干和反特斗争中发动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采用逼供信的方法，制造了一个个冤假错案。边区政府机关共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被“抢救”者达百余人，以致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一严重问题，并立即坚决加以纠正。毛泽东在干部会上首先承担了责任，中共中央于1943年8月15日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公开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审干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及“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精神，尖锐地批判了“逼供信”的错误做法，历时数月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得以遏制。

“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挫伤了一批党员干部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①]从1943年12月开始，西北局对边区一级和各地的冤案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了甄别平反。

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和西北历史座谈会

在边区整风运动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为了彻底清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把边区党组织建设得更好，中共西北中央局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毛泽东在开幕日和闭幕日都到会讲话，并且在会议期间做了两个重要报告。任弼时自始至终参加并领导了这次会议。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人也都到会做了重要讲话。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共266人，其中有陕甘宁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各系统的负责干部，各分区党政及军队旅一级的负责干部，县级党政及军队团一级的干部。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重要干部都到会旁听。

西北局确定这次高级干部会议的任务是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关（系）、整财、整学。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正确地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会议经过讨论，肯定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实际情况出发，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路线是正确的。清算了“左”倾错误给边区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特别是对1935年九、十月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在西北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干部，造成西北根据地的危机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和彻底的平反，解决了长期以来对陕北地区党内历史问题的争论。第二，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奠定了基础。与会者展开了尖锐而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过去某些党员干部把党和政、军及民众团体平列的观点，明确了共产党

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3页。

是无产阶级一切组织的最高形式的原则。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会议一致决定边区一级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归中共西北中央局统一领导，分区一级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归党的地方委员会统一领导。边区党的统一领导问题得到解决，使边区党在思想上、路线上、政策上和组织上得到统一，形成了在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巩固的团结。第三，明确了发展生产是边区党的基本任务。对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从1938年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根据1941年统计，边区的农民已经开荒230余万亩，种棉花9.4万余亩，其他如畜牧、纺织、运盐和合作社事业也都有了发展。人民政府已经建立了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工具、石炭等自给工业的基础，军队生产已经自给了经费的60%～80%，机关学校生产已经自给了经费的57%～90%。这三部分公营经济总起来已经占整个财政供给的五分之三。但是，多数人还没有深刻了解到经济建设工作是边区相对和平环境下唯一的中心工作。为了明确边区的中心任务，确定边区的建设方针，毛泽东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搜集和整理了大量历史和现实材料，写了长达10万字的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由贺龙向高干会议进行了传达。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着重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以及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提出生产和教育是边区建设的两大任务，而以生产为第一。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指出：为要完全解决经济财政问题，必须厉行精兵简政，纠正过去不愿彻底精简的态度，大量地减少消费人员而增加生产人员。

西北局高干会议有力地推动了边区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对于边区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研究党的路线问题起了先行一步的试点作用。

194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1944年3月初，周恩来做了题为《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学习和时局》的讲演，提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并对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

中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为正确分析党的历史问题指明了方向。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了结论。

1945年6月26日至8月2日，在朱德、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直接指导下，中共西北中央局在延安召开了高级干部参加的西北历史座谈会。会议对西北革命斗争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做了较为深入的回顾分析，对历史上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以及对西北根据地"肃反"中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一些当事人也在一些问题上检讨了过去的错误，承担了责任。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了是非，达到了加强团结的目的。

中共关中地委领导的整风学习

陕甘宁边区各分区、各县的整风学习，较边区晚一步。

参加中共关中地委领导的整风学习的人员有两部分，一是边区内的分区、县两级机关的干部，一是进入边区的陕西国统区党组织所属的党员和干部。对于边区内的学习人员，地委按照西北局1942年8月15日的指示，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或每月集中几天集体学习，或给干部规定学习具体任务，走到哪里学到哪里，或举办学习班。地委要求在深入学习党内整风文件的同时，还要结合评论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深刻认识国民党顽固派的本质，从而保持共产党员和党组织的政治纯洁性，提高坚持党的抗战、团结、进步方针的自觉性。

中共关中地委领导陕西国统区的党组织进行整风，主要办法是把在当地已经暴露、站不住脚的党员、干部调进边区，集中进行整风学习。地委将商洛地区进入边区的80多名党员干部组成"德记骡马店"，以巩德芳为经理，谢兴军为副经理，刘拓、王杰先后担任党支部书记，集中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他们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办了有百亩土地的两个农场，粮食生产逐步实现自给有余，还办了磨坊、粉坊、挂面坊、豆腐坊、木炭窑和杂货店，养猪，跑运输，学习和生产两丰收。谈国帆、王志温带领临潼县交

口镇的40多名党员、干部进入边区后，也是用这种办法进行整风学习的。零星进入边区的党员、干部则是住地委招待所，由地委组织部或统战部指定人员帮助他们进行整风学习。对在国统区坚持隐蔽斗争的党员、干部，则由地委派出的交通员口头传达整风学习文件精神。

1943年3月，中共关中地委开展了审干工作，开始对保卫、组织、机要、统战等部门的少数干部进行在职审查。5月28日，地委建立了地方干部整风训练班，先后将90多人集中起来进行学习和审查。7月，由于环境变化，遵照西北局指示，关中地委将一批知识分子新干部送往延安学习、审查。8月29日，地委确定从9月1日起，地委、专员公署、保安分处、整训班及其他机关主要负责人和管理干部，以审查干部思想历史、清查奸细为主。9月5日，军队整风队成立。10月7日，地委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正式布置各县普遍审查干部工作。受边区“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审干中出现了“左”的偏向，一些人被打成“特务”，造成了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审干工作九条方针下达后，地委从12月初开始坚决纠正审查干部工作中的错误，给受委屈的同志甄别平反，赔礼道歉，并认真总结审干工作中的教训。

（三）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

边区的政权体系与职能

实行民主政治，是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陕甘宁边区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成立了各级议会和民主政府。陕甘宁边区政权分边区、县、乡三级，由议会、政府和法院组成。

实行议会民主制度，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最重要的民主制度。在乡、区、县各级选举的基础上，1937年12月，选举产生了边区议会（1938年11月改称参议会）。边区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具有人民

代表大会性质。其职权是:选举或罢免边区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及高等法院院长;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的政务人员;批准关于民政、财政、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地方军事等项计划;通过和审查边区政府的预决算;决定征收、废除或增减地方捐税,发行地方公债;审议和决定议员的各项提案及其他兴革事宜。议长、副议长和其他常驻议员,也由参议会选举产生。由常驻议员组成的常驻议员会,在参议会闭会期间,监督政府执行参议会的决议案,听取工作报告,提出询问和建议,出席政府委员会议和召集临时参议会。边区参议会选出的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组成政府委员会,是参议会闭会期间的最高行政机关,负责边区的政务,并向参议会负责和报告工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是边区政府的派出机关,设专员、副专员,按照边区政府的命令和指示,指导和监督所辖各县政务及边区政府驻分区的附属机关。

县政权是推行边区各项政策的中坚力量。县参议会是县的最高权力机关,其性质、职权在本县范围内同边区参议会大体一致。县参议会选举县长、副县长和县政府委员及县法院院长。县政府委员会在县参议会闭会期间负责政务实施。县政府下设秘书、民政、财务、建设、教育、粮食、保安等科室及司法处、保安大队等机构。县的派出代表机关是区公署,协助县政府指导所属各乡的政权工作。

乡政府是边区的基层政权组织。乡参议会是乡的最高权力机关,不设议长和常驻议员,只在每次开会时推选三人组成主席团(乡长为当然成员)主持会议。乡一级实行议行合一的民主制度,乡参议会选举乡长、乡政府委员组成乡政府委员会,执行全乡政务,并对上级政府和乡参议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下设行政村,行政村辖若干自然村。

司法机关在边区设高等法院,分区设高等法院分庭,县设县法院。高等法院和县法院院长分别由边区和县参议会选举产生。

边区的两次普选与两届参议会

陕甘宁边区的选举制度是使一切抗日阶级、阶层、党派和各族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的选举制度。抗战期间,边区共进行了两次民主选举。

1937年7月，经过试点后，陕甘宁边区第一次选举由下而上逐步展开，各阶级、党派和社团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竞选名单。每20人选举一名乡代表，每200人选举一名县议员，每1500人选举一名边区代表。《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陕甘宁边区“采取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制，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7月6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发出《关于选举运动的指示》，重申“现在是普选，除汉奸外，不分阶级，都有选举权。苏区现虽无别党，但我们已允许别的党存在”。11月，在完成乡选、县选的基础上，开始进行边区议会的选举，各县市的党委陆续提出边区代表大会候选人名单。12月，经过各地直接选举或县代表大会选举，选出边区代表500多名。至此，历时半年多的边区选举运动全部结束。

为了使人民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边区政府根据老百姓文化程度低下，居住分散的情况，在普选过程中，采取了灵活多样的选举方法：识字者采用票选法；识字不多者采用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不识字者采用简单易行的投豆法、烙票法、举手法等；交通不便的则采用挨户送票法。选举谁和不选举谁，选民有充分的自由，并且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保障这种自由权。这些生动有趣、别开生面的选举方法，折射出边区人民追求民主的精神，也反映了边区民主的普遍性和真实性。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举行。会议选举林伯渠（主席）、高自立（副主席）、雷经天（高等法院院长）等15人为边区政府委员；高岗（参议会议长）、张邦英（副议长）等9人为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党内指示提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

1941年，陕甘宁边区进行第二次民主普选，这是一次贯彻“三三制”精神

的选举运动。为贯彻这一精神，边区首先在绥德、陇东分区及富县试行“三三制”，以取得经验。从5月开始，边区各级参议会和政府选举按照“三三制”的原则自下而上普遍展开。7月，乡（市）选举陆续完成，边区80%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共选出乡（市）参议员近3万名，共产党员占1/3强。各乡召开了乡参议会或代表会，选举了乡长，组成了新的乡政府。之后，县和边区两级参议会也开始选举，选出县参议员2624名，边区参议员242名（含31名候补参议员）。选举边区参议员时，由于很多党外候选人落选，边区政府正式聘请了46名非党人士担任边区参议员，一些县政府也聘请了非党人士担任县参议员。经过选举和聘请，边区和各县参议会的组成人员大体符合“三三制”的原则。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隆重举行。大会接受并通过了中共边区中央局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及两个决议、9个重要条例和400余件提案；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因当选的边区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超出1/3，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由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选举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召开，为“三三制”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政权建设中，边区还注意把“三三制”的原则贯彻到政府的各项工作、各级各类组织机构之中，充分团结非党进步人士和中间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发挥他们从事抗战、建设边区的作用。边区政府经常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征询他们对政府大政方针的意见；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与民主人士领导干部深交朋友，虚心听取意见；边区政府还切实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参议员中的少数民族名额按人口比例高于汉族。党外人士也从心底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同共产党合作得非常融洽。李鼎铭在就职演说中说：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非党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①

①《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1日。

在实行“三三制”,解决民主人士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同时,中共西北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还注重发挥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作用,倾听他们的意见,吸取他们的经验和创造,提拔他们中的一部分参加各级政权工作,作为政府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纽带,并通过他们去团结更广大的劳动群众。这不仅是“三三制”的一种极好的补充形式,而且使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在三级民主选举中,不少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当选为各级参议会的议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精兵简政与各项制度建设

精兵简政是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的一项重大改革。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边区政府进行了三次精简,基本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

在1941年11月召开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等11人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议案。毛泽东看了议案后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①]此后,精兵简政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开始在边区贯彻执行。第一次精简从1941年12月开始,到1942年结束,共裁减归并机构百余个,缩减1598人,占边区各级机关原有人数的24%。缩减的人员大部分充实到区、乡级行政机构。第二次精简从1942年5月部署,到9月结束,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建立边区政府的工作制度,实行合署办公,政务与事务适当分工,提高县政府的职能。1943年3月24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开始进行第三次精简,把35个机构减为22个,409人减为279人,其他各级政府也相应做了精简。经过三次精简,达到了机构精干、工作效能提高、作风改进、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党政军组织的统一领导等目的,使抗日民主政策得到了更好的贯彻,为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

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成立的边区学习指导委员会把加强政权建设列为整风的重要内容。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林伯渠做了《政权工作中的两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02页。

个根本思想问题》、《简政整政问题》和《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等报告和发言。会后，边区政府在原已公布的各项规章、条例的基础上，又陆续公布了一些规范公务人员行为、使各级政府工作制度化的条例，如《修正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修正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

边区对司法工作也很重视，逐步健全了司法机关，颁布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在司法工作实践中，还结合边区实际形成了马锡五审判方式。[①]这种审判方式的主要特点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把握案情；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合理合法地处理案件；就地审判，不拘形式；可以调解的尽量调解。

人权问题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受到高度重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写有保障人权的条款。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施政纲领和条例明确规定：一切抗日人民，不分种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在政治法律上一律平等；一切抗日人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移、信仰及抗日自卫的自由；一切抗日人民都有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个人均无逮捕、审讯、处理及侵犯他人的权利；而人民则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这些规定，对于提高干部和群众的人权观念，保障人民的人权、财权，加强各抗日阶层的团结，起了积极作用。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实验区，上述政权建设措施的实施，对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① 马锡五时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他总结的一种有别于国民党统治区审判方式的新的审判方式被称为“马锡五审判方式”。

(四)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建设

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和八路军留守兵团

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时,各师均在陕甘宁边区境内留了一部分部队,这是边区军事建设的主体。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在延安设立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并分设东区、西区留守处。神府、靖边、安定、志丹、扶施、甘泉、富县、洛川等县为东地区,驻守部队为第一一五师炮兵营、辎重营,第一二〇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及第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定边、盐池、环县、庆阳、合水、正宁、旬邑、淳县等为西地区,驻守部队为第一二九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及第三八五旅七七〇团。萧劲光为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曹里怀为参谋长,莫文骅为政治部主任,所辖兵力约9000人。

10月2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驻边区的八路军留守部队统一整编为陕甘宁警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团。后又将第七一八团改编为警备第八团。第七七〇团番号未变。

1939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改为八路军留守兵团(后"留守处"和"留守兵团"的名义根据需要分别使用),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共中央军委给留守部队下达的任务是"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据此,留守兵团切实加强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以适应战时及根据地建设的需要。首先,加强对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从1937年底到1938年7月,留守兵团先后召开

了一系列会议，强调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中心，积极开展“生产、学习”两大运动和“政治、军事、文化、党的工作”四大工作，提出了“把部队变成为战斗的学校”的口号，在部队中建立了经常的政治教育制度，组织学习小组，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和各项方针政策、时事政治以及文化的学习。干部、战士的马列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不断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和增强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次，进行组织和纪律整顿。经过整顿，部队严格了军事生活，建立了正常秩序，加强了团结，改善和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再次，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技术的学习，不断提高战斗力。技术训练着重于刺杀、射击、投弹和近迫作业的提高；战术训练以近战为中心，训练班排动作、夜间战斗、河川战斗以及森林、沙漠、高粱地等特殊地形条件下的战斗；提出“任务重于生命”的口号，培养指战员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经过军事训练和学习，部队的战斗力有很大提高。

在边区军队建设中，八路军留守兵团和边区政府首创了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的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双拥”运动。1942年10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决定在1943年春节期间，驻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和边区政府同时发起拥军拥政运动月活动。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拥军公约》和《“开展拥军运动月”的工作指示》，规定每年春节前后，要隆重慰问驻军。1月25日，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发出《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工作指示》，规定每年春节前后要向地方政府和人民贺年，增进军民感情。此后，“双拥”活动在边区迅速展开。同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将拥政爱民列为抗日根据地十大政策之一。发源于陕甘宁边区的“双拥”运动，是政府、军队和人民之间相互联系、增进团结的重要活动，成为人民军队和各级政府的优良传统。

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高岗任司

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兴任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吕振球任政治部主任。保安司令部下辖10多个保安基干大队，共约5000人。

边区的保安部队是由各地的游击队、警卫队等地方武装改编而成的，其主要任务是动员与组织民众参加抗日救国，镇压汉奸和反动派的阴谋活动，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协助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卫陕甘宁边区。

1938年3月，边区保安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划归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指挥。后又划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指挥。

1942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王世泰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吕振球为政治委员，陈伯钧为副司令员。

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全边区保安部队，下辖庆环、陇东、三边、神府、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及各县保安队。

1942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改编为警备第三旅。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1942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与晋西北联防军政治部，管辖两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及联防军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兼任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第一二〇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兼任联防军政治部第二副主任。留守兵团政治部并入联防军政治部。

1942年6月10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延安正式成立。9月15日，留守兵团司令部并入联防军司令部（对外仍称留守兵团司令部）。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后高岗代理），副司令员徐向前、萧劲光，副政治委员高岗、林枫，参谋长张经武。10月1日，联防军司令部召开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整编会议。经过整编，各独立团、队扩编为旅，每旅辖一二个主力团，其余编为小团；总兵力为5个旅21个团，共3.2万余人。其中，第三八五旅驻防陇东分区，第三五九旅驻防延属分区，警备第一旅驻防关中分区，警备第三旅驻防三边分区，骑兵旅驻防葫芦河。后，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三旅兼三边军分区，第三八五旅兼陇东军分区，第三五九旅兼延属军分区。

群众武装组织——抗日自卫军

组建广泛的群众武装组织是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军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7年8月25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作出《关于改造赤卫军的决定》，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起了重要作用的赤卫军改名为抗日自卫军，规定抗日自卫军“是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武装组织，是保卫边区的武装力量，是抗日的后备军”，“由边区保安司令部领导”。

1937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颁布《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条例》共10条，对自卫军的性质、任务、队员、编制、武器、各级首长选任、纪律、训练、指挥做了具体的规定。自卫军的任务是：“甲，保卫边区；乙，配合保安队或单独负责消灭汉奸、土匪，搜索零星匪徒，捕捉侦探；丙，担任警戒，设置盘查哨；丁，侦察敌情，递送情报；戊，经常进行抗战训练，负担战时有关军事的工作。”凡年龄在18岁以上45岁以下身体健壮的人民，均有自愿加入自卫军的权利，自卫军的最高建制为营，营长由边区保安司令部任免，连、排、班长及副职由连、排、班队员大会选举，报经上级批准。按实际情况，自卫军编制有基干自卫军的班、排、连，并由保安司令部发给一部分新式武器。

边区的自卫军组织发展很快。到1938年底，自卫军队员发展到22万人，其中基干自卫军3万多人。为加强对这支武装的领导，边区保安司令部专门设立了人民武装科；各县设保安大队部，县长兼大队长，县委书记兼政治委员，另设脱产的副大队长一人；各区设自卫军营，区长兼营长；各乡设连或排，由乡党支部或乡政府领导。

自卫军是不脱离生产的地方性群众武装团体，平时利用农闲操练，战时担任后方勤务，协助主力部队作战。自卫军在维护地方秩序、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安部队、自卫军，三位一体，胜利地保卫了千里河防线，剿灭了土匪，阻止或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进攻，从而使陕甘宁边区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得以顺利进行各项建设。

四、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下)

(一)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农业生产

陕甘宁边区处于分散的经济落后的农村环境。中共中央从边区经济状况的实际出发,确定了农业第一、工业(主要是手工业)第二、商业第三的经济建设方针。

为落实"农业第一"的经济建设方针,边区首先要解决农民和农村问题。而解决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关键又是土地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边区已有半数以上的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未经土改的地区则在抗战开始后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保障人权财权条例》规定:租佃债权债务双方均须遵照政府法令,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1942年10月11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后,未经土改的地区召开租户会议,成立农会、减租会、减租保地会、租户会等群众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彻底的减租减息。据绥德县6个区、米脂县3个区、子洲县5个区、清涧县3个半乡、佳县个别村的综合统计,除按条例减租外,还勾销欠租3.17万多石,退租1800多石,并在抽约换约的同时进行土地回赎。通过减租减息,适当地调节了边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也使地主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护,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业是边区经济的主体。抗战期间，边区的农业生产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937年至1939年为恢复阶段。这个阶段实行争取外援、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在内战时期遭到很大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运动。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吃饭是第一个问题”，号召一切可能的地方发展农业和工业，开展合作化运动，自己动手，解决吃饭、穿衣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困难，以利抗战。这一年，全边区开荒105.5万多亩，耕地面积由1936年的843万亩增至1000多万亩，粮食总产量由103万石左右增至137万多石，牛、驴由10多万头增至28万多头，羊由50万只左右增至117万只。

1940年至1942年为自力更生、克服严重困难阶段。1940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强调“广泛地开展边区经济建设，是边区当前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没有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边区的巩固和发展是不可能的”。12月3日，边区中央局在延安召开经济自给动员大会，提出“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完全的自给”。1941年至1942年，边区党政机关的工作重点是组织和领导群众进行农业生产。1942年，粮食总产量150多万石，棉花总产量140.3万余斤，公粮征收则由上年的20万石减为16万石。1940年到1942年三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靠自己动手获得的收入占了经费支出的部分或大部分，有的还做到自给有余，上缴公粮。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1943年以后，是为丰衣足食而斗争的全面发展阶段。1942年10月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了几年来生产运动的成就和经验，提出了生产第一的任务。194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丰衣足食”的号召。3月4日，中央生产委员会召开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以此为契机，边区军民开展了以“丰衣足食”为目标的大生产运动。11月，边区举办第三届生产展览会，从展出的情况看，全边区耕地总面积约1338万亩；粮食总产量约181

万石，除满足消费外，尚节余21万石；总劳力33万人，参加互助组的占1/4；安置移民约8000户；棉花种植面积达15万余亩，产棉约173万斤，达需要量的50%以上。1944年以后，农业又有新的发展，基本上实现了边区政府提出的“耕三余一”的要求。到1945年，耕地为1520多万亩，植棉约35万亩，牛、驴约40万头，羊约196万只。公粮降至12.4万石。

工业、交通、通讯

陕甘宁边区原没有工业基础。从1938年起，边区开始建设公营工业。1939年，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同时积极发展手工业。为此，边区政府曾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鼓励私人开办企业，为工业投资；欢迎海外华侨到边区兴办实业。1938年2月，沈鸿带领7名技术工人和10部工作“母机”，从上海来到延安，建立了兵工厂，奠定了边区工业发展的基础。1941年，边区的公营工业有了飞速发展，政府、部队、机关、学校都创办了一批工厂。三、四月，延安公营工厂职工开展竞赛月活动，大大加强了劳动纪律，提高了生产效率，平均产量超过原计划43%，产品质量显著好转，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这一年，政府经营的工厂共22个。1942年，边区公营工厂进行调整合并，到年底，已有工厂74个，资金约5967万元，职工4036人，连同私营和生产合作社，职工达21万人（小手工业工人未计）。这一年，边区生产土布约10万大匹，造纸约6900令，许多产品结束了零的历史，全部或部分地满足了军需民用。同时，私营手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农村约有土织布机1.2万架，手拉机6.8万架，纺妇约7.5万人，织妇约1.3万人，年产土布约5.4万匹；造纸厂48家。1943年3月，边区政府建设厅召开厂长联席会议，确定在进一步开展赵占魁运动[①]的基础上，对公营工厂进行整顿，改进领导作风，肃清自由主义、官僚主义，调动工人当家做主的责任感和参加工业建设的积极性。1944年5月，边区举行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提出了公私兼顾、先公后私、科学技术与工人群众的创造性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工人品质与生产技术相

① 赵占魁，山西定襄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农具厂工人，曾两次荣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称号，成为陕甘宁边区工人的一面旗帜。1942年，边区总工会在工厂开展“赵占魁运动”，号召边区工人向赵占魁学习。

统一、工厂企业化等原则。7月，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要求各工业管理部门努力发展工业生产，提倡群众使用边区工业产品；有计划地发展合作社和民营纺织、造纸、煤矿、陶瓷等工业；提高工业品质量；重视技术、尊重技术人员；加强领导和深化赵占魁运动。在这些正确方针的指引下，边区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44年底，公营工业已建立起纺织、被服、肥皂、火柴、造纸、印刷、煤矿、石油、化工、炼铸、盐业、机器制造和兵工等大小工厂123个，职工达1.2万余人。私营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各种工厂、作坊多达1400多家，职工4500多人。棉布的自给率约达70.3%，其他日用工业品也实现了自给或半自给的要求。到抗战胜利时，在重工业和化工方面，能炼铁、炼油、修造机器、配制军需品，制造盐酸、硝酸、硫酸、玻璃和陶瓷；在轻工业方面，年产土布15万大匹以上，纸张近2万令，还创办了火柴厂；民间纺妇达15万人以上，织妇近5万人，各种织布机近3万架。

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运输工具主要是毛驴等牲畜。为了发展经济，沟通边区内部以及与外部的联系，边区下大力气发展交通运输事业。1937年秋冬，边区政府建设厅与国民党陕西省建设厅协作，修复了富县至清涧段的211公里公路。此后，边区政府又组织补修，并由清涧延至米脂，使这段公路增长到365公里。1940年，边区政府拨款200万元，修通了延(安)定(边)、延(安)庆(阳)两条大车路。至1945年8月，运输合作社发展到317个，运输牲口由1942年的246头发展到1944年6月的近6900头，并以公营、公私合营或私营等形式，在各交通要点设立了交通站和过载站、骡马店、草料店等。

陕甘宁边区通讯站于1938年5月成立，主要任务是传递境内党政军民的各种报纸、文件、信件、书籍等，并与晋西北沟通联系。到1940年3月，通讯站系统的组织机构大体形成，总站下设绥德、关中、庆环、陇东、三边5个分站。分站下设15个县站，另设13个联络站，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通讯路线10余条。之后，撤销了陇东、庆环2个分站，设立庆阳分站，新增9个县站和33个宿站，20个食站，各站计有干部52人，通讯员129人。边区通讯站后改名为边区邮政管理局。

财政、金融、商贸

陕甘宁边区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抗战需要，促进生产发展，平衡财政收支，稳定市场。

抗战期间，边区的财政工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940年以前，是边区财政工作的创建时期，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和基本任务是争取外援与休养民力。外援占全部国民经济收入的比例，1937年为77.3%，1938年为51.6%，1939年为85.79%，1940年为74.7%。财政收入首先用于扶助农民发展生产，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减轻人民的负担。1937年征收公粮1.4万石，人均1升多；1938年征收公粮1.59万石，人均1升2合。边区各级工作人员厉行节约，减少开支，实行极低的津贴制，最高津贴每人每月5元，县长2.5元。1939年，机关、部队、学校开展生产劳动，减少了财政支出，增加了对生产建设的投资。

1941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费，并对边区进行军事和经济封锁，边区外援断绝，加上边区脱离生产人员增加，物价上涨，边区财政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是边区财政工作最艰难的时期，边区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来克服困难，主要是：向人民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禁止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在边区境内流通，发行边区货币，巩固金融，稳定市场；成立税务机构，统一税制；开发食盐业，促进农工业的发展。采取这些措施后，增加了财政收入。

1943年，由于广大军民为实现丰衣足食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大生产运动，边区的财政工作进入好转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边区政府财政对经济建设的投资逐年增长，1943年比1942年增加9倍，1944年比1943年增加50%，1945年仅农业投资就超过1944年全部经济建设投资的总和，各机关、学校、部队都有了自己的小积蓄。据1945年对27个县统计，生产收入平均占财政支出50%以上的为10个县，占33%以上的为7个县，占20%以上的为4个县，不足20%的为6个县。这一年，各县基本上实现了经费自给，政府取之于民的部分开始减少，党政军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到1944年，边区的财政收

支基本平衡，保证了抗日战争的供给，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

1937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区境内流通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1938年，边区银行发行“光华代价券”六种，以解决市场辅币的不足。1939年，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以边币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1941年1月30日，边区政府颁布停止使用法币的布告；2月18日授权边区银行发行面值为1元、5元、10元的边币，作为边区唯一的本位币，并逐步收回光华券。1944年5月，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流通券1元等于边币20元。边区又以民办公助、统一领导、入股退股自由为原则，倡办农村信用社。1945年，信用社发展到80余家，吸收存款约15亿元，起到了小银行的作用。与此同时，银行的主要财力则用于发放贷款、发展生产等方面。

经济的发展活跃了商业贸易。边区政府推行保护商业、团结保护私营工商业者、鼓励边区以外的工商业者到边区投资经营等政策，对商业给予扶持帮助。到1940年，边区第一个公营商业机构——光华商店，商品流转量已由初期的约400万元法币增加到约2000万元，公营商店仅延安就有46家；到1943年，私人商店仅延安就有473家，资本22亿元；到1944年，机关、学校分散经营的大小商店，仅延安就有67家。1938年1月，政府成立了消费合作社边区总社，各县建立了县联社。到1944年，全边区有消费合作社281个，方便了社员的交换，改善了人民生活。在边区受到国民党军队重点封锁之后，边区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开展内外贸易。1941年2月恢复了边区贸易总局，并规定了“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贸易政策。1943年，边区出口总值法币53万余元。1944年，仅盐业公司就卖出食盐24万多驮，土产公司换进法币10亿多元，进口总值299万余元，资本增值极快，仅土产公司就增值约22亿元，相当于该公司1942年成立时资本的202倍。公营企业以其雄厚的资金控制着边区的内外贸易，成为边区商业贸易的骨干和开展贸易斗争的基石。此外，还在商业集中的城镇形成了一些街市，恢复和发展了农村集市和骡马大会。

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为渡过严重困难，巩固抗日民主政权，

支持长期战争,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工作干部。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经济建设"在保证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是适时的抓住这个环节,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革命链条,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前进"①。

(二)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

教育和新闻出版工作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原来十分落后,全边区99%的人口是文盲。全面抗战爆发后,边区党组织和民主政权遵照《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行毛泽东提出的国防教育思想与抗战教育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全边区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国防教育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成立了国防教育会。随后,边区政府教育厅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的方针与实施办法》,强调边区国防教育的任务是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胜利信心和增加抗战的知识技能,以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训练千百万优良的抗战干部,培养将来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建设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1939年1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第一届参议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为要普及边区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教育民族新后代,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国防教育工作是当前迫切的任务。同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边区教育提高边区文化的决议》。之后,边区政府作出了许多决定和指示,对国民教育、干部教育工作做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60页。

了具体部署，并从上到下建立健全了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1943年12月召开的边区政府第三次委员会议明确规定，边区教育的方针是："为抗日战争与边区人民服务，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在这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组织的保障下，边区的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

干部教育的途径一是在职教育，二是在校培训。中共中央和西北局都规定了干部在职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同时有计划地抽调干部离职学习。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西北中央局均办有党校，先后培训县、区干部3700多人。1942年以后，边区师范学校、三边师范学校、绥德师范学校增设行政人员训练班，培训行政干部400多人。1943年以后，各县都在冬季举办干部训练班，每年培训区、乡干部2000人左右。中共中央在延安办的干部学校也吸收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参加学习。干部教育工作的大力开展，对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行政能力起了重要作用。

边区十分重视国民教育。1937年春，全边区仅有小学320所，在校生约5600人。到1940年春，已有小学1340所，在校学生4.1万余人，学校增长3倍多，学生增长6倍多。此后，小学教育不断发展，民办小学也在逐年增多。到1944年上半年，小学达1377所，其中民办小学1057所，在校学生约3.4万人。1937年以前，边区内没有中学。1937年3月成立鲁迅师范学校，1938年成立边区中学，到1942年，边区中学由2所增加到10所，其中普通中学2所，师范学校5所，中等专业学校3所，在校学生2000多人。

边区还加强了以成年农民为主要对象的不脱产的社会教育。1937年9月，边区政府提出开展识字运动，并开始办理冬学，建立了以小学为中心的半日校和夜校，进行不脱产的扫盲教育。1940年10月6日，边区党委宣传部、边区政府教育厅、边区保安司令部和边区工人、青年、妇女等群众团体联合发出《关于办理冬学给各界的指示信》，要求动员14岁至40岁的文盲、半文盲，利用冬季农闲时节入冬学学习，并由县、区、乡建立冬学委员会，主持这一工作。此后，边区政府教育厅陆续发出关于办好冬学的指示，使冬学运动在边区广泛开展起来。在政府的领导和必要帮助下，以民办公助为基本方针，以需要和自愿参加为原则，以读报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读书班、民教馆

等形式的社会教育在边区迅速发展。到1944年,各类识字组、读报组几乎遍及各村,全边区参加冬学的农民约5万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读、写、算以及群众迫切需要的卫生知识。

中共中央和边区党组织先后恢复和创办了《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打日本》、《边区群众报》、《抗战报》、《救亡报》、《战声报》、《部队生活报》、《关中报》、《三边报》、《绥德大众报》、《佳县报》、《新神府》、《靖边报》、《战旗报》、《米脂报》、《赤水报》等,到1944年10月,边区共出版报纸40种,为报纸写稿的通讯员达1952人,其中1114人是区、乡、村干部。边区还陆续出版了《解放》、《共产党人》、《学习导报》、《文艺战线》、《中国文化》、《大众文艺》、《诗刊》、《国防卫生》等60多种刊物。此外,还有668块黑板报,各部队、机关、学校都有墙报。在图书出版方面,成立了解放出版社和边区出版社,开办了新华书店,出版发行了大量的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以及中、小学的文化课本。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成并首次播音,主要广播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文告及国内外新闻,影响全国以至国外。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在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卫生工作

随着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建设的开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政治民主权利都得到了提高,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缺医少药、迷信、愚昧和不讲卫生的现象还严重存在,疫病流行,巫神横行,人畜死亡率很高,一些地方婴儿死亡率曾高达60%,成人死亡率达3%。这些严重问题引起了边区党组织和民主政府的高度重视。1939年11月,边区第二次党代会通过的《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指出:应在边区人民中进行普遍的清洁卫生教育,提高人民讲究清洁卫生的知识水平,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医药卫生工作,研究中药,发展制药厂,设立医药合作社,增设卫生所,发展医疗工作。1940年以后,边区医药卫生工作逐步发展起来,边区成立了专门的医药卫生工作管理机构。6月,边区召开国医代表大会,成立了边区国医研究会。之后,边区医药学校、白求恩护士学校、中华医药研究会、边区医药学会等一些医药教育、研究机构

相继成立，全边区开展了广泛的卫生运动，改善了卫生状况。

1944年春，延安数县传染病急剧流行，边区政府成立了防疫委员会，领导防疫工作，组织流动医疗队下乡救治疫病患者。6月30日，边区卫生动员大会在延安召开，号召人民群众讲究卫生，医务工作者热心为群众服务，造成热烈的群众卫生运动。会后，举行了夏季卫生运动宣传周，各医疗队在乡村巡回医疗，举办展览、助产训练班，给群众讲解卫生常识，开展群众卫生工作，使疫病得到控制。在边区政府发出的“卫生第一”、“婴儿死亡率降60%以下”的号召下，各地还在冬学运动中创办了一批以妇婴卫生为主要内容的妇女卫生冬学，推广新法接生，宣传科学卫生道理和妇婴保健常识，启发群众起来同愚昧现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

到1945年初，边区有医院11处，卫生所75处，休养所7处，西医276人，中医1074人，接生员61人，兽医54人，药店390家。通过提倡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组织医疗人员下乡、广泛宣传和普及科学卫生知识，农村不讲卫生的陋习逐步得到改变，人民的体质不断增强。

文学艺术工作

陕甘宁边区的民主空气与自由环境为文学艺术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文艺工作者云集延安，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发展革命的文艺工作，开展抗战宣传活动，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

1937年11月2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之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等专业协会相继成立。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其下含有社会科学研究会、国防教育研究会、国防科学社、战歌社、海燕社、世界语者协会、新文字研究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抗战文艺工作团、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文艺突击队、诗歌总会、戏剧界抗战联合总会、文艺顾问委员会等众多文化工作团体。这些文化团体的任务在于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唤起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觉，争取思想界的民主，扩大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

组织起来的文化人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抗战宣传工作之中，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起来抗战。1938年8月，丁玲、周巍峙等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东渡黄河，足迹遍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战地服务。抗战剧团、民众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鲁迅艺术文学院实验剧团、延安电影团、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烽火剧团、边区保安剧团、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延安平剧研究院等文艺团体更是活跃在陕甘宁城乡大地。据1940年统计，抗战以来，边区在美术方面，各种宣传画、漫画、木刻、壁画等创作在3500件以上；音乐方面的创作，从小调歌曲到大合唱，共计300首以上；戏剧作品，由活报杂耍到两三幕的大戏，有10种以上；文学创作如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数量之多，无从估计。

1942年5月2日，边区文艺座谈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并做了结论，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的问题。座谈会后，文艺界开始进行整风学习。5月29日，陕甘宁边区文委召集有关文艺团体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实行战时文化动员，号召文艺工作者到部队去，到地方民兵中去，文武结合，进行对敌斗争。1943年3月22日，中共中央文委确定各抗日根据地戏剧工作的总方针是“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文艺界提出“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行动口号，文艺工作者纷纷下乡、下厂、下部队。1944年4月28日和5月2日，中共西北中央局文委两次召开会议，总结剧团下乡和当年春节延安市宣传队工作，强调戏剧和戏剧创作要为政治任务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秧歌剧运动要有群众性，从实际出发，以普及为主。

延安文艺座谈会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带来了延安文艺界的勃勃生机，加之1943年全边区大生产运动取得丰硕成果，为文化运动的大规模开展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边区的文艺工作空前活跃起来，创作出了大批反映群众斗争生活、反映抗日战争重大题材的作品。许多优秀作品如《兄妹开荒》、《改造二流子》、《南泥湾》、《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血泪仇》、《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等风靡边区，并迅速传播到其他根

据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流传至今。边区革命斗争的实践造就了一大批有作为的文艺工作者。

边区专业性文艺协会有边区音协、剧协、美协等，文艺刊物有《文艺突击》、《文艺战线》、《文艺时报》、《大众文艺》、《部队文艺》、《新诗歌》等20多种。电影从无到有，先后拍摄了《南泥湾》、《延安与八路军》等十分珍贵的纪录片。艺术教育除业余的星期音乐学校和星期文艺学校外，有专业的鲁迅艺术文学院、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延安部队艺术学校。这一时期文艺运动的特点是：文艺与人民，特别是与工农兵群众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艺术创作者和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大幅度接近、结合；艺术主体形象中劳动人民大幅度地替代了社会其他阶层的人物和生活；艺术欣赏者突破知识阶层，大幅度地走向劳动阶层。

陕甘宁边区的文艺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在服务人民大众，服务抗战方面书写了彪炳史册的业绩，也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营养。

（三）陕甘宁边区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活动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是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对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保卫千里河防

陕甘宁边区东临黄河，保卫南自宜川、北至府谷的千里河防，阻止日军西进，守护西北大后方的安全，是边区军民的头等大事。

1937年10月，日军大举侵入晋西北，河防吃紧。10月26日，中共中央召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河防中段清涧、绥德、米脂、佳县、吴堡等县的工作。会议要求联合左翼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顽固分子，建立群众工作，在统一战线斗争中巩固河防。

10月28日，毛泽东致电驻防榆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师长高双成、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何绍南：拟派八路军陈奇涵部由肤施出发，阎红彦部由庆阳出发，前往清、绥、米、佳、吴五县接防。此前21日，毛泽东、萧劲光已电令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从黄陵、洛川开往清涧河口一带巩固河防。八路军绥德警备区司令部随即成立，陈奇涵任司令员，中共绥德特委书记郭洪涛兼任政治委员，下辖警备第一团、第三团、第八团。随后，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神府第一河防司令部也相继成立。两延河防司令部由何长工任司令员，负责河防南段的防务；第一河防司令部由神府保安司令部改设，黄罗斌任司令员，中共神府特委书记张秀山兼任政治委员，负责河防北段的防务。边区政府动员数千青年参军，募送毛袜和手套10万双，沿河各县组成运输队运输军需物资，支援河防前线。

1938年2月25日18时，日军2000余人占领山西离石，进扰军渡。另一部进至川口，意向河西。毛泽东、滕代远、萧劲光随即对河防作出如下部署：河合村至大河坪为第一河防区，黄罗斌负责；大河坪至丁家畔为第二河防区（碛口对面），贺晋年负责；丁家畔至沟口为第三河防区（军渡对面），文年生负责；沟口至河口为第四河防区，阎红彦负责；以上四区统归陈奇涵指挥。河口至马头关为第五河防区，白志文负责；马头关至凉水崖为第六河防区，陈先瑞负责；以上两区统归白志文指挥。并指示各地加紧动员民众，巩固河防，以策应河东的八路军和友军作战。

为了配合河防战斗，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于3月3日发表《告民众书》，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抗日的先进地区，是八路军和全国军队的后方”，“边区的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决心领导边区民众誓死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而奋斗”，号召“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配合军队参加抗战，努力参加抗战动员工作，粉碎日寇进攻边区”。《新中华报》也于3月5日发表了题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的社论，号召广大军民“紧紧地团

结，击破日寇的进攻”。

3月12日，日军一部2000多人，附炮20余门，携带渡河器材占领山西兴县，13日向神府河段发动攻击。日军在1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企图强渡黄河。警备第六团沉着应战，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术，当日军开始渡河、队形密集之际，给以猛烈炮击，并以机动兵力一部迂回河东袭击日军侧背。日军因受两面夹击，强渡失败，死伤100余人，退回兴县。

5月初，日军在离石一带集结了1个团的兵力，附炮30余门，再次沿汾（阳）离（石）公路西进，企图占领渡口，进犯河西宋家川河防阵地。宋家川是黄河岸边一个极为重要的渡口，陕晋两省的重要水上通道，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警备第八团主力东渡，在离石西北地区采取袭击、伏击等手段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歼灭日军200余人，迫使日军不敢贸然西进，其进占宋家川的企图失败。

为了保卫河防北段的安全，毛泽东于12月5日致函驻榆林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兼新编第一军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指出“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①]，并派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持函赴榆林报告防务，争取友军的支持与配合。

1939年元旦，侵占晋西大宁、吉县、永和一带的日军分兵3路，每路约1000余人，附大炮10门，同时炮击河西固临县泯金滩和延长县马头关、凉水崖，妄图强渡黄河。延长县抗日军民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在凉水崖渡口西岸的石崖上凿出一条长石洞，洞口开在侧面，正面凿有许多射击孔，洞外用杂草、树枝伪装，使整个渡口形成了一道具有相对纵深的坚固防御体系。警备第五团二营官兵早已做好了迎敌的准备，严阵以待。进犯日军一阵狂轰之后，分乘大小橡皮船、筏子渡河。当日军距西岸只有200米时，八路军突然集中火力向日军射击，河中日兵死的死，伤的伤，落水的落水，其后续部队见状落荒而逃。与此同时，驻守泯金滩、马头关的警备第五团也打败了日军的进攻，共击毙日军80余人。

6月5日，日军万余人进占军渡后，以大炮集中轰炸西岸宋家川、枣林坪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

一线的河防阵地。6日，日军进攻孟口、碛口，并以飞机滥炸西岸李家沟河防阵地及沿河村镇。日军的另一部2000余人占领马头关、凉水崖东岸的阵地，企图强渡西犯。9月4日，日军再次进占军渡，炮击宋家川。11月23日，日军进占碛口、孟口两镇，炮轰河西河防村镇，并在炮火掩护下以2000余人实施强渡。12月初，日军再次进犯军渡，占领李家崖，炮轰宋家川等地。在河东八路军和游击队的配合下，河西河防部队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犯，使其强渡屡屡失败。

八路军河防部队不仅要同企图西犯的日伪军进行战斗，而且要与企图破坏河防的顽固派进行斗争。1940年春，顽固派以增援陕西河防为名进行反共军事部署，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河东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西渡，进驻绥德警备区所属各县。顽固派又阴谋以李文第九十军的三个师西渡，进占绥德警备区。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负责人连发明电，质问蒋介石、程潜、阎锡山意欲何为，同时指示各地加强河防。蒋介石等人得知边区已有准备，遂改变了李文部西渡的计划。

1942年3月，日军“扫荡”河东沿岸各地，炮轰河西阵地，我军在反“扫荡”中击退日军。此后，河东沿线皆为八路军、游击队及友军所驻防。在几年的保卫河防战斗中，河防部队指战员以保卫中共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坚决消灭来犯之敌的坚定信念和高昂的战斗热情，与日军英勇作战78次。边区民众以保卫家乡、保卫祖国的神圣责任感，积极参加抗日自卫军，为河防部队运送粮草，随同作战部队上前线抬担架，护理伤病员。固临、延长、延川县有4000多名自卫军、1000多头牲口配合主力开赴前线，而且多次主动出击河东，扰乱并钳制日军。宋家川120名水手全部参加自卫军，协助主力部队作战。在保卫河防战斗期间，边区政府组织民众自卫军站岗、放哨、查户口，发动军民清除汉奸、土匪，边区内部的社会秩序安定，使河防部队有一个可靠安定的后方。由于军民大联合，军政大团结，使千里河防成为日军不可逾越的坚固防线，胜利地保卫了边区的安全。

为抗战人员提供后勤保障

陕甘宁边区是个经济落后的地方，同时又是个政治特殊的地方。由于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设在延安，由于这里实行彻底的抗日民主政策，所以全国各地的爱国志士纷纷奔赴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全边区脱离生产的抗日工作人员逐年增加，1937年1.4万多人，1938年1.6万多人，1939年猛增到近5万人。为脱离生产人员提供生活保障成为边区财政的重大任务。

“国民党在1937、1938、1939年还给我们发饷，从1940年开始就实行封锁。”[①]1940年11月19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通告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自即日起停发八路军的经费，10月份欠发的20万元亦行停止。此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每月60万元的军饷，对陕甘宁边区再“无颗弹、片药、文钱、粒米之接济”。[②]加之国民政府对边区实行断邮，外来货币无法汇兑，边区政府的外援收入断绝。

但是，进入边区的抗日志士还在增加。1941年，全边区脱离生产的公务人员增加到73117人，加上安置了11500多名伤、病退伍军人，边区脱产人员最多时达10万人，还有8120匹军政使役骡马。边区的财政经济出现了极为严重的状况。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③]何应钦“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他这样一困，我们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饿死，还是自己动手搞生产的问题。解散不甘心，饿死不愿意，那剩下一条，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④]。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每天都在等待着边区‘塌台’的经济困难”形势，陕甘宁边区人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一面努力生产，一面节衣缩食，尽力完成以至超额完成缴纳救国公粮的任务，支持政府渡过难关。毛泽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2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页。

东对此作了高度评价: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1940年的9万担,1941年的20万担,1942年的16万担,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食粮。陕甘宁边区"只有150万人口,供给这样多的粮食,是不容易的。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1941年还买了500万元公债,也是不小的负担"[①]。在抗日战争的后三年,虽然由于军队屯田、机关生产实现了部分自给,人民的负担逐年下降,但是人民缴纳的救国公粮每年仍在10万石以上,1943年18.4万石,1944年16万石,1945年12.4万石。

"仅有人口150万的边区,却养活了10万公家人"[②]。这是陕甘宁边区人民为支持长期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

安置外来移民和难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沦陷区的难民纷纷流向大后方。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外来的难民和移民采取了积极安置和优待的政策,深得民心,广受赞扬。

1940年3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规定凡沦陷区或非沦陷区之难民或贫民,如愿入陕甘宁边区居住从事劳动生活者,均得自行移入。难民或贫民"得享受下列各项之优待:甲,得请求政府分配土地及房屋;乙,得请求政府协助解决生产工具;丙,得免纳两年至五年之土地税(或救国公粮);丁,得酌量减少或免除义务劳动负担";"享受和边区人民同等之民主权利:有同等选举被选举权,得参加一切抗日团体,得受免费义务教育,得享受边区一切法令的保护,有选择正当职业的自由权"。各级政府对移民边区的难民和贫民不得"强迫服兵役,强迫其他劳动服役,强迫交纳捐税","违者惩罚之"。难民或移民"愿为人雇工者,得请求政府介绍并保障其不受雇主虐待"。

边区政府不仅对长住的外来难民和贫民实行安置和优待,而且要求地方政府对路过本地的难民也应尽可能地予以帮助,使其安全过往。为此,边区政府于1941年10月1日发出训令,通报延安市公安局关于妥善处理来延安

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3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页。

难民的意见，明确提出：第一，由市政府设立难民调查登记所，负责登记来延安的难民。第二，调查登记所根据难民的具体情形，或分配地方给难民住，或给难民路费介绍到别处，有劳动能力、愿在延安居住的，由工会介绍做工或者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总之，对难民要有适当的处理。第三，临时路过需要住宿一两晚的难民，也要指定地方让他住，不致因东跑西窜找不到地方而引起混乱。

在总结几年来安置和优待移民难民经验的基础上，边区政府于1942年2月6日发布了《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实施办法》。办法共12条，其中规定：延安、甘泉、华池、志丹、靖边、富县、曲子等7县为移民开垦区；绥德、陇东、关中3个专员公署及安定、靖边、富县3个县政府应设立移民站，专门管理移民事务；移民安家以后如缺耕牛，政府应帮助其向银行取得耕牛贷款；政府应调整移民与老户的关系，教育老户帮助移民；帮助移民组织移民村及移民乡政府。4月5日，边区政府又公布了《优待移民实施办法补充要项》，规定凡边区内和边区外的人民，本人并不能自力耕种，但愿以其资本雇人开荒或伙种者，均得自愿移入《优待移民实施办法》所指定的区域，或其他有多余荒地的地区，并得依据地权条例取得公荒公地之所有权；移民“依照《优待移民实施办法》的规定，享受下列优待：免征救国公粮三年；减轻义务劳动负担；其他负担三年减半征收之”。

1943年3月19日，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条例》共19条，是在总结几年来实行《陕甘宁边区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优待移民的布告》、《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实施办法》、《优待移民实施办法补充要项》等文件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使边区的外来难民移民的安置优待工作更加有章可循。陕甘宁边区安置优待移民、难民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仅1941年至1945年的5年，全边区就安置移民、难民10万人。他们在边区各地安居乐业，成为一支新的生产劳动大军，在边区的生产建设和抗日救亡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戏剧家马健翎创作的秦腔剧《血泪仇》，反映了边区政府安置优待沦陷区难民这一史实，至今演唱不衰。

为其他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干部

陕甘宁边区是一个重视培养干部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为全民族抗战培养了大量的抗日干部。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干部队伍损失很大。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开赴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随着部队的迅速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前方干部奇缺，加之形势变化和党的任务的转换，原有的干部也需要学习提高。抗战初期，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破坏，不畏艰险，奔赴延安，追求革命真理，这是党和革命事业宝贵的人才资源。如何适应抗战需要，培养大批抗日干部，特别是把大批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培养造就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持抗战的骨干力量，是摆在党面前的头等大事，也是作为抗日大后方的陕甘宁边区的历史责任。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创办“窑洞大学”，积极发展干部教育，为革命培养干部。

延安创办的干部学校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研究院、军事学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医科大学、俄文学院、延安大学、中国女子大学、西北局党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等等。这些学校，有的是中共中央创办的，有的是属于边区的。学校的领导人大多是经验丰富的干部，许多教师是来自全国的名流学者，学生多是来自各地的爱国进步青年，也有来自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其中有很多人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员在这里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研究抗战时期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实，研究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经过短期学习后，学员被派往各抗日根据地。学校把转变学员的思想、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坚持学以致用、言行一致的教学方针，为人民军队和各根据地培养了成千上万的抗日干部。此外，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西北中央局也分期培训边区县区干部；在边区师范、三边师范、绥德师范等学校附设行政人员训练班，培训干部；

各县每年冬季都举办区乡干部训练班，培训区乡干部。

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取得了突出成绩，不仅使边区的干部得到了提高，也为其他解放区培养输送了大批革命干部。八年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先后为其他解放区输送了4万多政治、军事干部及成千的文化和技术干部，并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派出由百余名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文艺工作团到各解放区工作。

五、中共陕西省委坚持团结抗战

（一）在陕西国统区发展中共组织

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中发展、壮大中共组织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的活动范围包括陕西的关中、陕南和甘肃天水一带的国民党统治区。抗战初期，省委机关在泾阳县云阳镇办公。红军改编出师后，为安全起见，陕西省委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留守处名义对外开展活动。

卢沟桥事变后，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需要，省委一方面调整省委的组织机构，一方面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省委机关除继续保留组织部、宣传部外，增设了妇女部、民运部、青年部、工人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随着东北军陆续离陕，省委撤销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改西北军工作委员会为省委军事委员会（随后又改为统战部）。省委抽调部分委员到西安开展工作，在群众中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各种群众救亡团体，开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党领导了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又为中共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到1937年底，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党员人数由省委刚恢复时的300多人增加到1300多人。

1937年12月21日至25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省委书记贾拓夫提出：在党的组织建设中，要克服关门主义和“拉夫”现象，注意吸收工人、农民、妇女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会后，省委和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派出党员干部到党组织空白地区发展党

员，建立组织。到1938年底，在国民党统治的关中、陕南地区建立了53个县的中共组织。成立县委或工委的有韩城、澄城、合阳、朝邑、华县、渭南、临潼、高陵、泾阳、富平、耀县、同官、蒲城、礼泉、乾县、永寿、麟游、蓝田、长安、户县、周至、眉县、扶风、岐山、凤翔、宝鸡、武功、商县、洋县、城固、西乡、南郑、勉县、宁强、安康、石泉、岚皋、旬阳等39个县；成立特支或支部的有潼关、白水、咸阳、彬县、长武、兴平、陇县、千阳和陕南一部分县。甘肃的天水、甘谷、秦安等地也建立了中共组织。为便于领导，省委先后将西路工委改为西路特委，陕东南工委改为安康地委，沿河特委改为沿河地委，汉中特委改为汉中地委，并新建了西府地委和甘肃陇南临时工委。西安和外县的中等学校或建立了中共组织，或有了个别党员。西安大华纱厂，铁路、邮电等部门的职工中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地方上党员人数达8000多人。

这一阶段，中共陕西组织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以西安为中心，向各县发展。西安事变后，中共组织在西安得到快速发展，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组织大批学生宣传队、工作团到各县进行抗日宣传，在抗日宣传中培养和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建立了当地的中共组织。

二是以学校为中心，向农村发展。很多县的中学和高小建立了中共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党员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在农村开办夜校、识字班等形式，提高农民政治觉悟，吸收其中的先进分子入党，积极进行建党工作。

三是以军队为中心，向地方发展。西安事变后，红军进驻渭北的同官、富平、耀县、泾阳、三原等地，在驻地建立中共组织，培养和发展了一批工人、农民党员。在东北军、西北军中的中共组织和党员也在驻地进行群众工作，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四是以空白地区为重点，派党员干部建立中共组织。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分析了党组织建立和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提出“向南发展”，即向组织力量较为薄弱的陕南地区发展。会后，省委派党员干部到安康、汉中和甘肃天水等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中共组织。

创办省委机关刊物《西北》

随着中共陕西地方各级组织的恢复、建立和迅速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也纷纷建立和迅速发展。为指导陕西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底，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公开创办省委机关刊物《西北》，作为对外宣传的窗口。省委宣传部部长欧阳钦为主编并负责筹备工作，郭有仪、李初梨等负责编辑，徐彬如等为发行人。1938年1月21日，《西北》创刊，先为周刊，后不定期出版发行。

《西北》以“加强抗战力量的团结，保卫陕西、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争取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三民主义新中国”为宗旨，以宣传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发动群众、团结抗战为中心任务。《西北》的主要内容：一是经常转载《新中华报》、《新华日报》的社论、专论以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和谈话，省委领导人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以及泾阳安吴青训班负责人胡乔木等经常为《西北》撰稿，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借以指导和推动陕西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健康发展；二是及时反映陕西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总结斗争经验和教训；三是报道国共两党的重大活动、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消息以及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消息；四是对国民党陕西当局破坏国共合作、压制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抨击，坚持团结抗战。

1938年2月23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西安各报发表《通告》，以“未经合法登记”为借口，宣布解散13个抗日救亡团体。27日，《西北》第4期发表了题为《关于解散西安十三个救亡团体》的社论，指出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务于抗日”的原则下，抗日救亡是重要的，“合法”、“非法”是次要的，而且“合法”也应是为了“抗日救亡的利益”，要求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抗日救亡的前提下，允许13个团体登记，给予合法地位。6月22日，《西北》第17期发表了欧阳钦《我们的意见》一文，揭露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解散抗日团体是违反抗战建国纲领、破坏抗日团体、分裂抗战力量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在《西北》的带动下，西安各界纷纷抗议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倒行逆施。1938年秋以

后，国民党陕西当局多方刁难，阻挠《西北》出版发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命令，《西北》出版前要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审查过程中，每期均有被审查删掉的段落、句子，有的甚至全文涂抹掉，强迫《西北》开“天窗”。为了对抗国民党压制舆论的行径，《西北》对一些被“审”掉的重要文章另行印发，通过零售点、报童在群众中广为散发。

《西北》形式活泼，贴近民众关注的问题，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声誉。《西北》设有社论、时评、专论、通讯、文艺、读者信箱、读者论坛、诗歌、大众抗日故事、一周时事等版面和栏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宣传工作的需要，《西北》经常向延安的重要干部约稿。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曾为第5期撰写了《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的文章。广大群众关心华北战场形势，《西北》记者便走访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在第23期刊登了朱德关于华北抗战形势的谈话和为《西北》写的“精诚团结、巩固后方”的题词。为了动员民众保卫陕西，《西北》第24期发表了由成仿吾作词、吕骥作曲的《保卫陕西之歌》：“日本强盗打到了陕西的门前，黄河两岸都成了抗日的前线；野兽般的敌人在向咱们逼近，他想占领咱们的城市和田园。咱们是黄帝子孙，咱们是三秦好汉，起来，男女老少，一千万同胞，大家联合加入抗战。为了保卫家乡、土地、老婆、娃娃、生命、财产，咱们排成队伍，一起拿起枪杆。在城市，在乡村，八百里秦川到处燃起抗战的烽烟，让日寇的鲜血染红泾河渭水，让日寇的尸骨飞不出华岳终南。保卫陕西，保卫长安，拼着头颅热血，保卫我们的河山、河山！”歌词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感和浓郁的乡情，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密切同广大读者的关系，《西北》还开辟了“问题解答”栏，答复读者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问题。《西北》每期一出版，迅速邮寄，并通过多种形式零售，不仅风行陕西及全西北，其订户还远及香港、广州、南昌、武汉等地，甚至在海外都有订户及代销处，发行量最多时达到1万多份，成为西北刊物中销量最多、发行最广的一种，深受群众的欢迎和赞扬，群众称它是“革命的向导”、“民众的喉舌”。

1938年秋，国民党实行“限共”、“溶共”、“反共”政策，《西北》在西安出版发行遇到困难，从第30期以后迁入陕甘宁边区。

（二）支持国民党陕西当局实行抗战

公开支持《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的进步政策

中共陕西省委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贯彻党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卓有成效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国民党陕西省当局实行抗战政策。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纲领虽然在坚持抗战和开放民主方面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些合理要求，但却没有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关于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等许多重要主张，而且有不少内容不过是好听的诺言，根本不打算实行。但是，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发布和这次会议决议设立国民参政会，还是表现了抗战初期中国政治的某些进步以及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有条件地接受了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的一些主张，因而它在这一时期的政策基本上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这些进步的方面得到了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赞同和支持。3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要求遵照孙中山联共的精神，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

5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公开发表文章，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的进步政策。文章指出："国民党这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颁布之《抗战建国纲领》及《大会宣言》，一般是抗日救亡所急需的政策，该纲领与本党以前所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不相矛盾的。今天，国民党能颁布这样的纲领和宣言，可以说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大进步。"文章同时表示纲领和宣言也是有"不够与缺点的：(1)在宣言中解释三

民主义时，民族主义对国内各少数民族未能明确提出‘民族自决权’问题，国内少数民族问题不能得到切实的解决；在民权主义中，提出政治之统一较政治之自由为急，政府对人民之自由必须加以尊重同时亦必加以约束对民生主义的解释则空洞而缺乏内容，并根本否认中国有阶级的存在。(2)对宣言和纲领没有提出具体实行的步骤和办法。(3)对于各党派合作的关系问题没有明确的解决，因此在大会后，有少数的死硬派、反共派继续其破坏团结的勾当，甚至有变本加厉，采取引诱威吓与打击的办法以对付我们的”。

省委宣传部的文章对这一纲领和宣言表示了如下的态度：“(1)以完全诚恳的态度来切实拥护，对其中不够与缺点的地方，也只是采取善意的解释和补充。(2)正确的运用宣言与纲领每一进步的条文，来对付那些挑拨离间破坏统一战线者。(3)采取一切方法，来切实的执行《纲领》中每一条文，并在纲领中发展正确的思想。(4)尽量的使民意机关扩大起来。(5)继续主张革命联盟的组织。(6)加强国民党中进步分子的力量，尽量地赞助扩大之。(7)加强本党的力量，提高党员的警觉性，以防止日寇汉奸、一切坏分子对我们的破坏。(8)注意正确的解释统一战线与共产党、统一战线与民主、统一战线与阶级、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阶级斗争、道德问题、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等等理论问题。(9)特别注意改善我们的工作方式，以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切实加强党内的教育工作，以充实每个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①

7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省县临时参政会工作的决定》，指出：“由于抗战的需要和人民的要求以及我党的努力，全国参政会已经决定在省、县建立参政会的组织。这是抗战以来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进步。虽然在其议员产生方法上不是人民的普选，人民团体代表名额很少，完全‘指定’、‘圈定’的办法缺少民主精神；对议员还没有很充分给予各种代表民意的职权，仍有许多缺点，然而这并不能抹煞其进步意义”，“党对于临时省、县参政会的态度和方针不是消极的批评，而应从积极方面去赞助和推动发扬其进步处，使之向好的方面发展”，“利用一切可能争取我们党员及先进人士的议席，打击、孤立和削弱顽固派”，使“临时参政会可能成为战

①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8年第1册)，第153—154页。

时相当的民意机关”。

中共陕西省委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原则立场，帮助国民党陕西当局实行抗战的诚恳态度，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赞许。

发表“对于保卫陕西与西北”的意见书

为了帮助国民党陕西当局实行团结抗战政策，1938年8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赵伯平、李初梨、徐彬如、惠子俊、汪锋、张英、陈煦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第三期抗战中保卫陕西与西北的意见》。

意见书分为前言、关于军事问题的一般意见、关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意见、关于民众运动的意见、关于西北回蒙少数民族问题的意见、关于加强团结与巩固统一战线的意见、关于干部问题的意见八个部分，文过万言，意见详尽。

意见书要求国民党陕西军政当局“调集必要数量的战斗力强的部队，加强潼关沿河战线，巩固河防，用最大决心守卫若干战略据点，并在这些守备部队中配备必要数量的重兵器”；“完全拆毁内战时代所建筑的堡垒，改建新式的地下支撑点，以免为敌人利用而便利于我们发展游击战争”；“武装广大民众，首先是整理现有的地方武装（包括保卫团、保安队、警察、民团、保甲队等正式地方武装），并给他们以正式的军事训练，使这些地方武装不但不因战争而溃散，相反的要使他们成为游击战争的骨干。一切非正式的地方民众武装如黄带会、红枪会，必须用一切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吸收他们参加抗战，在抗战中改造他们并使他们进步”。

意见书要求国民党陕西行政当局“选择坚决抗日与有力量领导抗战的人员到各级政府中去，提倡廉洁，肃清贪污腐化分子，振肃行政纲纪”；“厉行肃奸运动，不使一个汉奸、托派分子隐藏在我们的政治机构中实行‘城狐社鼠’式的阴谋，依靠法律与民众力量把这些分子从政治机关中清洗出去”，“肃清保甲中假借政府法令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改变保甲负责人员立刻派遣最好最得力的行政人员，到接近敌人的各个县份去，首先建立这些地方的战争动员工作，组织与动员千百万的民众来实行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战斗任务”。

意见书指出："中共陕西省委3月8日保卫陕西的宣言即已指出，'巩固陕西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力量的团结，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堡垒，是保卫陕西的先决条件'"，"而不可讳言，几个月来，关于加强团结与巩固统一战线的工作，各方面都做得异常不够，加之汉奸、托派各种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的阴谋与活动层出不穷，造成数月来吾陕各种不断的'纷争'与摩擦现象，而这些纷争与摩擦现象就大大地阻碍了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各种动员工作"。"建立与加强陕西国共两党的亲密团结，仿照两党中央的办法，建议由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中共陕西省委双方派代表成立联络委员会，以便协力同心解决吾陕当前各救亡工作问题"；"建立陕西及西北各省、县参政会，吸收各党派、各民族、各界同胞有威望的人士参加，以便使省、县参政会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意机关"；"立刻停止各种足以破坏团结与影响统一的刊物，并停止他们一切破坏团结的活动"；"建议由蒋鼎文主席立刻召集各党派、各救亡团体、各界有力人士的谈话会，讨论解决目前陕西和西北救亡运动中的一切'纷争'与'摩擦'现象，打破一切顽固分子的成见，以实现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大团结"。

意见书表示："我们曾经屡次提出'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及争取全国抗战胜利的斗争，需要成千成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干部'，'吸收一切对救亡工作有经验的干部参加动员'"；"中国共产党以17年来的英勇奋斗团结不少优秀的干部，曾经以自己的斗争博得世界的赞扬，这些干部也正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我们共产党员中，有许多同志对于军事工作、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动员民众武装和组织民众的工作、征募兵役和动员工作、物资动员工作、训练青年与训练干部工作，确有相当经验，我们愿以这些经验公诸全国同胞"，"我们愿意在任何困难，任何危险的情况下去负责工作，在工作中与友党诚恳合作，并帮助友党的进步与发展"。

贾拓夫等人的意见书，是中共陕西省委帮助国民党陕西当局实行《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真诚建议，再次表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

1938年11月21日至12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为了传达和讨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在泾阳县云阳镇举行了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60余人出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六中全会决议的决定》、《告全陕全西北同胞书》、《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信》、《致蒋委员长电》、《致八路军、新四军电》、《致中共中央电》等，并全部公开发表。

《告全陕全西北同胞书》指出："中共陕西省委对保卫陕西、保卫西北之事业素极关怀，从去年太原失陷起就不断地提出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具体意见，并不断地在各种实际工作方面努力。这次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又督促自己的党员并号召全体民众在政府当局领导之下，加紧一切战时动员工作，用全陕民众组织与武装的力量阻止敌人进攻，即使敌人铁蹄踏进陕西，我们更应顽强地作殊死战。""谁无田园庐舍？难道能让敌人来摧毁吗？谁无祖宗坟墓？难道能让敌人来践踏吗？谁无父母兄弟？难道能让敌人来屠杀吗？谁无妻女姊妹？难道能让敌人来污辱吗？不！决不！我们一定要保卫我们的家乡，一定要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精诚团结，本着互相尊重与互助互让的精神，继续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府当局的统一领导之下，紧急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上前线去，到军队中去，当游击队员去，为保卫陕西保卫西北坚持持久战，驱逐日寇，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信》中指出：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一致认为，根据17个月的抗战经验，要顺利地达到保卫陕西、保卫西北之目的，必须全陕人士首先是国共两党更加亲密团结。唯团结方能发动全陕西全西北的力量，唯团结方能克服目前阶段中一切困难，唯团结方能在持久战斗中战胜敌寇。为了巩固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完全一致拥护我党扩大的六中全会的宣言：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并主张共产党员用公开交名单的方式加入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同时再一次声明：三民主义为国共两党合作及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

基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中共陕西省委必将贯彻我党六中全会决议精神于一切实际工作中，我们深信国共两党及全陕人士诚能亲密团结，互相谅解，互相友爱，互相帮助，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保卫陕西、保卫西北的任务！

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告全陕全西北同胞书》和《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信》表明，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障碍不在共产党方面，而在于国民党的顽固派。

（三）加强对陕西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全省抗日积极分子会议

1938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全省抗日积极分子会议，县级以上干部30多人出席。根据日军逼近黄河东岸，陕西有可能变为沦陷区的形势，会议着重讨论并部署了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亡工作。省委书记贾拓夫做了题为《巩固团结保卫陕西当前的迫切任务与工作》的报告及讨论这个报告的《总结》。

贾拓夫的报告分为八个部分：(1)抗战进入第三期陕西战争动员情况。(2)巩固团结克服战争动员中的障碍。(3)继续加强党在青年中的工作。(4)扩大统一战线运动。(5)加强党在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中的工作。(6)关于武装部队及民众武装中的工作。(7)克服我们工作中的弱点和缺点。(8)巩固党与扩大党。

报告指出："为了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运动，首先应抓紧文化教育界的工作，把广大文化教育界人士团结在党的口号周围，在他们中先形成有力的统一战线，然后，经过他们去开展各方面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在团结各种各样的人物，在坚持抗战保卫陕西的时候，就不能单纯的完全以我们的观点出

发，而应照顾到各种各样人的特性和条件，不论是从保卫乡土出发的，从英雄主义出发的，从干大事出发的，甚至从升官发财出发的，这些一切都不要紧，只要他们是抗日甚至有抗日的因素，我们就应当赞助他，联合他，并推动他们前进。我们绝不能希望无论什么人都要和我们共产党员的态度主张完全一样，因为这是做不到的。这里我想利用陕西过去靖国军，国民军二军、三军的传统，来动员许多人起来进行武装保卫家乡的斗争是必要的，甚至我们可以拿出胡笠僧[①]、井勿幕等来号召团结一批在乡军人”；“一切上层关系，我们都不能对之要求过高，而应从最小的可能的事项上做起，应设法维持他的地位，他同我们的关系应当隐蔽，不宜突出，不要过早地暴露目标，每一个上层关系都应巩固，不应轻易放弃。这里应避免那种急躁病，不要希望一下子把什么弄好，结果是更加失望，帮助了顽固派”；“应当很好地把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配合起来，所谓配合是经过党的领导与组织”；“尽可能地争取省委在西安更公开的活动，有计划地培养一批做公开工作的干部”。

会议估计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可能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党总的方针是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陕西党目前的具体战斗任务就是巩固团结，加紧进行战争动员工作。陕西战争动员工作的领导力量和全国范围一样，主要是国共两党。会议要求，在政治上应当广泛地进行关于武装工作的宣传，提醒全陕人民的注意，鼓动每个有武装的同胞随时准备着打敌人，这种工作应广泛地公开地经常地去做，但组织上准备工作必须是绝对秘密的，暴露就等于帮助敌人，帮助顽固派，各县委必须成立武装部，专门负责领导武装工作，重点是做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工作和改造非法武装，在这些武装中广泛开展统战工作。

根据云阳会议精神，陕西国统区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国民党地方武装和非法武装中开展了统战工作。陕西的非法武装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仅10个县不完全统计就有53股，约1.5万至2万人，长短枪7000余支。党对他们的政策是争取团结抗战，逐步说服改造，帮助进步，保存枪支，准备在时局变化时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力量。在工作方法上是先从上层着手，通过各种

① 即胡景翼。

社会关系，以私人名义交朋友，结拜兄弟，帮助解决困难问题，建立威信，协助改造不良习气。

做国民党退伍回乡军人的工作也是中共组织开展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批人数量多，能量大，大都是地方名流，与地方政权、士绅及在职军人都有联系，与国民党中央系有较深的矛盾，同情共产党。国民党开始对他们排斥打击，后来又采取怀疑政策，拉打结合。中共组织则采取了“集中力量争取之”的策略，和他们广交朋友，讲究社会道德，重人情世故，谦虚谨慎，尊重礼遇，并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工作。对进步的，帮助其巩固扩大社会基础；中间的，通过一切办法，使其接近中共组织；有成见的，循循善诱，解释误会，使其逐渐转变态度，并在经济文化方面予以合作，吸收他们共同办工厂、学校、报刊，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照顾其经济利益，使之成为抗日的可靠的同盟者。云阳会议精神的贯彻，使陕西国统区的军事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临潼县的交口镇、栎阳镇，耀县的柳林镇等地的地方武装，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

积极组织民众抗日武装

陕东、陕东南地区是陕西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抗日前线，形势严峻。从1938年初春开始，中共陕西省委和这两个地区的党组织就努力宣传、动员、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准备参加对日作战。

陕东地区。1938年2月27日，续约斋（续俭）奉命抵达平民县任县长。此前，续约斋曾赴延安考察边区财政，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告诉续约斋：“打日本，救中国。”平民县是陕东最前沿的一个小县，原名大庆关，与山西永济县隔河相望。日军在山西永济县城城门楼架设大炮五六门，隔河日夜轰击平民县。续约斋应民众要求，选择有胆识、习水性的40余人，编为华北挺进军第一队，于4月19日渡河参战47天，11人为国捐躯。7月1日，续约斋专程到西安向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通报，受到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的接见和赞扬。中共渭南县组织协助渭南县政府筹建的常备抗日义勇军壮丁队，由共产党员宋蔚青任队长，迅速发展到150余人，有枪100多支，由县城移驻尤河

川望岗岭，挖战壕，修工事，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在中共沿河组织大力倡导下，合阳县政府与国民党军第一七七师配合，成立了合阳县抗日民众自卫队总指挥部，苏资琛县长兼任指挥，共产党员、一七七师参谋长梁步六任副指挥，全县23个联保分别建立自卫队中队，总计约2万队员。一批共产党员到各中队担任指导员。在共产党员带领下，二尹联、共和联、如意联等五六个自卫中队先后跟随一七七师东渡黄河，在山西荣河、稷山等地奋勇杀敌。在中共富平县委大力支持下，由共产党员师源、刘茂坤发起组织60名爱国青年成立了富平县抗日义勇军，随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胡景铎营开赴抗日前线，与日军激战多次，12名战士为国捐躯。中共蒲城中心县委以共产党员为核心，联络农村进步青年，组织特务队进行操练，准备战时打游击。中共华县组织积极协助县政府，组织了450人参加的自卫军游击队，配枪150支，并在各乡建立警备队。中共韩城县委在“民先队”基础上组织义勇队，共产党员自己拿钱购买枪支弹药，并建立造枪所，造枪数十支，随时准备打击来犯之敌。中共朝邑、澄城县组织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核心，购买、收集枪支，组织武装，依托黄龙山准备开展游击战争。

商洛地区。1937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王柏栋为中共商洛工作委员会书记，回乡领导商洛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2月，王柏栋派“民先”队员王柏梁和抗日积极分子谢华[①]、余谦等人到商南县大岭观、豫西荆紫关等地宣传民众，筹建抗日游击纵队，被顽固派破坏未成。6月8日，谢华、余谦击毙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吴子俊，拉起民众抗日武装。9月，共产党员周宝航和进步青年杜景做商县武关民团团长田兆丰的工作，后将该民团改为抗日特训队。

安康地区。193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干部王力随陕西警备第一旅第三团（团长刘威诚，中共党员）到安康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原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离开安康后，部分掉队战士和伤病员仍在秦岭山区坚持游击活动，王力派党员联络，准备将他们再次组织起来，进行抗日。宁陕县四亩地曾是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开展游击活动的地方，有部分

① 与中共西北特支书记谢华同名同姓，并非一人。

伤病员和掉队人员，中共四亩地支部联络了这部分红军战士，收集了一些枪支，准备建立民众抗日武装；旬阳县城附近有一批参加过国民党地方游杂部队的在乡军人，生活困难，不能安居，对国民党政府强烈不满，中共旬阳县工委同他们联系，准备建立抗日武装组织；岚皋县佐龙联保的进步青年也准备建立民众抗日武装组织。但这些活动均因国民党顽固派从中干扰、破坏，未能成功。

六、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在陕西发动的反共高潮

(一)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在陕西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西安反共中心的形成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对国民党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反共倒退妥协的倾向明显增长。陕西国统区的形势随之发生逆转。

1938年6月15日,国民政府免除孙蔚如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蒋鼎文为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又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集军权、政权于一身,国民党陕西当局打击抗日力量的活动日益表面化。

11月,在豫西南作战失利的国民党胡宗南部第十七军团撤回陕西。陕西干扰破坏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反动势力大大增加。

12月19日,蒋介石在武功县主持召开有长江以北第一、第二、第五、第八、第十战区师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但是,第十八集团军的将领全部被排除在外。会议名为协调各战区对日作战的行动,实则是蒋介石以防止日军从绥远侵入陕甘地区,再经陕甘进入四川、威胁陪都重庆为由,将胡宗南武装集团布防在陕甘宁地区,目的在于以重兵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蒋介石任命胡宗南为蒋鼎文挂名的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并特准设立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部,全权指挥这个集团军。此时,胡宗南掌管的兵力由原

来的三个军扩大到六个军。

以蒋鼎文、胡宗南为首的国民党西安反共中心开始形成。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会议秘密通过党务报告决议案，在国共两党关系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基本方针。这次会议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主要注意力正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会后，国民党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秘密文件，秘密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对中国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进行防范、限制、排斥和打击。

1月25日，国民政府撤销西安行营，任命程潜为新设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天水行营驻西安。

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是反共专家谷正鼎。谷正鼎将原西安行营民运会对付陕甘宁边区的一套反共办法呈报蒋介石，深得蒋介石的赞赏。为了加紧反共活动，对付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谷正鼎召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陕西省民政厅长、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班教育长等人，秘密拟定了《封锁陕甘宁边区计划》。这个计划分“建立封锁边区的领导机构”、“党务封锁”、“行政封锁”、“军事封锁”、“经济封锁”、“宣传封锁”、“教育封锁”、“民运封锁”、“特务封锁”、“执行封锁计划应注意的几个要点”等10条，提出：陕甘宁边区周围的榆林、洛川、彬县行政督察区分设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办事处，由反共坚决的省党部委员兼任办事处主任；沿边区各行政区的督察专员，各县的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县长、组训民众的社训队队长，必须由坚决反共的分子充任；沿边区各县的保长、甲长，必须选择与“异党”有仇恨的地方士绅充任；以国民党正规军为主，地方团队为辅，构成沿边区的封锁线；在三原、庆阳分设军事封锁指挥部，以彬县、洛川、宜川、庆阳、正宁为据点，各据点常驻师长以上军官一人，作为前线临时指挥官；由天水行营制发运边区的物资通行证，钢铁、电机、化学器材、棉花、纱布、医疗器械、药物等军用和主要日用品不得进入边区，各县设物资盘查站，违反规定者一律查扣；禁止报刊披露八路军抗战胜利的消息和“左”倾文章，取缔“左”倾书刊；选派特务人员打入边区邮

政等部门，担任沿边区重点县的警察局长，搜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络。这个计划分别由天水行营、陕西省政府、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负责执行，并建立了党政军特种联席汇报制度，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党政军特种联席汇报会为最高领导机构，并以天水行营的名义指导陕西、甘肃、宁夏、绥远四省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包围和封锁活动。行营汇报会先后由谷正鼎、胡宗南主持。洛川、彬县、榆林及所属各县的党政军特种联席汇报会设有专任汇报秘书，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所有封锁边区计划，统由各区联席汇报机构执行。国民党陕西当局《封锁陕甘宁边区计划》的长期实施，给陕甘宁边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破坏。

1939年冬，蒋介石任命胡宗南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后又兼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代主任，其所辖部队由6个军扩大到10个军。甘、青、宁、绥为第八战区，陕、豫、晋为第一战区，为协调两个战区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行动，蒋介石又令胡宗南兼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这样，胡宗南所指挥的部队就有6个集团军，共50多个师，50多万人。另外，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洛阳第一分校、特种兵联合分校、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也都受胡宗南的指挥。蒋鼎文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去洛阳后，胡宗南独霸国民党西安反共中心，专事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在抗战中坐大。

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组织的破坏

国民党西安反共中心形成后，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将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查封抗日救亡团体，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破坏团结抗战。

1938年7月25日，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被国民党商洛当局枪杀于商县显神庙村。8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镇举行追悼王柏栋大会，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汪锋代表省委致悼词，怀念这位“最忠实、最勇敢、最积极的民族革命战士”，并对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行径表示严重的抗议。7月31日晚，八路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宣侠父在西安“失踪”，8月1日被西安

行营特务秘密杀害。10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赵希愚赴商洛视察民众抗日救亡工作，被驻商南县的国民党军预备第一师非法逮捕。同月，国民党朝邑县党部查封了中共朝邑县工委领导的七七书报社。

对于国民党陕西当局破坏团结抗战的倒行逆施，1939年2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向中央书记处做了报告：近二三月来，行营、省党部与省政府更加进一步采取各种办法来打击我党的活动，他们不仅注意西安，而且注意外县（派出许多视察团）；不仅注意城市，而且注意乡村（派出许多社训人员）；不仅打击党领导的群众团体（如取消西安学生分会等），而且积极破坏党的组织（如彬县强迫党员自首，武功、汉南逮捕党员等），对我们同志不是威迫就是利诱，不是撤职就是逮捕，这样从各方面积极排斥、打击我党活动与力量。[①]

1939年5月16日，接替贾拓夫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欧阳钦报告中共中央："在'限共'、'溶共'政策下的陕西党政当局，目前向我们的进攻是日益表面化、具体化、激烈化。西安的妇女慰劳会，他们已决定强迫改组，排斥我们的人。在西安、汉中、武功、安康、商洛各地不断发生逮捕、破坏组织事，到处强迫'民先'自首，到处布置特务工作。"[②]6月7日，欧阳钦再次报告中央书记处："最近全陕西省各地摩擦更加严重起来，顽固分子用反共名义，利用与推动党政军机关到处进行其反共的宣传，对本党及先进分子乱加打击、破坏与逮捕，查禁书报，封闭书店，强迫改组慰劳会，检查交通道路，并到处组织其暗杀队，制造毫无根据的情报，无理的造谣"，"顽固分子在'限共'与'防共'的政策下面，把陕西弄得特别的严重与尖锐，除以此来打击我们，以缩小我们组织及其活动的范围外，更企图逼使我们与之发生正面冲突，然后找出一些冲突事件作为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及边区之口实，并进一步企图更大的打击我们。顽固分子又利用反共名义作为他们争权夺利、排除异己、制造一切罪恶的口实"。他建议对国民党当局"种种无理的攻击，应采取防卫性的回击，但特别要注意与群众站在一起，暴露每一事件的真相，引起社会一般人士

①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第1册），第161页。

②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第2册），第132页。

对他们不满，陷他们于孤立，使他们的企图失败，而争取社会人士对我们更多的同情”[①]。

1939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先后逮捕和杀害了多名共产党员。中共安康地委组织部长刘华于3月被捕，中共西安市委书记惠子俊于4月被捕，中共汉中地委书记任戈白于6月被捕。9月，共产党员王化蛰、刘生哲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渭南。10月，国民党蒲城县当局镇压要求迁校的蒲城中学学潮，逮捕学生50余人，并将其中8人送西安劳动营关押，其后又逮捕了共产党员许尚志。11月，中共韩城县委领导的少年书报社被国民党驻军非法查封。12月，中共西路地委组织部长兼永寿县委书记严克伦被捕。国民党陕西当局的倒行逆施，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国共两党在陕西的团结抗战。

中共陕西省委迁入边区领导陕西国统区的抗日救亡工作

在国民党顽固派对陕西国统区的中共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和抗日群众运动采取镇压政策的严峻形势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陕西省委机关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于1939年12月从国统区的泾阳县云阳镇迁移到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淳耀县安社镇，后又相继迁移到淳耀县照金镇、新正县马栏镇，在边区境内领导陕西国统区的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1月，省委在安社镇召开扩大会议，省委特派员、有关县委书记及省委机关科长以上干部参加。会议着重检查讨论了巩固党的问题。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张德生做了《关于巩固党的报告》，指出前一段发展党员对质量不够重视，有些基层组织过大，活动规模亦大；党员出头露面多，没有社会职业掩护。对此，会议决定加强党内教育，继续审查党员干部，开展反奸细斗争，健全秘密工作制度，改变党的领导方式。

同时，省委发出《告全陕同志书》，号召全体党员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在省委周围，为克服投降、分裂、倒退危机，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并通报了陕西党内在日常生活方面、在党内工作方面、在群众工作方面违反秘密工作的一些现象及工作中的不正确的倾向，要求全体党员坚决执行秘密工作的规

①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第2册），第137—138页。

定，保卫党的组织，巩固党的组织。

4月10日，省委紧急通知各级党组织：时局正处在严重关头，各级党组织应时刻提高革命警惕性，时刻准备顽固分子的袭击与阴谋，以保卫党的组织；为了保存干部，应坚决地、迅速地把已经暴露的干部、党员和非党干部分别调到省委或送往延安学习；立即焚毁表册、记录、通知等所有党内秘密文件；省委机关已全部搬迁边区，凡到省委汇报工作的党员、干部今后一律不要再前往云阳镇。4月16日，省委致电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副处长李华："已接到中央决定，云阳、安吴各机关撤退，紧急电令你们去省府谈判撤退日期，请要求能有较长时间，以便结束工作，避免不必要损失。谈判决定后，请立即在西安各报纸用大字登一启事，说明云阳、安吴各机关均撤退，以免各地继续去人致受打击。"

国民党陕西当局非法监视八路军驻陕办事处

在摧残共产党秘密组织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肆无忌惮地摧残设在国统区的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代表机关，破坏国共合作的全民族抗战。

设在西安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简称"八办"）是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于1937年8月设立的。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1)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2)为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采购和运输物资。(3)代表八路军总部与国民政府军政部等部门办理有关公务事项。(4)接送进出延安的抗日干部、爱国志士、国际友人和青年学生，同时协助中共陕西省委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既是八路军总部设在西安的代表机关，也是中共中央在西安的公开机关，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驻陕代表的林伯渠、董必武就曾住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公开对外进行活动。中共陕西省委的一些工作人员也以"八办"工作人员的名义对外开展活动。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成为各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通往延安的红色桥梁。到1938年，有近万名爱国青年通过办事处奔赴延安。国际友人斯诺夫妇、史沫特莱、贝特兰、白求恩、爱泼斯坦、马海德、路易·艾黎、米勒、詹金斯、伊文思、范查理以及印度援华医疗队等都是经过办事处的周到安排进入

延安的。西安的一些知名爱国人士如杜斌丞、宋联奎、马德涵、刘古风、侯外庐、陈建晨等也时常来往于办事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成了顽固派“关注”的地方。

1939年春，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以“特联汇报会”秘书主任的身份主持召开特联汇报会，讨论如何“对付”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因办事处是公开、合法的机关，会议确定在行营秘书处直接领导下设一个组，专门对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进行秘密监视。

谷正鼎的“特联汇报会”不仅对“八办”实行每天24小时的监视、侦察，而且秘密逮捕与“八办”有来往的商人，并警告一些商店不准给“八办”采购人员卖货物。

1939年10月间，“八办”与《新秦日报》社签订合同，由《新秦日报》社用“八办”提供的纸型印刷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特务警告新秦报社不能代印《新华日报》，新秦报社则以《新华日报》是重庆出版的合法报纸，并已与“八办”签订有“代印合同”为由继续代印。西安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即强行搬走报社仅有的浇版机，迫使报纸停刊。后在报社具结不再承印《新华日报》，并“聘用”两名特务分子为报社编辑、记者的条件下，《新秦日报》始得复刊。但是，顽固派并未善罢甘休。新秦报社隔壁的钢笔大王商号，因学徒点汽灯不慎引起大火，烧毁商店18家。警察一分局竟以新秦报社未被烧毁并曾代印《新华日报》纵火嫌疑最大为由，将新秦报社社长俞嗣如拘留，移送长安地方法院关押。后经钢笔大王商号点汽灯的学徒出庭作证，顽固派对《新秦日报》的政治陷害才未得逞。

西安情报处的建立

1939年秋，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指示在中央采购委员会工作的王超北，在采购抗战物资的同时，要注意收集国民党顽固派反对共产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报，并且随时报告中共中央。同年冬，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董必武途经西安，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代表中央正式宣布建立西安情报处，作为中共中央社会部下属的情报机构。西安情报处由八路军驻陕办事处

处长伍云甫直接领导。

遵照林伯渠、董必武的指示，王超北具体负责西安情报处的筹建工作。为了掩护情报工作，保证情报人员的安全，王超北在自己居住的西安市雷神庙街5号修建了秘密工作的暗室。周恩来视察了这个工作暗室。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王超北又用变卖家产的钱购买了大莲花池街7号、王家巷24号、24号之甲和25号等院落，建成了相互联结的秘密工作室。关于西安情报处的工作任务，周恩来明确指示：第一，要想尽一切办法搜集顽固派企图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及时电告中共中央，使中央有所准备；第二，要全力支援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工作，驻陕办事处是党在西安的公开办事机构，顽固派暗中的破坏活动他们不可能知道，西安情报处要紧密配合，全力支援；第三，要积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第四，要保持西安情报处工作的极端秘密性，保护组织的绝对安全，当好党的耳目。

西安情报处由小到大，最后发展为有100多人的庞大情报组织，下设4个科。情报科：先后由艾稚青、萧德、王心源、蔡茂林、马之江等任正、副科长；交通科：先后由吴卜亭、史剑北、朱官义、武志平、秦治安等任正、副科长；机要科：先后由王释奇、胳伯安、王惠今、高秀芳、杨碧涛等任正、副科长，电台台长先后有杨嘉德、雷光斗、王释奇、胡家兆、师兆华等；保卫科由梅永和担任科长。各科下设有情报员、交通员、机要员、掩护员。西安情报处还在市内设立了两个传递情报的秘密联络站——春生永车行和奇园茶社。

在抗战时期，西安情报处搜集了大量的国民党党、政、军方面的重要情报，为中共中央粉碎国民党反共阴谋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也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顺利开展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西安情报处一直坚持到西安解放。

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断扩大，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

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陕甘宁边区是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重点地区之一。早在1939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就在边区的陇东分区制造了严重的摩擦事件。3月，因河防吃紧，设在黄河岸边的八路军残废院奉命西移到旬邑县城南边的土桥镇，被国民党保安队800多人包围，肆意凌辱殴打。残废院不得不退出土桥，移到旬邑县城。为此，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电告蒋介石，要求制止。5月24日，八路军残废院军人陈通外出采购时，被保安队枪杀。伤残人员群情激愤，20多名代表前往旬邑县政府请愿，要求惩办凶手，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县长张仲堂不但拒绝代表所提条件，反而下令保安队开枪，20多名代表当场被枪杀。事件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调集邻近几个县的保安团，会同陕西保安第六团一营，围攻八路军驻防旬邑部队独一营和荣军排，昼夜猛攻。八路军被迫退出旬邑县城，17名重残伤员掉队被捕，全部被杀害。旬邑事件发生后，萧劲光、林伯渠等多次致电蒋介石、程潜、蒋鼎文等人，陈述事实原委，揭露国民党反共摩擦的罪恶行径，并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各界“一致呼吁，以彰公理，而警凶顽”。

然而，蒋介石一意孤行，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2月，先后在边区南、西、北三面部署了19个步兵军、2个骑兵军、3个保安旅和17个保安队，伺机向边区发动武装进攻。在边区西部，1939年12月10日，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师一个团配合庆阳县保安队突然袭击驻宁县的八路军一个营，进占宁县县城。合水县县长率县保安队袭击八路军第三五八旅直属队，配合进攻宁县。14日夜，九十七师步炮兵又配合数县保安队围攻八路军驻镇原县城内的一个营，16日进占镇原县城。在边区南部，1940年3月下旬，国民党军突然包围淳化县城，迫使八路军驻军退出淳化县城。至此，镇原、宁县、正宁、旬邑、淳化5座县城及6个区、43个乡被国民党军占领。5月8日，国民党军向新正县进犯，20日占领县政府驻地马家堡。5月10日，国民党军以4个团以上的兵力，向富县店头镇的八路军军运联络站、独立营猛攻。6月8日，预备第三师向关中分区大举围攻，强占底庙、东牛堡、西牛堡、马栏、刘家店、湫头等地，并继续进攻新正、赤水、淳耀、新宁等县，杀伤八路军指战员。在边区北部，陕西

省绥德行政督察区专员何绍南纠集13个保安中队，企图偷袭八路军驻军，并煽动清涧、安定、吴堡等县保安队，袭击八路军第七一七团，抢占了部分阵地。

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直接威胁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一再忍让，并派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力求避免冲突。八路军总部和留守兵团先后致电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呼吁停止进攻边区，反对枪口对内，要求撤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但因国民党方面不听劝告，致谈判毫无结果。根据地军民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坚决打退来犯的顽军。同时，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由雁北进驻绥德，迅速控制绥德地区，使陕甘宁边区获得安定。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加强了对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蒋介石向边区周围各战区的长官和驻军首脑下达了严密封锁边区的命令。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构筑了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绵亘数省的五道封锁线和近万座碉堡。在这五道封锁线中，顽固派对南线的封锁尤为重视，除构筑严密的工事外，还部署了重兵，重要地段均由胡宗南的国民党正规军把守。

（二）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在陕西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继续破坏陕西国统区的中共组织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之后，国民党陕西当局继续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

在渭南地区。1940年4月25日，共产党员王韵清被国民党蒲城县长王抚洲派人暗杀。5月，共产党员刘生俊被国民党渭南县党部派人暗杀，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县民众教育馆馆长贺修之被捕。12月20日，驻华县的国民党第一军特务营寻衅包围咸林中学，逮捕共产党员白万诚和进步青年王

西周、李祥文、时万成、时万发等人。

在商洛地区。1940年6月20日，中共商县县委委员王士哲被捕，次年10月31日，与早先被捕的中共商洛工委委员雷振杰在商县同时被杀害。

在安康地区。1940年5月13日，国民党紫阳县县长带队破坏中共安康地委秘密机关，地委书记刘文彬、委员刘华被国民党安康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通缉。1941年2月10日至22日，安康保安副司令张英与国民党旬阳县党部书记长胡爱瑗、县长施德广、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樊佑庶合谋，捕杀共产党员梁宏、魏凌玉、李兆众、鲁世鑫和非党人士王昌民等17人。安康县政府逮捕了中共安康县委书记王崇法、共产党员刘振清、何伯淳及进步青年王复荫、张慕桓等15人。9月，安康县恒口镇共产党员张家贵、吕国藻等八人被县长赵文质杀害。

在汉中地区。1940年10月14日，国民党汉中警备司令部逮捕了共产党员、南郑县新集小学校长戴树人，次日又逮捕了进步教师宋鑫泉，11月12日将两人枪杀于汉中城东门外牛集坎。1941年4月4日，女共产党员刘彩凤被国民党勉县县长王慕曾枪杀于勉县城北何家营村。5月，中共洋县中心县委副书记梁志宇被国民党杀害于南郑。10月22日，中共城固县西北区委书记张书行和穆春发、李长青、王勃兴、胡永沧被汉中警备司令部枪杀于南郑北门外。

在宝鸡地区。1940年12月，中共扶风县委书记咎耀华被国民党扶风县当局逮捕，押送西安劳动营。1941年1月，中共眉县县委书记任光烈领导小学教师反对贪污公款的县教育科长陈日章，被县长逮捕，押送西安劳动营。3月，武功西北农学院共产党员郭必忠等被捕。5月30日，宝鸡“工合”事务所永清堡毛纺站女共产党员章若雾被捕；同时，中共宝鸡县委组织部长倪子裕被捕。7月15日，凤翔竞存中学中共总支委员滕净东（校务主任）、学生支部委员时保泽等被捕。

在咸阳地区。1940年6月，共产党员、三原中学学生郭壬戊被国民党三原县党部逮捕，并被押送西安劳动营。1942年10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萧寥、三原西阳镇东寨支部书记周新轩被捕。

在西安地区。1940年7月，在临潼县中正中学求学的鲁宗周、王克哲等5名共产党员和13名进步学生被捕。9月，西安陇海铁路管理局机关中共党员孙宝球、侯孟甫被铁路局国民党特别党部逮捕，孙宝球被迫害致死。1941年初，在周至县甘西小学任校长的共产党员李萃亭及几名进步群众被捕，关押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囚室，遭严刑拷打。年近六旬的李萃亭出狱即亡故。

这些被捕、被杀的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的所谓“罪行”，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民众起来抗日救国。南郑县新集小学的戴树人和宋鑫泉，除给学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外，就是在工艺美术课中组织师生用胶泥塑造了两尺多高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朱德、鲁迅等人的半身像，在新集街口展出。这成了他们必死的“罪证”。

大量的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被捕、被杀，足以证明国民党是破坏抗战团结的罪魁祸首，同时，也对中共陕西组织在国统区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贯彻中共中央“荫蔽精干”的方针

为了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保存党的力量，毛泽东于1940年5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指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也加发给了全党。中共陕西省委及时传达了中央的“荫蔽精干”政策。

1940年6月，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前往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8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指出“陕西党过去三年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在大量发展党组织的工作中存在着不足”，“陕西党今天还极不巩固”。因此，中央要求“陕西党必须严格执行荫蔽精干政策，加强党与社会及群众的广泛联系，以达到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①]。

《决定》强调：首先需要巩固党的组织。为此，要抓住中心县区，审查与配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备干部，建立坚强的领导机关；采取明确彻底而慎重具体的方针，抓住中心县区整顿各地党的组织；慎重地、彻底地审查党员，洗刷混入党内的奸细投机分子，保存党的基干部分；有计划有系统地加强党内关于党的策略、工作方针及组织等各方面的具体教育；改善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作风。其次，必须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此，必须在策略上抓紧争取中间势力这个中心环节，纠正对中间势力认识不够与要求过高的有害倾向；在国民党的机关中，党除了保持党员已获得的地位外，应尽量推动与帮助中间分子及进步分子取得各级政府机关的地位，特别是下层保甲机构中的地位；加强文化教育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巩固党员在文化教育界中的地位，同时，扩大党与各高等、中等及初等学校广大教职员的联系，并在其中建立坚强的领导；坚决执行党在友军中停止发展组织，停止组织生活的决定，同时扩大党与友军交朋友的工作；一般党员，为了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应允许其加入国民党；在领导上把公开的统一战线关系与秘密党的组织分开管理。再次，必须加强党的群众工作，充分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可能去进行群众工作；经过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去开展各种文化经济等社会的改良活动；一切群众斗争都必须经过统一战线来进行；在群众运动中，经常地注意培养和保存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关心群众福利而为群众所爱戴的党与非党的群众领袖。

《决定》指出，应该使陕西全党同志懂得，短小精悍的秘密的党组织与广泛的社会各阶层及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是巩固党的两位一体的任务。脱离社会与群众，秘密党的巩固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切党员都应深入社会，深入群众中去，一方面同社会、同群众保持各种各样的联系，而同时又不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面目与党的组织，以达到长期埋伏的目的。

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为陕西各级党组织在国统区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9月2日至7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中共中央的《决定》，部署进一步巩固党的工作，确定在巩固党的工作方面，占第一位的问题是干部问题：各级党的干部必须选择政治上坚定可靠的同志；必须职业化、社会化，不能随意丢掉自己的社会职业；必须培养锻炼自己分析环境、独立工作的能力，不要事事依靠上级；必须准备候补干部，保证工作连续进行；必须

调动暴露的干部，一般调到边区学习，也可离开本地，改业谋生；必须特别重视审查干部，正确对待和处理干部在国民党中受训的问题，不要随意作结论，不要弄错一点。其次，要继续审查和清洗异己分子、投机分子、自首分子，特别是暗藏的奸细分子；要加强反奸细斗争，保证党内不暗藏一个奸细，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对那些政治上尚未成熟，年龄太小，或者觉悟太差，不够党员资格的人，劝其暂时退出党的组织。再次，要改变组织形式，改进领导方式与领导作风。12月18日，省委制定了《关于保卫党的组织条规》。1940年，省委直接审查了190名干部和一部分党员，其中县级以上干部100名。还审查了22个县委与县工委。次年2月18日，省委又作出了《关于防止国民党破坏我党组织的指示》，将“荫蔽精干”政策进一步具体化。

1941年4月22日，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使关中分区更好地配合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将原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所辖的关中分委改由中共陕西省委领导。5月6日，中共中央对陕西省委的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省委由欧阳钦（书记）、张德生（组织部长）、赵伯平（宣传部长）、汪锋（统战部长）、习仲勋（关中分委书记）、文年生（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张中（秘书长）组成。

6月，欧阳钦和张德生先后赴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在听取汇报后指出：在国民党反共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地下党只有坚持“荫蔽精干”的方针，方能生存和发展。之后，陈云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有关文稿，报经中央和毛泽东修改后，以西北局名义下发陕西省委。

12月29日，西北局作出《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决定》肯定了“陕西党在执行中央新的策略路线与组织路线中，是有相当成绩的”，“虽然遭受了许多破坏，但基本上保存了党的基础”。同时指出，“目前陕西党内，尚存在着主观主义与关门主义的残余”，“党的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则仍多不适合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严重环境”①。鉴于陕西处于国民党重点统治区域，西北局要求陕西省委必须坚决肃清主观主义与关门主义倾向，扩大社会活动，采取公开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3页。

合法的斗争方法，适应环境，随机应变；在整顿和发展组织中以精干、短小、分散、多样、自然为原则；党员活动最大部分应公开化、社会化，尽量减少秘密活动，党的会议一般不召开，改为个别接头，秘密文件一律停止印发，改用口头传达；继续审查党员，清洗不坚定分子。强调要熟悉国民党，加强在国民党内的工作，争取其中间分子，孤立顽固分子，利用各种矛盾，同国民党反共力量作斗争。同时，要熟悉社会，深入社会，广交朋友，联系群众。

1942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在马栏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西北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接替欧阳钦任省委书记的张德生做了会议总结报告。会议指出，自执行中央“荫蔽精干”政策以来，陕西党组织不仅“保存了量”，而且“提高了质”。会议决定进一步贯彻“荫蔽精干”的方针，彻底改变党的组织形式与领导方法。会后，省委派出21名干部，以春节期间探亲访友的形式，到有党组织的50多个县传达贯彻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精神。各地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和本地的实际情况，采取各种形式，来隐蔽和巩固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灵活多样的斗争。12月，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分委合并，成立了中共关中地委，由张德生（书记）、汪锋（统战部长）、张仲良（分区行政专员）、文年生（警备第一旅旅长兼分区警备司令员）、张鹏图（副专员）、高仰云（宣传部长）组成地委常委会，统一领导关中分区和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

再次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武装进攻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总长白崇禧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种种攻击和诬蔑，无理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地区，并将50万八路军和新四军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他们又密令顾祝同、汤恩伯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

为了配合顾祝同等部制造皖南事变，消灭新四军，蒋介石于11月22日密电胡宗南，将在豫西、晋南抗日前线的第三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西调关中。其阴谋是：第一步夺取关中分区，第二步向北进攻直取延安，同时夺取三边和

陇东地区。

1941年1月初，驻关中分区赤水县附近的国民党预备第三师首先抢占关中分区的职田镇、马家堡、井村、马栏等地，到处烧杀抢劫，并明令凡逮捕边区人员者，县级奖钱300元，区级奖钱200元，乡级奖钱100元。国民党军相继在三边分区的张家畔、陇东分区的宁望堡、绥德分区的吉镇等地挑起摩擦，并侵占了边区一些地方。

为了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武装进攻，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主力进驻延安以东和以南的金盆湾、南泥湾、九龙泉及甘泉、富县等地，警备第一旅全部进入关中分区。警备第一旅抵达关中分区后，旅长文年生、政治委员阎红彦率警备第三团、第八团和部分县的保安大队，首先在彬县以北的义石村、夙王山一带与胡宗南部激战三天，将其赶回夙王山以南；接着攻打柳林，转战土桥镇和正宁县，均把来犯者赶回原地。

边区南线的摩擦基本平息下来，北线的形势又紧张起来。1941年10月，驻在绥远伊克昭盟境内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十六师何文鼎部突然南下，向定边、安边、靖边进逼。为了打击何文鼎部，确保三边分区安全，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三五九旅的七一七团和第四支队、留守兵团警备第一团、保安司令部保安第二团和骑兵团组成野战兵团，王震为司令员，贺晋年为副司令员，率部急进。11月6日，野战兵团集结于靖边县张家畔，其中一部已到人烟稀少的伊克昭盟四十里铺、黑头梁、银头梁一线，迎击南下的何文鼎部。得悉边区部队已有充分防范，加之驻三边的国民党军邓宝珊部新编第十一旅承诺保持中立，何文鼎不得不于1942年1月14日龟缩回绥远原防地。

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武装进攻被迫暂时停止。

（三）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在陕西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第三次进攻

1943年3月10日，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公开提出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抗日根据地为“变相割据”，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反对抗日民主根据地。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大肆制造反共舆论，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取消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企图发动新的反共高潮。

6月18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拟分九路“闪击”延安。28日，国民党第十六军炮兵团第一营由河防前线合阳开抵耀县。30日，国民党第五十七军第八师由西安开抵同官，游击纵队王裕民部由河东晋南撤抵大荔。7月4日，国民党第五十三师一部闪击边区富县略口村。7月6日，国民党第九十军第二十八师由合阳开抵洛川县交口河桥子镇，第六十一师开抵洛川县东南圪台镇，第八十军直属队由耀县开抵同官，新编第二十七师由富平西开抵庄里镇、口头镇，第一军直属队及第七十八师由华县开抵彬县。7月7日，国民党军炮击关中分区八路军警戒阵地。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大力制造反共舆论和进行武装挑衅的严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战，进行政治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以粉碎其可能的大规模进攻。7月4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谈判代表董必武：蒋介石正增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内战可能爆发，请发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及各界人士起

来呼吁制止内战，特别通告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同日，朱德致电胡宗南，责问胡宗南何以将河防大军西调，北向边区。7月5日，萧劲光致电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各将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调动大军准备进攻边区、重开内战的阴谋。7月9日，朱德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胡宗南等，抗议国民党军炮击关中分区警戒阵地，要求制止进攻。同日，延安3万军民举行大会，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纷纷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运动，陕甘宁边区警卫部队一次次地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试探性进攻。

解放区军民的抗议活动和反内战斗争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和支持，苏、美、英等国大使警告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声讨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蒋介石被迫命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7月11日，蒋介石、胡宗南致电朱德，表示无意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12日，胡宗南令其部队从彬县、洛川等地撤回。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还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犯的情况下即被制止。

国民党顽固派在陕西国统区继续捕杀抗日志士

在对陕甘宁边区准备武装进攻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在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继续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抗日志士以及无辜群众，破坏团结抗战。

1943年6月26日，中共商县县委书记王连成、县委委员巩德胜在商县县城西门外英勇就义。

8月3日，国民党陕西省第十行政督察区专员温良儒和临潼县县长王家麟带领保安团一个营、工兵一个连和咸阳、临潼、高陵、泾阳县军警以及渭北12个镇的保甲武装3000人，将临潼县施家堡、白杨寨子、花刘村包围，企图将交口镇的民众抗日武装一网打尽。交口地区长期以来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力量控制，是西安附近的一个红色据点。在温良儒带队包围交口镇之前，包括胡宗南部的高级参谋、第十行政督察区副专员、渭北“剿匪”总指挥等党外朋

友已将情报送给了交口镇中共组织负责人谈国帆、王志温。谈国帆、王志温和有关人员紧急疏散、隐蔽。温良儒等未捕到谈国帆、王志温，即将共产党员戚玉平等8人杀害，逮捕了进步人士杨耀山、包文长，并查抄了谈国帆、王志温等人的家，解散交口乡各保，撤销交口乡的行政建制。谈国帆、王志温、王廷益等40多名已经暴露或可能受到迫害的人员全部撤入陕甘宁边区。

8月20日，国民党西乡县党部书记长赵寿阶、县长温恭、警察局长于聪生分头逮捕了中共黄池支部书记刘继哲等9名共产党员和两名进步青年。11月29日晚，刘继哲就义。之前，其母亲和嫂嫂带着他四岁的儿子去探监，他一边给啼哭的儿子擦眼泪，一边叮咛儿子“长大了要跟爸一样”，并将新写的《甘将热血献八荒》诗交嫂嫂带给党组织。诗的全文是：“你问啥，我不讲，你动刑，我不降；你要杀，我昂头，甘将热血献八荒；今日鲜血浇棉田，明日红旗满天扬！”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意志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中共西乡县简易师范学校支部书记陈鼎昌和支部成员万发明、冯忠恕被移送到西安劳动营关押，陈鼎昌遭受酷刑死于狱中。

10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陕南调查专员王文楼、安康县长袁德新带领军警到安康县恒口区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共产党员杨麟科等23人被捕。

12月初，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李犹龙带领省党部调统室、三青团陕西省分团部、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陕西省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的特工人员到礼泉县进行大搜捕，破坏当地的中共组织。23名共产党员和25名党外民主人士被捕，并被押送西安的监狱。被捕人员被施酷刑，但无人屈服。

12月9日，共产党员许权中、任耕三、刘兴坤被国民党袭杀，许部特务排排长阎麦绪同时遇难。抗战爆发后，许权中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第五二九旅旅长、第一七七师参谋长，驰骋于华北抗日前线，后任第四集团军中将参议兼第四集团军眉县万家塬垦区主任，从事中共地下工作。他以生产为名组织了两个连的武装，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在眉县教坊村窑店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1944年3月22日，中共麟游县委书记王乐天在宝鸡英勇就义。

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的残酷打击、迫害，使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损失。

恢复陕西国统区的中共组织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后，为了有效地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斗争，领导陕西国统区人民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共关中地委开始领导恢复陕西国统区的党组织。

1944年9月30日至10月8日，中共关中地委召开地委统战部部务委员和各县县委统战部长联席会议。由于康生诬蔑陕西党是“红旗党”、“假党”而造成的恶劣影响，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陕西党组织的现状和对陕西党组织的认识问题。会议认为：内战时期，陕西党只留下了一些零星党员，党组织主要是在西安事变后的群众抗日救亡高潮中建立和恢复起来的，是由几个系统发展起来的。省委的主要负责人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李一氓、彭加伦、汪锋、潘自力、惠子俊、王俊、张策等都是中央和西北局派出的。陕西党组织不是什么“红旗党”，也不是“假党”。八年来，陕西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做了很多工作，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这几年积蓄了党的力量，保存了党的基本组织。陕西党在执行中央新的策略与组织路线中是有相当成绩的。会议指出：中共中央和西北局认为陕西党基本上是好的，是可靠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地委也是这样的认识。这就是党对陕西组织的结论和评价。

1944年秋，陕甘宁边区的审干和为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发生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基本结束。根据中共西北中央局的指示，关中地委陆续派出干部到陕西国统区与地下党组织联系，逐步恢复建立党的组织。

恢复与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是积极而又非常审慎地进行的。工作方式步骤一般是：第一，从边区找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尤其是通过一些到边区做生意、探亲的人员了解国统区的情况。第二，从侧面了解地下党员的情况。第三，恢复联系的方式，一种是从边区选派合适的干部外出，到原来领导管理的

地区，同认识的发生过关系的党员接头，进一步了解情况，确定哪些党员可恢复联系，这是主要的方式；另一种是派交通员外出，调有关党员干部到边区，详细了解本人与所领导的党组织情况以及其他社会情况，经过认真研究，确定恢复联系的党员。此外，也有一些党员干部自行到边区寻找组织，汇报工作，恢复联系。首先恢复联系的党员，绝大部分为支部委员以上的干部党员、中上层社会职业的党员以及地方武装中的党员，其中知识分子党员居多。

为了适应形势与工作任务的需要，中共关中地委在恢复各地党员组织关系的基础上，开始逐步建立党的组织机构。各地党的组织形式以“精干、短小、分散、多样、自然”为原则，这样不仅可以防止组织被破坏，而且有利于组织发展。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和中国民主同盟组织在陕西的建立和发展

1941年夏，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民族大众同盟是在周恩来的提议和董必武、王若飞的直接领导下，由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等筹划成立的。一年后改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既有中共党员参加，又有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幕僚的进步人士参加，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在政治活动中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努力促进国内团结，把国民党中愿意进步的人尽量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制造分裂、阴谋妥协、反对民主的情况下，它从国民党内部去进行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1941年秋末，在西南进行抗日民主活动的杜斌丞经王炳南介绍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任陕西组组长。共产党员杨明轩、李敷仁、武伯纶、赵寿山、王维祺等也加入了这个组织。杜斌丞和杨明轩还当选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941年3月19日，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基础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民主政团同盟主张坚决抗日、加强团结，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实践民主、保障自由，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社论，指出：

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及其发布的纲领，“其中强调指出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1942年5月初，民主政团同盟总部特派员郭则沉到西安，与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等商讨建立民盟西北组织与开展抗日民主运动问题。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中国民主同盟。10月，郭则沉持民盟主席张澜致杜斌丞的亲笔信抵达西安，邀请杜斌丞主持西北盟务。杜斌丞即与杨明轩、王菊人等秘密成立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过几个月的积极工作，西北民盟在西安、三原、韩城等27个市、县和甘肃、宁夏等地发展了150多名盟员，其中一些是共产党员。次年2月，民盟西北总支部正式成立，主任委员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成柏仁、李敷仁为执行委员。民盟西北支部确定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不反苏、不反共、不反人民为发展盟组织的政治原则。杨明轩协助杜斌丞主持盟务并负责组织工作。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和中国民主同盟在陕西的组织十分注重与西北军人的联络工作。1944年12月，杜斌丞到固原，与国民党军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商讨西北军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问题。高桂滋表示，在西北军联合反蒋之前，第十七军将进一步保持固原与陕甘宁边区商旅的畅通。高桂滋向守备边界的部队下达了与八路军互不侵犯、各守边界的命令，建立了由固原经王洼子到三岔的秘密交通线，并把第十七军盖有关防印信的通行证、护照，交边区的地下工作人员使用。杜斌丞在固原期间，中共西北中央局数次截获蒋介石要胡宗南“逮捕杜斌丞就地适宜处理”的密电，均派专人到固原，向杜斌丞和高桂滋通报，并诚邀杜斌丞进入延安，以保障他的安全，并就近请教。

在中国共产党支持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和中国民主同盟陕西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民主活动，在配合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有效的作用。

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斗争

(一)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王树声、戴季英率部挺进豫西

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在1944年4月12日提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①]此时,陕甘宁边区河防压力减轻,中共中央决定抽调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部分部队和边区部分干部,开赴抗日前线,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5月11日,鉴于河南大片国土在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中被日本侵占,中共中央决定在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开辟河南、控制中原的战略部署,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派部队向河南敌后进军。九、十月间,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后改为豫西抗日游击第一支队)和以太岳军区第十八、第五十九团组成的豫西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先后进入豫西,在嵩山、箕山和陇海路新安、渑池段南北建立了拥有20个县、300多万人口的根据地,并成立了河南行政公署和河南军区。

10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任命王树声为河南军区司令员,戴季英为军区政治委员,率两个团及大批干部从陕北进入河南活动,建立河南人民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5页。

解放军，为解放河南而斗争。一个月后，王树声、戴季英率部从延安出发。12月19日，毛泽东指示王、戴，要备足鞋袜，以免指战员在途中冻伤腿脚而致残。12月底，从延安出发的中共中央党校百余名干部和晋绥军第六支队一部进入豫西新安地区。

194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局、晋察冀分局、平原分局、山东分局从财政上援助河南。因为“迅速发展河南建立根据地，打通华北与鄂、湘联系，这是准备反攻、夺取华北、巩固苏北的重要步骤之一，没有河南之发展与巩固，要想完成上述任务将发生严重困难”，并指示河南区党委必须确定与坚持自力更生的财政原则，克服财政困难。

河南新解放区的开辟，扩大了华中与华北、陕北战略区的联系，对于坚持全国抗战，控制中原战略要地，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湘鄂赣

1944年9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巩固和发展华北、华东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派遣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主力和一批干部挺进华南，深入敌后，北与鄂豫皖边区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南与广东曾生领导的东江抗日纵队连成一片，力求开辟湘粤赣边区的五岭山抗日根据地，以配合全国各抗日战场实行强大的反攻作战。随后，毛泽东同延安警备区司令员、三五九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王震谈话，对中共中央准备组织部队南下的问题做了指示，并分析了这次南征的前途，提醒王震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10月31日，第三五九旅主力部队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全支队4000余人。11月1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出席南下支队举行的誓师大会。9日，南下支队离开延安，东渡黄河，越过同蒲路，由太岳区垣曲以东再渡黄河，越过陇海路，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

1945年1月27日，南下支队在鄂豫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师。后在新四军第五师一部的配合下，转战鄂南、湘北、湘南，在通城、崇阳、郴县、宜章等地区开辟了南北130公里、东西180公里的湘鄂赣抗日解放区。4月，

南下支队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湘鄂赣边区党委、行政公署和军区。后部队继续远征，沿湘赣边向南挺进，一直打到广东的南雄、始兴地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骑兵旅北上大青山

在平绥铁路以北，依托大青山脉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既是晋察冀边区的屏障，也是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45年春，在姚喆、高克林等人率领下，中共领导的绥远抗日军队发动强大攻势，连克绥中、绥东、绥南的日伪据点10多处，将大青山绥南抗日根据地与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使平绥铁路处于抗日武装的钳制之中。这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绥远省政府派回了臭名昭著的“自卫军”，委任“游击县长”，到大青山地区向抗日军民收复失地。顽匪鄂友三也乘机挤进绥西地区。抗日时躲在后面的国民党“挺进第五纵队”也到了绥西，顽匪苏美龙则由绥南跑到绥中。他们勾结日军，破坏解放区，暗杀解放区工作人员，并集结兵力侵占了抗日根据地所属的井尔沟等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从陕甘宁边区抽调康建民、朱子休率领的骑兵旅北上大青山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和开辟解放区的工作。在姚喆和高克林的领导下，骑兵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在武川县的井尔沟痛打“挺进第五纵队”邬四儿部，在后脑包将其全部歼灭；然后乘胜连克武川县城、陶林等地日伪据点三处，扩大了解放区，使绥西、绥中、绥东等根据地连成一片。

6月，中共中央又从陕甘宁边区抽调独立第一旅全部，教导旅第五团、独立团，抗大七分校第一、第三大队等部先后开赴晋西北，攻占日伪据点，开辟新的解放区，以支援和配合其他抗日大军准备反攻。

文年生、张启龙率部南下

1945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和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从延安南下，经湘鄂赣前往湘鄂桂边（小北江一带五岭山脉中）开辟新的根据地。警一旅南下时用八路军第三游击支队的名义，文年生

任支队司令员，雷经天任支队政治委员；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南下时用八路军第二游击支队的名义，刘转连任支队司令员，张启龙代理支队政治委员。两个支队的任务除了经中原、江南同王震率领的南下支队合并开展工作外，还担负着护送中共中央派往两广工作的第九干部队和派往中原工作的第五干部队的任务。为了加强领导，统一指挥行动，成立了以文年生为指挥、刘转连为副指挥，张启龙为政治委员、晏福生为副政治委员的临时指挥部。

6月7日，毛泽东在准备南下的警备第一旅和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营以上干部会上讲话。他说，这次有两个旅，还有很多干部，要到前方去，这是关系中华民族解放的问题。这次出去能不能胜利，决定于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的好坏和政策的正确与否，要同人民团结得像一家人，有了正确的政策就到处无敌。12日，毛泽东主持会议，再次讨论文年生、张启龙率部南下的任务、战略方针等。

6月18日，文年生、张启龙率部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太岳根据地，而后由晋南抵豫北，从陕县再次过黄河南下。当部队到达河南省新安县时，日本宣布投降。

（二）学习贯彻中共七大路线

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

在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为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做准备，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的召开，经过了长时间的筹备。早在1944年5月21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就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做了充分准备。1945年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为七大准备的《论联合政

府》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在此时提出适当的纲领,这就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刘少奇说:党章以毛泽东思想来贯穿,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党章强调扩大党的民主,包括党员在一定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4月20日,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了军事报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七大的议程。六届七中全会历时11个月,先后召开8次全体会议,完成了七大的筹备工作。

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召开。任弼时报告了七大的筹备经过。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到今日,这固然是缺点,但也有好处。因为在延期当中,首先是发展了我们的力量。现在党员120万,党领导的军队近100万,解放区人口近亿,党已成为全国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七大在这样的基础上召开,其意义与作用是非常伟大的。毛泽东就七大的工作方针做了报告,他说: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地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预备会通过了七中全会提议的由毛泽东等1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等6项提案。

4月23日,延安中央礼堂的主席台上悬挂着两面鲜艳的党旗和毛泽东、朱德的画像。下午,中共七大在庄严肃穆的《国际歌》声中揭开帷幕。毛泽东致开幕词,他指出:我们的大会是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的前夜召开的。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一个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一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老中国。我们的任务就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也是七大的中心任务。4月24日,毛泽东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形势,指出希特勒德国就要被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的失败也为时不远。他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但由于战争的胜利,为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关于国内形势,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八年抗战,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有了强大的解放区,但国内仍存在着危

机。在人民面前有两个前途:光明的前途和黑暗的前途。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为了实现全党的任务,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大会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4月25日,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精神和毛泽东军事学说以及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大会制定了以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基本内容的人民武装抗日的军事路线。

5月14至15日,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科学地阐述了党的组织路线、组织原则和干部问题。经过热烈讨论,大会一致通过在新党章中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5月24日,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条例和毛泽东关于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建议。大会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6月19日,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全党在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代表大会,也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经原中共陕西省委选举和中共中央调整,欧阳钦、张德生、汪锋、赵伯平(以上为正式代表)、彭毓泰、胡达明(以上为候补代表)代表中共关中地委所属的党组织和党员出席了中共七大。

学习贯彻中共七大路线

为了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共七大路线,1945年6月23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发出关于学习七大文件的指示,要求陕甘宁边区县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从7

月1日起认真学习七大文件，“学习的目的在于深入七大路线的传达，给干部以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一步改进干部的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团结全党，实现七大路线”，并规定以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朱德《论解放区战场》、新党章及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西北局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文件为学习的主要内容。关于各单位学习步骤、方法及组织领导等问题，西北局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军队政治机关、政府及民众团体中的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订出计划并具体指导，不必强求一律。西北局特别强调，边区各单位、各部门都要认真研究延安整风学习的经验，采取细致的与实际密切联系的方法，防止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倾向的发生，提倡精读、思考、漫谈与争辩学习，根据文件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及时总结与交流学习经验，利用报纸推动与帮助学习，使干部、党员对七大文件的学习能深入，获得良好的效果。

7月10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根据部队的实际，作出了关于学习中共七大文件的指示，要求边区部队应以深入传达七大路线，系统地宣传与学习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及其建党建军的方针为学习的重心，并根据它来检查和改进思想与工作。经过学习七大文件，务必使我们的干部在思想上、党性上、政策的理解及党内军内团结上有所改善，有所提高，强调在干部和部队中，要克服存在着的若干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及个人主义等等倾向，以及一切有碍团结、有碍进步的思想，为促进部队的建设而努力奋斗。

在陕甘宁边区党、政、军系统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共七大文件精神的同时，边区文教单位也掀起了学习中共七大文件的热潮。延安大学积极组织各院，教职学员，采取联系实际、民主讨论的方法，深入学习七大文件。他们在学习讨论的基础上，举行学习报告会，由校长周扬及张宗麟、何思敬、萧军、艾青等分别讲述七大文件的中心内容和意义，讲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启发、引导大家克服学习中的盲目性，深入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增强贯彻执行七大路线的自觉性。

中共关中地委就中共七大文件的学习安排向西北局写了请示报告，提出在干部中学习七大文件配合检查领导作风，在干部中进行思想教育消除上下

隔阂，组织边区内的干部学习好、贯彻好七大路线。地委并指定联络员熟背七大的主要文件，到国统区向党员口头传达七大精神，着手恢复整顿党的组织，为迎接抗战的胜利做准备。

（三）延安筹备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

陕甘宁边区发起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拥护，却遭到了蒋介石集团的悍然拒绝。他们顽固地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并玩弄“还政于民”的阴谋。为实现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6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决定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于当年11月在延安召开。为做好会议的准备工作，会议还决定在延安成立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各解放区的筹备工作，由各解放区的参议会驻会委员会兼任。

为了贯彻七大路线，进一步推动全国爱国民主运动和全国性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于6月21日召开了边区各团体代表会议，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会致辞。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同志曾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及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与联合政府的建立，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及政府委员会一致认为，亟宜正式发起筹备这一伟大的人民会议，并认为在目前时机下，筹备事宜，刻不容缓，故特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共商进行。会议向各解放区发出了关于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通电。

7月7日，延安各机关代表及延安市群众千余人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

行大会。马豫章市长发表讲话，赞扬八年来各解放区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号召延安人民认真贯彻中共七大路线，在备荒中加紧生产，厉行节约，准备反攻力量，帮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及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为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

7月10日，延安、富县、庆阳等地的天主教友为纪念抗战八周年和拥护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公开发表了致朱德总司令转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抗日将士的专函。他们对八路军、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指出，在目前形势下的中国，只有迅速召开代表人民的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实行真正的民主，动员全国力量，同心协力准备反攻，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对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表示拥护。

随后，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及各人民团体也表示拥护陕甘宁边区关于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通电。

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延安成立

7月13日，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朱德出席，林伯渠报告筹备经过，周恩来作《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草案）》报告。

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128人，其中有陕甘宁边区的高岗、李鼎铭、谢觉哉等9人；晋绥解放区的续范亭、刘少白等8人；晋察冀解放区的成仿吾、沙可夫等9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邢肇棠、薄一波等9人；山东解放区的齐燕铭、黄春圃等8人；华中东部各解放区的恽子强、贺绿汀等8人；华南解放区的陈郁、何干之等7人；湘鄂赣解放区的徐特立、陈奇涵等3人；鄂豫皖解放区的钱瑛、苏井观等3人；河南解放区的范文澜等3人；中共中央的周恩来、林伯渠、李富春；第十八集团军的杨尚昆、边章五等9人；新四军的潘汉年、伍云甫等6人；解放区职工会的崔田夫、赵占魁等3人；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的冯文彬、胡乔木等5人；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的蔡畅、邓颖超等4人；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周扬、丁玲等5人；蒙古文化协会的乌兰夫；回民协会的张凤午等3人；东北

救亡总会延安分会的李延禄、刘澜波等3人;中西医协会的毕光斗等2人;解放区新闻记者协会的柳堤、范长江等5人;抗大2人;延大4人;医科大学3人;护士协会3人。

会议选举产生了由25人组成的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周恩来为主任,林伯渠、续范亭、邢肇棠、李鼎铭为副主任;通过了《关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筹委会通电全国,阐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使命,并指出:"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为中国的最后胜利与全国民主开辟广大的道路。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将是一个加强抗战、配合盟国、准备对日反攻的大会,将是一个加强团结、制止分裂与内战的大会,将是一个促进国民党一党专政之迅速结束与民主的联合政府之迅速产生的大会。"通电号召解放区人民与全中国人民一致起来,为使这个会议得以如期召开并获得伟大成功而努力。

7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讨论实施《关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和起草行动纲领等有关问题。

8月1日,筹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纲领起草计划的意见",并决定由周恩来、陈云、谢觉哉、刘少白、成仿吾、邢肇棠等29人组成纲领起草委员会。

(四)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夺取爷台山反击战的胜利

淳化事件

1945年2月,以梁干乔为副指挥官的国民党彬洛区军训民众指挥部由耀县移驻淳化县,主管淳化、旬邑、耀县壮丁训练。梁干乔是个死硬的反共分

子，到淳化几个月，竟残杀无辜群众118人，关押所谓“嫌疑犯”200多人，激起了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抗，纷纷向陕西省政府告状。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借机扩充自己的势力，于5月19日以“破坏行政，纵属扰民”为由，将梁干乔撤职，派亲信李静谋接替梁干乔的职务。

彬洛区军训民众指挥部下属第二守备区保安第二、第三、第四团。李静谋上任时，带来90多名军官，大换各级主官，激起了梁干乔委任的军官的强烈不满和反抗。6月26日，第二团团长刘文华发动兵变，攻占国民党淳化县党部、淳化县政府和彬洛区指挥部。同时，淳化县方里镇的一排守军起义，向边区赤水县保安大队投诚。

7月11日，刘文华率部到马栏镇。后刘文华去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的接见。毛泽东在接见和宴请刘文华时高度评价他的革命行动，风趣地说“这是逼上梁山”。10月，刘文华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谋。

这就是名噪一时的“淳化事件”。

“淳化事件”本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官逼兵反，但胡宗南却反诬“淳化事件”是陕甘宁边区插手策划所致，借此大举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边区。从7月15日起，胡宗南从河南前线和陕西东部急速调动国民党军九个师，部署于淳化、耀县、三原、泾阳、兴平、乾县、同官、旬邑一带。反动分子还制造所谓“共产党要打西安”的谣言，声言“反共第一，抗日第二”，要“进攻边区，杀尽共产党”。在一片反共内战的喧嚣声中，7月21日拂晓，胡宗南命令暂编第五十九师和骑兵第二师，突然向驻关中分区淳耀县爷台山的八路军发动进攻。

7月23日，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致电蒋介石、胡宗南，揭露其制造反共内战的阴谋，并要求调查、制止。紧接着，延安权威人士通过新华通讯社，郑重地向国民党当局发出严重警告，指出：大敌当前，从抗日前线调动军队来反对自己的同胞，这是犯了滔天大罪，真的要打的话，那就无异于玩弄一堆燎原的大火。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玩火的人应当注意，全民族正用自己的精力向民族敌人苦战的时候，若干败类要想违反这个意志以逞自己的私图，那是绝对不会有好结果的。

从7月21日至23日，国民党军数次疯狂进攻八路军爷台山阵地，均未得逞。24日，国民党军第十六军预备第三师投入战斗，并调集大批野炮、山炮、迫击炮及美国火箭炮，向爷台山阵地猛烈轰击。爷台山守军新编第四旅六个连的指战员坚守阵地，进行英勇反击。关中分区由1129人组成的56个游击小组和由37人组成的3个爆破组，分别有效地配合了正规军作战。26日，国民党军以更加猛烈的炮火向爷台山阵地轰击，大部分村庄被毁。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副司令员徐向前、萧劲光，政治委员关向应，副政治委员谭政，参谋长张经武联名致电胡宗南，指出："大敌当前，既属黄帝子孙，即宜一致对外，枪口内向，为全国人民所不许。兹与先生约，如先生尚无破裂决心，即请约束贵部，停止攻击。如先生执迷不悟，必欲大举进攻，激动边区广大军民起而自卫，则事态决裂，全由贵方负责。"然而，胡宗南一意孤行，调集重兵继续向爷台山发动大规模的进攻。27日晚，为避免遭受重大损失，八路军主动撤出爷台山阵地及爷台山西面的官庄、于村、野狐嘴、十里原、符子沟等41个村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上述地区，并在边区边境的官庄、梁庄、龙局、彬县、耀县、洛川一线集结重兵，企图扩大进攻。

爷台山反击战

为了打退胡宗南部的疯狂进攻，取得自卫反击战的胜利，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成立了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习仲勋。赤水、淳化、耀县成立了战地工作团，负责担架、运输等各种支前工作。

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和扩大内战的阴谋，八路军决心在国民党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反击。在张宗逊、习仲勋的指挥下，八路军以爷台山为战役的主攻方向，以新编第四旅五个营为主攻部队，第三五八旅为助攻部队，教导第一旅、第二旅为预备队。同时，边区的广大群众也积极动员起来，支援八路军反击顽军的战斗。他们不仅有组织地送饭送水，护理伤员，而且组织了担架队、游击队，配合八路军作战。8月7日，朱德、彭德怀再次致电蒋介石、胡宗南，要求撤退来犯的国民党军，对居民损失予以赔偿。蒋、胡置

若罔闻。8月8日,边区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和联防军司令部关于反对内战、坚持自卫的原则,对国民党军队予以坚决还击,一举攻占爷台山。经过英勇顽强的战斗,到8月10日,八路军全部收复爷台山等失地,取得了爷台山反击战的全胜。

爷台山战斗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后方多次制造反共摩擦的最后一仗,也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向人民抢夺胜利果实、阴谋发动内战的信号。这次反击战的胜利,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国民党顽固派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和侵占爷台山阵地后,中共中央不仅在政治上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阴谋给予深刻的揭露,而且在军事上集中优势兵力给来犯者以歼灭性的打击;同时又在收复边区失地后就停止了进攻,严阵以待,使顽固派不敢越雷池一步。爷台山反击战的胜利是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的胜利。在国民党军以强大的兵力发动进攻,而爷台山驻军只有少数兵力守卫阵地的情况下,八路军采取了既坚守又不死守的作战方针,在防守中消耗敌人,在赢得时间后主动撤出战斗,待敌深入边区后,八路军利用地形、群众支援等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聚而歼之。这次反击战的胜利,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而且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使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蚕食陕甘宁边区并挑起内战的阴谋又一次破产。

毛泽东对爷台山反击战给予了高度评价。1945年8月13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轻易易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①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7页。

（五）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解放区战场的全面反攻

1945年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苏联军队从东、西、北三面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由于日军在关内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早已处在解放区的包围中，因此，解放区军民承担起对日全面反攻的作战任务。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①]。

8月10日，中共中央要求各地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人民军队，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8月10日24时至11日18时，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7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的日、伪军送出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即组织反攻大军，向日、伪军发出通牒，陆续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

晋察冀军区于8月11日向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发出通牒，限其在48小时内令所属日军投降。日军拒绝后，晋察冀军区在广大群众支援下，对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一部攻夺大同、丰镇、集宁、商都等城，一部配合晋绥解放区的部队进攻太原，一部包围北平，一部攻张家口、张北、多伦、沽源，一部攻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9页。

唐山、秦皇岛、葫芦岛等地，一部攻天津、塘沽，一部攻石家庄、保定。

晋绥军区于8月11日向附近日、伪军送出限时投降的最后通牒。24小时后，晋绥军区一部向平绥路以北进攻，一部沿黄河北上攻击归绥，一部在南线由同蒲路西侧反攻太原。8月15日至19日，先后攻克太原外围的日军据点，并一度攻入太原以南的晋源县城，对太原形成包围。

晋冀鲁豫地区部队于8月13日开始对日、伪军全面反攻。太行部队一部向新乡、博爱段进攻，并于8月16日晚突入博爱城内，一部向太原进攻；太岳部队于8月20日进抵平遥，随即向平遥、介休地区之间的日、伪军进攻；冀豫部队一部相机进攻开封、新乡、安阳、邯郸，一部配合山东解放区部队进攻济南；冀南部队首先对运河以东的伪军展开进攻，接着攻击临清城，突入城内，并截歼逃敌大部。

山东军区于8月11日部署全面反攻任务，编成山东野战兵团，动员10万民兵组成数十个脱离生产的“子弟兵团”，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以五路大军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

在华中，从8月中旬开始，新四军的苏浙军区、淮北军区、淮南军区、苏北军区、苏中军区及鄂豫皖湘赣军区、河南军区所属部队，分别向长江两岸、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及宁沪铁路的各地日、伪军举行反攻，直逼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解放了华中地区大片国土。

在华南，从8月14日开始，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琼崖纵队等人民武装力量，分别向广九路沿线、东江两岸、雷州半岛的日、伪军据点及当面之敌展开猛烈进攻，扩大了解放区，直逼广州、汕头、海口等城市。

此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从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华中、陕甘宁等解放区抽调大批部队和干部，准备向东北进军。东北抗日联军在中苏边界营地召开反攻誓师大会后，回国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并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占领战略要地，解放了东北一批城市和乡村。

从1945年8月11日到9月2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在对日军实行全面反攻中，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其中包括华北重镇张家口。但由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阻挠，人民军队未能解放被自己包围的

一些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10月25日，台湾地区受降仪式在台北举行。

经过十四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全国人民热烈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9月5日，延安各界2万人集会，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到会讲演。朱德说："中国几十年来受日本侵略，今天得到了解放。这个胜利的获得，是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军队的英勇作战和同盟国的帮助。""八路军、新四军将士抗战八年，功勋卓著，如果没有这样能打仗、能生产，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就不会有今天抗战的胜利。""现在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富强的中国"。[①]西安10万民众于9月3日举行了庆祝大会。

中共陕西组织和陕西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的陕西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里既是全国抗日战略总后方之一，西北大后方的前沿阵地，又是中共中央的抗战指挥中心。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中共陕西组织和陕西人民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 发动组织陕西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积极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实现

陕西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中共陕西地方组织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最忠实的实践者，是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者。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陕西省委就明确提出党在新时期的任务是动员千百万群众到抗日战线中来，为和平民主和抗战而斗争。

全民抗战爆发后，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各级组织利用卢沟桥事变及其发展的形势，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抗战宣传鼓动工作和抗日人民的组织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部署和领导下，陕西的抗日救

①《解放日报》，1945年9月6日。

亡运动迅速发展，各种抗日团体纷纷成立，工农商学及妇女等各界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空前的反侵略宣传周和“捐献一日所得”运动，支援前方抗日将士。西安、咸阳、安康、汉中等地纷纷组织学生抗日宣传队下乡宣传，他们通过召开抗敌大会、农民大会、讲演会、座谈会及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街头演讲、演唱等多种形式，声讨日军侵华暴行，讲解防空、防毒及救护常识，动员人民参军支前。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青年积极要求报名参军，百姓慷慨解囊，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要求转交前方将士。一些地方官员和士绅也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民众的抗日活动，建立抗日武装保境安民，有的还率部到前线与日军直接作战。

从1937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八路军沿陕西的泾阳、富平、蒲城、同官、澄城、合阳、韩城一带东渡抗日。沿途各县民众在中共陕西组织的领导和组织下，迎送八路军出征，热情慰问出征将士，许多青年投笔从戎，踊跃参军。中共陕西省委号召共产党员要带头开赴抗日前线，抗敌救国，奋勇杀敌，用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群众，并要求每个党员和支部在特殊情况下都要有独立工作的精神，以各种方式动员和组织群众抗日救亡。

中共陕西组织积极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通过卓有成效的组织动员，使陕西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实现。

2. 三秦儿女用血肉之躯保卫河防，巩固全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与日军浴血奋战，不怕牺牲，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但终因敌强我弱和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华北、华东、华中迅速陷入敌手。在这种形势下，巩固西北、西南大后方，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陕西东依黄河，自古以来就有着重要的军事地位，无论是群山环绕的关中，还是黄土高原的陕北、秦巴山区的陕南，均需据险设防。尤其是1938年日军侵入山西、逼近潼关后，陕西不仅成了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和华中、中原抗日军民的后方基地，更是连接西北、西南的重要枢纽。保卫陕西，抗击日军，支援前线，就成为中共陕西组织和广大民众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对陕西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陕甘宁边区人民保卫河防英勇

奋战。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主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为加强对留守陕甘宁边区领导和指挥，为保卫河防、保卫边区、保卫中共中央，在延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1938年3月，边区保安司令部下辖的10个保安大队和各县保安队也划归留守兵团管辖，从村、乡、区到县还建立了抗日自卫军。到1938年底，自卫军人数达22.4万余人。这些武装成为陕甘宁边区进行保卫河防、清剿土匪等军事斗争的主要力量。从1938年初至1942年4月，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及边区军民同日军进行大小战斗78次，粉碎日军数十次进攻，共歼灭日军近万人，胜利完成了保卫河防的任务。

1938年初，日寇进逼潼关，炮轰陕西河防，陕西即将成为国防前线和战区，中共陕西省委号召全陕军民奋起保卫陕西。在保卫陕西的神圣战斗中团结起来，共赴国难。要求“陕西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更加紧学习军事，学会打仗，时刻准备上前线！共产党员应当站在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斗争前线！为坚持长期抗战并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奋斗到底！”[①]中共陕西各级组织积极组织和动员民众抗日力量，参加或配合国民党军队奔赴抗日前线与侵华日军浴血奋战，三秦子弟以血肉之躯抗击日军的西进锋芒。由成仿吾作词、吕骥谱曲的《保卫陕西之歌》迅速唱遍全省，它反映了1000万陕西同胞的共同心声，无数热血青年就是唱着这首歌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而朱德总司令在东渡黄河时气壮山河的誓言：“古人中流击楫而誓：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我们这次出征，不把日寇赶出中国，也决不复渡黄河。我们要打到敌人后方去，打到鸭绿江，直抵黄龙府，再与诸君痛饮！”[②]更是时时激励着三秦儿女奋勇杀敌。

在整个抗战时期，除陕北府谷沦陷数小时外，日军没有能够侵占陕西一寸土地。三秦儿女用血肉之躯保卫家乡，确保了全国抗日战略大后方的安全。

3. 积极支援前线，为全国抗战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

抗战时期，陕西约有937万人口，耕地面积3692万余亩，陕西人民在人

① 罗凤林等：《中国共产党陕西80年》，西安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西军民抗战纪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均为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积极为抗战输送兵源。抗战时期，陕西人民为抗战前线输送了大批兵员。在陕甘宁边区，“1937年至1938年两年中，全边区动员了8000多名青年参加八路军和边区保安队。1939年12月28日，边区党委、边区政府与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发出训令，动员壮丁1710名补充留守兵团和保安队，要求三个月内完成，而延安县这次完成130名，占补充总数的7.6%。1940年春，边区政府原计划动员3500名青年参军，结果有5000多名青年参军。抗战期间，边区先后动员了3万多名青年参军。延安县和延安市的青年表现得非常积极，据有关当事人回忆，延安前后参军的青年人数占到当时县、市总人口的10%。”[①]另据国民党陕西军管区的统计，八年抗战期间，陕西历年征兵额为：1937年自10月征兵为5.0108万名，1938年11.2372万名，1939年18.2025万名，1940年18.3276万名，1941年15.4285万名，1942年15.6904万名，1943年9.2864万名，1944年13.8264万名；1945年初至9月3日为8.6119万名。[②]连同志愿兵等兵员在内，共训练壮丁约160万以上。以当时陕西人口计，几乎不到9人就有1人应征。这些数字，一方面反映了陕西人民对抗战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陕西人民不堪承受的负担。

其次，田赋征收与军粮调配。陕西驻着胡宗南的四五十万军队和四五万军事学校的学生，他们的军粮均取自于陕西人民。陕西人民年需负担军粮256万石，加之阎锡山的部队每年向陕西采购军粮10余万石，陕西人民的负担极为沉重。另外，自抗战爆发，冀、鲁、晋、豫诸省相继沦陷，难民流亡，云集关中陇海铁路沿线各地。尤其是在黄河决口以后，黄泛区灾民更像潮水般涌入陕西。据当时官方统计，为数约10万人。因此，在抗战开始后不久，陕西就把开垦荒地、扩大农村耕地面积视为重要问题之一。当时，陕西纳粮数及人均负担均超过全国其他省。1941年至1945年，陕西每年的纳粮数分别占全国总数的6.6%、7.3%、7.4%、8.7%、8.5%；全国纳粮各省平均每人负担不过0.574石，而陕西省每人竟达1.564石；以粮食产量与捐纳赋粮的比例计算，

①《陕西军民抗战纪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5页。

② 范宝信：《陕西省政述要》，陕西省政府统计室1947年7月印行。

1944年度后方15省粮食产量中捐纳田赋者，还不到4%，而陕西竟达10%以上。[①]

4. 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创建了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贫穷、闭塞、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了举世称誉的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当时中国政治上最先进的区域。国内外进步人士把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誉为“西北的红星”、“中国的希望”、“新中国的试管”。毛泽东把陕甘宁边区和以它为样板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称为“民主中国的模型”。[②]

陕甘宁边区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大力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

陕甘宁边区是进行民主政权建设的模范。民选的参议会是边区名副其实的民意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边区政府和法院由它组建，受它的监督并对它负责；参议会的参议员通过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真正民主选举产生；边区的政权在组织上实行“三三制”，不论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均吸收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代表参加。这种政权结构充分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形成了最广泛的执政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管理边区，建设边区，坚持抗战。“在我们这个没有民主传统国度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伟大的创造。”“全国人民渴望着的民主政治，毕竟在适宜于它生长的土壤上，结出灿烂的果实。”[③]

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模范。边区地处黄土高原，地瘠民穷，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困苦。抗战时期，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休养民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总的方针是：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依靠和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改善人民生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策是：在经济结构方面，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协调发展的政策；在产业结构上，实行农业第一、工业第二、商业第三的方针；在财政方面，实行照顾各方

① 范宝信：《陕西省政述要》，陕西省政府统计室1947年7月印行。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5页。

③《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利益，适当征粮征税，合理负担，开源节流，厉行节约，生产自给的政策；在土地政策上，除已完成土改的地区外，一律实行减租减息。上述方针政策的实行，合理地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在农业、工业、商业、财政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对于战胜困难，巩固根据地，坚持抗战，改变边区经济落后面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模范。边区各项文化事业原本就十分落后，文盲高达90%以上，城乡医疗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疫病流行。边区党组织和政府按照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方向，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拓荒"式的工作。特别是1942年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的边区高干会议决定把生产与教育列为边区两大任务后，边区文化建设事业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一是大办干部学校，提高边区干部文化素养和理论政策水平；二是从扫盲入手，办好识字班、夜校、冬学和小学、中学，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三是逐级建立医药社、卫生社、卫生院和医院等医疗机构，改善医疗条件，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四是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广泛开展群众性的革命文艺活动。各项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使边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是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楷模，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5. 在中共中央倡导培养下，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固有美德，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培育、铸造了闪耀着时代光辉的延安精神。

革命圣地延安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1942年，毛泽东考察延安县的工作，对延安县的干部不怕艰难困苦、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十分赞赏。他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高度评价延安县同志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精神。[①]此后，"延安县同志的精神"在各方面被广泛传播、发扬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民主中国的模型——陕甘宁边区政治文明建设》，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页。

和充实，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它连同“整风精神”、“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等被一起概括、升华为“延安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①]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保留下来的一笔宝贵财富，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精神动力，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

① 胡锦涛2006年1月在延安慰问和考察时的讲话。

甘　肃

一、中共甘肃组织的恢复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的建立

八路军驻国民党统治区办事处的设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为了敦促蒋介石履行事变中承诺的六项条件，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围绕国共合作、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的地位以及停止进攻西路军和南方游击根据地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并于1937年2月10日发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表示了早日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极大诚意。然而，由于蒋介石试图将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以达到用和平的手段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目的，在谈判中设置了很多障碍，致使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在这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于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便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随即，中共中央拟定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草案，7月中旬由周恩来送交蒋介石。《宣言》在“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基础上，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要求，重申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

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愿为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中国共产党这种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正义之举，却因国民党蒋介石此时尚未放弃对日媾和的企图，不情愿承认中国共产党平等地位而被搁置，谈判仍未取得结果。

8月初，日军在不断扩大对华北进攻的同时，大举增兵上海，上海形势日趋紧张，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美、英等国家的在华利益。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努力下，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呼声越来越高的压力下，加上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因此，蒋介石等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在国共谈判中态度有所缓和，放弃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表现出较多合作的愿望。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将陕甘宁地区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3个师之上设立总指挥部，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办事处，出版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下简称八路军）的命令。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编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八路军总指挥部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和第一二九师，全军编制近4.6万人；还将原活动在南方（琼崖地区除外）8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以下简称新四军），全军4个支队，1万余人。并决定在上海、西安、太原、武汉、兰州、南昌、迪化（今乌鲁木齐）、广州、桂林、重庆等城市设立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通讯处。①

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搁置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团结御侮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抗日，首先是实现军事上的合作，是两支军队的合作。将红军

①9月中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将第八路军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同时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但是，人们仍习惯将改编的红军称为八路军，设立在各地的办事处称为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坚决抗日的极大诚意。红军在改编中，坚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保持了红军光荣传统和人民军队的本色。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事处、通讯处，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显著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以八路军的名义在国统区建立的公开、合法的机构，对于贯彻落实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了重大作用。

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正式成立

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以下简称“驻甘办事处”）的前身是兰州红军办事处。西路军在河西地区失败后，为了营救被俘人员，收容失散人员，查找当时下落不明的西路军主要负责人，党中央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千方百计开展营救工作。由于人数多和遇到各种阻挠，致使营救工作难度很大，有必要成立相应组织，进行这项工作。

1937年2月，周恩来在西安会见原中共甘宁青特委负责人之一吴鸿宾时，提出在兰州设立办事处的问题，国民党政府迫于团结抗日的形势，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兰州设立一个半公开的机构，进行对外联络和营救西路军工作。随之，党中央调陕西云阳红军办事处主任彭加伦负责筹备工作。5月27日，张文彬、彭加伦率领朱良才、况步才、黄文彬、生大成、刘富秀等7人从西安出发，29日到达兰州。10天后在南滩街54号（今甘南路700号）建立了红军办事处。由于当时国共合作尚未正式形成，红军办事处的名称还不便公开使用，因彭加伦是办事处的负责人，办事处对外便称作“彭公馆”。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加强党在甘肃的统一战线工作，加强兰州办事处的力量，7月17日，党中央决定派谢觉哉作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代表到兰州工作。29日，谢觉哉到达兰州。8月25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兰州红军办事处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由半公开成为公开的组织。随后，又改为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人们习惯地称它为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或兰办。谢觉哉为中共中央驻甘肃代表，彭加伦任办事处处长。

由于工作的不断进展，加之需要与设在兰州的苏联代表处联系，1938年2月，党中央调派熟悉俄语的伍修权（在办事处工作，化名吴寿泉）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接替彭加伦任处长。并将办事处迁到孝友街32号（今酒泉路314号）。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包括党代表、处长、秘书、副官、译电员、通讯员、医生、警卫员、炊事员等，最多时有十一二人，所担负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他们认真贯彻党的洛川会议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在甘肃很快出现，同时，帮助恢复党的地方组织并协助开展工作，营救和收容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利用国际交通线，接待和保护过境兰州的党的领导人和重要干部，保持与苏联的联系和物资转运等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的任务，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共甘肃工委的建立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建立后，工作迅速开展，与各方面的联系日益增多。办事处深感干部不足，同时，作为八路军办事处，当时首先开展的是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而深入发动群众，开展中下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需要大量干部，花大力气去进行。1937年9月，彭加伦在给党中央关于兰州工作的报告中，总结存在的不足时，第一条就是“下属工作建立不够，干部少，群众工作无人做，影响工作的开展”[①]。同时，办事处作为公开组织，有些工作也不便进行，因而亟须加强党的地方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基层党员的积极作用。

为此，谢觉哉、彭加伦曾多次向党中央报告，建议“能找到甘肃进步分子，望多介绍几个来”，“立即派得力干部去领导党的工作及军队工作，并设法在西安调些学生（党员）去作学生运动（用转学方式），凡有在甘宁青的前进分子多介绍回去工作，”[②]以便尽快恢复和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积极为甘肃选派干部，只是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迅速发展，各地

①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甘肃党史资料》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②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甘肃党史资料》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均需大量干部，暂无适当之人可派。电告谢觉哉：干部需在本地物色。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办事处把“培养进步分子，建立党的组织”，作为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1937年7月底8月初，党中央派孙作宾到达兰州，负责甘肃党组织的筹建工作，并于8月中旬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甘肃工委）。随后，又陆续调派刘杰、刘南生、蔺克义、樊大畏、郑重远、窦志安等一批共产党员到达兰州，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大力帮助下积极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孙作宾首先与在国民党新一军邓宝珊部任副官的地下党员杨子实接上关系，经过考察，恢复了一些失去联系党员的组织关系，如赵子明、陈成义、陆长林等，不久，在兰州和榆中发展了陆云龙、金焯三、陆泰安、牛发荣、汉尚忠、周延龄等一批新党员。到10月中旬，党在兰州和榆中等周边地区已成立了4个党小组，有党员24人，为中共甘肃工委的成立准备了组织条件。

1937年10月25至26日两天，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因设在兰州，曾称为兰州工委），孙作宾任书记，郑重远负责组织工作，吴鸿宾负责宣传兼回民工作，刘日修负责青年工作，刘杰（女）负责妇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中共甘肃工委近期工作和经费预算等问题。谢觉哉自始至终出席会议并予以具体指导。

中共甘肃工委的成立，标志着甘肃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党组织的正式恢复，是甘肃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1938年春，为加强甘肃工委的工作，党中央从延安调罗云鹏（原名张敬载，曾用名张西平）来兰，担任工委副书记，同时因吴鸿宾前往国民党杨德亮部开展工作，改由窦志安负责军事工作，甘肃工委组织更加健全。

此时，虽然国共合作已经形成，国民党蒋介石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是，并不承认两党的平等地位，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中，把这次合作解释为是国民党政府“开诚接纳”共产党，“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他们实际上只承认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地位，而广大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党组织是不允许公开存在的。正如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指出的：“现在国民党对待民众的一套，还

是十年来的一套，从政府机构，军队制度，民众政策，到财政、经济、教育等项政策，大体上都还是十年来的一套，没有起变化。”[①]历史的经验教训使甘肃党组织认识到，对于长期以来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绝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和松懈，在国民党统治区各级党的组织，必须采取秘密的地下状态开展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设立和中共甘肃工委的建立，对甘肃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一方面，八路军办事处以公开、合法的地位，利用各种机会，开展甘肃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政策，努力扩大党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共甘肃工委以隐蔽的方式，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协助下，通过各种渠道，在工人、城市劳动群众、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组织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提高人民抗日救国和争取民主的觉悟，巩固和扩大办事处公开斗争取得的成果。八办和工委有机结合，相互配合，促使甘肃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局面形成，有力地推动了甘肃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

（二）甘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的形成

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前的甘肃国民党政府机构多为封建落后势力所把持，政治腐败，贪污成风，派系斗争，勾心斗角，加之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思想封闭，致使这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很落后，吸毒、赌博、封建迷信成风，人民生活非常贫困，政治思想十分沉闷，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人数很少，全省连同小学生在内，共有学生三四千人，这种现状，就使党在甘肃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非常艰巨。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6页。

1937年5月，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主任委员贺耀祖，接替于学忠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战争时期，贺耀祖曾在谢觉哉的争取下，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和北伐战争。他在政治上较为开明，但是，在抗日和共产党等问题上仍有许多错误和模糊的认识。由于他与谢觉哉是同乡、同学、同事，特别是有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的那段交往，谢觉哉来兰使他非常高兴。当晚，谢觉哉便与贺耀祖会面，商谈国共合作抗日等问题，随后又交谈了几次，8月13日，贺耀祖邀请各界要员，设宴欢迎谢觉哉，出席宴会的有国民党新一军军长邓宝珊、马愚忱、田昆山、戴槐生等。席间，谢觉哉就国共合作抗日发表了具体意见，主要有：民运问题。包括开放民主自由、改造领导机关、训练干部、建立下层组织、改造舆论、改善人民生活等内容。整理军队：包括建立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加紧抗日教育、训练干部、改善士兵生活等内容。甘、宁、青、新团结问题：包括在抗日原则上团结合作、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团结少数民族中优秀分子、打通国际交通线等内容。宴会后进行座谈，与会者都表示同意以上建议。贺耀祖在发言中认为："共产党是民众运动的祖宗，有丰富的经验，国民党因害怕民众，以致民运视为畏途，结果民运就成了共产党的了，现在希望你们多贡献你们的经验。"[①]当时，由于国共合作还未正式形成，贺耀祖对谢觉哉提出的主张和建议只是口头上赞同，却很少行动，推托说许多事情只有等中央政府下达命令方可实行。有段时间贺耀祖还有意回避不见。为此，谢觉哉采用书信的方式继续对贺耀祖进行诚恳的说服工作，在10月1日的信中写道：我以一个中国人和共产党员的资格，向台端提议：（一）立即扶植并保障人民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的完全自由，打击那些反对自由的派别与观点。其办法，可由后援会采取晋绥察总动员纲领。（二）明令减租减息，裁废苛杂，惩治贪污，首先把省府贪污案子公审正法。（三）训练大批做民运与组织游击战的人才。可仿照成仿吾等发起之陕北公学办法。（四）改组《西北日报》。（五）登用曾被裁抑的人员。（六）改革政府工作方式，多做实事，少做些"等因奉此"。……维护甘新公路的大工作，必须派富于爱国的人才去做，才

①《彭加伦关于兰州工作报告》，见《甘肃党史资料》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

可保证不至误事。信的最后指出，今日之患，不在敌强我弱，而在若干亡国观念尚泛滥于统治阶层中。《大公报》社论说，不是下层掀不动，而是上层说不服，伟哉是言。[①]书信中还指出，中国所以弄到这步田地，弄得各条战线暂时失利，怪不得人民不争气，腐败的政府要负第一等的责任。谢觉哉进一步说，甘肃为西北国防中心，当日寇西进时，你身为老成谋国之主席，受中枢之托，系全国之安危，可要全局在胸。

在中国共产党耐心说服教育下，贺耀祖原先的错误认识有了转变，加之此时《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已公开发表，国共合作已经形成，贺耀祖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上迈出实际的步伐。谢觉哉和彭加伦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兰州环境大有转变，贺比前更进步，对我们提出之问题均愿照行，对于民运，贺已无阻挠之意。"[②]

1937年10月3日，贺耀祖将国民党CC派控制的《甘肃民国日报》和国民党蓝衣社控制的《西北日报》合并，任命思想进步的李剑华为总编辑，李剑华出任民政厅主任秘书后，又任命与共产党比较接近的王宗梦为总编辑，以加强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又同意八路军办事处设立电台及方便兰州八办与八路军总部及各方面的联系。贺耀祖分别召开省党部、省政府有关部门会议，从有利于抗战出发，具体讨论修改了一些不适宜的政策，研究制定了一些有利抗战的规定，号召全体政府人员要一致对外，要求一些坚持反对意见的人，顾全大局，不要恶意攻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要求国民党各级人员在抗战中尽职尽责对得起祖宗。11月4日，在一次区长、巡官会上，贺耀祖发表训词，指出："在全国一致抗敌目标之下，共产党放弃其阶级斗争及暴动政策，来诚意合作，参加抗战，这是很好的现象。""共产党员的努力，实在超过本党党员之上，""共产党有很好的办法，我们乐于接受，如对民众的组织与训练，对军队的政治工作与游击战、运动战，毫无疑义的有他的特长，应该虚心考察仿效。"[③]为了学习共产党的特长，贺耀祖还在省政府下办了一个军官教导团，特

① 政协甘肃委员会：《谢老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②《兰州之统战及党的工作报告》，见《甘肃党史资料》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③ 无奇（谢觉哉笔名）：《读贺主席入党训词》，见《西北日报》，1937年11月14日。

别邀请共产党员任政治教官，并批准《甘肃民国日报》、《西北日报》刊登八路军的消息，刊载曾被禁止刊载的彭德怀的《抗日战争的先决问题》一文，同意公开发行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他还亲自出面协助八路军办事处营救西路军人员。为了谢觉哉出入国民党省党部方便，他把一枚国民党省党部的徽章送给谢觉哉，免得门卫盘查。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他往往在深夜到八路军办事处与谢觉哉彻夜长谈。贺耀祖当时是甘肃省国民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他合作共同抗日态度的积极变化，对国民党甘肃上层人士有着相当的影响。

邓宝珊是共产党的老朋友，早年加入同盟会，后参加冯玉祥的国民联军进行北伐，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曾参加邓演达的第三党，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1932年应杨虎城之邀，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兼新编第一军军长，1935年11月，毛泽东亲笔写信给杨虎城、邓宝珊、杜斌丞，希望他们真挚地同共产党合作。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拥护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赞成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谢觉哉到兰州后，多次和邓宝珊交谈共同抗日的问题，对于谢觉哉和八路军办事处提出的要求，邓宝珊积极响应，并在国民党和省政府召集的各种会议上就民主、民运、合作抗战等问题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给予支持。1937年，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邓宝珊将女儿邓友梅送到延安学习，使她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9月23日，彭加伦在给党中央关于兰州工作的报告中说，“邓宝珊政治眼光比较远大些，对我表示最好。关于我们的主张和在甘肃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极表赞成。”[①]作为国民党甘肃军界有名望的实力派人物，邓宝珊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对甘肃国共合作抗战局面的形成，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经过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多方面的工作和努力争取，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和省政府上层人士中，有一些拥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主张，比较进步开明的人士成为共产党的朋友。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比较开明，有

①《彭加伦关于兰州工作报告》，见《甘肃党史资料》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正义感，常与八路军办事处及谢觉哉往来，谢觉哉和八路军办事处对他进行了争取团结工作。他认为共产党的国共合作宣言，不只是抗日协作，而且是将来建国的当然趋势。他支持和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后来和进步青年王德谦结婚，参与营救被扣押的进步作家白危（吴渤），为党和八路军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时任省民政厅厅长的施奎龄，早年在天津南开学校与周恩来同学，对周恩来和共产党比较友好，赞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谢觉哉经常向他介绍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关系融洽。1939年，周恩来去苏联治病，途经兰州时，他还特地去八路军办事处拜会。罗贡华曾任甘肃省民政厅、教育厅厅长，思想比较开明，一实际工作中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抗战主张，谢觉哉多次与他商谈问题，建议省政府举办民运训练班，可以招收中学生参加，使之成为民运骨干，罗贡华同意这些建议，及时向贺耀祖进行汇报，并取得了同意。后来，在他主持举办的民众训练班中，还参照延安的教材教学。建设厅厅长李剑华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与办事处联系密切，通过他为中共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安排了记者的工作，并让工委委员郑重远在建设厅当了录事，以方便他们开展党的工作。省参议杨干丞、国民党八战区参谋长章亮琛、国民党中央政府驻甘肃外交特派员李铁铮、第八战区经济委员张效良等，都和八路军办事处经常往来，关系十分友好。李铁铮有一定的政治见解，对省政府一些官员昏庸无能极为不满。杨干丞比较进步，有抗战决心，积极推荐进步青年去延安抗大学习，自己也在谢觉哉的安排下到延安参观访问，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1937年7月，陇东特委成立后，书记袁国平以陇东办事处主任名义与平凉专署专员胡公冕相见，进行工作。10月下旬，中共陇东特委宣传部长任质斌前往平凉，与平凉专员公署、平凉中学、新陇日报社以及当地驻军第四十七师进行广泛接触，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在国共合作形势影响下，胡公冕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支持进步力量，惩处汉奸，严肃处理土豪劣绅欺压勒索群众财物的事件，打击地痞流氓等封建反动恶势力，禁种、铲除罂粟，禁毒禁赌，开放边界，协助苏联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运往边区的各种物资安全过境，做了许多有利于抗日救国和国共合作的事情。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还与一些地方开明士绅、教育界名流如张维、水梓、慕少堂、乡村师范校长蒲敏政经常接触，向他们阐释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张维不仅赞成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还对国民党虐待壮丁，致使壮丁被冻饿而死，当官的乘机发死人财，冒领粮饷，影响了抗日兵源的问题仗义执言，公开批评。他还提出应平抑物价，解决许多人没饭吃的问题的建议，得到群众的称赞。

当时，甘肃的国民党驻军除邓宝珊的新一军外，还有平凉一带第四师、驻兰州第九十七师、胡宗南之西北补充旅以及鲁大昌一个师和甘肃河西一带马步芳等部。在这些军队中也有一些拥护共产党同仇敌忾，团结抗日主张的爱国将领和官兵。

新一军的主力是杜汉三团，驻防定西。团长杜汉三思想进步参加过黄钺领导的响应辛亥革命的甘肃秦州（天水）起义，后参加冯玉祥的国民军，结识了葛霁云等许多共产党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932年，他随邓宝珊来到兰州，在他的特务营中，安排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1935年邓宝珊新一军成立后，杜汉三任十旅一团团长。西安事变发生后，他积极拥护和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对部队影响很大。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成立后，杜汉三经常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与谢觉哉等交谈。1937年9月，办事处处长彭加伦途经定西时，杜汉三邀请其为部队作了抗日形势报告。随后，他又将两个女儿和儿子送往延安抗大学习。在他的要求下，党和八路军办事处派黄俊耀、雷鸣等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做思想政治工作，后来他的长女杜国英（翟英）回到定西，配合雷鸣等工作。由于缺乏经验，工作过于暴露，引起反动势力的注意，他又设法掩护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安全撤离，继续为党做了许多工作。

鲁大昌师的主力为蒋云台旅。旅长蒋云台，原为西北军许权中部下，参加过1928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辗转来到甘肃，拉起了部队。由于受党的影响，他思想比较进步，经常暗地里阅读革命书籍，红军长征过甘肃时，他对收集到的一些红军文件和材料，都认真阅读和研究。1937年8月2日，蒋云台派部属张斯然、孟国权（均参加过渭华起义）到八路军

驻甘办事处联系，对刚到兰州不久的谢觉哉表示欢迎。彭加伦主动去蒋云台部开展工作，希望蒋云台动员鲁大昌抗日，加强对部队的抗日教育。蒋云台曾要求兰州八办为部队选派政治工作人员，后因蒋部调防未果。

在这期间，对日本特务事件的处理，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随着对华北侵略的不断扩大，1936年，日军又将魔爪伸向西北，日本特务用大量金钱财物，收买当时属于宁夏省的额济纳旗蒙古族头面人物和国民党地方官员，使其在旗政府所在地东庙建立据点，设立特务机关。到1937年年初，日特不仅修建了飞机场，而且还开辟了固定的专用运输线，运送了大量的军用物资。日特机关的规模不断扩大，最多时有日本特务10余人，汉奸50多人。在江崎寿夫机关长的指挥下，他们公然穿起日军军服，挂起军衔，以东庙为基地，深入到宁夏银川、甘肃酒泉、张掖、武威等地，收集情报，查勘地形，绘制地图，活动十分嚣张，影响极坏。为此，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电令宁夏省政府取缔日本特务机关。1937年，宁夏省民政厅厅长李翰园，取道兰州、酒泉前往额济纳旗处理此事。8月，办事处利用共产党员周仁山与额济纳旗保安司令蒙族图王的同学关系，去开展争取图王的工作，并协助李翰园处理取缔日本特务机关。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李翰园等肃清了东庙的日本特务机关，逮捕了以江崎寿夫为首的日本特务13名，汉奸5名，在国民党西北行营宪兵队的押解下，分乘5辆卡车，途经酒泉，于1937年9月2日到达兰州。

随后，李翰园和贺耀祖一起向谢觉哉和八路军办事处通报了情况，征求共产党对日本特务、汉奸的处理办法。根据协商的共识，在贺耀祖的主持下，在兰州对这批日特和汉奸进行了审判，军办事处派地下党员、留日学生刘国夫参加了审判。经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9月14日，在兰州安定门外刑场，将13名日本特务和5名汉奸全部处决。正当日军大举进犯我国，抗日救亡斗争日益高涨之际，国共两党协作惩处日本特务事件，壮国威，快人心，激励了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在兰州、西北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日本特务事件的处理，正是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之际，是抗日战争以来甘肃省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日，成功办理的第一件大事，推

动了甘肃省国共合作局面的发展。

团结少数民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阻止日军进入西北，并在西北建立革命的大本营，考虑到西北（包括内蒙古）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蒙、回、藏、维吾尔等民族人数很多，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强调在西北必须特别注意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的工作。1937年7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书记。8月，党的洛川会议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动员蒙、回及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治原则下共同抗日的主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工委）成立，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开展西北陕、甘、宁、青、新、蒙各省党的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

甘肃是多民族地区，其中回族、蒙族、藏族人数较多，据彭加伦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抗战前夕甘肃约有600万人口，回民约占三分之一，省会兰州人口约11万，回民2万多人。因此，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方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精神，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努力开展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委托回族共产党员吴鸿宾拟定回族问题和回族运动纲领，制定了工作方案。根据计划，工委在回民群众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了中共兰州回民特别支部等党的基层组织；把原来的学术团体伊斯兰学会改造成回民青年抗日救亡的进步组织，把原来由少数上层分子操纵的甘肃回教教育促进会改组成为统一战线性质的甘肃回民教育促进会，并在全省20多个县成立了分会。以这些组织为依托，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回汉团结，联合抗日救国的道理，使回民群众懂得没有各民族的团结，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回民的解放也是不可能的道理；在各地设立回民小学，培养回民军政人才，选用回民优秀分子参加工作，发动回民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募捐活动。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对回族上层人士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省政府参议马凤图、马公章比较开明，谢觉哉与他们交往频繁，在一起讨

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国共合作抗日等问题，使他们对问题有新的认识。马凤图非常赞成《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的基本政治纲领，还带领伊斯兰教徒前往延安参观，在回族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得到回族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马公章表示愿意组织军队，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参加抗战。国民党省党部委员、甘肃民国日报社负责人马焕文（马述尧），是河北回民，为了能在甘肃站住脚，主动靠近兰州的回民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党组织对他也进行团结教育工作。马焕文同意在《甘肃民国日报》给伊斯兰学会开辟一个专栏，专门刊登伊斯兰学会的有关文章；在伊斯兰学会重建时，他在催促省党部早日批准一事上，起了一定的作用。驻扎在兰州的国民党胡宗南部补充旅旅长兼兰州军警督察处处长杨德亮，是云南回族，党组织对他进行团结工作。为表示对伊斯兰学会的支持，他每月拨给银元20元作为学会经费。对于前往办事处求教的爱国阿訇，谢觉哉、彭加伦对他们的爱国热情都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青海民和县县长马腾云和大通县县长刘希古等人，在谢觉哉等的帮助下，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表示赞成团结抗日的主张。中共回民特别支部还与地方实力派马锡五、宁夏驻兰办事处主任马锐、商人包子明、光明火柴厂经理张善卿等建立经常的联系，争取他们对伊斯兰学会的支持。

对于在甘宁青很有实力的回族封建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等，办事处和工委通过多种关系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谢觉哉等会见了马步青和马步芳在兰州的代表马少武等，阐述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了在甘、青收容西路军人员等问题，收到了一定效果。1937年底，青海马步芳将被俘的西路军1500多人编为新兵团，准备移交给国民党当局。新兵团途经兰州时，谢觉哉找到该团团长杨明亭，向他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抗日主张，希望将新兵团交给八路军，杨团长表示同意。后来，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努力下，新兵团在陕西三原县安吴堡被八路军接收，回到党的怀抱。在八路军安排下，杨团长参观了延安。他在回青海时，在兰州专程看望谢觉哉，叙说他在延安受到的礼遇和深切感受。

在回民比较集中的平凉和西（吉）、海（原）、固（原）地区，党组织多次派人

前往那里开展工作。1937年8月，中共陇东特委成立后，立即对平凉回族情况进行调查。1939年，海固地区回民第一次起义失败后，为了了解回民起义后的情况，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派马寅、徐强夫妇，以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教师的身份，到平凉进行调查。他俩通过教务主任马汝邻（失去关系的共产党员）、进步学生沙里士和校长达浦生（上述人员均为回族）等进行工作，组织师生阅读进步书籍，培养和发展共产党员。7月，借国民党“安抚”起义回民之机，以马汝邻为首的30多名师生，参加了暑期宣传大队，分为3个分队，到海原、固原、化平、隆德、华亭、清水等地，深入回族群众，了解情况，掌握群众动向。根据了解到的情况，马寅给中央青委写了调查告。原中共甘肃工委委员吴鸿宾被派到平凉国民党杨德亮部开展工作，担任杨部秘书。这期间，吴鸿宾协助创办了力行中学并兼任校长，后来又在平凉中学任训育主任，并支持平凉回族上层人士建起一所回民小学（新民小学），受到当地回族群众的支持和欢迎。

甘南藏族地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经济也较为落后，然而，早在国民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开展了工作。红军长征过甘时，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种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1937年冬，正在西藏朝谒的夏河拉卜楞寺第五世嘉木样活佛，指示其兄弟黄正清、黄正基，尽快组织慰问团，前往各战区慰劳抗日将士。拉卜楞寺教区很快组建了代表所辖108所寺庙的共20人的抗日前方将士慰劳团。慰劳团制作8面锦旗，携带大量慰问品，在团长黄正基的带领下，在近一年时间里，不辞劳苦，辗转于山西、河北、河南各战区，表达甘南藏族同胞齐心协力，同仇敌忾，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对抗战将士的敬意。由于长途劳顿，28岁的黄正基不幸身染重病，医治无效去世。1941年春，临潭县西道堂教长马明仁，为表达甘南人民抗战到底的愿望和决心，以坚强的毅力，徒步126天到达重庆，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西北回民规劝蒋介石抗日》的请愿书。

抗日战争期间，甘南人民积极参军参战，仅临潭县先后就有570多名青年应征入伍，奔赴抗日前线，不少人为国捐躯。1938年在纪念七七事变一周

年时，临潭县政府在新城修建了一座抗日将士纪念碑。临潭县民众纷纷集资，在新城城隍庙修建了抗日阵亡将士忠烈祠，昭彰英烈们的历史功绩。

甘南人民积极捐款捐物，支援抗日战争。八年中临潭县藏汉回人民捐献银元3万枚、战马300匹。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带领拉卜楞地区的50名中上层人士，千里迢迢前往重庆，向国民党政府捐献价值30架飞机的金银珠宝（折合450万元），表达了甘南藏区各族民众众志成城，共赴国难，保卫中华民族的爱国心。此举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国民政府为此特赠送“输财卫国”匾额一幅，以示表彰。

中国共产党在甘肃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扩大了党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的影响，传播了党的民族政策，团结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甘肃的发展。

推动甘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不仅开展上层人士的工作，对于中层人士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进步青年和学生的工作也特别重视，利用重大节日和纪念日，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九一八事变纪念日等机会，通过读书会、研讨会、座谈会、识字班等渠道和报纸刊物发表文章，广泛宣传、阐释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团结抗日的主张等，提高他们对抗日战争的认识，激发他们的抗日热情，收到很好的效果。

有一时期，由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孙静工等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组织发起，在农民银行举办时事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国民党省党部委员，省政府的厅、处长，国民党在兰州的各部队政治处长，报社负责人，大、中学校校长，社会团体和学术团体的有关人员，以及关心时局，思想进步的青年，经常有100多人到会，谢觉哉和伍修权等也应邀参加。座谈会一至二周举行一次，涉及的内容很广泛，诸如，三民主义与抗日救国、怎样保卫西北、和平阵线和侵略阵线、战时财政和经济、战时政治与行政、目前军事问题等。甘肃工委和八办十分重视这项活动，谢觉哉和伍修权每次参加会议前，内容重要的发言都认真准备。他们在会上的精彩发言，澄清了人们认识模糊的问

题，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受到会的进步分子、革命青年和上层爱国人士的欢迎和赞赏。而一些反动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则极为恐惧，故意在会提出一些挑衅性问题进行捣乱，谢觉哉、伍修权则据理驳斥，巧妙回答，使这些人无言以对，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在开展争取贺耀祖工作的同时，办事处和工委还对其夫人倪斐君开展工作。倪斐君为人正直，是一个进步女性，办事处派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经常与她接触，进行教育和帮助，请她帮助贺耀祖在开放民运、改造舆论、团结抗日等方面尽量多做些实际工作。倪斐君也主动与办事处、王定国联系，争取得到支持和帮助。在办事处支持下，由她出面组织了甘肃妇女慰劳会，创办了《妇女旬刊》，为抗日救亡做出贡献。她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37年8月开始，许多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和进步组织，如妇女慰劳会、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甘肃青年抗战团、省外留学生抗战团、伊斯兰学会、回民教育促进会等，相继成立并积极开展活动，甘肃省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高潮。

二、甘肃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一）抗日救亡群众团体的建立

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甘肃分会的成立及活动

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一二·九运动前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出现高潮，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下，全国各阶级、阶层，工、农、商、学、妇女、青年各界群众纷纷成立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在此基础上，1936年3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高涨的抗日救亡浪潮，对于一向比较闭塞的甘肃产生了影响。一些学生仿效平津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到驻兰东北军、兰州的水夫、车夫等工人群众、农民群众中宣传抗日救亡，教唱抗日救亡歌曲，1937年上半年，青年学生还发动了一次抵制日货活动，宣传抵制日货、拒绝购买日货、带头使用国货，在兰州群众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是，由于缺乏统一、坚强的组织领导，许多活动未能继续坚持下去。甘肃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是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

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甘肃分会（简称甘肃妇女慰劳会），起初是甘肃妇女抗日后援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甘肃最早成立的抗日救亡组织。抗战爆发后，国民党革命派的杰出代表、著名妇女运动领袖何香凝发起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动员全国妇女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号召国民政府各省政府主席及党政高级官员的夫人带头行动，组织各省分会。谢觉哉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在开展贺耀祖工作的基础上，建议和帮助贺耀祖夫人倪斐君，响应何香凝的号召，1937年八、九月间发起成立了甘肃妇女慰劳

会，倪斐君任会长，邓宝珊夫人崔锦琴任副会长，参加人员还有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书记赵清正夫人陆志微、电信局局长夫人等甘肃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夫人及兰州中、小学校女教师、中等以上学校的女学生等100多人。甘肃妇女慰劳会的宣言指出："……日人的行动是有计划有步骤地，他不仅要奴役我们的一男一女，而且要整个灭亡我们的国家，消灭我们的民族。现在和平已经绝望了，已经到我们国家民族绝续的关头。我们心还跳，血还在流，我们一息尚存，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要起来抗战，要起来为民族和国家的生存而抗战。"①

为加强领导，有效开展活动，充分发挥妇女的作用，党组织派共产党员，青年学生邢华（邢芝芳）、陈睿、彭微之、原振华等参加慰劳会，邢华担任秘书长（总干事长）兼宣传股股长，进步青年王九菊、杭淑娟、石庆、沈滋兰、原煌、原圻、马竹轩等十多名女子师范学校成为该会的骨干力量。由于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积极努力工作，加上倪斐君、崔锦琴等有一定名望的女士的影响，妇女慰劳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她们组织歌咏队和演出队，学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街头剧，用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救亡；组织时事座谈会、出墙报、召开演讲会、举办漫画展览，利用纪念五四、一二·九运动、妇女节、儿童节的机会，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组织妇女参加识字班、救护训练班学习，开办托儿所，创办抗属工厂，提高妇女素质，积极帮助妇女从家庭琐事中解放出来，参加社会活动；组织义卖、募捐活动，召开大规模劝募会，并深入街道家庭开展募集工作，慰劳前方抗战将士。1937年11月中旬，妇女慰劳会创办《妇女旬刊》杂志。这个刊物内容广泛，形式活泼，宣传抗日救亡，抨击时弊，登载抗战前线最新消息，呼吁妇女解放，提倡放足，反对束胸，主张婚姻自由和实行对儿童进行正确的家庭教育等，深受爱国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好评，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甘肃青年抗战团的成立及活动

八路青年抗战团（简称青抗团）的成立虽然比较晚一些，但就其规模和影

① 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甘肃统战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

响来看，在甘肃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中是最大的一个。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成立后，许多进步青年和学生积极主动与办事处联系，经常听取谢觉哉的教诲，思想觉悟得到提高，抗日救亡积极性十分高涨。1937年11月，由甘肃学院附中学生罗伟，清华学生谷苞，京陵农大学生郭普、万良才等人发起，成立了甘肃青年抗战团。青抗团的时间虽然比较晚，但是，它是全省青年的组织，包括各行各界青年，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其影响范围较之其他组织要广泛得多。因此，国民党当局极力想将其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主动提出同意将青抗团总部设在国民党省党部机关，提供办公设备和条件，使其带有官办色彩。加之该组织的领导人缺乏经验，因而，青抗团成立初期的一段时间内，没有明确的方向，在组织发展方面也很保守，相当长时间内团员不足百人，工作开展得也不多。

为了使青抗团摆脱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影响，充分发挥青抗团在团结青年抗日救亡中的作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青抗团，以改变青抗团的组织领导。青抗团改组后，罗伟任团长，万良才任秘书长，工委青年委员刘日修和学委书记商克义先后任组织部长，学委委员樊大畏、罗扬实任宣传部长和总务部长，共产党员姚国价、贺进民、安鼎铭、原振华和大批进步青年 成为骨干力量。在此期间，谢觉哉先后与青抗团领导人多次谈话，进行指导，并写了书面指示，对青抗团的性质、宗旨、组织发展、训练工作以及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谢觉哉指出，青抗团是团结广大青年，担负抗战工作的，因此，“抗战第一”、“抗战高于一切”、“要处处不离抗战。”在组织发展方面，要放开手脚，尽量吸收青年参加。对于要求参加青抗团的青年，“只要他赞成抗战就够”，不要求每个团员都是积极分子。“青抗团员有更高信仰当然很好，但不必拿到青抗中来，因青抗目的只在抗战、在救亡，世界大同不是这个团体的目的。”不要犯关门主义的错误，尽量扩大，青年学生、青年农民、青年工人、青年士兵及其他青年等，只要愿意加入就行，要敞开门，任一切青年进来。“应建立下层基础，渐次成立县的、区的、乡村的、街道的青抗团，以及学

校的、工厂的、店员的、妇女的……(以职业分)青抗团",[①]并建立正确的上下级关系。谢觉哉还指出,要处理好与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的关系,不拒绝省党部派人,只要抗战就好,对于有碍青抗工作的,应进行说理,不必搞对立。这些指示为青抗团的发展和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使青抗团的工作得以迅速地发展。

在党组织指导下,在兰州的甘肃学院、兰州中学、兰州师范、兰州农校、兰州工校、乡村师范、护士学校等学校的学生踊跃报名参加青抗团,并分别建立了分团。青抗团还派专人到各县进行联络,利用寒假学生返乡探亲的机会,广泛宣传,发展组织,很快就在武威、榆中、靖远、临洮等县建立分团。经过3个月的努力,青抗团组织已分布于25个县市,建立分团72个,团员达3000余人,成为甘肃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中规模最大,分布最广,人数最多的组织。青抗团组织团员开展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举办读书会、演讲会,出墙报;组织歌咏队、演出队、募捐队、防空救护队等,用音乐、美术、文字等多种形式,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募集了大量捐款、衣物、各种慰劳品,支援慰劳前方的抗日将士。他们还定期出版《抗战通讯》,及时介绍前方战况,散发油印的《西北青年》旬刊、《甘院学生》等刊物,十分活跃,影响广泛。可以说,甘肃青年抗战团在甘肃抗日救亡运动中起了主力军的作用。它的成立、发展及活动,推动着甘肃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

其他抗日救亡团体的建立

抗日战争时期,甘肃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除了甘肃妇女慰劳会、甘肃青年抗战团外,影响比较大的还有甘肃省外留学生抗战团、伊斯兰学会和回民教育促进会、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以及抗日民族先锋队、学生抗战队等。

甘肃省外留学生抗战团。甘肃省外留学生抗战团于1937年9月上旬成立。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战祸造成华北等地许多学校无法正常上课,滞留兰州的100余名在省外读书的青年学生,在聂青田、邢华、原烨等人发起组织

①政协甘肃委员会:《谢老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下，在兰州成立了甘肃省外留学生抗战团（简称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聂青田、邢华、原烨、马兆男、谷苞、秦崇模、李瑞徵等被推举为常委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宋尔恭、宋雅、宋之瑜、徐苇苏、张令琦、肖祖华、郭普、王永炎等七八十人参加。省外留学生抗战团成立后，一面积极发展团员，扩大组织规模，一面努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成立了几个力量较强的宣传队，深入市内各公共场所，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抗日救亡的重大意义，同时办快报，出墙报，在此基础上，创办《热血》周刊。他们还组织街头剧团、歌咏队，上街演出抗日救亡节目。国民党当局力图控制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先是拉拢他们，要团员全体参加国民党，由于团内大多数人不同意，未能得逞，后又故意制造矛盾，挑起团内分裂，企图破坏、搞垮这个组织。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及时引导和鼓励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坚持正确方向，加强内部团结，巧妙应对国民党当局破坏该团的企图，使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在抗日救亡中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

伊斯兰学会和回民教育促进会。抗日救亡运动在甘肃蓬勃兴起后，许多进步的回族青年积极要求建立自己的抗日救亡组织，由杨静仁（杨希珍）、鲜维峻等发起筹备成立回民青年的抗日救亡组织，但是，国民党省党部却不予批准。1935年，当时还在兰州中学读书的马明德、杨静仁、鲜维峻等，联络一批回族同学，组织了一个叫做“伊斯兰学会”的学术团体，在青年学生中产生相当影响。后来，组织者陆续毕业离校，学会便有名无实了。成立回民青年抗日组织遭到国民党阻挠后，杨静仁、鲜维峻等人决定恢复伊斯兰学会，并改造成为回族青年抗日救亡的进步组织。此事得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的支持和帮助，在重建学会的过程中，经过考察，中共甘肃工委发展杨静仁、鲜维峻、马明德3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兰州回民特别支部（简称回民特支），后来又发展了一些党员。在回民特支的领导下，1937年底，经过努力，他们在兰州大、中学校的回族学生和知识青年中发展会员70多人，恢复了伊斯兰学会，改选了领导机构，产生了新的理事会，由马明德、杨静仁、鲜维峻、安文蔚、马玉田、马秉义等7人组成理事会，马明德任理事长（后由鲜维峻负责）。学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作，兴办夜校、建立图书馆、举

办座谈会、出壁报、散发传单等。当时兰州回民有十四坊，学会多次到回民集聚的各坊宣传演讲，还编辑出版刊物《回声》（只出了一期就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广泛联系回族青年和回族各阶层群众，受到广大回民群众的欢迎。

在改造回教教育促进会的斗争中，伊斯兰学会在回民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回教教育促进会全称是甘肃全省回教教育促进会，是1913年5月，由回族知识分子、四川人蔡大愚和湖南人马邻翼发起成立的，也称兰州回教教育劝学会，意在发展甘肃回民教育。后来，这个组织被一些与反动势力相勾结的封建顽固势力所把持。1937年年末，兰州警察局不顾回民群众的强烈反对，要强行在清真寺附近的城墙上开门，引起回族群众和警察局的冲突。伊斯兰学会强烈指责警察局的错误行为，批评警察局妨碍民族团结，不利于共同抗日，支持回民群众的合理要求；而原甘肃回教教育促进会的领导人却支持警察局，并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群众和伊斯兰学会的关系，引起大家不满。彻底改造回教教育促进会的意见，得到十四坊回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这次事件在群众参与下，终于取得斗争的胜利，为改造回教教育促进会创造了条件。

改造回教教育促进会的工作得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的支持和指导。1938年春，经过两次斗争，重新组建了促进会的领导机构，杨静仁、鲜维峻、马明德、吴鸿业等当选为委员，杨德亮任主任，杨静仁被选为委员会书记（相当秘书长），组织名称改为甘肃省回民教育促进会。由于杨德亮忙于军务，只挂虚职，实际领导权掌握在进步力量手中。改组后的伊斯兰学会和回民教育促进会十分活跃，在整顿原有回族各坊学校的同时，还在兰州、榆中等地恢复和新建了14所回民小学，在兰州白塔山办了一个中学补习班，后来发展为知行中学，有初中两个班、高中一个班，100多名学生。回民教育促进会的领导和成员杨静仁、吴鸿宾、吴鸿业、鲜维峻等都在学校担任义务教员。在榆中县还成立了回民教育促进会榆中分会，张杰、金少伯为分会负责人。教育促进会还邀请著名学者和进步人士讲学、作报告，曾请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作《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的报告，张仲实讲民族问题，作家茅盾到兰州时，也被促进会邀请做了《抗战与文艺》的报告。这些活动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38年，中共甘肃工委派鲜维峻去延安向党中央汇

报工作，后又和杨静仁一同前往武汉向周恩来、董必武请示如何开展民族工作，学习其他抗日团体的经验。此次武汉之行，他们受益匪浅，回兰后，立即成立了中国回民抗日救国会甘肃分会，国民党当局强行取消了伊斯兰学会后，由回民抗日救国会带领甘肃回民群众继续坚持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9月，杨静仁以甘肃回民教育促进会的名义前往平凉，调查日本飞机轰炸平凉时回民群众的损失情况，呼吁拨款、筹款予以赈济。他还被邀请在伊斯兰师范学校给师生作报告，宣讲民族团结、共同抗日、民主生活等问题，受到师生们的欢迎。在甘肃省回民教育促进会的影响下，平凉、静宁、固原、海原、泾川等20余县也相继成立了回民教育促进会分会。每个分会办了一所独立于国民党教育部门的回民小学，这对发展回族文化教育事业起了一定作用。

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成立于1937年10月，由共产党员蔺克义、樊大畏发起组织，兰州各学校师生都有人参加，会员绝大多数是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李尚忠（郭生）、贺思忠（贺进民）、薛迪畅、张恕、薛志超等都是读书会会员。到1937年底，已有70余人。谢觉哉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他们工作很好，经常讨论政治问题，看社会科学书，讨论抗日问题。已讨论了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情绪极高。”[①]读书会会员自己出钱出版了刊物《西北青年》。刘日修任主编，樊大畏、罗扬实、刘南生为编委，谢觉哉经常为《西北青年》写稿。后来，这个刊物成为中共甘肃工委的刊物，公开向社会发行。读书会的多数会员，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兰州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学生抗战队。兰州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由外地来兰的民先队员组成的，队员40多人。由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全国影响很大，他们的成立和活动，使国民党当局十分不安，千方百计地破坏这个组织。1938年秋，为了保护革命力量，党中央决定解散民先队，民先队队员分散参加到其他群众组织中去，继续发挥先锋作用。

学生抗战队。学生抗战队是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的影

①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甘肃党史资料》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响下，由兰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组成的组织。学生抗战队成立后，组织了巡回演出队，到兰州周边的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该组织成立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止，组织成立后，又遭到监视。学生们与国民党顽固派巧妙周旋，索性搬到国民党省党部去办公，在省党部大礼堂公开组织抗日救亡活动。这样一来，反而得到省党部的认可，不但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进而争取到在《甘肃民国日报》上出了副刊——抗战生活。

除了省会兰州，在甘肃其他地方抗日救亡组织和活动也得到发展。在平凉，各种抗日救亡群众团体纷纷成立。当时，除了国民党成立的陇东和各县的抗敌后援会外，青年学生和进步青年还成立了青年救国会、学生联合会、青年民族先锋队等组织。这些团体组织平凉各学校教师走上街头，进行宣传演出和募捐活动，还组织了17个宣传大队，分赴陇东各县，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宣传活动，所到之处，呈现出热烈的抗日救亡景象。1938年春，党员赵守一在平凉西关开办战时读物推销社，发行各种抗日救亡及进步书刊、报纸，深受青年学生和读者欢迎。4月，平凉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和泾川、庆阳、合水等县的抗日救亡组织，在西峰镇举行了陇东各界青年救国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决定在陇东各县和各阶层组织建立青年救国会分会和会员小组，出版青年刊物，实施战时教育，开办青年救亡训练班等。另外还建立了抗日救亡组织“反帝大同盟”。1938年下半年，这些组织和活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禁止和限制。

（二）抗日宣传及爱国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

抗日文艺团体的活动

王氏兄妹剧团。王氏兄妹剧团1937年8月成立于榆中县，是在时任榆中县县长、进步人士王云海先生的鼓励支持下，以其子女王德彰、王德谦、王德

芬、王德乾、王德威为主组成的，在榆中、兰州演出著名抗日救亡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1938年初，进步作家吴渤（白危）从上海来到兰州后加入这个剧团。《放下你的鞭子》这个剧是反映东北被日军侵占后，不愿做亡国奴的劳苦群众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到处逃难，一家父女2人，饥寒交迫，只得靠卖唱度日的悲惨遭遇。演出后在榆中和兰州产生很大反响。演出高潮时，经常是台上台下、演员和观众融为一体，共同高喊口号，产生很大共鸣，“大大刺动了观众的情绪。”①

王氏兄妹剧团的演出得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的高度赞扬和积极支持，并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谢觉哉、彭加伦、伍修权等成为王家的尊长和挚友。但王氏兄妹剧团的活动却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安，他们极力抵制和控制王氏剧团，教育厅要求王氏兄妹剧团与官办的西北抗战剧团合并。王氏兄妹犹豫不定，便去寻求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帮助。谢觉哉认为可以同意合并，一方面，通过合并可以将这个原来的官办剧团，改变为真正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国民党出钱，进步分子演戏，演什么戏，主动权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发展壮大进步力量。随后，在王氏兄妹邀请下，进步作家、文艺工作者塞克、萧军、王洛宾、朱星南、罗珊等从西安等地来到兰州加入西北抗战剧团，加强了进步力量，提高了演出水平。合并后的西北抗战剧团，先后演出了《打回老家去》、《保卫卢沟桥》、《葡萄美酒夜光杯》、《突击》等剧目。剧团团员不辞劳苦，克服生活习惯、气候条件等带来的困难，长途奔波，深入到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民乐、通渭、甘谷、天水、秦安、临洮、陇西和青海的大通、西宁等地巡回演出，产生了很大影响。

联合剧团。联合剧团是1937年11月，由成立不久的甘肃青年抗战团和妇女慰劳会、省外留学生抗战团联合组建而成。共产党员聂青田、邢华任正、副团长，团员有原烨、谷苞、徐弗苏、马兆南、秦崇模、樊大畏、尚德延、朱芳兰、瞿静芳、尚德芳、原煌、原炘、宋雅、宋之瑜、宋尔恭、杨亚林、李承荫、郝俊杰、岳维竣、王锡明、李祁元等50多人。剧团自编自演了话剧《不要放走了汉奸》，抨击殷汝耕的冀东汉奸政府，以后还演出了《到前线去》、《松花江上》、

①政协甘肃委员会：《谢老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页。

《南洋之春》、《古城怒吼》、《抢米》、《六年后的"九一八"》、《卢沟桥血花》等宣传抗日的剧目。1938年3月，在国民党当局干预下，强行将联合剧团并入甘肃省抗敌后援会，并改名为"血花剧团"。[①]血花剧团仍然是以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为骨干，坚持演出进步剧目。联合（血花）剧团还成立了有40多人参加的歌咏队，由王洛宾担任教练，在兰州等地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全民抗战》、《壮丁上前线》、《太行山上》、《洪波曲》、《到敌人后方去》、《干一场》等著名歌曲，这些歌曲很快就流行起来。后来，一些骨干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排斥打击，离开了剧团，年底，剧团被改名为青年剧团，沦为国民党的宣传工具。

在此期间，还有一些演出团体，如第八战区抗宣八队、天山剧团、甘肃省民众教育馆抗日宣传演剧队等也开展了宣传活动，但大都时间较短，影响不大。

抗日报刊的创办及作用

在甘肃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一批进步刊物，如《妇女旬刊》、《热血》、《西北青年》、《回声》、《抗敌》、《号角》、《苦干》、《现代评论》、《甘院学生》、《民众通讯》、《战号》、《老百姓》等。这些刊物促进了甘肃先进文化的发展，启发了群众的思想觉悟。

《民众通讯》是在众多的刊物中，存在时间比较长，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民众通讯》是进步人士丛德滋（1938年秋参加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民众通讯社刊物。1938年元月，丛德滋提出创办通讯社，得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支持，但国民党省党部却对通讯社的立案迟迟不予批复，在谢觉哉帮助下，通过进步人士的斡旋，才得以批准。《民众通讯》由王洽民任社长，丛德滋、苏子长为编辑，于千（谦）为记者。1938年3月1日，《民众通讯》开始发稿。刊物是油印版，除向外发送外，还四处张贴。《民众通讯》内容丰富，稿件质量高，据不完全统计，仅1938年3月7日至4月7日的一个月中，《甘肃民国日报》就采用该

① 有材料认为，1938年8月，平津学生演剧队来兰演出，被国民党强行解散，他们遂与联合剧团合并成立了血花剧团。

社稿件和消息达98件。[①]同时，丛德滋、吴皋元（吴渤）、王德谦、袁弱水、王洽民、汪祖继、大江等人又在民众通讯社内创办《战号》旬刊，创刊号于1938年3月1日出版。[②]

《民众通讯》和《战号》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报道八路军的战绩，特别是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国民党顽固派推行的反动政策，及压迫剥削下的甘肃工农群众的痛苦处境给予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刊物发表的《兰州市的担贩》、《兰州的屠宰业》、《兰州市的轿车夫》、《兰州市的皮业》、《一叶筏夫血泪史话》、《皋兰东乡马滩村农民的负担》等调查报告，反映了兰州市工农商各界劳动群众的痛苦生活。特写《国难不在中山林》一文，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和鞭笞那些官僚政客、太太小姐、老爷公子们，在国难当头之时，仍然吸吮人民膏血，吃喝嫖赌，无所事事，毫不知耻的行径。对于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民众通讯》给予积极热情的报道，短短时间里，发表新安旅行团的特写和通讯就达24篇。由于《民众通讯》和《战号》的内容贴切现实，反映群众心声，受到广大劳苦群众的喜爱。

民众通讯社不仅为党提供了良好的宣传舆论阵地，而且还成为掩护党的干部和进步人士的处所，也为营救红西路军失散人员做了不少工作。《民众通讯》发行不久，当时的第八战区长官、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便扬言刊物是"不良分子"所为，应查封。1939年夏，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民众通讯社被"注销登记"，被迫停止发稿。

《西北青年》旬刊是西北青年救国读书会于1937年12月创办的，由共产党员刘日修任主编，后来成为中共甘肃工委向社会发行的刊物，该刊物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讨论抗日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压制民主的法西斯主义的行径予以揭露和批驳。针对当时的专制主义和复古思潮，《西北青年》等刊物奋起反击，指出，"救国之道德，近来倡之最盛者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八德之中，最根本者，为忠

① 范圣予：《以笔作刀枪的优秀共产党员丛德滋》，见《甘肃现代革命人物传》，甘肃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131页。

② 因经济条件限制，该刊仅出两期即停刊。

孝。于国家尽其忠,于民族行其大孝,本国民之最高义务,无可厚非。但绝对不容……东方式的君主专制幽灵不散”,“……泱泱大国,何以半壁河山沦丧。李鸿章之流尚亦可记取败训,大兴洋务科学,如今当该省悟些什么?”指出,提倡科学民主对于甘肃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深受封建顽固势力影响的社会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①]该刊物共出版了7期,1938年6月19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

《妇女旬刊》,是由甘肃妇女慰劳会于1938年12月创办的,由倪斐君任社长,邢华任主编。这个刊物内容比较广泛,形式比较活跃,宣传抗日救亡,抨击时弊,登载抗战前线最新消息,呼吁妇女解放,提倡放足,反对束胸,主张婚姻自由和实行对儿童进行正确的家庭教育等。刊物创刊时,谢觉哉应邀写了《祝贺〈妇女旬刊〉的诞生》一文。随后,还为该刊物写了《战争是随便可以过去的吗?》、《抗战到底与妇女解放》等重要文章。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樊大畏(朝风)、王德谦等也为刊物写了不少好文章,深受爱国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好评,产生很好的影响。该刊物仅出版7期,1938年4月,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

《热血》周刊(后因印刷困难改为月刊),1938年1月由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创办。该刊的发刊词中写道:“我们是热血的青年,我们将用手中的笔和这铅印的文章,磨砺民众之抗战意志,造成青年之抗战情绪,来捍卫疆土,讨伐敌寇。”该刊物以宣传抗战救亡,报道前线战绩,对甘肃的抗战动员工作进行评论为主要内容,登载了如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平型关大捷、第一二〇师雁门关大捷、第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的胜利消息和国民党爱国将士在山西忻口战役中的英勇壮举等。谢觉哉为该刊撰写了《西北并不是安乐的天地》等文章。1938年6月,因其揭露国民党征兵中的黑幕,而被朱绍良强令停刊。

《抗敌》是甘肃省抗敌后援会的刊物。1938年4月,各抗战群众团体被合并到抗敌后援会后,丛德滋任宣传组组长,在他的组织下,创办了这个刊物,由万良才任主编。该刊物刊登的文章,有的从分析国内外形势入手,阐明只

① 中共兰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兰州青年革命运动史》,1990年内部版,第113页。

要坚持抗战就会胜利的道理;有的论述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说明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重要意义;有的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1938年8月,该刊因刊登了甘肃青年要求成立"参政会"和《献给全省党务会议》两次签名运动的文章,触怒了甘肃国民党当局而被强行停刊。

《苦干》原是一份外省的刊物,1938年4月从南京迁到兰州复刊,负责人是王季良。8月,经中共甘肃工委同意,由共产党员樊大畏担任该刊物的主编,成为抗日救亡的宣传阵地。

《现代论坛》是1938年8月从西安迁来兰州的,主编是思想进步的国民党员赵纯碖。这个刊物迁到兰州后,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刊登了许多知名人士、进步文化人士如茅盾、赵丹、史枚、老舍等在兰州的演讲稿,如《论文章下乡》、《关于西北文化运动诸问》等。当时,甘肃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下已渐入低潮,不少刊物已被迫停刊,而《现代论坛》在这种形势下得以坚持,无疑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老百姓》是由北平燕京大学著名教授顾颉刚,联合兰州进步青年,于1938年12月创办的通俗读物,4开油印3日刊。它大力宣唱抗战歌曲,如脍炙人口的歌曲《劝老百姓快当兵》,和顾颉刚自编的《拉布娃》等,就刊登在这个刊物上,许多歌曲都借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小调填词,广为流传,很受群众欢迎。

《甘院学生》,是甘肃青年抗战团成立后在甘肃学院创办的刊物,刘日修任主编。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的负责人谢觉哉、罗云鹏等都为《甘院学生》撰写过文章。1938年8月停刊。

除此之外,当时兰州还有杨静仁、鲜维峻等创办的《回声》,萧军、王德谦等创办的《号角》,第八战区办的《政论》,以及《伊风》、《回教青年》等刊物,虽然出的期数较少,存在的时间较短,但都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活跃了甘肃的思想文化气氛。

除了创办的刊物,这期间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报纸《甘肃民国日报》、甘肃省政府的《西北日报》也有不少抗日救亡的宣传,一些抗日群众团体和进步人士还在这两份报纸上开辟了各种专栏和副刊。在《甘肃民国日报》,塞克主

编的副刊《剧运》，萧克主编的副刊《西北文艺》，学生抗战队开辟的《抗战生活》，还有《政治与社会》等。《西北日报》开辟的副刊有《大众论坛》、《战斗者》、《西北公园》等。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负责人借用这些刊物和《西北日报》、《甘肃民国日报》，发表了大量文章，仅谢觉哉就先后以敦夫、焕南、明远、佳金、忠理、见心、无奇、飘飘、飞飞、雪朗、金、觉斋等笔名，发表了评论文章《苟安即自杀》、《战争是随便可过去的吗？》、《西北并不是安乐的天地》、《抗战到底与妇女解放》、《三民主义与抗日救国》、《"不良分子"界说》、《重来一次认识》、《苏联是我们的朋友》等70多篇。

党组织十分重视先进文化的传播工作。但是，抗战之前，甘肃没有什么像样的书店，许多书籍、学生教材只能直接从外地邮购，革命的进步的书报刊物更是很少见到。为适应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需要，必须为革命的、进步的书籍、报纸、刊物在甘肃的传播建立阵地，开通渠道。因而，在多方的努力下，一批进步书店便应运而生了。

兰州书报社（也称兰州派报社）是党组织直接领导下开设的。1937年12月，中共甘肃工委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帮助下，在兰州道升巷开设书报社，先后由姚国价、孙耀先（瑞庭）等人负责。1938年1月以后，书报社增加了发行销售《新华日报》的工作，成为《新华日报》甘肃分销处。书报社除销售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刊《解放》（1941年前发行）、《新华日报》和延安新华书店发行的各种书刊外，还发行销售其他进步书籍报刊，甘肃各抗日救亡团体创办的刊物也在这里销售。书店销售的《群众》、《新中华报》、《毛泽东印象记》、《二万五千里长征记》、《西北的新区》、《鲁迅研究》、《列宁主义概论》、《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战术》、《费尔巴哈论》以及生活书店的《全民》、《抗战》、《世界知识》等都很受读者的欢迎。书报社还设立了租书部，向读者借阅图书，成为党向革命群众介绍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救亡政策，传播革命火种，唤起人民大众觉醒的阵地。书报社有一批推销员，分头到甘肃省内各地销售图书报刊。在榆中设立了分店（新隆书报社），还通过商店在定西、陇西、潭县、岷县以及兰州周边的夏官营、甘草店、什川、金家崖等地销售书籍，教唱歌曲，工作十分活跃。1940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遭到破坏后，9月，兰州书报社停业。

生活书店是进步人士邹韬奋先生(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其前身是他创办的《生活周刊》附属的书报代办部,由于深受读者的喜爱,到1932年便发展成为在全国有56个分店的生活书店。生活书店发行销售多种报纸刊物,出版数百种图书,团结了一批进步作者,引导青年走向革命,深受读者欢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邹韬奋提出"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的方针,生活书店在各地增设了许多分店和分销处,为抗日战争和社会服务。

1938年2月中旬,生活书店总管理处派薛迪畅到兰州开设店址选在辕门(今甘肃省人民政府附近),后来薛天鹏又在天水设立分店,在甘谷县建了分销处。书店销售大量进步书刊、抗日救亡丛书,战时大众知识丛书、青年自学丛书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也收订《新华日报》。国民党当局对生活书店在兰州的经营百般阻挠刁难,经常派特务监视,查抄书店,扣压邮件,给营业造成很大困难。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给予书店大力支持和帮助,出面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归还被查抄的书刊,及时通报有关信息;共产党员丛德滋为书店寻找了一处秘密书库,专门存放进步书刊,加之读者的支持,使书店顶住了顽固派压力,业务逐步发展扩大。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后,1939年6月,薛天鹏在甘谷分销处被捕,天水分店和甘谷分销处被查封,1940年4月,生活书店兰州分店也被迫停业。

同仁消费合作社始建于1933年,合作社成员多为进步青年,最早的负责人是王彦升。合作社最初以经营香烟、肥皂、食品、燃料、布匹等平常生活用品为主。看到甘肃消息封闭,王彦升经与上海生活书店、开明书店联系,由合作社开始为他们销售一些进步书刊报纸。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支持下,合作社规模得发展。1937年冬,万良才负责该店以后,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除销售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杜仲远的《大众生活》,邹韬奋的《萍踪寄语》、《抗战三日刊》等大量进步书刊外,《解放》、《新华日报》等报刊和延安新华书店的一些书刊也销量不少。后来,合作社成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负责人开展工作和群众会面交谈的地方,成为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宣传进步思想的场所。合作社不少成员成

为抗日救亡骨干，许多青年在这里接受革命思想，前往延安，走上革命道路。1939年年底，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浪潮中，根据党中央“荫蔽精干”的精神，一些党的干部和党员先后转移撤离，同仁消费合作社随之停办。

省外文化团体和著名人士在甘肃的抗日救亡活动

抗战初期，除了甘肃本省成立的抗日救亡团体、文艺演出团体外，还有一批从外地来甘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团体组织、知名人士、学者，为甘肃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贡献。

新安旅行团（简称新旅），是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左翼教师联合会支部的支持下，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的鼓励和帮助下，于1935年10月10日在江苏省淮安县成立的。开始是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淮安新安小学的14名学生组成，他们小的十一二岁，最大的十七八岁。这些青少年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号召，遵循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的遗训，践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生活教育的思想，决心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救亡斗争中去。他们高唱《新安旅行团团歌》（田汉作词，张曙作曲）：“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我们的家破产了，我们的国遇了盗，听啊！到处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同胞们，别睡觉，把一切民族敌人都打倒，都打倒！”于1935年10月10日，在校长汪达之先生的领导下，开始了漫长的抗日救亡的旅程。他们先后到达过江苏、安徽、上海、浙江、山东、河北、察哈尔、山西、北平、绥远、甘肃、湖北、广西、内蒙古等22个省、市，行程50000里，吸收发展团员600余人，得到宋庆龄、周恩来、郭沫若、田汉等人的鼓励和支持，毛泽东还为他们题词，他们的行动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7年12月，新旅结束了在绥远慰问傅作义部百灵庙战役胜利的活动后，到达甘肃平凉。此时，正值隆冬时节，20多名团员住在平凉中学学生宿舍，自己生火做饭，一面学习文化理论，一面排练文艺节目，在平凉商场和沿西兰公路的白水、四十里铺等乡镇进行演出，并向《新陇日报》投稿宣传。他们用自带的电影放映机，自己发电，放映影片《民族痛史》、《一·二八淞沪抗战》等，许多群众扶老携幼，赶着大车，骑着毛驴，从十多里外的偏僻农村前来

观看，轰动一时。他们的活动，给平凉城镇带来一片抗日救亡的生机。

新旅到平凉后，得到平凉地下党支部的支持，支部书记张耀宗和边区驻平凉特派员刘华仁等，主动与新旅联系并提供帮助。旅行团总干事徐之光（徐志贯）提出前往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向党汇报和请示工作；陇东特委秘书长黄欧东，宣传部长吴铁鸣等热情接待他们。对于他们提出前往延安和派人帮助建党的要求，党中央根据当时形势，认为新旅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活动发挥的作用会更大，建议他们暂不前往延安；为加强领导，党派共产党员牟永春、少共团员苏纯俊到新旅帮助工作。

新旅一行20余人，于1938年2月28日到达兰州。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热情欢迎新旅的到来并予以关怀和支持。发展了徐之光、张杰、张牧等人加入共产党，建立了新旅党支部，徐之光任书记，张杰任组织委员，张牧任宣传委员。新旅的到来，“以新姿态的宣传形式，搅动了整个兰州”，[①]为甘肃的抗日救亡活动注入了活力。他们先后组织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话剧演出，节目中有反映码头工人抗日斗争的《扬子江风暴》，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烙印》以及《重逢》、《最后一课》、《沦亡之后》等。他们和联合剧团、妇女慰劳会联合宣传队，深入到榆中、崔家崖、雁滩等农村演出。在新旅的发起下，1938年4月，兰州各抗日群众演出团体共同举办了游艺大会，掀起了话剧演出的高潮。

新旅很好地运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唱歌形式，先后举行了歌咏演唱会，演唱了《热血》、《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我的中国》、《义勇军进行曲》、《新安进行曲》和《西南旅行团团歌》等几十首歌曲。仅在兰州就组织了9个歌咏队，深入到中、小学校、机关团体，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参加学唱的学生达600多人，还成立了救亡会。当时一些报纸评论新旅组织的歌咏活动说，“团员们的救亡歌曲，现已传遍了兰州市，每个小巷里总会听到‘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大刀进行曲》的杀声也雄壮地喊出了。”“新旅足迹所到，歌声四起。随着歌声发展救亡力量，提高了救亡的情绪，唤醒了无数迷梦

①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甘肃党史资料》第五辑，1988年内部版，第137页。

的同胞。”[①]

新旅出发时携带的16毫米电影放映机、发电机和幻灯放映机，成为有力的宣传工具。当时，甘肃省电影还很不普及，普通劳苦大众很少能够看到电影。新旅到兰后，放映电影14场，有讴歌少年儿童抗日斗争的《小五义》，反映国土被帝国主义占领的《民族痛史》，纪录片《一·二八沪战写真》，以及《农人之春》、《抵抗》和苏联影片《夏伯阳》，还有宣传防空常识的《防毒面具制造法》等。配合电影，还放映自制的《全国总动员》、《保卫大西北》、《儿童与抗战》、《抗战漫画辑》等幻灯片。很多演出是在露天广场，遇有恶劣天气，只要观众不散，就坚持放映，群众热情很高，反响很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像山洪暴发般喊出来”。媒体报道说，“崭新而动人的宣传工具——电影放映机，帮助他们成就了伟大的宣传工作”。“这些影片差不多在各处放映，都有成千上万的观众被吸引了”，“那些抗战的影片，提高了市民的抗战意识，增强了爱国热情。”[②]

新旅还经常采用演讲、出墙报、办展览、画漫画、座谈会、销售进步书籍等方式进行宣传。为了使群众及时了解全国形势，他们坚持收听收音机，将最新消息记录下来，利用快报、演出间隙、电影放映前的时间向群众宣讲。由于当时兰州一般人很少有收音机，所以大家都感到这些消息非常新鲜、及时，很受大众欢迎。新旅在甘肃虽然只停留了3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火热的抗日救亡热情，形式活泼的宣传方式，通俗易懂、充实丰富的宣传内容，都给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受到广大群众的赞扬和拥护，一些进步人士主动送自己孩子参加新安旅行团。1938年5月17日，在新安旅行团即将离开甘肃时，谢觉哉为他们题词：“以艺术武装你们的手口，以理论武装你们的头脑，从工作中锻炼你们成为铁的战士。”[③]5月底，新旅圆满地完成了他们在甘肃的任务，离开兰州前往西安。

①中共兰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兰州青年革命运动史》，1990年内部版，第109页。

②中共兰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兰州青年革命运动史》，1990年内部版，第110页。

③政协甘肃委员会：《谢老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

平津学生演剧队(又称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1937年10月在西安建成,得到中共党组织的大力支持。团内有共产党员9人,负责人是黄作舟、田文扬(田禾夫),团员有刘克里、白鹰、肖风、黄俊耀、田汉鼎、石杰、邢子义、肖丽、流萤、郑翠明、赵戈、王莘耕等。1938年8月(一说10月),演剧队一行28人,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阻挠,沿西兰公路一路演出到达兰州,得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的鼓励和支持。当时兰州形势已经紧张,他们便和血花剧团同台演出。萧军、塞克为他们编写剧本,他们自己带来的《前线》、《电线杆子》、《八百壮士》、《雷雨》、《渡黄河》、《打鬼子去》、《古城怒吼》等剧目演出后,受到各界群众的欢迎和赞赏。他们将队员分开深入到农村和各个学校演出,教唱歌曲。9月,国民党在统一抗战团体的名义下,强行解散平津学生演剧队。队员中有些人回延安,有些人受党的派遣前往杜汉三团开展工作,部分人留在血花剧团或到第八战区抗宣队,平津学生演剧队就此结束活动。

除了省外救亡团体外,还有不少省外的学者、教授、进步文艺工作者来到兰州,开展救亡活动和学术活动。1937年9月,燕京大学教授、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来兰,筹建科学教育馆,并到西北各地考察。他以满腔热情宣传抗日救亡,主编通俗读物《老百姓》旬刊,还被省外留学生抗战团、省妇女慰劳会、青年抗战团及兰州伊斯兰学会等组织聘为顾问或指导员,并为回民教育促进会、兰州伊斯兰学会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讲演。1938年4月底,作家萧军、戏剧家塞克、舞台美术家朱星南、作曲家王洛宾及夫人话剧演员罗珊等人来兰,开展文艺演出,创办刊物。在《甘肃民国日报》上,萧军主编副刊《西北文艺》,塞克主编副刊《剧运》,深受读者的欢迎。1939年1月,著名作家茅盾(沈雁冰)、张仲实来兰。茅盾先生在兰州停留了45天,先后在甘肃学院作了题为《抗战与文艺》、《谈华南文艺运动概况》等报告,对抗战文艺的方针、任务和文艺批评等方面进行了精辟的论述,针对当时兰州文艺的状况,指出:"开展西北文艺运动,除努力抗战建国外,还要和封建势力斗争。"[①]7月,艺术家赵丹、王为、田烈、朱令明、徐销、史枚等到兰,赵丹作了《抗战两年来中国话剧的发

① 中共兰州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兰州历史》上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

展》、史枚作了《学术中国化在重庆实际活动情形》、张仲实作了《民族问题》的报告。10月6日，著名剧作家老舍先生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参加全国慰劳总会的慰劳活动来到兰州。20多天中，开展了不少活动，他为甘肃学院等单位作了《两年来抗战中的文艺运动》、《抗战与戏剧》等报告，号召“文章下乡，文章入伍”[①]。这些活动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推动了甘肃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三）工业合作运动与玉门油田的开发

工业合作运动在甘肃

工业合作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战争前，整个中国的工业大部分集中在生产条件较为优越的东南沿海地区，仅上海一地就集中了当时中国三分之二的工业。内地各省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西康、青海、宁夏三省没有现代工业。川、湘、桂、陕、甘、滇、黔7省的近代工业仅占全国工厂数的6.02%，占资本数的4.21%，占产业工人数的0.79%。这些工业不仅在全国无足轻重，就是对地方经济的影响也不大。内地商品市场对外依赖性很大，商品大多来自国外和沿海各省。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东南沿海及华中、华北各地，并对西南、西北地区实行经济封锁，使抗战大后方的经济几乎崩溃，战争物资奇缺，人民生活用品日渐告罄，尽快发展西北、西南大后方工业生产就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同时，战争造成大批难民流入内地；其中，有许多是手工业者和熟练技术工人，如何利用各地的条件，发挥失业工人和难民的力量，从事简单易办、见效较快的手工业生产，以解决战争和民用急需，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

① 中共兰州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兰州历史》上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页。

题。当时，在上海的一些爱国人士和社会名流就此事经常交换意见，研究具体办法。

1937年11月，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携从延安采访归来的夫人海伦·斯诺从北京来到上海，在一次各界爱国人士、社会名流和国际友人参加的“星期一聚餐会”上提出，为支持长期抗战，应该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生产，供应军队和民用，支持游击战争。这一建议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决定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推选在上海工部局任职的国际友人、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为召集人，并起草《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宪章》。1938年4月，第一个工业合作社促进会在上海成立。1938年5月，经武汉国民政府同意，成立了中国工合协会。8月5日，工合在武汉正式成立，下设区办事处、事务所和指导站，孔祥熙兼任协会董事长，艾黎被任命为技术顾问。宋庆龄对工合给予极大的支助，1939年1月，在香港发起组织了中国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任名誉主席，一些知名爱国人士和国际名人，担任委员，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得到英、美、新西兰等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在人力和物力的支援。从1939年初到1942年的4年中，工合在西北、西南、川康、东南，新四军在南方的根据地和陕甘宁根据地等地区，相继建立办事处、事务处和指导站70多处，领导着分布在16个省的3000多个合作社，工合运动在我国发展起来了。

工合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分不开。1938年期间，艾黎和斯诺经常和周恩来商谈和研究工合组织的性质和人事安排问题。周恩来认为，工合既要保持自己社会团体的性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民主组织，又要同国民党政府保持一定的联系，争取社会人士参加，得到广大抗日民众的积极支持，防止成为官僚机构，鼓励他们一定要将工合运动坚持下去。博古（秦邦宪）曾多次帮助艾黎决策，指出工合要促进蒋介石抗战，尽可能地多争取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希望艾黎把一些工厂迁到西北，将西北建成为抗战的后方基地，有利于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对敌斗争。1939年毛泽东给设在香港的中国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写信，欢迎他们在抗日根据地建立工合。同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斯诺时说，我们支持建设许多小工业作为战争期间经济建

设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设想。即使中国工业合作社对于前线地区和敌后游击区起不了很大的作用，但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帮助后方工业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艾黎曾为工合工作三次前往延安，都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全面报道了西北工合运动的发展情况。共产党人林祖涵（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还担任了工合理事会理事，王炳南等还多次参加工合的各种会议。1940年毛泽东从延安派刘鼎、陈伯康、黎雪和赵一峰等，前往陕西宝鸡双石铺地区推动工合运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和引导，使工合运动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扩大了工合运动的影响。

甘肃的工合运动

工合西北区办事处是工合建立最早的办事机构，其任务主要是负责开辟和发展陕西、甘肃两省的工合事业。在甘肃，天水是工合运动开发最早的城市之一。1939年2月天水设立了工合事务所，先后建立了工业合作社50余个，社员达580人左右。合作社主要以棉毛纺织及皮革加工为主，还有火柴、面粉、机器、皂烛、油墨、造纸等。同时在秦安、甘谷、两当分设了机构，1939年5月，秦安有合作社4个，社员31人；甘谷有合作社3个，社员34人；两当有合作社1个，社员11人。由于甘谷及附近的清水、张家川一带盛产羊毛，因而，这些地方合作社多为棉毛纺织业。为了便于指导，同年5月，在天水组织合作社联合社和联合供销社。为了发展社员福利，鼓励妇女参加工合教育，天水事务所还组织过一个妇女合作社，举办妇女识字班，开设工合小学，附属幼儿园等。接着，兰州、平凉、徽县的工合组织也建立起来。

1939年3月，兰州工合事务所建立，在科学教育馆的协助下，工作开展顺利，到5月已发展到13个合作社，98名社员，股金有3250元。合作社最多时达37个，经过整顿，1940年4月，有合作社31个，社员358名，股金9072元，分布在兰州市西郊的费家营、孔家崖、刘家堡，黄河北的盐场堡、赵家庄、穆柯寨，东郊的宁卧庄、岸门街、张苏滩和市区内的颜家沟、中街子、中山路、西城巷、横街子、东梢门，榆中的金家崖、条城等地。开始时，合作社主要是生产民用生活用品，如毛巾、鞋袜、肥皂等，1939年7月以后，由于接受了大批军用毛

毯的生产任务，工合组织和合作社的机构和业务，主要围绕着军毯生产服务，成立了军毯纺织厂、军毯管理处、工合弹毛厂、工合合纱，还有研究所、实验室、工合金库、供销处、运输队等。专门生产或兼做军毯的合作社就有11个。西北工合第一批承担军毯30万条，第二批接收100万条，主要由兰州、天水、平凉3地合作社生产，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兰州工合合作社生产的产品还有提花毛毯、地毯、栽绒毯、挂毯、椅垫、马褥、各种布料、皮衣、皮箱、皮鞋、木器家具及机器零部件等。这些产品对工业十分落后的甘肃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支援了抗日战争，支持了抗日救亡运动，缓解了群众生活用品的不足，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山丹培黎工艺学校

随着工合运动规模的扩大，艾黎日益感到工合运动不仅资金缺乏，更重要的是人才缺乏、尤其是技术人才缺乏。为此，工合组织先后在四川成都、广西桂林、湖北老河口、河南洛阳、陕西双石铺、甘肃兰州等地创办了培黎学校和培训班，培养各种技术人员。其中，后来搬迁甘肃山丹的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是坚持时间最长、最有成效、知名度最高的一所。

1940年工合组织建立于陕西省双石铺的培黎工艺学校，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学校和学校负责人的刁难和迫害，艾黎决定迁校。1943年，艾黎陪同英国著名科学家、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约瑟夫·李约瑟（尼达姆）博士前往玉门油矿考察、讲学，往返都在甘肃河西走廊的山丹县驻足和考察。看到那里资源丰富，发展农牧业条件很好，也有一些房屋可以利用，又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有利于建立学校和发展工合事业。在请示在重庆的周恩来以后，决定将学校搬迁到山丹。搬迁工作得到时任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和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农学家张心一的大力支持，在他们帮助下，搬迁获得甘肃省政府的批准。

1944年11月开始搬迁，在艾黎和双石铺培黎学校负责人英国人乔治的组织和带领下，将全部设备装在马车上，60余名师生背着行装，冒着严寒，跋涉千余里，翻越秦岭、华家岭，先后分两批到达兰州。随后，乘汽车前往新校

舍山丹县的发塔寺，到1945年2月，迁校工作结束。

新学校改名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由艾黎任校长，乔治·何克任教务长，有200多名学生，多为贫苦人家子弟和孤儿。这是一所半工半读的技术培训学校，将“创造分析”、“手脑并用”作为办学宗旨，办学方针是“学校应该面向生产活动，在提高教学标准的同时，不应脱离当地人民的斗争”。在艾黎、何克谱写的培黎学校校歌中写道：“我们生活学习在培黎学校，纺织制革钢铁机器工业技术都具备，求知生产不相离。毋自暴，毋自弃，亲爱精诚，齐心合力，发扬合作精神，为新中国奠定工业建设的石基。”在这样的教学思想指导下，学校根据当地条件和需要设置专业，有纺织、皮革、缝纫、机械、电器、陶瓷、玻璃、造纸、煤矿、农牧业、水利工程、运输、建筑、会计、测绘、医疗等专业。山丹培黎学校在教学中，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校附设多个实习工厂，建立许多专业小组，如造纸组、陶瓷组、纺织组、化工组等等，开办了煤矿、农场、运输队等，学生除上理论课外，每天都安排相当多的时间从事实习活动。学生不但掌握了所学知识，生产出产品、收获粮食和其他收入，还为学校、学生解决了许多急需。

山丹培黎学校得到国际组织和人士的大力支持，在艾黎、何克努力下，募集了许多资金和设备，聘请了不少外国专家、教师、技术人员来校任教，其中有美国人瓦尔特·易斯利、恩迪·布雷德、罗伯特·纽威尔、柴油发动机教授唐纳德·肯普，新西兰友人司宾塞夫妇、农业专家魏美司、艾启赫、马克斯·威尔金森、会计师埃尔文·阿切尔，加拿大电气工程师胡·埃利奥特、毛纺专家雷娃·埃塞，奥地利工程师布鲁诺·哈德尔、日本陶瓷专家野口胜等，共有来自8个国家的20多位国际友人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发展经济培养了人才，无私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教务长乔治·何克由于工作繁重，生活条件差，身体受到损害，1945年7月22日患了破伤风，受当地医疗条件限制，未能得到及时治疗，不幸逝世，长眠在甘肃祁连山脚下，年仅30岁。

山丹培黎学校独特的办学方式和教育体系，以及显著的成效，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英国财政大臣克里普斯的夫人、工党议员胡特、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都曾到山丹培黎学校参观，有的还捐款资助，《密勒氏评论报》还多次发

表文章报道了培黎学校的情况。

国共合作开发玉门油田

旧中国一向被外国人称为“贫油国”，工业、交通运输、国防甚至民间用的灯油（煤油）完全依赖进口的所谓“洋油”，美国的美孚油等巨头几乎垄断了中国市场。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沿海地区沦陷，铁路运输大半陷于敌手，公路运输日趋繁忙，特别是铁路运输原本就不发达的西北、西南等内陆地区，汽车几乎成为支撑战争的主要运输工具。一向依赖洋油的中国工业和运输业，此时因海运不畅，进口油品竭蹶，出现了严重的油荒。当时曾有过“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比喻。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党内一些有识之士和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议开发国内油矿并积极奔走斡旋。1938年，当时在武汉的国民党政府为解燃眉之急，仓促决定开发甘肃玉门油田。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奉命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着手实施玉门老君庙地区石油勘查和建矿，同时，选派一批专家和技术人员前往甘肃玉门工作。

最初，油矿设备的筹办成为资源委员会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如果从国外购买，远水解不了近渴，不但资金缺乏，且沿海又被日军封锁，设备运输是个大问题；从国内内地调运，困难很多也很不经济，因此，想从离甘肃较近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所辖的陕北延长油矿，拆迁两部冲击式钻机（亦称顿钻）。1938年6月18日，资源委员会将《密矿字第三一三号》公函，送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函称“本龄奉令勘探甘肃油田，需用油钻机，拟从陕北延长、永坪选配两部连同锅炉等件运往甘肃，兹派本会甘肃油矿筹备处兼代主任张心田前往商洽”[①]。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立即请示周恩来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大局出发，对此事十分重视和关心，周恩来亲自过问并决定，将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属的两部冲击式钻机拆迁调往甘肃油矿。6月20日，钱之光以办事处的名义，回复资源委员会“总字第二二五号”函，明确表示：“派甘肃油矿筹备处兼代主任张心田先生赴陕北办理移送油钻机去甘西间使用，准此。除商准周恩来同志，介绍本军代表林伯

① 中共酒泉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酒泉地区党史资料汇编》，1987年内部版，第71页。

渠同志于张主任到陕时，就近照料一切，并专电延安陕甘宁区政府外，相应函复。”[①]张心田到达西安后，受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的热情接待，并在办事处的妥善安排下前往延安，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商办采油设备拆迁的具体事宜。在延安期间，张心田受到高自立、萧劲光等人的接见，由边区政府第三局王局长、八路军后勤部军工局李强副局长负责办理。他们答应了资源委员会提出的各项要求，并尽量给予工作上的方便和生活上的照顾。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支援开发甘肃油矿的真诚态度，通力合作的办事效率，以及热情周到的关怀，都给张心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其耳目一新。8月10日，他在西安写给高自立和萧劲光的信中说：“上次陕北之行，获睹鸿宇，备承优待，感常谒晚。”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

1938年8月下旬，资源委员会派遣以工程师张心田为首15人组成的拆迁队，到延安执行具体拆运钻机等事宜。在拆迁过程中，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热情、无私地帮助他们解决了种种困难和问题。所拆迁的两部钻机，一部为德国造，一部为美国造，考虑到开发甘肃油矿紧迫性，边区政府除钻机主体部件外，还将动力、钻头、钻具、锅炉等附属设备、配件，配备齐全，以便钻机到达甘肃油矿后，可以立即安装开钻。在边区政府帮助下，拆迁工作非常顺利，只等国民政府派车拉运。然而，拆迁队却被告知，国民政府无法派出汽车，致使装运工作被迫停止。无奈之下，张心田只好又致电李强求助，请求将这些设备运到陕西咸阳，再想办法。尽管八路军汽车不多，且前方对日作战运输非常紧张，也很困难，但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仍抽调汽车十余辆运送设备。由于矿区不通公路，汽车无法靠近，边区政府便动员群众，人扛畜驮地将设备装上汽车，使运输工作顺利完成。设备和配件全部安全到咸阳后，咸阳国民党政府仍无汽车接运，心急如焚的张心田万般无奈只得雇用民间的马车、私人汽车将钻机和设备辗转运往甘肃兰州，直到翌年四、五月间，本可早些运到的这些设备才陆续到达玉门矿区，整个过程历时半年左右。中国共产党在拆迁钻机设备过程中热情无私磊落举动，加速了玉门油矿的勘探开发和建矿的进程，为油矿的开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① 中共酒泉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酒泉地区党史资料汇编》，1987年内部版，第72页。

在钻机迁运期间，1938年12月23日，时任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留美学者严爽，协同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孙健初和测量技术员靳锡庚等一行8人，携带仪器设备、行装、粮食，从甘肃河西走廊重镇酒泉出发，骑着骆驼，在茫茫戈壁旷野之中风餐露宿，艰难跋涉3天，于12月26日到达玉门石油河，在冰天雪地的严冬，开始艰苦的勘探普查，为油田正式钻探做了较为详细的准备和研究工作。陕北延长油矿的一批技术熟练工人，如钻井工徐成华、杨邦福、郑云兴、郑云祥等以及锻工、木工10余人也先后到达玉门，成为玉门油矿的第一代产业工人。

1939年5月6日，陕北运来的一台钻机，在孙健初先生确定的老一号井正式开钻。8月11日，当钻至115.51米时探到了油层，投产后日喷原油10吨左右。当时，这样的产量已属高产油井了，全矿人欣喜若狂，倍受鼓舞，再接再厉。8月17日，另一台钻机安装在老君庙二号井开钻，到9月15日，钻至145.88米时见油，日产原油10余吨。从1939年10月至1941年6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两部钻机钻探了4口浅井，均告成功。据统计，从1939年8月至1940年8月，钻成的口浅井，出产原油327100余加仑，炼成汽油51200余加仑，灯油19700余加仑，柴油39200余加仑。[①]这些成果不仅宣告甘肃油矿开发成功，而且，在抗战时期“除飞机的汽油经盟部供给外，其他液体燃料供应均由该局努力，赖以不匮”[②]。就连当时美国远征军驻中印缅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也曾通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向玉门油矿发来急电，想就近得到油品供应。

1940年3月，甘肃油矿筹备处撤销，正式成立了甘肃油矿局，隶属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由矿业专家孙越崎任总经理，矿局设在重庆，遥控玉门油矿的开发和生产。

油矿开发成功，具有很大的意义：第一，油矿生产的油品，直接运往抗日前线，大大地缓解了中国的油荒，对抗战胜利和经济发展，给予极大的支持。第二，油矿开发中取得的宝贵资料和进一步研究，对石油地质理论的发展有

① 中共酒泉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酒泉地区党史资料汇编》，1987年内部版，第76页。

② 中共酒泉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酒泉地区党史资料汇编》，1987年内部版，第76页。

很大的贡献。孙健初和工程技术人员据此所写的大量有价值的论文，如1939年10月14日，孙健初发表的《甘肃玉门油由地质报告》等，首开世界地质史上陆相生油之先例，为后来在我国开发大规模陆相油田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第三，玉门油矿开发的成功是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取得的，是国共合作的可喜成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胜利。

孙越崎上任后，对油田的发展有很好的设想，在技术人员的培训、矿区基础设施建设、钻井器材、炼油设备添置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多工作，锐意扩大开发玉门油矿。1940年9月，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等到玉门油矿视察，被油矿取得的成绩所感动，回重庆后与资源委员会主任、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取得共识，根据孙越崎提出的500万美元的开发计划，拟就了一个大规模开发玉门油矿的宏大计划。当年冬天，派张心田、萧之谦等赴美国考察，订购了钻机14部、一座炼油厂全套设备、抽油机10台、大量汽车及运输器材等。不料，这个计划遭到国民政府内一些人的反对阻挠，经过努力，计划虽得以继续，但由于两个半月的耽误，恰遇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导致大部分设备无法从美国运出，少部分运出的设备，又遭日军飞机轰炸受损，发展玉门油矿的计划夭折。

三、开展党在甘肃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一）各地中共党组织的恢复和建设

中共甘肃工委所属党组织的建立

抗日战争时期，在甘肃成立的中共组织，除直接归属中共陕甘宁省委（后为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的庆（阳）环（县）分区党委外，还有中共陇东特委、中共甘肃工委、中共陇南临时工委、中共甘（肃）宁（夏）工委以及其他系统直接领导的党组织等。有些党组织虽然存在的时间长短和影响范围大小不同，但都从不同方面推动了党的事业发展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中共甘肃工委的组织建设

1933年原中共甘宁青特委被敌人破坏后，甘肃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很长一段时间未能恢复起来。虽然红军长征和西路军在甘肃各地播下了革命火种，也曾建立了一些党的组织，但存在的时间都比较短，只有少数党员分散在各地坚持斗争。因此，中共甘肃工委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甘肃党的组织。由于陇东边区和统战区党的工作，已由早先成立的中共庆环分区党委和中共陇东特委负责，因此，中共甘肃工委的工作范围主要是在除陇东地区以外（包括平凉、固原、天水西部的一部分）的整个甘肃国民党统治区。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帮助下，中共甘肃工委大力培养群众运动骨干，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和扩大组织，到1938年初，工委领导的基层组织以兰州为中心，逐步向河西、甘北、陇南、甘南发展。根据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

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共甘肃工委制订了甘肃党的发展计划，加快了发展步伐。在中共兰州市学生委员会（学委）和中共兰州回民特别支部建立以后，4月，成立了中共兰州市委，5月又建立了中共榆中县委。除此，工委的各个联络点和抗日救亡群众团中还有党员30多人。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图谋西安，不断派飞机轰炸兰州。党中央考虑到，兰州今天虽是远后方，如果西安失守，就可能变为近后方，成为西北的政治中心，中共甘肃工委的中心工作应放在外县及乡村，工委负责人应分散到外地去，实际帮助当地进行工作，同时，党中央又调派王实先、林亦青等同志到兰州加强工委的领导工作。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为了防备日军侵占西安后沿西兰公路西进，工委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西兰、兰新公路一线和陇南山区，以便有效地控制西兰公路两侧，并在必要时依托陇南山区的有利地理条件建立抗日根据地。工委委员也分别派到各地指导和帮助工作。这期间，工委又建立了中共凉州（武威）临时县委、中共靖远县委、中共徽县县委等组织。截至1939年6月，全省党员已发展到264人，分布在西到甘（张掖）、凉（武威）、肃（酒泉）州，东到天水、甘谷、清水，北至景泰、靖远、固原，南到徽县、武都、夏河，并延伸到宝鸡、泾阳、略阳、吴忠、广元等省外地区。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甘肃工委组织发展的最好时期。

中共甘肃工委的思想建设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历来把思想建设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首要任务。恢复和建立起来的各地党组织中，有一小部分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同志，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比较高，斗争经验也较为丰富，但是，大部分是入党不久的年轻新党员，他们革命热情很高，但斗争经验不足，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了解甚少，认识不深。在残酷的斗争中，加强党组织的思想建设，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全面提高党员思想政治素质，就成为中共甘肃工委组建后的一项迫切重要的任务。

中共甘肃工委制定了学习制度，拟定了党员教育大纲。对党员思想教育

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党内教育服务于“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中心任务，“工作中的困难就是研究的主体”。[①]在学习的方式方法上，要因时、因人、因地制宜，能合则合，宜分则分，上党课、举办训练班，讨论会和个人自学相结合，十分灵活，因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基本知识的学习，帮助党员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当时有些党员对党、对革命缺乏深刻的认识，“只有民族主义思想，而无共产主义思想，或者笼统地认为共产党、八路军是好的”[②]，有的甚至把共产党看成和青红帮一样的组织，对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对党的性质、任务、宗旨认识极为模糊。因此，1938年3月，工委明确指出“加紧党的教育，提高同志的政治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工委委员以身作则，以自学为主，每周集中学习一两次，边学习边研究工作。当时兰州的马列主义著作很少，他们就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借，从生活书店购买和在《新华日报》中寻找，学习了马列主义著作、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大众哲学》、党内报刊和党内文件等。工委还想方设法编印了一些小册子，解决党员学习资料不足的问题，如《党的建设提纲》（包括党员、党的组织、组织原则、党的纪律等10章）、《党员须知》、《共产党18周年纪念专刊》、《怎样发展党员》等。工委还要求党员学习鲁迅先生的革命精神，学习一些革命文学作品。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对工委组织的党员思想教育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在工委举办的各种训练班上，谢觉哉给大家讲党史，上党课，讲形势；伍修权讲共产主义运动史，讲马列主义理论，党员学习积极性普遍很高。

（2）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以保证党对甘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的全面落实。当时一些党员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认识不深，甚至有人认为“统一战线在全国或将来有可能，而在今日的甘肃没有可能”，“先对立着自己干，做出成绩来，再谈合作”；不愿参加合法的抗敌后援会，想另起炉灶；也有人觉得有抗敌援会就行了，“一切听后援会的命令。”[③]这些错误的、糊涂的不利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落实，不利于

①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甘肃党史资料》第五辑，1988年内部版，第120页。

②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甘肃党史资料》第五辑，1988年内部版，第121页。

③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甘肃党史资料》第五辑，1988年内部版，第120页。

团结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此工委多次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1938年上半年，工委召集了一次党的活动分子讨论会，对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等进行了比较具体的研究，还举办了兰州市委、学委、妇女3个训练班，以及外地工作的同志、公开工作干部的训练班。这些研讨班、训练班都以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教育为重点，还专门组织了回族党员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学习讨论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等。

(3)进行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的教育。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主要的仍然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而有些党员对这种形势下的秘密工作缺乏认识和经验。有人认为现在是统一战线时期，我是共产党员又怎么样？有的党员在实际工作中不注意隐蔽身份，在公开工作中习惯于用党内的一些做法和语言，以致把自己暴露了，受到特务注意。针对这种情况，工委对党员进行了秘密工作和斗争艺术的教育，印制一些相关材料，如《我们不应该松懈，应该是很警觉的》等，深刻剖析对秘密工作的几种不正确的认识，告诉党员什么是秘密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与联系，对于秘密工作做了一些详细的技术性的规定，提高了党员的警觉性和斗争艺术。

为了“武装每个党员的头脑，使每个党员都锻炼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警惕性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同时在教育的过程里，训练与提拔广大新干部去担负伟大的革命任务”[①]，并指导各级党组织的工作，1938年3月，工委编印了党内刊物《党的生活》(《DangDe生活》)。这个刊物的内容是“严格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战争趋势与党的任务；实际反映各级党支部群众工作的情况与各支部经常生活；严格的讨论与批判党的工作”[②]。刊物为32开本，先是油印，后改为石印，每期印五六十份，下发各支部及党小组，要求“每个党员必须把她详细地阅读，细慎的讨论，为每个党员头脑的武装者”[③]。刊物刊登了《西北危机与我们的任务》、《工委关于缴纳党费和新党员规定的决议》、《怎样发展组织》、《支部怎样工作》及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

甘肃党组织在艰苦的秘密斗争中，重视思想建党，因此能够克服困难，创

① 中共甘肃工委：《党的生活》，1938年3月。

②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甘肃党史资料》第五辑，1988年内部版，第124页。

③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甘肃党史资料》第五辑，1988年内部版，第124页。

造性地开展工作并取得成绩。中共西北工委在总结甘肃党的工作时指出，“甘肃的党内教育，进行是相当起劲而且有计划和有些成绩的。”[①]1939年六、七月以后，由于中共甘肃工委委员分散到各地开展工作，《党的生活》停刊。

中共兰州市学生委员会和中共甘肃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建立

甘肃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是最积极、最活跃的抗日救亡力量，为此，中共甘肃工委成立后，首先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发展党组织。工委委员刘日修考入甘肃学院，并担任了甘肃学院学生自治会的常务干事，创办了进步刊物《甘院学生》，广为散发，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党组织通过各种活动发现、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了罗扬实等一批党员。在兰州师范学校也发展了党员，成立了中共兰州师范支部（兰师支部），牛发荣担任支部书记。兰师支部的党员利用寒假的机会，到榆中县开展工作，在文城小学发展党员8人，成立了党支部，直接与兰师党支部联系。同时在兰州中学、兰州农校、兰州供销学校等学校也发展了一批党员。为了统一领导，1937年12月，中共甘肃工委成立了中共兰州市学生委员会（简称学委），直属工委领导，刘日修任书记。学委负责领导兰州市各学校党的工作，组织青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重要任务，发挥了宣传抗日救亡的先锋作用。1938年夏，中共甘肃工委决定成立中共甘肃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青委），林亦青、王实先先后任书记，原学委的工作归于青委。1940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遭破坏后，青委也随即结束了工作。

中共兰州市委的建立及活动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兰州市各界进一步动员起来，在各行各业中涌现出一批先进分子，党员人数不断增加。为适应兰州市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需要，1938年4月，成立了中共兰州市委，书记由中共甘肃工委委员郑重远兼任，组织委员赵子明，宣传委员陆云龙。1938年8月后，陈成义接任书记，1939年9月，陈成义离兰后、陆云龙任书记，1940年6月至1941年秋，罗扬实任书记。担任过市委委员的还有鲜维峻等人。

①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甘肃党史资料》第五辑，1988年内部版，第125页。

中共兰州市委是在中共甘肃工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其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着重在工人、职员、市民中开辟工作，推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全面开展；掩护工委领导机关协助和配合工委工作。市委认真贯彻工委“发展党员着重质量，教育着重党的基本知识”的方针，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素质，发展党的组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市委从成立初期仅有一个街道党支部和一些党员，发展到1939年的五六十名党员。其领导下的党组织有中共兰州邮电支部、中共西北公路局汽修厂支部、中共兰州印刷厂工人支部、中共水伕工人支部、中共兰州医院支部、中共兰州空军机场支部、中共兰州师范支部、中共甘肃学院支部、中共兰州农校支部等，另外在机器制造局、织毡工人、水烟工人、银行职员中也建立了党小组和发展了党员。市委所属党员大多为兰州本地人或已在兰州居住多年的同志，情况熟悉，社会关系广泛。为掩护工委工作，他们为工委委员和外地来兰的党员介绍社会职业，解决身份证明、路条，寻找适当的住房，利用工作之便，掌握社会动态、提供重要信息，作为工委决策的依据。中共邮电局支部的党员在分拣邮件时，发现军驻甘办事处和生活书店、兰州书报社、同仁消费合作社等单位的邮件、书籍邮包时，及时通知提取，尽量避免被特务扣押。如有被特务查扣的书报，他们也及时通知有关方面设法交涉索回。在印刷厂工作的党员，也将印制的材料中有关重要信息及时报告党组织，以便党组织了解情况，及时采取措施。

中共兰州市委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取得的主要成绩是，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改变了以前甘肃党组织发展中工运较为薄弱的状况。

中共西北公路局党支部（书记甄廷兰），为了启发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成立了以青年工人为主的识字班，在识字读书、学习文化的过程中，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党员与工人们谈心交朋友，与群众打成一片，组织工人阅读进步书刊，学唱救亡歌曲，编写墙报，结合五一劳动节，组织工人进行爬山活动，讲解五一劳动节的意义。通过一系列工作，工人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在一次抗日救亡的捐献中，汽修厂的工人捐献了200元。1939年，

在党支部领导下，汽修厂工人进行了两次斗争，一次是要求厂方对工人与职员一视同仁，享受购买厂方发售的平价面粉的权利，厂方最终答应了工人的合理要求。一次是反对厂方借故迫害工人的斗争。由于厂方无端怀疑工人偷盗，进行野蛮搜身，侮辱工人人格，工人群众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痛打了帮凶。冲突中一些工人被警察逮捕，党支部团结群众，实行罢工，并发动群众向警察局交涉。当局害怕事态扩大，被迫释放被捕工人，斗争取得胜利。

在中共兰州市委领导的工人斗争中，影响最大的是水伕斗争的胜利。当时，兰州的自来水刚刚筹办，机关、单位和居民生活用水，主要依靠人工从黄河里挑送。这就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挑水大军——水伕。他们多是从灾区逃难出来，或是不堪忍受地主的盘剥来到城市谋生的贫苦农民，不少人常年露宿街头，生活很苦。尽管如此，国民党当局还想方设法要在他们身上榨出点油水，除了各种捐税外，还不时摊派他们无偿地去做各种苦役，警察对他们也经常打骂，还规定每天上午要进行“集训”、“训话”，占用了他们做工的时间，引起挑水工人和用户们的强烈不满。中共甘肃工委认为，这支挑水大军，虽然不是产业工人，但由于他们的送水工作关系到全市人民生活，社会联系广泛，影响面很大，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很有必要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和教育，指示兰州市委派专人加强对他们的工作。

1938年夏，水伕们开展了反对集训的斗争。这一天，全城挑水工人携带家属，男女老少近千人，涌向警察局请愿，强烈要求取消“集训”，致使全城供水几乎全部停止。这次行动也得到广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许多市民来到警察局声援他们。人们从四面八方相继赶来，越聚越多，以致把从中央广场到五泉山的交通都阻塞了。警察局唯恐事态扩大，不好收拾局面，被迫答应了挑水工人的要求，同意从今以后不再进行“集训”，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斗争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这些从来被欺辱的人们，“他们开始认识了自己团结的力量，并开始认识了共产党，说党的这些人是好人，是为工人谋利益的”。党组织也利用斗争胜利的生动事实教育他们，要加强团结，互相帮助，要组织起来为争取自身利益而斗争。不久在挑水工人中成立了群众性组织——“兄弟会”。随后，中共兰州市委在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中发展了党员，

成立了党支部。后来他们又取得了1938年底向一些公馆、衙门讨还拖欠水费的斗争和1939年抵制当局摊派无偿洒扫机场道路斗争的胜利。

在西北日报和甘肃民国日报报社印刷厂党组织领导下，建立了工人读书会，1939年还取得了要求增加工资斗争的胜利。

1940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遭破坏后，中共兰州市委工作十分困难，1941年11月，时任书记的罗扬实奉命撤回边区后，中共兰州市委机构实际上已不存在。

中共榆中县委的成立及活动

榆中县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活动较早的地方。1937年10月，中共甘肃工委成立后，工委组织委员郑重远，前往自己的家乡榆中县开展工作。他人熟、地熟，首先在金崖乡邴家湾发展了党员，成立了工委成立以来全省第一个党小组，随后又在金崖小学的教师和学生中发展了一些党员。不久，又成立了榆中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金崖党支部，周延龄任书记。1938年1至2月，在兰州师范、兰州农校读书的榆中籍的学生党员，利用寒假在家乡开展工作，成立了甘肃青年抗战团榆中支团，积极开展活动，发现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成立了中共榆中城关党支部。此时，榆中全县共有党支部2个，党员30名。1938年初，党中央派回族党员张杰（张恩科）、金少伯（金三津）到甘肃工作，中共甘肃工委派他们到榆中，张杰担任朱家沟回民小学校长，金少伯在大壑岘小学当教师。同年5月，中共榆中县委成立，张杰任书记。

榆中县委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员教育，在当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主要工作有：

（1）党员们利用各种合法身份，在讲台上向学生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阐述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利用张宗麟先生编写的《战时读本》作教材，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在党组织的教育下，榆中县的青年学生有不少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有的积极参加各地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2)兴办回民教育,维护回民群众利益。榆中县的朱家沟、大壑岘、洼庄一带是回民群众聚集的地方,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推行歧视政策,致使这里没有一所学校,回族子弟上学非常困难。为了提高回族群众的文化水平,动员回族群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组织在甘肃省回民教育促进会的支持下,在朱家沟、大壑岘两地各建回民小学一所,解决了孩子们上学的困难,得到了当地回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然而,其教育局却从中作梗,企图侵吞教育经费,并在学校的归属和领导权的问题上做文章,图谋控制学校。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在榆中县城西关清真寺内成立了甘肃省回民教育促进会榆中分会,以甘肃省回民教育促进会的名义出面与当局交涉,保护了两所学校的独立办学权力和合法地位,斗争取得胜利。

(3)带领群众和反动势力作斗争,保护群众利益。驻扎在榆中的一些国民党军队,常以搜捕"土匪"为借口,到农村骚扰百姓,抢夺民财。当地群众的烧柴历来取之于周边的山林,而一些土豪劣绅却以"护林"为名敲诈勒索贫苦农民。对此,张杰等组织群众和学生起来进行护卫,保护了群众的利益,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1940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遭破坏后,1941年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共榆中县委的负责人和已经暴露的部分党员,分别转移隐蔽,中共榆中县委的工作随之结束。

中共靖远县委的建立及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靖远县的活动开始于1930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在这里举行了水泉暴动等活动,播下了革命火种;1934年,一批在兰州求学的学生回靖远创立了靖远同进合作社,经销进步书籍,传播进步思想;抗日战争爆发后,甘肃青年抗战团在靖远建立了分团,团员最多时有400多人,以后,经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介绍,有40多名靖远籍的青年学生前往延安参加革命。党在靖远的活动,为靖远县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极好的条件。在此基础上,1938年8月,中共甘肃工委派岳秀山、张生强前往靖远筹建党组织。这年秋天,中共靖远县委正式成立,岳

秀山任书记，张生强任组织委员。以后县委领导机构曾多次调整，郑重远、乔映淮、欧化远相继担任过书记。县委积极开展了各项工作。

（1）建立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党员教育，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从1939年到1941年，全县先后成立了中共乩肚子（地名）党支部（书记魏仰峰）、靖远师范党支部（书记李淮）、北湾党支部（书记李保洲）、三滩党支部（书记王大觉）和城关党支部（书记万夫哲）5个党支部。各支部成立前后都发展了一批党员。据统计，1941年，在甘肃的136名党员中属中共靖远县委领导的就有48人，[①]为全省党员最多的县委之一。在组织发展中，县委还注意进行思想教育，利用中共甘肃工委提供的各种学习材料，通过民众夜校等形式对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党的性质、任务和奋斗目标，收到明显的效果，党的战斗力不断提高。

（2）贯彻落实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了动员群众，县委主要利用民众夜校这种很受群众欢迎的形式作阵地，宣传抗日救亡，提高群众觉悟。到1940年底，各党支部共办民众夜校20多所，县委委员、支部书记亲自到夜校上课。三滩党支部组织了读书会，成立了救国救民协会，发展会员30多人。陡水党支部在金矿沟的淘金群众中，以讲“精忠传”等形式，结合抗日战争，宣传爱国主义思想。靖远师范党支部除利用多种形式上街宣传外，还组织了“晨呼队”，每天早晨坚持在钟鼓楼活动。1939年春节期间，他们和朝阳学校联合成立了醒民剧团和朝阳剧团，深入农村演出抗日救亡节目，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

（3）积极贯彻“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掩护党的组织，保存革命力量。抗日战争期间，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中共靖远县委虽曾遭破坏，却能坚持斗争，直到抗战胜利。其重要原因是，县委积极贯彻党的精干隐蔽的方针。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中，特别是在中共甘肃工委被破坏以后，党的工作困难很大。县委根据工委的指示决定，除身份已经暴露的党员立即转移外，党组织要特别注意隐蔽，寻找合法身份，甚至进入国民党政府基层政权，开展合法斗争。为此，县委一方面团结上层进步人士和社

①《甘肃省1940年以来党的工作》，存甘肃省档案局资料9号卷。

会名流、知名人士，和他们搞好关系，得到他们的帮助，如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县参议长苏振甲、教育界名人李儒等。另一方面，利用县长马继舟急于拉拢人员，扩充自己势力的机会，县委决定县委委员、支部书记和骨干可以去国民党在兰州举办的西训团“受训”，以便将来进入国民党基层政权。1941年6月，西训团“受训”结束前，县委在兰州开会决定，回到靖远后，尽快进入各乡镇政府，利用合法身份，坚持斗争，扩大党与群众的联系，尽量为群众做些切实保护群众利益，减轻群众负担。同时决定，在组织建设上，以巩固为主，暂不发展党员，提高警惕，严防被捕。“受训”结束后，县委委员等分别进入北湾乡、东湾乡、三滩乡、糜滩乡等乡公所以及城关镇，担任乡长、副乡长、镇长、干事等职，基本上控制了靖远县沿黄河各乡的权力。还有一些党员在县政府、教育局、国民党县党部等部门任职。这样，靖远党组织不但得以隐蔽存在，而且还以合法身份为群众谋利，组织群众进行争取民生的斗争，营救被捕同志，工作很有成绩。

(4)组织群众反对贪官劣绅，发展生产，为争取自身利益而斗争。为了减轻贫苦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县委组织群众反对国民党靖远政府“以丁派兵”的兵役制度，提出以“地亩摊派”，即穷人当兵，富人出安家费、服装费的办法。经过斗争，在有党支部的地方基本得到实施。1941年秋，甘肃省财政厅到靖远进行所谓“清田均赋”，官员们乘机袒富坑穷，贪污受贿，群众十分不满。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在东湾、大庙、永安等乡，愤怒的群众怒打了清丈队队长；到县上、省上状告清丈队“贪污受贿，殴打民夫”，结果先后两任田赋处副处长均被撤职。为了抵制一些商号乘人之危，低价收购农民的农副产品，残酷剥削农民，1944年5月，陡水党组织成立了水泉消费合作社，公平买卖很受群众欢迎；同时，为了党员地下工作的方便，还开办了旅店和饭馆。1944年北湾黄河游地工程竣工，淤地15000亩。为了使这些土地全部分给贫苦农民，县委指示北湾党支部领导争地斗争。1945年初，经过党支部的发动，各村都成立了贫民互助会，直接插手分地，15000亩淤地全部分给了贫苦农民，还挫败了当地一些富户的反扑活动。中共靖远县委还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开展自救。1939年冬，北湾党支部在中堡组织群众沿永固渠植树28000株；1940

年冬，为组织群众度过荒年，从银行贷款80000元，在曹家湾淤地500亩，分给贫苦农；1941年10月，又带领大家开凿山洞60丈，延长永固渠3里，解决18000亩土地的灌溉问题；1944年至1945年改造了复兴渠，解决了蒋滩、金园5600亩土地的灌溉问题。陡水党支部组织贫苦农民到金厂沟淘金，最多时有2000多人。党支部还在这里成立了民众夜校，提高了群众的觉悟；1941年又派人到兰州学习纺织技术，成立了陡水纺纱合作社。这些措施，发展了生产，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中共凉州（武威）临时县委的建立与活动

早在1934年春，中共顺直（河北）省委领导的宁夏特支，就派进步青年尹有年到武威开辟工作，首先办起了《大公报》销售处。年底，中共宁夏特支又派共产党员李德明和进步青年张春申到武威开展工作。他们办了一个生活书店，销售《大公报》、《申报》、《益世报》和鲁迅、茅盾、艾思奇、邹韬奋等作家的进步书籍、刊物，传播新思想，使青年教师和学生受到启蒙和熏陶，逐步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1935年春，他们在青年学生中组织了钦文读书会，创办了《钦文月刊》，进步青年杨依峰任总干事长。读书会最多时有30多人，结合国内外形势和重大事件，组织大家学习讨论，利用星期日进行郊游，利用假期去农村考察，引导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情，在这些活动中培养了一批革命分子，从中发展了一些党员。1938年2月，建立了中共武威县支部，李德明任书记。不久，中共甘肃工委将从延安回甘肃的党员李振华分配到武威工作，于1938年春，成立了中共凉州临时县委，李振华任书记，李德明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刘大武。

在临时县委成立之前，1937年12月9日，在甘肃省青年抗战团和李德明的组织指导下，在武威成立了甘肃青年抗战团武威分团。分团组织歌咏队、话剧团和墙报组，在街道和马步青骑五师的新兵中教唱抗战歌曲，在城乡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创办《抗战周刊》，共发行12期。县委成立后，进一步发展组织，还发动武威中学、武威师范、青云中学进步学生到农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9年在国民党的反共浪潮中，武威国民党当局强迫停止销售《大公报》，查封生活书店，查禁《抗战周刊》。1940年4月，县委领导人李德明、李振华等人先后被捕或被武威国民党当局强迫送往劳动营“受训”，至此，中共凉州临时县委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中共徽县县委的建立及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徽县的一批进步青年纷纷出走，寻求救国道路。他们中间有些人阅读了进步书刊，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追求真理的觉悟不断提高。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这批青年陆续回到徽县，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大家对共产党，对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有了新的认识，共同商定设法寻找共产党组织。1938年夏，时任徽县北街小学校长的吴治国和两当县东街小学校长苏河，被通知参加国民党兰州西北训练团的轮训。在兰州，他俩通过熟人找到了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伍修权会见了他们，并与万良才取得联系。此后，他们经常到同仁消费合作社阅读革命报刊和进步书籍，参加各种活动。同年11月，吴治国、苏河在兰州加入中国共产党。轮训结束后，吴治国回到徽县，发展伏镇小学校长山炯堂和王锐青、周少珊等人入党，成立了徽县第一个党小组，吴治国任小组长。1939年初，中共甘肃工委派魏子义、高健君到徽县帮助工作，发展党员，建立了北街小学党支部和伏镇小学党支部。在此基础上，同年3月，建立中共徽县县委，吴治国任书记，山炯堂、高健君、王锐青为委员。

县委成立后，十分重视组织发展工作，相继建立了伏镇小学学生党支部（书记葛维西）、县保安队党支部（书记周冠军）、泥阳小学党支部（书记刘一鸣），连同原有的北街小学党支部（书记吴治国）、伏镇小学党支部（书记山炯堂），共有5个党支部。1940年2月，中共甘肃工委委员林亦青（惠光前）来徽县指导工作，为加强领导，将葛维西、周冠军增为县委委员。1941年2月，工委派原先在榆中县工作的张杰、金少伯和张敏到徽县工作，3月，罗扬实也来到徽县。6月，高健君、张敏、张杰、金少伯、罗扬实、吴治国等相继调离徽县，县委书记由山炯堂担任，葛维西任副书记。1943年又成立了东关回民党

小组。

中共徽县县委下属组织多数是在学校建立的，因此，县委在学生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党组织利用党员多为教师的条件，向学生宣讲革命道理，启发学生的革命思想和爱国热情。讲授国语课和写作文、记日记都要求学生以抗日救亡为主要题材；音乐课学生唱抗日救亡歌曲；美术课教学生写标语、画抗战漫画，还组织宣传队、歌咏队、演出队，利用节日、庙会、集市，到群众集中的场合进行演出。1939年秋，泥阳小学党支部把三年级以上学生，组成3～5人的“小先生”小组，深入街头巷尾，走家串户，教群众识字明理、学唱抗日救亡歌曲、开展募捐。县委还在北街小学、伏镇小学学生中建立了青年维梓团，每周六进行活动。他们上街宣传、打扫卫生、清除垃圾、抓赌查毒。这些活动，对于动员徽县人民群众起来抗日救亡，唤醒觉悟改变群众精神面貌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浪潮期间，中共徽县县委注意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广交朋友，团结当地各界的国民党开明人士、进步人士和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士，以合法的社会职业为掩护，坚持与顽固势力、反动势力进行斗争。1939年4月，国民党伏镇区长因贪污抗日捐款，欺辱妇女，敲诈百姓，引起民众公愤。伏镇小学党支部由范连元、高健君以教师的身份，带领学生和民众百余人，高呼口号，冲进区公所。事后，县政府追究责任，将伏镇小学校长山炯堂扣留在县城。党支部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号召师生罢课，向县政府请愿，其他学校的党组织组织师生到伏镇小学声援慰问，声势很大，震动全县，迫使县政府放回山炯堂，斗争取得了胜利。1940年，县委委员、东关回民小学校长周冠军，领导学生和群众与国民党驻军抢夺群众柴草和财物的行为，公路局以修路为名，乱挖清真寺和回民小学及居民庭院的石料，乱砍树木，讹诈钱财的恶行作斗争，取得胜利，保护了群众的利益。1944年7月，曾任河北省保安司令的张荫梧来到徽县，兼任徽县师范校长，妄图控制徽县教育大权，并与反动势力勾结，调查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当时在师范学校工作的葛维西等党员，以反对学校强迫学生住校、伙食费等不合理的规定，与张荫梧开展斗争，击败了张荫梧的阴谋。

中共徽县县委自成立到抗战胜利期间，虽然处于恶劣的环境之中，却能巧妙斗争，与敌周旋，取得成绩，始终未遭破坏，为以后党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共兰州回民特别支部

中共兰州回民特别支部于1938年2至3月间建立。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帮助指导回族进步青年重建伊斯兰学会的过程中，通过实际斗争的考验，由吴鸿宾介绍，杨静仁、鲜维峻、马明德3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成立了直属中共甘肃工委领导的中共兰州回民特别支部（简称回民特支），鲜维峻任书记，马明德负责组织工作，杨静仁负责宣传工作。特支成立后，一方面在当地培养和发展一批回族进步青年入党，如安文蔚等，同时，中共中央又派张杰、金少伯、闵毓华等回族共产党员到甘肃加强工作，特支后来发展到10人左右。

回民特支以伊斯兰学会和回民教育促进会为阵地，通过多种形式对广大回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大力开展回族上层人士的统一战工作；团结回族群众，开展改造回教教育促进会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1940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遭破坏后，根据组织安排，回民特支的主要成员相继离开兰州，到1940年底，特支机构已不存在。尽管如此，留下的共产党员，在艰苦的环境下仍继续开展着工作。

中共陇东特委的建立及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活动

中共陇东特委于1937年7月正式建立，是抗日战争时期党在甘肃建立较早的组织之一。

西安事变后，驻防陇东的国民党东北军，除少数留守部队外，全部南调。为策应东北军、西北军，原驻陕甘宁边区环县木钵的红军中央教导师移防甘肃庆阳，中共陕甘宁省委也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庆阳、合水、镇原、正宁地区，派出了以组织部长蔡畅为团长的50多人的工作团在该地区开辟工作。这样，在这一带就形成既有国民党政权，又有共产党的管理机构，国共共处、共同管

辖的“统战区”的格局。在工作团领导“统战区”工作发展很快，团结包括国民党进步人士在内的广大群众建立了各界救国联合总会，工、青、妇、商、教育各界及各区、乡普遍成立救国分会。同时，发展一批党员，创建各级党的组织。到1937年下半年，相继成立中共庆阳、合水、镇原、宁县、驿马关5个县委和固原工委，区、乡党组织也逐步建立，党员发展到1500人左右。1937年5月，中共中央为了落实曾向国民党提出的愿将“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的承诺，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快形成，撤销了中共陕甘宁省委，建立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专管边区党的工作，不久，陕甘宁特区政府（即边区政府）也正式成立。为适应这一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庆环分区党委，隶属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负责陇东边区党的工作；成立中共陇东特别委员会（简称陇东特委），直接由中共中央领导，负责陇东统战区和平凉等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随即派中央教导师政委袁国平负责中共陇东特委的筹建工作。1937年7月，中共陇东特委在庆阳正式成立，对外称“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陇东办事处”，袁国平任书记，公开身份是办事处主任，秘书长黄欧东，组织部长李铁轮，宣传部长任质斌，副部长吴铁鸣，巡视员段德彰。中共陇东特委接收了原中共陕甘宁省委管辖的陇东统战区党的工作，调整和加强了庆阳等6县的县委（工委）的领导班子，1937年秋还建立了中共西峰工委（对外称八路军驻西峰办事处，段德彰任书记任办事处主任）。

中共陇东特委成立后，在统战区，坚持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抗日群众组织，广泛地宣传和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停止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积极开展民运工作，凡是赞成抗日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地主豪绅都可以参加到抗日行列。同时改救国会为抗敌后援会，把一批民运干部选进后援会，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群众工作路线通过后援会得到贯彻，使抗敌后援会组织不仅得到巩固和加强，有政权性质。特委还注意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并同国民党政府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又开展必要的斗争。特委积极支持群众的抗捐抗税斗争，并同国民党政府交涉，要求国民党政府让步，在斗争中扩大民主，改善民生，满足群众的基本要求。1937年9月，国共合作宣言《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公布后，特委向国民党陇东各县县

党部发出《中共陇东特委给国民党党部的公开信》，提出贯彻国共合作宣言，协商共同领导陇东各县抗日救亡运动问题。在统一战线的合法条件下，一些民事纠纷，都依靠群众解决，保甲长都要求由民主选举产生。在改善民生方面，实行减租减息，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鼓励和扶持农民努力生产、改善生活。

中共陇东特委在统战区周边的国民党统治区也发展了一些党组织，使党的工作以统战区为中心，沿西兰公路向平凉、固原、天水等地发展，统战区党的工作不断完善和加强。

1938年春，中央调袁国平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并对中共陇东特委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李铁轮任书记，黄欧东任副书记兼秘书长，陈仁麒任组织部长，任质斌、吴铁鸣任宣传部正、副部长，增设了统战部，段德彰任部长。7月，中共陇东特委合并于中共庆环分区党委；至此，中共陇东特委不再存在。

在中共陇东特委的领导下，1938年7月，建立了中共平凉市委。1937年8月，中共陇东特委派张耀宗（张可夫）回到平凉，首先建立了一个党支部，后来，又成立了罗云章为书记的党支部。10月，特委宣传部长任质斌，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留守处第三科科长的身份到平凉考察，特委根据他的建议，决定全面开展平凉的工作，遂派人在镇原与泾川交界的党原、玉都、华亭、安口，镇原与平凉交界的草峰一带开辟工作，发展一批党员，建立党的支部。1938年春，为加强镇原，开辟平凉、泾川一带工作，特委将原中共镇原县委改为中共镇原中心县委；任质斌兼任书记。此后特委陆续派柳青（刘华仁）、赵守一、刘思明等党员到平凉工作，党员人数发展到20多人。1938年7月，中共陇东特委决定成立中共平凉市委，张耀宗任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赵守义任宣传部长。7月下旬，平凉市委以中共平凉市委的名义印发了《告平凉各界同胞书》，引起平凉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结果赵守一被迫离开，在报社工作的张耀宗也被辞退，市委领导机构受损。

这年7月，中共陇东特委与庆环分区党委合并，不久，中共平（凉）泾（川）工委成立，吴铁鸣任书记。其任务是以平凉、泾川、华亭为据点，沿西兰公路一线发展党的工作。同时，为加强平凉工作，中共平泾工委派林英任中共平凉市委书记，张耀宗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39年后半年，为适应形势的发

展，中共庆环分区党委决定将平泾工委改为新区工委，由吴铁鸣任书记，负责平凉、泾川、华亭以及镇原南三镇等新区的工作。不久，中共新区工委任命曹瑞安任中共平凉市委组织部长，回族党员马寅任宣传部长。充实后的市委加强了学校的工作，在平凉女师、伊斯兰师范学校和平凉城区发展了一批党员，市委所属党员最多时达30多人。同时，李义祥、孙存弘、李树有等在泾川、华亭、崇信、草峰等地开展活动，农村党的工作也有发展。1939年9月，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形势下，个别党员自首叛变，导致平凉市委组织部长曹瑞安和一些党员被捕，一些党员脱党，中共平凉市委遭到破坏。

1940年4月，中共陇东地委决定将原中共固原县委、新区工委、回民工委合并，成立中共平东工委，吴思宏任书记。平东工委曾多次进行恢复平凉市委的努力，由于多种原因，均未有大的进展。1940年夏至1941年冬，中共平东工委又派回族党员沈遐熙、艾青山、郭生满、李子英、乔培仁、廖寿录等到华亭、灵台与清水、张家川交界地区开辟工作，到1944年5月，发展了党员18人，先后建立3个党支部。抗战胜利时，平凉地区共产党员约400人。

中共甘(肃)宁(夏)工委的建立及活动

1940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遭到破坏后，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与上级失去了联系，面临的形势和所处环境十分恶劣，甘肃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处于抗日战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甘肃党的领导机构，1942年3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民运部部长贾拓夫，主持召开原中共甘肃工委负责人座谈会，当时在延安的郑重远、陆云龙、罗扬实和吴治国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甘肃工委的工作经验和教训，提出恢复甘肃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领导机关的建议。4月1日，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本着“西北中央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的精神，提出了党在甘肃“今后工作计划”。计划认为：中共甘肃工委应恢复起来，“为了甘肃工作能与宁夏工作密切配合，并帮助宁夏工作的开展，同时由于甘肃宁夏两省的地理历史的相属关系，及少数民族的普遍分布关系，应设立一甘宁工委，以指导甘宁两省工作。”[①]座谈会后，西

①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甘肃党史资料》第五辑，1988年内部版，第426页。

北局在庆阳专门设立了“陇东调查站”，由朱敏、方晨等人负责，调查中共甘肃工委被破坏后，甘肃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及党员的情况，为恢复甘肃国统区党的领导机关做准备。

1942年8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对甘肃工作的决定》，认为“甘肃党自1940年领导机关破坏后，两年来由于某些暴露干部的撤退及组织关系的割绝，所以基本上保留了党的组织基础，正因为如此，一般干部党员对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还未深刻了解或不知道。因此，党员中表现‘乱冲乱闯’的左的毛病者有之，表现‘没有前途’的消极情绪者亦有之。党的组织上的混乱状态还未结束，党外的社会群众活动也是非常薄弱的。此种情况，要求党迅速的整顿甘肃党的工作”。“为了有计划地整理与推进甘肃党的工作，决定重新成立甘肃工委，驻在边区境内，领导外面甘肃党的工作。”并要求甘肃党组织“应设法在宁夏、青海建立党的组织”[①]。根据上述精神，贾拓夫派陈成义、李仰南到庆阳先行开展工作，不久，又派孙作宾、刘杰、丁志明、万良才等到达庆阳。1942年10月，中共甘宁工委在庆阳正式成立，书记孙作宾，委员陈成义、李仰南。

中共甘宁工委成立后，派出一批党员到甘肃、宁夏、青海进行联络和开辟新的工作。遗憾的是，正当工作起步之际，1943年4月，“抢救运动”发生，中共甘宁工委领导人均陷入“红旗党”冤案中，成立仅半年的中共甘宁工委领导机关的工作基本终止。

南方局及邻省党组织在甘肃建立的机构及活动

1. 中共陇南临时工委的建立及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陕西省委在与陕西毗邻的甘肃陇南地区开辟党的工作，以加强党对陇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为此，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天水地委，并经林伯渠推荐，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三原联络站站长董振国（董邦），于1938年6月，前往天水筹建地委。此时，原设在西安的国立第五中学已迁往甘肃天水，董振国首先与五中学生党

①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甘肃党史资料》第五辑，1988年内部版，第426页。

员刘桂增接上组织关系。随后,在国立五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又发展天水生活书店经理薛天鹏等人入党。在此基础上,6月底,成立了中共天水支部,董振国任书记,刘桂增、孙耕夫为委员。同年11月,董振国在参加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期间,与陕西省委常委杨清研究后认为,由于此时天水党员只有8人,成立地委的条件尚不成熟,可以先成立一个统管陇南各县党的工作的机构,为建立天水地委作准备。1939年1月,中共甘肃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罗云鹏到陇南指导工作,在天水与董振国取得联系,将在甘谷的党员宋肃如等的组织关系,移交给董振国。2月,中共陇南临时工委成立,董振国任书记,组织委员张德祥,宣传委员孙耕夫,统战委员薛天鹏,职工委员刘桂增,青年委员贾荣陶,委员宋肃如。

临时工委成立后,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先后建立了中共国立五中支部(书记耿夫孟)、中共国立五中甘谷分校支部(书记刘桂增)、中共甘谷县委(书记彭昌运),到1939年4月,中共陇南临时工委下属1个县委,2个支部,有党员30余人。

同年6月,由于三名工委委员被派往陕北公学培训,薛天鹏在天水被逮捕,为避免组织再遭破坏,工委决定暂停组织活动。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陕西省委取消了地委一级组织,中共陇南临时工委即行结束。

2. 玉门油矿党组织的建立及活动

1939年8月,玉门油矿建成投产以后,党中央一直十分关注油矿的发展。1939年冬,中共长江局川东特区决定派遣党员前往玉门油矿开辟工作。当时,正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工作的川东特委三峡实验区特区工区区委宣传部长王道一接受了这个任务。年底,他以"试用技术员"的身份进入玉门油矿。他在途经酒泉油矿办事处暂住时,结识了办事处工作人员孙馨沛,并经孙馨沛介绍认识了刁德顺。随后,陈赍从国民党中央地质调查所到油矿地质室工作,刁德顺也从酒泉来到油矿从事后勤管理工作。由于刁、陈二人在北京读书时是同学,都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相互了解,因此,王道一、刁德顺、陈赍成了好朋友,交往密切。刁德顺已于1936年入党,曾在东北军中工作,西安事变后进入延安抗大学习,毕

业后被分到甘肃，1938年春，中共甘肃工委派其到酒泉开展地下工作。陈贲到达玉门油矿后不久，经王道一、刁德顺介绍入党。1941年春，成立了中共老君庙油矿（即玉门油矿）支部，[①]刁德顺任支部书记。为与甘肃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陈贲借到兰州出差机会，前往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汇报了油矿党支部情况。由于原中共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化名孙友民）已调离，工委也遭破坏，党支部一时未能与甘肃地下党接上关系，他们按照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在发动职工维护自身利益，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及代理人的残酷压迫剥削的斗争中开展了艰苦的工作。1943年，支部发展孙馨沛入党。

在这期间，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也指示南方局常委、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组织力量到玉门油矿开展工作。此时由于油矿工人不断增加，子女上学问题急需解决，油矿决定筹办职工子弟学校，趁此机会，1941年秋，南方局派田伯萍（田君实）、宁汉戈（林禾民）、丁酉成（丁培楠）、黄小穆（黄永森）4名党员先期到达玉门油矿，在玉门油矿职工子弟学校任教，以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黄永森任校长，田伯萍任教导主任。他们成立了中共甘肃油矿职工子弟学校党支部，田伯萍任书记。以后又利用学校发展，在嘉峪关设立分校的机会，孙铭勋、张清廉、丁毅、彭瑾等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来到学校，加强了党支部的力量。党支部积极开展活动，利用上课和夜校，在油矿职工中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妥协投降的行径；组织读书会、歌咏队、演出队，组织大家学习革命和进步书籍，学唱、演出抗日歌曲和节目，激发爱国热情，团结职工增加生产，为抗战服务。

由于油矿职工子弟学校支部和甘肃地方党组织没有关系，又远离南方局，因此，玉门油矿虽有两个党支部，却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各自在油矿中独立工作。

1942年至1943年期间，原中共甘肃工委组织部长时已调到中央农委工作的王实先（化名赵振雄），为开辟第三国际交通线来到玉门油矿，与中共玉

① 关于玉门油矿党支部成立的时间，是根据中共酒泉市委党史办公室和中共玉门市委党史办公室提供的材料认定。也有人认为，根据有关材料分析，玉门油矿党支部成立的时间应早于1941年春。

门油矿党支部取得联系，为了保证交通线的安全，决定支部切断与地方党组织的联系，直接与中央农委联系。然而，王实先回延安不久，就陷入“红旗党”冤案之中，被隔离审查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因此油矿党支部与上级失去联系。1944年，刁德顺、王道一、陈贲因工作调动等原因，先后离开玉门油矿，支部由孙馨沛负责，由于条件的限制，没能开展更多的活动。同年秋，油矿白色恐怖严重，职工子弟学校党支部工作处境困难，经上级同意，党员陆续分批撤离，返回重庆。

3. 中共西北师范学院支部的建立及活动

抗日战争期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迁到兰州，是甘肃一件大事。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在北京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相继西迁陕西，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4月，学校在迁往陕西城固后改称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1939年8月，西北联大下属各学院独立设置，由原北平师范大学改制的教育学院，独立设置后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0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明令西北师范学院从城固迁往甘肃兰州。从1941年3月开始到1944年年底，西北师范学院分期分批完成了搬迁任务。此时，学院有在校生1020人；教师159人，职工66人，已有相当规模。

西北师范学院迁兰州，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很不发达的甘肃乃至西北，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此举受到甘肃省政府和各界的热烈欢迎和支持。甘肃省教育厅在致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中称：“西北师范学院迁兰，省府及地方人士均热诚欢迎，祈电令该院派员来甘筹备。”甘肃省临时参议会致西北师范学院电称：“贵院历史悠久，成绩卓著，海内外蜚声，此闻有奉令迁甘之议，将于西北整个文化推进贡献重大力量，本会代表全甘民众欢迎并愿切实赞助，盼早来临。”①

随着西北师范学院的西迁，学院的中共党组织也在兰州建立起来。早在城固时，西北联大就有一个30多名党员组成的联合支部，受中共陕西党组织的领导。1939年，教育学院招收的新生中有一个地下党员叫孙济，成为正式

① 1941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第30期。转引自《西北师大校史》编写组：《西北师大校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改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后的第一个共产党员。1940年又发展了王伦(王志宏)等4人入党,成立了西北师范学院第一个党小组,孙济任组长。后来,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高潮中,西北联大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西北师院党小组也有2人被捕,直到迁校完毕时也未能恢复。但是,在兰州校区的党组织却有发展。1941年,兰州分院招收的第一批新生中,有范山(刘生智)和李齐夷2名地下党员;1942年招收的新生中,又有5名地下党员,于是,成立了中共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分院党支部,范山任书记,江明贞任组织委员,王积忠任宣传委员。1943年,范山离校,由江明贞任书记,王积忠、李齐夷分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

党支部在学生中积极开展活动。1941年12月开学后,学校准备成立学生代表会,训导处未经学生讨论,宣布了指定的代表名单,企图将学生代表会变成训导处的工具。当时,党支部虽未成立,但在地下党员的联络下,组织学生反对校方的做法,迫使训导处取消了原定的代表资格。1943年暑假,在党支部的领导下,8名党员和20多名进步学生,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山阳读书会,由李齐夷负责。读书会学习进步书刊,讨论国内外形势,团结进步同学,培养了党的预备力量,后来有八九人入了党。在此基础上,1944年春,他们在兰州兰园开办了北辰书社,由郭松茂、韩其昶、李齐夷主持。这年暑假以后,又创办了进步刊物《新地》和《读书月刊》,由李齐夷主持。两个刊物均由北辰书店经销,以文艺的形式团结了同学,活跃了兰州文化生活。这两个刊物得到了郭沫若的热情支持,郭沫若曾写信鼓励和支持他们,并为《新地》题写了刊头。[①]1944年12月8日晚,学校在新建的大礼堂举行校庆晚会,演出京剧,为解决照明,遂将教室里学生用的汽灯集中到礼堂,致使学生无处学习,又不准进入礼堂,引起学生强烈不满。加之学校当局平时对学生生活漠不关心,新生长期睡地铺,伙食差,冬天教室和宿舍不生火,有时连开水也喝不上,学生早已不满,这天的事导致学生怒火的爆发。学生用砖头砸了礼堂的窗户,训导处的负责人出面未能制止,赶来阻挠的警察也被学生冲散撤走。事后,党支部印发传单,组织学生向学校提出成立学生自治会和改善生活两项要

① 1945年北辰书店和两个刊物被迫停业。

求。学校被迫答应改善生活条件以平息学生怒潮。1945年1月16日，反动派逮捕了郭茂松、李齐夷、袁方、韩其昶4位共产党员和具有进步倾向的国民党员薛天刚。5月，江明贞离校，支部工作由李修成、李景曜负责，后来又发展了几名党员，恢复了山阳读书社的活动。不料，这年7月，金滕、郝磷等党员，因在《景泰通讯》发表揭露国民党腐败的文章而被捕，使党支部因此受到严重破坏。同时，党支部又失去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处境困难。但支部一直坚持斗争，直到抗战胜利。

除以上所述，中共南方局、西北局、中央农委等系统，还派出一些党员在甘南、河西走廊、清水、张家川等地开辟工作，建立了组织，但多因环境恶劣，基本处于长期埋伏状态。

（二）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

利用上层统战关系营救

根据调查掌握的情况，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利用上层统战关系积极进行营救。谢觉哉致函贺耀祖，要求释放有关人员，贺耀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不少工作。1937年9月，得知关押在甘州（张掖）监狱的刘瑞龙、魏传统等8人将被转押到青海的消息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立即请贺耀祖出面与马步芳交涉放人，但是，由于这8人都是红军的领导干部，事关重大，贺耀祖不敢做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立即致电党中央，最后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的名义，向蒋介石和马步芳要人，迫使马步芳将8人移交给甘肃绥靖公署贺耀祖处，在贺耀祖的关照下，他们回到了党的怀抱。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还根据掌握的名单，直接向第九十七师要回了何兰阶等人。在此之前，在国民党将“感化总队”被俘人员向南京移交的途中，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及时提供消息，在党组织的策应下，方强、秦基伟等100余人于平凉境内顺利逃

离，回到边区。1938年8月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党中央的报告称："八路军在河西失去联络的战斗员和大部分干部，有甘肃省政府遣送前来的1200人，从其它各方面零星收集的也有500人左右。"①

为了顶替壮丁，搜刮钱财，1937年10月，马步芳将被俘的西路军人员1500人，编成一个新兵团，送往河南第一战区补充卫立煌部队。新兵团路过兰州时，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了解到该团除连以上军官外，全部为西路军被俘人员组成。谢觉哉即面见贺耀祖，要求将这个交给八路军，贺耀祖未能答应。谢觉哉便找到新兵团团长杨明亭，向他阐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道理，分析了新兵团的情况，晓以利害，使杨团长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他表示这么多人的去留问题自己不能作主，只要上级同意，他立即执行。与此同时，彭加伦前往新兵团讲话，说明党对西路军指战员的关心，希望大家坚定信心，准备随时回到八路军来。办事处又将情况及时电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当新兵团到西安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立即开展工作，前往驻地看望和鼓励他们。经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出面与国民党有关方面交涉，新兵团到达陕西三原安吴堡后，便被八路军三原留守处接收，回到党的怀抱。

通过高金城开设福音堂医院营救

流落在河西走廊山区和农村的西路军人员，受到敌人的追捕，消息闭塞，不了解国共合作的整个形势的变化，无法和党组织取得联系，急需派人前往营救。考虑到河西一带马步芳、马步青封建统治力量很强，控制很严，又值战事结束不久，形势仍很紧张，必须派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有相当社会关系和掩护职业的人开展营救工作。当时任赵守钰（国民政府特派护送西陲宣化使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班禅额尔德尼回藏专使行署专使）秘书的吴波推荐了高金城。

高金城一家是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朋友。高金城是基督教徒，为人正直，富于正义感，不向恶势力屈服，长期从事医务工作，是一位有名望的医生。他

① 中共兰州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兰州历史》上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曾在甘肃河西的凉州、甘州、肃州等地布道和行医，在甘州（张掖）有福音堂医院，医德高尚，扶困济贫，深受当地群众的热爱。后来，他随冯玉祥部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结识了蒲化人、吴波等共产党人并成为好友，深受共产党的影响。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做外科医生的高金城，随医疗队到上海支援淞沪抗战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1934年他再次来到兰州，开设福陇医院，他的夫人牟玉光，1937年在兰州开办“牟玉光助产所”。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设立后，高金城夫妇和他们在国民党空军工作的女婿刘亚哲及女儿高雪杰，都成为办事处的好朋友，为办事处做了不少工作。

高金城在张掖开设过福音堂医院，济贫扶危，仗义执言，在当地各界各阶层中都有影响，是营救西路军人员最合适的人选。1937年8月初，谢觉哉到兰州不久，和彭加伦、朱良才一起邀请高金城在五泉山商谈前往河西营救西路军人员的具体办法，高金城慷慨受命。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经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谢觉哉的争取，贺耀祖任命高金城为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办事处又派原红军团长蔡光波以助手名义随高金城前往张掖。

8月7日，高金城一行到达张掖，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高金城遂以抗敌后援会主任的名义，宴请了包括县长马鹤年、第一〇〇师师长韩起功在内的国民党党、政、军、商、绅头面人物；召开了各界民众参加的抗日动员大会，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抗日救国，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为后来的营救工作创造了条件。高金城以重开福音堂医院，为抗日伤病员治病为由，要回了被第一〇〇师伤兵医院占据的福音堂，并召回了以前的学徒、现已各自行医、卖药的张明新、陈大伟等人，很快恢复起了福音堂医院，以此为掩护，积极开展营救西路军人员 的工作。

此前，被编入国民党张掖补充营的西路军被俘人员，秘密建立了党支部，正积极设法与上级取得联系。一些伤病员经常到福音堂治疗，经过相互反复考察，党支部和高金城、蔡光波之间取得了信任，通过党支部的汇报，高金城掌握了张掖一带西路军人员的情况。他一面向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报告请示营救办法，一面在秘密党支部的协助下，开始营救工作。高金城以医院缺少

护理人员的名义，向韩起功要来了被俘的王定国等4人到福音堂医院工作，加强了营救力量。医院设有病床20张，不够时还增加一些地铺，主要用来收治西路军伤病员。治愈后，高金城发给他们路费和自己的名片，寻找车辆，组织他们分批到兰州寻找八路军办事处。据不完全统计，从张掖福音堂医院经高金城送回的西路军人员，先后有10余批200多人。在营救刘瑞龙等8人的过程中，当高金城得知这8人关押在甘州监狱并将押往青海的消息后，立即派人昼夜兼程，向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报告；派人到狱中向他们介绍外面的形势，告诉他们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坚持斗争；几次派人前往狱中为他们治病、上药；在他们离开甘州时，还送去供路上使用的碗筷等日用品和急救药物等，给予尽可能的照顾。

为了寻找陈昌浩等人的下落，收容失散人员，高金城等以外出治病机会，走遍了甘州的民乐、甘竣、龙渠、安阳、康隆寺、倪家营等地。通过调查，他们得知陈昌浩已在群众的掩护下离开了甘州，将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西路军三十军参谋长黄鹤显等重要干部，分别关押在青海、凉州的消息，及时通知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当得知在民乐南山中还隐藏有不少西路军人员的消息后，高金城利用旧交，与民乐沐化区区长兼民团团长孙振铎取得联系，得到了孙振铎的帮助。高金城遂即派王定国、张明新等人，带着100多张写有“红军已改编为第八路军，在兰州南滩街54号设有办事处，朱良才在那里接应你们”的纸条，前往南山洪水一带寻找并散发给西路军流落人员。见到纸条的人们，互相联络、传递，不少人都辗转回到兰州，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不少红军的领导干部，如西路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妇女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野战医院院长丁世芳、中共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等，都是通过这次行动得到营救的。还有一些没有离开的人员，后来大都在孙振铎的关照下在当地安了家。

高金城的营救活动逐渐被反动势力所察觉，福音堂医院和高金城等受到监视。为了安全，高金城将临时支部的刘德胜、王定国等撤离回兰州，自己仍留下坚持工作。即便是当他得知自己已被列入马步芳捕杀共产党人的名单后，仍在1938年春节前夕，冒着危险，将19名从祁连山中出来的西路军伤病

人员收留救治，结果被发现。1938年2月3日（正月初四），敌人以给韩起功治病为名，诱捕并残忍地杀害了高金城。高金城烈士为营救西路军人员献出了宝贵生命，深深地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营救

有些西路军失散人员，经历了各种磨难，九死一生，在群众的帮助下千辛万苦来到兰州。他们在找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之前，很多人靠打零工、卖水，甚至乞讨为生。为了使他们尽快归队，办事处经常到处寻找，一旦发现，立即接回，热情接待，治病疗伤，使他们尽快休整恢复，再设法送回延安。这样的收容工作一直继续到1940年，约有200人被营救。1937年冬、1939年秋，青海马步青释放了被俘的西路军伤残人员两批，约300人。这些人到兰州后，由于条件的限制，办事处经请示党中央，积极与贺耀祖、国民党第八战区交涉，要了一些钱，发给路费，开具通行证，帮助他们返回家乡。

在兰州的收容中，牟玉光开办的助产所和丛德滋的民众通讯社，也成为西路军人员与办事处之间的联络点。有些西路军人员到兰州后，先到牟玉光助产所或民众通讯社休整，再设法前往办事处。1938年春，曾受到丛德滋影响的西北公路局司机、进步青年侯维炽，从甘肃安西接运苏联援助的卡车回兰时，在乌鞘岭遇到十几名西路军人员，便和随车的共产党员盛健一起，将他们隐藏在车内带回兰州后送到民众通讯社，丛德滋夫妇予以热情接待，随后乘夜将他们送往八路军办事处。

（三）接转护送党的干部和物资

国际交通线与苏联驻兰代表处的设立

中国共产党和设在苏联的第三共产国际（简称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以来，通过东北地区满洲里或经过海运进入苏联是双方交往的主要渠道。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占领东北，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条交通线受阻中断。1937年8月21日，苏联政府与中国国民政府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慨然表示，苏联当尽其一切可能，援助在反侵略的英勇解放斗争中之伟大的中国人民。提供数以亿计美元的武器、军事装备、汽车、汽油、药品、被服等物资，派遣军事顾问、军事工程人员、车辆驾乘人员、医疗人员来华帮助工作。中国则以茶叶、羊毛、生皮等农产品及一些矿产品折价偿还。因此，通过甘肃、新疆进苏联的西北国际交通线，就成为中苏两国最重要的沟通渠道。从苏联经阿拉木图、中国迪化（今乌鲁木齐）、兰州、西安到武汉、重庆的交通运输线，在抗战期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作为西北联系陕、甘、宁、青、新交通枢纽的兰州，此时又成为苏联援华物资的集散地，因此，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便于工作，并考虑苏联航空志愿队即将来华，苏联政府决定在兰州设立代表机构。1937年9月，苏联代表3人先期到达兰州进行筹备，10月，在兰州颜家沟（今三爱堂医院）设立了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军事代表处代表阿克莫夫中将（1938年5月由杜特喀姆接任），副代表符拉基米洛夫。阿克莫夫在国民革命时期来过中国，曾任冯玉祥部的军事顾问，对中国比较了解。外交代表处代表阿扎洛夫，一秘马格列夫斯基，二秘沙夫鲁诺夫。11月上旬，苏联援华的第一批航空志愿队飞机50架，空、地勤人员150人到达兰州，在兰州设立了基地。那时，日军

为了破坏西北运输线，摧毁兰州这个战略要地，曾数十批次空袭兰州，狂轰滥炸。在保卫兰州的空战中，苏联航空志愿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仅1939年2月20日兰州大空战中，就击落日军轰炸机9架。在兰州空战中，斯切帕诺夫、雅士、古力芝等苏联航空志愿队战士，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壮烈牺牲。

此前，从西北前往苏联路途是极为艰险的。1936年，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保卫局局长邓发，受命去苏联向第三国际汇报中国政局和党的情况，从6月12日离开西安，几经周折，于12月1日到达莫斯科，历时达半年之久。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开辟和苏联驻兰州代表处的设立，为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联系提供了便利。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的联系频繁，人员交往不断，虽然国共合作已经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具有合法和公开的地位，但涉及党的机密和重要领导人员的行动，仍然是秘密进行的，利用西北交通线和苏联代表处，开辟党的地下秘密交通线，并保障其安全和畅通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正是这样，八路军驻西安、兰州、迪化3个办事处便成为这条秘密交通线上的3个重要支撑点，担负着繁重而艰巨的任务。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工作全面开展以后，与苏联代表处的联系日益频繁，而谢觉哉、彭加伦处长均不懂俄语，交涉多有不便。为工作考虑，1938年春，党中央派熟悉俄语的伍修权来兰州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伍修权的到来，使办事处与苏联代表处的联系更加及时、密切，使这条秘密交通线在党的人员接转护送和物资的转运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接转护送党的重要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有许多领导人和重要干部来往苏联和新疆，接转护送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是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任务。办事处成立不久，就接待了去新疆的张之夫、杜重远和周小舟。东北抗日将领、民主人士李杜将军赴苏，也在兰州办事处中转。1937年12月，蔡树藩、钟赤兵、贺子珍、刘英等去苏联；1938年1月，毛泽民等去新疆，办事处为他们联系乘坐苏联飞机前往。1938年，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和支

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意见回国，到达兰州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东返时办事处派副官况步才等4人将他一直护送到延安。1939年9月，周恩来在邓颖超、孙维世的陪护下前往苏联治疗臂伤，伤愈后，于1940年2月回国，来去都经由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负责接送。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苏联的影响下，新疆的盛世才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合作关系。党中央派陈潭秋、毛泽民、陈云、邓发、滕代远、周小舟等到新疆工作。后来，在盛世才的要求下，又先后三批派去数十名干部，第一批林基路等10人，第二批张东月等21人，第三批高登榜、郑亦胜等23人，都是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为他们解决食宿，联系车辆，前往新疆的。西路军在河西失败后，余部在李先念等的带领下经过休整，编为新兵营。1937年12月14日，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曾传六、李天焕、郭天明等西路军领导人乘飞机抵达兰州，经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安排，乘汽车到西安后，于12月26日回到延安。1940月11日，329名西路军突围人员，从新疆东返途经兰州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刁难，受阻于西郊十里店，不准进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积极交涉，送去大量食品，休息两天后，使他们顺利离开兰州。办事处还派人专程前往嘉峪关迎接，并护送这些人到西安。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接转护送的党的领导人和重要干部还有：任弼时、王明、蔡畅、邓发、陈郁、肖三、刘亚楼、李天佑、高自立、滕代远、陈昌浩、林彪、康生、许光达、杨至诚、孔原、冯铉、朱德海、江泽民、王弼、曾三，还有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电影艺术家袁牧之，文学家茅盾、张仲实等人。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还接待过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从苏联经中国回国时，办事处接待了他，并护送其安全到达延安。还有日本共产党主席冈野进（野坂参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阿里亚汗。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随周恩来等同机到达兰州并一同去了苏联。

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

由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积极认真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甘肃国共合作的局面形成，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出现高潮。许多国民党党政人士和进步人士，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局出发，真诚团结抗日的光明磊落的举动，看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希望自己的子女参加革命；同时一批抗日救亡团体中的骨干力量和进步学生，在党的影响和教育下，通过抗日救亡运动的实际锻炼，觉悟进一步提高，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迫切希望参加革命。为了满足进步青年的要求，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决定，从中选拔一批送往延安。1937年秋，以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名义，在兰州散发了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和陕北公学（陕公）的招生简章，许多青年踊跃报名。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通过办事处和工委推荐选送，前往延安参加革命的进步青年约300人，仅1938年5月至8月就有30多人。新一军军长邓宝珊的女儿，杜汉三的女儿、儿子，省参议杨干丞推荐的青年，都是通过办事处和工委安排前往延安的。在这批青年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各级党政负责人，有些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接转军事物资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各种物资，包括飞机、汽车、枪支、弹药、汽油、被服等装备数量很多，但是，几乎全部被国民党所接收。1937年9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专门成立了军事运输处，并从新疆开始，沿途各地均设立了接待站，负责此事。为了防备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接受苏联援助而发展壮大，国民党对于苏联援华物资，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控制极为严格。1937年12月，蒋介石曾亲自下达手令，责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无论飞机、汽车或货物到兰后，必须由战区司令部接收经营，向各地运出必须请示于中正许可后，方得放行。如其有欲飞向陕北或运往陕北之飞机物品，更非得中正之许可与中央之护照，切勿擅自放行。"[①]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八路军还是从苏联方面获得了医药等物资的援助，特别是通过与新疆盛世才的合作关系，新疆人民支援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物资不断运到兰州，因而，转运物资

① 中共兰州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兰州历史》上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也成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重要任务。这些物资经由西兰公路东运，必须经过陕甘宁边区管辖的陕甘交界的长武县境内，汽车到达时，将货物移交给在当地驻防的八路军，再转运往延安。每次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都事先联络妥当，并派人带路护送。

1938年，苏联共产党送给中国共产党一批医药、书籍、自行车等被送往陇东边区；1939年6月，由苏联赠送的各种书籍5卡车，包括《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问题》、斯大林《论民族主义问题》等，经兰州转西安送往延安。从1937年11月开始，新疆各族人民支援八路军的物资不断运到兰州，时任新疆督办公署上校参谋的共产党员韩光，两次押运物资到兰州，一次是包括苏联援助的药品在内的物资，一次是两次返回时都带走办事处安排的一批赴疆人员；滕代远带来的高射机枪、子弹、西药12卡车；高自立带来的皮衣、军火10车，还有新疆任副官运来的皮衣等，经办事处运往陇东交给八路军第三八五旅；新疆人民和爱国人士支援八路军和边区的3万件羊皮大衣，用骆驼长途运到兰州后，由于数量较多，办事处全体行动，加班加点，租用了数十辆大车运到陕甘宁边区。

保持与苏联兰州代表处的密切联系

抗日战争开始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真诚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就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尽力支援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与苏联驻兰代表处之间有着很好的关系，通过苏联代表处，沟通中共与苏共、第三国际的关系，传递党的文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互通情况，提供相关资料，负责来往于中苏之间和新疆的人员、物资的转运工作。八路军办事处是公开、合法的军事机关，可以和苏联军事代表处公开接触，直接联系和办理各项事务，参加苏联代表处举办的友好活动和节日招待会等活动。为了便于联系和及时传递信件，办事处还安排了人员到代表处担任中文教员。办事处没有电台，有时还利用代表处的电台与党中央进行联系，伍修权处长有时还帮助代表处翻译一些资料。在人员和物资的接转中，很多次都是办事处通过代表处安排，乘坐苏联的飞

机和汽车往返。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前往苏联时，经办事处联系，苏联代表处及时报告苏共中央安排飞机，并用代表处的轿车护送他们到机场。有时等待适当的飞机与汽车需要时日，办事处就利用这些时间组织大家开展活动，进行学习。周恩来在兰期间，接见了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和南开校友、时任甘肃民政厅厅长的施奎龄，对他们进行了工作；为办事处和地下党的同志作报告，讲解国际形势、统一战线和党的任务，并与苏联代表处就抗日战争发展趋势交换了意见，研究了双方联系的办法等事项。有的人需要等得时间更长，办事处就组织他们学习俄语，伍修权就是最好的教师。

1939年1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统一战线，办事处的工作遇到了困难。为了保证过往人员的安全，在苏联代表处的帮助下，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有时从苏联回来的人员到兰州后，先隐蔽在代表处住处，与办事处约好时间后，由代表处用汽车将人送到办事处大门口，借用汽车的遮挡，车上的人迅速跑进办事处，有时代表处将人员送到城外约定的地方，车上的人下车后，再跟随在那里等候的办事处的同志进城，装作互不相识，走到办事处门口时闪身进去。随后，办事处为他们更换八路军军装，给一个适当的军衔，使他们有了合法的身份，再寻找机会送他们离兰。由于国民党不检查苏联车辆，有时办事处就为他们联系，乘坐代表处的汽车前往西安。这期间，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与苏联兰州代表处建立了密切友好的关系，代表处为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开辟地下交通线的努力

1939年10月，中共甘肃工委代理书记罗云鹏前往延安，参加中共西北工委召开的会议。会议对中共甘肃工委前段工作进行了讨论，根据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日益加剧的形势，指示工委注意改变工作方针，采取措施开展秘密活动。罗云鹏回兰后，积极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为了能够多渠道与党中央保持联系，在继续通过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与党中央联系外，决定再开辟一条从兰州到延安的地下交通线。建立地下交通线的任务由工委委员兼靖远县县委书记郑重远负责。经过郑重远等千里跋涉，依靠群众，实地勘察的不懈

努力，一条从兰州经靖远、海原、固原、庆阳到延安的地下交通线，于1940年初开通了。党中央的指示和工委的信件，通过交通员王泽喜等不断传递于兰州与延安之间。只是，由于1940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遭到破坏，影响了这条交通线。

1941年2月，原中共甘肃工委委员王实先，受中央农委任弼时、李富春的指派，回到甘肃，准备开辟一条从兰州经新疆进入苏联的国际地下交通线，以便多渠道沟通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按照计划，将在沿途选择一些掩护身份比较稳妥、地位较高、便于工作的党员，设立联络站、转运人员、物资和情报，并设法利用公开、合法的电台为我们服务。经过王实先的艰苦工作，在第八战区、酒泉、安西电报局、玉门油矿、甘肃公路局等地方和部门建立了相应的关系。后来农委又派王实先、李申、杨刚等人，来甘肃进一步落实建站工作，使国际交通线的建立基本就绪。遗憾的是，1943年7月，王实先在延安被陷于"红旗党"的冤案之中，致使这条交通线尚未发挥作用即告中断。

1939年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在陕甘宁边区周围设立防线，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打破顽固派的封锁，在平凉地区，中共平泾工委、新区工委和后来的中共平东工委先后在镇原新城、三岔、马渠等地建立了秘密交通线和联络点，承担一些与兰州、西安、重庆等地的联络和部分物资采购、护送出入延安人员的任务。

四、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

（一）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民党顽固派压制和破坏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10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而集中主要力量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在日本的政治诱降下，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一批亲日派官员公开投降日本；蒋介石集团也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限共”、“防共”、“溶共”方针，设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公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从1939年到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先后掀起了以进攻抗日根据地，消灭共产党、消灭抗日武装为目的的3次反共浪潮，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破裂，葬送抗日战争胜利前途的严重危险。

抗战一开始，国共两党就存在着两条抗战路线的分歧。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洛川会议，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动员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国民党实行的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反对人民群众参加的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形成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扩大，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以及全国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国民

党的片面路线造成了大片国土的沦丧，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遭到压制和打击。1938年8月，正是日军五路进攻武汉，人民群众正在为保卫武汉而行动起来之际，国民党却以武汉卫戍总部的名义，发布了《民众团体战时行动规约》，剥夺了人民群众集会结社的自由，解散了一些救亡团体。与此同时，国民党又下令组织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和各地方的同类审查机关，规定除国民党机关出版物以外，一切图书杂志均需出版前审查原稿，借此打击进步言论。

长期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在抗战初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深入人心，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节节胜利，以及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合作关系，迫使他不得不勉强维持合作关系。1937年12月贺耀祖被调离甘肃，朱绍良接任省政府主席以后，甘肃抗日救亡形势开始不断恶化。朱绍良公开扬言："中国有两个敌人，目前有两个任务，就是抗战与防共，在西北防共更为重要。"[①]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朱绍良和他的继任者谷正伦的反共分裂的活动更进一步。首先，为加强反共力量，撤换了一批贺耀祖时期的省政府官员，改组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强迫公务人员加入国民党，使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原先建立的统战关系受到破坏。随之，压制抗日救亡运动，取消和破坏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以重新登记为借口，解散一些救亡团体。强迫一些群众团体并入甘肃省抗敌后援会，后来又以"内存不良分子，已被共党利用"为由，改组抗敌后援会，使其置于反动分子的操纵把持下。在学校实行法西斯训导制度，严格控制学生言行，禁止师生阅读进步书籍，不准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强迫学生集体加入三青团。第三，查禁进步书刊、报纸，迫使文化界进步人士离开甘肃。1938年3月，无理查封了深受群众喜爱的民众通讯社，改组了甘肃民国日报社。

4月，朱绍良指示第八战区、省政府、省党部等，联合组成图书审查委员会，查禁进步书刊、报纸，公然宣布80多种图书和20种刊物、报纸为禁品，其中包括《怎样组织义勇队》、《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战时妇女工作》、《战时农

① 中共兰州市委党史办公室、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八路军驻甘办事处》，1991年内部版，第40页。

民运动》、《中日问题讲话》、《抗战与外交》、《淞沪火线上》、《文学修养基础》和一些马列主义书籍等图书;《战号》、《西北青年》、《回声》、《老百姓》、《妇女旬刊》、塞克主编的《剧运》、萧军主编的《西北文艺》、《少年先锋》、《群众》、《救亡》、《全民》等刊物,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解放》、《抗战》等也在其列;查抄生活书店、兰州派报社,扣押邮件、邮包;禁演《放下你的鞭子》等进步戏剧。萧军、塞克等一批进步人士被迫相继离开甘肃。轰轰烈烈的甘肃抗日救亡运动一下变得冷冷清清。

中共甘肃工委遭到严重破坏

甘肃工委被破坏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甘肃的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进行反共活动,破坏共产党组织,搜捕共产党员,迫害进步人士。1939年5月,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召开"防止异党活动会议",决定"秘密组织各机关办公处专事对付异党",各党政机关清洗内部人员,一些原来与八路军办事处有来往的进步人士被撤职、调离,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也被视为怀疑对象被撤职。特务机关罗织黑名单,许多无辜的人们,被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被监视、迫害,甘肃呈现出一片白色恐怖的局面。

面对险恶的形势,中共甘肃工委根据党中央指示,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的措施。首先,将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表现较突出的群众领袖人物、身份可能暴露或引起反动势力怀疑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转移撤离,送往陕甘宁边区和延安,以防不测。第二,销毁有关机密文件,如名单、登记表等。第三,工委委员实行分散隐蔽,罗云鹏到天水,郑重远去靖远,林亦青前往徽县、陇南一带,以特派员的身份,巡视检查指导各地党的工作。孙作宾、王实先留在兰州坚守工作。1939年春夏,孙作宾奉调前往延安,由罗云鹏主持工委工作,罗云鹏回到兰州。

1939年5、6月,康生主持的中央社会调查部派人来甘肃进行组织考察。随后,康生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说党员丛德滋、于谦(千)是混进党内的奸细、特务,并由此论断甘肃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指令甘肃工委整顿组织。

为此，工委决定把审查党员、整顿和严密组织作为下半年的中心任务，制订了计划。对党员逐个审查，对丛德滋、于谦等被点名的“奸细分子”或只因家庭出身不好，或在国民党机关中有职位或是曾在国外留过学等原因，被认为是政治上“严重不纯的投机分子”，全部割断关系。在整顿过程中，停止组织发展工作。这次整顿在康生的干扰下，给甘肃党组织的工作造成很大损失，失去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党员，到1939年年底，中共甘肃工委只剩下143名党员，比上半年减少了45.8%。1939年5月，于谦被“调”到延安，1943年被冤杀。丛德滋与党失去联系后，仍坚持工作，1941年被敌人逮捕，坚贞不屈，1942年4月19日，不幸在狱中病逝。

1940年1月，党中央调李铁轮来到兰州任中共甘肃工委书记。6月初，工委准备在周家庄2号罗云鹏的住所召开工委委员会议，因而分散在外地的委员陆续回到兰州。因罗云鹏家中地方较小，先期到达的郑重远和王实先，住在比较偏僻的中共兰州市委书记陆云龙家中，4日，从徽县和河口回来的林亦青、李铁轮住在罗云鹏家中。6日凌晨，兰州进行全市户口大检查，因李铁轮、林亦青没有申报临时户口，加上户主罗云鹏3人，一起被警察带走。天亮后，罗云鹏租房的保人、工委秘书赵子明和罗云鹏的夫人、共产党员樊桂英及出生仅8个月的女儿俐俐（罗力立）也被抓走。由于在搜身时，从罗云鹏的帽子里搜出了一张纸条，写着党员教育计划，他们的身份暴露了。敌人明知他们是共产党员，但顾及到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已深入人心，公开杀害共产党人必然遭到人们的谴责，就企图给他们加上汉奸的罪名加以杀害。罗云鹏等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决定公开身份。在一次审讯中，罗云鹏向敌人宣布“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了抗日救国，是无罪的！”在随后敌人的多次审讯中，被捕的同志们经受住了酷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严词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的罪行，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魁祸首，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

中共甘肃工委被破坏后，中共西北工委指示由郑重远暂时负责工委工作。1941年5月，郑重远去延安汇报工作，由罗扬实、吴治国负责工作。11月，罗扬实、吴治国被调往延安，至此，中共甘肃工委机关实际已不存在。

党组织的营救和狱中人员的英勇斗争

工委主要负责人被捕，使中共甘肃工委遭到严重的破坏。狱外的同志立即开展营救工作。郑重远、王实先一方面将情况报告给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并转告党中央，一方面通过交通员王泽喜和赵子明的妻子，设法与狱中的同志取得联系，了解案情进展情况，并送去食品、衣物和零用钱。开始时他们还想通过国民党上层人士营救，终因罗云鹏等身份暴露未能奏效。1940年7、8月间，王实先到延安直接向党中央汇报，请示营救办法，李富春听取汇报后，介绍王实先通过周恩来向重庆国民党中央交涉营救。党中央指示甘肃工委转告狱中同志：第一，中央正在设法营救，暂时不要采取过分激烈的斗争手段；第二，利用在狱中的时间，组织学习，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水平；第三，注意利用一切可能条件，锻炼身体，准备迎接更严峻的考验。狱中同志得到中央指示很受鼓舞，坚定了斗争的信心。

1940年秋，被捕的同志被转移到兰州郊外沈家坡警察局看守所，由于牢房紧张，除樊桂英母女外，他们4人关在同一间牢房内。利用这个机会，他们一方面分析组织遭破坏的原因，总结教训，进行自我批评，表示如有机会出狱，一定加倍努力工作，弥补损失。另一方面，大家意识到必须要有长期坐牢的思想准备，要有一套对敌斗争的策略和方法，决定在坚持立场和原则的前提下，在斗争的方式方法上可以灵活巧妙一些，并要保护和锻炼身体，保留革命的本钱。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捕的同志们意识到全国形势趋于恶化，被营救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必须做最坏的思想准备，同时，寻找机会设法越狱。

关押他们的牢房是由一座旧庙宇的门道改建的，其中一面墙是原来的木大门，大门外不远就是大路；此时又正值严冬，牢房内生着火炉，经过商量，他们把通火炉的铁条烧红，谨慎巧妙地在木门上钻开了一个一平方尺大小的洞。1938年春节正月初五的午夜时分，趁着看守们过年时的麻痹大意，李铁轮、罗云鹏、赵子明、林亦青4人顺利越狱。越狱后，在通往阿干煤矿的路上，不期与敌人的巡逻兵遭遇，4人跑散了。李铁轮、赵子明逃脱敌人的追捕，后

回到延安，而林亦青不慎摔伤腿，罗云鹏因道路不熟未走多远，两人不幸又被敌人逮捕。

1941年4月，罗云鹏、林亦青和樊桂英、罗力立母女，一起被投入设在大沙沟的秘密监狱。在这里，他们建立了以罗云鹏为首的秘密党小组，领导难友为改善待遇而斗争，团结教育了一批难友。1943年秋，年仅25岁的林亦青，因患病得不到医治而不幸牺牲在狱中。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2月25日，罗云鹏被敌人秘密杀害于沙沟监狱，刑前，他大义凛然地说“我生为共产党人，死为共产党鬼”，从容就义。始终未暴露身份而被释放的樊桂英，背着相依为命的女儿，历经千辛万苦，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在反共高潮中坚持斗争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坚持斗争

朱绍良接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以后，破坏了甘肃省抗日救亡的大好形势。而且对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活动，也进行监视、阻挠和破坏，在办事处周围布置了军警、特务。他们有的伪装成鞋匠、摊贩，有的开设饭馆，在办事处房后的城墙上，安置流动哨，对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特别的行踪进行盯梢。对于与办事处有过联系和接触的人，以各种罪名编造“黑名单”，准备随时加以迫害。1939年12月，朱绍良策划国民党军队制造陇东摩擦和阎锡山制造的“晋西事变”，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国民党顽固派借故制造谣言，攻击诋毁办事处。更甚者，顽固派还禁止群众给办事处供应粮食、蔬菜、水、煤等生活必需品。

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日救亡的行径，给八路军办事处在工作和生活上造成许多困难。但是，办事处在谢觉哉、伍修权领导下，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

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管朱绍良、谷正伦等破坏抗战初期办事处与上层人士的统战关系，但是，办事处始终与中层进步人士如杜汉三、第八战区经济委员张效良、亚欧航空公司技师樊景润、第二十六补训处医务处主任李干球等，以及广大群众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国民党顽固派禁止群众给办事处供应生活日用品的情况下，仍有不少群众不畏风险，不顾阻拦，设法送来粮油菜水煤，缓解办事处的困难。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解散抗日救亡团体的命令，尽量不进行公开的正面的对抗，办事处与中共甘肃工委一起，教育和帮助大家调整斗争策略，利用合法、官办的形式和组织，加以改造，掌握主动权，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使抗日救亡运动得以继续。对于顽固派无理查禁抗日进步书刊的行为，办事处和谢觉哉等一方面组织大家加强防范，巧妙周旋，一方面严正与顽固派交涉，揭露其破坏抗日、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新华日报》被查禁后，办事处还报告党中央，由周恩来出面直接交涉，迫使朱绍良不得不对《新华日报》等一些书报解禁。

继续保持与苏联兰州代表处的联系，保障国际交通线的安全。苏联兰州代表处作为一个外交机构，经常与甘肃党政军机关相互举办一些庆祝活动、宴会。1940年，朱绍良反共日甚，曾命令各党政军机关，不经外交手续不得与苏联代表处接触联络。但是，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与代表处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各种工作继续进行，特别是国际交通线长期承担着重要任务。这条国际交通线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才渐渐失去了作用。

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陇东摩擦。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陇东摩擦事件中，主要由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与甘肃当局交涉。1937年11月，谢觉哉就陇东问题与甘肃省政府谈判，商定了暂行边界划分办法，国民党却拖延执行，不断制造事端，还嫁祸八路军。办事处多次向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声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保持和平的立场，揭露发生摩擦的真相，使朱绍良只得承认陇东事件确系下属造成，表示以后不准部下乱动。

协助、掩护中共甘肃工委工作。在中共甘肃工委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办事处都予以很大的帮助、支持和指导，并肩作战。1940年6月，工委遭到破坏以后，王实先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在兰州的委员仅有郑重远一人，办

事处与伍修权帮助郑重远共同部署营救工作，进行转移人员和文件销毁等善后工作。又建议工委将工作重点向农村转移，进一步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避免了党组织进一步遭到破坏。

加强学习，严肃纪律，提高人员素质，应对复杂局面。办事处同志在险恶的环境中，尽职尽责，在完成各项任务的同时，还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学习，努力提高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他们制定学习制度和计划，规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一般情况下，每周学习3次，一次学习时事，阅读《新华日报》等党报党刊；一次政治课，由谢觉哉、伍修权讲党课，学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讲中国革命史、国际常识；一次文化课，学习语文和识字，一部分人还学习了俄语。由于白天忙于工作，学习基本上安排在晚上，一到时间，大家自觉地参加，谢觉哉、伍修权和大家一样参加学习。办事处人员无事从不外出，各尽其责，严守秘密，不询问地下工作人员的姓名、住址和工作。同志们同甘共苦，团结友爱，互相关心，因此，工作、生活虽然很艰苦，大家却觉得非常充实愉快。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奉命撤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民族危亡，加紧反共反人民活动，形势更加严峻。为了避免可能的损失，党中央指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做好撤退准备，根据情况发展和可能条件，如果东返困难，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将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人员向新疆转移，先静观国民党顽固派动静，何时行动，听候党中央命令。八路军驻甘办事处遵循党中央指示，一方面做好各种应急准备，进行革命气节教育，销毁文件、密码、电稿等，一方面坚守工作。由于党中央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国内进步人士和广大群众强烈谴责和国际社会的反对，蒋介石在政治上十分孤立，不得不对反共反人民的行径有所收敛。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全国形势有所缓和，办事处暂时不必撤退。1941年3月，党中央调伍修权回延安工作。5月，他带领办事处一些同志离开兰州。

伍修权离开兰州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规模缩小，仅留下副官、译电

员、通信员赵芝瑞、李培华、周铁群、张传叙、柳秀英5人，由副官赵芝瑞负责。1941年7月，共产党员高栋臣率领的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在重兵的“围剿”下，高栋臣等8人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办事处立即展开营救工作，赵芝瑞通过时任第八战区高参的杜汉三和邓宝珊的副官、共产党员王新潮等人，在第八战区医务室主任陈仲谋、第八执行部军法官蔡晓东等人的极力帮助下，将高栋臣营救出狱(后二次被捕遭杀害)。由于对国民党的残暴和无能不满，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1942年1月14日，由史鼎新发起，王教五、王新潮、杨可显、许青琪、刘余生、杨景周等甘肃省的一部分民主进步人士组成的西北民主政团在兰州成立。他们寻求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共产党员王新潮在赵芝瑞的帮助指导下，为这个组织拟定了十大政治纲领，指导他们积极开展活动。办事处还继续担负接转人员的任务，1942年1月，林彪从苏联返回延安途经兰州时，当时的情况已经非常紧张，办事处仍然设法安全护送过境。10月，希尧受叶剑英的委托前往甘南藏区开展工作，在办事处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后，去拉卜楞进行考察，为后来党在甘南开展工作做了准备。

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顽固势力大做文章，指示一些人以所谓“群众团体”的名义，叫嚣“马列已经破产了”，“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甘肃国民党当局指使一些人，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门前闹事，妄图摘取办事处的牌子。8月，《甘肃民国日报》连续发表反共社论，当局再次操纵一些“团体”和人，到办事处门前闹事。鉴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原定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考虑到形势的变化，1943年11月2日，党中央决定撤销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8日，办事处留守人员全部离兰撤回延安，结束了在甘肃6年零5个月的战斗历程。被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部”的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对甘肃国共合作局面和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甘肃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三）人民群众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武装斗争

西海固三次回民起义

处六盘山区的西（吉）海（原）固（原）地区（原属甘肃省，现属宁夏回族自治区管辖），是中国西北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五大分支中哲赫忍耶派回民聚居区。1939年到1941年间，这里先后爆发了3次回民自发性武装起义。

1938年初，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在西海固地区大规模修筑所谓“国防工事”，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企图使西海固地区成为防共、反共的“模范边界”。国民党驻军与地方政权、地主豪绅、反动宗教好乘机勾结，巧取豪夺。他们在西海固地区大抓民夫，无休止地摊派各种劳役，加捐增税，加上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歉收，使这里本来就十分贫穷的山区人民生活更加困苦，群众怨声载道。

更使回民群众无法容忍的是国民党的民族歧视政策。1938年12月底，国民党海原县县长贾从城在撰修《县志》时，把回民的“回”字写成“狗”字，公开侮辱回族人民。沙沟、白崖一带的回民立即联名上告。贾从城却带领百余名县常备队员，到上白崖子搜捕上书的群众，抢劫财物，强奸妇女。在这期间，又发生国民党士兵在黄庄集体强奸妇女，将猪肉挂在泉沟脑的清真寺内，在白崖石坡底村抓走回族农民等事件。这一系列暴行使回民群众愤怒到极点，他们以讲经传教的形式联络群众，决定奋起反抗。

1939年1月15日凌晨，在马国璘、马银贵、马少净、马喜春等人率领下，海原县沙沟、白崖、固原县红崖堡三处的回民群众同时举行起义。起义群众攻下民团团总、联保主任、恶霸地主的堡子，分粮分物，消灭了反动自卫队，起义初战告捷。在“反蒋抗日，寻找民族出路”、“杀贪官，灭土豪，打富济贫”、“自己武装自己，杀官劫库，除奸救民”等主张的号召下，起义部队在1月下旬已

扩大至八九千人，马国璘为海原地区起义军司令，马银贵为固原地区起义军司令。

国民党第八战区急调马鸿宾等4个师，从中宁、静宁、平凉三面前来镇压起义。起义军兵分两路，由马国璘率5000余人南下攻打隆德县城，不料被敌包围在隆德、固原交界的套马庄山梁上。经过一天激战，起义军在马鸿宾部当兵的马思义等人帮助下，冲出重围，退到偏城修整。固原地区的起义军3000多人，在马银贵等人的带领下挥师东进，在硝口击溃马鸿宾部一个团，后因攻打固原城未克，回到偏城与马国璘部会合。在偏城一带，起义部队镇压了一批作恶多端的保长，致使海原、固原、隆德三县的国民党保甲组织陷于瘫痪。

在武力镇压的同时，国民党还采用政治诱降手段，组成以拜伟为团长的“宣抚慰问团”来到固原，声称同意起义军提出的释放被捕人员，惩处贪官，免粮免款等7项条件，并利用回族人民虔诚的宗教信仰，高举《古兰经》起誓说，只要起义军放下武器，便既往不咎。起义军领导人未能识破敌人的诡计，谈判后将起义军解散。此时，国民党第三十五师等部队乘机进入海固地区，诱捕了起义领导人马银贵、马国凡等。1939年春，马银贵在固原被杀害，历时40天的第一次起义失败了。

1939年5月29日凌晨，西海固回民第二次起义开始。起义分别在王家新庄（红崖）、小坡庄、艾壕湾等5个地方同时进行。起义军提出“打倒欺回灭教的国民党，为死难的回民报仇”、“救国救民，受欺压的回汉人民是一家”、“回回单独组织自己的抗日武装”等口号。在马国瑞、马喜春的率领下，小坡庄起义群众全歼国民党军两个连，缴获全部枪支弹药。正在战斗激烈进行之际，突降大雨，起义群众撤出战斗，后到艾壕湾集中进行整编。此时起义军有4000多人，编为一个旅，下设4个团，马国瑞任司令，马喜春为旅长。

5月31日晚，起义军离开艾壕湾南下，计划到张家川大麻子山的密林中活动。6月4日晚，在固原县和尚铺与敌一个团遭遇，激战一昼夜，歼敌大部，起义军声势大震，人数扩大到1万余人。朱绍良唯恐起义军投奔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一面急调重兵围追堵截，一面又故伎重演，组织以拜伟为首的甘肃

省政府代表团，赶到北面河与起义军谈判。起义军领导人明知谈判有诈，却认为可以利用谈判使部队稍加修整，便同意进行谈判。谈判中起义军方面提出在陇东成立回民自治政府，给起义军配备装备给养，撤走国民党军队等3项要求。国民党谈判代表却以需要请示上级为借口，拖延时间。十多天后，国民党军队完成对起义军的合围，便拒绝了起义军提出的所有条件，动用十多架飞机，几十门大炮和数百挺机枪，组织整营整连的军队，向起义军坚守的北面河两岸山头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双方激战13昼夜，起义军伤亡3000多人，马国瑞、马喜春、马凤歧等领导人牺牲，余部1000余人，在马思义等人的带领下，乘夜从老龙潭方向突围。此时，起义军内部产生分歧，部队解散，第二次起义又失败了。

1940年底，马思义、冶老九、王登云等人，决定再次筹划起义。他们以打工、做买卖为掩护，发动群众，在白崖、红套、沙沟一带惩处了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反动自卫队队长34人，消灭了一批地主武装和国民党零星部队。国民党急调杨德亮部第四十二军前往镇压。

1941年5月3日，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偷袭了马思义等经常活动的上白崖子村，企图集体屠杀村民。马思义等决定立即起义，从下白崖子村向敌军猛攻，击毙敌团长，并乘胜追击溃退之敌，攻占了穆家营，解救了被囚群众，第三次起义首战告捷。

起义军很快就扩大到六七千人，编为1个团，24个营，马思义任团长。为了长期坚持斗争，起义军决定南下张家川，与那里的回民联合。5月中旬，起义军到隆德时已发展到两万之众。然而，到达张家川后，发现那里条件并不成熟，起义军继续南下。5月16日，起义军在大麻子山利用有利地形，伏击尾追之敌，歼灭第四十二军黄初飞团，击溃第一九一师两个团，歼敌900余人，缴获机枪50多挺、步枪800余支，起义军仅伤亡3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但是，此时南下道路已被敌人封锁，起义军只得北上回到西吉县境内。这期间，敌人又企图与起义军谈判，进行政治欺骗，遭到马思义严词拒绝。

5月底，起义军营以上指挥员，就今后发展问题在陈家大坪的土窝子举行会议，在马思义主持下，决定投奔陕甘宁边区。6月6日，部队开始北上，不料

在石蛤螨被敌两个师包围，在突围中，起义军损失很大，第三天上午冲出包围时仅剩五六千人。遭此挫折后，起义军内部发生分裂，一些领导人对去陕甘宁边区产生动摇，带领大部分军队返回西海固地区，最后遭到失败，马国璘于1942年4月被敌杀害。马思义率领500多人继续北上，于7月初到达陕甘宁边区。

起义军受到党和边区人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萧劲光、王维舟领导人接见了马思义，中共中央赠给起义军一面“浩气长存”的锦旗，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起义阵亡将士的悼念和对西海固起义的高度评价。1941年9月，起义军改编为回民抗日骑兵团，马思义任团长。这支军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绩。

甘南农民起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在坚持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的同时，对人民群众采取了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1943年，甘肃南部广大地区的汉、回、藏、东乡等民族10万群众，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揭竿而起，爆发了长达一年的武装起义。

早在1941、1942年间，进步人士史鼎新（曾任国民党西安行营少将参议）、王仲甲、肖焕章等人，就在兰州、临洮多次商议与卓尼县水磨川寺庙活佛、藏族领袖肋巴佛（经名金巴嘉木措、俗名康三哥）、康乐县回族领袖马福善，以及马子祥、李耀山、范大、王作宾、毛克让、王得一、毛德功等联系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

1943年1月10日前后，马福善、马继祖、吕百元、吕百林、边永祥和马木个等人，率领回、汉农民数百人，在临洮卧龙寺，喊出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口号，打响了甘南农民起义的第一枪。

国民党临洮县县长张德西和保安第四团，急忙派1个中队前往镇压。起义军从边家湾主动撤退，把敌人吸引到西坪，利用有利地形，向敌人发起反攻。这时在临洮牙下集一带活动的王仲甲、肖焕章等人，带领60多人前来支援，保安队大部被俘，中队长跳入洮河才得以逃脱。初战胜利鼓舞下的起义

军，在马福善、马继祖、肖焕章等的率领下，前往临洮牙下集、庙家山等地，消灭了恶霸地主王杰仁、沈进禄的反动武装，处死了王杰仁，夺取枪支，开仓济贫，穷苦百姓纷纷参加起义军。部队经整编后，成立了西北农民抗日义勇军，下辖两个团，马继祖任司令，刘财旺为回民团团长，肖焕章为汉民团团长。

国民党甘肃省保安司令部派保安处副处长胡统英率第十二师一部前往镇压。1月27日到达临洮，兵分3路向牙下集的起义军进攻。经过激战，起义军击溃敌军6个连后，向岷县、陇西、渭源、漳县一带转移，开展游击战。后马继祖部转战康乐、宁定等地，另一部由肖焕章带领回到牙下集，与王仲甲部会合，经整编成立3个团，王仲甲任司令，肖焕章、蒲万祥、何建吉等为团长。整编后部队转移到会川一带活动。

2月中旬，卓尼县水磨川一带汉、藏群众100余人，在活佛肋巴佛领导下，举起"饥饿团"旗帜，在临潭县冶力关起义，攻破临潭县城，杀死县长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起义部队迅速扩大到8000多人。

2月27日，临洮北乡毛克让率领100多名农民在马衔山起义，袭叶家坪飞机场，击溃守卫机场的保安中队，打死中队长；在新添镇袭击军火运输队，缴获军火两车；又在马继祖部的支援下，进攻青天镇保安大队，击毙大队长，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百余支。

3月，安华雄在皋兰率部起义，袭击了皋兰县管辖的西果园汽车站，缴获一批枪支和手榴弹等武器。同月，洮沙（今属临洮）杨华如率部起义，在安华雄部的配合下，在七道岭伏击押送壮丁的敌小股部队，缴枪百余支，解救壮丁数百人。

在这期间，临洮亮店的刘化一，南乡的李德旺，紫松乡的刘鸣、通渭的王子元，陇西、渭源的毛德功、郭化如，榆中的黄作宾、水振东等也先后率众起义。

从1943年1月到3月，农民起义席卷甘肃南部的临洮、康乐、陇西、宕昌、会川、渭源、临潭、卓尼、武都、岷县、礼县、和政、洮沙、西固（今舟曲县）和定西、榆中、皋兰、武山、通渭等20余县，还波及兰州近郊的西果园、夏官营、阿干镇等地，起义军已达3.7万人，有各种枪2000余支，相继在临洮漫山、榆中

新营镇、陇西首阳等地会师，并推举毛克让为总司令，王仲甲、马继祖为副司令。

4月，起义军100多位领导人在岷县申都、闾井举行会议，作了4项重要决定：起义军的名称统一为甘肃抗日救国义勇军；设立集团军总司令部，下设路、旅（团）、营、连，起义人员一律佩戴红色臂章；开展“抗兵抗粮”、“分粮食，打富济贫”、“打倒土豪劣绅”等活动；南下松潘茂州割据待机而动，由马继祖率部分起义军，向会宁、海原、固原等回民集聚区行动，联络回民群众，并向陇东发展，沟通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

起义军南下过程中，在岷县蒲麻与肋巴佛率领的2000名藏族起义军会师，起义军又推举肋巴佛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司令。接着又在武都县境内与刘鸣和张英杰部会师。随后，起义军领导人举行会议，决定将起义军的名称改为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张英杰总司令，王仲甲为副总司令，刘鸣为参谋，下辖3个路军和一个师（武都起义的王得一部到达后又增编一路），肖焕章、何文保分任第一、二、三路军司令，肋巴佛任番兵师师长。会议还决定起义军向武都、成县、康县等地进发，攻战武都，控制陇南。

6月，起义军两次攻打武都县城未克，遂撤回草川崖一带，这时马继祖、闵福元、黄作宾、杨华如、毛克让等部向海固地区发展受阻，南下向王仲甲部靠拢，起义军约12万之众齐聚陇南，发展到鼎盛时期。

甘南农民起义使国民党政府极为震惊，先后调遣正规军2万多人、地方部队8000多人和一个空军中队前往镇压。6月中旬，起义军在武山滩歌镇一带与敌交战，损失较大，渐渐不支，便分散撤退。王仲甲、杨华如部撤向洛门；马继祖、肖焕章率部撤向临洮；刘鸣部撤过洮河，分别与敌人展开激战。失去统一指挥和联系的各路起义军，人数虽多，武器却很差，在与武器精良的国民党正规军交战中处于劣势，先后失败。起义军领导人刘鸣、张英杰、黄作宾、王作宾、赵寿山、张守礼、董含贞等先后被敌人杀害，轰轰烈烈的甘南农民起义失败了。

甘南农民起义是甘肃近百年革命斗争史上，声势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起义。起义失败后，许多人仍坚持着斗争。1944年，肖焕章、毛得功、郭化如、

杨友柏、肋巴佛等人带领数十人，组成地下武装，一直坚持到1946年解放战争时期，成为中共陇右工委领导的地下游击队，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中共甘肃工委、中共陇东特委的紧密配合，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展上层人士工作，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局面的形成；积极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开辟和利用国际交通线接转党的干部和转运各种物资；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和发展甘肃经济文化等方面，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任务。

这一时期甘肃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和此前其他时期党在甘肃的工作相比较，有着明显的特点。首先，从领导关系上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甘肃工委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从工委的成立、工作的部署和主要干部的调配，都是由党中央直接安排。第二，甘肃省和甘肃党组织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得到提高。抗日战争前期，考虑到一旦日军攻陷西安以后形势可能发生的变化，作为抗战后方的甘肃省在战略上便有着重要的地位，必须大力经营；同时，甘肃在苏联援华物资和中苏之间人员交往的国际交通线的开辟、保护其安全畅通方面至关重要，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设立、苏联兰州代表处的建立，都是采取的重要措施，甘肃国民党当局在抗战初期比较合作的表现也和这种形势不无关系，加上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所承担的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等繁重任务，因此，党中央十分重视甘肃地下党的建设和发展。第三，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相互配合，复杂艰巨的上层工作和深入细致的中下层的群众工作优势互补，使党的工作迅速展开，抗日救亡运动的局面迅速出现。

甘肃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暴露出一些值得总结的教训，例如，有些同志秘密工作的经验不足，在工作顺利的时候，往往表现出自满情绪，过于暴露自己，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在组织发展中，有些地方过快过急，造成一些党员质量不高；特别是必须防止来自党内的错误给党组织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干扰和损失。丛德滋、于

谦事件和“红旗党”冤案，都使甘肃力量受到损失，党的工作遭到破坏。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

这一时期，由于敌人的破坏和党内错误的干扰，1940年6月以后，甘肃国民党统治区各地党组织处于长期埋伏状态。但是，从1937年7月到1940年6月的几年中，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奠定的良好基础，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党在甘肃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五、陇东军民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摩擦的斗争

（一）战略相持阶段陇东地区的态势

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密划“防共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陇东地区的国共两党在合作抗日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在陇东地区一度曾形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良好局面。但是由于国民党在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片面抗战路线，没有放弃限制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力量发展的方针。因此，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在陇东地区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企图削弱共产党的抗日力量，限制人民的抗日和民主活动，使陇东国共合作的局面开始出现裂痕。

1938年2月，当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不久，国民党甘肃省政府通令陇东各县不得与边区政府发生关系。4月，为限制甘肃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下令查禁了60余种进步书籍和十几种进步报纸杂志，以此来封锁抗日进步思想在甘肃人民中传播，并指示陇东各县对八路军部队派员进行民运工作进行种种限制。11月，国民党镇原县县长邹介民秉承甘肃省政府的旨意，极力限制共产党领导民众的抗日活动，强行解散了镇原各地的抗日后援会、农会等团体。国民党庆阳县县长下令解散各地群众抗日组织。国民党宁县县长取消救国会，不准人民成立“抗日后援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对此种有损于两党合作抗日的行为，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却给予嘉奖，称赞说：“该县

长所陈限制共产党活动范围，以免扩大赤化一节，颇有见地。"[①]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开始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在国民党召开的五中全会上秘密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设立"防共委员会"，随后又秘密颁布《共党问题处理办法》等防共、反共的文件，其目的是要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政组织。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积极推行国民党顽固派的方针，把"防共、限共、溶共、反共"列入施政首项任务，开始在陇东地区密划"防共线"，有预谋地策划摩擦事件，企图取消共产党领导的陇东抗日民主政权和赶走八路军陇东驻军。1938年11月1日，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复电镇原县县长邹介民，指示对八路军在该县进行民运工作和建立的抗日群众团体，"随时派员严密监视"，并"制止或解散之"[②]。为对付八路军陇东驻军和陇东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国民党甘肃省政府还专门规定所谓的"八项方针和十二项原则"，其要点是："边区组织在未奉中央命令及正式委派负责人时，应认为非法，不予承认"；"县境驻有八路军地带，应严加监视，并随时注意其行动"；对军进行民运或其他工作，要"严密监视"，"竭力防范"，"以咨抵抗"等。[③]据此，国民党甘肃当局开始在陇东地区秘密划"防共线"，进行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共分裂活动，并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向陇东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陇东地区的反共分裂活动的局势日益加剧。

1939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派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在边区周围地区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至黄河修筑了5道封锁线，妄图置边区于死地。国民党中统局设立"陇东包围区调查统计室"特务组不断派出特务潜入陇东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在军事上，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公开袭击八路军驻地，非法拘押八路军民运工作人员。先后调集一六五师、一九一师、预备第七师等部队，重兵包围和封锁陇东抗日根据地，对八路军驻军步步进逼。为配合国

① 丁雍年等：《陇东的两次反摩擦斗争》，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②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上），1992年编印，第197页。

③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上），1992年编印，第197页。

民党军队的武装挑衅行动，国民党甘肃省第三行政区专署专员钟竟成，下令各县县长公开破坏抗日民众组织，公开破坏八路军开展的民运工作，扣押和封锁八路军军粮。在经济上，对陇东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国民党政府命令第一战区经济委员会拨专款400万元，在西峰等地大量抢购物资，封锁交通要道，封锁和限制物资进入陇东抗日根据地，给根据地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

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对陇东根据地划定“防共线”，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进攻加剧，陇东地区反共摩擦事件接踵而来，国共合作抗日局势日益恶化。1938年12月，国民党甘肃省第三专区专员钟竟成赴庆阳城，向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提出归还庆阳县城、改编抗日民众自卫军为国民自卫队等的无理要求。遭到严正拒绝后，钟竟成即指使其人员在国民党办的《新陇东报》上发表反共文章，中共庆环分区党委机关报《救亡报》撰文予以严正批驳。紧接着，驻防陇东的国民查一六五师鲁敏团突然侵占八路军七七〇团在白马铺、赤城一带的驻防地，扬言要消灭驻防陇东的八路军，公然挑起陇东事件，陇东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39年1月，国民党镇原县县长邹介民在召集群众大会上公开进行反共宣传，威吓群众说接近八路军就是汉奸。并捕押八路军民运工作人员多人。1939年4月初，国民党庆阳县政府强行解散庆阳县驿马关南沟子自卫队和农会，逮捕农会主任赵玉海；派出特务便衣队百余人，潜入根据地劫杀边区工作人员，并利用土匪张金卯等组织的黑军在陇东根据地杀家劫舍，制造混乱。紧接着合水、正宁、宁县、环县等各县的反共摩擦事件也相继发生，陇东地区形势严重。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地区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就达70余起。

国民党顽固派并不满足于制造一般的反共摩擦事件，他们继续推波助澜，力图使事态进一步扩大，从而达到限制和取消陕甘宁边区的阴谋。1939年3月10日，国民党甘肃省民政厅厅长施奎龄给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的签呈中说：“本厅认为对于陇东纠纷，应力使其地方化、严重化，……迨事态扩大，则声请中央制止。……共产党必将俯首听命，如不顺从，则中央即有词可依据制裁”。朱绍良对这一阴谋十分赞赏。3月13日和5月2日，朱绍良先后两次

密电国民党中央，策划挑起反共摩擦事端、将八路军赶出陇东的阴谋。他建议由国民党陇东驻军、保安部队和地方民团挑起事件，扩大事态，然后由国民党中央出面将八路军调离陇东，如“八路军反抗调防，则以武力制裁”。朱绍良策划挑起反共摩擦事端的主张深得蒋介石的赞许，5月31日，蒋介石复电称“所授第三区专员应付八路军相宜甚妥，仍希饬体力行”[①]。这样，由国民党顽固派有计划、有预谋在陇东挑起和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就在所难免了。正是在此情形下，陇东地区的摩擦活动愈演愈烈，逐渐升级成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1939年4月和12月，先后挑起两次大规模的武装摩擦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和军事挑衅，中共陇东各级党委、民主政府和八路军驻陇东留守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陇东工作应在不破裂整个统一战线的总原则下，扩大独立自主的工作精神”的指示，[②]积极进行说理斗争，以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团结抗日、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积极态度置若罔闻，置之不理，继续公开进行反共摩擦活动。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地区公开建立“防共线”和制造摩擦活动，中共陇东各级党委、民主政府和八路军驻陇东部队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

陇东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25日，按照国共两党双方的商定，中共中央军委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作战。同时决定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部及第七七〇团等部队留守陕甘宁边区，以保障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全。9月，在延安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12月，留守陕甘宁边区的各部队进行整编，

①丁雍年等：《陇东的两次反摩擦斗争》，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

②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上），1992年编印，第59页。

统编为留守兵团警备第一团至第八团，以及三八五旅第七七〇团，其中第三八五旅旅部和第七七〇团、警备第七团、第二团先后驻防陇东地区。

1937年10月下旬，八路军第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副旅长耿飚率领旅部和第七七〇团驻防陇东，旅部及其直属部队400多人进驻庆阳县城。第七七〇团所辖第一营400余人，驻合水县城；第二营400余人，除1个连暂驻正宁县城外，营部及其余4个连驻宁县县城；第三营500余人，驻守镇原县城。第七七〇团团部及直属部队驻守驿马关、赤城一带，团长张才千，政委肖元礼。1938年夏，留守兵团警备第七团转隶三八五旅，先后驻守曲子、合水、宁县等地。1940年春，警备第二团转隶第三八五旅，驻守环县、曲子等地。驻守陇东的八路军留守部队，不断加强政治建设和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加强军事训练和文化学习，开展生产自给运动，打退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军事摩擦活动，在保卫和巩固根据地的对敌武装斗争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陇东根据地除驻有八路军正规部队外，还组建有地方保安部队。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各县成立保安队或保安大队，各分区设立分区保安司令部。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随之成立；王世泰、吴岱峰先后任司令员。1940年8月，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合并于陇东分区保安司令部，吴岱峰任司令员。陇东根据地各县先后成立保安大队。除此之外，又先后成立陇东回民骑兵团、陇东独立营、关中回民支队、陇东分区警卫队等地方保安部队。1941年1月，陇东分区保安司令部撤销，第三八五旅兼陇东军分区，旅长王维舟兼陇东军分区司令员。陇东根据地的地方保安部队不断加强政治、军事、文化建设，在配合八路军部队保卫和巩固边区的武装斗争中，积极开展反特肃匪，维护根据地社会秩序，保卫根据地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为维护和促进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为营造全民族抗战的社会环境，陇东根据地除驻有八路军正规部队、组建有地方保安部队外，还组建有从根据地各村、乡、区到县的各级民众抗日自卫军。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规定“抗日自卫军系边区内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抗日武装组织，同时是抗日的后备军”，

“凡边区的劳动公民自愿执行抗日自卫军的任务与遵守抗日自卫军的纪律，年龄在18岁以上45岁以下身体强健者，均有加入抗日自卫军的光荣权利。”[①] 在分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加强抗日自卫军的建设，陇东各县普遍建立从区到县各级抗日自卫军，仅合水县的抗日自卫军就发展到3000多人。抗日自卫军自上而下地建立了军事指挥系统，村设班或排，乡设连，区设营，县设自卫军大队部。1937年12月，庆环分区结合抗战动员工作，整理与扩大自卫军，全分区（不含华池县）共扩大抗日自卫军11629人，编为80个连、231个排、863个班。

陇东根据地的抗日自卫军是组织起来的、群众性的、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平时执勤放哨，劳动生产，战时配合八路军部队和地方保安部队作战。自卫军经常利用农闲和冬闲进行军事训练，每人都备有一件土枪、大刀、长矛等旧式武器，以及经常备有担架、毛驴车等运输工具，随时准备参加战勤工作。陇东、关中党组织以自卫军为骨干成立除奸委员会38个，锄奸小组2245个，成员有4822人。自卫军积极配合了八路军部队、地方保安部队保卫和巩固根据地的军事斗争，特别是在反特肃匪除奸、维护社会秩序、反摩擦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1937年11月，曲子县自卫军破获反动分子破坏抗日的反动组织“一心堂”；固北县自卫军破获汉奸特务进行破坏抗日的“义和团”反动组织。1939年3月，镇原、合水、环县等县的抗日自卫军，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摩擦的斗争。自卫军在保卫陇东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中，为巩固和维护根据地的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陇东根据地抗日武装的建设，形成了八路军留守部队、地方保安部队和群众武装抗日自卫军三种抗日武装相结合的军事武装体制，在对敌斗争中协同作战，极大地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使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陇东根据地人民抗日武装在反摩擦斗争，维护社会秩序开展拥政爱民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有力地支持了抗日前线工作。一支强大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既是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活动进行斗争的主要力量，又是

① 甘肃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7页。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保卫和巩固陇东抗日根据地的坚实支柱。

（二）陇东根据地的反摩擦斗争

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陇东各级党组织始终把维护、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作为建设和巩固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基础，为维护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对于实行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族抗战一开始就缺乏诚意，并没有放弃限制和消灭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采取军事上包围、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并不断地制造反共摩擦事件。抗战开始后，陇东各级党组织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领导陇东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设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但在1938年夏季，由于党内王明的右倾投降错误对陇东根据地的影响，使党在统战区的民运工作发展一度出现低潮，党的组织也受到一定损失。同年秋，中共庆环分区党委在曲子召开扩大会议，纠正党内右倾投降错误在陇东的影响，明确认识到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才能维护和统一战线。会后，陇东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恢复和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众组织，开展抗日民众运动。如在同年12月2日，庆阳县召开各界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庆阳县民众抗敌后援会，共产党方面派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抗大三分校校长何长工为代表，国民党方面派庆阳县党部书记刘谦、庆阳县县长王致云为代表，共同监督大会选举，民主选举出姚静波、阎庆云为庆阳县民众抗敌后援会正、副主任。

为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陇东根据地党和政府同国民党甘肃省地方政府破坏团结抗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8年冬，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在属于边区行政管辖范围的环县甜水堡设立县政府，任命原国民党庆阳县党部书记刘谦为环县县长，刘谦竟委任土匪头子赵老五（赵思忠）为环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他们在环县洪德区强行编制保甲，统计户口，张贴反动标语，并勾结股匪耿子平、陈彦科等，在虎洞子区抢劫群众，破坏社会治安。中共庆环分区党委派分区保安部队一部开赴环县，与环县保安大队协同防范。为维护边区行政的统一，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发出通电，提出质询，严正指出“环县久属边区辖境，县政完备，民情安谐，不料该刘谦此次竟勾结赵思忠股匪潜入边区，号称伪环县县政府，张贴布告标语，强编保甲，显系有计划进行破坏边区之活动，捣乱后方治安，破坏团结抗战”。并要求国民党甘肃省政府“迅予追查、严行惩办”[①]。直至1940年2月，赵老五这股受到国民党地方政府庇护的政治土匪被彻底剿除。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后，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制造的反共摩擦活动更加频繁。为维护抗日民族一战线，共产党为此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这样便形成国民党顽固派限制抗日、破坏统一战线和共产党坚持抗战、维护统一战线的对立和冲突。从1938年底开始，陇东国民党地方政府和驻军进行反共宣传，禁止群众抗日救亡活动，向八路军驻军挑衅，扶持和唆使政治土匪烧杀抢掠，频繁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直至发展成为1939年春和1939年12月在陇东发生的两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下，陇东各级党委、民主政府和八路军驻军部队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带领根据地人民同国民党顽固派对陇东根据地实行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挑起的反共事端、制造的分裂摩擦等行径，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以保卫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

①《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关于刘谦等成立伪环县政府破坏边区行政系统的代电》，载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陇东的军事斗争》（上），1992年编印，第74页。

战线。

第一次反摩擦斗争

1939年春夏间，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镇原、宁县制造事端，挑起了第一次陇东摩擦事件。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分裂和军事挑衅行动，为维护陇东地区国共合作的局面，坚持团结抗战，陇东各级党委、民主政府和八路军驻陇东留守部队，坚持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原则，领导和组织陇东抗日军民展开反摩擦斗争。

1939年4月8日，八路军第七七〇团第三营教导员和两名通讯员在庆阳县被国民党保安队捕去，羁押在国民党西峰专署。同日，国民党西峰专员公署派遣保安队一个中队在屯字镇、南三镇扣押八路军民运工作人员7人。八路军三八五旅当即向国民党西峰专员公署质询，并电告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提出抗议。4月10日至12日，八路军三八五旅第七七〇团10多名指战员被国民党镇原县保安队先后绑架关押。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数次挑衅，八路军第三八五旅在向国民党陇东地方政府急电抗议无果的情况下，于4月9日晚，派人将国民党镇原县太平镇区公署的9名人员、南三镇警察队长等人扣押，以示警告。4月18日，朱绍良密令第一六五师师长王治岐派兵前往镇原“驻防”，该师即派兵会同国民党西峰专员公署调集的保安队900余人，向镇原县开进，对驻防镇原县城的八路军七七〇团第三营采取包围态势。4月21日，朱绍良密调国民党第一六五师一个营及西峰保安队百余人抢占镇原县太平镇。国民党镇原县长邹介民带领大小官员秘密出城，驻扎在内的县保安队为使围城部队混入城内，随后也以“打野外”为名出城。驻防的八路军七七〇团第三营识破国民党顽固派阴谋后，即关闭城门，严密防守，交涉解决争端。4月24日下午，镇原县城外国民党保安队向城内射击挑衅，八路军驻防部队力避冲突，未予还击。当晚12时，城内的国民党保安队20多人伙同常备队60多人，为策应城外国民党部队攻城行动，突然袭击西城门八路军驻防部队。八路军第三营当即被迫奋起反击，将其大部俘虏，缴获枪械42支。国民党方面置八路军抗议不顾，继续调兵攻城，兵力多达3个团，形势异常严

峻。八路军驻防部队全体指战员坚守城堡,严阵以待,听候解决。

在镇原县摩擦事件发生的同时,爆发了宁县事件。1938年底,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公然威胁八路军驻军警备第七团第一营撤出宁县县城,并要求接管抗敌后援会等群众抗日团体,遭到严厉拒绝。1939年春,国民党第一六五师的3个骑兵连突然开至宁县城郊,随后,国民党第一六五师2个团也分别开至宁县县城附近的南山庙咀子和五里铺,对八路军警备第一团第一营形成包围之势。八路军驻军部队严阵以待,做好防卫准备。4月29日夜,国民党宁县县长方镇武率保安队200余人及壮丁队500余人,突然向宁县县城八路军驻军发起袭击。八路军自卫反击,经过一夜激战,将敌击溃,夺取了顽军占领县城的所有碉堡和东、西、南3个城门,并将县长方振武及其残部70多人围困在县城辑宁楼上。这次战斗俘获国民党400余人枪。

镇、宁事件发生后,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按照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指示,为制止摩擦,团结抗战,分别致电蒋介石、朱绍良等人,说明事件真相,要求双方派代表调查处理。1939年5至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留守兵团派王观澜等人为代表,国民党甘肃省派少将参议谭季纯等人为代表,双方先后在驿马关、庆阳县皇城等地进行谈判,双方于6月29日签署了《镇、宁两县事件解决办法》。依照双方协议,八路军守镇原、宁县两县的部队打开城门,交还缴获的枪支弹药,释放被俘人员。7月1日,国民党甘肃第三行政区保安部队撤离镇原、宁县。2日,国民党第一六五师撤回西峰、肖金等原防地,国民党镇原、宁县县长返回县城行使职权。镇、宁两县遂恢复原状,第一次陇东摩擦事件得到初步解决,以国民党顽固派的失败而暂告结束。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向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发电,望朱对达成的协议"鼎力维护,使得公平解决,以利团结,是以为幸"[①]。

第二次反摩擦斗争

第一次摩擦事件后,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避免摩擦事件再度发生,维护国共两党在陇东地区合作的局面,驻守陇东的八路军第三八五旅旅长王维

①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陇东的军事斗争》(上),1992年编印,第79页。

舟、副旅长耿飚即向国民党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提出《陇东纠纷第二步解决之意见》，希望与其通力合作，团结抗日。然而国民党陇东当局对此置若罔闻，毫无解决陇东纠纷的诚意，继续策划制造新的反共摩擦事件，使陇东局势一直不能缓和。1939年冬，国民党在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甘肃国民党当局为配合全国的反共高潮，于1939年12月，在陇东又制造了一场规模更大、后果更为严重的第二次摩擦事件，企图消灭或赶走陇东的八路军驻军，搞垮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所属陇东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第二次陇东摩擦事件从1939年12月开始至1940年春结束，先在宁县爆发，并很快蔓延扩大到合水、庆阳、镇原、环县等地。

1939年12月10日晚，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率保安队，突然向驻守宁县县城的八路军警备第七团第三营发起袭击。战斗开始后，国民党第九十七师第五七八团和第三区行政专署派出的3个保安队昼夜开赴宁县增援，投入进攻。八路军驻军部队指战员奋起自卫反击，与进攻的国民党军展开激烈战斗，给予有力回击，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于12日突围出城。宁县县城被国民党顽固派占领。

12月12日，国民党合水县县长翟大勋率保安大队160多人，袭击八路军驻合水县城警七团特务连，八路军部队予以坚决反击。在八路军的打击下，保安队大部溃散，部分被缴械，县长翟大勋也被俘虏，国民党在合水的势力被“礼送”出境，合水县即告解放。当日，八路军第三八五旅接管国民党庆阳县政府等办事机关，捣毁其第三、第四区署，拘押两区联保主任、保甲长若干人，驱逐了国民党顽固派在庆阳县的势力。

12月14日晚，国民党镇原县县长孙宗谦指挥保安大队400多人，突然向八路军驻县城的七七〇团第二营发动进攻。八路军驻军部队奋起还击，很快占领了西城门，消灭了部分国民党军，其余全部被缴械。15日，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师步兵营和炮兵连纠集西峰保安队等围攻县城，八路军第二营沉着应战。16日晚，双方经过激烈交战，因敌众我寡，八路军第二营和中共镇原县委机关工作人员突围撤出镇原县城。镇原县城被国民党顽固派占领。

12月31日，国民党环县县长刘谦唆使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土匪头子赵

老五(赵思忠),率保安队和土匪武装150余人,并胁迫壮丁200多人侵入根据地洪德区,捣毁区、乡民主政府5处,杀害地方干部数名,还袭击环县抗日民主政府,遭到八路军环县保安队和警卫队的痛击。赵老五被打败后流窜于环县洪德、毛井、虎洞、耿湾等区乡,沿途烧杀抢掠,捣毁地方抗日政权,残杀干部和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环县事变"。在这次事变中,由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策反,车道、耿湾、虎洞、洪德、环城等5区的自卫军相继叛变。"环县事变"历时近1月,有5个区、21个乡的地方政权遭到破坏,4所学校被毁,47名区乡级干部被杀害,20多人被抓走,损失长短枪29支,5处合作社被抢,抢走公粮130多石,群众牛羊万余只,粮食财物计价数十万元之多,造成惨重损失。

为巩固抗战后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对于土匪武装赵老五所部及张廷杰叛匪,八路军陇东驻军予以坚决打击。1940年2月16日,边区留守兵团命令警备第二团和独立第五营进剿赵老五和张廷杰股匪,环县、华池县保安大队配合作战,并组织2000多名自卫军协同。2月27日,八路军剿匪部队攻克赵老五盘踞多年的甜水堡,毙伤及俘虏匪徒110余人,国民党环县县长刘谦、匪首赵老五及少数几名匪徒乘天黑仓皇逃往宁夏中卫,甜水堡获得解放,随即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张廷杰部被八路军打垮后窜入固原一带,受到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庇护。4月12日,张廷杰率国民党固原保安队偷袭环县毛井区,被八路军警二团一部击溃,其部大多数被俘或投诚,张廷杰只带个别惯匪西窜固原。从此,陇东根据地最大的匪患被剿除,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

第二次陇东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陇东地区的具体表现。在这次陇东事件中,国民党顽固派置民族存亡于不顾,调集部队,网罗地方顽固势力,疯狂进攻陇东抗日根据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次陇东摩擦事件开始后,八路军第三八五旅即向国民党甘肃省第三区行政专署提出抗议。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先后致电朱绍良、蒋介石等,指出:"我留守部队对于保卫河防边防,巩固抗战后方并无犯过,对于原定23县地区并未越出雷池一步",希望"主持公道,制止异动,恢复团结,勿使局部

事件日益扩大”[①]。1939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司令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八路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一方面向全国人民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地区制造摩擦事件的真相：“10日，九十七师千余人及保安队袭击宁县，我驻军罗营长受伤，兵士死亡过半；14日，九十七师2000余袭击镇原，我驻军王营死伤百余，两城均被九十七师夺据。现复集中准备向庆（阳）、合（水）进攻。”另一方面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南京政府以民族大义为重，“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明令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处理共产党实施方案》，制止军事活动，勿使局部事件日益扩大。”[②]八路军驻陇东各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顽固派的摩擦行动。在全国各界的谴责和边区政府、留守处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谈判。1940年2月，边区政府派谢觉哉为代表，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派保安处参谋长李学谟为代表，在西峰进行了长达20多天的谈判。但国民党方面毫无和谈诚意，寻找各种借口拒不接受边区政府代表谢觉哉所提的五项条件，谈判最终仅达成一项互释被俘人员、暂维现状、听候双方中央解决的协议，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争端问题，但基本上缓和了陇东的局势。

反摩擦斗争的胜利

陇东两次大规模的武装摩擦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有计划、有预谋制造的，其目的就是妄图驱逐共产党和八路军出陇东，摧毁陇东的抗日民主政权，占领陇东根据地，但其结果是陇东地区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不但没有被驱逐，反而更加壮大，陇东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得到巩固和发展。陇东根据地的反摩擦斗争以国民党顽固派的失败而告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得到发展壮大，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一，陇东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在政治上结束了陇东统战区国共两党政权并存的局面，维护了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划的统一，使陇东根据地行政建制基本确定。在陇东反摩擦斗争中，国民党顽固派虽以武力占据了宁县、镇原

①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陇东的军事斗争》（上），1992年编印，第87页。

②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陇东的军事斗争》（上），1992年编印，第91、92页。

两座县城，但在政治上输了理，其分裂统一战线，破坏抗日的行径受到全国各界人民的谴责。八路军留守部队虽然被迫退出宁县、镇原两座县城，却赢得了陇东各界和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八路军在军事上给予顽固分子以有力的打击和教训，边区政府正式建立庆阳、合水、镇原3县抗日民主政府，并成立陇东分区辖上述3县。至此，陇东国共双重政权的局面结束，使陇东根据地在行政上得到统一。

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关于建立陇东专员公署及成立庆阳、合水、镇原县政府》的函件，委任王维舟为陇东分区专员公署专员，朱开铨为副专员兼庆阳县县长，任命高朗亭为合水县县长，任命冯治国为镇原县县长。正式通知国民党甘肃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行使对庆阳、合水、镇原3县的行政管辖权。4月，陇东分区专署在庆阳县城正式成立。5月1日，陇东专署发出《告陇东同胞书》，明确指出陇东专署成立的目的在于："第一，为了巩固抗日后方，坚持对日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第二，为了建立边区行政组织，实现民主政治，使整个边区负起抗战应有的模范作用；第三，为了配合全国进步，克服陇东政治环境中的一切倒退逆流；第四，为了尊重和执行国民政府蒋委员长的意志。因为庆阳、合水、环县、宁县、正宁、镇原等6县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蒋介石亲口承认划归边区的，当然要由边区政府管辖、整理。"[①]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作出庆环分区并入陇东分区的决定。8月，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专署发出布告："为了今后工作上领导便利起见，边区政府兹将庆环分区合并于陇东分区。原庆环各县统受陇东专署直接管辖，庆环分区名义即行取消。"[②]王维舟任陇东分区专署专员，马锡五任副专员，专署机关驻庆阳县城。陇东分区此后辖环县、曲子、华池、庆阳、合水、镇原等6县，行政建制基本确定。庆阳县城成为陇东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第二，陇东反摩擦斗争的胜利，促进了陇东根据地党的组织建设，形成了统一的中共陇东组织的领导机关。1940年2月11日，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发

①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②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出指示，针对庆环、陇东两个分区党组织和政府并存的情况，指出“在目前环境须有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机关”。“决定成立陇东特区军政委员会，管理陇东和庆环两个分区大政问题”[①]。陇东特区军政委员会由马文瑞、王维舟、段德彰、耿飚、陈仁麒、马锡五、谢扶民7人组成。7月，在庆环分区并入陇东分区的同时，中共庆环分区党委与陇东分委合并，组成新的中共陇东分委，成为统一的中共陇东地区组织的领导机关。陇东分委书记马文瑞，分委机关进驻庆阳县城。

第三，陇东反摩擦斗争的胜利，促进了陇东根据地的军事建设。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得到迅速的发展壮大。陇东反摩擦斗争前，八路军驻陇东的正规部队有三八五旅旅部及七七〇团、警备第七团、警备第二团等部队，共2900余人。此外，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有500余人的地方部队，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所属新正、新宁两县保安大队尚有200余人的地方武装。八路军在陇东地区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合计3700人左右。在取得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后，八路军在陇东地区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根据地许多青年农民主动参加八路军。八路军留守兵团先后增派警备第一团、警备第八团驻守陇东根据地。驻守陇东的八路军正规部队增加了约3000人，总兵力达到6000余人。

在反摩擦斗争中，陇东根据地的青年纷纷参加县、区保安部队，使陇东根据地的地方部队也得到进一步补充，迅速得到发展壮大，其兵力增加约1000人，总兵力也达到1700人，比反摩擦斗争前增加了一倍以上。陇东根据地的八路军和地方保安部队兵力合计达到七八千人，总计比反摩擦斗争前增加了近一倍。陇东根据地各县的抗日自卫军也得到巩固和发展。

第四，陇东反摩擦斗争的胜利，促进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创造了条件。陇东事件后，边区政府在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庆阳、合水、镇原3县设立了相应的税收机关，增加了边区的财政收入。1940年11月，边区银行陇东分行宣告成立，禁止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在陇东抗日根据地流通，以维护陕甘宁边区的金融财政秩序。陇东统战区国共双重政

①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

权并存局面的结束，也为促进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陇东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实施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领导抗日军民广泛深入的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力发展工商业经济，在根据地兴办农业合作社，建立公营工厂、商业、贸易公司等机构，促进陇东根据地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战胜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巩固和发展陇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物资基础。

1941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部署在陇东根据地边境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不断挑起摩擦事件，1941年5月和1942年初，先后两次向关中分区的新宁县望宁堡八路军驻地进攻，均被八路军驻军部队打退。

1943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企图对边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为制止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有力反击。7月10日，陇东分区召开有万余名抗日军民参加的群众动员大会，提出坚持抗战，发展生产，加强自卫，制止内战的口号，通责顽固派破坏抗战、挑动内战的罪行。同时在军事上做好自卫反击的部署，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八路军总部先后从晋绥解放区等地，调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主力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等部队驻防陇东，加强陇东根据地的军事实力。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揭露，在军事上作了充分准备，也由于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反对，这次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还未转为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就被制止了。陇东人民和边区人民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进攻边区的阴谋，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做出了贡献。陇东反摩擦斗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策略的胜利。

六、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陇东党组织的发展

（一）中共陇东党组织的建设

陇东党的组织形式与发展沿革

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在陇东建立的地方组织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隶属于陕甘宁边区党委的部分，包括1937年9月成立至1940年8月撤销的庆环分区党委，1940年4月建立、8月与庆环分区合并的陇东分区党委，以及隶属于关中分区的新正和新宁县的党组织。二是中共中央于1936年5月建立，1937年9月撤销的中共陕甘宁省委，以及1937年7月在陇东国民党统治区建立，1938年7月并入庆环分区党委的中共陇东特委。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在陇东的地方组织，是自1940年9月开始，统一由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改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所辖的中共陇东分区特委会（简称陇东分委，1943年1月改称为陇东地委），在陇东地区隶属于中共关中地委的新正、新宁两委，以及属陇东分委领导的、建立在陇东根据地周边国统区的宁县工委、平东工委等。陇东地方党组织是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的领导下，在领导陇东人民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中，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和破坏的斗争中，为适应形势的变化逐渐进行相应的组织调整，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地方党组织先后在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为把陇东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同时，不断加强

和巩固党的组织建设，使党的组织得到发展壮大，成为领导和组织陇东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设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坚强核心。

中共陕甘宁省委的撤销与庆环分区党委的建立

1936年5月，中共中央为配合红军西征，恢复和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正式设立陕甘宁省、陕北省，关中、神府特区。陕甘宁省先后辖有曲子、环县、华池、赤安、赤庆、固北、豫旺、豫海、定边、安边、盐池11个县级政权，其中陇东境内有7个县。同时，建立了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陕甘宁省委。1937年春季，又先后在陇东统战区成立中共合水、庆阳、驿马关、镇原、宁县等5个县委和西峰、固原2个工委，区乡级党的基层组织相继建立。到1937年9月，中共陕甘宁省委建立了50个区委，党员人数发展到2762名。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陕甘宁省级建制撤销，在其辖区分别成立了庆环分区和三边分区。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陕甘宁省委随之撤销，成立中共庆环分区党委，书记马文瑞，隶属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负责领导陇东根据地党的工作。陕甘宁省委原属根据地党的工作分别移交庆环、三边分区党委，统一战线区域党的工作移交中共陇东特委。10月，庆环分区党委在曲子召开第一次分区党代会，会议总结抗战工作经验，研究布置征粮工作和领导抗战运动，决定在庆环分区各县进行抗日民主政权的选举工作。庆环分区党委领导陇东根据地人民为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极其复杂和艰苦的环境下，大力发展党的组织，促进了党员队伍的迅速壮大，到1937年底，庆环分区党员人数由2000多名增加到3000多名。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庆环分区行政区划作了调整，庆环分区只辖环县、曲子、华池3县，中共庆环分区党委成为陇东根据地党的领导机关，负责上述3县党的工作，分区党委领导驻地曲子镇。

中共陇东特委并入庆环分区党委

1937年7月，中共陇东特委建立，统一领导着中共庆阳、合水、镇原、宁

县、固原5个县委及西峰、驿马关2个工委，党的基层组织逐渐增加，党员队伍迅速壮大。1937年8月，镇原县委改为中心县委，12月，驿马关工委撤销，所属党组织并入西峰工委。1937年10月，陇东特委在庆阳县城出版发行《救亡日报》，1938年3月改名为《救亡报》，正式作为特委机关报。到1937年底，中共陇东特委领导的党的基层组织迅速发展，党员人数由原来500余名增加到2900多名。1938年春，中共陇东特委改属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对外仍称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陇东办事处。为开展平凉、泾川一带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陇东特委建立了平泾工委。7月，宁县县委划归关中分区党委领导。

1938年7月，中共中央和边区党委根据形势的新变化，为加强党对陇东地区的统一领导，对陇东党的组织作了适当的调整，决定中共陇东特委并入庆环分区党委，组成新的中共庆环分区党委，马文瑞任分区党委书记，庆环分区党委统战部仍以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陇东办事处的名义驻庆阳县城，领导原陇东特委所属统战区党的工作。此时，庆环分区党委除辖环县、曲子、华池3个县委外，还辖原陇东特委所辖统战区的庆阳、合水、镇原、固原4个县委和西峰工委，共25个区委和2个中心区委。新的中共庆环分区党委的组成，成为统一领导陇东根据地和统战区党的工作的领导机关。

1938年夏季，庆环分区的工作，由于受到党内王明右倾投降错误影响，致使在陇东统战区停止开展民运工作，党的工作人员实行所谓的“职业化”、“社会化”，一些党组织和群众团体被破坏，党的队伍也受到弱化；在环县、曲子等根据地有的地主反攻倒算，收回已分配的土地财产，有的地方反共势力有所抬头，而党的组织却不敢公开领导群众进行坚决斗争，造成了消极的影响。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右倾的错误。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派王若飞来陇东检查工作，参加了庆环分区党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参加分区党委扩大会议的有分区党委委员、各县县委书记及八路军驻陇东部队领导干部王维舟、耿飚、谢扶民等。会议着重批判王明右倾错误，检查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提出在统战区积极、主动地开展民运工作，巩固庆阳、合水等地的民运团体，普及群众工作到区乡的斗争策略，推动了党在陇东工作迅速发展。会后陇东各级党组织正确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坚持独立自主原

则，在统战区恢复和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众组织，积极抗日民众运动，陇东党的组织得到巩固并不断发展起来。

1939年初至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先后挑起了两次大规模摩擦事件，破坏了陇东团结抗战的大好局面。中共庆环分区党委带领陇东抗日军民展开反摩擦斗争并取得胜利。陇东党组织在两次摩擦事件中遭到破坏，特别是统战区党的组织几乎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多数组织失去联系，许多党的干部被捕关押，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者脱党，有的甚至投敌出卖组织。反摩擦斗争结束后，庆阳、合水、镇原的国民党政权机关被“礼送”出境，上述3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隶属新建立的陇东分区专署，陇东统战区随之解体，成为陇东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陇东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边区中央局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指示，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着力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从1937年10月至1940年4月期间，中共庆环分区党委先后下辖环县、曲子、华池、庆阳、合水、镇原、宁县、固原、固北等县委和西峰工委，党的基层组织得到较大发展，根据地和统战区的中共党员人数最多时达到6000多名。

中共陇东分委的建立

1940年1月，为适应陇东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新形势，遏制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倒行逆施，巩固和发展陇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保卫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另行组织陇东分区。4月，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庆阳县城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党委随即建立中共陇东分区特委会（简称陇东分委）。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作出决定，将庆环分区并入陇东分区，中共庆环分区党委随之并入陇东分区特委会，组成新的中共陇东分委，隶属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马文瑞、段德彰先后任分委书记。新组成的中共陇东分委，在原庆环分区党委基础上，增加八路军陇东驻军领导王维舟、耿飚、甘渭汉等人为分委常委。8月，中共陇东分委领导机关驻地由曲子镇迁至庆阳县城。

新组建的中共陇东分委根据陇东党组织的现状和当时的环境，着力促进

根据地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在陇东分委的领导下，陇东各级党组织对党员普遍进行了审查，严格履行入党手续，重视对党员进行经常性考察和了解，以达到纯洁党的队伍的目的。与此同时，陇东各级党组织还开展了对党支部的审查和教育，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广泛开展对党员的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修养和文化素质，使党员队伍得到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陇东分委对在根据地周边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党的基层组织，同样也进行了整顿、巩固和加强。1940年4月，中共陇东分委成立后，为了严密组织，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将原固原县委、新区工委和回民工委合并，组成中共平东工委。同时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国统区党的工作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躁和暴露”的方针，对国统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进行整顿，采取严格保密、选好干部、一旦暴露立即调离，以及防止内奸和肃清内奸等方法，使根据地周边国统区党的地下组织不但保存了力量，得到了巩固，而且逐渐有所发展壮大。到1940年11月，陇东分委的中共党员发展到5844名。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党委与中共西北工委合并，组成新的边区中央局，中共陇东分委隶属边区中央局。1941年5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撤销边区中央局，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陇东分委隶属中共中央西北局。从1940年4月至1943年1月，陇东分委辖环县、曲子、华池、庆阳、合水、镇原6个县委，并负责领导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中共宁县、平凉2个工委的工作。

中共陇东分委改称陇东地委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级组织关系的决定》（简称《九一决定》），强调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对党政军民实行一元化领导，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群团工作的现象。中共陇东各级党委执行《九一决定》精神，在组织上，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撤销陇东军政委员会，中共陇东分委改称为中共陇东地委，确定陇东地区为陇东分区最高领导机关，负责领导全分区党政

军组织，马文瑞、段德彰先后任中共陇东地委书记；地委书记兼任地方部队政治委员，地委领导成员由陇东地方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组成。陇东分区各县县委也按照这个格局进行调整，确定各县委为一个县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工作上，实行党政分开，党委对政权系统实行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不搞包办代替，下级党委认真执行同级参议会及政府的决定和法令，对参议会及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通过自己的党员去实现。陇东各组织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坚持按照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教育党员干部把服从党的领导看成是服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与纪律。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上，无论机关、学校、工厂，有3名党员都建立党的支部，农村则以行政乡为单位建立党的支部。通过对《九一决定》的贯彻执行，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陇东根据地的贯彻执行，使陇东党组织逐步得到发展壮大。

从1943年1月至1945年8月，中共陇东地委辖根据地的环县、曲子、华池、庆阳、合水、镇原6个县委，曲子、庆阳、西华池3个市委（区级），以及在周边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宁县县委和平东工委，共47个区委。到1944年3月，陇东根据地周边国民党统治区华亭、泾川、清水、镇原、平凉、庆阳、固原、彬县、宁县等地建立党组织622个，陇东分区（不含新正、新宁县）中共党员人数5128名。至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3月，陇东分区的中共党员人数5051名。

陇东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

陇东党组织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同时，还不断地进行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指示各地要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新党员。中共庆环分区各级党组织在工人、雇农、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中发展一大批新党员。到1937年底，中共庆环分区党委和中共陇东特委已有党员6000余名，1938年到1939年上半年又发展新党员1600多名。由于短时间内党组织迅速发展，党员队伍迅速扩大，出现了在新发展的党员中搞突击、审查不严、普遍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造成党员队伍严重不纯。如在环县曾出现一个

支部书记，在一天之内就发展了5名党员的不正常现象。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的决定》，提出已有相当数量党员的地方一律停止发展，集中进行巩固工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陇东分委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同时，以进行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为基础，开展对基层党组织的巩固工作。

1940年2月至8月，中共庆环分委、陇东分委在党员中普遍开展了一次审查工作，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工作作风进行整顿，纠正强迫命令、贪污腐化、违反群众纪律等作风问题，进一步改善党和群众关系，加强党员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在审查工作中对缺乏党的知识、不了解党纪党规、犯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党员，进行帮助和教育，提高对党的认识；对那些突击发展、经过教育觉悟仍很低的、不起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劝其退党；对少数立场不坚定者、投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坚决清除出党。在这次审查中特别注重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审查。通过审查对犯有严重错误的10名区级干部、21名乡级干部分别给予处分，对个别违法乱纪的干部予以法律制裁。通过审查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党风教育，党和群众的关系、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都有很大的改善。各级党的组织都建立起经常性的考察制度，严格入党手续。经过这次对党组织的审查整顿，到1940年11月，全分区中共党员人数5844名。

中共陇东分区各级党委把支部教育当作对党员教育的基础工作，重视对党员的思想和作风教育，重视和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分区党委确定党支部教育的方针是：提高支部和党员文化水平，使每个党员懂得怎样做一个合格党员。在党支部教育中，根据每个党员素质、文化程度和实际工作表现，采取多种形式对他们进行思想和作风教育。陇东分区各级党的组织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有计划地组织报告会、演讲会和座谈会，加强干部的策略意识。各县县委经常派训练团到区乡开展支部教育工作，采取举办支部委员训练班、上党课、学文化等多种形式开展教育活动。1942年，经过整风运动，整顿党的组织，整顿党的工作作风，广大党员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陇东各级党组织还重视加强干部教育，教育新老干部加

强团结，坚决克服影响党内团结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种种错误倾向。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陇东地委紧紧围绕党的七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和共同纲领，教育党员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和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使党员教育工作更加深入扎实地开展。

（二）中共陇东党组织的整风运动

整风学习的开展

1942年，全党普遍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陇东各级党组织亦开展了整风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各级党组织在边区党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在领导陇东抗日军民在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中做出了新成绩。陇东党组织的广大党员在实施抗日民主政治，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的过程中，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头执行各项统一战线政策，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但是，在陇东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和一些党员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学风、党风、文风不正的问题，其原因也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从历史根源上看，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曾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特别是“左”倾错误给西北革命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党中央到达陕北后虽然立即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但未能从思想上彻底加以清除。从社会根源上讲，陇东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队伍迅速壮大，党员人数有较快的增加。由于许多新入党的同志思想有着许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这就成为党内不正之风

滋长的条件。同时，由于陇东抗日根据地处在抗战后方的特殊环境，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派遣特务混入根据地和革命队伍内部，用各种方式对革命队伍进行分化瓦解和开展破坏活动，个别党员干部经不住考验，丧失革命立场，甚至公开投敌叛变，在党内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如在陇东反摩擦斗争严酷和复杂的环境中，原八路军驻镇原县城的七七〇团第三营营长张怀兴，被国民党镇原县县长邹介民用“美人计”拉下水，泄露八路军部队的军事机密，幸好被及时发现未造成重大损失；原中共镇原县委宣传部长赖辉煌、新城区委书记陈贵起等40余人公开叛变投敌，使镇原县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显然，陇东一些组织和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干扰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因此，为使党组织在政治上思想上统一起来，陇东分委在党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的统一布置下，领导全分区各级党组织，开展了以整风运动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陇东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是在中共陇东分委和以后的陇东地委领导下进行的。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次演讲后，整风学习运动在全党开始普遍进行。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会议讨论整风问题，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学习总委员会，领导边区各级党委开展整风学习。5月24日，西北局发出关于整风问题致各地委的指示电，要求切实抓好整风学习。5月30日，西北局再次发出《关于在各分区和各县学习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等22个文件的指示》，规定整风学习时间为6个月，自1942年4月1日开始。从1942年3月开始，在中共陇东分委的领导下，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和西北局的安排计划，整风运动在陇东各级党组织中逐步展开。隶属关中地委的新正、新宁县的各级党组织，亦投入整风运动。

从1942年3月至1943年3月，是陇东根据地整风运动的学习阶段。中共陇东分委首先根据陕甘宁边区学习总委员会的指示精神，制定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规定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的考排计划，规定分区机关和各县、区的党员干部每天集中学习三四个小时，认真组织学习和讨论，提高党员对整风运

动的思想认识，为全面开展整风运动奠定了基础。1942年3月18日，陇东分委召开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分委书记马文瑞做动员报告，全分区的党员干部掀起学习竞赛活动。为使没有文化的干部也能参加整风学习，分委和县委两级分别举办干部学习班。陇东分委成立业余文化补习学校，马文瑞亲任校长；举办乡级干部训练班，组织支部书记、乡长集中进行学习。各县相应举办干部短训班，进行整风动员和学习。

为加强对整风运动的领导，陇东分委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和要求，成立由马文瑞、王维舟、马锡五、段德彰等人组成的学习总委员会；各县委及陇东分委、专署所属各单位成立学习总委员会和学习分委会。为更好地宣传和指导分区的整风学习，陇东分委将机关报《救亡日报》改为《陇东报》，增加报道整风学习的内容，加强对整风学习的指导。陇东分区机关和所属各县、区干部整风学习随之陆续开始。

6月，陇东分区各级党委在学习整风文件的基础上，展开全面的思想检查和工作检查，开始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反省。整风运动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运用中央整党文件的精神来检查党员思想作风上存在的错误，查找不正之风的存在和滋长的根源。具体方法是学习和教育相结合，反省与批评相结合。通过查找和揭露三股歪风，在陇东分区各级党组织中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其主要形式是老干部中的经验主义倾向，新干部中的教条主义倾向；个别党员干部存在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以及闹独立性的倾向，以及反对党八股的斗争。

陇东分区在整风学习运动中，还在各级党政机关中开展对官僚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贪污腐化和落后意识的斗争。对存在问题和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坚持从团结教育的愿望出发，采取个人反省与组织帮助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育，提高认识，改正错误。1943年初，全分区整风运动的学习阶段基本结束。

整风中的审干工作

1943年4月至10月底，是陇东根据地整风运动的审查干部阶段。4月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整风运动便进入审查干部的阶段。5月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整风学习的指示，要求有系统的进行干部审查和工作检查，达到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和改进工作的目的。中共陇东地委贯彻西北局高干会议精神，安排各县重新组织干部集中进行整风学习，学习中强调在领会文件精神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进行反省。9月6日，陇东地委举办整风训练班。审干工作初期，陇东分区各县结合整风学习，检查每个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弄清一些同志的历史问题，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干部进行教育，基本上达到弄清问题，坦白错误，提高思想认识的目的。

审干工作开始后，由于党中央对敌特分子的渗入和破坏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中央社会部在对甘肃地下党组织的审查中出现了“甘肃红旗党”案的错误，进而在边区扩大为党内开展的“抢救失足者运动”。1940年6月，设在国民党统治区兰州的中共甘肃工委机关遭到破坏，工委书记、副书记等5人被捕。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怀疑甘肃工委被破坏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党内有奸细存在”。甘肃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就成为审干的重点。1942年底至1943年10月，在康生的主持下，中央社会部首先开始对在该部工作的原中共甘肃党员张克勤，采用刑讯逼供的手段进行审查，在连续几天几夜车轮般威逼诱供下，张克勤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并牵连到甘肃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和一些党员。康生对张克勤“特务”的认定，立即波及到整个甘肃国统区党组织，中共甘肃工委机关及所属党组织被诬陷为所谓的“红旗党”（意指党组织外红内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由此，“甘肃红旗党”错案产生。1943年4月，审干工作开始后，即将在延安和陇东根据地的原甘肃工委领导和党员孙作宾、陈成义、陆云龙、魏子义、乔映淮、陈超群、杨静仁、李铁轮、鲜维峻、罗扬实、王实先、郑重远、赵子明、贺进民、高陇生、霍流、刘杰、王冰、陈瑞、高炯明、段源、陈裕源、蔡炯、鲁平、窦志安、张生强、刘玉村、张友三、牙含章、王君朗、万良才等30多人逮捕关押，隔离审查，刑讯逼供，被打成“红旗党特务”。在西北党校学习的高健君、金少伯、张重

鸣(苏星)等,也被批斗审查。致使原中共兰州市委书记陆云龙、地下党员于千(谦)、陈睿(女)等人被迫害致死。"甘肃红旗党"事件的出现,也影响到审干工作的走向,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单位中以"抓特务"、"嫌疑分子"等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普遍开展起来,在运动中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一大批党的好党员、好干部受到伤害,造成审干工作中"左"的错误发生。

由于受"甘肃红旗党"错案的牵连和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陇东地委在举办的干部整风训练班中也开始大抓"特务"、"反革命分子"等,使许多好党员好同志受到打击和伤害。参加训练班的干部,多数被迫"坦白交代"问题,受审查和批斗的干部达129人,有104人被逼迫"坦白",其中4人被逮捕,华池县代理县长第五汉杰被迫自杀身亡。关中分区所属的新正县、新宁县也在党员干部中大搞过火斗争,新正县县长郭存信等5名干部被列为"特嫌",停职关押反省,受到批斗;新宁县有20多名党员干部被逮捕关押。

党中央逐渐发现了"抢救失足者运动"的严重问题,不断采取措施纠正错误,最后决定停止运动,进行甄别工作。7月30日,毛泽东及时发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指示。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纠正逼供信的错误。10月9日,毛泽东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①]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认为"抢救运动"应予否定。按照党中央的指示,陇东地委及时纠正在审干工作中出现的偏差,随即解散了干部整风训练班,停止过火的斗争。12月,陇东地委成立甄别委员会,进行甄别工作,陆续给受冤的同志进行赔礼道歉,恢复工作。陇东分区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严重偏差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1943年上半年,陇东地委制定和完善工作制度、纪律守则、奖惩制度和政务人员公约,使各项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深入群众,广泛联系群众,采取调查研究的方法来实事求是地执行党的政策。陇东各级党委还普遍建立集体学习、集体办公的制度。制度的落实有效地纠正和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克服了党内的不良思想和不正之风。

1943年10月中旬至1944年年底，是陇东根据地整风运动的总结提高阶段。陇东地委和各县县委按照中共中央学习总委员会部署，组织党员干部重新学习整风文件，根据中央关于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审干方针，认真总结整风以来的经验教训，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犯错误同志进行真诚的批评和帮助，促使他们改正错误，放下包袱，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对于错整的党员干部，按照中央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给予彻底平反；党组织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取得他们的谅解，被致死的给予昭雪。

1943年底，陇东分区的整风运动基本结束。通过这次整风，陇东根据地各级党组织清除了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地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坚持和发扬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团结和巩固，整顿了党的各级组织，促进了根据地各项工作深入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七、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形成和建设

(一)陇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陇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形成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当局。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合法地位的谈话。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边区首府延安。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通过决议,承认陕甘宁边区,同时划定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范围为陇东的庆阳、合水、镇原、正宁、宁县、环县在内的23县,总面积129600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改为陕甘宁特区政府。1938年1月,陕甘宁特区政府又复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1937年5月,陕甘宁特区政府成立后不久,特区政府随即对边区行政区域进行重新划分,在陇东设立庆环分区,辖华池、环县、曲子、固北等县,以及关中特区所辖的新正、新宁县。在中共中央和特区政府的领导下,陕甘宁特区所辖陇东各县开始实施抗日民主政治制度,开始了由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到抗日民主政府转变的过渡。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国共两党在陇东的地方政权逐渐消除对立的局面，开始团结合作抗日。1937年2月，陕甘宁苏维埃政府在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第三行政公署所在地西峰设立了联络处，由左觉农负责。7月，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战爆发后形势的变化，在陇东国民党统治区庆阳城建立了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中共陇东特委，袁国平任特委书记，对外称"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陇东办事处"，主任袁国平。8月，陇东特委又建立了中共西峰工委，对外称"八路军驻西峰办事处"，主任段德彰。至此，陇东地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正式形成。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国民党中央政府实行国共合作、对日作战方针，陇东地区的国民党地方政权也基本上采取同中共陇东地方政权团结合作、共同抗战的态度。1937年11月28日，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在给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陇东行政区）专员罗人骥的电报中说：经过与中共代表谢觉哉商定，"经边区政府编组乡镇，由人民正式选举负责人员之地区，暂归边区政府管辖。其未编组各地，即由各县政府分别整理编组保甲。"[①]国民党军政部还将陇东庆阳、合水、宁县、正宁、镇原、环县等6县，划为八路军"募补区"。由于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在抗战初期，陇东上述各县归边区政府直接管辖，为国民党当局承认，"均属八路军的后方，军民协作相安无事。"[②]但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共两党合作，全力团结抗战，避免摩擦，仍照认定庆阳、合水、镇原、宁县、正宁等县保留着国民党地方政权，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在西峰设立的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上述各县。

陇东地区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为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民主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为保护和巩固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①丁雍年等：《陇东的两次反摩擦斗争》，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②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陇东的军事斗争》（上），1992年编印，第90页。

陇东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的成立及主要职责

陇东各县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

随着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了维护和巩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进一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在边区实行普选的议会民主制度，促进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转变。193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宣布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为陕甘宁特区，各级工农苏维埃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权，由苏维埃民主制度改为议会民主制度，并接受国民政府指导。5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通过《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法规。《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规定："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各级行政长官、乡长、区长、县长、边区主席由各级议会选举"，"各级政府直接对各级议会负责"，"选民对所选代表认为不称职的，得随时撤回改选之"。根据上述原则，《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除了汉奸、经法院判决剥夺公民权和精神病患者以外，"凡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十六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法律上确定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由此，陕甘宁边区普选的议会民主政治制度初步确立。

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同月，陕甘宁省撤销，成立庆环分区，始辖华池、环县、曲子、固北（后撤销）等7县；成立中共庆环分委、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马文瑞任庆环分区党委书记，马锡五任分区专署专员，王世泰任分区保安司令。同时撤销关中特区，成立关中分区党委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习仲勋任关中分区党委书记，霍维德任分区专署专员，张仲良任军分区司令员，关中分区辖陇东新正、新宁县，以及陕西赤水、淳耀等县。庆环分区和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派出机关，行使对所辖各县的行政管辖权。

按照西北办事处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和《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的精神，从1937年7月至11月，庆环分区所属的曲子、环县、华

池、固北等县和关中分区所属的新正、新宁等县，按照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原则进行了普选。自下而上逐级进行乡代表、区议员和县议员的选举，召开第一届乡代表会和区、县两级议会；逐级民主选举县、区、乡三级议员，召开各级议会；实行差额选举，逐级选举县长、区长和乡长，选举产生有各界抗日进步人士参加的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相继完成了由工农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担负起领导陇东根据地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重任。

陇东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环县抗日民主政府。1937年10月，在民主普选的基础上环县在河连湾召开第一届议会，刘昌汉当选为县议会议长，选举产生由杨玉亭、陈玉山、宋飞等11名委员组成的环县抗日民主政府，杨玉亭任县长。县政府设有秘书室、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保安6个科和司法裁判处、税务局、合作联社等工作机构。环县抗日民主政府始辖环城、洪德、虎洞、山城、耿湾、马坊源6个区。后经调整与合并，1940年2月，甜水区收复后，归环县政府管辖。

曲子县抗日民主政府。1937年10月，曲子县第一届议会在曲子县纸坊沟召开，会议选举苏耀亮为县议会议长，庆环分区专员马锡五当选曲子县县长(兼)，曲子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县政府和庆环分区专署合署办公，专员兼任县长，分区各科长兼任县政府各科长。1940年4月，与庆环分区专署分署办公。曲子县先后管辖八珠、曲子、天子、木钵、合道、土桥、马岭、三岔等8个区公署。1942年1月，成立曲子市(区级市)政府。

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1937年11月，华池县第一届议会在大沟门召开，李湖当选为县议会议长，选举产生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李培福当选为县长。县政府设秘书室、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科和保安裁判处等8个工作机构，县政府机关初驻温台大沟门，后迁至悦乐镇。华池县始辖林镇、白马、白豹、水泛、吴旗、元城、悦乐、温台、柔远等9个行政区。1940年6月，边区政府批准成立三边分区吴旗县，将华池县所辖吴旗、水泛两区划归吴旗县管辖。

固北县抗日民主政府。1937年10月，固北县召开第一届议会，会议选举产生固北县抗日民主政府组成人员，成立抗日民主政府，阎志尊当选为县

长。县政府设秘书室、民政、财政、教育科和保安科、司法裁判处等6个工作机构。固北县辖毛井、车道、庙儿掌3个区公署。1938年4月,边区政府决定撤销固北县,其辖区并入环县。

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1937年7月,新正县在民主普选的基础上,在阳坡头召开第一届议会(当时称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左怀玉当选为县长。县政府与关中分区专署合署办公,专署之各科亦即是县政府之各科。1941年7月与关中分区专署分署办公,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科及保安科、武装科、裁判处7个工作机构,县政府驻在阳坡头。新正县辖湫头、三嘉、长舌头、湫坡头、底庙5个行政区。1940年3月,湫坡头、底庙两个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7月,新正县又建立马栏区。

新宁县抗日民主政府。1937年7月,新宁县苏维埃政府改为抗日民主政府。9月下旬,新宁县在下齐家召开第一届议会(当时称为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新宁县抗日民主政府,穆天祥当选为县长(未到职,由陈含玉代理)。县政府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科和保卫科、司法裁判处等6个工作机构,辖九岘、金村、湘乐3个行政区,14个乡。1940年先后成立了盘克区和宇村区。

1940年2月,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摩擦的行动,八路军驻陇东部队对合水、庆阳、镇原等地的反共武装给予坚决打击,并"礼送"上述3县国民党地方政府办事机关出境,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建立起合水、庆阳、镇原3县抗日民主政府。

庆阳县抗日民主政府。1940年2月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朱开铨任县长,县政府驻庆阳县城。庆阳县辖城关、桐川、高迎、赤城、三十里铺、驿马6个行政区,43个乡。1941年4月,撤销城关区,成立庆阳市(区级),新增新堡区。

合水县抗日民主政府。1940年2月成立抗日民主政府,高朗亭任县长,县政府驻合水县城。合水县始辖城关、西华池、店子、太白、肖嘴5个行政区,后经调整增设盘马区、西华池市(区级)。

镇原县抗日民主政府。1940年3月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冯治国任县长,县政府驻孟坝镇。镇原县辖孟坝、柳州、庙渠、新集和1942年新增的三岔区5

个行政区。

1940年4月20日，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庆阳县城成立，辖庆阳、合水、镇原3县抗日民主政府，王维舟兼任专员，朱开铨兼任副专员。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又作出决定，将庆环分区并入陇东分区。8月，庆环分区专署与陇东分区专署合并，统称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王维舟兼任专员，马锡五任副专员，分区机关驻庆阳县城。庆阳县城成为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陇东分区辖环县、曲子、华池、庆阳、合水、镇原6县抗日民主政府，分区行政辖区基本确定。至此，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包括关中分区新正、新宁县的8县抗日民主政权正式建立，所辖区域面积27119平方公里，人口27.8万。1941年12月，《解放日报》公布边区各县区乡户口统计，其中陇东分区6县、38区、248乡、242807人。关中分区所属的新正、新宁县共有7个区，40个乡，48393人。

陇东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和主要职责

陇东根据地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组织由参议会、政府委员会、司法机关三部分组成。《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分区一级不设参议会。但陕甘宁边区政府又规定，在所属各县未成立参议会的可以召集临时参议会代行参议会职权，负责管理和监督各级政府，参议会成立后即行撤销。因此，按照边区政府规定，陇东分区只是在1940年9月召开过一次临时参议会。

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陇东分区督察专员公署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派出机构，设专员、副专员，目的是加强对县政权的领导，提高行政效率，负责把边区政府的政策、法令与指示运用到当地具体工作中去；统一领导督察分区所辖各县的一切行政事宜；组织与领导人民武装军队维护地方治安；监督所属各县财政经费收支情况；负责监督和指导驻分区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各种附属机关。

县参议会是县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县政府服从县参议会，对上级政府及县参议会负责；领导和执行全县政务。县参议员由全县人民选举产生，设正、副议长。由议员中选出常驻议员5人（正副议长为当然常驻议员），组成

县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在参议会休会期间，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并负责监督县政府对县参议会决议案的执行情况，听取县政府的工作报告，向县政府提出建议，派代表出席县政府委员会会议，必要时决定召开县参议会临时会议。其职权是：选举或罢免县长、县政府委员及地方法院院长；监督及弹劾县政府、司法机关的公务人员；决定本地方经费收支事项；制定与否决本县单行法规；批准县政府民政、财政、粮食、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等各项计划；议决县长、县政府委员会交议事项和本县人民及群众团体提请审议事项，督促和检查县政府执行参议会议决的事项；决定本县应兴应革重要事项等。

政府由县参议会选出县长及县政府委员，组成县政府委员会，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后，为县政府常设权力机关，负责全县政务，对上级政府和县参议会负责。县长和县政府委员任期两年，可连选连任。县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掌握并贯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发扬民主政治，加强乡政权工作；组织人民经济生活，发展公私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建立地方财政；建设民兵，加强保卫工作，巩固地方治安，维护社会秩序；调解民事纠纷，公平处理民刑诉讼；进行干部教育，改进国民教育；管理本县各级政府干部的登记、审查、任免、调动、考绩、奖惩等事宜；监督上级政府驻在本县的附设机关等。

公署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县政府可根据所辖乡的多少，划分若干区，设立区公署，作为派出机构，承县政府之命，帮助和督导各个乡政府办理下列事项工作：调查研究所辖乡情况，执行上级政策法令和指示；组织人民经济，增加生产，改善生活；进行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国民教育；组织人民武装，维护地方治安；检查与总结工作经验。同时，帮助督导乡之民政、财政、保安等工作及其他应兴应革事宜。一般区公署所辖乡政府为3至5个。

乡政权是基层政权组织，实行乡参议会与乡政府议行合一制。乡参议会为乡的最高权力机关。乡参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不设议长和常驻委员会，只是在开会时期推举3人组成主席团（乡长为当然成员），主持会务。休会期间，由参议会选出的乡长和乡政府委员，组成乡政府委员会，行使乡政权的最高权力。乡参议会每年改选一次。乡参议会选出乡长后，须经县政府批准，对乡参议会负责，掌握全乡政务。

陇东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均根据县政府组织条例规定，设立工作机构。各县县政府一般设有秘书室、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保安6个科和司法裁判处。每科设科长1人，科员1至3人不等。保安科和司法裁判处（后改为保安处和司法处）是另成系统的部门，受县政府的领导，主管全县的锄奸、保卫和民事、刑事诉讼工作。

陇东各县抗日民主政府相继建立，完成了政权组织由苏维埃制度向议会民主制度的转变。由各抗日党派、各阶层人民选举产生的各级参议会，成为陇东地区各县的民意机关和权力机关。陇东各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政权中得到了初步贯彻。但是，陇东抗日民主政权在建立初期还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普选制度没有完全适应抗战的特点，参议会组织还不够完善；在政权中民主人士参政较少等等。在后来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中，随着大规模的民主普选活动开展，参议会民主制度的完善和“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开展，这些不完善的方面逐渐被克服和消除，从而使陇东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不断走向成熟。

普选制度与“三三制”政权建设

普选制度的完善

1938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参照国民政府所颁布的《省参议会组织条例》，决定边区议会改为参议会。为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随着边区普选活动逐步开展，不断适应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实践，不断完善普选制度本身，边区政府先后在1939年、1941年和1944年三次对选举条例进行修改和补充，使普选制度进一步切合边区政治建设的实际，使边区的普选制度逐渐完善起来。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第一次大规模普选基础上召开，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法规。施政纲领明确阐述了普选制度的原则：发扬民主政治，采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加人民的自治能力。新选举条例进一步完善了普选制度。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关于

选举资格，新条例规定凡居住在边区的人民，年满十八周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除经法院判决有罪和剥夺公民权者及精神病患者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关于选举参议员人数比例，规定乡市参议会，居民每30人选举议员1人；县参议会，居民每700人选举参议员1人；边区参议会，居民每5000人选举参议员1人。边区管辖范围内的部队、机关、工厂、学校都应参加选举，按同样比例选举参议员。少数民族可以单独进行民主选举。新条例规定乡参议会议员每半年改选一次，县参议会议员、边区参议会议员每一年改选一次。新选举条例还对各抗日党派、团体的选举及设立选举委员会事宜作了原则规定。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总结了前两次普选活动的经验教训，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1944年12月，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对条例又作了补充和修正。这两次大会通过的选举条例，对普选制度进一步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规定每一公民皆有一票选举权；修改了各级参议会议员选举名额的比例，修改了各级参议会议员的选举期限，对妨害选举自由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处罚办法等。修改后的选举条例根据边区的具体实际确定了选举区域，选举人数比例及改选期限等内容，这就使普选制度的实施有了法律的指导。修改后的条例还对妨害选举的行为增补了处罚办法等内容，保障了选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断完善民主普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从民族利益大局出发，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有益探索。随着边区普选活动的逐步开展，边区政府为不断适应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实践，不断完善普选制度本身，以求实的态度使普选工作普遍、直接、自由、平等。在总结普选活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先后三次对选举条例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这就使普选制度逐步地得到完善。普选制度的完善，密切了党、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抗日民主政权真正成为各抗日阶级、阶层和人民的政权。

陇东根据地普选制度的实施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陇东根据地各级党委和政府按照《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法规的规定，于1937年、1941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普选活动，使普选制度得到充分贯彻实施，推进了陇东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陇东根据地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规模的普选活动。

1.陇东根据地的第一次普选

陇东根据地第一次普选开始于1937年7月。陇东根据地的这次普选是在苏维埃民主制度向议会民主制度转变的过程中进行的。从7月开始，庆环分区所辖华池、环县、曲子、固北等县自下而上逐级进行代表、区议员和县议员的选举；10月，召开第一届乡代表会和区、县两级议会，实行差额选举，选举产生由各界进步人士参加的抗日联合政府。全分区7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共选出乡代表3332人，候补代表811人；选出区正式议员1511人，候补议员132人；选出县正式议员363人，候补议员92人；选出边区正式议员40人，候补议员15人。到10月底，庆环分区各县和隶属关中分区的新宁、新正两县，完成了由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建立了包括各抗日党派，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各级议会以及各级政府委员会。

1938年11月，陕甘宁边区议会改为参议会。从1938年底至1939年冬，庆环分区各县撤销区议会，将县议会和乡议会转变为县、乡参议会，对参议员进行改选，分别召开第一届县参议会，正式确定参议会为本地方最高权力机关。关中分区的新正、新宁两县，也先后于1939年4月和下半年正式召开参议会。在这次普选中，选民在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后，对抗战动员、优待抗属、发展经济、施行教育、改善生活、锄奸剿匪、废除买卖婚姻等重大方针和问题，向各级政府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监督和促进政府改进工作。这次普选扩大了民主范围，陆续给原来被剥夺公民权的地主、富农、绅士、资本家等剥削阶级恢复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给他们参政议政的权利，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庆环分区在这次普选中促进了民主运动的发展，注意把普选工作同广大群众的利益密切联系起来，通过争取向选民汇报政府的工作，发动选民向议

会提案，让群众对候选人进行认真评议等手段，提高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渐使广大群众把普选当成自己的事情。据统计，陇东根据地各县在这次改选中，选举气氛热烈、民主，有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投票。

1940年2月，陇东根据地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庆阳、合水、镇原3县收复后，也按照民主选举原则产生了抗日民主政府。一月，陇东分区按照“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原则，在庆阳城召开临时参议会，共产党、国民党及其他各抗日党派、无党无派人士、绅士议员50余人参加了会议。庆阳县开明人士刘仲邠当选为临时参议会议长（10月病故，任绍亭继任），段德彰当选为副议长。会议通过“三七减租”和“1939年底以前所有欠租一律豁免”的决议。随后，陇东各县也相继召开县参议会，开始贯彻执行“三三制”建政原则。

2.陇东根据地的第二次普选

1941年，陕甘宁边区举行第二次大普选。这次普选既有1941年的，也包括1942年的改选和1943年的整编。这一时期是陇东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阶段，主要是全面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和“精兵简政”政策。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向各分区专员和各县县长发出指示信，要求“边区各级参议会今年都要改选，未成立的都要成立”[①]。3月25日、4月5日，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先后两次向各县发出指示信，对选举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强调“民主建设为一切工作中心，而民主建设之第一着就是选举运动”[②]。同时成立陇东分区选举宣传委员会和选举工作团，公布《选举宣传大纲》，组织分区干部深入各县，成立各县选举委员会，加强对选举工作的领导。

1941年9月和10月，陇东分区华池、环县、曲子、庆阳、合水、镇原各县均在先行直接乡选的基础上，先后召开县参议会，选举产生县参议会正、副议长，常驻议会议员；选举产生县政府委员、县长；选出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和候补议员。在选举中，陇东分区十分重视动员妇女参加选举，

①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

②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页。

许多优秀妇女当选为各级参议员和政府委员。庆阳市桐川区选举的187名乡参议员中,有妇女参议员26名;庆阳市政府委员会7名委员中,有2名妇女委员。1941年7月下旬,关中分区的新正、新宁两县召开县参议会,进行民主普选。

在第二次普选中,根据边区选举条例的规定,陇东各级政府成立选举委员会,负责指导选举活动,并组织大批干部下乡进行选举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新正县选举委员会组织了28人的工作团在马栏区进行乡选举试点。环县选举委员会以学校学生为主组织了3个宣传队,由县级干部和学校教员带领下乡宣传民主选举。合水县选举委员会编写印发《合水县选举指南》的小册子。由于普选工作深入细致,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积极投身于民主选举的活动,真正履行和享受主人翁的权利。有许多地方在选举投票之日像过节一样,男女老幼齐出动,乡村平时常出门的姑娘媳妇们,穿上新衣服成群结伴上路,老太太骑着毛驴,也从几十里外赶来参加普选投票,气氛热烈、民主。在这次普选中,陇东根据地参加投票选举的选民达到80%~90%,有的地方高达95%以上。为进一步贯彻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在民主选举的实践中,陇东分区党委和专署针对边区群众文化落后,部分选民不识字,自然条件差,山大沟深,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等实际情况,创造出许多方便群众的选举方法,比如:"投豆豆"、"抻(伸)胳膊"、"烧香洞"、"画圈圈"等。对于因各种原因不能到会参加的选举者,则采取"背箱子"的办法,就是派工作人员背着流动票箱,挨家挨户送票收票,让群众都能行使自己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充分保障了各阶层人民的民主权利的实现。这次普选活动充分贯彻了普选制度,进一步推动了陇东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三三制"原则在陇东根据地的实施

1."三三制"原则的提出

为巩固团结,动员抗战,发扬民主,克服困难,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信,提出"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即抗日民主政权构成的原则是"三三制",在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员占1/3,非党派

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依照这样的原则,"在……陇东等地建立新的政权,也具有严重意义。必须依照上述原则进行,力避过右和过'左'的倾向。"[①]这种政权建设的原则,目的是建立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三三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上的基本原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在政权建设中的具体体现。为贯彻实施"三三制"原则,1940年,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先在绥德、陇东两分区进行"三三制"的试行。

1941年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与西北工委合并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发出《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要求边区各地的选举运动切实贯彻中央指示的"三三制"原则,建立起真正模范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三三制"不仅要实行于各级参议会,还要实行于各级政府机关中。1941年5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提出抗日政权建设中的"三三制"原则。《纲领》提出:"本党愿与各党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只占1/3,以便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政治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中2/3的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比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②]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的指示及《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颁布,对推动陕甘宁边区之陇东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建设,培养党的各级干部同党外人士合作的民主作风,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建设"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2."三三制"原则在陇东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实施

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取得"三三制"建政原则的经验,在陇东、绥德两个分区试行"三三制"。1940年9月,陇东分区先后召开分区临时参议

① 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743页。

② 甘肃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

会、各县临时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一般都是通过聘请的方式，邀请党外民主人士参加参议会和政府工作。在第二次普选中，虽然陇东分区党委、专署在政权建设中十分强调和坚持“三三制”原则及政策，在经过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在1941年的民主普选活动中开始全面地推行“三三制”原则，得到了党内外各界人士的普遍拥护。在这段时间进行“三三制”的试行中，边区参议会认为“陇东分区做得比较认真”[①]。但是，陇东根据地各县在这次普选中的结果，共产党员人数在新产生的各级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中仍超过1/3，并未真正建立起“三三制”政权。如环县选出的11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8名；华池县5名常驻议员中，有共产党员3名；庆阳县7名政府委员中，有共产党员4名；新宁县9名政府委员中，有共产党员5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民主作风深得民心，共产党员能够同人民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群众办事，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加之陇东是老革命根据地，广大群众对共产党有着深厚感情。因此，在普选中人们都极愿意给共产党员投票，这样就造成了在新产生的县、乡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中共产党员人数超过1/3的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1942年3月6日，边区政府发出《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规定各县参议会和政府中，“共产党员超过1/3的，应该自动提出辞职，由无党派候补议员补充。”[②]根据这一精神，陇东分区各县及时召开县参议会，对县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进行改选，解决1941年普选中各级政权中共产党员超过1/3的状况。陇东分区专门先后4次发出指示，要求在政权建设中严格做到“三三制”。在改选中酝酿确定县、乡两级政府委员和参议员时，共产党方面主动限制自己候选人，积极替其他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提出候选人，帮助他们参加竞选，使共产党员在各级政权中占有的比例始终保持在1/3以内。当选的共产党员如果少于1/3时，就选多少是多少；若超过1/3，

①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1944年3月25日在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见西北五省区《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②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页。

则主动提出辞职，由其他党派或无党派民主人士递补。环县1941年选出的，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8名，1942年改选时，谢正和等5名共产党员主动退出，改选后的9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3名。其他各县政权中，共产党员超过1/3的也都纷纷提出辞职。新正县11名政府委员中有共产党员3人，不足1/3。共产党员的这种主动谦让，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的精神，使党外民主人士深受感动，也极大地促进了民主政治在陇东抗日根据地的贯彻实施。经过改选，陇东根据地各县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均达到了“三三制”的要求。

在陇东各县的乡级普选中，“三三制”原则同样也得到认真贯彻，根据地各乡级政权中共产党员人数都严格控制在1/3以内。如庆阳县选出的乡参议员1028名，其中共产党员180名，仅占1/5；新宁县选出乡参议员609名，其中共产党员111名，还不足1/5。陇东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对于选进各级政权的非共产党人士表示出极大的信赖和诚意，虚心听取和尊重他们的意见，真正赋予他们以职权，使他们参政的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使“三三制”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陇东根据地各项建设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3.精兵简政政策在陇东的贯彻执行

陇东抗日根据地建立后，陇东分区的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建立健全，党政干部人员也相应有较大的增长。但是随着严重经济困难的到来，“鱼大水小”的矛盾逐渐凸现出来。为克服根据地严重的物资困难，适应变化了的客观情况，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陇东分区结合整风运动开展精兵简政工作。

1941年12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向各专员、县（市）长发出指示信，提出“精兵简政”的原则和要求。从此开始，陕甘宁边区政府把“精兵简政”当作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成立了专门的整编委员会，制定了整编方案。1942年1月，边区政府发布《关于各级行政组织区划编制的规定》的通令，根据边区各分区人口、地域、自然、经济状况与政治环境等条件，划分不同等级，并以此编制配备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将超编的人员精减下来，使行政机构真正做到少而精。陇东分区划为甲等，关中分区划为乙等，两分区对所属各县也划分了等级，庆阳县为甲等，环县、曲子、新宁、镇原、合水5县为乙等，新正、华池2

县为丙等。各区乡也划分了等级。陇东分区共划分甲等区22个，乙等区14个，丙等区2个，从而为简政工作的顺利进行做好准备。

陇东分区专署按照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和《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规定，着手裁撤不急需的机构，合并性质相近的机构，精简缩小行政机构，裁减超编人员。陇东分区在精兵方面，缩编分区主力部队及指挥机关，减少非战斗人员，加强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在简政方面，整顿各级组织，紧缩机构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分区专署将其所设处一律改为科，进行了裁撤、合并和缩小，将原6处1室合并为2科1室，即一科（管理民政、教育事宜）、二科（管理财政、经济建设、粮食等事宜）和秘书室；保安科改为保安分处，裁判处改为司法处（1943年改设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陇东分区的原交通运输局和调查站等单位撤销；地方卫生所与三八五旅医院合并；陇东分区税务局与庆阳县税务局合并。后又根据实际需要恢复粮食科，成立分区邮电局。陇东分区各县政府也相应地精简机构，将县政府所设6个科室合并为3个；同时撤销区公署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助理员，总设大区助理员3人，小区助理员2人。适当缩小乡的规模，全分区由原来的226个乡增加到239个乡。

陇东分区在精简机构工作中，依照甲、乙、丙3个等级分别配备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并将超出编制的人员精减下来，使机关真正做到少而精。分区专署在精减前共有工作人员44人，经过精减配备干部25人，事务人员6人，精减了13人。陇东分区还对群众团体的专职人员也进行精减，如陇东分区工会在原有脱产干部60人中减去40人，并取消区工会主任一职。陇东分区在精减工作中，十分注意把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充实到县政府机关、生产部门和区、乡基层单位中去，有89名干部调动工作，既使上级机构变得精干，又使基层组织、政府机关、生产部门的工作得到加强。1942年2月，分区第一次精简整编工作结束。

1943年1月，西北局高干会议之后，陇东分区及县、区、乡各级普遍进行第二次精简整编，于5月底完成。整编后，分区专署编制31人，编余的13人充实到基层；各县行政机构精简后，配备干部112人，事务人员35人，精减64

人，行政工作人员均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华池县县级单位精减干部20人，新宁县精减干部22人。对精减下来的编余人员通过派出学习、转送生产部门或退伍等途径全部作了妥善安置。如合水县县政府精减13人，其中4人送延安学习，7人转到生产部门或其他工作岗位，2人到行政村工作。由于处理慎重，安排适当，编余人员都高兴地服从组织的安排。实行精兵简政后，区乡基层单位和生产部门均得到充实，人民群众负担减轻，干部工作作风大转变，更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加强和改善了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各级政府机构趋于合理，基本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

陇东分区实行精兵简政以后，不仅缩编了政府工作人员，减轻了群众负担，充实了基层政权和生产部门，更主要的是各级政府建立健全了政府工作制度，如工作汇报制度、干部管理制度、行文制度、文件管理制度、巡视检查制度等，使行政事务管理和干部管理逐步走上正轨化、制度化；加强了公安、司法工作及基层政权的工作；改变了工作作风，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分区专署专员王维舟、马锡五经常巡视各县工作，帮助干部解决具体问题。广大干部也进一步提高了工作责任心，廉洁奉公，艰苦奋斗，面向群众，为人民利益忘我工作，从而密切了党、政府和群众的联系。

陇东根据地法制建设和“马锡五审判方式”

随着陇东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和完善，在陇东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公安、司法机关逐步健全，法制建设得到迅速发展。1942年陇东分区实行精兵简政以后，加强和健全司法、公安组织机构，根据地的法制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1943年，“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产生，使陇东根据地的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陇东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已经基本确立。

1937年7月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成立。按照边区高等法院规定，为适应边区的环境及抗战需要为标准，边区各县原苏维埃时期设立的裁判部改为司法裁判处，设司法裁判员、书记员等，在县政府的领导下承担全县的刑事、民事诉讼等司法工作。1938年，陇东根据地各县按照边区高等法院第四号通令，建立县裁判委员会。1940年，庆阳、合水、镇原3县收复后，建立

了抗日民主政权，随之设立裁判处等司法机关。1941年初，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根据边区整编委员会决定，在庆阳、新正各地成立地方法院，设院长兼庭长1人，看守所长1人，编制共8人。1942年，各县司法机关逐渐健全，一般设有裁判员1人，书记员1人至2人，看守员和法警1人。

1943年4月，根据《陕甘宁边区司法处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高院分庭组织条例草案》的规定，根据地各县统一建立司法处，处长由县长兼任；设立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任命马锡五为庭长，石静山为推事。1937年至1942年，为发扬司法民主，各县都采取裁判委员会的形式，讨论和审判重大的民事、刑事诉讼案件。裁判委员会由裁判员、县长、县委书记、保安科长、保安大队长组成，由裁判员负责召集会议并主持会议，根据法律提出初步处理意见，提交裁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判决。同时，在部分乡政府还建立人民仲裁委员会，模拟法庭的形式由人民群众自己解决纠纷。1942年以后，又开始普遍实行人民调解制度，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民事纠纷或轻微刑事案件的调解和审理。人民参与行使司法权，积极参加法制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法制进一步完善。陇东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是抗日民主政权的组成部分，在打击特务汉奸，惩治犯罪，解决民事纠纷，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根据地的社会秩序，促进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巩固抗日政权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1943年3月，陇东分区专署专员兼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在华池巡视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根据《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公开审理“封芝琴婚姻案”，[①]果断地支持女青年封芝琴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主的大胆行动，依法合理解决她和张柏儿婚姻案件，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普遍好评，这个案件审理迅速传遍边区。马锡五是创建陕甘边苏区的领导人之一，曾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抗战开始后，先后担任庆环分区、陇东分区专署副专员、专员职务。1943年，他兼任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开始从事司法工作。他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实事求是地了解案情，并亲临现场勘查，解决了一批疑难案件，纠正错判的案件，注重以调解方式处理民间纠纷，对人民群众进行民主和法制的宣

① 即著名评剧《刘巧儿》中“刘巧儿”的原型。

传和教育，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群众亲切地称颂他为“马青天”。1944年8月至9月，他在镇原、曲子、环县巡视检察司法工作时，在处理镇原县新集二区余家湾的土地纠纷案时，充分尊重群众的意见，坚持以法律为原则，对案件客观公正地作出判决，使这场拖延多年的纠纷迅速地圆满解决。在曲子县视察工作时，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亲临现场勘察，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纠正了曲子县司法处错判的苏发云“谋财杀人案”，使这个疑难案件最终真相大白，受到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在马锡五这种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作风引导下，陇东的司法干部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蔚然成风，解决了一大批遗留多年的案件。合水县县长兼司法处处长王仕俊在合水县三区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协助区助理员、农会主任调解了群众土地纠纷，使多年未决的一场诉讼遂告平息。

马锡五审理案件的方法很快引起边区高等法院的高度重视并在全边区推广，促进了边区司法工作的根本转变，标志着边区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陕甘宁边区政府把马锡五在审判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办案方法，总结为“马锡五审判方式”。1944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评论文章，把马锡五的审判方式归纳为：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原则，坚决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审判方式是座谈式而不是坐堂式，是“民门”而不是“衙门”。马锡五审判方式在陇东根据地产生，为抗日根据地的司法工作树立了一面旗帜，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抗日根据地司法实践中普遍推广后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陇东的实施

陇东统战区的形成与斗争

陇东统战区的基本特征

陇东统战区的形成是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结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陇东的活动范围，壮大了抗日力量，有利于陇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虽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但是国民党当局仍然顽固地坚持其一党专政，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也加强了对陇东统战区庆阳、合水、镇原、宁县、正宁等县的统治，派出官员到属于陇东统战区的各县原旧县政府任职，由在庆阳西峰设立的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并扩充地方保安团队，编组保甲等。1938年冬，又在属于边区管辖的环县甜水堡设立国民党环县县政府。国民党还增加了驻陇东的军事力量，至1939年11月，全区共驻有国民党地方部队6个保安大队、19个中队、1个骑兵队，1个迫击炮分队。同时国民党第一六五师、九十七师等部队先后驻防陇东庆阳、西峰、镇原、宁县等地。中国共产党在陇东统战区除建立中共陇东特委、各县县委（工委）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外，还驻有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三八五旅旅部及第七七〇团、警备第七团、警备第二团等部队。这样，在陇东统战区就形成了国共双方共管的复杂局面。

陇东统战区形成后，在陇东便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地区。一种是华池、曲子以及合水、环县、新正、新宁等部分地区的老革命根据地，这类地区不仅建立有苏维埃政权，而且大部分地区进行了土地革命。另外一种地区就是统战区。统战区又分为两类不同情况，一类是由红军西征时收复的苏区和新解放地区，这类地区大多建有苏维埃政权，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另一类是西安

事变后由原国民党统治区转变为统战区的地区，仍然存在着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和地方保安部队。陇东统战区这两类地区虽然都存在着国民党的地方政权机构和地方保安部队，但也有中共地方组织、八路军驻军和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而且一些抗日救国会已掌握了当地实际权力。统战区这两类地区在部分地区交错存在，使陇东地区形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因此，国共双方共管和双重政权并存，是陇东统战区最基本的特征。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能较好地合作抗日，陇东统战区国共双方基本相安无事，抗日救国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但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以及相持阶段的到来，国共双方在抗战路线上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尖锐，在陇东统战区国共双方的矛盾日趋凸现和激烈起来。

陇东统战区的斗争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顽固坚持其一党专政和片面抗战路线。因此，在统一战线中国共双方存在的矛盾和斗争，突出地在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区域中反映出来。

陇东统战区形成后，国民党陇东地方政权逐渐开始公开阻扰和压制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对中共组织和八路军开展民运工作进行种种限制和刁难，公开破坏统一战线。国民党陇东地方政权还支持和唆使属边区政府管辖的环县、华池、新正等地地主势力复辟，强迫农民退还已分配的土地、房屋和已废除的债租；在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破坏和阻挠减租减息；增加粮款税捐，加重人民负担。中共陇东各级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加强对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和组织的领导，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把形式上是群众团体的抗日救国会，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人民政权性质的机构；并按照1938年5月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从既成事实出发，重新收回地主夺去的土地、房屋和强收的债租等，退还给农民；在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有步骤地进行减租减息，实行群众合理负担，实行“二五”减租，打击地主势力的复辟活动。同时还积极支持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旧政权的苛捐杂税、加重人民负担的斗争，维护人民的既得利益。

1938年底，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国民党甘肃当局开始秘密在陇东建立“防共线”并指示陇东地方政府公开进行反共活动，陇东统战区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日趋激烈，以致后来发展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中共陇东各级组织、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驻军部队，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策略原则，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维护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陇东的统一战线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地区的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在陕甘宁边区党委的领导下，陇东党组织坚持团结抗战，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战胜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攻势、经济封锁和军事挑衅，使陇东根据地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实施抗日民主政治制度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陇东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庆环分区，以及隶属关中分区的新正、新宁两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同时还形成国共双方共管的统战区。为实施抗日民主的政治制度，陇东党组织在根据地不断地加强抗日政权的建设，在统战区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初，在挫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第二次陇东事件后，在原统战区成立庆阳、合水、镇原3县抗日民主政府，并设立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理上述3县行政。7月，庆环分区并入陇东分区成为行政上统一的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

陇东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为实施抗日民主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陇东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与边区其他地方一样，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纲领建立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它代表抗日各阶级、各阶

层人民的意志，在实行普选的议会民主制度的指导下，成为包括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地主、富农、绅士、资本家等剥削阶级也被恢复了公民权，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由各阶级、各阶层抗日进步人士组成的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充分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因此，陇东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得到充分贯彻。

陇东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组织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就是要保证政权的民主性得以充分的实现，使之代表各抗日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有效发挥自己的职能。为达到这一目的，在陇东各级党委的领导下，通过实施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政权人员组成为“三三制”结构、以及实施“精兵简政”方针等，使陇东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完善和巩固，保障了根据地各抗日阶层的民主政治权利，抗日民主政治得到充分体现。

陇东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上呈现出四个显著的特点，集中地反映出抗日政权的民主性，以及所实施的抗日民主政治制度。一是陇东分区党委和专署高度重视普选工作，把普选工作当成加强和完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大事来抓，在各次普选工作中成立“陇东分区选举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对各县的选举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安排和指导，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保证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二是陇东根据地人民把普选作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积极参与，并在选举实践中创造出各种适应当地民主选举的方式。三是在政权人员结构组成上贯彻“三三制”原则，各级参议会、政府委员会人员组成都严格按照“三三制”原则，政权人员共产党员的比例都在1/3以内。四是在1942年的改选中，贯彻了抗日政权建设中“精兵简政”的方针，于1943年完成了对政权机关的精简整编，使陇东各级政权机构设置更趋合理，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加强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

实行统一战线的经济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确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为调动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等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在已分配土地的地区，保证农民已分得土地的既得利益，颁发土地证，承认地权；在没经过土改的地区，停止分配地主的土地，实行减息，保护地主土地的地权和佃户的租佃权，调整租佃关系和债权关系，缓和阶级矛盾，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从1937年到1940年初，陇东根据地开始宣传和实施“减租减息”政策，由于当时存在统战区等情况，减租工作开展得不彻底。1940年9月，陇东根据地全面开展减租减息工作。1942年到1943年，陇东根据地又实行了大规模认真细致的减租减息工作，取得突出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和地主的利益都得到保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陇东根据地在全面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的同时，还贯彻了中共中央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实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一致的发展工业、商业贸易、财政税收、金融以及奖励和保护私人工商业等方面的政策。为克服严重的经济财政困难，配合大生产运动的开展，首先由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门办起一些公营工商业，在公营工商业带动与政府扶持下，又办起一批合作社性质的工商业，私人工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由于陇东根据地认真贯彻执行保护和奖励私人工商业的政策，根据地工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而且还出现一些地主、富农转而经营工商业的积极倾向，促进了小城镇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繁荣了陇东根据地经济，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同时根据地还加强财政、金融和税收工作，使根据地的经济逐步摆脱了困境，从1944年开始基本上达到了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盈余。此外，在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根据地党组织和民主政府也都采取有利团结抗日的政策，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陇东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巩固和壮大了统一战线。

开展民族平等团结工作

陇东分区及新正、新宁县境内有一些回族居民，其中一部分聚居在镇原县三岔乡和新正县的龙嘴子、孟家河、西渠一带，曲子、环县等地也散居着一些。到1941年，陇东根据地回族居民总计约350多户，1500多口人。陇东、关中两分区及当地党和政府，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政治上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他们的民族自治权利，尊重其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帮助他们发展民族文化教育；在生产、生活上给予大力扶持与照顾，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陇东根据地在开展民族平等团结工作中，按照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精神，把实行民族自治，建立民族自治政权，作为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治保障。早在1936年7月，关中特区新正县成立了龙嘴子回族自治乡，建立了陇东第一个民族自治政权。在1941年边区第二次普选中，陇东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镇原县三岔回族自治乡，关中分区新正县一区一乡等回族自治乡，回族群众自己选举产生乡议会、乡政府和出席县参议会的议员。新正县还推选出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回族特邀参议员。陇东分区各县共有6名回族县参议员。1941年，新正县帮助回族群众修起一座清真寺，组织起回族抗日游击队。为更好地开展民族工作，1942年，边区政府在陇东分区专署、关中分区专署设立民族事务科，镇原、曲子、环县等县政府第一科设有民族事务科员1人。

陇东根据地党和政府还重视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1937年秋，新正县在回族聚居区的龙嘴子、杨家台成立两所伊斯兰小学，还在各村开设读书班、夜校，请回族教师任教，教授回、汉两种文字。1940年，新正县政府第三科成立回民教育管理委员会，聘请两名阿訇参加管理，并拨款修缮了龙嘴子清真寺。镇原县政府在回族聚居区三岔乡办起了一所伊斯兰小学。1939年至1941年，陇东分区为方便回族群众，先后在曲子市、环县庙儿掌、镇原三岔建起3座清真寺。1941年，新正县成立边区文化协会关中分会回民支会；1942年成立回民研究会，专门研究回族历史文化与宗教信仰等。由于陇东根据地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但回族群众在这里安居乐业，还吸引着根据地周

边国民党统治区大批回族群众陆续进入根据地生活。陇东抗日根据地形成后，环县、曲子由外地移进的回族群众有130多户，600多人。新正县原有回族居民120多户，350多人，到1940年已增至150多户，430多人。1941年，镇原三岔乡只有回族居民23户，1942年猛增至53户，370多人。当地民主政府对于新移来的回胞实施优待政策，生产上给他们调剂和解决土地、种子、粮食、生产工具等，生活上解决住处、口粮等。1941年关中分区拨给迁入分区的回族同胞和难民耕地4006亩，荒地2135亩；环县拨给8户迁入当地的回族居民耕地400亩，宅基地30亩，帮助他们安家和生产。大多数回族群众在当地政府的扶助下，生产经营得到发展，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新生活。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当地汉族群众十分注意民族团结，回、汉群众和睦相处，形成民族团结、共同抗日的局面。

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开展对友军的工作。1940年，在反摩擦斗争中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优待反共俘虏问题的指示》，陇东根据地贯彻中央精神，关中分区在新宁县的盘克、新宁县的揪头以及职田镇等地设立了收容友区官兵招待所，收容和教育在反顽斗争中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并规定凡顽军官兵携枪来归者，发给路费5元，奖励30元，仅在7月中旬，国民党预三师周开勋部士兵逃来者15人。陇东特委统战部把驻在平凉、固原一线的高桂滋的国民党第十七军作为重点统战对象。该部曾在北岳地区与八路军共同抗战，其官兵大都与边区有乡土关系。1944年冬，陇东特委统战部成立中共第十七军工作委员会，通过一年多的工作，该部的很多军官和士兵与边区建立了友好关系。高桂滋的亲信、辎重团团长齐天然，还与边区建立了由固原至三岔的秘密交通线。后来在解放战争中，齐天然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做了不少工作，参与了策动原国民党第十一军的起义。后来高桂滋本人也弃暗投明，脱离了国民党阵营。

陇东党组织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努力争取国民党地方公职人员和上层人士的同时，还通过边区的商业贸易部门、设在边区边界检查站以及保安部门开展工作，打破顽固派的经济封锁。1940年后，陇东特委曾派干部

窦志安、高俞修等人，通过做生意与外界商人、军政人员广交朋友，宣传边区情况和各项政策，通过他们采购运进边区所需物资。为了争取中间人士和进步分子，关中分区以保安司令员习仲勋的名义发布《告友区公正绅士书》，晓以民族大义，宣传团结抗日。通过团结和争取工作，使国统区的一些上层进步人士长期与边区建立了友好关系，做了许多有益团结抗战的事，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

（三）陇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工作

大生产运动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限制和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并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饿死边区军民，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面临着严峻的财政经济困难。1939年2月2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提出生产和学习是全党和根据地的中心工作。1941年，为克服边区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党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开展大生产运动。为坚持长期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陇东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带领分区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41年，在中共陇东分委领导下，陇东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在大生产运动中，党政军民学一齐出动，上山进沟，组织集体开荒造田，增加粮食产量，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为鼓励和发展农业生产，抗日民主政府规定新开垦的荒地地权归开荒者所有，3年免征公粮，收获归己的政策。陇东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向农民大力宣传以自愿为原则的劳动合作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组织与调剂劳动力，广泛实行劳动互助合

作，组织变工队、互助组、扎工队等开展劳动竞赛，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942年夏，全分区参加互助合作的劳动力达到2.2万多个，占到总劳动力的33%。1943年，全分区有35%以上的农户实行了互助合作，在夏收大忙季节达到了45%以上。华池县有耕牛2438头，加入互助组的耕牛有2206头。各级抗日民主政府还积极教育、引导和帮助农民改进传统的耕作技术，扑灭虫害、兴修水利、提高农业产量。到1945年，全分区可灌溉面积达到11.18万亩。

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陇东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1939年至1943年，陇东分区共开垦荒地40多万亩，仅1943年就开垦荒地22.6万亩，比原耕地面积扩大了1/10，增产细粮5万石（每石约150公斤，计750万公斤），相当于陕甘宁边区当年粮食增产总数的1/3；运盐7.6万驮，养牛、驴等大牲畜近14万头，养羊68.7万多只。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大部分农民实现了耕三余一，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生活有较大的改善。其中以华池县成绩最为突出。1943年华池县耕地面积增加了12.2万多亩，被评为边区大生产运动模范县。陇东分区在大生产运动中还进行了改造社会上二流子的工作。1943年初，华池县有二流子138人，通过各级政府和群众的帮助教育，到年底已改造好128人。据1941年的统计，新宁县有二流子136人，到1944年绝大多数经改造转变为好人，其中有25人还被评为劳动模范乃受到奖励。仅在1944年，全分区各县改造二流子732名，当年他们开垦荒地3000余亩，人均开荒4亩多。对二流子的改造，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发展农业生产、转变社会风气和进行锄奸自卫工作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陇东分区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兴办水利和发展其他副业。为解决国民党经济封锁带来的困难，陇东分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种植棉花，增加棉麻生产，解决穿衣问题。1943年，仅庆阳县就种植棉花1100亩。1944年，全分区种棉3万亩，收棉30万斤。还发动群众种植烟叶、大豆、蓝（可制作染料的作物）等经济作物；发展养蚕、养蜂等副业，增加收入。1943年，大家畜发展到11.5万余头，羊66万余只。在植棉的基础上，纺线织布在陇东普遍发展起来。1943年，庆

阳、合水、镇原3县纺线23237斤，织布32452丈。其中庆阳赤城区纺线业发展最快，全区有377名纺织妇女，纺车282架，仅1943年一年就纺线11930斤，织布15897丈。在大力发展农业、纺织业生产品的同时，各级抗日民主政府还大力发展造纸、制革等手工业及运输业。

在大生产运动中，陇东分区还开展了安置移民、难民的工作，先后安置了大批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来的移民、难民，鼓励和帮助他们开荒种地，发展生产。陇东分区党委、专署根据本地实际，制订出优待移民的条例和细则，在耕牛、农具、种子及口粮等方面予以优待，并提供农贷帮助，奖励移民参加生产。1942年，陇东分区各县安置难民529户，2281人。1943年，陇东根据地（含新正、新宁县）安置移民难民2100户，7487人，当地政府为他们调剂土地9430亩，发放农业贷款37.8万元，帮助他们开荒2552亩，当年他们便生产粮食6.4万公斤。仅在1942年到1943年5月，新正县就安置难民1264户。1943年，他们在当地政府扶持和群众的帮助下，大量开垦荒地，大部分一年便可独立经营，口粮达到自给，两三年就能富裕起来。在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移民和难民经过努力，生产资料有所增加，部分还达到了中农或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

在大生产运动中，陇东分区党政机关的各级领导干部到一般战士、工作人员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他们开荒种地、种粮种菜、养猪养羊、打柴烧炭、开设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自救，努力解决衣食自给和办公费用，减轻群众的负担，取得了显著成就。1941年，全分区机关和各县政府机关开荒种地3000余亩，种地6000多亩，一年即达到衣食自给有余，并解决了大部分办公费用，减轻了人民负担。1943年，环县县、区、乡三级政府机关开垦荒地2300多亩，收细粮200多石，饲养大牲畜160多头，基本上满足了生活需要，并解决办公经费开支的64%以上。华池县政府机关计划开荒56亩，实际开荒102亩。新正县机关干部每人开荒地4亩，种熟地4亩，做到衣食自给有余，解决了大部分办公经费开支。

陇东根据地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1943年1月，在延安召开的高干会议上，中共中央西北局对领导大生产做出优异成绩的22名

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表彰奖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分区专员马锡五、华池县长李培福被授予生产英雄称号，毛泽东分别为他们题词："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面向群众"。1月1日，陇东分区召开首届生产展览和奖励劳动英雄大会，展览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到会军民万余人，盛况空前。大会对王存红、张振财、孙成福、刘志仁等54名劳动英雄进行表彰奖励。同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陇东分区有59名代表参加大会，华池县的张振财、新正县的张清益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华池县城壕村被评为模范村。张振财、孙万福等17名劳动英雄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驻守陇东的八路军部队也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1942年，抗大七分校师生开进华池县东华池、豹子川和合水县平定川等地垦荒种地。他们一边劳动生产，一边上课学习，劳动建校。到1944年，全校开垦荒地6万多亩，收获细粮约113万公斤，生产蔬菜300万公斤，改善了学校师生的生活，减轻了政府和人民的负担。他们还办起商店、饭馆、油坊、醋坊、粉坊等副业作坊和木器厂砖瓦厂等，建起了一座能容纳2000多人的大礼堂。1943年，留守陇东的八路军三八五旅，在旅长王维舟的率领下开进华池县大凤川小凤川，一面保卫边区，一面开荒造田，开展农业生产，并积极发展副业，办起农具厂、被服厂、火药厂等10多个工厂，不仅粮食蔬菜自给有余，而且经费自给率达54%以上。在大凤川屯垦的七七〇团成绩更为突出。广大指战员们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垦荒3.4万多亩，修筑营房400余间，修筑公路50多里，架设大桥一座，办起酿酒、制药、木器、制蜡、纺织、烧瓷等各种副业加工作坊10余处，呈现出粮食满仓、蔬菜有余、牛马成群、猪羊满圈的动人景象，使昔日荒凉贫困的大凤川变成五谷丰登的米粮川，为陇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陇东根据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仅取得了显著成就，而且有着重要意义。大生产运动的开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陇东抗日根据地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改善了军民生活，巩固和发展抗战后方，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党政军民的关系，培养了一批生产管理干部，积累建设的宝贵经验，形成了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成为延安精神重要的组成部分。

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以实施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陇东抗日根据地是最早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地区之一。陇东根据地在土地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地区，一类是华池、曲子、环县和新宁、新正县的部分区乡，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建立了革命政权，已经分配了土地，基本废除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另一类是在1940年3月第二次陇东摩擦事件后，正式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的庆阳、合水、镇原3县及新宁、新正县的部分区乡，这些地区没有经过土地革命。1942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抗战初期减租减息不彻底的情况，制定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之决定》，要求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在中共陇东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按照陇东根据地两种不同类型的地区的不同情况，分类进行减租减息的工作。

陇东根据地华池、曲子、环县3县和新宁、新正县的部分区乡虽然实行过土地革命，但由于战争的影响，土地问题解决得并不彻底。在这类地区的减租减息中，首先是确保农民的既得利益，巩固土地革命的成果。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土地所有权条例》后，华池、曲子、环县认真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及时组织成立土地登记委员会和土地清查委员会，开展土地登记工作，为分得土地的农民确定地权，颁发土地证。宣布土地所有权证为土地所有权的唯一凭证，原有的各种契约一律无效。对返乡的地主、富农，同样分配给一定的土地和房屋。1940年底，土地登记、颁发土地证和清查工作基本结束。在减租减息运动初期，少数地主豪绅违抗政府法令，散布谣言，欺骗和恐吓群众，并采用撤佃、重新丈量、高额收租、明减暗不减等方式抵制。针对这种状况，陇东根据地各县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减息的土地政策，制定地权纠纷处理条例，发动佃户同不法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公开处理一批夺地逼租的典型事件，保证减租减息运动的顺利进行，激发了群众生产积极性。同时，根据边区政府减租减息条例，积极协调租佃关系，做到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并

重，达到合作互惠，促进生产发展。经过各级政府和农会干部的共同努力，不少地主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能够按照边区政府租佃政策法令办事，各地出现许多主动减租减息的开明地主，如庆阳县的刘仲邠、田长吾，镇原县的李焕章等。1941年10月，曲子县二届一次参议会通过的《调整土地及债务关系草案》，规定出租人欲收回租地，须于一年前通知佃户，收回后另出租时，原佃户有优先承租权。1943年5月，曲子县二届二次参议会再次通过调整租佃关系议案，确定了兼顾租佃双方利益原则，以建立适合生产的租佃关系。华池、环县、新宁、新正县也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减租办法，减租减息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陇东分区庆阳、合水、镇原3县及新宁、新正县的一部分区乡未经土地革命，地主封建土地占有制度没有受到根本性打击，占农户大多数的贫雇农没有或很少占有耕地，他们的生活依然十分贫困。地主通过定租、活租、包山租、伙种、安庄稼等租佃形式，地租一般在40%～50%，佃民遭受着沉重的地租剥削。这些地区大多属统一战线区域，由于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减租减息工作未能真正落实。1940年2月，陇东统战区结束后，庆阳、镇原、合水3县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在第一届参议会上讨论减租提案，确定减租率。9月，陇东分区召开临时参议会，通过了“三七”减租（即一斗减三升）及关于1939年底以前所有欠租一律豁免的决议。1942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检查各地减租减息的执行情况，及时纠正部分干部中存在的强调团结、迁就地主的倾向，发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陇东分区把保障佃权作为巩固减租成果的首要问题来抓。11月，陇东分区专署向各县发出指示，把庆阳、合水、镇原3县普遍实行“二五”减租作为中心工作。分区各县针对减租中出现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减租交租的补充办法，具体规定定租一律按1937年以前的原租额减少25%；活租、伙种地主所得不能超过收获量的30%；1937年后地主不实行减租规定多收的租额要一律减去；交租以38斤斗计算，不能私自增减；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另租他人，未经佃户同意，不得改定租为活租或伙种；原佃户有续租的优先权；开垦地主荒地者有永佃权；遇天灾人祸，地租应酌情减免；地主以各种名义破坏土地政策行为者，坚

决制止，不听劝告者依法处理。在减租减息中也照顾到地主利益，坚持交租交息。

1942年冬，中共陇东分委和分区专署在庆阳、合水、镇原3县的部分区、乡分别组织减租工作队进村，成立了各区、乡减租委员会、租佃小组等组织，召开租佃会议，丈量土地，查账算账，订立新约等，开展了以算账、换约、退租为主要内容的减租斗争。合水县首先在店子乡进行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在13个乡开展减租减息，换约710张，地主向佃农减退租粮29.8石。1943年春，中共陇东地委重新部署减租减息工作，组织各县抓典型，总结经验，推动全分区减租减息作深入发展。各县组织减租减息工作队深入农村，依靠农会组织，调查租佃关系，废除旧约，重立新约，把地主收回的土地退还给佃户，巩固减租的成果。对于一些采取诱骗威胁佃户、收讨陈租、明减暗不减等手段阻挠和破坏的不法地主，农会干部组织召开租佃会议，领导佃户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清算账目，订立新约，迫使地主不得不减租。镇原县孟坝区一乡地主许治国、慕万程，制造假账假约，拒不执行减租减息的政策，经过农会的斗争，迫使他们将几年来多收的租子全部退还佃户。到1943年底，庆阳、合水、镇原3县114个乡中，有73个乡实现彻底减租，普遍废除旧约，重立新约，共落实减租亩数228万多亩，减免地租188万公斤。庆阳县经过减租减息的佃户1878户，减租减息额达31323石。合水县得到减租减息利益的佃户1337户，共买进和当得土地11540亩，平均每户增加土地8.6亩。到1944年底，庆阳等3县减租工作全部完成。

1945年3月，中共陇东地委对分区减租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发现存在着对一些中小地主的减租工作不彻底的情况。3月29日，陇东地委作出《关于减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县普遍开展减租复查工作。各复查中对一些地方存在的明减暗不减、地主无理收地、拒不退租等问题坚决纠正，使全分区的减租工作进一步健康发展。据统计，庆阳、合水、镇原3县得到减租减息利益的佃户有3757户，减租地共为2284195亩，减租93833石。

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在陇东抗日根据地的贯彻执行，在政治上打击、削弱和限制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剥削，调整了农村阶级关系，提高广大农民

的阶级觉悟，调动了农民群众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农民有了固定土地和余粮后，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踊跃参军、拥政、支前劳军、交纳公粮，有力地支援抗日战争。在经济上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为支持抗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坚持了既减租减息、又交租交息的政策，团结了大多数地主投入抗日斗争，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

工商业、合作化事业和财税工作的发展

陇东地方工业的建立和发展

抗战时期，中共陇东地方组织带领根据地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为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解决军需民用，积极发展地方工业和手工业。陇东分区的地方工业于1938年开始建立，在大生产运动中得到迅速发展，并形成规模。陇东地方工业包括公营工业，合作社工业、手工业、个体私营工业等多种成分，种类也比较齐全，有纺织、造纸、被服、制革、印刷、卷烟、酿酒、油坊、染坊、化工、农具等。

1938年开始，在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带领下，陇东各县普遍兴办供销合作社，发动群众集资入股，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并以此为基础，开办小型工厂。如1938年，华池县办起供销合作社，入股者1962人，集资11.005万元。同年，曲子县政府创办公属职业工厂一处。随后，中共陇东特委、庆环分区专署和保安司令部集资股金3.5万元，向边区政府贷款2万元，合办了救亡工厂，该厂年产布约900匹，毡帽219顶，以及生产织袜、毛巾等物。庆阳县联社办了利民工厂，年产毡鞋2100双，毡帽820顶。这些工厂成为陇东分区创办最早的地方公营工厂，有效地推动全分区公营工厂的发展。

1939年冬至1940年9月，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禁止布匹、棉花等生活必需品进入边区。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陇东分委、分区专署一方面加强对原有公营工厂的领导，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一方面根据需要又建立起一批以纺织业为主的新工厂，并逐步形成规模。到1941年10月，陇东分区工业发展迅速，办起各种工厂10余处。以纺织业为主的工

厂主要有利民工厂、克己工厂、民生工厂、济民工厂及镇原、环县、新宁、新正、华池等县办的纺织厂等。此外，还建有益民造纸厂、黎明火柴厂、华丰卷烟厂、肥皂厂、制毡厂、毛毯厂等。1941年，陇东根据地由各县政府直接经营的公营工厂达到17个。这些工厂的产品质量逐步提高，产量也逐渐增多，基本满足了军需民用。1942年，分区专署和三八五旅合办的救亡工厂和利民工厂，年产大布千余匹。1943年两厂合并为“联合工厂”，有职工141人，资金740万元，年产大布3600余匹，毛毯1920余条，毛巾600余打，袜子840打，布鞋2.4万双，毛毡1.2万条等，年获红利1770万元。到1945年底，陇东分区公营工厂达到28个，有职工1000余人。公营工业成为陇东根据地地方工业的骨干。

在公营工业的带动和促进下，陇东根据地各县的合作社工业和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仅在1941年大生产运动中，曲子、华池、合水、环县、镇原、新宁等县都通过集资和贷款，办起合作社纺织工厂。曲子县生产合作社工厂生产毛口袋、毛毡，从1941年4月开工生产至9月，即获利千余元。华池县生产合作社集股金4100元，贷款千元，有纺织机器3架，工人18名，于1941年5月开工生产。这些合作社有政府与群众集资合股创办的，也有各机关单位为生产自给而经营的。合作社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个体手工业的发展，成为根据地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陇东根据地在发展工业中，还积极支持和保护私人工业，大力扶持和发展私人个体手工业，进一步促进了陇东工业的发展。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鼓励扶持私人工业发展的规定，陇东分区各级党委、政府鼓励扶持一些地主、商人投资创办工业，欢迎边区以外的商人到陇东投资发展工业，制定对私人投资工业给予贷款、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陇东分区一些地主绅商看到在政府支持和帮助下创办工业利润丰厚，纷纷弃地弃商投资办工业。1945年初，庆阳市商会副会长张守安抽出商业资金举办纺织厂，绅商任绍亭等投资入股。1945年上半年，庆阳县城的地主绅商梁鸿桂、刘宪庭投资兴办了庆兴纺织厂和民生纺织厂。庆兴纺织厂是由庆阳县刘宪庭等5个私人股东和3个机关股东合资创办的，也是陇东最大的纺织厂。

为解决群众穿衣问题，陇东分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村妇女积极参加纺线织布活动。1940年，庆阳、曲子、镇原3县从事纺织业的农村妇女有1042人。1942年，陇东分区6个县从事纺织业的妇女达到4427人，纺线34039斤，织布18756丈，合4689匹。1944年10月，陇东分区为进一步发动妇女从事纺织业，发放纺织贷款3300万元，把万余名农村妇女组织起来纺线织布。1944年底，全分区参加纺织的妇女达到1.5万人，纺纱32.2万斤，织布1.5万匹。陇东农村纺线织布业的发展，也成为陇东分区手工业生产的支柱产业。陇东手工纺织业的发展，不仅使群众穿衣自给有余，促进了物资交流，同时推动其他手工业的快速发展。如1941年前，庆阳县毡房只有1家，1944年公私毡房已发展到10余家，每天可生产毛毡50余条，成为庆阳手工业中的一大行业。当年，边区银行陇东分行还向庆阳发放贷款300万元，扶助庆阳制毡业的发展。到1944年，陇东分区个体手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各类手工业作坊如毡坊、油坊、木器、染坊、卷烟、酿酒、裁缝等，发展到11个行业，达到320家，为解决手工业日用品的军需民用起了重要的作用。陇东地方工业、手工业的发展，实现了工业日用品的部分自给和全部自给，战胜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经济封锁造成的严重困难，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

发展和繁荣商业贸易

陇东根据地在大力发展地方工业的同时，还沟通根据地内外物资交流，发展和繁荣根据地商业贸易，增加财政经济收入。根据地民主政府对公营商业、合作商业、私人商业都给予大力扶持和引导，实行自由贸易，发展根据地内的商品流通，保护商人自由经营，发展私人贸易，多设集市，繁荣市场，建立消费合作社，调整进出口贸易等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根据地商业贸易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创办集金融、商业、贸易为一体的光华商店。1939年7月，庆环分区专员公署在曲子县设立光华商店曲子分店。1940年8月，庆环、陇东两分区正式合并，边区光华总店拨款150万元（边币，下同），在庆阳县成立光华商店陇东分店，下设西华池、驿马关、孟坝、三岔等7

个支店，1945年发展到13个。1941年初，边区政府在光华商店下设光华盐业公司、西北土产公司和边区贸易总公司。这些公司在陇东各县均设有分公司和支公司，主要外销当地的皮毛、药材、食盐等土特产；购进土布、棉花等生活日用品，目的是为机关干部和部队筹集资金，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如1941年6月成立的陇东贸易分公司，下设7个支公司，工作人员达100余人。在光华商店的带动下，陇东分区各县、学校及驻军也自筹资金创办一批公营商店、店铺。如陇东地委、专署、八路军驻军三八五旅不仅在庆阳城分别办有“德丰源”、“庆丰源”、“八一商店”，还在各县、镇办有分店。仅在合水县的西华池，1942年后就设有各类公营商业店铺30多家。1941年上半年，中共陇东分委、分区专署通令各县扩大运输队，帮助光华盐业公司等运销食盐，自力更生解决干部的给养问题。随着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到1943年，全分区共有大小运输队30多支，驮畜1400余头。1945年，光华商店陇东分店拥有资金1.3亿元，下属支店发展到13个（含新宁、新正县），成为陇东根据地公营商业贸易的主体。

在公营商业的带动下，陇东根据地的私人联营和个体商业也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1937年前，西华池商业贸易很不景气，各种店铺不足10家，到1943年，西华池已是商号林立，市面繁荣，各种店铺、饭客栈已达到百余家，各种小摊贩75户。在陇东分区所在地的庆阳城，原有规模狭小私商铺面40余家，到1943年，已有一大批有私人商号的店铺，一般小商小贩也有百余户。私人联营和个体商业成为公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补充部分，形成以公营商业为主体的合作社营、单位机关联营、私人联营和个体户营并存的商业体系。

陇东分区商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全区贸易事业的发展。陇东分区在西华池、赤城、驿马关、孟坝、三岔、苦水掌、长舌头、湘乐等设立8处对外贸易口岸。贸易口岸设立货币兑换所、税卡、贸易公司、土产公司、盐业公司等机构，负责管理和承办贸易业务。陇东实行“以货易货”的政策，与边区以外的各行各业商户做生意。1941年6月，陇东贸易分局成立，先后在西华池、曲子、驿马关等地设立贸易站，有计划地调剂对外贸易，向国统区输出本地食盐、皮毛、中药材、羊毛等土产，从国统区输入边区紧缺的布匹、棉花、药品等日用品

及军用品，争取贸易平衡，并积极帮助合作社商店及私人商店发展贸易。根据地内外的商人想方设法，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积极开展商贸活动，使根据地内的市场繁荣。1941年6月至12月，仅三岔一个口岸就输入粮食1500石，价值125.6万元，价值194.75万元的布匹，价值42.4万元的棉花，价值27.3万元的杂货；输出食盐120.3万驮，价值213.4万元。1944年，陇东各地食盐出入口贸易活跃，成交量明显增长。以西华池口岸为例，仅在1944年1月至11月，从国统区共输入布匹450514匹、棉花1122075斤，以及纸张、药品、日用百货等；从边区销往国统区的有食盐19996435斤，牲畜和羊52256头（只），以及皮毛、甘草等土产，从而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促进了物资流通，活跃了边区经济，增加了财政收入，缓解了经济困难。

陇东根据地为发展和繁荣商业贸易，促进物资交流，各县都增设了集市，繁荣市场，保护商贩自由买卖，促进集市商品贸易的发展。如新正县原仅有1处集市，1940年后又新增设了3处集市。各级政府十分注意培育集市贸易，保护和发展私人商业，使根据地的市场集市贸易逐渐繁荣兴旺起来。1940年秋，陇东分区先后在驿马关、镇原孟坝等地举办骡马交易大会，大会买卖牲口大多免征税费，边区、国统区群众纷纷前往参会，进行物资交流，边区抗战剧团、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与会宣传演出，为大会助兴。1942年5月，陇东分区举行为期10天的骡马交易大会，《解放日报》说："万商云集，贸易鼎盛，与会者不仅有边区各县群众，并有友区人民，包括陕、甘、宁、青、晋、豫省等远近客商。每日从早至暮，市集上熙熙攘攘，车马络绎不绝，大会上百货俱全，最多的是牛、骡、马等牲畜，在5000匹以上，大多外地客商买之。"[①]1943年5月，陇东分区又举办了规模更大的骡马交易大会。

发展合作社事业

中共陇东地方党组织在领导根据地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同时，还积极宣传以自愿为原则的、以群众联合经营的合作经济政策，大力扶持和积极鼓励兴办合作社事业，发展经济建设。根据地的合作社以经营商业为主，也兼营运

①《陇东分区举行骡马大会》，见《解放日报》，1942年6月2日。

输业、手工业等，既有县办的，也有区乡办的，是广大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也是陇东分区公营工商业的重要补充。陇东根据地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积极帮助群众筹集股金，建立合作社组织，以建立合作商店、组织运输队、兴办各种手工业加工作坊，进行生产和经营，发展合作社经济。1939年初，镇原县三岔乡成立消费合作社，设门市部一处，入股群众3600多人，股金800万元，是陇东根据地创办最早的民办合作社。合作社除群众入股集资外，政府还发放贷款扶持。如1941年，曲子县纺织生产合作社筹集股金3500元，政府贷款1500元，办起合作纺织厂，年产袜子2046双。华池、环县、合水等县都通过筹集股金，向银行贷款筹办合作社，做到当年筹资，当年生产经营，当年获利收益。他们还组织了许多运输合作社，定边一带驮运食盐，赚钱赢利。合作社商品价格比私商便宜，而且对军烈抗属实行八折优惠。合作社经济的发展使参加合作社的人数迅速增多，股金也相应增多，进一步促进了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1942年，边区政府建设厅提出在发展合作社经济中要“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官助”的方针后，陇东分区的合作社开始由政府包办转向民办。1943年，全分区（含新正、新宁两县）合作社发展到47个，拥有资金7930多万元（边币，下同），比1942年增长了近18倍，发展最快的是华池、庆阳两县。如1943年5月，华池县温台区群众筹集股金100余万元，建立供销合作社经营，到年底股金扩大到870万元，当年获利156万元，平均每股分红利9万元，促进了民办合作社的发展。同时，由于私商不收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而合作社收边币，对巩固边区金融起到积极作用。到1944年，陇东分区民办合作社增加到99个，总股金6648万元，总资金14164亿元，比1943年增长21倍。在发展合作商业中，陇东分区党委、政府制定“入股退股自由，保证有利可图”的政策，群众入股积极性大大提高，合作社也由单一的消费合作社向综合合作社发展。分区还在各乡镇增设集市，鼓励群众个体经营、私人联营，形成公营、合作社、私营商业全面发展，开发根据地的财源，改善群众的生活，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1944年6月24日，《解放日报》发表《陇东合作社蓬勃发展》的评论文章，对陇东合作社事业发展作了详细报道。

驻守陇东的八路军部队，为减轻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负担，在大生产

运动中也创办军人供销社和农副业作坊，经销部队生产的布匹、木器、陶瓷器、毛毡、食油等产品，方便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为部队积累了资金，改善了部队的生活和装备，也为促进陇东根据地商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加强财政、金融和税收工作

在中共陇东地方组织的领导下，陇东根据地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和商业贸易的繁荣，使陇东分区的财政、税收不断增加，经费和物资供给的困难逐步得到克服，财政基本达到收支平衡。1940年7月，陕甘宁边区银行陇东分行成立，下设西华池、马关、曲子3个办事处。1942年1月至1944年春，陇东对外贸易不断扩大，陇东分行又在三岔、孟坝、赤城、环县、苦水掌增设货币兑换所，基本形成陇东的金融网络。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决定在边区内停止使用法币，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即边币）。为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陇东分行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利用期买期卖外汇，吸收法币和外汇，促使边币信誉提高，流通范围扩大，边币和法币比价稳定在二比一。1941年汇出3059万元，汇入2462万元；1942年，汇出5521.5万元，汇入8.599亿元。仅在1944年，陇东分区就完成边币和法币兑换金额达2.57亿元。当年，边区政府发行建设公债500万元，分配给陇东分区90万元，实际完成94.3万元。为支援陇东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陇东分行积极筹集资金发放农业、工商业、纺织业、合作社事业等各项贷款。1941年，发放贷款27.6万元；1942年，发放贷款10.8多万元；1944年，发放纺织贷款3300万元，扶持1万名妇女发展纺织业。1943年，关中分行给新正县发放农业贷款150万元。

陇东根据地建立后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改革税制，规定按收入多少纳税，实行合理负担。1940年5月，根据边区政府颁布《货物税暂行条例》，陇东分区依法征收货物税。1941年6月，陇东分区税务分局在驿马关成立后，在分区各县建立起6个税务支局和14个税务卡，税务网络基本形成。陇东分区税务分局在税收工作中，逐步把过去零星分散的税收转变成较为正规的税收制度，依照既要增加抗战能力，又不加重人民负担的原则，不搞过头

征税，使人民满意，政府增收。1943年，陇东分区开始实行农业累进税，规定80%的农民要负担救国公粮任务，对通过行政手段动员超交的，必须如数退还。当年，陇东分区共退还超交公粮7000石。金融和税收事业的发展，使陇东根据地的经济逐步摆脱困境，从1944年起基本上达到财政收平衡，略有盈余。当年全分区财政收入14.3亿元(边币)，支出14.1亿元。

陇东根据地的文教卫生工作

发展和普及学校教育

陇东根据地以小学教育为主体的学校教育蓬勃发展起来。从1937年到1940年，庆环分区和陇东分区主要以“国防教育”和“普及教育”为宗旨，坚持“改变教育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①]的教育方针，积极发展小学教育。到1940年，陇东分区6县共有学校278所，其中完全小学11所，模范小学18所，普通小学190所，女子小学9所，私学50所。1939年，新正县有小学77所，其中完小3所，共有学生2293人。1940年，新宁县有小学31所，其中完小2所，共有学生1068人。各学校从学制到教学内容都进行了整顿和改革，规定完小学制为5年，普小学制均为3年；各学校都采用边区教育厅编印的教材教学，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

从1941年到1943年，陇东根据地的学校教育逐步向正规化的方向发展。1941年10月，边区教育厅针对各地片面追求学校、学生数量，忽视教学质量的问题，召开第四届各县教育科长会议，作出“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决定。陇东分区贯彻边区教育会议精神，专署召开政务扩大会议，研究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的工作。随后又召开分区各县完小校长联席会议，具体讨论学校教育正规化问题，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工作全面展开。从1942年2月开始，对全分区各类学校进行整顿，裁并学校，提高质量。经过整顿，全分区小学由1941年底的156所减少为69所，学生人数由3927名减少为2744名，教员也由224名减少为151名。这次精简提高了教育质量，但由于过分强调正规化，小

①见《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见西北五省区《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页。

学裁并过多过快，学生数量大量减少，使一些儿童失去上学的机会。从1943年开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认真贯彻整风精神，总结教育工作经验，清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纠正工作中的偏差，端正了办学方向和教育指导思想，学校布局更为合理，教师更为优化，使学校教育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提出“民办公助”的办学方针。陇东根据地在贯彻边区文教会议精神中，按群众需要和实际需要改革教育，既注意学校数量的增加，又重视教学质量的提高，全分区下力气搞群众性办学热潮，许多劳动英雄、知名人士和广大群众积极集资办学校。到1945年，陇东分区共新建民办学校160所，私学88所，占学校总数的89.2%，在校学生达到5172名。各级政府加强对私学的管理，采取逐步淘汰或进行改造的方法，使其成为新型学校。镇原县孟坝乡西坳村小学是一座私塾，教书先生贾其昌贯彻边区政府颁布的新教育方针，提倡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废止对学生的体罚打骂，教学力求学以致用，形成了符合实际的办学方法和模式，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深受学生和家长的称赞。1944年，他本人先后在陇东分区文教大会上荣获“模范私学”、“模范教员”称号，在边区文教大会上被评为特等模范。“贾其昌先生私学模式”和经验，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表扬，在陇东分区进行推广。

陇东根据地原来没有一所中学。1940年3月，边区政府决定在陇东分区创办筹建陇东中学，中共陇东分委书记马文瑞兼任校长。1940年9月1日，陇东中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为学校题写校名，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分别题词。陇东中学的教育方针是，“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培养抗战救国人才”①。陇东中学创办之初只有8名教职工。首届招生122人，设3个班次，学制为1年。1940年11月，学校根据边区政府“提高国民教育质量”的要求，对学校进行全面整顿，学制改为2年，充实教学内容，增设教学机构，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使学校逐步走向正规化。1941年9月，在校学生增加到247人，设6个班次。1942年秋，学制改为3年。1943年，陇东地委、专署为大量培养和培训地方干部，在陇东中学开设地方干部训练班。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陇东革命史料选辑》（二），1985年印刷，第321页。

文教大会召开后，陇东中学教学改革深入开展，教研机构相继成立，教学质量逐步提高。到1945年，陇东中学教职工增至37人，有教学班7个，学生330人。陇东中学是边区政府在陇东根据地创办的第一所新型的中等学校，坚持办学8年，到1948年3月，除学习中途调出工作者外共毕业523人，为革命和建设培育了一批骨干。1947年3月，陇东中学改为中共陇东地委党校，1949年5月，又改为陇东分区干部学校。

社会教育成绩显著

在大力开展学校教育的同时，陇东根据地开展的社会教育也卓有成效。社会教育是以文化、政治、卫生和群众文艺活动为主要内容，以不影响生产和工作为原则的民众教育，扫除广大工农群众中的文盲和半文盲，提高成人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文化水平。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因地制宜地开展社会教育，创造出冬学、夜校、识字组、民教馆等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1937年冬季，根据地的扫盲识字活动形成高潮，仅环县、曲子、固北3县共办冬学58处，识字班369处，夜校20处，学员达3368人。1939年4月，边区政府正式公布“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①]社会教育方针，根据地社会教育出现前所未有的局面。到1940年底，陇东分区社会教育广泛发展，分区6县及新正、新宁县都建起了民众教育馆，共办冬学80处，学员1334人；夜校239处，学员3182人；识字班374个，学员2390人；半日校62个，学员1124人。在社会教育的促进下，妇女放足和婚姻自主活动迅速开展起来。到1939年，新正县在“放足委员会”的领导下，18岁以下女子放足者达80%。

1942年，中共陇东分委、陇东分区专署按照边区教育厅的指示，对全分区以冬学为主的社会教育组织进行整顿，提出“重质量为主”的要求。陇东分区各级党委和政府结合整风运动，对社会教育工作中存在的过分强调正规化的偏向进行纠正，按照群众需要和自愿的原则，进行相应改革，广泛动员群众自

①《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见西北五省区《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

愿参加文化学习，以识字为主，并注意对群众进行政治和科学教育，从实际出发安排教学内容，把学习文化和群众的实际生活、生产需要结合起来。社会教育学习使用边区教育厅统一编写的《民众识字课本》、《抗日三字经》、《日用杂字》、《庄稼杂字》、《卫生课本》等教材，通俗易懂，文图并茂，具体生动。此外还学习庄稼栽培、纺线织布、妇婴卫生、珠算记账、公文知识等。教学组织形式灵活多样，方便群众，仅冬学就有全天冬学、半日冬学、成人冬学、儿童冬学、妇女冬学、一揽子冬学等。教学方法丰富多彩，生动活泼，除课堂教学外，还大量的在田间地头、村边院落进行分散与集中的教学，注重学习实效。另外，还广泛组织读报组，既学习文化知识，又学习时事政治。1944年底，庆阳县有冬学148处，参加学习的有2800多人。镇原县有冬学120多处，参加学习的有2300多人。根据地15岁至40岁的群众，凡参加扫盲学习的，一般识字都在500个左右，不少人达1000字以上，一般都能读书看报，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社会教育的广泛开展，不仅大大提高了陇东民众的文化水平，促进了根据地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的普遍树立，而且大大激发了陇东民众的抗日觉悟，推动了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重视和加强干部教育

1937年9月，庆环分区党委在曲子东沟岳王庙创办分区党校，主要任务是培训区委书记、区长、县部级干部，分区党委宣传部长彭飞兼任校长，教员由分区党委、党委各部、专员公署各负责同志兼任。分区党校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党务干部。从1938年起，陇东根据地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在职干部教育，主要是提高地方党政、军事干部的文化、政治、军事素质，以适应革命战争和政权建设的需要。各级党组织根据当地干部普遍文策理论水平不高的实际，采取在职学习和离职培训的形式，提高干部素质。在职学习主要是通过办夜校、办补习班，学习文化和政治理论。离职培训主要是以举办培训班的形式进行。1938年到1939年底，庆环分区党委先后举办7期区、乡干部培训班，培训区乡干部149人；共举办各种长短不定期学习培训班28期，离职参加学习和培训的各级干部1046人

次。同时还选派干部离职参加边区党校、分区党校、陇东中学干训班的学习和轮训。对干部教育一般是先从学习文化入手，逐步过渡到历史、地理、政治理论的系统学习。1939年，陇东各县的干部教育机制初具规模，仅环县就成立区级干部识字组11个，乡级干部识字组40个。在干部教育中还注重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1940年，陇东分委组织分区、县两级干部系统地学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下册)、《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上册)等理论书籍，提高领导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1940年下半年，陇东分委制定干部教育长远规划，加强干部正规化教育，积极为全分区培养德才兼备的地方干部。从1941年至1945年，中共陇东分委和陇东地委共举办干部培训班12期，先后培训县、区干部3000多名。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共陇东分委贯彻党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的精神，把干部教育与整风运动紧密结合，认真学习整风文件，联系实际进行思想、工作检查，使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陇东地委、专署为使在职干部教育正规化、制度化，在分区和各县、区都成立学习指导委员会，各乡成立学习小组，建立健全各项学习考核、奖惩制度。县以上干部除进行业务教育外，还组织干部进行理论学习；区级干部以学习文化为主，政治教育与业务教育为辅；乡村干部以识字、扫盲为主。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分区各县举办区、乡干部训练班，培训区、乡干部522人。

1943年，陇东地委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第一”的指示，对陇东中学的教学进行调整，增加对干部教育的任务，开设了地方干部训练班(简称地干班)。地干班培训的对象主要是区、乡级干部和少量的县级干部；特别注意对妇女干部的培养和提高，开设了妇女干部培训班。地干班的教学原则是，“因人施教”、“学以致用”和“理论联系实际”；目的是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政策水平，增强群众观念和革命观念。陇东中学地干班从1943年招收第一届学员开始，到1947年上半年，共培训干部308人。通过学习教育，陇东各级干部的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普遍有了提高。此外，1936年7月至1937年8月，红军大学，三科先后在环县、庆阳办学；1943年2月至抗日战争胜利，抗大七分校先后在陇东根据地合水、华池等地办学，培养了大批军队和地方领导

干部及专门人才。

繁荣和发展文化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文化事业也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1939年6月，庆环分区在曲子镇创办了陇东第一所艺术学校——庆环农村剧校，为陇东各地农村业余剧团培养了大批文艺专业人才和骨干，并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创作和编排了《破奸计》、《再上前线》、《排长起义》、《坚壁清野》等许多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剧目，到陇东各县进行宣传演出，受到群众的热情欢迎；1940年，在专署专员马锡五亲自指导下，陇东分区以庆环农村剧校为基础，组建起陇东剧团，积极创作和演出反映根据地现实斗争生活的剧目，剧团的文艺骨干也不断得到充实，剧团成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创作和演出水平都有明显提高。陇东剧团长期深入基层为群众服务，以根据地现实生活为题材，排演了《白毛女》、《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王三宝转变》等许多剧目，深受广大群众热烈欢迎，也受到中共中央领导和边区政府的称赞，毛泽东亲笔为剧团题词："向前进，勇往直前！"在陇东剧团的带动下，全分区各县均先后组建业余剧团，自编自演了许多丰富多彩的反映根据地革命和建设的节目，活跃群众生活，鼓舞人民抗战热情，促进了陇东群众业余活动的兴起。边区抗战剧团、战火剧团、关中剧团、三八五旅和抗大七分校等宣传队等也先后到陇东各地巡回演出，推动了陇东群众文化活动的发展。

1942年，全区各县认真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开展文艺普及运动。延安一批专业文艺工作者来陇东体验生活，指导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使全区群众文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一些剧团骨干和农民业余作家在创作中，利用群众熟悉的民间曲调，填上宣传抗日生产、歌颂边区政府和人民领袖的新歌词，唱起来顺口，听起来通俗易懂，深受群众的喜爱。如配合大生产运动的《兄妹开荒》、《边区十唱》（即《军民大生产》）、《订生产计划》、《合作化人员》等，配合扫除封建迷信的《山神算卦》、《常大郎拾元宝》、《王三宝转变》等，配合文化教育的《夫妻识字》、《上冬学》、《讲卫生》等。1943年，陇东群众性的

秧歌运动兴起，陇东地委、行署十分重视对新秧歌运动的领导，陇东县秧歌队创作并演出一批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新秧歌，使传统文化推陈出新，赋予新的内容，创造了灿烂的革命文艺。每逢新年春节或重大庆祝活动，几乎所有村镇都要耍秧歌，到处敲锣打鼓，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人们扭秧歌，跑旱船，打腰鼓，打霸王鞭，载歌载舞，歌唱边区生活安定、五谷丰登，歌唱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好领导，把群众性的文化活动推向高潮。

1944年1月，中共陇东地委召开分区文艺座谈会，确定陇东分区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为，以戏剧为主，采用民间艺术形式，向工农兵群众做普及宣传教育；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与政治教育；大胆创作，设立创作奖；化整为零，深入到农村、连队中去，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文艺演出活动；加强对各宣传队和剧团的政治领导。在陇东群众性文化活动中，群众业余创作十分活跃，当地民间艺人与专业文艺工作者密切结合，创作出一批优秀的作品，如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十绣金匾》、《军民大生产》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作。曲子县农民诗人孙万福创作的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经作曲家贺敬之修改润色和谱曲后，在整个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广泛流传，久唱不衰，成为传世之作。新宁县的刘志仁对旧社火的形式大胆改革创新，把秧歌的唱调和跑故事的舞蹈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实实在在反映根据地群众生产生活的新秧歌剧，采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曲调，填写上新编写的故事和歌词，由他领导的五六十人的社火队几年间先后演出了由他编排的20多个新秧歌剧，受到群众极大欢迎，流传甚广。新正县的汪庭有怀着对革命领袖、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感激和热爱，利用陇东群众喜闻乐见的《绣荷包》曲调和表现手法，创作出民歌《十绣金匾》，后经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提炼和润色，成为今天流行的优秀民歌《绣金匾》。1943年，环县农民诗人孙万福参加了延安劳动英雄大会，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刘志仁和汪庭有在1944年边区文教代表大会上，荣获边区甲等艺术英雄称号。汪庭有创作的《十绣金匾》被评为边区文艺佳作。刘志仁被边区文教代表大会树为特等艺术英雄，获“新秧歌运动旗帜”奖旗一面。

陇东根据地群众文化的发展，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人民的政治觉

悟，发展生产和巩固边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夺取抗战胜利的精神武器，使陇东根据地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成为文化先进地区，为巩固和建设边区做出了贡献。

发展医药卫生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分区为改变根据地医疗卫生条件差，缺医少药的状况，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医务人才，设立医疗机构，医疗卫生事业也得以迅猛发展。1937年9月，庆环分区保安处设立卫生队，有医务人员10余人，除为分区干部和当地驻军服务外，坚持经常下乡为群众看病，宣传卫生常识。1937年冬，八路军第三八五旅军医处随旅部驻庆阳县城，有医护人员20余人；八路军第三八五旅第七七〇团卫生队随团部驻庆阳县驿马关；警备第二、第七团分别在曲子、合水组建起了两个卫生队，有医务人员70人，这些部队医疗单位既为部队指战员也接收当地群众患者。1939年秋，三八五旅军医处与原红军教导师医院合并为三八五旅野战医院，共有医务人员30余人。1941年，边区卫生处又从白求恩和平医院调来数名医术较高的医生，加强了医院的技术力量，陇东各地病人纷纷前来就医。野战医院在庆阳县和华池县开办2个保健药社，积极为当地群众医治疾病。1942年1月，陇东分区正式设立卫生所。

1941年初，陇东分区根据边区政府的指示在曲子、华池、环县等地设立了医药供销处，并要求各县开办保健药社，促进根据地的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同年4月，陇东分区在部队医疗单位支持下，在庆阳举办医疗培训班，培训卫生人员120多名，为分区各县培养了一批医疗卫生骨干。陇东分区各级政府还注重团结教育当地民间的中医、游医，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挥医疗技术和特长，壮大了卫生医疗队伍。1942年，陇东根据地各县建立县级保健药社。为解决当时医疗卫生经费困难，各地政府积极鼓励群众集资入股，办合作社性质的保健药社，解决医病吃药的困难。在创建合作药社中，按照边区政府规定的“股东、抗日军人及其家属吃药，一律九

折";"药社盈利30%,按股分成"[①]鼓励集资办药社的政策,不仅较好地解决了群众存在医病吃药困难的问题,也激发了群众集资创办卫生药社的积极性,陇东各地办起许多保健药社。各地合作保健药社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就地采集药材,炮制加工成许多种中成药品,积极为群众医病解痛。在传染病流行时,对贫苦农民免费医疗和赠送药品,使广大群众减轻了疾病的痛苦和生活负担。如曲子县保健药社于1941年初建立后,在两年时间里为群众治病11444人次,研制成新的中成药品20余种,给群众免费送药品价值62万余元,药社资金由2000多元发展到700万元。

1943年下半年,三八五旅野战医院与陇东分区卫生所合并,改为陇东地方医院,除为干部、战士服务外,还积极为农民群众医治疾病,并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为群众服务。1944年,曲子县突发猩红热和耳下腺炎病流行,陇东分区医院即派出医疗队赴曲子医治,与曲子保健药社医护人员积极配合,很快控制了疾病的流行,治愈患者200余人,免收药费57万余元。陇东地方医院在成立后的一年内,共为农民群众节省医药费487万元。1945年春,三八五旅第五团卫生队在合水县西华池开办民生医院,开诊两个月,即免费治疗贫苦农民和军烈病人452人。1945年1月,陇东分区在庆阳县城成立了中西医药合作研究会,开办分区保健总社,中西医互相学习,用土办法研制出不少新品,治愈了许多顽症和疑难病患者。驻陇东的三八五旅、抗大七分校等单位,也为地方基层政府和群众捐助卫生费,帮助筹办保健药社,经常派出医疗队巡回医疗,为人民群众看病送药,深受欢迎。

陇东根据地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和保健工作。1941年,根据地各县普遍成立卫生委员会,积极向广大群众进行破除封建迷信、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宣传,开展禁止缠足与放足运动;宣传卫生科学常识,组织群众揭露巫神、马脚害人骗钱的把戏,开展反巫神活动,掀起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1942年,陇东分区结合大生产运动,以"摆擂台"、"打擂台"互相挑战、应战的方式,开展群众性的讲卫生运动,建立卫生模范点。1944

①甘肃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页。

年，分区各县都举办新接生法训练班，不少区、乡也举办新接生法训练班，妇幼卫生保健水平大大提高。新正县雷村举办的新接生法训练班成绩突出，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奖励。分区各级机关干部深入农村动员和组织群众修改茅厕、畜圈，改良水井、水源，逐步改变农村不讲究卫生的陋习，开展卫生防疫，净化卫生环境，使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1943年11月，陇东分区医院被边区政府评为边区卫生系统先进单位，荣获集体奖。1944年10月，在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代表大会上华池县保健药社被评为卫生战线先进单位，获集体奖；授予新宁县窦家湾村、华池县城壕村为边区特等卫生模范村称号；曲子县保健药社主任庞克道荣获卫生战线甲等英雄称号；新正县农民郭德林家被评为卫生模范家庭。

（四）陇东根据地的抗战支前工作

拥军优属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实施抗日民主政治制度，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开展文化教育建设，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坚持持久抗战，使边区成为巩固的抗战后方，解除抗日前线将士的后顾之忧，陕甘宁边区开展拥军优属工作。边区政府先后制定颁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义务耕田队条例》、《陕甘宁边区优待抗属代耕工作细则》、《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政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等一系列制度和法规，为边区的拥军优属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陇东根据地积极开展拥军优属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

陇东抗日根据地是老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光荣的拥军优属传统。抗日战争时期，陇东人民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参军参战，踊跃支援前

线，为巩固根据地自发地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在陇东各级党组织和民主政府的组织和领导下，每逢过年过节，学校组织秧歌队，群众主动筹集慰劳品，由党政负责同志带队慰问当地八路军驻军和军烈属，帮助他们向部队亲人写信，鼓励部队指战员杀敌报国。为解决军烈属的生产生活困难，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群众，组织常年性或季节性代耕队，为他们代耕代收，砍柴担水。对一些生活较困难的军烈属，政府不仅减免公粮捐税，而且还发放救济粮款。1938年春节，陇东分区拨救济款692元、粮食13石、硬柴5000余斤，解决110户抗属的生活困难。各级政府也经常组织群众集粮集物，使军烈属的生活有了保障。如在1941年，曲子县组织群众代耕队，为全县723户抗属代耕田地1353亩，筹集和发放救济粮食14.9石，现金784元；抗日群众团体发动1600人参加帮助抗属，慰劳粮食1.7石，现金125元。

党和民主政府的关怀，使军烈属们感到温暖，他们也积极参加生产自救，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政府的恩情，出现了许多值得赞颂的模范人物，新正县三区一乡的模范抗属张茬英就是一例。1939年，她动员丈夫参加八路军后，经常给丈夫送鞋袜、衣服和零花钱，给予关心和支持，鼓励丈夫在部队搞好工作。她主动承担家务劳动，尊敬公婆，解除丈夫的后顾之忧。她还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1944年纺纱45斤，织布13匹。1944年12月，她被新正县选为劳动英雄，出席陕甘宁边区群英会，《解放日报》报道了她的模范事迹。

1943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每年农历正月为八路军部队的“拥政爱民月”。1月17日，陇东分区专署召开扩大的政务会议，专门讨论拥军问题，决定农历腊月15日至正月15日为“劳军月”，并成立劳军委员会，由分区党政领导和抗敌后援会负责人、分区参议会的3位参议员共同组成，马锡五任劳军委员会主任，领导陇东分区的拥军优属工作。在劳军委员会的领导下，陇东分区迅速掀起拥军优属热潮。在劳军活动中，对参加抗战的国民党军队的军人家属，与八路军军人家属同样受到优待。1943年9月，陇东分区开展了当年第二次大规模的拥军活动。庆阳市各乡给八路军捐款122050元，鞋452双，以及袜子、肥皂等物品。庆阳市商会召开了商民大会，会上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准备发动内战的罪行，提出拥军捐款的建议，与会的217人捐款224000

元，会后将捐款送往三八五旅旅部。1月和9月，陇东分区两次拥军活动共捐献现金503677元，猪肉1510斤，羊68只，鸡838只，酒12担，各种蔬菜4627斤，以及毛巾、鞋袜、肥皂、牙粉等物品。1943年春节，庆阳县驿马关、赤城和庆阳市的群众慰问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部及送大匾一面，捐送烧酒、毛巾、白麻纸、布鞋、袜子、肥皂等物和现金7459元。

1944年农历正月，陇东分区展开轰轰烈烈的慰劳部队的热潮，各县群众纷纷组织起来开展拥军活动，慰问当地的八路军驻军部队，各种慰劳品总价值超过100万元。1月29日，庆阳市举行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拥军大会。华池县拥军工作显著。春节期间，华池县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带着慰问品羊55只、猪肉和现金等，冒着大风雪前往大风川，慰问八路军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指战员。当年华池县在开展拥军活动中，慰问部队的慰问品有猪肉470斤、羊61只、硬柴10万斤。1945年，慰问部队猪肉688斤、羊60只、蔬菜365斤、木炭2万斤、硬柴28万斤、鞋1300双。陇东根据地拥军优属工作的普遍开展，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陇东人民支援抗日前线

在陇东各级党组织和民主政府领导和组织下，陇东根据地人民在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开展拥军支前工作，使抗战支前工作得到很大发展。在抗战极为困难的时期，陇东根据地人民积极开展生产运动，踊跃支援抗日前线，倾其所有捐赠物品，慰问八路军前线抗日将士。1939年，根据地群众捐献毛袜1118双、毛手套1267双、毡袜子1872双、羊皮手套890双、现金1046元。1940年，当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胜利消息传到庆城，广大群众纷纷捐资劳军，慰问八路军部队。小商贩梁月亭原在国统区西峰经商，饱受国民党军队的欺压，被迫来到边区庆城经营。他处理掉自己经营的一部分商品，购得50件毛衣、100双袜子、50双手套转送给参战的八路军将士。仅在1943年的9个月中，陇东分区各县共捐现金503677元，猪肉755公斤，羊68只，鸡838只，蔬菜23135公斤，及黄酒、毛巾等物品。1937年抗战以来，根据地广大

妇女共做军鞋20多万双、袜子5000双，给战士洗衣服4000多套，纺线6000多斤，织布8万多丈，捐粮20多万斤，捐猪、羊、鸡5000多只(头)，柴草20万斤，以及蔬菜等物，有效地改善了部队的食宿与给养，支持了抗战事业。

保障前线抗日将士和边区政府的粮草及物资供给，根据地人民勤俭节食，争交救国公粮公草，帮助部队运输给养，积极参加战勤服务。从1941年至1946年，陇东分区共交救国公粮21.4万石，年均为3.6万石。根据地人民还按照边区政府战时动员法令和规定，积极参加战勤服务。1939年，环县出动牲口500头，为八路军部队运送被服。1941年至1943年，新正县先后组织投入人工9997个，出动担架463副，大车1025辆、驮畜5134头，为八路军部队转送伤员，运送粮草物资，并派民夫12020人次修筑工事。仅在1942年，环县动员民夫14617人次，支援八路军修筑工事，抽调牲畜703头，转送军粮军火等抗战物资。1943年至1945年，华池县共组织出动人工193886个，畜力58150个，运输粮食12404石，饲料296229公斤，以保障抗战前线对军需物资的需要。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人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全民抗战的号召，广大青年踊跃参加八路军和人民武装部队。陇东根据地到处出现妻子动员丈夫，姐妹动员兄弟，母亲动员儿子，爷爷奶奶动员孙子参加八路军的感人事迹。1939年，环县有202名青年应征入伍。1939年12月，华池县120多名青年应征入伍，元城区抗日自卫军营长高文秀，带领自卫军一个连集体参加八路军，受到陇东分区嘉奖。1939年到1945年，华池县有1734名、新正县有1016名青年参军。1941年，新宁县110人参军。1945年7月，陇东分区在全区扩招兵名额为2850名，广大青年积极应征，征兵任务如期超额完成。

陇东根据地人民还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形式拥军支前，开展了军民文化共建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伴随着根据地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丰富多彩、热火朝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迅速开展起来，一大批群众自编自演歌颂党和政府的好领导、歌唱八路军英勇善战、歌唱军民鱼水情的优秀作品不断产生，受到广大军民的欢迎。其中一些优秀的文艺作品，传遍了整个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每逢新年春节和重大的喜庆活动，根据地的党组织和

民主政府都组织机关学校的宣传队，群众业余剧团、秧歌队等到当地驻军部队慰问演出，与当地驻军部队举行文艺联欢，开展抗日军民文化共建活动，鼓舞八路军指战员的斗志，活跃部队的精神文化生活。军民文化共建活动，密切了军民关系，促使了边区社会文化新风貌的形成，同时也为边区新民主主义文化增添了异彩。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中共甘肃工委等党组织建立，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党在甘肃国统区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党在甘肃国统区工作取得成绩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等地方组织正确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很快打开了甘肃原来落后、封闭的政治局面，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浪潮到来时，又及时贯彻了“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及时调整工作策略。第二，认真贯彻党的全面抗战政策积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即使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靖远、徽县等地的党组织，仍能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办了不少实事，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使组织免于破坏。第三，党组织十分注重思想建设，提高党员的素质和党组织的战斗力，基层组织和党员在失去与上级组织联系的困难条件下，仍能自觉地坚持斗争。第四，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十分宝贵的经验。

虽然，在抗日战争中后期，由于甘肃工委领导机关被敌人破坏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撤离，各地党组织处于长期埋伏状态，党在甘肃国统区的工作一度处于低潮，但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所打下的良好基础，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党在甘肃的工作提供了新的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甘肃陇东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带领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不断开展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项建设。陇东党组织肩负着领导建设模范的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任，在复杂的斗争环境和艰苦恶劣的生活条件下，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使陇东党组织的自身建设

得到不断增强，在保卫和巩固陇东根据地的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成为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坚强的领导核心。

与国统区地下党组织不同，陇东根据地党组织是在公开条件下，通过民主政权，发动、团结群众，建设政权，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文化，使陇东抗日根据地成为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教育发展先进，军事巩固，社会进步的地区，成为陕甘宁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巩固和建设边区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如此，陇东党组织在如何通过政权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加强政权建设完成党的中心任务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探索，为马克思主义政权建设学说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陇东根据地的发展，为甘肃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可靠的战略基地。

宁　夏

一、宁夏工委的建立及其领导下的抗日运动

(一)抗战初期的宁夏形势

日本全面侵华和全民族抗日战争的爆发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进攻,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发展的唯一出路。只有这样,中国的各个阶级和政治派别才有自己的前途。为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①]。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强调"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并重申了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愿意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实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同纲领等四项保证。中共代表提出以《宣言》作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也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这番谈话，虽然表示了准备抗战的决心，但此时他仍未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把卢沟桥事变视为"地方事件"，仍"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八一三"事件后，日本的侵略已威胁南京，伤害了英美的在华利益，在全国要求抗战洪流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外交部于8月14日发表声明，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蒋介石急欲调红军开赴前线，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停止内战，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的实现，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受压迫、剥削最为深重，所以，抗日决心最大。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努力生产，支援抗战。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知识界，或脱下长衫奔赴前线，或以知识为武器，激励同胞揭露打击敌人。主要代表中间阶级利益的各民主党派，如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也发表声明，拥护政府抗战和国共两党合作，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民族工商业资本家踊跃认购救国公债，为前线捐赠钱物。上海著名企业家胡厥文等克服重重困难，积极组织厂商内迁。在新加坡成立了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其分支遍布东南亚各国。欧美等地的华侨纷纷建立抗日团体、宣传抗日，筹款捐资，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人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从反蒋抗日转为拥蒋抗日。全国各族人民、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爱国人

①《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

士、海外华侨汇成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洪流，使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抗战初期的宁夏形势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日寇占领山西、绥远后，在包头扶持蒙奸、回奸，准备进攻宁夏，侵占兰州，威胁西安，进而包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日本派遣特务潜入绥远、宁夏进行间谍活动，在宁夏管辖的额济纳旗东庙和阿拉善旗定远营（即今巴音浩特镇）建立驯马场、军用机场，开辟百灵庙——定远营——东庙之间的不定期航班。日本飞机多次到额济纳旗和阿拉善旗进行侦察，装卸军用物资。日本组织所谓经济考察团到宁夏，沿途测量地形，拍摄照片。日本还以建立“回回国”、“蒙古国”为诱饵，引诱马鸿逵投降日本。马鸿逵集团对日本侵华采取妥协、观望的态度，他们从其私利出发，既不愿站到反抗日本侵略的第一线，又不想让日本骚扰自己统治的地盘。这时马鸿逵的对日态度正像当时党中央驻兰州代表谢觉哉分析的那样：“马鸿逵虽（没）降日胆量，也没有抗日胆量。”①

“八一三”事变后，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千百万同胞惨遭日寇的血腥屠杀和蹂躏。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共合作新形势的推动下，为了民族的生存，纷纷拿起刀枪奋起抗日，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祖国的城乡。地处边陲、信息闭塞、封建统治严密的宁夏，也受到了影响，朔北朔南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

此时，日寇逐渐加紧对绥西、宁夏进攻的准备。日军大量增援包头，不断派飞机轰炸宁夏，宁夏将成为西部战场的要冲之地。迫于形势，马鸿逵提出了“发动民族、组织群众”的口号，其办法是“注重民众自卫力量之培养，与一般民众之组训，以充实地方势力”。②实质上是通过保甲组织和保安系统集训壮丁，使更多的居民和农民成为士兵和后备兵员，以壮大其军事实力，使宁夏的抗日工作军阀化。与此同时，马鸿逵还加强了北部黄河沿岸的防御力量。

①《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中《谢觉哉同志手稿选载》。

②马鸿逵：《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第7册，第156页。

自1937年冬天开始，分四期修筑国防工事，石嘴山、尾闸一带挖掘深、宽数米的壕沟，上面覆盖树枝、麦草、浮土伪装，以阻止日军装甲车、重炮之通过；在磴口以北百余里，断绝一切主要道路；将黄河两岸及贺兰山通道，均削为陡峭立壁，设置阻绝阵地，埋伏炮兵以备阻击日军。对日军采取保守防御的政策，但并不积极主动向日军进攻。

中共中央认真分析了当时宁夏的形势和马鸿逵的态度，估计日军可能进攻宁夏。倘若日军进攻宁夏，马鸿逵军事势力单薄，不是逃跑就是投降，绝无抵抗之可能；倘若宁夏沦陷，陕甘宁边区的处境将会极度困难。为此，中共中央决定，立即派人加强绥远和宁夏的工作。

中共中央派张子华来宁开展统战工作

1938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张子华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的身份，由宁夏驻陕西办事处主任柴成霖陪同，从西安来到银川做马鸿逵的统战工作。当时，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是：交涉在宁夏省城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我方被俘人员；解决边界有关问题；开展统战工作。

张子华向马鸿逵通报了1936年同（同心县）环（环县）民团赵老五偷袭环县民主政府，将红军干部朱子修等7人抓至宁夏关押和红四方面军部分女战士被俘的情况后，郑重地指出："现在国共两党已达成协议，政府方面已同意释放全部政治犯。这些被关押的人士都是国家良才，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正需要他们出来为抗日大业工作呢。"[①]马鸿逵在确凿的证据下答应"很快放人"。[②]事后，经多次交涉，才释放了朱子修、吴玉芳等7位我方被俘人员。

张子华提出："主席先生一再表示愿与我党修好，合作抗日，可否在银川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以便日后联系？"马鸿逵推诿说："此事关系极大，本主席难以作主，须请示中央政府定夺。"张子华又做了许多解释工作，马推托说："此事后议！"[③]张子华还提出解决边界问题，开放民主、动员民众抗战等问

①《国共密使张子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②《国共密使张子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③《国共密使张子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题。马鸿逵对此只讲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空话，没有作实质性的回答。

张子华在宁期间，虽然没有全部完成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但是却利用自己是宁夏人和其叔父王含章（国民党中央派驻宁夏省党部的特派员）的身份，利用宁夏旅平学生会的关系，宣传抗日救亡和我党的主张。如多次会见其在北平的同学、时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科长的袁金章、雷启霖，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建立了以袁金章为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小组。1937年12月，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成立时，工委书记李仰南[①]等人持张子华的信找到袁金章。袁、雷等人积极为他们谋求职业掩护，得以开展工作。张子华还动员王振纲（即王茜）、王栋、孟长有[②]、张致善等一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张子华来宁，为恢复和建立宁夏地下党组织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为日后党组织在宁夏开展工作起到了铺路搭桥的作用。

（二）中共宁夏工委的建立及其领导下的抗日运动

中共宁夏工委的建立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以便加强宁夏地

①李仰南（1910—1983），山西省新绛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在山西运城县参加革命。解放前曾任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书记、定边统战部部长、中共甘宁青工委宁夏部部长。解放后任沈阳工学院党委副书记等职。

②孟长有（1916—1941），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人。1937年7月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抗大学习。1938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迁至太行山后，孟长有随一分校到晋中南地区，担任分队长。1940年初受组织派遣回宁夏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在中卫县邮电局任职员，后到豫旺县（今同心县）小学任教，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40年4月遭敌逮捕，押往宁夏第一监狱，在狱中坚持斗争。1941年4月17日夜，被敌人活埋于银川城隍庙。

区的工作。中央决定：宁夏工委由杨一木[1]、李仰南、霍士廉（未到职）、苏文（即陆平）4人组成，杨一木任书记。杨一木上书中央称，由于本人在定边工作期间与宁夏方面的人员接触较多，不适合到宁夏国民党统治区秘密工作，另外，手头的工作暂时也离不开，要求中央另派人负责宁夏工委的工作。中央遂又任命李仰南为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在1941年和1968年填写的干部登记表中称“1937年10月至1940年2月任宁夏工委书记”；杨一木在1951年填写的党员干部简历表中载称“1938年1月至1938年12月任宁夏工委书记”。）经组织安排，李仰南携带张子华给袁金章、雷启霖的介绍信及早年同袁、雷同在北京俄文学校学习、时在三边特委工作的共产党员赵统儒写给袁、雷的信件，会同新任三边特委书记白如冰从延安到定边，同杨一木等人共同研究了赴宁夏开辟工作的问题，确定李仰南、李维钧、薛天民（敏）、何广宽[2]先行，与袁、雷建立联系，了解情况，站住脚后，再继续派人前往宁夏。

1937年11月，李仰南（化名杨学文）、何广宽（化名杨文卿）分别从定边前往宁夏城。李仰南持张子华、赵统儒的信件拜访了袁金章，袁表示愿为抗日救国效力，对李仰南来宁宣传抗日表示支持。袁通过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即高尚信）的关系，安排李仰南到实验小学任庶务主任，以此作掩护开展工作。不久，又把李仰南介绍给原北大学生、时任平罗县黄二完小教员王振纲（王茜）。李仰南请求王振纲带领何广宽去平罗县尾闸（现归惠农县）会见赋闲在家的雷启霖，动员他出来工作，掩护中共地下党开展活动。接着，李仰南多次去平罗、黄渠桥、石嘴山等地，通过王振纲、雷启霖结识了进步人士李冲和、叶松龄、雍民飞（即雍生善）、贺闻韶、刘廷栋等人。何广宽一时找不到合

①杨一木，1911年出生，曾用名杨志雄、杨寿亭，山西省临汾县人。1920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加入红军。解放前曾任汾河流域抗日游击队政委、中共宁夏工委书记、中共中央民委回民部长、中共伊克昭盟工委书记、陕甘宁贸易总公司政治处主任、晋西工委书记、晋南工委秘书长等职。解放后，任甘肃省工业厅厅长、中共兰州市委书记、甘肃省副省长、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常委、国家机械成套总局局长、新华社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国家机械工业部顾问等职。

②何广宽，1918年出生，陕西省子长县人。1934年9月参加革命，1935年12月入党。解放前，任中共金（积）灵（武）工作委员会书记、宁工委委员、宁夏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后，任中共宁夏永宁县、灵武县县委书记，宁夏省交通局副局长，甘肃省城建局副局长，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顾问等职。1990年5月离休。

适职业，暂以卖书报的名义，往来于银川、平罗、黄渠桥、石嘴山等地，主要做中、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此后，李仰南又去宁夏南部的吴忠、宁朔、中宁等地了解情况，先后与梁大均、马云泽（即马思俊，1926年入党，1933年到宁夏瞿靖堡养病与组织失去联系，时任宁朔县宋澄堡小学校长）等人建立了联系。另外，还通过苗培植（中共地下党员、马英才旅副官）的关系，把从三边调来的党员李维钧安排在马英才部队，专门进行兵运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原在北平、天津读书的宁夏籍学生陆续回到宁夏，他们多在教育界工作。1938年春季开学前，经王振纲、贺闻韶、刘廷栋等协商，通过宁夏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宁夏中学教导主任阎廷栋向省教育厅推荐，任命刚从北平回宁的进步大学生俞占鳌担任平罗县教育科科长，撤掉了省地政局局长的亲信王定一教育科科长的职务。俞占鳌上任后，根据王振纲等人的建议，对平罗县城镇小学进行整顿，撤换了一批思想守旧的小学校长，任命了思想进步、作风正派、有事业心的雍生善、叶松龄、刘堂琛、谈尚庸等分别担任黄渠桥第二完小、石嘴山完小、宝丰完小、姚伏堡完小的校长，使平罗县各主要小学的领导权都掌握在进步分子的手中，为安排掩护地下党员在各学校开展革命工作，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铺平了道路，创造了条件。

李仰南在掌握了宁夏的情况并作好上述安排之后，于1938年1月返回延安汇报工作，要求上级党组织继续派人到宁夏开展工作。

1938年2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和三边特委先后从延安和定边抽调共产党员苏文、孙芳山（化名张芳山）、萧子珍等人到宁夏工作。苏文先被安排在马英才部当文书，准备配合李维钧做兵运工作，由于他不习惯军队生活，后来又被安排在平罗小学当教师，负责平罗县城一带的工作。孙芳山有文艺特长，被安排在宁夏中学任音乐教员，组织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萧子珍，是经过长征的女干部，与李仰南以夫妻名义，租房住银川，主要从事红军长征中被俘后在马鸿逵兵营做苦役的原红军女战士的工作。薛天民被安排在掌政桥谢冒家店铺当学徒，主要负责省城至定边之间的交通工作，薛暴露后何广宽接任交通。1938年4月，党组织又派江生玉、金三寿、马宗彪来宁工作。江生玉是宁夏中宁人，在家乡以小学教师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金三寿、马宗彪

系宁夏吴忠堡回族青年，回家乡从事回民工作。此时，杨一木也来到宁夏，在平罗县黄二完小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

1938年夏，曾混入我定边回民游击队并在三边分区定边县学习过的马鸿逵特务、便衣队副队长马子成回到宁夏。李仰南、何广宽在银川街头曾几次碰到此人，见他身着国民党军装，行动诡秘，遂引起警惕。因为来宁的部分地下党员与马子成在定边相识，为了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工委决定利用放暑假的机会，将大部分党员撤回陕甘宁边区。李仰南、杨一木到定边、延安汇报工作，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决定对在宁夏工作的地下党员进行调整。

1938年8月，各学校开学之前，陕甘宁边区党委又派白玉光、杜琳、李宜成（化名李宛）、蒙兴中（化名李平山）等中共党员到宁夏工作。他们到定边后同李仰南、杨一木商议了到宁夏的路线和去宁后的工作安排。白玉光是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派他到宁夏是想加强宁工委的领导力量。但是他到定边后生病，直到1939年初才到宁夏，先在马云泽处任代课教师，后到宁朔县汉坝小学任教。李平山和李宛由杨一木带到黄渠桥，通过李冲和、刘堂琢、叶松龄的关系，分别安排在宝丰完小和石嘴山完小任教。苏文在平罗工作期间受到敌人的监视，不宜继续在平罗工作，由杜琳带到中宁，因找不到工作作掩护遂返回定边。杜琳是宁夏省城人，到中宁后由亲戚介绍先在中卫县兴台寺小学任教，而后，又转至省城西门小学、新城小学任教。李仰南返宁后，因考虑到特务马子成的关系，不能继续在实验小学工作，便隐蔽在掌政桥那位同乡的店铺中，改名杨维宝，以商人的身份，领导宁工委的工作。

1938年至1939年，中共宁夏工委，先后在宁夏各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党组织的力量。新发展的党员有：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教员杨文海[①]、薛云亭（薛嵩山）；宁夏中学学生吴景惠、黄子华、霍纯锡；省城小学教师成明儒；黄二完小教师李东甫、郭英教，学生常凤翔；石嘴山完小学生王延（原名沈耀龙），并恢复了叶松龄的党籍；宝丰教员王福寿、马焕如；中宁恩和小学教师安秉性、马成汉（又名马少波）。另有1938年送往延安抗大学习入党后派回

①杨文海，化名侯振斋，字亦人，山西省人。1937年从山西来到宁夏，在实验小学任教导主任，组织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延安抗大学习。解放后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宁夏工作的贺闻韶、杨森林、王世同、姚怀廉等人。据1940年冬，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在宁夏工作撤回边区的人员编写的《抗战中宁夏党的工作》记载，1938年中共宁夏工委下属5个支部，32名党员，其中，宁夏中学支部，党员11人；省城支部，党员5人；黄渠桥支部，党员5人；石嘴山支部（包括宝丰），党员4人；吴忠堡回民支部，党员5人；中卫县派去党员1人，又发展1名新党员。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的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对国民党政府由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在此大气候下，马鸿逵公开反共，大肆逮捕共产党人，限制、破坏抗日宣传活动，宁工委的党员干部陆续撤离。10月，杨文海在高立天、涂春林、杨茂林的掩护下，离宁赴延安。12月，杨一木、李东甫在李冲和、熊根子的掩护下返回边区。1939年春，李平山、李宛也被迫撤回边区。加之1938年秋把一批进步青年送往延安，削弱了党在宁夏的骨干力量，党的工作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宁工委领导下开展的主要活动

中共宁夏工委建立之初，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加之宁夏又与陕甘宁边区毗连，所以，马鸿逵也不敢公开禁止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有时，还发表一些支持群众抗日的言论。另外七七事变前后，在北平、天津等地求学的宁夏籍学生先后回乡，多在教育界工作。他们在平、津读书期间，在我党的影响下，由共产党员张子华、孙殿才和进步分子袁金章、雷启霖等人发起组织宁夏旅平学生会，其会员中的绝大多数人参加了当地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并进行了反对马鸿逵对宁夏人民实行反动、黑暗统治的斗争。他们思想进步，富有爱国热情，利用在教育界工作之便，进行抗日宣传教育活动，是我党争取和团结的一支进步力量。中共宁夏工委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和这批进步人士，很快在宁夏打开了局面，在建立、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壮大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培养革命骨干，开展学运和兵运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1.建立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在宁工委的领导下，在地下党员的组织、推动下，在爱国进步人士的全力支持下，以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为主力，从1937年冬，到1938年底，黄河两岸、朔南朔北燃起了抗日救亡的烽火，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宁夏建立的抗日群众团体主要有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后方抗战服务团、农村抗战服务团、小学教师战时教育研究会、回民教长战时教育研究会、文化书社等。宁夏实验小学、宁夏中学、贺兰立岗堡小学、平罗姚伏小学、平罗一小、黄渠桥一小、黄渠桥二小、宝丰小学、石嘴山小学、中宁恩和堡小学、宁朔县汉坝小学等学校，都先后建立了抗日团体。中卫中学虽未建立抗日团体，但在教师、中共党员尚钺（即尚建庵）的组织、领导下开展了许多革命活动。当时群众团体开展的抗日活动主要有：组织抗日游行示威，教唱抗日歌，演抗日戏，作演讲，写标语，办壁报，揭露日寇侵华暴行，颂扬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提高群众的爱国觉悟，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组织抗日募捐，慰劳前方抗日将士（共捐款8000余元）；组织发行抗日报刊，共推销《新华日报》、《群众》、《全民周刊》、《中国农村》等报纸杂志17000多份。在众多群众团体中，宁夏实验小学组建的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和平罗县黄二完小成立的后方抗战服务团最为活跃、影响最大。

2.争取、团结进步人士，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宁夏地区建党时间较早，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有党的组织和革命活动，红军长征、西征时，宁夏的群众就受到革命的熏陶，宁夏又毗邻陕甘宁边区，革命思想易于传播，加之长期对马鸿逵的反动统治极度不满，所以，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早在大革命时期，宁夏就出现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30年代初，宁夏的一批知识分子到北平、天津等地读书，组织了留平学生会。他们中有的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反蒋抗日斗争；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坚持进步立场，同情、支持共产党，并同党组织保持了一定联系。这批知识分子回宁后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他们大多数

在中上层和教育界工作，与社会各界有着广泛的联系。

宁工委成立后，针对上述情况，积极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及其代表人物，发展、壮大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直接做袁金章、雷启霖、李冲和、高立天、杨文海的工作；杨一木做叶松龄、郑万福、王振纲、贺闻韶、郭英教、雍民飞及伊斯兰教教主马进西的工作；何广宽做雷启霖、李冲和、韩潮的工作；苏文在平罗期间做刘廷栋、谈尚彦、俞占鳌等人的工作；李平山在宝丰做刘堂琛、王福寿、李如檀等人的工作；江生玉在中宁做张致和等人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进一步团结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争取了其他方面的社会人士，扩大了统战政策的影响，掩护了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支持了党的工作。许多共产党员来宁后很快得到安排和保护，得以顺利开展工作。在敌特搜捕共产党员时，不少党员都是在进步人士的掩护和帮助下，才得以安全返回边区。

3.选送优秀青年赴延安学习培训

培养宁夏当地干部是中共宁夏工委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发动群众逼马抗日，准备日寇侵占宁夏后组织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完成今后党在宁夏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培养和造就一批熟悉宁夏情况，并与宁夏人民有着密切联系的革命骨干力量。因而，中共宁夏工委建立后，特别重视选送优秀青年赴延安学习培训的问题。从1938年春天开始，中共宁夏工委先后物色和选送了30多名优秀青年到延安，分别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和边区中等学校学习，如宁北地区的王振纲、贺闻韶（即李少白）、杨生贵（即汪毓斌）、王学文（即高力、王承业）、李发春（即李力）、郭英教（即郭育三）、李振声（即李东甫）、王福寿（即王南山）；银川地区的宋谦（即宋子谦）[①]、李志纯[②]、钱钺（即钱大钺）、李有祯（即李清惠）、饶钰旭、焦汉文（即解理）、王汉元（即江涛）、杨玉昆（即易昆）、李芳云（即刘旭）、杨文海（侯亦人）、薛云亭；银南地区的梁大均（即梁光富）、张致善、孟长有、王世均、王世同、张子玉、姚怀廉、王怀

①宋谦，原籍山西人，1938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八路军某连指导员，1941年在大青山战斗中牺牲。

②李志纯，银川市人，1938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陕西省高教局党组成员。

明、胡连升、高尚纯、杨森林、尚钺、江生玉、李振帮、马成汉(即马少波)、刘廷相等。这些同志都成为边区党组织和宁夏人民联系的主要桥梁。他们有的被党组织分配在边区和八路军中工作,有的被派回宁夏工作。

4.开展兵运工作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精神,宁工委对马鸿逵部队的工作,主要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通过交朋友、讲形势,提高友军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自觉抵制、反抗马鸿逵对日妥协、投降。

李仰南来宁后,党组织交给了他在马英才部队的几个关系。李先到马英才部队(驻尾闸、石嘴山)找到在马英才旅部任副官的苗培植,把从陕北派来的共产党员李维钧安排在该旅五团三营八连任文书,以此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李维钧对该连连长宁炳贤耐心细致做思想工作,激发了宁炳贤的爱国精神,他明确表示:如果日寇侵占宁夏,他绝不会跟马鸿逵撤退、投降,将带领部队上山打游击。

杨一木派王振纲、贺闻韶到马英才、傅作义驻石嘴山部队中宣传抗日。杨一木还通过郭铎教做原土匪头子,后被马鸿逵收编的"贺兰山王"郭栓子的工作,动员他一旦日寇侵占宁夏后到贺兰山打游击。

这一时期,由于马鸿逵对其部队统治很严,兵运工作开展困难,成效甚微。

（三）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和后方抗战服务团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新安旅行团在宁夏的抗日救亡活动

“新安旅行团”（原名“新安少年长途修学旅行团”），是1937年春由江苏省淮安县下河镇小学教师与高年级学生组成的一个实地学习考察团。由团长汪达之、团总务干事徐志贯率领，命行15人。他们原计划旅游全国，考察城市乡村和名山大川。宗旨是走入社会，接触群众，增长知识和才干，实践“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他们动身之前，曾向社会各界募集到一笔基金，用来购得电影放映机、留声机、扬声器、电影拷贝、唱片、幻灯机、幕布、防毒面具等器材及一些生活器具和药品。他们由苏北出发，经山东、河北、天津、北平转道平绥路到包头，再经五原、临河，8月到达宁夏境内。他们沿途每到一个城镇，都在公共场所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如向群众演讲、唱抗日歌、演抗日戏，放映“一·二八”淞沪抗战影片，播映日军暴行的幻灯片，讲解防空知识和防毒知识。他们边行走，边学习，边宣传。他们衣服单薄，到达金积县董府时已至初冬，董府热情好客的主人董文伦先生（清末将军董福祥后裔，现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为他们的抗日热情和求知欲望所打动，留他们在董府度过了漫长的冬天。1938年春，他们离开宁夏抵武汉，那时，全国半壁江山已沦陷，新安旅行团走遍祖国山川的愿望无法实现，大部分团员都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

新安旅行团在宁夏城乡宣传抗日救亡，历时半年多，在宁夏播下了抗日救国的火种，促进了宁夏教育界、知识界的新觉醒，激发了他们抗日救国的热情。

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七七事变之后，宁夏实验小学进步教师杨文海、薛云亭、涂冲林在校长贺自正、高立天的支持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是年冬，秘密成立了“西北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发展团员20余人，制定了“团章”、“团员守则”，编写了“团歌”，发布了“告西北同胞书”，选举宋谦、李志纯为正副团长，下设组织股、体健股和工作推进股。团章规定，少战团的宗旨是：“爱我中华，赶走强盗”，战斗口号是：“火线就是战场，战地就是课堂，唤起民众，一致抗日。”规定团员必须遵守组织纪律，做到三要，三不要，三不怕，即要服从组织决定、要保守组织秘密、要忠心耿耿为抗战和战地服务；不做亡国奴、不做汉奸、不做顺民，不怕苦、不怕难、不怕牺牲。为取得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杨文海带领学生多次向马鸿逵政府请愿，要求少战团赴前线为抗日将士服务。经过一番斗争，1938年1月，宁夏当局准于登记，改名为“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但只准在宁夏境内活动。

1937年11月，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到实验小学任庶务主任后，积极支持和指导少战团的工作，并先后吸收杨文海、薛云亭、高立天入党，由此，少战团的活动完全置于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之下。此后，少战团的抗日救亡活动便进入高潮，团员发展到100多人，先后组织了宣传队、歌咏队、剧团，走向社会，走上街头，通过漫画、演讲、街头壁报、唱抗日歌、演抗日戏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并两次徒步到各县宣传，历时3个月，走遍了全省各主要城镇，点燃了抗日救亡的烽火，激发了宁夏青年和民众的抗日热情，全省各地纷纷成立了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

少战团及全省抗日团体的不断涌现和革命活动的深入开展，引起了马鸿逵当局的注意。1938年7月，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下令“划一”全省抗日救亡组织，取消了少战团，杨文海、薛云亭与少数少战团团员赴延安参加革命，少战团遂解体。

后方抗战服务团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黄渠桥是宁北重镇，包兰公路穿过街心，黄河码头红崖子距此不远。当时这块弹丸之地就有2所小学，后来又成立了1所师范学校，1所中学。在落后闭塞的宁夏，这一小镇的交通、文化都比较发达。黄渠桥及其周围乡镇，有许多进步青年在外地求学，受进步思想影响较深。在新安旅行团和宁夏少战团的推动下，在从北平回乡的大学生王振纲、贺闻韶等人的影响下，在校长雍生善和进步人士李冲和、韩潮的积极支持下，1937年秋，黄二完小的抗日救亡活动就已蓬勃开展起来。1938年4月，共产党员杨一木到黄二完小任教后，很快团结了一批爱国师生，组织了“后方抗战服务团”，王振平任团长，常风祥任副团长，下设壁报、歌咏、演讲、话剧、军训、总务等股，经常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军事训练。后方抗战服务团的师生革命热情高，纪律严明，把军训和抗日救亡活动视为战场，形成了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战斗集体。他们主要开展了以下活动：创办阅览室，组织师生阅读《向导》、《抗战》、《群众》、《民意》、《解放》、《全民抗战》、《抗战文艺》、《文艺阵地》、《大众哲学》、《新华日报》、《青年自学丛书》等书刊，进行讨论，写出读书心得；办街头壁报，召开演讲会，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戏剧。唱的歌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毕业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演出的剧目有《军民一家人》、《小放牛》、《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机智抓鬼子》和哑剧《理发匠》等；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开设军体课，进行队列、匍匐前进、夜行军、打背包、木棍对打、游泳、爬山、防空演习、防毒演习等训练；开展献金、募捐，给抗战将士写慰问信。杨一木还向进步师生介绍陕甘宁边区和苏联的情况，并介绍他们入党、入团，选送一批优秀青年到延安学习。

这个弹丸之地的小学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活动搞得内容丰富、声势浩大，引起了反动派的惊惧和注意。1938年12月，特务马子成又在黄渠桥发现了杨一木，后来，杨一木等被迫返回延安，校长雍生善和进步教师被捕，革命活动被迫终止。

（四）宁工委遭敌破坏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侵华方针发生改变：对国民党采取“政治打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并以“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诱饵，引诱国民党投降。因而，国民党顽固派不仅不积极抗战，而且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攻，反复制造摩擦，全国政治形势开始逆转。

国民党“防共”、“反共”的逆流也席卷了宁夏。马鸿逵当局采取了一系列“防共”、“反共”的措施：首先，在宁夏与陕甘宁边区交界的主要据点驻守骑兵部队，增加岗哨，伙同特务机关，稽查出入边区的人员；其次，建立了省军警联合督察处和县军警联合督察分处，专事稽查所谓“共产党分子”，在公安局设立高级侦察队，搜罗特务、叛徒，专门侦察我地下党的活动；命令各县严密保甲组织，经常稽查户口，组织传递哨，以查防“共产党嫌疑”；还明文规定今后任用各级行政人员和学校教员时，无一定机关介绍，无长期居留宁夏之人作保证，概不得随意录用。1938年秋冬以后，宁夏当局“防共”、“反共”活动逐渐升级。马鸿逵公然下令取缔抗日团体，追捕共产党人，因而，特务机关加紧了对宁夏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的监视和侦破。

这个时期党的工作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宁夏党的工作混淆了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的界限，在敌人严令取缔抗日团体、疯狂搜捕共产党人的情况下，党组织和党员依然公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暴露了党员和积极分子，给敌人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提供了线索。1938年秋，打入陕甘宁边区学习的马鸿逵特务、便衣队副队长马子成回到宁夏，先后在银川、黄渠桥、吴忠等地遇到并认出了地下党员李仰南、萧子珍、杨一木、金三寿等人，加紧了对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侦察和监视。李仰南已经觉察到他在宁夏熟人太多，容易暴露，不宜继续在宁夏从事秘密工作，要求调换工作。组织上虽然同意李仰南的意

见，但由于尚未选定合适人选接替李的工作，指示李仰南必须把宁夏工作安排妥当后方可离宁。在此情况下，工委决定：全体党员暂时隐蔽。李仰南离开实验小学，化装成商人，改名杨维宝，隐蔽在掌政桥，秘密进行党的工作。但是，敌人并未放松对共产党员的搜捕。

马鸿逵对宁夏共产党员的搜捕工作首先是从宁夏省立实验小学教员杨文海和平罗县黄二完小教员杨一木开始的。

敌人对杨文海的监视工作，早在1938年春就已开始。国民党办的中山小学的一批“党棍”，曾多次到实验小学以参观为名，翻阅检查学生的作业，并向学生打探、了解杨文海的情况。宁夏《民国日报》记者，以“拜访”为名，闯入杨文海房内，翻阅了杨文海的书籍。1938年10月的一天，敌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高中第，突然闯入实验小学，借口“看望”杨老师，进行实地侦察。他们的阴谋当即被高立天、薛云亭识破，以杨文海不在学校为由，将其支走。之后，高、薛二人一面将书籍和有关文件、资料转移；一面安排杨文海脱险。高立天、涂冲林将杨文海送到黄河岸边杨茂林家，由杨茂林协助渡过黄河回到延安。当晚，敌人包围了实验小学，指名要抓“大汉奸侯亦人”（杨文海别名）（此时马鸿逵不敢公开打出反共旗号），但是，敌人的阴谋落空了。

敌人搜捕杨文海的阴谋未逞，又把目光转向少战团的另一位领导人薛云亭身上。同年12月，为避免日本飞机轰炸，实验小学进行防空疏散，迁往省城南边40里的永宁县养和堡。敌人到养和堡打探薛云亭的下落。当时薛云亭在宁夏中学任教，得知特务打探他的情况后万分焦急，又与党组织负责人联系不上，他便果断决定带少战团副团长李志纯跨过冰封的黄河，取道盐池县惠安堡一带进入边区。不久，刚入党的李有祯也进入边区。

1938年12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杨一木和李东甫到黄渠桥“德润昌”商号买四条屏，商号老板冯存子是学生家长，急忙将二位老师让进里屋，不料遇到正在冯存子里屋抽大烟的特务马子成。杨一木说：“天色已晚，看不清货物，改日再来买”，拉着李东甫就走。他们离开“德润昌”商号后，迅速转移至距黄渠桥20多里的郭英教家中，之后又转移到贺兰山脚雁窝池一学生家长熊根子的煤窑中躲藏。后来，在李冲和、熊根子的资助和掩护下辗转离开宁

夏，回到定边。那天夜里敌人搜查了黄二完小及其他教师的家，搜捕杨一木的计划落空。

马鸿逵特务机关（军警联合督察处）和国民党中央设在宁夏的特务机关（国民党宁夏党部调查统计室）逮捕杨文海、杨一木的阴谋破产后，进一步加强了在全省范围内的侦察活动，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处境极度困难。为了安全起见，工委决定将大部分党员撤回边区。在进步人士的掩护和帮助下，地下党员薛云亭、苏文、孙芳山、萧子珍、何广宽、金三寿、马宗彪、李平山、李宛、李东甫等人相继撤离宁夏返回边区。原少战团和后方抗战服务团的骨干，有的被送往边区；有的升学；有的就业，剩下一些年龄较小的团员，无法开展工作。党组织虽然在1939年冬派白玉光、杜琳等人来宁，限于当时的形势也无法开展工作，所以，1939年宁夏党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1939年10月，中央研究了宁夏地区党的工作。决定派崔景岳[①]、王博（即王连成）到宁夏接替李仰南的工作。

1939年11月，李仰南回延安汇报工作期间，在延安会见了崔景岳，把宁夏情况向崔景岳作了介绍，并约定在宁夏中宁县由地下党员张重义、朱官义、刘顺则、张经堂开办的经营烟酒茶糖的“协记号”商店接头，再作具体交接手续。

1939年12月，崔景岳会同王博由延安出发，绕道云阳镇，经平凉、固原来到宁夏省中宁县。李仰南则从定边出发，经盐池到达中宁县城。12月下旬，他们在“协记号”相会。接头后，王博被安排在宁朔县小坝小学白玉光处，崔景岳被安排在宁朔县宋澄堡小学马云泽处，以代课教师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安排妥当后，李仰南带崔景岳到各地交接工作，了解情况，同党员和进步人士取得联系，并对党的基层支部进行整顿，确定了党支部负责人：黄渠桥支部由郭英教负责；宝丰支部由王福寿负责；智垣城支部由杜琳负责；宁夏中学支部由吴景惠负责；中宁支部由江生玉负责。1940年春节后，李仰南交代

①崔景岳（1911—1940），陕西省旬邑县人。原名崔廷儒，化名崔皓、健任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陕西许多地区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兼省委秘书长、中共西兰特委书记、中共西兰地委书记、中共宁夏工委书记等职。1940年4月被宁夏军阀马鸿逵逮捕，在敌人的监狱里、法庭上和刑场上，坚贞不屈，英勇斗争。1941年4月17日英勇就义。

完工作后，经定边返回延安。崔景岳回到汉坝与白玉光、王博研究工作，确定重建宁夏工委。

1940年3月初的一个夜晚，在汉坝小学召开会议，重建了中共宁夏工委，崔景岳任书记，白玉光任组织委员，王博任宣传委员。确定汉坝小学、宋澄堡小学作为宁夏工委的工作机关。会议确定当前的主要工作是：日寇已进攻绥西，可能要侵占宁夏，要积极组织力量，准备游击战争；马鸿逵已公开反共，要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严格区分并紧密结合起来；对从延安回宁夏，身份已经暴露的本地党员，如江生玉、王世同等人，组织他们撤回边区；为壮大党的力量，应进一步发展秘密党员；对各基层支部，由工委成员分工负责。当时宁夏有5个党支部，26名党员。还有在中卫和同心海如小学任教的王世同、孟长有等党员。会议决定由崔景岳负责将会议情况写成报告报送边区党委。

崔景岳到中宁写完报告后，找来江生玉，让他将报告送往延安，并再三叮嘱："半个月内务必动身，如果届时走不了，就把报告烧了。"江生玉回家乡中宁县恩和堡后，把报告夹在一个账本里，锁在抽屉中，延误多日，既未动身去延安，也未将报告销毁。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由于胡宗南进犯延安，宁夏的形势日益紧张，马鸿逵则变本加厉地对宁夏地下党组织和党员进行侦查搜捕。由于宁夏的抗日救亡活动是各学校带头进行的，所以，他们把学校作为重点侦查的对象。宁夏教育厅会同敌特机关全省中、小学教师进行登记，特别对从延安回宁任教的教师进行重点审查和秘密监视，对有些从延安回宁的教师如姚怀廉、王世同等人进行了诱降活动。

1940年3月，敌特机关调统室主任、中统特务马孝贤和省教育厅厅长骆美焕共同策划，把原抗大毕业生、时在新城小学任教的共产党员杜琳作为重点突破对象。派马效贤的助手、便衣特务李郁华到新城小学任实习教师，与杜琳同住一个房间，专门对杜琳进行盯梢、侦查。李郁华诡称他是东北流亡学生，并伪装进步，常常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以骗取杜琳的信任。杜琳丧失警惕，很快中了敌人的圈套，暴露了自己。4月上旬，杜琳准备把他在西门小学新发展的党员马明儒介绍给崔景岳，因此写信给马云泽，邀崔景岳于4月13

日晚上到他家有要事商议。杜琳下午放学后从新城返回老城家中，见崔景岳已在等他。李郁华一直暗中尾随杜琳，见杜已回家，便在西门打电话告知马效贤。午夜，马效贤、李郁华及军警联合督察处中校科长徐宝璋率20多名宪兵冲入杜宅，将崔、杜押往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

马效贤和军警联合督察处主任高中第首先提审杜琳，杜承认自己是抗大毕业生，中共党员。敌人又提审了崔，并从崔身上搜出了马云泽让他到银川采购书本教具的证明，问崔是干啥的，崔说："过去是商人，现在宋澄堡小学义务代课"。敌人问："到银川干啥？"崔回答："购买书、教具。"敌人当夜逮捕了书店老板、进步青年陈选民。次日，逮捕了马云泽。14日，再审杜琳，在酷刑下，杜供出了宁夏中学学生吴景惠、霍纯锡、黄子华是共产党员，3人当天在董府被捕。15日，敌人又到中宁逮捕了江生玉、王世同、姚怀廉，到同心逮捕了孟长有。

江生玉被捕后叛变，向敌人供出崔景岳是宁工委书记，并供出了白玉光、王博及崔景岳写给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报告。敌人一面逮捕了白玉光、王博；一面派人搜出宁工委的报告。敌人按报告标明的12处联络点，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先后在平罗、黄渠桥、宝丰、石嘴山一带逮捕了雍民飞、杨天伟、童山斗、党廉清、郭铎教、蒋春芳、马兴隆、叶松龄、李如檀、雷润霖、刘振彦、高立天、俞占鳌、王振平、王福清、李高峰、冒海珠、梁振基等3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16人。只有少数党员如郭英教、贺闻韶、杨森林脱险。敌人的大肆搜捕，使宁夏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为了团结、教育、组织被捕同志坚持狱中斗争，1940年5月14日下午，在难友们的掩护下，由崔景岳执笔，给边区党委和三边分区负责人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汇报了宁夏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斗争的情况，并成立了由崔景岳任书记，白玉光、王博、马云泽、孟长有为委员的狱中党支部。讨论确定了党支部今后的三项任务是进一步组织大家进行狱中斗争，并争取动摇分子；二是设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三是保护好身体，以利再战。崔景岳把自己的自行车卖掉，托人在狱外买来羊毛10多斤，组织大家捻毛线，织毛衣出卖，既解决了衣着单薄的问题，又改善了生活。为了活跃狱中生活，崔

景岳经常给大家讲故事、教唱革命歌曲，组织难友学政治、学文化。为了增强体质，他带领难友一起做“狱中早操”。党支部还领导大家开展了团结难友，争取自首分子，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字的政治斗争。

1941年4月17日深夜，中统特务高中第突然闯进牢房，喊着崔景岳、孟长有的名字。崔景岳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从容地脱下身上的棉袍送给战友。敌人把崔景岳、孟长有以及被捕的三边回民巡视团中共特支书记兼团长马文良（回族），押解到银川城隍庙后面挖好的土坑准备活埋。在活埋前敌人问崔景岳：“还有什么话说？”崔景岳说：“我本来不想跟你们说什么，你们要问，我就说上几句。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们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其所，但却死得其值。我遗憾的是祖国半壁河山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之下，你们不为民族着想，不积极抗日，却要积极反共，屠杀共产党人。你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扪心自问！”敌人恼羞成怒，用锹把、洋镐把崔景岳等3人的头骨、肩胛骨打折后推入大坑活埋。他们为革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崔景岳时年仅30岁，马文良时年仅29岁，孟长有时年仅25岁。

崔景岳等人牺牲后，狱中的党员又组织了由白玉光、马云泽、王博负责的党支部，领导大家继续坚持狱中斗争。被捕的人员，除16名共产党员外，其他人员多为各校的进步教师，他们大多数被逼无奈，在悔过书上签字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被保释出狱。白玉光、王博、马云泽、江生玉、王世同、姚怀廉等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雍民飞一直被监押到1949年9月宁夏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宁夏省委和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对宁夏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坏一案进行过两次调查和审理，江生玉被定为叛徒，判刑3年；杜琳被定为自首分子，判刑1年；王世同、姚怀廉被开除党籍。

（五）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的革命活动

1941年至1942年，日军集中主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连续“扫荡”，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蒋介石也调集数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马鸿逵为配合胡宗南、邓宝珊、马步芳等部，建立起东起金（金积）、灵（灵武）、同（同心），西迤黄河，南沿泾水，北至长城的封锁线，在宁夏加强“防共”、“反共”活动。首先，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严密封锁。在宁夏和陕甘宁边区交界地带构筑了“防共”碉堡线，分段设立哨所，派出大批步兵、骑兵沿线巡查。设立稽查站，并在各要道和黄河渡口设立关卡，盘查来往行人。其次，在全省实行国民身份证制度，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保连坐，一人出事，株连全甲、全保。因此，我党在马鸿逵统治区重建党组织的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但是，党在宁夏的革命活动并未因此终止。一些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在宁夏依然坚持了革命斗争。

1941年，中共党员何自成[①]、曹松林、毛达等人，以单线联系的方式，被党组织分别从湖南、重庆和兰州等地派来宁夏省城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何自成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在重庆“回民救国会”和“世界语函授学社”工作。1941年暑假，宁夏中学校长马汝邻到重庆受训，顺便请“回民救国会”为宁夏中学推荐教员，何自成被“回民救国会”推荐，应聘到宁夏中学任教。后来，担任庶务主任，兼教高中地理、历史课。

他在教学中，公开宣传抗日救国，也经常巧妙地宣传革命思想。他向进步学生介绍阅读《新华日报》、《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夏伯阳》等书

①何自成（1907—1943），回族，原名何春亮，山东东平县人。1931年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世界环游团出国留学，先后到达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后来入印度泰戈尔大学学习，掌握了世界语。1940年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其到宁夏开辟工作。1943年4月17日晚，被敌人活埋在银川城隍庙后。

刊。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书籍的内容，常将这些书籍包上书皮，另写别的书名伪装。他动员进步学生投奔延安，去寻求“这里学不到的新东西”，“到那里学习做人的道理”。

为了教育青年，发展革命势力，他与宁夏中学教师王植先共同发起创办了“宁夏中学世界语学习班”。他们通过这一公开组织，秘密联络了宁夏电信局无线电技术员凌蕃、报务员姚益庭、事务员王广仁；宁夏邮局邮务佐、共产党员毛英华（即毛达）、陈硕夫；宁夏驻军高射炮连排长刘裴等10多名具有强烈爱国心和正义感的革命青年，开展了一些革命活动。并为函授“重庆世界语”学社募捐基金。这些活动引起了马鸿逵军警特务的注意和严密监视。

正当他们酝酿建立党的组织时，不料1942年9月，邮政局邮务佐李培源用光华钞票（解放区通用的货币）嫖妓被拘捕。李供出是毛英华、凌蕃给他的光华钞票。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借口毛英华、凌蕃传播光华钞票而予以逮捕。此时何自成到阿拉善旗旅游，绘制了一张阿拉善旗地图，引起敌人怀疑，因此，也遭逮捕。之后，敌人又逮捕了曹松林、姚益庭、陈硕夫、刘裴，王广仁因事先听到风声而逃离宁夏。

敌人对何自成等人挨个审讯，用尽酷刑，打得何自成皮开肉绽，死去活来，但他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并与敌人据理力争，搞得敌人无言对答。敌人问：“为什么要办世界语学校？”何答：“世界语是一种语言学，开办世界语学校就是为学习、研究世界语。研究世界语犯什么法？”敌人又问：“你为什么要到定远营绘制地图？”何答：“我到定远营是利用暑假游历，我绘制地图是为了地理教学的需要。”敌人没办法，马鸿逵在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报告中沮丧地承认：对何自成“经多次审讯，始终不供只字”。

敌人多次提审何自成，均一无所获。马鸿逵呈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准备杀害何自成。经国民党中央批准，1943年4月17日晚，敌人将何自成押往银川城隍庙后活埋。何自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同时被活埋的还有陈硕夫、毛英华、刘裴。其他同案则以“奸党”、“危害民国”等罪名被长期监禁至宁夏解放。凌蕃、李国青病死狱中。姚益庭在狱中经受了锻炼，出狱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六）中共甘宁工委、金灵工委和河东工作组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中共甘宁工委的建立

1942年8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对甘肃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一般党员干部对“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理解不深，思想比较混乱。要求迅速整顿甘肃党的工作。“为了有计划地整顿和推进甘肃的工作，决定重新建立甘肃工委……”“甘肃党应设法在宁夏、青海建立党的组织”。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这一决定，西北局民运部部长贾拓夫召集陈成义、李仰南开会传达了关于组织甘宁工委的指示。不久，中共甘宁工委在庆阳正式成立，书记孙作宾，委员陈成义、李仰南等。

中共甘宁工委成立后派李仰南、穆德彪到盐池和三段地调查了解宁夏情况。

1943年7月，因受康生所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诬陷甘肃地下党是“红旗党”，甘宁工委负责同志几乎都被隔离审查。甘宁工委的工作暂时由陇东地委统战部副部长朱敏负责。后来，朱敏也被隔离审查，刚刚打开局面的中共甘宁工委的工作被迫中断。

中共甘宁工委从成立到结束仅有几个月的时间，所做的工作也是有限的。但是，它认真总结了建立和发展地方党组织的经验教训，明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和方针，为后来党组织的工作提供了借鉴。

中共金（积）灵（武）工委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1940年4月，中共宁夏工委遭敌破坏后，党对宁夏的工作由三边分区党委领导进行。鉴于马鸿逵统治集团统治严密，对边境封锁严紧，党组织不易

派人到宁夏国民党统治区内活动的实际情况，只能采取在靠近边境的地方建立党的组织的办法开展宁夏工作。为了打开宁夏工作的困难局面，三边分区党委决定：首先，从宁夏逃到边区的移民、难民和逃兵中开展工作；其次，因为宁夏是个回族聚居的地方，特别是靠近陕甘宁边区盐池县的金积、灵武、同心一带，回族人口较多，做好回民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共三边地委在盐池县委和政府的密切配合下，从妥善安置移民、难民，争取团结回民入手，逐步向马鸿逵统治区内扩展。

为了进一步开展党对宁夏的工作，1942年9月4日，三边分区党委研究决定成立中共金（积）灵（武）工作委员会（又称河东工委，代号ABC工委）。《决定》指出："我盐池边境与金积、灵武、惠安堡（国民党盐池县政府所在地）毗连200余里，双方居民经常来往不断，且我区之士绅、非党的、党的干部及党员多在金、灵、惠有亲友关系。根据多年来对宁夏工作的经验，利用此种适当的关系，施以适当的教育，在职业的掩护下，进行中层的统战工作和下层的建党工作及社会调查工作是非常可能的，以现有力量，实为开展宁夏工作的第一步。"1942年9月中旬，金灵工委正式成立，何广宽任书记；许宗岳、江云分别任组织、宣传部长。先后参加工委工作的干部有张万福、李占荣、马盘山、邵占奎、孙占元、宫光等人。工委办公地点设在靠近灵武的曾家畔（盐池县三区政府所在地）。

根据三边分区党委的要求，金灵工委的主要任务是：首先，对宁夏国民党统治区逃到边区的移民、难民、逃兵进行妥善安置，帮助解决住房、口粮、耕地、耕畜等困难，使其安居乐业。通过他们宣传共产党和边区民主政治的好处，对其中的进步分子发展入党；其次，对宁夏国统区中上层人士调查了解，选择工作对象，建立工作联系，再通过他们向马鸿逵统治区展开工作；再次，设法恢复原有的统战关系，如恢复与吕士元、孙学秀、夏麟阁、何晓霆等人的联系。

金灵工委根据三边分区党委的上述要求，积极开展工作，在马鸿逵统治区建立的新关系有：磁窑堡煤矿工人苗发明，灵武县城东门外居士李善堂，灵武东山大洋其农民李成福，石沟驿煤矿工人杨全林、彭学礼，金积县鲁庄子农

民鲁光宝等。鲁光宝、李成福等后来均发展为单线联系的共产党党员。

通过这些关系，进一步了解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工委还对国统区的社会名流、士绅、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政府人员进行了解，为研究和开展宁夏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提供了线索和资料。

1943年2月，因开展整风运动，金灵工委停止活动，工委成员许宗岳、江云调往三边地委工作，何广宽调往盐池县委工作，1943年3月1日中共金灵工委撤销。

余庄子、红井子、三段地工作据点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1940年夏，三边地委提出了加强外部工作的问题，并制定了在宁夏国民党统治区建立党组织，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的方针。同时，派出宁夏籍和熟悉宁夏情况的干部，在盐池县二区余庄子、五区红井子和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三段地建立了3个工作据点，积极开展对宁夏方面的工作。中共三边地委决定：余庄子据点由梁大均、李健负责，活动范围为灵武、永宁、宁朔、贺兰4县；红井子据点由何广宽负责，活动范围为盐池、同心、金积、中宁、中卫5县；三段地据点由王延负责，活动范围为陶乐、惠农、平罗、磴口4县和阿拉善旗。

由于组织工作和干部力量有所加强，各据点的工作比较活跃，工作进展也较快。各据点进一步加强了在移民、难民中的工作，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经过考察、培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然后再通过这些党员，利用亲友关系，把工作延伸到马鸿逵统治区内，发展单线联系的党员。如三段地据点，先后发展的秘密党员有：永宁县的王克和、周广耀、周广智、朱九章；贺兰县的陈芳、邓万福、刘子和、殷学忠、邓广仁、徐生禄；陶乐县的李双双（即李发祥）、孙鸿谋、王登科；平罗县的仇思诚、仇思忠、郑尚仁、李荫选；惠农县的徐文彬、徐天才等。余庄子、红井子据点也发展了一批党员。通过发展党员，扩大了党的组织，并增进了同马鸿逵统治区群众的联系。还设法派人到马鸿逵统治区内开展秘密工作，收集情报。如余庄子据点负责人梁大均同三边保安处处长赵文献商量后，派保安处外勤人员何述田到中宁与梁大均的好友李振帮（时任马鸿宾八十一军中宁县石空军械仓库少校参谋）取得联系，李提供了不少

有用的军事情报。1945年，李振帮经梁大均、李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边地委统战部派马少林、杨占彪等人到金灵地区活动，对马鸿宾八十一军中宁南营房驻军进行策反活动，该部孙克仁、张俊、张凤元、柳洪隆等于1944年8月脱离该部，逃往定边，后参加了回汉支队。1945年2月，中宁县彰恩堡农民刘廷相到定边，找孙殿才要求参加革命。孙将刘派回中宁，以放羊为掩护，收集、传送了许多情报。

中共河东工作组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为了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协调、促进各据点的工作，中共三边地委于1945年3月决定成立中共河东工作组，组长赵文献，副组长梁大均，成员何广宽，统一领导3个据点的工作，并明确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方针是："以建党为主，走农村路线，深入下层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同时不放弃任何有机会的统战工作。"到1945年底，发展党员60名。并决定将余庄子、红井子两个工作据点改为工委。1945年12月，中共三边地委在盐池县召开了河东工作组会议。鉴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出现的新形势，进一步提出大量发展党员的方针，主要对象是工人和贫苦农民。并要求培养党的核心骨干力量，领导工厂、农村群众的自发斗争。把建党工作同群众的自发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同时，重视和加强中层统战工作。此次会议后，各据点都加强了党组织的发展工作。截至1946年2月，在宁夏国统区共发展党员131名，分布于宁夏国统区的11个县。在中上层人士、国民党军队、政府中建立统战关系70多人。党依靠上述力量，掌握了宁夏国统区内党、政、军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消除了一些干部、党员认为宁夏工作难搞的顾虑，选派一批优秀党员回宁夏工作，为1946年5月中共宁夏工委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二、固原地区的革命斗争

1937年7月，由于中共陕甘宁省委撤销，固北县委隶属庆环分区党委领导。1938年4月，固北县委撤销，与固原县委合并。1940年5月，在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白色恐怖下，中共固原县委以及统战区建立的区委组织均被迫撤销，地下党支部遭敌破坏，党的活动由公开、半公开转入地下。固原地区党的活动由中共平东工委领导，平东工委坚持了“荫蔽精干，蓄积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继续坚持斗争。

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固原地区，有6个基层党组织一直坚持隐蔽斗争到固原解放。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共红河党支部。

抗日战争时期，海原、固原的回族农民，在红军长征、西征的影响下，于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间，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残暴统治和民族歧视，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接连三次爆发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特别是第三次起义失败后的余部，突破重围，奔赴陕甘宁边区，投入中国共产党的怀抱，组成了西北回族人民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回民抗日骑兵团。

（一）中共甘肃工委领导下的固原地区党组织及其革命活动

中共固北县委及其所属区乡抗敌后援会的革命活动

1937年10月，为适应国共合作的需要，根据庆环分区党委指示，固北县改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为抗日民主政府，在全县范围内进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阎志尊被选为固北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慕志斌、党志善、李志明分别被选为毛井区、庙儿掌区、车道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兰馨美、白明草分别被选为草庙、二龙山区抗敌后援会主任。县委、区委各组织系统依旧。县委书记为高锡堂。王仲检、连锡五、雷光辉、兰馨美、白明草分任中共毛井区、车道区、庙儿掌区、草庙区、二龙山区区委书记。

1938年4月，庆环分区党委决定撤销固北县委和县政府。固北县辖区分别与环县、固原县合并。固北县委撤销后，所辖毛井、车道、庙儿掌3个巩固区区委并入环县，在苦水掌成立了1个中心区委，由中共环县县委领导；所辖草庙、二龙山2个统战区区委交由中共固原县委领导。

中共固北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抗日民主政府）在其存在的1年零9个月中，领导所属区、乡抗敌后援会和人民群众，开展了如下革命活动：

1.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

固北县处于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交界地带。革命政权建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扩大根据地，特别是对统战区的巩固工作。县委和县政府，在所辖区、乡行政村中，根据不同情况，建立了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县、区、乡都成立了锄奸委员会，打击土豪劣绅和汉奸的破坏捣乱。在统战区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政权组织一律改称抗敌后援会。在5个区21个乡都建立了革命政权机构和党的组织。

2.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固北县委、县政府，领导区、乡抗敌后援会，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使经济落后、消息闭塞的固原人民，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积极动员起来，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固北县还组织了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工人联合会和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等群众抗日团体，在县委和县政府领导下，号召人民团结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抗日前线募捐钱物，筹集粮草，动员兵员，建立保安队、自卫队、警卫队，直接支援前线抗日。

3.加紧生产，征集粮草支援红军

1937年组织了大规模的开荒和大生产活动，隔年粮食丰收，征收公粮362石（每石折合500市斤），超额完成了原订计划。对一些囤积粮食，不愿捐草献粮的劣绅、富户，政府通令强行没收他们的存粮，然后把征集到的粮草统一交给红军部队，有力地支援了红军。

中共固原县委及其所属区乡抗敌后援会的革命活动

1937年7月，中共陇东特委决定将固原工委改为固原县委。李庭序任县委书记，刘文山任县委副书记。县委工作机构设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军事部和秘书室。下辖三岔区（下属3个乡，称巩固区）和麻子沟圈区（下属8个乡，称统战区）。各区乡均设有抗日救国委员会。10月，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发展的需要，便于开展统战区的工作，区乡抗日救国委员会一律改称抗敌后援会。中共三岔区委书记岳占军，三岔区抗敌后援主任吴庭玺。三岔区委下辖3个党支部（后移交曲子县委领导）。中共麻子沟圈区区委书记兼抗敌后援会主任为王稼祥，麻子沟圈区下辖2个党支部。

1938年4月，固北县建制撤销，将其所属的二龙山、草庙2个统战区下属的8个乡级抗敌后援会移交中共固原县委领导。1938年年底，又将二龙山区和草庙区合并为草庙区。中共草庙区委书记兼抗敌后援会主任为谢三锡。中共草庙区下辖6个党支部。1937年10月至1939年7月，又在麻子沟圈区组建了陈坪、邴家堡子、红河党支部，在草庙区组建了堡子崾岘党支部。

在这期间，中共固原县委领导区、乡各级党组织和抗敌后援会，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和抗日宣传活动。从1938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固原县军政当局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致使二龙山区委和草庙区委所属的6个党支部遭到破坏，许多共产党员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区乡抗敌后援会组织全部解体。中共固原县委面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的行径，领导统战区人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将已暴露身份的10多名党员干部撤入边区；将红河、麻子沟圈、陈坪、石家沟口、峁家堡子、堡子崾岘6个未暴露的地下党支部和68名党员隐蔽起来，交由平东工委领导。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继续坚持斗争，经受住了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严峻考验。1940年春，国民党向陕甘宁边区设置五道防线，企图彻底封闭边区，限制共产党的一切活动。胡宗南部预七师开进固原严加防守，修筑了许多碉堡，日夜轮流监视边区的一切活动。由于国民党的干扰、破坏，中共固原县委无法继续开展工作，1940年5月，中共庆环分区党委决定撤销固原县委。

中共平东工委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严重干扰下，我党在统战区的工作遭受严重破坏，将公开、半公开的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1940年5月，中共固原县委被迫撤销。固原地区尚未暴露的6个党支部，交由新成立的中共平东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

平东工委初成立时，由原固原县委、新区工委、回民工委以及镇原县管辖的南三镇、开边等党的地下组织组成。新区工委主要负责华亭、平凉、泾川、张家川一带的工作，吴铁鸣任书记。回民工委负责西海固、同心等民族地区的工作，李庭序任书记。中共平东工委书记吴思鸿，组织部长杨志超，宣传部长马兆祥。工委驻地先在马渠，1942年迁回三岔，以一个小商店——“天发祥”为掩护开展工作。这个商店既是工委的联络站，又是工委的工作机关。党派胡天龄以伙计的身份从事联络工作。工委向所辖各地区派特派员负责该地区党的工作。艾青山为固原特派员，李义祥为安口窑特派员，李有弘为泾川特派员，沈遐熙为张家川特派员，廖寿禄为平凉特派员，韩××为南三镇特

派员。另外，还从本地区未暴露的地下党员中选择了一批特派员，如固原城内一个姓黄的商人，固原、同心一带的回民李生荣，隆德的乔培仁等……工委特派员到各地后，与原来的党员发生联系，并在群众中广交朋友，了解熟悉当地情况，争取群众对党的支持。

固原特派员艾青山在平东工委成立之前的1940年3月，已由回民工委派往固原，负责领导固原地区石家沟口、堡子崾岘、崩家堡子3个地下党支部的工作。艾青山化名马德富，以卖布为名开展地下工作，人称“马布客”。后来，又结识了河南籍商人韩广喜、李唐杰，以乡亲关系开杂货铺和烧瓦罐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海固第三次回民起义时，1941年5月，马思义[①]曾派一阿訇携带信件与共产党组织联系，请求红军派人攻打固原。石家沟口党支部书记马义仁把送信人介绍给艾青山。艾立即带信前往边区汇报，边区领导答复：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敌人是日本侵略者，八路军不能出兵攻打固原。起义的农民如能坚持，就在那里坚持斗争；若不能坚持，就到边区来，我们表示欢迎，并保证其安全。艾青山回到石家沟口时，马思义已率起义失败的余部投奔边区。

平东工委在固原地区还设立了几个接待站，负责边区地下工作人员往来的食宿和安全。

平东工委还以三岔为基础，开展了民族统战工作。在三岔地区居住着50多户，300多口回民，他们绝大部分是不堪忍受国民党的暴政，从西吉、海原、固原、同心等地逃往边区的难民。他们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极为不满。平东工委对这些离乡背井的少数民族群众深表同情，极为关怀。在经济上，由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严密封锁，边区政府经济薄弱，边区人民生活极度困难，但边区政府和人民还是拿出一部分钱粮，帮助难民安家立业，解决衣、食、住的困难，拨给土地、耕畜，使其安居乐业。在政治上为了体现民族自主权，在三

①马思义（1914—1967），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沙沟乡沙沟村人。参加了海固第一、二次回民起义。第三次回民起义爆发，任团长，全权指挥。起义失败后，1941年6月率余部投奔八路军，任回民抗日骑兵团团长。1946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平凉军分区副司令员，中共西海固工委书记，西海固回族自治州第一副州长，军分区司令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委员，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宁夏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岔成立了回民自治乡人民政府。为了驳斥国民党诬蔑共产党“消灭宗教”、“共产共妻”的无耻谰言，平东工委筹措4石（约2000斤）小米，为回民修建了一座清真寺，给居住在这里的回民进行宗教活动提供方便。在三岔还开办了一所回民小学，派回族教师李明俭（苏采云）任教，动员回族少年、儿童入学读书。

党的民族政策深深打动了回民的心，他们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衷心爱戴，十分拥护。他们利用回老家、串亲戚之机，宣传党的政策，有的人主动承担平东工委的义务情报员，替平东工委收集敌占区的各种情报。党组织经过充分了解和考验后，在回民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如李庭荣、杨满鸿、杨宗寿、沈霞熙等人，又把他们派往回民地区工作。他们通过民族、宗教关系，利用人、地两熟的优势，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结识了许多朋友，在党的民族统战工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平东工委的工作方针是：荫蔽精干，蓄积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工作原则是单线联系，易地领导，重点在集镇发展一些能发挥作用的党员，在农村一般不发展党员。隶属关系上谁发展归谁领导。

1942年夏，平东工委书记吴思鸿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严克伦接任书记。1943年1月，严克伦调延安参加整风，李步瀛接任书记，李义祥、李子英为委员，这届工委一直工作到1946年解放战争时期。

中共红河党支部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到全国解放

红河村位于固原地区东南部，今彭阳县红河乡境内。红河地下党支部是1936年6月红军西征中在红河乡建立的抗敌后援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37年2月，中共庆环特委派李有福，三岔抗敌后援会派朱孟才到红河地区开展工作，对抗敌后援会进行了整顿，确定王兆鸿接任红河抗敌后援会主任，组织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并秘密发展了党员。1937年，党在红河乡先后发展了常仁义、刘荣、王兆鸿、王进堡等4名共产党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敌后援会的工作一下活跃起来。截至1939年7月，在红河抗敌后援会范围内，已发展党员15人。中共固原县委决定成立红河地下党支部，并派三位同

志前来整顿。在这次成立大会上,学习了党的基本知识,明确了党的主要任务;制定了铁的纪律;选举产生了党支部领导成员。会议规定党在当前的任务是:学习党的基本知识,明确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了解敌情,掌握敌人动态。会议提出,为了确保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必须加强组织纪律性,规定了四个不准:不准喝酒;不准通财;不准说假话;不准暴露党的机密。若有犯,必受党纪处分。会议选举王兆鸿为支部书记,王进堡任支部副书记,成立了3个党小组。

红河党支部自成立以来,在白色恐怖下,始终坚持秘密工作,隐蔽斗争,不但没被敌人破坏,相反不断发展壮大,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时11年。共产党员由成立时的3个党小组15名党员,发展到解放前夕的5个党小组52名党员,遍及红河乡的所有村庄,为革命保存了中坚力量,培养了党员干部,壮大了革命队伍。

红河党支部在11年的隐蔽斗争中做了许多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始终和上级党委保持密切联系,主动争取接受上级党委的领导。11年中,王兆鸿、王进堡等支部领导成员,坚持每月到边区一次,汇报情况,传送情报,请示工作,接受上级党委分配的任务,与边区党委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2)认真学习,提高觉悟,坚定信心。王兆鸿同志到边区总是带回一些文件和材料,把党员集中到山洞里学习,边学边议,研究敌人的动态,传达上级的指示,谈论喜人的形势。通过学习,认清了形势,受到了鼓舞,坚定了信心。

(3)发展党的组织。在白色恐怖中,对一些积极分子,经过深入了解,并交给一定任务进行考验后,积极、稳妥地吸收他们入党。红河党支部建立11年中,党员由15人发展到52人。

(4)搜集情报,散发传单。党支部及时、准确了解敌情,掌握敌人动态,及时向边区党委汇报。为了搜集情报,甚至打入敌人内部。如城阳六保保丁惠安民,出身贫苦,又是国民党下层人员,备受欺压,支部通过他的亲戚做工作,后来发展他入党。惠安民入党后继续当保丁,把城阳乡公所及各保情况向组织汇报,甚至得到了抓捕地下党员的秘密信件,及时送往边区,使许多地下党员脱险。党支部派地下党员王启祖打入敌自卫队,及时提供了自卫队的动

向，防止了敌人的破坏活动。支部成员经常从边区带回传单，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进行张贴，甚至把传单贴在作恶多端的乡保长家的大门上，贴在彭阳、固原、平凉的街道上，使敌人感到惊恐，使群众受到鼓舞。

(5)掩护和护送党员和八路军干部。红河党支部多次接待和护送组织上派到敌占区工作的同志，为他们安排吃住，护送他们顺利完成任务。1942年，党从元城子派2名同志去青海工作，沿途白区的关卡哨站很多，极不安全。他们走青海必须到平凉乘车，须经过敌人关卡哨所林立的一段很危险的道路。党支部派2名党员护送，乘夜赶往平凉并送上到青海的车后才返回红河。

(6)组织群众抗捐、抗粮、抗丁。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穷凶极恶，到处派款、派粮、派壮丁，搞得群众鸡犬不宁。党支部决定把大家组织起来，对抗国民党抢粮、款、拉丁。提出了“不让敌人抓去一个人，抢去一粒粮，拿走一分钱”的口号。党支部把60多名青壮年组成一支游击队，以镰刀、铁锹、锄头、棍棒做武器，白天隐藏，晚上出来活动。城阳乡公所到南沟里抓走袁士武，并抢去一些钱，党支部委员王永清带领游击队员抄近路拦截，将人和钱夺回。游击队的活动搞得乡保长魂飞胆丧。敌人在红河地区不但没有抓到壮丁，抢到粮款，相反，游击队还筹到一批钱粮，准备支援解放军。

(7)打击作恶多端的乡保长。国民党野王保保长高士杰、副保长王榜荣横行乡里，甚至上下炕都要群众为他们脱鞋、穿鞋。王兆鸿到环县向县委汇报后，县委派马照祥、杨志超于夜深人静时赶到野王保，把正在熟睡的高士杰、王榜荣从被窝里拉出来，打得皮开肉绽，呼爹叫娘。高士杰吓得离开野王保，王榜荣杀猪宰羊向乡亲谢罪，并辞去副保长职务。伪固原县代表雷凤山欺压群众，环县负责人李义祥率部队到华亭开会时，把雷抓起来，严厉训斥，指出再有不轨绝不饶恕。雷发誓再不敢胡作非为。

(二)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抗日骑兵团

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间,聚居在甘肃省海原县、固原县(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海原、固原县)的回族(包括部分汉族)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主张的影响下,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残暴统治,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先后在具有爱国思想的回族青年马国瑞[①]、马国璘[②]、马英贵、马喜春、马国墦、马思义等人的领导下,接连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起义从海原县的白崖、固原县的沙沟(今均属西吉县)和上店子一带发动,波及到今甘肃、宁夏的隆德、静宁、会宁、化平(现为泾源)、张家川、庄浪、华亭、秦安等8县回民比较集中的地区,历时100多天,参加暴动的农民最多时达2万多人。他们主要用大刀、长矛、斧头做武器,前仆后继,同国民党正规军、地方武装、保甲人员进行了英勇搏斗,共消灭敌军2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1000余支(挺),杀掉恶霸、地主、反动保甲人员数十人。

起义虽然在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围剿和政治诱骗下失败了,但是,它却用鲜血谱写了回族人民反抗阶级和民族压迫、谋求解放、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它有力地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促进了回族人民的新觉醒,促进了甘肃、宁夏地区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新发展。特别是第三次起义失败后,有230多

①马国瑞(1907—1939),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沙沟乡沙沟村人。出身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派宗教世家。自幼聪颖好学,常以树正义、除邪恶自律,是个爱国的宗教界人士。抗战初期在家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织回教抗敌工作团,出任高等顾问和总团长,主持拟订了《抗敌工作团团章》。组织领导了海固第一次、第二次回民武装起义。1939年6月18日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中英勇牺牲。

②马国璘(1916—1942),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沙沟乡沙沟村人,马国瑞之三弟。他积极支持长兄马国瑞的抗日救国活动和反对国民党暴政的武装起义。在第一次回民起义中,由于马国瑞被软禁兰州,他任司令,战斗中受伤后离队休养,未能参加第二次回民起义。马国瑞牺牲后,他组织领导了第三次回民起义,任司令,发现马思义果敢有为,任命为团长,并授予全权。第三次起义失败后,他支持马思义投奔八路军,途中,他受坏人蛊惑半路折回,遭敌扣留,押解兰州,倍遭酷刑,坚贞不屈。1942年4月14日被敌枪杀于兰州红山根。

人在马思义、马国瑶的率领下，突破重围，奔赴陕甘宁边区，组建了西北回族人民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回民抗日骑兵团。

海固地区回民三次武装起义

1.起义爆发的时代背景

海固起义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它是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革命主张的启发和影响下，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在国民党反动派对海固地区回族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民族压迫下发生的。

海固地区是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长征经过和1936年西征转战的地方，与陕甘宁边区相毗邻，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红军严明的纪律，在回族人民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吸引了当地数十名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起义提出的“成立回民独立军”、“回民单独组织自己的抗日武装”、“成立陇东回族自治政府”等政治口号，以及马思义等人在第三次起义失败后，把奔赴陕甘宁边区作为最终归宿。显然是受了共产党和红军革命主张的启发和影响。

海固武装起义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三次起义均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马国瑞，是一位伊斯兰教界人士，人称“少师傅”。九一八事变后他到日军占领的吉林、齐齐哈尔等地进行宗教活动，目睹了东北人民惨遭日寇杀戮的惨状。七七事变前后，马国瑞和胞弟马国璘在北京又亲眼看到了日寇侵华的暴行。这桩桩往事激起了他们的抗日热情。马国瑞返乡后，在海固联络部分爱国宗教人士，发起组织“回民抗日工作团”并出任总团长，还在李旺堡、沐家营等地成立了分团，并拟定了“团章”，准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他们把制订好的“团章”报送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备案时，不仅被限制其挣动范围，而且强令增加了“不得干涉行政及其他事项”的条款，使他们更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后来，在起义中又提出了“出山抗日”、“反蒋抗日，寻找民族出路”、“救民抗国（指国民党）”等口号。

海固武装起义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海固地区回族人民进行残酷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必然结果。海固地区本来土地贫瘠,灾害频繁。自清末清王朝镇压陕甘回族大起义后,又强迁云南、陕西、甘肃等地的回民于此地。历代统治者不仅不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反而不断加深剥削和压榨,促使阶级矛盾日渐尖锐。1938年至1939年,海固地区连遭旱灾,人民啼饥号寒。为了围困陕甘边区,国民党在海固一带屯聚重兵,并以"抗日"为名,抓兵派夫,横征暴敛,人民群众怨声载道。素以不畏强暴、勇于反抗、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回族人民,只能揭竿而起。

回族人民有虔诚的宗教信仰、独特的风俗习惯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然而,国民党政府无视这些特点,实施民族歧视政策,对回族人民进行民族歧视和压迫。驻在海固回族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肆意违犯回民的生活习惯,甚至把猪肉带进泉沟脑清真寺,在黄家庄强奸回族妇女,强迫被抓去的回族壮丁上汉民灶进食。对上述这些做法,当地回族人民曾多次上诉国民党当局,但他们却置若罔闻。更不能容忍的是海原县政府把回民聚居的大寨乡改名为"安化乡",在修改县志时,把"回"字加上"彡"旁。这些蓄意欺侮回民的恶劣行为,严重伤害了回民的民族自尊心。在阶级和民族双重压迫下,海固地区回族人民长期积聚的怒火,终于引发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2.第一次武装起义

1938年秋,海原县保安队在鹞子川抓去"壮丁"10多名,关在乡公所百般虐待,激起民愤。群众自发而起,乘夜赶走保安队,救出被抓"壮丁",但他们意识到国民党当局不会善罢甘休,请求马国瑞保护。马国瑞听罢群众的汇报,义愤填膺,即与族弟马国琮等人商议筹款购枪,串连群众,准备在12月29日(农历11月8日)举行武装起义。由于不慎,事情泄露。甘肃省政府密令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回民,马国瑞堂叔)设法诱捕马国瑞。马锡武派团长袁福昌率一骑兵连到隆德县唐家庄找到马国瑞,面呈了劝马国瑞赴兰州"以避不吉"的信。马国瑞知道事已暴露,留下"不要乱动,等待时机"的口喻,携眷赴兰,后即遭到软禁。海原县政府以"抗粮抗丁"的罪名,逮捕了参与营救被抓"壮丁"的柯老五等人。激怒的群众在马喜春(马思义之父)的率领下,冲进区

政府夺回柯老五等人。并派马老七赴兰州向马国瑞汇报。马国瑞支持群众的行动,给马国琮写了"大事闹起,有进无退"八个字交马老七带回。

翌年1月初,海原县县长贾从城带40余人"清乡",到小坡村召集群众训话说:"历代回民造反,都是人头落地,成为叛国逆贼。谁敢反抗政府,仍然免不了这个下场。"并派保安队搜缴枪支,罚没款项,抓捕人员。固原县也出动保安队到处搜枪。马国璘、马国琮、马国瑶、马英贵于1月14日在上店子聚会,公布了马国瑞来信,决定次日在红套村举行武装起义。

15日(农历1938年11月25日),沙沟、白崖一带回族农民由马国璘率领,固原上店子一带回族农民由马英贵(大疙瘩清真寺阿訇)率领,手持刀斧长矛及少量枪支会合于红套村,包围并攻破了恶霸、联保主任王国义的堡子。此事户传户,村传村,揭竿而起的农民又聚集到千余人。

马国璘率义军赶往距红套村东北30里的李俊堡。此地驻有穆玉清的民团,其父穆生春任联保主任,穆氏父子狼狈为奸,欺压乡里,作恶多端。马国璘带队攻克穆家寨堡,击毙穆生春及两个团丁,缴枪21支、马12匹,义军威风大振,附近农民纷纷奔来。此时起义队伍已达8000人,枪1000多支,遂进行初步整编:马国璘任旅长,白受采任参谋长,按地域编为6个团,马正荣、马占清、海登明、秦老四、马得仓、马正清分别任团长,团以下按各村庄来人多少编为营、连、排、班。为阐明起义的原因和目的,张贴了布告,宣称:"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汉回同胞,救民救国,除害安民,杀官掠库。无论回汉,不分新老(新教和老教——作者注),不分军民,一体同仁。"同时,还提出了"反蒋抗日,寻找民族出路"、"打倒欺回灭教的国民政府,保教保民"、"暴政之下不做顺民"、"杀贪官、灭土豪、打富济贫"、"自己武装自己"等口号。

起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恐惶万状。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急调马鸿宾的八十一军、韩锡侯的九十七师、预备第七师,从平凉、静宁和中宁而来,南北夹击义军。平凉专员张振武也赶到固原坐镇联络指挥。

义军在商讨下一步行动方案时发生了分歧,争执不下,结果分兵两路:马国璘率4个团约5000人,攻打隆德;马英贵率2个团约3000人,攻打固原。因城池坚固,敌装备精良而未克。1月底,两路义军会师偏城,在攻克民团头子

海老四堡子后移往八只窑、刘家沟一带休整。国民党中央得悉海固回民起义的消息后，在命令第八战区加紧围剿的同时，又派出以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继为正副团长的“中央宣慰团”飞抵兰州。第八战区、甘肃省政府也组成了以第八战区参谋长许显时为首，由该战区参谋处长拜伟、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甘肃省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四十二军参谋长马建新、甘肃省政府顾问郭福全（即郭南浦）等回族人士参加的“宣教慰问团”来到固原三营进行政治诱降活动，双方商定在大寨马广武家进行谈判。

参加谈判的双方代表是：起义军代表马国琮、马国瑶、马英贵；“宣抚团”代表拜伟、马鸿宾、马建新、郭福全。拜伟假惺惺地举起“古兰经”为誓，骗取义军代表相信后，提出两项条件：现在安定下来，不要再动；部队解散，交还夺取的枪支。马国琮提出三个条件：释放马国瑞，起义军编为“回民独立军”，发给枪支，由马国瑞率领，出山抗日；海固免兵减粮；严惩平凉专员张振武、海原县长贾从城、固原县长张桃。拜伟表示对义军提出的后两个条件可以采纳，第一个条件断然拒绝。马英贵则据理力争。拜伟提出马英贵可以到固原黑城祁家堡子与许显时面谈。

“宣抚团”经过密谋后，2月10日约起义军代表去祁家堡子面谈。义军决定由马英贵、马国璠、白受采前往。当马英贵、白受采先行到达时，即遭逮捕。马国璠途中闻变，当即折回。马英贵怒骂拜伟是“吃人肉喝人血的狗官”、“没有依麻尼（信仰）”的赫瓦尼（背叛者），马英贵、白受采次日被押解兰州。义军失去坚强的领导，群龙无首，开始涣散。国民党当局逼迫起义军呈缴枪支，解散人员，马匹清册。历时40多天的农民起义失败了。

3.第二次武装起义

1939年5月，马喜春、马耀华、马重成、秦老四怀着对国民党政府办理“善后”事宜的强烈不满，秘密到兰州探望马国瑞。他们用重金买通看守马国瑞的士兵，乘5月9日日机空袭兰州秩序混乱之机，接马国瑞逃出兰州，日夜兼程回到马鹿湾（今西吉白崖乡）。甘肃省政府发觉马国瑞逃走，一面严令海固驻军加强防范；一面把马英贵、白受采押解到固原于5月13日枪决，借以杀一儆百。

马国瑞于5月10日在马鹿湾召集马喜春、马思义、马正荣、马凤歧、王文杰等人开会，布置分头串连群众，摸清敌军情况，决定再次发动起义。

5月29日（农历4月11日）午夜发动了第二次武装起义。起义军提出了如下行动口号："打倒欺回灭教的国民党，为死难回民同胞报仇！""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打富济贫！""五族共和，打倒蒋贼！"派人传谕各村。届时，白崖乡数十个村庄的回族农民，手持刀、矛、斧头、锄头、镢头，按预定布置分别向石坡底、小坡、北湾、南湾、八只窑汇集，同时向当地驻军八十一军马殿帮团发起进攻。初战虽未获全胜，但杀死敌军数十人，夺得一批枪支、弹药、马匹，鼓舞了士气。

5月31日，起义军4000多人汇集艾蒿湾进行整编。马国瑞给起义军命名为"崇义军"，自任司令，下编一个旅、四个团，马喜春任旅长，马正荣、马凤歧、王文杰、咸成华分任团长。团以下的营、连、排、班以村庄组编整编就绪，起义军挥师南下。6月4日，义军进驻大湾何家堡时，腹背受敌，情势危急。入夜，天降大雨，"崇义军"冒雨强攻，冲出包围圈，伤亡400多人。

6月6日，"崇义军"进至化平县黄花川，当地回族农民700多人加入。12日，"崇义军"进至白面河，当地农民400多人加入，张家川、龙山镇一带600多农民翻过关山加入"崇义军"。至此，"崇义军"声威大振，人员剧增，遂扩编为2个旅8个团，马喜春、马国璐分任旅长，化平县新编的二个团，白玉祥、马超发分任团长。

"崇义军"逐渐扩大，敌人万分震惊。国民党政府一面布置血腥镇压，派重兵配备骑兵、山炮部队进行南北包剿；一面派拜伟、郭福全、张振武、穆二师（马国璘的岳父、阿訇）组成代表团赶到化平，找马国瑞谈判。马国瑞提出三条：在陇东成立回族自治政府；给"崇义军"配发装备给养；撤走包围军队。拜伟等答应对所提条件"回去请示"，要求"崇义军"原地待命，等待答复。"崇义军"信以为真，原地待命。可是，国民党部队则在童家山东、西高地构筑工事，准备全面围剿"崇义军"。他们将"崇义军"包围在白面河峡谷一隅，且出动飞机侦察、轰炸，配合地面部队行动。"崇义军"虽拼命厮杀，但由于军事素质差，武器低劣，敌不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敌军，700多人牺牲，400多人被捕。

马国瑞、马喜春、马凤歧、马正川等领导人相继阵亡，“崇义军”大部走散，只剩下马思义、咸成华率余部退至老龙潭的深山密林之中。二人对行动方案意见争执不休。在翻越关山进入庄浪途中，行至韩店，受到当地民团阻击，“崇义军”弹尽粮绝，丧失了战斗力，各自走散。第二次武装起义遂告失败。

起义失败后，被俘的义军战士，有的被杀，有的被长期关押做苦役，即使主动缴械者也难以幸免。在起义地区，军队、官府、地主、恶霸扭在一起，进行“清乡”，杀人放火，起义者房屋被拆毁，家产被充公。整个海固回民聚居的地区“村村人带孝，处处闻哭声，山野累累骨，村庄处处腥”。

4.第三次武装起义

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参加过起义的农民忍无可忍，纷纷找马国璘要求重新举事。马思义、冶世仓、王德成等人，分别串连130多人，采取各种办法，除掉了30多名在前两次起义后作恶多端的反动保甲人员、地主、恶霸、地痞、通敌分子。在他们的影响下，附近农民也进行秘密串连。不久，驻扎固原的国民党军队连长周尚义、王占彪等4人，也杀死侵吞粮饷的军需，来白崖参加农民起义。

这些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安。第八战区、甘肃省府命令驻固原的四十二军进行“清剿”。四十二军配合保安队分兵二路，惨杀无辜，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搞得百姓鸡犬不宁。连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一份调查报告也承认：李俊堡一路军纪太坏。李营长曾于5月3日在黑窜涧附近，……一次枪决回教良民黄希连等7人，任意牵拉骡马，屠宰牛羊……事态更趋扩大。[①]国民党当局的罪恶活动，进一步激起了回族人民的愤懑。

1941年5月3日（农历4月8日），马国璘发出了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令。马思义、王德成各带二三百人，分头攻击围剿上下白崖子的敌军。

5月4日，义军2000多人汇集泉沟脑，整编为1个团，马思义任团长，马敬德任副团长，下设18个营，1个特务连。马国璘当众宣布：“一切听马思义指挥，我跟上给大家壮个胆。”义军从泉沟脑出发，转战海原、固原、隆德、庄浪、静宁、清水6县，发展到24个营，2万多人，建立了旅的建制，马国璠任旅长。

①《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敌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急调一九一师、预七师共6个团的兵力“围剿”义军。5月15日，义军进至张棉驿，为歼灭尾追敌军，马思义指挥在此设伏歼敌。16日，义军7000多人埋伏在大麻子山山腰的田埂地堰下，部署1万多人于山顶和马鹿镇、张棉驿两侧，约定三声枪响，全线出击，每人事先包好一包黄土，待敌人接近时扬土障目。敌军到来时义军遍山而出，黄土滚滚，刀光闪闪，刀砍斧劈，敌伤亡过半，余众掉头鼠窜，又被两翼埋伏的义军截住，屯上的义军下山合兵一处，穷追猛打，毙敌900多人，俘敌100多人，收缴步枪800余支、轻机枪23挺、重机枪5挺。此次战役大挫了敌军的气焰，大长了义军的威风。

休整两天后，义军进逼张家川城下，准备攻城。此时，地主万寿山房舍被点燃，火光冲天，义军被暴露。守城敌军猛烈射击，义军放弃攻城计划，分兵三路向陇山镇、白草洼集结。5月24日，激战一夜，义军被打退，翻关山到隆德苏台集中，后经天桥、张家南湾、将台、西吉滩，到达沐家营休整。敌人故技重演，从兰州派一姓马的代表劝马思义投降，说：“省上希望你过去，要地盘可给几个县。”马思义愤怒地回答：“要陇东17个县！”敌代表尴尬而离去。

5月底，马思义、马国璘、马国璠在土窝子召集营长以上领导开会，商讨行动方案，提出“进边区，投红军”的建议，但认识不一致，只好继续北上。6月6日，义军行至海原县石蛤蟆脑时，遭敌包围，肉搏两昼夜，冲锋数十次，死伤千余人，撤到东海坝时，义军由2万人锐减到5000人，又有许多人沿途走散，转移到石砚子时，只剩下1000余人。该地区地形复杂，形势险恶，马思义流着泪对大家说：“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有到边区投奔红军。愿意去的跟我走，不愿意去的各行方便，但要把马匹留下，让我们骑上马冲出去……”在一片哭喊声中，许多人留下了马匹，相继离开。

6月9日，马思义身边只有400余人，马思义、马国璘、马国璠率余部向张家川转移。途中，马国璘因带有妻室，听信共产党“共产共妻”的谣言，改变了到边区的主意又带走了一部分人。马思义率230余人经固原头营张家崖、官厅，穿过敌人封锁线，6月10日傍晚抵陕甘宁边区环县庙儿掌。历时38天的武装起义又以失败告终。

国民党对起义地区人民的镇压比以前更加残酷，有200多人被杀害，有

的被监押;有的倾家荡产;有的被迫流亡外地。马国璘不敢回家,隐匿深山,后被敌人用花言巧语骗下山来,刚进大寨村,即被扣留,7天之后被押解兰州,蒋介石拍了"立即枪毙,摄影即复"的急电,次年4月14日被枪杀于兰州红山根。

马思义等刚到边区,6月12日半夜,敌一九二师派便衣队潜入沙沟村,将马思义、马思贞、马思聪弟兄三家的人赶到一起,杀死11口,只有3人幸免。

1942年秋,国民党以三次起义地区为主,将海原、固原、隆德、静宁、庄浪5县毗邻的地区,称为"变乱肇端之地",在沐家营单独设置特区——甘肃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10月改为西吉县,派中统特务孙宾濂为县长,以便加强对这个地区的统治。

5.海固武装起义失败原因及其经验教训

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手段极其残暴和卑鄙,是农民起义失败的客观原因。

主观原因则是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农民虽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强烈要求,但是,他们受落后的生产方式的限制,看不清社会和革命的发展前途,无法克服自身的许多弱点。海固起义自始至终没有解决好打击谁、团结谁、依靠谁的问题,整个起义的过程表现为单纯的军事行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流寇主义思想严重,走州过府到处闯荡,没有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起义的核心许多都是伊斯兰宗教界的进步人士,由于回族人民信仰上的特点,有这些人士的号召,起义易于发动,行动中便于领导,但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其对宗教信仰的虔诚,使他们在关键时刻容易动摇、妥协,甚至对敌人抱有幻想,因而一再上当受骗。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民起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民族斗争必须坚持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这是争取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的根本保证。

回民抗日骑兵团的组建及其革命活动

1. 回民抗日骑兵团的组建

1941年6月9日,海固第三次回民起义失败后,马思义、马国璠带领余部

230多人，日夜兼程，10日傍晚到达陕甘宁边区的环县庙儿掌，寻访八路军部队。11日抵砖城子，打听到苦水掌驻有八路军，遂派周尚义等4人前去联系，找到环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王世保，说明投奔八路军的来意。王世保和有关人员商议后，决定由环县统战部副部长张镜如和保安大队书记毛至善到龙家阳洼面见马思义、马国璠，对他们进入边区表示欢迎，并安排他们住在砖城子、龙家阳洼和席茂滩三个村子，供给粮食。义军派代表马思义、马智宽、苏山到达苦水掌，由王世保陪同，经环县到庆阳，受到陇东保安司令部白受康副司令员的接见。经商谈后确定：义军仍用原来建制，不加整编；给养按八路军标准，由军分区供给。马思义等人在庆阳期间，受到热情欢迎和款待。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率延安歌舞团到义军驻地柳沟慰问演出，给每个义军战士配发了新军装及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不久，党中央又派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萧劲光从延安专程来柳沟看望他们，并赠送了“浩气长存”的锦旗，表达了对海固起义的高度评价和对死难义军的深切悼念。

1941年7月，党中央安排马思义、马智宽、周尚义、苏山去延安参观访问。安排他们住在边区回民文化协会，参观了中央民族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央民族学院还邀请马思义作报告，马思义含着热泪介绍了三次回民武装起义的经过，控诉了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倾诉了对解放区的向往，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7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在边区礼堂接见了马思义、马智宽。当他们在杨静仁[①]的陪同下步入礼堂时，毛主席等领人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交谈。毛主席说：“你们海固地区回民三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你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今后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毛主席问到还有什么顾虑时，马思义说：“如果边区不收留，就准备把枪和马交给八路军，我们去

①杨静仁，1918年出生，回族，甘肃省兰州市人。1937年参加革命并于同年入党。解放前曾任中共甘肃省工委回民特别党支部书记，陕甘宁边区回民骑兵团参谋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民族科科长等职。解放后任国家民委办公厅主任，民委副主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宁夏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家民委主任、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委员等职。第一、二、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下苦打短工。”毛主席说:“八路军怎能不收留?但我们不要你们一支枪、一匹马,原建制保留,人员不整编,由你们自己去领导,共产党帮助你们。”临走时,主席嘱托马思义:回去代问200位战士好。

不久,中央将这支义军命名为“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回民抗日骑兵团”,驻扎陇东,后移驻延安大偏沟回民协会。任命马思义为团长,马智宽、周尚义、苏山为副官,下设3个连,冶福荣、王登林、马负图分任一、二、三连连长。原起义军的建制予以保留,马国璠任旅长,马继先任参谋长,马世荣为副官。为帮助他们学习,边区联防司令部派杨静仁当政治教员,马克[①]当文化教员,后来,中国回教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派鲜维峻到回民骑兵团协助杨静仁、马克工作。

2.回民抗日骑兵团在党的抚育下茁壮成长

回民抗日骑兵团组建后,这支仅有222人的队伍思想却极为复杂:多数人到边区的愿望是搬八路军打国民党报仇雪恨,但听领导讲,国共合作时期,八路军不能打国民党时,即大失所望;不少人从未远离过家门,日久天长思念家乡和亲人;部队纪律严明,加之敌人的封锁,供给不充分,生活极度困难,一些人情绪发生波动。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团部副官的苏山和当过土匪的马负图等人乘机挑拨,要回海固去,甚至煽动说:“如果马思义不走,把他绑住拉上走。”马思义本人因惦记马国璘及自己家属的安全,想去接他们;同时想出去再带一些人回来,壮大力量,因而也同意重返海固的意见。

组织上得悉这一情况后,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指出:他们一出边区定会受到严重摧残;另外,他们已被正式命名为八路军回民抗日骑兵团,离队后会给国民党攻击共产党造成口实。中共陇东地委耐心细致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们听不进去,个个归心似箭,执意要回海固。1942年1月2日,陇东地委统战部部长段德彰说:“要回去看看可以,遇到危险再回来仍然欢迎。可是,一出边区,难免打仗,可否把老弱伤病员留下,在曲子成立一个留守处?”这个意见被采纳后,第二天,杨静仁带来路费,并一直将他们送出边区。

①马克,1920年生,回族,山西省右玉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1942年入党。解放前曾任回民骑兵团连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等职。解放后,任宁夏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等职。

当他们回到白崖、沙沟等地后，耳闻目睹的是一片触目惊心的惨状：马国璘被押解兰州，生死不明；马思义家11口人惨遭杀害；义军战士有的人头落地，家产被充公，房屋被烧毁……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不时巡逻，虎视眈眈。他们不敢久留，想立即撤离，但发现已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包围。敌军派一个姓李的副官前来劝降。马思义见不好硬拼，答应去沙沟谈判。途中，乘黑夜抛开敌人，想速返边区。当到达海原杲王家塌时，苏山、马负图挑唆部分人员哗变离队，马思义悔恨不迭，率余部30多人，几经曲折于1月16日回到苦水掌。

受挫回来，大家既伤心又惭愧，觉得无颜见首长。但是，陇东党组织和军分区仍然满腔热情地欢迎他们，安排他们移驻合水县。后来又将30多名家属接到边区随军居住。一些离队回家的战士受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又自动返回部队，人数增至80多人。他们从心底发出“我们需要学习，需要改造”的要求。离队未归的人遭遇十分悲惨，在西吉沐家营一次就被枪杀15人，甚至绑在树上，用火烧死，乱刀戳死。1942年夏，马国璘在兰州被杀害的消息传来，回民抗日骑兵团在合水召开了追悼会，干部战士决心化悲痛为力量，表示紧跟共产党，扎根边区，努力学习，提高觉悟，加强训练，提高军事素质，为死难者报仇。

由于人员减少，回民骑兵团缩编为一个连。萧劲光司令员宣布了干部的任命：马思义仍为团长，杨静仁为参谋长，马思贞为连长，马克为政治指导员。不久，党组织送马思义、冶福荣、周尚义、锁云龙、马希杰、马生荣、马保珍、丁良臣、苏尚华、马文海等人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1943年3月，马思义、冶福荣、周尚义、锁云龙、王弼贞等人又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杨静仁、马克等同志带着党的重托，一面给战士讲授中国革命的理论知识，党的民族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政治课；一面教战士读书识字，学习文化知识，教唱革命歌曲，开展文体活动。党组织还从各地派11位回族干部、党员到回民抗日骑兵团言传身教。不久，整个连队呈现出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革命生机。

为了提高军事素质，边区联防司令部从骑兵旅中选派副营长李振海担任回民抗日骑兵团的军事教员，教干部战士讲战略、学战术、练马术、习刺杀、识

地物、用地形，进行军事训练，军事素质大大提高，在几次运动会上回民抗日骑兵团都受到嘉奖。朱德总司令还亲自给他们颁发了一面奖旗。回民抗日骑兵团的马术表演还被拍成电影，并在边区广为放映。

在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时期，回民抗日骑兵团的指战员热烈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克服国民党对边区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1943年和1944年在合水县东太白地区开荒种地2000多亩，实现了粮、油、菜、肉、马匹草料自给，并实现了“耕三余一”的要求。战士们捻毛线、织毛衣，磨野桃核做扣子，自己纺纱、织布，用草木灰做染料，克服了穿衣的困难；自己挖窑洞、盖房子，解决了住宿问题；抽出10多头骡子跑运输，增加收入，补充给养。三八五旅宣传队，把该团在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事迹编成文艺节目，广为宣传。马思义从抗大毕业后，1945年秋返回固城川营地，发现指战员政治思想、文化知识、军事素质显著提高，而且情绪饱满、精神焕发；看到连队训练成绩显著，生产果实累累，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回想起自己带领战士走过的一段曲折的历程，感到无比羞愧。他感谢党对他的教导和挽救，从心眼里感觉还是共产党好。1946年3月，马思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团里还先后发展了6名党员，成立了党支部。上述这些变化表明，回民骑兵团的大多数指战员已经由仅有反抗意识、复仇思想的贫苦农民成长为一批共产党领导的、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战士。

回民抗日骑兵团指战员的生活习惯受到边区各方面的尊重和照顾。阿訇马进仓一直随军活动，婚、葬以及“尔德”、“古尔邦”等节日，都按回族的传统习惯举行，随军家属15户30多人随营移居。这些表明回民骑兵团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点。

这支回族武装力量，在解放战争中，与兄弟部队一起，为保卫陕甘宁边区、解放大西北而英勇战斗；全国解放后，改名为“甘肃省军区回民骑兵团”，为捍卫人民政权、保卫民主改革、进行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1953年8月，甘肃省西海固回族自治区成立，以回民抗日骑兵团骨干为基础，组建成西海固军分区，回骑团建制撤销，部分干部充实到各县人民武装部；部分干部、战士转业到地方，加强民族地区的工作。

三、陕甘宁边区的盐池县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史上驰名中外的革命圣地。自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这里就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在抗日战争中，党中央在这里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实行了“三三制”政权，开展了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减租减息等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盐池县是陕甘宁边区的组成部分。它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东部，陕、甘、宁、内蒙4省（区）交界处，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大门，也是1936年红军西征在宁夏境内建立的6个红色县级政权中唯一坚持到全国解放的一个县。到1945年，全县共有2.6万人。其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又盛产食盐、甘草、裘皮、煤炭、石膏、砂、硝等，是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支柱，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民主建政

中共盐池县委和县政府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的方针和“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团结各阶层人士，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

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行民主建政，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日高潮。

中共盐池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党政机构的建立

1937年7月，中共盐池县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王敬民任县委书记。下辖5个区委：将原城区、北区、西区、南区区委分别改为一、二、三、四区区委；将原划归定边县的盐池南部6个乡重新划归盐池县管辖，成立第五区和五区区委。盐池县委根据上级党委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巩固和发展解放区人民政权，壮大人民武装力量，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的中心任务，狠抓党组织和各级政权的建设，推动整风、大生产、发展武装力量、支前等工作。

1937年10月，召开了盐池县议员会议，选举产生了正副议长、常驻议员和政府县长、委员。将县、区、乡苏维埃政府改为抗日民主政府；将县、区、乡政府主席分别改为县长、区长、乡长。1939年1月，根据《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的精神，将盐池县议会改为盐池县参议会。规定县参议会的职权是：选举县长、县政府委员及法院院长；监察及弹劾本县政务人员；决定本县人民之生计设施；议决本县之单行公约；议决县长和委员提交审议事项；议决民众团体提交审议之事项；督促、检查执行参议会之决定；决定本县应兴应革之事项。

推行“三三制”政权建设

为适应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需要，1940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改为中央西北局）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即《五一施政纲领》），并经中央批准实行。在这个纲领中，提出了抗日民主政权机构中实行“三三制”的原则，即共产党员占1/3，代表无产阶级和贫民，非党派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派占1/3，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及开明士绅。还规定：“在最下级的政权中，人员构成的比例可作某种变动，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实行这

一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领导地位，同时紧密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以孤立反共顽固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中还明确规定：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

在抗日战争时期，盐池县先后于1937年8月、1941年8月、1946年9月进行了三次民主普选，采用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方式选举了县、乡政权。为了贯彻民主建政的精神，盐池县于1941年4月至8月进行的第二次民主普选中，按照“三三制”的原则，自下而上地选出了乡、县议员，组成各级参议会。选出县议员41人，其中共产党员16人、国民党员6人、无党派民主人士19人。选举县政府委员13人，内有共产党员5人、国民党员2人、无党派民主人士6人。1941年9月召开的盐池县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了县长、县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常驻议员。鉴于这次选举中国共产党员比例稍多的状况，为了进一步贯彻“三三制”的原则，在1942年3月召开的盐池县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上又作了调整：县参议会5名常务议员中的3名共产党员退出1名，补选1名非党人士；县政府委员中的10名共产党员退出7名，补选5名非党人士。1945年8月盐池县进行了第二次县、区、乡三级选举，选出县议员38名，内有共产党员14名、国民党员1名、无党派民主人士23名。“三三制”民主建政原则的推行，使盐池县县、区、乡三级政权真正成为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充分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原则。它对于团结各革命阶级、阶层人士，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全县人民的积极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盐池县商会会长靳体元被选为县参议员以后，积极筹办元华工厂，使工人由2人增加到56人，资金由5万元（光华币）增加到4171万元（光华币），可以生产20多种毛织品。另外，还兼营运输业、农牧业、盐业、食品的生产、销售，为边区军民和前线指战员解决了衣、食、物严重不足的部分困难。

反摩擦斗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反复提出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加紧制造反共摩擦。

当时的盐池县，东有驻苟池蒙兵一连，西有驻宝塔马鸿逵部一连，北有驻北大池蒙兵一连，西南部的惠安堡是马鸿逵伪盐池县政府所在地。国民党千方百计挑起事端，制造各种反共的摩擦和纠纷。他们越界到边区组织保甲制，破坏抗日民众团体，强占地盘，派粮、派款、派草，招募壮丁，抢劫财物……1938年2月，国民党盐池县政府以“设立防空监视哨”为借口，深入盐池县三区牛毛井地区设立哨所，架设电话线，进行特务活动。1938年冬，马鸿逵骑兵二旅四团五连以“借防”为名，强行进驻盐池县所辖之宝塔，并在宝塔一带编组保甲，抓人派款，叫嚣“收复失地”。1939年2月，驻伊克昭盟蒙军章文轩部，武装越境，侵占盐池县二区的二、四、五乡和一区的五乡，强行编组保甲，在麻花塘设立区公所，在苟池、北大池驻军“保护”。1940年11月，章文轩部还多次袭击驻苟池的八路军；大肆抢劫群众财物。1941年1月，马鸿逵部驻惠安堡骑兵巡逻队，将陕甘宁边区回民救国会派往盐池县回六庄工作的三边回民巡视团团长马文良等5人捕去并送往银川，4月17日马文良被活埋于宁夏城隍庙后。

盐池县军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各区建立了统战委员会，乡党支部配有统战干事，加强统战宣传，组织群众严防和击退敌人的侵扰，侧重政治说理，避免正面冲突。毛泽东同志针对敌人搞摩擦之事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①]为此，盐池县县长阎志遵多次给国民党伊盟司令员章文轩、宁夏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0页。

省主席马鸿逵等人写信，晓以团结抗日之大义。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力等致信伊克昭盟长官，望“劝导制止”其部队“侵犯人民利益”的行动。另外，1942年决定在边区建立骑兵游击队，以便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革命政权和革命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后期，骑兵游击队已发展到150多人。对严重破坏抗日的顽固分子则坚决予以打击。如章文轩部多次袭击我驻苟池的八路军，大肆抢劫群众财物，我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回击，毙敌31人，俘敌8人。对此事件，八路军三边警备司令部发出《为苟池事件告全国同胞书》，揭露了顽固分子有意制造摩擦的反动嘴脸。

通过上述反摩擦斗争，使敌人的破坏活动有所收敛，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巩固。

（二）整风运动

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史称“延安整风”。从1942年春天起，到1945年4月止，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了整风运动。它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整风运动的方法是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单位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提出努力的方向。整风运动分为三个阶段：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为高级干部整风学习阶段；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为全党普遍整风阶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为总结提高阶段。1945年4月20日，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

上的一致，标志着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在盐池县的开展

1942年4月，盐池县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到延安参加了边区高干会议和整风运动，历时近3个月，他们返回盐池县后，传达了会议精神，7月至8月整风运动在全县普遍展开。整风期间，学校放假，干部半天学习，半天办公。县级机关和区、乡脱产干部，学校的教师都集中到县城参加整风。首先，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规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22个文件。其次，传达了边区高干会议的精神，由领导带头，自己反省自己，进行自我批评，提倡发扬民主，引导大家揭发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中，做到领导心中有数，掌握每个干部的思想工作状况，纠正在反省会上平均对待。在整风运动中，大力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和自由主义，以便达到改造思想，统一作风，提高党员素质，充实整顿基层组织，巩固和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目的。在整风运动中，确定了党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提出要进一步贯彻“三三制”和精兵简政等政策，纠正领导机关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协调党、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抢救失足者运动”对整风运动的干扰

整风运动一开始，进展正常顺利。盐池县委领导党员和脱产干部认真学习了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提高了认识，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加强了革命纪律，扫除了歪风邪气。

1943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边区各地开展了审干运动。这在当时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国民党特务加紧活动的条件下，是必要的。1943年5月中旬，康生以“张克勤案件”[①]为“坦白典型”，到处召开“坦白”大会，使边区审干工作发生了“左”的错误。7月15日，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煽动性报告，“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边区各机关纷纷召开“抢

①张克勤系原甘肃省地下党员、陕北公学学生，19岁，被康生采用“逼、供、信”的办法强迫承认自己是特务、甘肃地下党员是红旗党。

救”大会，日夜进行“抢救”，大搞“逼、供、信”，搞得是非颠倒，敌我难分，人人自危，伤害了许多同志。盐池县也把一些从国民党统治区到盐池参加工作的革命干部和热血青年当做“内奸”、“国民党特务分子”、“特务嫌疑”，进行隔离审查。当时盐池县送往三边分区审查的干部有10余人，县集训所集中审查的有30多人，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很快察觉到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左”的错误。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了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9月10日，毛泽东强调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之后，本着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盐池县委很快对被审查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对处理错了的同志给予平反。

整风运动的意义

整风运动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成绩是主要的，意义深远，有力地推动了盐池县的各项工作，为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它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盐池县的广大党员干部把整风学习和改造世界观紧密地结合起来，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紧密结合。他们以整风文件为武器，对照检查自己参加革命以来的思想转变过程和工作表现，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每个人认真写了思想小结，总结了经验教训，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人生观，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它使盐池县党组织在党中央、西北局和三边地委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空前地团结起来。

第二，通过整风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进展，使盐池县的面貌为之一新。学习理论的风气浓了，组织纪律性强了，“三三制”得到了进一步贯彻，简政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领导作风改变了，各级领导都能深入实际，调

查研究，县委和县政府紧紧抓住生产和教育两大中心开展工作，为抗战胜利创造了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1943年10月29日《解放日报》报道：盐池县农牧产、盐产量都比上年增加1倍。1943年10月12日《解放日报》又报道：盐池县机关生产良好，经费大部自己解决，肉食丰富，每天有牛、羊奶喝。文化教育工作活跃了，农民歌手王有才创作了《父子揽工》、《劳动英雄王冬科》等脍炙人口的民歌；诗人李季创作了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等诗篇，在陕甘宁边区和各个解放区广为流传。

（三）大生产运动

1941年至1942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最严峻的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也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对苏联不宣而战。12月，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了解决兵力、财力的严重不足，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原则，集中兵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围攻、“扫荡”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陕甘宁边区处在日寇和国民党的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下，国民党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且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又禁止国统区的货物，特别是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电信器材等运往边区，违者军法从事。在沿边区各县设立盘查哨站实行连环保结，切断了边区与外界的联系，使边区物资匮乏。1940年至1942年，边区又连续发生严重自然灾害，3年累计受灾面积达575万多亩，受灾人口达96万多人，群众生活苦不堪言。抗战以来，大批革命青年为了寻求救国真理，纷纷从海内外奔赴边区，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陆续从前线调回一批部队，使脱产人员在1941年达73117人，占陕甘宁边区总人口的5.17%。由于战争和灾荒，灾民、难民不断

逃入陕甘宁边区，达170176人。由于外援断绝，灾荒严重，脱产人员剧增，边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毛泽东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没有衣穿，没有肉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作为陕甘宁边区一部分的盐池县，情况和边区其他地区大致相同。

为了克服严重困难，坚持抗战，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及其家属，从1942年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大生产运动。

盐池县的大生产运动主要是开荒种地、办合作社、打盐运盐、发展纺织业和手工业生产。

开荒种地，发展农副业生产

盐池县地广人稀，有大量可耕地没有开垦使用。为了扩大粮食产量，解决军队、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渡过难关，县委和县政府鼓励开荒种地。

大生产运动开始后，盐池县委和当地驻军领导带领广大干部及其家属、战士、学校师生开荒种地。盐池驻军警备三旅七团打井掏泉开种水浇地100多亩，种植粮食和蔬菜，养羊500多只，养猪100多头，做到自给有余，除部分食用外，还抽出一部分粮、油、菜、肉支援机关和群众，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促进了军民团结。人民群众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开荒种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生产。全县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有了显著增加。1942年，有耕地194879亩，开荒64883亩，粮食总产23873石。1945年，则有耕地467593亩，开荒48495亩，粮食总产38290石。3年时间，耕地增加了272714亩，粮食总产增加了14417石。

通过开荒种地，机关、学校部分或完全解决了粮、油、肉、菜的供给，有的还达到"耕三余一"、"耕一余一"。

除开荒外，部队、机关、学校、农民还开展了副业生产。挖甘草、打柴火、烧砖、种菜、养猪、养羊、养骆驼，增加了收入。1936年盐池解放时有羊4.8万

只，1945年发展为15.7万只，牛原有1100多头，发展到4100多头，骆驼原有80峰，发展到1100多峰。通过开荒种地，发展农、副、牧业生产，干部、战士、教职工和人民群众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

为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下，广大农民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了互助组、变工队等劳动组织。以1939年为例，全县共有互助组210个，互助社26个，参加人数为2243人；义务耕田队26个，参加人数为1032人；妇女生产组136个，参加人数为1035人。还有儿童杂务队。这些组织在大生产运动中又得以巩固、发展。1945年变工队发展到263个，扎耕队6个，人数达2000余人，占全县农村劳力的55%。在组织互助合作运动中，共产党员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据1943年统计，全县参加变工队、互助组的党员有218人，占党员总数的60%。有1/3的党员担任了组长、队长。

在开荒种地、组织集体劳动的同时，对一些不好好劳动的“二流子”进行了思想改造，采取“官督民逼”的办法将“二流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据1943年统计，全县有135名“二流子”，其中114人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办合作社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论合作社》的报告，提出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强调发展经济的主要方法是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会后，边区各县的合作社，在原有基础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盐池县的消费合作社是在1938年兴办的，当时只有9个，社员1816名，股金4715.7元。1944年9月，社员发展到2085名，股金21160.7元，公积金2147.47元，销售总量为49920.92元，纯利润为3688.72元。其中，元华工厂成绩最为突出。1944年7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接见边区合作社英雄模范人物时，详细询问了元华工厂经理靳体元先生创办元华工厂的情形。听完汇报后，毛主席表扬“元华工厂办得好”。

元华工厂是1941年9月由原任盐池县商会会长靳体元先生和时任商会会长杨华亭先生等人创办的。共产党员孙春山任厂长。最初只有2名工人，资金12万元。到1944年，工人发展为56名，资金达4171.7万元。除办工厂外，还兼营畜牧、农场、运输、消费合作社等业务。能够生产地毯、毛毡、被套、被胎、衣服等20多种产品。生产的产品，不仅能够满足盐池县的需要，而且支援了边区其他地方和部队，还将部分产品运往国民党统治区，为边区换回了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等物品，为支援边区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产盐运盐

盐池县以境内众多的盐池而得名。食盐既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又是多种工业的原料，所以它是盐池县的经济支柱。早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国民经济部就曾发出“大家到盐池驮盐去”的口号，以便发展边区经济，改善群众生活。1940年的严重灾荒，影响到边区内外食盐的供应，边区政府为了促进产盐运盐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确定：“以军队生产为主，盐民产盐为辅”的方针。部队广大指战员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打盐井、筑盐坝、辟盐田，使食盐产量猛增。故边区政府在1942年又将上述方针改为“盐民产盐为主，部队产盐为辅”，积极动员农民、机关、部队、学校组织人力下湖打盐，并组织毛驴、骆驼运往陕北、延安、庆阳、关中、内蒙、绥远等地。对参加运盐的人数、运出的数量及销售情况作了详细的统计，由各区、乡经济部门按月逐级上报。由于进行了有组织的打盐、运盐、销售，使盐产量逐年增加。1939年为19万驮（每驮约合150斤），1940年为23万驮，1941年为29.9万驮，1943年为38.8万驮。食盐的生产、运输和贸易，对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活跃边区经济贸易，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发展纺织业和其他手工业生产

抗战期间，由于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给边区军民的穿衣和其他生活日用品造成极大的困难。边区军民在大生产运动中，响应毛泽东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积极发展纺织业和其他手工业生产，公营、民间纺

织、皮坊、毡坊、铁坊、木材、裁缝等手工业均蓬勃发展起来。

盐池县的纺织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元华工厂为主,帮助各区、乡发展纺织业;二是家庭自纺自织。盐池县党政军干部带头并动员家属参加纺织。县长、县委书记在大生产运动中,都学会了纺纱织布。县委书记肖佐汉的妻子下乡传艺,一人教会20多名妇女纺纱织布。在他们的带动下,盐池全县掀起了纺纱织布的热潮,解决了部队指战员、干部、师生和人民群众穿衣用布的困难。

在大生产运动中,盐池县的手工业生产也有了显著的发展。截至1944年10月,城乡共有毡匠21家,从业人员62人;口袋匠7家,从业人员10人;木匠42家,从业人员71人;铁匠19家,从业人员37人;铜匠5家,从业人员6人;银匠4家,从业人员16人;裁缝4家,从业人员9人;鞋匠38家,从业人员52人;箩匠1家,从业人员3人;绳匠8家,从业人员10人;泥水匠13家,从业人员18人;剃头匠4家,从业人员6人;石匠11家,从业人员17人;皮匠81家,从业人员146人;工厂1家,从业人员48人。

盐池县通过大生产运动,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发展,机关、部队、学校基本上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的。农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阶级成分也有明显的变化。1938年,盐池县农民中,贫农占54.25%,雇农占20.92%,中农占19.16%,富裕中农占0.654%,富农占2.61%。1944年盐池县农民中,贫农占44.25%,雇农占4.74%,中农占31.28%,富裕中农占13.27%,富农占4.74%。

(四)文化教育

盐池县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民国初年,全县只有县城惠安堡一所高级小学,学生很少,且多为地主豪绅子弟。1918年盐池城(旧称花马池)又设立了一所高级小学,个别乡也创办了初级小学和私塾。到1936年盐池解

放时，全县历年小学毕业生累计仅有50人。所办学校教师缺乏，资金不足，设备简陋，学生人数甚少，且多为男生；劳动人民的子女无上学的机会，女孩寥寥无几。学校实行封建教育，开设的课程主要是国文、修身、四书，没有自然科学。在高级小学，还建立了童子军，对少年儿童实行军事训练。

1936年6月，盐池解放后，党和政府特别重视教育事业。抗日战争时期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发展较快。

小学教育

在党中央“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方针指引下，盐池县在办好公办小学的同时，号召和发动群众办民办学校，政府从人力、物力、资金方面给予支持。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边区政府从鲁迅师范派了一批毕业生来盐池任教。三边分区和盐池县又从当地选拔一批文化程度高、思想素质好的青年送往外地培训，毕业后回盐池担任教师。为了尊师重教，政府提高了教师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县委和县政府明确规定：乡上的小学教员是乡政府委员；“三三制”实行后，各级政府机构中，应该有教师代表参加；区乡领导应经常邀请教师参加区、乡的有关会议，协助政府搞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教师的生活待遇比实行供给制的行政干部高，政府每月发给教师100斤小米，每年发给教师一套单衣，两年发给一套棉衣。另外，还发给米津，连医疗费、被褥费也均由政府解决。教师家中的农田由政府和群众代耕，有困难给予临时补贴。边区政府教育厅为学生编写了语文、算术、农村应用文、珠算等各种教材，要求采用民主的方法管理学校，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教育学生，取缔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在师生缺乏的地区实行复式教学。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在县城北关还建立了伊斯兰小学，专收回民学生入学。千方百计筹措教育经费。县政府规定赁房贷费、牲畜附加费、部分罚款、地租、营业收入等项收入均拨给教育部门使用。1942年筹措教育经费达11.7万元，支出6万元，节余5.7万元。

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盐池县的小学教育发展很快，1942年全县有完全小学1所，在校学生57人；公办中心小学2所，在校学生79人；公办普小6所，

在校学生38人。到1945年，全县有完全小学1所，在校学生62人；公办中心小学2所，在校学生36人；公办普小3所，在校学生48人；民办小学15所，在校学生147人。

社会文化教育

盐池县委、县政府在狠抓小学教育的同时，大力开展了社会文化教育。延安和三边地委派来一批文化教育干部到盐池从事社会文化教育，县委和政府也派干部到各区乡宣传动员，大办冬学、夜校、识字班、读书班、民教馆、半日轮等各类学习文化的组57个，参加学习的共有1765人（其中男1510人、女255人）。另外还开展家庭识字，夫妻、子女互教互学。教学内容为“新三字经”、“日用什字”、“新华什字”、“识字课本”、珠算、记账方法、写便条、写信等，很受群众欢迎。

盐池县二区文化教育搞得最好。特别是二区五乡妇女李兰英，不仅自己刻苦学文化，而且教丈夫、娃娃识字。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以《李兰英怎样教娃娃识字——介绍一种新的社会教育形式》为题，作了长篇报道，县委对此也积极宣传推广。在李兰英的影响下，盐池二区750户农民有80多户搞起了家庭识字教育，许多农民脱掉了“文盲”的帽子，学到了文化知识。1944年，《解放日报》多次刊登了盐池县文化教育的先进事迹与典型材料。如《盐池杨万义刻苦自修，现能读报写稿》、《盐池余仁、官生秀自动创立民办小学》、《盐池二区五乡文教工作活跃》、《李兰英怎样教娃娃识字》等。

1944年11月中旬，边区召开文化教育表彰大会，盐池县文化教育工作受到边区政府的嘉奖。盐池二区获集体特等奖，二区宣传科科长李和春获个人特等奖，盐池驻军警备三旅七团七连张治国班荣获部队特等奖，盐池二区石礼荣获个人甲等奖，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干部阎成美、王百宜获个人二等奖。

（五）盐池县在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和作用

盐池县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陕甘宁边区的门户前哨和经济支柱。

盐池县是陕甘宁边区的门户前哨

盐池县位于陕、甘、宁、内蒙4省（区）交界处，东邻陕西省定边县，南靠甘肃省环县，北接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西南、西北与宁夏同心、灵武县接壤，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可“羽翼陕北，控扼朔方”，有“平固门户”、“环曲襟喉”之称。历史上就是防御外族入侵的边关前哨、军事要塞。盐池县是红色政权和国民党统治区接壤的前哨阵地。它是外界观察、了解陕甘宁边区的窗口。盐池县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情况，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对于巩固和发展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盐池县委和县政府，领导人民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巩固发展党组织、政权机构和统一战线，开展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把一个在国民党统治下极端贫困落后的地方，建设改造成为政治上进步，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地区之一，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向往的地方。

盐池县党组织和人民为开展宁夏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以前，中共宁夏工委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通过盐池县境进入国民党统治区的，遇有情况变化，也是通过盐池县境撤回边区。从宁夏送往边区的进步青年，也都首先经过盐池县境。盐池成为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来往的联络站、转送站，为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安全提供了必要的保证。1940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马鸿逵集团封锁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边境，强化辖区的反动统治，宁夏地下党组织遭彻底破坏，盐池县便成为向

宁夏开展工作的主要基地。

盐池先后安置了从宁夏国民党统治区逃来的大量移民、难民和逃兵，为党开展宁夏工作建立了群众基础。抗战后期，领导宁夏党的工作机关，如中共金灵工委、余庄子、红井子工作据点、河东工作组均设立在盐池县境内。中共盐池县委和盐池县二区、五区区委，对宁夏党组织的工作给予了密切配合和有力支持。

盐池县是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支柱

盐池县地广人稀，可耕地面积大。以1945年为例，全县共有2.6万人口，有耕地516088亩，粮食总产38290石，共折合1914.5万斤左右，除供本县人民和驻军食用外，还解决了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盐池的大量移民、难民的生活用粮。盐池县人民具有努力生产、踊跃支前的光荣传统，有力地支援了边区经济建设和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

盐池县以盛产食盐而著称，食盐不仅是人民生活必需品，而且是许多种工业、药品的原料。党和政府组织打盐、运盐、销售。1939年打盐运盐为19万驮，1941年为29.9万驮，1942年（截至9月）为15.6万驮，1943年为38.8万驮。这些食盐被大量运往陕北、延安、庆阳、关中和其他国民党统治区，换回了布匹、粮食、药材、电信设备等，解决了边区军民的部分困难，满足了前线的需要，增加了人民的收入。

盐池县草原辽阔，宜于放牧，畜牧业在盐池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特别是羊只生产尤为重要。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培养兽医、建立畜病诊疗所、举办羊只生作社、废除草场税，严禁宰杀母羊等，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1936年盐池解放时全县仅有羊只4.8万多只，到1945年发展为15.7万多只；牛原来只有1100多头，到1945年发展为4100多头；骆驼原有80多峰，1945年发展到1100多峰。畜牧业的发展既增加了农牧民的收入，又解决了军民对肉食、皮毛的需要，同时有力地支援了边区各地和前方指战员。

盐池还盛产甘草、裘皮，有丰富的煤炭、石膏、砂、硝等资源，这些资源的开发，也有力地支持了边区的经济建设和抗日战争。

盐池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动员财力、物力支援前线，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每年秋收后，盐池县人民把粮食打净晒干，早交粮、交好粮，赶上毛驴，跋山涉水，不辞辛苦，把粮草送往国库和前线。抗日战争期间，盐池县人民一直提前超额完成救国公债和救国公粮。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产出大量的粮食、蔬菜、皮毛、肉、食盐等物资，支援前线。仅元华工厂在抗日战争中后期的四五年中，为抗日部队和边区政府提供毡胎子、毛毯、绒帽等物品10万多件，条毡2万多条，还有许多毛袜、毛套、军鞋等。盐池商会甘草庄7天完成军鞋500双，1938年募集羊皮缝制皮衣142件，1941年完成救国公债10570元，超额570元，1944年完成救国公债1.6万元，超额6000元，还超额完成了救国公粮。

积极开展拥军优属活动。逢年过节，盐池县党、政、军、民都在一起召开联欢会、座谈会；县、区、乡三级领导和群众一起抬着猪肉、羊肉、米酒、年糕等食品慰劳子弟兵和抗属，子弟兵也为群众挑水、垫圈、背柴、打扫卫生。为使前方将士无后顾之忧，英勇杀敌，全县组织义务耕田队，有1000多人为抗属代耕、代种。政府还定期发放救济粮款，解决抗属中的生活困难。军民关系情同手足，犹如鱼水。当时，盐池县到处流行着人民爱戴子弟兵的拥军小曲：

正月里来是新春，
抬上猪羊出了门。
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
送给英勇的八路军。
……

新　疆

一、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进新疆

苏联与盛世才结盟以后，共产国际曾经指示中国共产党重视对新疆的工作。193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中共中央加强陕甘川的政治军事领导，将川陕苏区联系起来，进一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认为这是“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从此，打通国际路线，解决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依托问题，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①]1935年8月5日，在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张国焘反对中共中央决议，南下川康，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仍贯彻北上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1935年9月20日，在哈达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设法打通国际关系。后因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到陕北建立根据地，谢、毛未能成行。

1935年11月中旬，共产国际派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到瓦窑堡，带来共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并传达斯大林的意见，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古）和西北（新疆）靠近苏联，从而使中共中央再度对取得苏联援助寄予希望。

为了打通国际路线，中共中央从政治上、军事上和技术上作了多方面的努力。

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大功率电台调试成功，开始根据张浩由莫斯科带来的电报密码同共产国际建立电报联系。6月29日，毛泽东就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和时机问题电询彭德怀，指出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还是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连接苏联的线路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一是冬天。不论采取哪一条道路与选择哪一个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条件。为此，要求一方面军必须于一个月内做好打击宁马及西渡黄河的准备工作，[①]随之，中共中央就西征问题致电共产国际征求意见。

1936年9月11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同意中国红军夺取宁夏的作战计划，并表示在红军占领宁夏后，苏联即从外蒙给予红军技术上和物质上的援助。9月27日，共产国际再次通知中共中央，苏联红军方面正就接济中国红军问题进行认真的准备，希望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努力实施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计划。

1936年10月，中央做出了宁夏战役的计划。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0月25日，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之三十军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及红五军、红九军也渡过黄河，可是国民党军很快就开上来控制了黄河渡口，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未能渡河。由于国民党军隔断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以至夺取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11月绥远抗战爆发，苏联方面通过外蒙援助红军的计划难以实施，不得已，共产国际决定改由新疆哈密向红军提供援助。

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特派出陈云（化名施平）、滕代远（化名李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51页。

广)、段子俊、冯铉(即何晓理)、李春田5人前往新疆,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由于入冬后交通运输极为困难,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大批物资的接济须待来年开春以后才有可能。

11月8日,中共中央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根据中央的意图和当时的形势,决定西进以取得苏联的接济。

11月13—18日,西路军连克古浪、永昌、山丹,包围凉州。这时中央军委突然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建立根据地。从11月22日起,西路军在东起凉州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约150余公里的地段上,与敌军展开战斗。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西路军以万众一心、前仆后继、血战到底的决心,与凶悍而野蛮的马家军主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先后共歼敌2.5万余人。然而西路军的损失也非常惨重,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政治部主任曾日山等先后壮烈牺牲,许多指战员相继伤亡,他们以血肉之躯写下了英雄悲壮的史诗。

1937年3月12日凌晨1时,徐向前、陈昌浩就西路军危情向军委发电告急,电称西路军"现全不足三团","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疲乏大","全军决死战斗待援,希望及时反攻"。同日,中央军委主席团复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现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所能解决问题,必须立即采取特殊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力量的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两种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一)率现存的三团人员向蒙古边境移动;(二)率现存的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以上方法不论采取哪一种,均须将伤病员安置民间,均须采取自主自动姿势,均须轻装,均须采取变化不测的战术。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潜回陕北;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率余部3000余人,分三路游击。

西路军右支队因遭敌人的追击包围而溃散,西路军左支队却一直在冰天雪地中顽强地团结奋战。党中央对左支队十分关心,1937年3月17日中央在给李先念、李卓然的指示电中,要求左支队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行动应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左支队行到海巡堡

以北之分水岭时，党中央再次指示他们团结一致，保存力量，视情可向新疆转移，并委派陈云和滕代远同志去迎接。4月7日，中央军委主席团再一次致电西路军工委：你们可以向新疆去，已电彼方设法援接。4月12日，左支队走出祁连山，向新疆进发。4月下旬进至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

（二）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盛世才在新疆要实行亲苏政策，向国民党闹独立，必须联合中国共产党。因此，盛世才在国内一些重大问题上，与中共有一致的看法。1935年，盛世才著文批评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亡国主义"，1936年7月，他发表通电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这是中共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

陈云指出："我们党和盛的联系是通过苏联建立的，对盛采取统战做法也是从苏联的做法延续下来的。"[①]盛世才在苏联的推动下，欢迎西路军左支队余部进入新疆，促成了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建立。

苏联曾经通过新疆边务处总电台同西路军的电台进行联系，以便向他们传达西进新疆的命令，并通过盛世才派人与西路军联络。

1937年4月23日，陈云、滕代远等5人，由盛世才派官员和专车从中苏边境接到迪化。陈云由边务处副处长陈培生引见，会见了盛世才，盛表示欢迎。25日，由盛世才派部队护送，陈云等携同医务人员携带足够的衣服、食品、药品和武器赴星星峡，接运已经先期到达那里的西路军干部战士407人。陈云代表党中央向这支英雄的部队进行了亲切的慰问。他说：党中央一直关怀着你们，派我们来接你们到迪化去。革命有胜有负，不要只看眼前剩

①陈云：《关于我党在新疆做盛世才统战工作的几点看法》，1984年12月20日，载《中共党史资料》第25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下400多人，要看到我们的红军还在，要看到未来的胜利，这400多人会扩大到4000、4万，甚至400万，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必将属于我们。5月8日，左支队余部全副武装抵达迪化，[①]住在西公园附近的纺织厂内。他们一面医治伤病，调养身体，恢复健康，一面进行思想整顿和组织纪律教育。以后，又有一些西路军成员陆续到达新疆。7月下旬，西路军左支队由纺织厂的宿舍搬出，迁到东门外营房里，与盛世才的部队住在一起。考虑到当时国际、国内和新疆的政治形势，以及盛世才的要求，决定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对外称"新兵营"。陈云为中国共产党驻新疆的第一任代表，负责和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并领导"新兵营"。陈云到达迪化标志着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建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初，周小舟奉命以中央军委联络员身份前往新疆，毛泽东电示周小舟要求他"用谨慎、周密和谦逊的态度去观察问题，去处理工作，去待人接物，特别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须严格采取这样的态度"。[②]经与盛世才商谈，在迪化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其工作任务是：在党代表的领导下，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促进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抗日斗争，使新疆始终为中国的领土，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通道，接待过往新疆的我党干部和国际友人，筹集援助八路军抗日物资，管理在新疆迪化治疗的八路军伤残病员。八路军办事处设在盛世才的南梁招待所。不久，周小舟奉命调回延安，滕代远任八路军驻新疆代表。

1937年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在迪化停留时受到盛世才热情接待。盛世才向王明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及派干部到新疆工作的要求。王明答应将盛世才的要求带回延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11月27日，陈云随王明、康生一道回延安。12月底，滕代远和原西路军领导干部程世才、李卓然、李先念、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人奉命回延安。1938年1月，邓发（化名方林）任中共驻新疆代表。

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新疆的重要战略地位，为了巩固与盛世才的统一战线，为了建设新新疆，造福新疆各族人民，应盛世才的请求，决定派一批干部

①《陈云致王明信》，1937年5月11日。

②《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到新疆工作。当时尽管本身干部非常缺乏，仍然从“新兵营”、从去苏联治病或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的干部中和延安各抽调了一部分干部，先后达100余人来新疆工作。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确定中共党员在新疆工作的方针是：(1)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避免英国与苏联外交关系恶化；(2)使蒋介石抗日，并不致与苏联恶化关系；(3)派人去不使蒋介石国民党插足新疆；(4)不发展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公开党的面目。①

从“新兵营”调地方工作的有：黄火青(化名黄民孚)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兼审判委员会委员长；汪小川(化名汪哮春)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兼公安管理处职员训练班教官；潘同(化名潘柏南)任和田警备司令兼和田行政长；胡鉴(化名胡东)任蒲犁边卡大队中校大队长；周纯麟(化名周玉隆)、曾玉良(化名曾海山)任喀什四十八团少校连长；赵海丰任叶城四十一团少校连长；谭庆荣(化名谭桂标)任和田三十八团少校连长；黄学谦(化名黄义明)任督办公署经理处处长；谷先南(化名谷志远)任和田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处长。

路过新疆留下的干部有：徐孟秋(化名孟一鸣)被任命为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韩光(化名韩明光)任督办公署上校副官，后任布尔津县副县长。1938年2月1日，中共干部毛泽民、钱希均去苏联治病途经迪化，应盛世才的请求，经中共中央批准，毛泽民(化名周彬)留新疆工作，任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后任代厅长。此外，还有刘希平(化名刘西屏)任哈密行政长；沈谷南(女，化名张奋音)任迪化女中小学部主任，兼新疆妇女协会副委员长；吉合(化名吉国兴)先在“新兵营”当教员，后在八路军办事处协助中共新疆代表工作；林超(化名任德山)任八路军办事处副官；郑瑛(女，化名李霞)、黄颐(女，化名苏枚)任迪化女中教师；冯咏莹(女)任迪化女中小学部教师。

从延安抽调的部分干部于1938年分两批从延安出发，分三批入新。第一批林基路(林为梁)、李云扬(李志梁)、杨梅生(杨永生)三人于1938年3月10日随任弼时一道到迪化。林基路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李云扬为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杨梅生暂留“新兵营”当文化教员。第二批，1938年5月入新的有：彭加伦；张东月(化名张东岳)任哈密行署第一科一等科员，后任科长；朱旦华

①《邓发等同志检讨新疆工作的纪录》，1943年11月3日。

(女)任迪化女子中学教导主任,新疆妇女协会秘书长,后被聘为省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于村任反帝会文化科长,后担任文化协会戏剧运动委员会委员长;许亮任教育厅编辑主任兼新疆学院教师,后调任蒲犁县县长和麦盖提县县长;祁延霈(化名祁天民)任新疆学院秘书,后调任哈密区教育局局长;鄢义贞(女,化名鄢念萱)任迪化女中教员;王韵雪(女);安志远;李涛(原名李毅)任哈密行署第二科二等科员,后调迪化任编译委员会委员兼女中教师;李斐仪;苏启苍;王宪唐(化名王苇)任《新疆日报》文艺版编辑兼校对员,后任制版科长;天宝(原名桑吉悦喜);田力军(田虹);申玲(女)任哈密女校校长,后调迪化任女中教师;乔林(陈原基);李光(林征);蹇先任(女,化名林方);余学斌;刘及时(刘基石);段进启(原名段时谋)任反帝会组织科长,后调博乐县任副县长、县长;李宗林(化名李啸平)任《新疆日报》编辑长。未分配工作的均留在"新兵营"任文化教员或留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第三批于1938年11月中旬入新,他们是:郑亦胜(化名郑正声)任财政厅秘书,后调叶城任税局局长;高登榜(化名高玉成)任疏附、疏勒、伽师、英吉莎、蒲犁、乌恰地方税局副局长,后任喀什税局副局长、沙雅县税局局长;曹建培(化名曹克屈)任焉耆行署教育科科长;陈谷音(陈克琴)任迪化师范音乐教师,后调新疆日报社任编辑;陈清源(化名陈浩然)任《新疆日报》编辑,后调阿克苏报社任编辑、编辑长、副社长、社长;李何(洪履和,笔名小黎)任《新疆日报》国际版编辑;刘子平先后调任迪化师范、省一中教师;王谟(化名王谟行)任《新疆日报》国内版编辑,后任喀什分社社长;马殊(邝宗球)任《新疆日报》文艺版编辑;蒋连穆(化名蒋春茂)任库车、沙雅、拜城、轮台地方税局副局长,后任莎车财政局副局长;钱萍(钱春申)任莎车地方税局副局长,后任阿克苏地方税局副局长;刘勉(女)任迪化女中军事教官,后兼任新疆妇女协会宣传部长;罗乃棠(李华荣)任巴楚地方税局副局长;陈广竹(化名陈解虚)任和田地方税局副局长,后任墨玉县代县长;薛汉鼎(薛激刚)任叶城、皮山税局副局长,后任财政厅视察员;马肇嵩(化名马锐)任和田教育局督学,后任代局长、博乐县教育科长;郝冰清(郝升)任焉耆地方税局副局长,后任焉耆区财政局副局长;黄永清任于阗、策勒地方税局副局长,后任洛浦县税局局长、皮山县

税局局长;任远光(女)任迪化女中教师。

在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是全国抗战的远后方,成了最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而且新疆还是中共与共产国际、苏联联系的通道,而且新疆地方实力派盛世才又打着"亲苏、拥共"的旗帜。这种状况决定了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的特点。

第一,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共同纲领的指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没有明确的共同纲领的,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是有共同纲领的,这个共同纲领就是苏联帮助盛世才制定的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陈云当时指出:我党在新疆建立的是特殊的统一战线。新疆实行的六大政策,是我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六大政策与我党最低纲领是一致的,我们帮助盛世才推行六大政策,也就是贯彻我党的最低纲领。从而也就决定了我党在新疆的工作方针。正如陈潭秋所指出:(1)怎样保持新疆始终成为中国的领土,不致陷入帝国主义的手中。(2)怎样巩固这个抗战的主要后方和国际交通要道。(3)怎样推进这个落后的社会前进,怎样使各民族过上和平友谊的生活。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只有拥护和贯彻执行六大政策,因为六大政策是最适合于新疆特殊条件的革命政策,六大政策的胜利,也就是我们在新疆的胜利。如果我们在新疆提出另外不同于六大政策的主张,则无论主观如何,客观上都是只能起破坏作用。所以决定我们在新疆工作的任务,不在于发展组织或宣传主义,也不在于扩大自己的力量,而是要巩固六大政策的政权。①

第二,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特殊的组织形式。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国共两党有政权有军队,但是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只是遇事协商,共产党员一般不参加国民党政府工作,只在个别战区,如山西参加了地方政府工作。而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特殊的形式,共产党人参加盛世才政府的工作,并负有重大责任,中国共产党人还将盛世才官办的群众组织反帝会改造为统一战线的组织。1938年1月,黄火青从"新兵营"调入反帝会任秘书长,对反帝会进行了第二次改组,调入一批中共党员担

①陈潭秋:《在新疆的工作任务与工作方针》,1939年11月。

任部、科领导，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和“新兵营”的同志均参加了反帝会，不久又修改了反帝会章程，增加了许多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新内容。中国共产党人利用这个组织的合法性来宣传抗日，训练和组织群众，并竭力把反帝会变成一个真正群众性的组织。黄火青曾经明确指出：“反帝会既然是群众性政治团体，它的基础对象，不应限于窄小界限以内，而是要注意到全疆十四个民族，四百万民众。”[①]到1939年底，反帝会已有27个区会，118个分会，33个直属分会，24个直属小组，会员人数已有1万以上。

第三，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共同领导，事实上起最后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国际。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军事上的独立性，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分析的态度，择其善者而从之。而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是完全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是因为，一方面苏联在新疆有很大的势力，中共与盛世才的统一战线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另一个原因是新疆与延安之间相隔遥远，中间又隔着国民党统治区，交通联系十分不便，而新疆与苏联相连，交通方便，在迪化共产国际派有专门负责与中共联络的人员，因此，当时中共中央经常通过共产国际来处理新疆的事务。这种状况，在合作关系较好的时候，问题还不大，在合作关系即将破裂、情况瞬息万变、需要当机立断时，就暴露出它的严重弊端，它使在新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缺乏独立自主的应变能力。

第四，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实行“三不”原则为基础。中共在新疆工作，同样要遵守共产国际、苏联制定的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的原则。在新疆实行“三不”原则，一方面是沿袭俞秀松等一批联共党员在新疆工作时实行的办法；另一方面是适应盛世才的要求。1939年以后，盛世才确定自己的立场为独立于共产党、国民党以外的第三集团，他坚持在新疆实行“三不”。因过去中共在新疆没有任何工作基础，只是由于苏联的关系和盛世才的邀请才进入新疆，因此，中共在新疆不发展组织，主要是帮助现政府进行工作。

①《反帝战线》第5号，1938年8月15日。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业绩

（一）动员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日战争

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增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下，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当时的中心口号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8月，在迪化成立了新疆民众抗日救国后援会，各区设分会，各县均有抗日救亡团体（抗日后援会后并入反帝会），并组织了商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工人救国联合会等民众团体。新疆各民众团体为了响应全国抗战号召，通电全国，内称："新疆虽僻处边陲，抗日救国尤为吾人之素志，枕戈待旦，誓与国人共同奋斗。"充分表达了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

发动抗日募捐，支援抗日前线，是新疆各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一大贡献。早在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后，反帝会就在新疆发动了第一次抗日募捐活动，省城各公务员以12月份两日之薪金捐助绥远抗日将士，军人、学生自由捐助。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救国后援会在新疆范围内发动"一·二八"抗日募捐活动，在短期内即募集新疆币200多万两。从1938年开始，抗日救国后援会把募集抗日捐献作为经常性活动，在"一切为着抗日胜利"和"有钱出钱"的口号下，新疆各族民众开展了广泛而热烈的募捐活动。迪化裕丰隆商号把拍卖三天的货物，全部捐作抗日经费，不少劳动者也从日常的生活费里节省一些费用，一点一滴地聚集起来送到抗日救国后援会。一位泥水匠

在给后援会的信中写道："爱国有心，捐款无力，仅将今天给人下苦所得省票3500两，留500两买两个馕充饥，其余如数捐献。"短短几句话，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对抗战救国事业的万分关切，同时也表现了我中华民族子孙的优秀精神和忠勇气概。

1938年10月17日，反帝总会在秘书长黄火青主持下，讨论募集寒衣问题，会议决定开展为抗日前线募集寒衣活动，预定募集寒衣10万件。11月19日，反帝总会成立了"抗日救国献金运动委员会"，发动全疆三日献金运动，把爱国热忱推向高潮。当时在迪化市内设置献金台，两边高挂大幅标语："集中个人的财力，驱逐日本强盗出中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联合起来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这次活动深入、广泛，从机关团体到穷乡僻壤的蒙古包，从省主席、督办到公务员、学校教师、工商业者、街道居民、农牧民，从七八十岁的老人到小学生，大家慷慨解囊，热诚地献出金银、首饰、枪支、现金。一些少数民族同胞还把自己家传或节衣缩食购买的和田挂毯、绸缎衣服，以及家中牛羊、毛驴、大车、黄豆、高粱、大米、小麦、苜蓿、谷草等也送到献金台，表现了新疆各族同胞极大的爱国热忱。迪化有位70多岁的老太太含着激动的热泪走上献金台，当场摘下自己唯一值钱的金耳环，双手捧献，目睹者无不为之动容；一位小学生写信给新疆日报社，省下糖果费，为抗日捐献省票9000两；额敏县的民众减食三日，献出口粮；温宿县的寡妇阿提克汗将其夫生前留下的27个元宝全部捐出；库尔勒维吾尔族贫民艾沙无钱捐助，情愿送子上前线，并称"倘不忠实抗战，宁可不见子面"；新疆著名的艺术家康巴尔汗、"达瓦孜"（走高绳）演员司迪克·阿西木祖孙等许多艺人自发组织了抗战义演。真是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至年底，迪化地区献金总额法币9.4万元，皮大衣20万件及许多其他物资。

1938年冬，为了给前线喋血将士们以精神上的鼓励，反帝会特发起写慰问信活动，数月集得10万封长长短短的慰问信，把14个民族对前方将士的慰问带到了战壕中和山村里，极大地激发了将士们杀敌的勇气。为了抵抗敌寇施用惨无人道的毒气战，减少我前方将士的牺牲，1939年又有防毒募捐活动的发起，共募捐7万余元。据1940年反帝总会统计，自1937年9月至1940年

5月，全疆各族人民共捐款折合现大洋322万余元。1939年8月，新疆用捐款152万余元(法币)购买了10架战斗机献给国家，命名为“新疆号”。

保障运输盟国军援物资，是新疆对抗日战争的又一大贡献。为解决苏联援华军用物资的运输问题，成立了中央运输委员会新疆分会。当时新疆与苏联的国际通道有两条路线：一是公路，由苏联的萨雷奥泽克—霍尔果斯—迪化—兰州；二是航路，由苏联阿拉木图—伊宁—迪化—兰州。公路在新疆境内设立新二台、精河、乌苏、绥来、迪化、吐鲁番、鄯善、七角井、哈密、星星峡10个接待站。航路在伊宁、乌苏、迪化、奇台、哈密5处建立临时航空站，以提供空援和辅助援华运输中的紧急需要。1937年10月17日，第一批苏联军用物资由萨雷奥泽克紧急运往中国。同时，还在奥德萨用4艘轮船进行海运。1938年10月日军攻下广州后，海上运输线中断，苏联向中国运输军事物资只能依托新疆这条唯一的陆上交通运输线。

据苏联方面统计，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8月，苏联提供给中国政府的军事物资有：飞机985架，坦克82辆，大炮1317门，汽车1550辆，拖拉机30台，机关枪14025挺，枪弹16400万发，炮弹190万发，炸弹8.23万颗。1940年底崔可夫来华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兼苏联驻华武官，苏联又供给中国政府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3000门炮，500辆吉斯5型汽车的援助，1938—1940年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先后派出军事顾问140人，先后来华的志愿空军人员2000余人。这些援华人员和军用物资以及中国偿付苏联的物资，基本上从新疆这条国际交通线通过。

1940年7月，英国在日本的压力下封锁了滇缅公路，使英国援华物资无法运入，当时邵力子任驻苏大使，经与苏联政府谈判，签订假道中亚细亚共和国运输英国援华物资的协定，暂定过境运货1.9万吨，平均每月1600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缅甸失陷，日军长驱直入，封锁了滇缅公路，至此，通往中国的海岸运输线完全断绝，美援物资只有改道印度中转，由美国空军从印度狄布鲁伽空运到中国昆明。但这条航线须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受恶劣气候影响，大批空运尚有困难。为了解决运输困难，1944年9月又开通了新疆至印度的国际驿运。

支持中共坚持抗战，是新疆对抗日战争的另一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利用与盛世才的统一战线，在一段时间里保住了新疆这条国际交通要道，使中共能够及时地向共产国际反映情况，增加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了解，从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积极的成果。由于这条国际通道的畅通，使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和重要干部如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王明、康生、王稼祥、蔡畅、邓颖超、邓发、林彪、陈郁、蔡树藩等，以及越南的胡志明、日本的冈野进、印度尼西亚的阿里阿罕姆等国际友人能够途经新疆，来往于莫斯科和延安之间。

中国共产党利用与盛世才的统一战线，还取得了物资上的支援和政治上的声援。新疆支援延安的物资可考者计有：1937年10月，中央军委派周小舟来新，盛世才赠送八路军3万件皮大衣，一批机枪；1937年11月王明路过迪化回延安时，盛给王明1万美金帮助八路军抗日；1937年底，滕代远从新疆返回延安时，带回高射机枪4挺，子弹2万发，西药400公斤；1938年1月，邓发将新疆各族人民用“一·二八”捐款从苏联购买的一批药品及电讯器材运往延安；1939年，陈潭秋又用新疆筹集的防毒捐款，从苏联购回《新中华报》需用的新闻纸10吨运至延安；1940年1月总支队东返时，除携带随身自卫武器外，还带回迭克铁里瓦机枪4挺，子弹4万发，作为送给朱德、彭德怀的礼物。

新疆在政治上对中共的声援是十分突出的。每当中共发出通电、号召，或八路军取得重大战绩时，新疆总是热烈响应，积极支持，高度评价。1939年末至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4月，迪化举行市民大会通电全国坚决拥护团结，反对摩擦，坚持抗战，要求力行宪政，实现民主，革新政治机构，改善人民生计，争取抗战最后胜利。1940年秋，八路军在华北取得百团大战的胜利，《新疆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华北出击大捷，提高了抗日根据地与游击队的地位，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显示出它的伟大力量和作用，从而获得全国人民更大的拥护和援助。”皖南事变时，盛世才多次复电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盛世才复电时，称盛世才“主持正义，仗义执言”。[①]《新疆日报》还先后刊登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中共中央发言人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苏联塔斯社关于皖南事变的消息、

①《新中华报》，1941年2月13日。

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的通电等，进一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应当承认，在1942年盛世才投靠蒋介石之前，在抗日救国的大局上盛世才和新疆是站在中共一边的。对此，中共中央在1941年7月28日电贺新疆反帝军成立7周年时指出："由于督办六大政策的领导和全疆十四个民族四百万民众之团结，使新疆成为抗战最巩固的后方。当此抗战第五周年到来之时，又正值国际形势发生严重的变化，疯狂德国罪魁希特勒已经大举进攻苏联，并正式承认汪逆伪组织，来和中国人民为敌。今天全国人民的任务是要更加强国内的团结，并与一切反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及人士联合，为着保卫中国，保卫苏联，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独立而斗争，本党愿与督办所领导下的反帝会、反帝军同向此目标前进！"①

（二）"新兵营"——我军最早的特种兵学校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红军的现代化装备非常关心，建议中共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建立以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独立部队。当时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无法解决现代化武器装备问题，因此，由陈云同志提议，党中央决定利用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使新疆成为党培养和训练特种军事技术干部的基地。"新兵营"实际上是一所训练特种兵技术干部的学校。

1937年秋，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整编为总支队。总支队队长杨秀昆，政委刘庆南，参谋长饶子健，政治处主任姚运良，党总支书记喻同金，总支队下设4个大队及直属总务科、医务室和警卫排。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1937年秋季开始，总支队在迪化利用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技术装备作教具，以苏联和盛世才的军事教官为老师，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一、二大队学习汽车驾驶，三大队学习装甲车和坦克，四大队学炮。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挑选了67人学汽车，87人学炮兵，50人学装甲车，34人学无线电，13人学医疗，43人

①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5页。

学航空，20多人派往苏联学习情报工作。

党代表陈云、邓发、陈潭秋先后组织和领导总支队的学习，他们亲自讲授政治时事和马列主义理论，安排延安来的干部曾山（总支队政治处副主任）、孔原、曾涌泉等任文化教员，对总支队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总支队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由于所学的科目多，学习时间短，因而教与学都面临着重重困难。为了创建未来的特种兵部队，他们一边补习文化知识，一边学习军事技术，以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攻克了一道道难关，终于把特种军事技术学到了手。

为了进一步提高和检验所学的各种军事技术和指挥能力，1939年夏秋之季，在邓发、陈潭秋的组织领导下，总支队进行了三个月的野营训练。部队从行军，与假设敌人作战，到同盛世才的步、骑、炮兵部队和装甲部队联合战斗演习，进行了全面的实战训练。他们把所学到的军事指挥、军事技术等知识，运用到实际训练中，使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有很大提高。

为了培养航空技术人才，总支队从新兵营抽调吕黎平、方子翼等25人，加上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保卫部和摩托学校选调的严振刚、黎明等19人（1人因病除外），一起进入盛世才的航空队学习飞行和机械等航空技术。在举行开学典礼时，从延安来的学员与“新兵营”来的学员，遵照邓发的建议，开了个联欢会。在联欢会上，严振刚传达了陈云的指示，他说，陈云同志在延安窑洞里接见即将赴新疆学习航空的同志时说，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有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要搞好团结，遵守纪律，保持党的荣誉。大家听后，受到很大的鼓舞。

正式开课后，先学习一个月的航空理论，包括机械物理、航空原理、飞机构造等课程。随后正式投入开飞机训练，开始先学苏式伊-2型双翼初级教练机，考核及格后，接着学中级教练机P-5侦察机。经过艰苦训练，全部完成了空域盘旋、轰炸和单、连续投弹等科目，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党中央对在新疆学习军事技术的指战员非常关心。1939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莫斯科治臂伤，在迪化逗留期间，正值总支队在进行

野营训练和联合军事演习，周恩来在陈潭秋的陪同下，专程去迪化北郊八家户野营地，看望“新兵营”指战员并讲了话，他说：党中央要求你们认真学好军事技术，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培养出自己的特种兵骨干，大家一定要安心学习，一定要学好。我相信不要很久我们也会建立起自己的机械化部队。在野营地，周恩来还接见了中共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学员代表吕黎平和严振刚，周恩来告诉他们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关心你们学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周恩来详细询问了航空队学员们的学习情况，当听到他们已经能够操纵、维护两种飞机时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他还给这两位代表分析了国民党空军的状况和教训，兴奋地谈到我党建立空军的设想和要求。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党迟早要建立自己的空军，暂时没有飞机就培养技术人才，你们40多位同志有学飞行的，有学机械的，一旦有了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1939年冬，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抗日前线的需要，党中央指示总支队全部撤返延安。1939年11月初，朱德总司令向盛世才发出了撤回“新兵营”的电报，由盛世才负责同国民党进行多方面的交涉，使总支队能够顺利东返。党中央指示总支队大队（团级）以上干部乘飞机，其余同志乘汽车返回延安。因国共两党军队摩擦得很厉害，怕路上遇到麻烦，要有得力干部带队。陈潭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做了精心安排，除决定航空队、兽医班留下继续学习外，“新兵营”官兵329名，由曾玉良（化名朱光）、喻同金等带队，于1940年1月11日乘汽车离开迪化回延安，盛世才派督署参议丁宝珍护送。陈潭秋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乘车相送，一直送了30多公里。饶子建、姚运良、宋承志等总支队领导人及警卫人员和病员共31人，于1940年2月2日乘飞机离开迪化返回延安。

总支队返回延安后，受到毛泽东、洛甫等中央领导人及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1940年3月8日下午6时，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晚会，欢迎丁宝珍参议及从新疆归来的八路军诸同志，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洛甫、王稼祥、康生、陈云、邓发在会上讲话。这支在新疆培训的特种兵

技术力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年在总支队学习的指战员，后来都成为我军特种兵部队的骨干和领导力量。

1940年夏，航空队的学习遇到困难，为此，在航空队学习的中共党员，要求陈潭秋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并转达他们的三条要求：(1)回延安建立自己的空军抗日；(2)参加陆战队抗日；(3)赴苏参战。党中央回电：严守纪律，安心学习。1941年恢复飞行课，大部分学员继续飞P-5侦察机。此时盛世才又从苏联运来伊-15双翼战斗机和伊-16双翼战斗机，这两种飞机马力大、速度快、火力强。为了尽快掌握这两种飞机的飞行技术，陈潭秋同苏联顾问商定了名单，将吕黎平、方槐等10人抽出来进行专门训练，经过4年的学习，中共在航空队的学员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学习任务。他们是我党我军第一批航空技术人才，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开展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列主义和进步文化

由于民国以来新疆地方军阀推行极端的愚民政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春风化雨，未能滋润新疆这片国土，使新疆在文化方面完全是一片荒漠。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中共党人来新疆工作，使新疆在许多方面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当时被誉为“中国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国内一些进步人士因不满抗战时期国民党的腐败，想到新疆施展自己的抱负。1938年10月，应盛世才的邀请，著名民主人士杜重远担任了新疆学院院长(1939年1月到任)，《立报》经理萨空了担任了新疆日报社副社长。1939年3月，应杜重远邀请著名文学家沈雁冰(茅盾)，著名学者张仲实、沈志远、涂治、史枚、高滔等到新疆学院任教。1939年8月，著名文艺工作者赵丹、徐韬、王为一、朱今明、叶露茜、俞佩珊、陈瑛、陈婉芬、易烈等也来到迪化，可以说新疆当时是人才荟萃。中共党人和进步人士密切合作，齐心协力，在短短两三年内使新疆的文化建设有了巨大的发展，形成了声势浩

大的新文化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新文化运动最大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广泛传播。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新疆个别先进分子曾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未能在新疆传播。1933年苏联与盛世才结盟以后，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人和进步人士利用盛世才允许并提倡研究马列主义的一面，大力传播马列主义。在迪化的书店公开出售《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列宁主义问题》、《论反对派》等中文版的马恩列斯著作，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如《新哲学读本》、《大众哲学》、《马克思传》、《社会科学基础教程》、《通俗经济学讲话》、《政治经济学》、《新经济学大纲》、《大众资本论》等等。仅1941年销于新疆的中文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列宁主义问题》就有万余本。在共产党人掌管的《新疆日报》上发表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等著作，以及中共中央文件和介绍抗日根据地的报道、通讯。新疆日报社1938年翻印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各8000册，1940年翻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2万册，1941年翻印洛甫主编的《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2万册。反帝会的《反帝战线》、新疆学院的《新芒》均发表过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在新疆学院，中共党人和著名学者沈雁冰、张仲实、沈志远等讲授过《新哲学》、《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中国革命史》、《世界革命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直接向各族师生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盛世才反共后，1943年3月阿克苏行政长公署根据盛世才的反共指令，仅在乌什县抄出的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就有543本。[①]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竟有这样多的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可见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广泛。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大唱抗日歌曲，大演抗战题材的话剧。大唱革命歌曲是从“新兵营”开始的。“新兵营”一边紧张学习，一边排练文艺节目，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文艺生活热火朝天。盛世才也受到革命歌曲的感染，便邀请“新兵营”文化教员李光到督

①《中共党史资料》第25辑，第276页。

办公署大楼教唱革命歌曲，政府官员和军队领导参加学唱，盛世才带着家属参加。中共党员陈谷音曾在上海专修音乐，担任师范学校专职音乐教师，他积极编写了《简谱乐理》等书，普及音乐知识，又组织学生排演《黄河大合唱》等节目，为中小学培养了一批音乐教师和骨干力量，他在反帝会举办的歌咏训练班任教，为《反帝军军歌》谱曲。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提倡和努力下，歌咏队的发展更像雨后春笋，普遍于各学校、军营和工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流亡三部曲》、《国共合作歌》、《黄河大合唱》等民族抗战的歌声响彻迪化全城。

话剧这一艺术形式是由中共党人和进步人士带入新疆的。它紧密地反映现代生活，是宣传抗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形式。1938年5月，从延安来的同志在迪化“新兵营”驻地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警号》等宣传抗战的戏剧，引起极大的反响。随后，“七七”和“九一八”纪念日，他们又演出了《无名英雄》、《血祭九一八》等话剧，影响越来越大，要求观看的群众越来越多。林基路、李云扬、朱旦华等中共党人组织新疆学院、省立一中、女子中学师生排演话剧。1938年10月，新疆省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反帝会组织新疆学院演出了话剧《死里求生》，女中演出《一个受伤的游击队员》，省立一中演出《牺牲》，师范学校演出《塞外狂涛》，哈萨克文化促进会演出《黑眼睛》，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和好评。1938年11月在反帝会领导下，迪化市学生联合会举办了一次戏剧比赛评奖大会，新疆学院演出的林基路编导的话剧《呼号》，获大中学组第一名；省立中学演出的《我们打冲锋》，女中演出的《电线杆子》并列第二名；师范学校演出的《民族公敌》获第三名。参加这次戏剧评奖委员会的有中共党人黄火青、汪哮春、李啸平、于村、林基路、李云扬、朱旦华等，《新疆日报》为此次比赛连续出了专刊，并邀请文化界知名人士杜重远、陈纪滢、萨空了等参加座谈讨论，充分肯定了戏剧评奖的成绩。通过这次戏剧评奖，使话剧从学校走上社会，每当新话剧公演之时，市民便连夜排队购买戏票，踊跃观看。

1939年3月沈雁冰来新后，担任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兼艺术部部长。为了把已经发展起来的戏剧运动推向新的阶段，沈雁冰亲自在新疆学院学生中

组织成立了“戏剧研究会”，组织指导戏剧文学爱好者赵普林、党固、乔国仁等学生创作报告剧《新新疆进行曲》，初稿完成后，沈雁冰亲自执笔修改定稿。这部反映新疆现实生活的大型话剧于1939年5月在西大楼和汉族文化促进总会俱乐部正式公演，沈雁冰在《新疆日报》上发表题为《为〈新新疆进行曲〉的公演告亲爱的观众》的评介文章，指出该剧公演的意义：“一方面是我们的一点点微忱，另方面是抛砖可以引玉，在不久的将来，就有伟大的文学杰作产生出来。”①

1939年8月，赵丹等9人来到迪化，使新疆的话剧活动达到高潮。在“九一八”8周年之际，文协组织演出了章珉的5幕话剧《战斗》，由著名戏剧家赵丹导演，王为一、徐韬、易烈、叶露茜、陈婉芬等名家出演该剧主角，布景和灯光由朱今明负责，中共党员于村、白大方和新疆学院多人参加演出。他们精湛的演技，轰动了迪化全城，该剧上演10余日，场场爆满。沈雁冰、杜重远、张仲实著文评论演出，介绍赵丹等表演艺术家。《新疆日报》不仅编出了评介《战斗》演出的专刊，还发表了社论称：“赵丹等人来新，话剧运动委员会的成立，使新疆的话剧走上新的阶段，将给予新疆整个文化发展一个很大的助力。”11月，新疆文化协会实验剧团成立，与新疆文化协会戏剧运动会合署办公。中共党员徐韬、于村、白大方参与了剧团的领导工作。在实验剧团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就上演了《战斗》、《故乡》、《新新疆万岁》、《突击》（丁玲编剧）、《前夜》（阳翰笙编剧）、《古城的怒吼》等大型话剧以及《小黑子》、《两兄弟》、《打日本》、《血祭九一八》、《顺民》、《最后一计》、《搜查》等独幕剧。

与此同时，迪化大中学校和机关成立的群众性业余话剧团的演出方兴未艾。1940—1941年期间，曾经演出了陈白尘的《魔窟》、《乱世男女》、《太平天国》，宋之的的《旗舰出云号》、《鞭》、《武则天》、《民族万岁》，曹禺的《雷雨》、《北京人》等剧作。秦腔和新疆曲子也先后演出了富有时代精神的《郑成功抗日》、《台儿庄》、《抓汉奸》等新剧本。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促进会相继成立了本民族的演出队或剧团、歌舞团。在迪化演出的有维吾尔语话剧《阿娜尔古丽》、《在原野上》、《战斗的姑娘》；歌剧《艾里甫与赛乃木》、《货郎与小姐》，蒙

①《新疆日报》，1939年5月26日。

古语话剧《牛马儿媳》,哈萨克语话剧《胭脂》等。而且在喀什、伊宁、麦盖提等地都有了用少数民族语言演出的戏剧活动。话剧、戏曲、民族歌舞交相辉映,在新疆文艺舞台上开拓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特点是大力传播五四新文化,介绍苏联革命文化。在这方面成绩卓著者首推沈雁冰。他在新疆工作一年多时间,身兼数职,担任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会长、《反帝战线》编委会编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他不遗余力地传播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介绍苏联革命文化,为新疆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39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新疆学院隆重召开了五四纪念会,沈雁冰作了《五四运动之检讨》的报告。在报告中,沈雁冰分析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论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同时指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弱点,报告的结论是:五四运动的历史"证明了'先天不足'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像十九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那样领导农民工人以坚强的战斗的行动来完成反封建反帝的民主革命",中国只能走"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民主革命"。[①]1939年5月7日,沈雁冰应妇女协会的邀请,作了题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讲演,他介绍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史以及各阶段的特点,分析了各种文学流派和文学样式的兴衰消长,总结了极为宝贵的历史经验。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旗手,新疆各族人民比较深入地了解鲁迅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10月19日,新疆学院师生举行了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反帝战线》出版了"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专栏,发表了齐同的《鲁迅怎样》和沈雁冰的《在抗战中纪念鲁迅》两篇专文,全面介绍了鲁迅先生的思想、事业,以及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沈雁冰的文章痛斥了中国的"正人君子"们对鲁迅的种种嘲讽和攻击,深刻地阐述了鲁迅的革命精神,号召青年们学习鲁迅"至大至刚的爱民族之心","百折不回的勇气和毅力",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

①《新芒月刊》第1卷第1期。

沈雁冰1939年11月发表了《二十年来的苏联文学》一文，分三个阶段简略地介绍了苏联文学发展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深刻地指出："二十年算不得怎样长久，可是经过了'震动世界的一周间'，经过了内战与饥饿，经过了新经济政策与第一、二期五年计划的苏联文学，却是反映了这新时代的诞生与成长的全貌的，比之过去的任何大革命时代的文学更丰富，而且也更多彩而生动，特别是更现实主义的。"在《苏联的科学研究院》一文中，他叙述了科学在实现苏联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在《青年的模范——巴甫洛夫》一文中，沈雁冰号召广大青年学习苏联科学家巴甫洛夫忠实于人类幸福，死而后已的伟大人格，终生如一的治学精神，以及除了学问没有所好的高贵品格，努力从事抗战建新事业。

沈雁冰在新疆期间，还写了《显微镜下的汪派叛逆》、《白色恐怖下的西班牙》、《"纳粹"的侵略并不能挽救经济下的危机》、《英法苏谈判迁延的症结》、《侵略狂的日本帝国主义底苦闷》、《所谓"芬兰事件"》、《帝国主义战争的新形势》等战斗檄文。控诉了德、日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刻画了汪精卫集团的汉奸脸谱，揭露了英法对法西斯侵略者妥协屈服的"慕尼黑阴谋"，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色厉内荏、八面碰壁、日暮途穷的困境，沈雁冰深刻地指出："凡能使日本帝国主义垂死的挣扎于无效，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的一切因素之中，最重要的一个却是我们的坚决抗战到底，决不中途妥协，而要坚决抗战到底，就非加紧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良政治机构，改善民生不可。"①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新文化运动的第四个特点是重视教育，大力培养各民族的多种人才。在新疆的中共党人有27人先后担任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领导职务和教学工作，他们团结各族教育工作者，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为了发展教育事业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一是健全省、区、县教育行政机构，建立规章制度，稳定教学秩序，结束了教育工作缺乏统一领导和要求的紊乱局面，加强了领导，提高了各级教育部门的工作效能，使教育工作开始有秩序地进行。二是增加教育经费并动员社会力量兴办学校。三是培养各族师资，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编译出版各种小学教材，使各族

①《反帝战线》第3卷第1期。

儿童有书可读。四是重视社会教育，除学校教育外，创办了社会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孤贫教育，以及其他各种训练班和讲习会，大力培养人才。到1942年，全疆公立会立小学2463所，学生27.11万人，比1937年增长1.4倍；大中学校8所，学生3787人，比1937年增27.5%；扫除文盲的民众学校846所，学生146911人。还开办多种训练班，培养各种人才。沈雁冰担任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后，举办了文化干部训练班，在全疆招收了200余名各族青年，沈雁冰、张仲实分别担任正副班长，并亲自讲授马列主义革命文艺理论，经过1年多的培训，使他们成为文化战线的骨干。毛泽民担任财政厅代厅长后，在迪化创办了财政专修学校，毛泽民兼校长并亲自讲课，培养了几百名财政金融专门人才。黄火青调任阿克苏行政长后，举办了会计训练班，焉耆区也举办了会计训练班，哈密区办了簿记训练班。中共党人还在新疆日报社举办了三期新闻技术人员训练班，培训了140多名新闻工作者。反帝总会到1942年底，共举办训练班20期，34个班，训练会员2200余人。新疆妇女协会在迪化举办了两期干部训练班，同时在焉耆和奇台地区又各办了两个班，培养各族妇女干部百余人。此外，还举办过“县长训练班”、“政治干部训练班”。

教育面貌的改变，更重要的表现在大中学校教学内容的革新上。新疆学院的深刻变化是一个生动的范例。1938年，中共党人林基路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祁天民任新疆学院秘书兼教育系主任，杨梅生任军事教官，许亮兼任讲师。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所还未脱离旧式学塾状态的学院被改造成了培养进步青年的火的殿堂。林基路到任后，首先制定了“教用合一”的教学方针，提出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八字校训，并决定以“生活革命化”和“新工作作风”作为建设新校风的基本方向。学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设置《新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政治课，并规定每周周末为“抗战建国日”活动，由林基路等向学生讲解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全校教学秩序井然，政治热情饱满，抗日情绪高涨。1939年1月，民主人士杜重远任新疆学院院长，共产党人郭春则任教务长。杜重远完全同意林基路提出的办学方针，他认为新疆学院应该成为宣传抗日的基地，培养人才的熔炉，推动新疆文化教育发展的主要阵地。他聘请内地著名学者到新疆任

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教学质量，而且给学生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学生们在著名学者、教授的影响下，思想更为活跃。虽然学校设备和条件较差，但学生的“求知欲非常的高”，“对抗战的工作，异常努力”。杜重远十分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经盛世才同意，1939年7月，新疆学院200多名师生组织了“暑期赴伊犁旅行团”，杜重远任团长，张仲实、郭春则任副团长，到北疆去旅行，一面进行抗日宣传，一面进行社会调查。这次北疆之行，历时1个多月，走了8个县，行程1000多公里。杜重远、张仲实等在群众大会上演讲50多场，师生们深入社会，广泛了解工人、农牧民状况，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锻炼。在中共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教育、培养下，各族青年学生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新文化运动，以它革命的内容，清新的格调，民族的形式，为新疆各族人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哺育了新疆一代革命青年成长，促使新疆各族人民的觉醒。

（四）发展经济，改革政治，巩固边防，为各族人民办好事

1938年2月10日，毛泽民被任命为省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当时新疆财政因连年多事，纸币毛荒，负债累累，“弄得天怒人怨”。毛泽民走马上任，大力整顿财政，开源节流，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毛泽民整顿财政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改组银行，改革币制。新疆商业银行于1939年1月1日正式成立，废除原来50两票面的旧币和流通喀什一带的喀票，发行以元为单位的新币。新币币值稳定，使用十分方便，公众舆论很好。至此，新疆货币终于从混乱不堪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货币流通开始萌现新的转机。二是整顿财政机构，健全财政预、决算制度。当时规定在新疆8区设立财政局，受财政厅直接管理及本区行政监督处理财政事项，总局自科长以上，分局自主任以上职员之任免，应报财政厅核准后再行委派。新疆

自1937年开始实行预算制度，但很不健全，各地向财政厅直接要钱的现象仍屡见不鲜，税收也不能按时入库。针对这种混乱状况，毛泽民在制定财政收支预算时，对发展经济建设、文教卫生事业所需经费放得比较宽，而对军费和公安费却卡得很严。在毛泽民的坚持下，公安费在总预算中由1938年的20%降到1941年的10%以下，教育经费由4.5%增加到11.5%。三是整顿税务，增加财政收入，减轻人民负担。为了彻底取消包税制，改变在税收提成上的不合理状况，毛泽民对税务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对田赋采取核实田亩，保证田赋收入；对牧税分为大小畜，大畜征收3%，小畜（羊）征收5%，并制定《征收牧税奖惩条例》；对于关税，重新修定了《关税税则》及《征收关税办法》；此外还整顿了营业牌照税和印花税。在整顿税务中，重视减轻人民的负担。1939年在保证正常收入的前提下，豁免了南北疆因灾歉收的田赋额粮；取消南疆各区随田赋带征正草的多年惯例；免征储蓄冬草搭盖冬窝的牧税，核减了旱田的田赋，取消了牲畜屠宰税，核减了行商的贩运牌照税，禁止随意向人民募捐等等。毛泽民还于1940年4月19日发布通令重申：为改善人民生活，绝不愿民众负担太重，所以迭次通令各军政机关，各地方严禁有向民众捐款情事，不论何种捐款，非经政府核准，不得擅自行动。……未经政府核准擅自捐款者立即撤差，从严惩办，决不姑息。

税务的整顿，促进了财政收入的增加，据有关资料统计：1937年收入为1240万余元，1938年为1347万余元，而到1942年则达到7828万余元。财政收入的增加，为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1940—1942年三年实拨教育经费1226.8万元，比计划数多支32.3万元。为了积累更多的资金投入经济建设，1941年1月1日，首次发行新疆省建设公债，定额为500万元，毛泽民亲自制定了《建设公债条例》和宣传大纲，号召群众和政府通力合作，加速新疆的建设，以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当时驻新疆的中共代表陈潭秋也指示各地共产党员要做好认购公债的宣传鼓动工作。由于工作做得细致深入，实际推销建设公债6655344元，超额165万余元。建设公债的发行，有力地支援了新疆的经济建设，1942年全疆耕地面积扩大到1638万亩，牲畜总头数达1280万头，农牧业生产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此外还创办了皮革厂、面粉厂、针织厂、榨

油厂、缫丝厂、发电厂、造纸厂、印刷厂、制酪厂、糖果厂、自来水公司等一批工厂。

1941年7月，毛泽民调任民政厅代厅长后，进行政治改革。他参照陕甘宁解放区实施的民主选举方法，结合新疆实际情况和特点，亲自起草了《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经省政府批准，于1941年11月1日公布实施，由区、村代表会议来选举区、村长，在市镇由居民直接选举街长。他还主持起草了《县政组织章程》、《新疆省各区行政长公署组织暂行条例》，各县相继成立了政务委员会，重大事项由政务委员会议决。当时担任行政长、县长职务的黄火青、林基路、韩光、许亮、李云扬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工作岗位上勤政清廉，他们处处从维护各族人民利益，增强民族团结出发，体察民情，解除冤狱，兴修水利，发展教育，修桥补路，救苦恤贫，为各族人民办了许多好事，至今还在群众中传颂着。

在盛世才军队中工作的中共党人，恪尽职守，为巩固边防做出了贡献。1938年5月，驻疏附县骑兵三十五团有两个连在英国间谍策动下叛乱，胡鉴领导的蒲犁边卡大队以及骑兵三十一团、四十八团奉命平叛。平叛后，胡鉴拟定了修建哨所计划，经督办公署批准，到1940年，修建成红其拉甫、达不达尔、伙比什、排依克、罗不盖等5个哨卡，巩固了边防。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狱中斗争及其返回延安

（一）中共与盛世才统战关系的破裂

恩格斯指出："不同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动起武来。"[①]中共与盛世才的统一战线，也是不同阶级的联合，因此，破裂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尚未打倒，1942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均处在艰难的年代，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破裂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于盛世才的背叛。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此时，苏联为了对付德国法西斯的凶猛进攻，已经不能继续给盛世才援助，而且要求盛世才对苏联的战争进行援助，一方面要求在新疆扩大开采石油、钽、铍等战略物资，另一方面要盛世才还债，而且必须用实物偿还。[②]为了还债，新疆税收改收实物，比如牧税征收不收纸币，而用牛皮、羊皮、马皮等实物代之。这一变化，使盛世才与苏联的结盟无利可图。此时，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处在空前困难之中。惯于见风使舵的盛世才认为："现在苏德战争在苏联境内进行，究竟什么时候结束，无人知道，即令苏联获胜，恐怕也不能如过去很有力量的援助新疆，现在我们应该研究三民主义，准备接近中央（蒋介石）。"[③]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0页。

②高登榜：《难忘的战斗岁月》，《中共党史资料》第25辑，第64页。

③李英奇：《盛世才的罪行》，1951年3月16日。

与此同时，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已经是危机四伏。在国内，国民党势力向新疆步步进逼，他的兵力阻挡不住国民党势力来新疆，政府工作人员中不少人希望倒向国民党。在经济上，发生了危机。1941年"阿山军事，政府支出较繁，省币开始贬值，该年政府曾成立平价委员会，在各区设立分会，施行限价工作，初行时尚收若干效果，但自七、八月后，布匹、洋糖、纸烟、石油、火柴售价，扶摇直上"，政府对物价"束手无策"。其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中某些要人及当局的亲戚，许多兼做商人，而许多大商人又是和这些要人们有勾结，因此，平价工作宣告失败，财政金融情形也是每况愈下。迪化的米价，由1941年1月每升1.05元（国币），上涨到1941年12月的每升3.25元，上涨2倍多；面由1941年1月每斤0.95元，上涨到1941年12月的每斤2.5元，上涨1.5倍。[①] 在政治上，盛世才制造的冤狱遍于全省，结怨已达极点，怨声载道，民怨沸腾，阿山更燃起了反盛的武装斗争烽火。

这些矛盾危及盛世才统治宝座。盛世才认为苏联已靠不住了，中共也自顾不暇，只有投靠国民党蒋介石才能确保他在新疆的统治。1941年12月，新任中国驻苏联使馆武官郭德全经新疆去苏联，盛世才热情款待了他，并在谈话中反复表示了他对蒋介石的尊敬。郭德全也告诉他，最近蒋介石已得到美英国家支持的消息。郭德全抵苏之后，立即电告蒋介石说盛世才正在重新考虑他的地位，有可能准备改善他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蒋介石在接到郭德全的报告后，竭力拉拢盛世才。1942年4月，蒋介石三次召见盛世才驻重庆的代表张元夫，向盛世才提出谈判条件，指示派三个师的军队进入新疆。5月，盛世才召集亲信汪鸿藻、李英奇、李溥霖、盛世骥、邱定坤、彭吉元等研究对策，决定派盛世骥随张元夫去重庆，并携去《新锡条约》及《独山子石油矿条约》文件。蒋介石夫妇予以热情接待，张元夫在重庆宣布盛世才与共产党"决非同一路线"。6月28日，盛世才致电蒋介石要求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来新，因朱绍良是他旧日长官，又是旧友，交谊甚厚，便于谈判。7月3日，朱绍良飞迪化，经过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协议：蒋介石答应新疆的事仍然由盛世才自己来管，满足了他确保独裁统治的需要，在

①张之毅：《新疆之经济》，中华书局1945年版，第46—47页。

经济上，为稳定新疆物价，采纳盛世才的要求，在新疆使用新币，不以法币径向新币兑换，而以50%付给美金，30%付给茶、糖、布匹和杂物，20%付给法币。盛世才同意国民党军队来新加强防务，外交权交给中央，在新疆成立国民党党部。8月29日，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在朱绍良陪同下访问了迪化，对盛世才做了四点指示：(一)调甘肃境内政府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牵制哈密苏军；(二)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将外交权收归中央；(三)肃清新疆共产党；(四)要苏军退出新疆。并加委盛世才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从此，盛世才公开抛弃亲苏拥共的旗帜，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

盛世才在加紧与蒋介石勾结之时，对中共党人和进步势力的迫害步步升级。1942年3月19日，在盛世才的指使下，其四弟盛世骐在寓所被谋杀，盛世才却倒打一耙，将罪责转嫁给苏联和中共党人，制造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开始了对全体在疆中共党员的迫害。他先以“另有任用”为名，将在新疆各地工作的共产党员陆续调回迪化，将他们同原在迪化的中共党员及家属集中在八路军办事处、羊毛湖和新房子三个地方，并对他们的行动加以严密监视和限制。

随着盛世才与中共关系逐步恶化，陈潭秋曾多次向中央报告要求把一部分同志撤回延安。中共中央对在新疆工作的人员安危十分关心，并为他们的撤退作了多方联系。然而，在中共人员未及撤退时，心狠手辣的盛世才已经下手了。宋美龄离开迪化后，盛世才借口为了“容易保护与免被国民党发觉”，将在新疆的中共人员集中在迪化八户梁和南梁招待所。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将中共在新疆人员分三处全部软禁。至此，盛世才完全撕掉了“进步”的面纱，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破裂。

（二）中共党人在狱中的斗争

被盛世才软禁在各处的中共党员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软禁后不久，陈潭秋同志作为我党代表给盛世才写了抗议信，对盛世才秘密软禁我党同志提出强烈抗议，严正指出：我们是接受你的邀请来新疆帮助建设的，要求立即释放，保证人身安全，迅速送回延安。信发后如石沉大海。陈潭秋同志又写了第二封措辞更加激烈的抗议信。与此同时，陈潭秋同志想方设法与软禁在其他地方的同志取得联系，了解情况，指导大家开展斗争，他告诫大家：盛世才要么叫你们去做苦役，要么软化你们去做他的官，你们不要上当，要坚定斗志，争取集体回延安。

软禁在三角地的同志在“学委会”领导下，仍坚持整风学习。李宗林向大家讲述萧楚女、恽代英、方志敏等烈士的英勇斗争事迹，大家漫谈讨论如何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并做出决定，被捕后一概不承认敌人强加于我们的任何罪名，和敌人坚决斗争到底，变监狱为学校，变监狱为战场。同时，他们还学习《联共党史》、《新民主主义论》和俄文等。软禁在八户梁的同志，在张子意同志领导下，利用当时在院内仍可自由活动的条件，组织集体学习与研究。他们组织了总学委会，下设分学委会学小组。学习内容有联共党史、中国问题、党建等。学习方法采取自修和上课，辅之以漫谈、讨论、作笔记、测验、默写、朗读、写作业等。软禁在督署教导队的航空队在学习生活指导委员会指导下坚持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和《联共党史》，更加坚定了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渴望能奔赴前线驾机打击侵略者。软禁期间，同志们经过学习提高了觉悟，坚定了立场，增强了与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为后来的狱中斗争打下了基础。

1942年冬，盛世才派亲信彭吉元赴重庆，要求蒋介石派员参加对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的审讯。1943年2月7日，盛世才将陈潭秋、毛

泽民等6人投入第二监狱，将林基路、李宗林等17人投入第四监狱。4月11日，将马明方、方志纯等35人投入第一监狱。3月10日，中统高级特务、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训育主任王德溥率季源溥、朱树声、郑大纶等到迪化，以所谓“特派新疆审判团”名义，直接参与对中共在新人员的审讯和迫害。王德溥等4人在离渝赴新前，蒋介石曾面示：对于中共重要人员，应判极刑，对于其他主要人员，也应严惩，务必肃清中共在新疆的力量。

“审判团”以陈潭秋、毛泽民为重点，妄图通过审讯，逼迫他们承认“阴谋暴动，推翻政府”。陈潭秋、毛泽民大义凛然，据理驳斥各种诬蔑。陈潭秋声明“绝没有这回事”，“如说四一二暴动等问题，硬说中共党员干的，但我们没有做这种事，从哪里承认呢？”“这是武断虚构的，那是天上来的，我还请把受我指示的找来，把事实拿出来。”毛泽民说：“你们所说的有什么阴谋，是对我的一种侮辱。”“我在新疆整理财政，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更没有违背民族利益，在新疆四五年辛苦于抗战建新事业，事实俱在，哪有对新疆政府进行阴谋事件之说？我要求把事实拿出来，但是我对新疆良心无愧，十分忠实的”。敌人妄图让他们反苏，陈潭秋答道：“我拥护中国，亦拥护苏联，我认为苏联是中国的朋友。我了解苏联的，因为我看到苏联对中国对新疆的帮助事实，我相信苏联。我现在明白，新疆改变了政策，我们被捕是当然的。”敌人知道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弟弟，竟异想天开，妄图诱迫他脱离中国共产党，毛泽民斩钉截铁地说：“脱党！脱党！脱党！那是我的政治生命，不能脱党”，“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不能脱党，气节还有，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为国家为民族，自有他的气节！”敌人对他们施以种种酷刑，妄图使他们屈服，纵使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几度死去活来，但他们意志如钢，毫不动摇。

敌人无计可施，便于1943年5月7日，利用已经叛变的刘西屏、潘柏南，以及盛世才的官员李一欧、臧谷峰同陈潭秋、毛泽民进行所谓“对质审讯”。这一天，敌人用幕布将“审判厅”的一角隔开，审判官坐在幕前，叛徒藏在幕后，周围站着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国民党士兵。敌人首先让幕后的叛徒按事先编造好的“证词”念一遍，然后要陈潭秋、毛泽民承认。陈潭秋怒不可遏，痛斥了这4个无耻之徒，他严正指出：刘西屏、潘柏南、李一欧、臧谷峰他们说

的话都是虚构，现在他们失去了良心，我要求政府法院研究为什么他们失去了良心，我想法庭一定能研究出来的。弄得敌人狼狈不堪。毛泽民也驳斥道："根本没有事实，李一欧说的，我觉得很离奇"，"刘西屏、潘柏南他们两人是叛徒"。

在狱中，林基路表现了共产党人顽强的战斗精神。他写下了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囚徒歌》，后由陈谷音谱曲，被狱中同志广为传唱。他第一次被审讯，就受了重刑。敌人用针刺他的指尖，十指连心，疼痛万分，但他毫不屈服；敌人又把他按在"老虎凳"上，林基路也毫不低头。在"老虎凳"上受刑醒来时，发现胸前木板上刻有"1943年3月11日小马受刑致死"的字样，知道是马殊刻的，便也忍住疼痛刻上自己的名字"小林"。这样连续审讯了3天3夜，林基路被折磨得多次昏死过去，但敌人仍一无所获，只得把他押到第二监狱的一间黑牢房里。当林基路苏醒过来时，首先想到的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他用广东台山土话唱《木鱼》调，与同乡难友马殊取得了联系。林基路唱道："指尖刺烂心如铁，虎凳见词添小林，严刑当作家常饭，烈火焚烧见赤金。"以此表达誓死不屈的决心。从此，他们便常用此方法来互相联络，鼓舞斗志。正如狱中党组织负责人后来向党中央写的《在新疆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中所说：林为梁等同志的宁死不屈精神，创造了新疆法庭上受审者的新模范，抑压了特务分子无计不施的气焰，打破收罗刘西屏等叛徒后的新幻想，对于全党的荣誉，对于全体同志的战斗鼓舞，对于特务继续审讯的遏止，都有重大意义。①

盛世才费尽心机，但始终没能从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口中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一言半语，也没有找到一星半点"证据"。穷凶极恶的盛世才经蒋介石批复，于1943年9月27日深夜，在狱中秘密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杀害。

1944年8月，盛世才调离新疆，吴忠信任新疆省主席。吴忠信上台后，将分别关押在一、四监狱的中共人员集中于二监（男监）、四监（女监）。这时，以张子意、马明方、方志纯为首的狱中党组织，总结了前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

①《中共党史资料》第25辑，第96页。

针对斗争形势，提出“无条件释放集体回延安”的口号和“百子一条心”的团结方针，把全体人员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先后组织了三次反普遍审讯的斗争。

从1944年底至1945年3月，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清理积案审判团”对中共在新人员进行了入狱后的第一次普遍审讯，狱中党组织领导了第一次反普遍审讯斗争。这次过堂没有一个上当，并且提出对非法捕押的控告与无罪释放的要求。结果，审判团宣布将历次所谓“阴谋暴动案”中的非中共人员无罪释放，而以案情复杂为借口，将中共在新人员继续关押。

第二次反普遍审讯斗争，发生在1945年7、8月间。审讯者杀气腾腾，从侮辱谩骂、滥施酷刑，到逼令写脱离共产党八路军的“声明”等，无所不用其极。中共党员英勇顽强，他们坚定地回答：“生为共产党人，死做共产党鬼”，“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决不丢！”在审讯中，杨南桂、胡鉴、蒋连穆三人被打得遍体鳞伤，站不起来，但他们毫不屈服，被架回牢房的第二天就联名向吴忠信写了抗议信，严正抗议非法刑讯，要求惩办打人凶手，立即送医院治疗。负责普遍审讯的监狱当局无可奈何地承认：“提共党88名分别谈话劝其投诚，结果均仍执迷不悟。”

第三次反普遍审讯的斗争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1月下旬。审讯中，敌人大肆诬蔑中共“破坏统一”、“挑动内战”、“抢占地盘”、“破坏交通”、“杀人放火”等，这些无耻谰言，遭到中共党人的严厉批驳和痛斥。他们严正申明：共产党救国救民，绝不危害国家民族利益，八路军英勇抗日，举世皆知。在回答敌人“你愿意为他们牺牲吗”的问题时，朱旦华答道：“我愿为他牺牲到底，即为共产主义牺牲到底，并且现在要为三民主义之彻底实现而奋斗。”独伊坚定地表示：“我是始终信仰共产主义，不用考虑，我已谈过共产党是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我就是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主、幸福而奋斗，死了也是光荣的。”张奋音义无反顾地说：“是的，一个人的信仰不能因一点小的事情而动摇，我是相信共产主义的，在目前是为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些回答，表达了共产党员宁死不屈，誓为共产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同时也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当局的诬蔑，粉碎了第三次普遍审讯的阴谋。

在长期艰苦的监狱斗争中，国民党新疆警务当局虽然竭力想把狱中中共人员与外界隔绝，但在新疆狱中的中共人员仍不时得到当地各族进步青年、人民群众的支援。

（三）中共在新人员集体返回延安

1942年9月，中共在新人员被软禁后，便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1943年1月初，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告知陈潭秋等被捕。1月13日，共产国际再次致电中共中央，称陈潭秋等均已被捕，除那边设法营救外，要求中共也想办法营救。

1943年2月14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林彪，电称："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等140余人的要求。说明这140余人中一部分是在国共合作后盛世才要求我们派去新疆帮他工作的，一部分是在苏联治病回国途中在迪化停留的，另一部分是到迪化养病的（其中有些是残废），这些人是在重庆中央调整与新疆关系时被盛诬加罪名而加以拘捕的，要求重庆方面去迪化释放并准他们经兰州西安回延。""即使上述要求一时不能实现，但不妨提出备案，作为将来交涉之根据。"

1944年6月4日，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林伯渠根据中共释放政治犯的一贯主张，向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一份，其中乙项"关于两党悬案者"的第八条郑重提出：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新疆的陈潭秋、毛泽民等……此等人员，均系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①]

1945年9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时，中共于9月3日提出《谈话要点》，

①《人物》1980年第2期。

其第十一条第一项再次明确提出“释放政治犯”。蒋介石亲自草拟《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由张治中等答复:“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将应释之人提出名单。”同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国民党当局履行“还政于民”的诺言》,明确指出我党中央委员陈潭秋,候补中央委员马明方等依然被监禁着,敦促国民党必须予以释放。以后在国共双方达成的《双十协定》第七条中明确规定了“释放政治犯”。接着,旧政协决议中也有同样的内容。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于1946年初颁布行政院训令,命令全国各地释放政治犯,称:“此项人犯无论已判未判,准由各机关查明释放见报。”但新疆省主席吴忠信对这一训令不予公布,更不执行。

《双十协定》签订前后,国民政府为解决1944年秋爆发的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革命问题,派张治中先后两次赴新同三区人民代表进行谈判。1946年3月,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并于4月4日抵迪化就职。在张治中赴新前,周恩来、邓颖超亲赴重庆上清寺桂园张寓,当面嘱托说,我党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去后请务必按《双十协定》予以释放,并设法送回延安,念及他们长期狱中生活,条件艰苦,亦请改善一下。张治中先生慨然承诺。①

张治中到新后,即派屈武、党必刚等到监狱探望,了解情况,并命令改善监狱的待遇。另一方面,张治中电告蒋介石,说明这是盛世才做的事,为了增进两党友好,表示和平意愿,应该全部释放。几经周折,至5月中旬,蒋介石才复电同意。张治中随即将中共狱中人员全部集中到第二监狱院里,为释放作准备。

当时狱中人员尚不完全了解外界情况,为了防止意外,党组织以“王韵雪等全体”名义给张治中写信,提出登报公布释放消息及出狱进行短时期休息等5项要求。张阅后即邀中共人员代表杨之华、吉合、朱旦华、沈谷南、李云扬、独伊等6人到他的寓所面谈。在会见中,张治中对信中所提的问题作了解释,着重说明此次释放大家,是受周恩来先生委托,请大家放心,一定派人

①邓颖超:《〈张治中回忆录〉序》,1983年9月。

护送大家回延安。当前局势不定,宜早不宜迟,一旦准备好了,就立即启程。

6月6日,《新疆日报》公开发表释放在押中共人员的消息。6月10日,长期被押于新疆监狱的中共人员分乘10辆大卡车从迪化出发,张治中派新疆警备司令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负责护送。出发前,张治中分别去电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陕西省主席祝绍周,主要是强调得到蒋介石同意释放的一批中共人员,由行营派人护送回延安,请沿途放行并妥善接待。同时也把这件事的简要情况和动身日期电告周恩来。动身前,还特派屈武到狱中和中共人员见面、送行,祝他们一路平安。车队登程后,沿途历经坎坷,在刘亚哲周旋、操持和全体人员积极配合下,均化险为夷。7月9日抵达终点吉家村,在此实行交接。全体新疆出狱人员受到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刘亚哲一行受到热情接待。刘亚哲返新时,带回朱德总司令给张治中的感谢信和礼品。数月后,张治中从新疆到南京时,董必武又代表中共中央亲往张宅当面致谢。

新疆出狱人员在吉家村稍事休息后,换乘边区的汽车驶往延安。7月11日,当车辆行至延安城南七里铺时,受到朱德、任弼时、林伯渠、杨尚昆、安子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专程迎接,中央领导同志登上汽车和他们一一握手。车队抵达延安城,受到数以万计的边区军民夹道欢迎。从新疆监狱归来的同志们热泪盈眶,向迎接群众挥手致意。至此,他们结束了数年监狱生活的磨难和3000余公里的艰苦跋涉,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回到党的怀抱。出发时共131人,途中因病逝世2人(航空队谢奇光,儿童胡狱燕),返回延安129人。毛泽东亲往他们的住地亲切慰问,连声说:同志们,受苦了,你们的归来,就是胜利。

青　海

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青海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青海各阶层人民和青海地方实力派在中国共产党倡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斗争，为支援抗战和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与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行动，对扩大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青海地区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

（一）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行动对青海的影响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193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致党中央的信中提出创造西北苏区、在新疆建立与苏联联系的任务。这是最早提出“打通国际路线”的主张。1935年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信中提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加巩固更加有利的基础上，今后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①]随后，党中央在不少电报中提出从宁夏或甘西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以便取得苏联的物资支援。党中央还与张学良商量，红军从宁夏、东北军从甘西接通苏联。

①《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宁夏战役计划放弃后，中央制定“作战新计划”。红一、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未过河的四方面军之四、三十一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已过河的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国际路线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1936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①]西路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沿着河西走廊打通国际路线。西路军经过近半年的浴血奋战，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400余人最后到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胜利完成了打通国际线路的任务。

早在1936年7月3日，李先念率领左纵队先遣军进入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知钦乡之唐摇沟，这是红军长征首次进入青海境内。同日，先遣军到达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壤塘县境内的西倾寺。随后，先遣军复入青海班玛县境内的作木沟（今佐木沟）。红军曾在唐摇沟口、吉德寺、班前寺、灯塔寺、扎洛寺、纳达村、子木达村等处驻扎休整，并在班前寺的子合山，扎洛村后的扎洛山等处修建哨所。至今遗迹尚可辨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军在很多地方书写了北上抗日的标语，虽多已不存，唯有亚尔掌乡子木达沟的石壁上书写的“北上响应全国抗日反蒋斗争！安庆宣”的标语[②]，经多年风雨吹打，其字迹仍清晰可辨。这些标语在青海藏族同胞心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藏族兄弟冒着生命危险将伤口化脓的红军战士何世安掩护直到青海解放。他们还为红军筹办食物和燃料，特别是班玛县藏族当周、满吉玛、阿牙三知等，还自愿给红军当向导，一直把红军送到阿坝。红军走后，当地群众把红军用过的铜锅、马鞍子、马叉子、草帽以及使用过的手榴弹等物，都细心地保存下来，解放后献给了文物单位。可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深得各族人民群众拥护的。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首先，做好争取“二马”停止内战的工作。西路军同马步青部队在锁罕堡、一条山地区进行多次谈判，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的主张。马步青愿意接受红军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9页。

② 崔永红等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7页。

方面提出的停火协议，愿意向红军提供部分粮食。他的代表张毅生两次与红军接触，红军的热情接待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使他大为感动，表示愿为红军与马军之间的停战谈判铺平道路。其次，西路军在西征途中严格执行俘虏政策，优待被俘人员。三十军在古浪县土门子包围了守敌骑兵师工兵营，红军向他们宣传统战主张，迫使敌营长马有明以下官兵350余人携枪280余支投诚，经过教育，马有明等160余人参加了红军。九军在古浪县干柴洼、横梁山战斗中，俘获了以罗承训医生为首的"青海战地医疗队"一行数十人。九军敌工部部长吴仲廉负责对他们的管训工作。她向被俘人员进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和以民族大局为重"的宣传教育，并鼓励他们为抗日救国民族解放服务。随后将这些人释放。后来，罗承训在西宁做了很多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工作。再次，西路军组建了对敌先遣工作团，负责对马家军的统战工作。团长黄火青、秘书长魏传统。先遣工作团携带总指挥徐向前、五军军长董振堂联名签署给马步青的信，与马步青正式建立联系。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前后，西路军加强了对"二马"的统战工作。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立即在永昌城内召开全军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确定西路军应利用西安事变的有利形势，为实现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稳固的西北后方发挥自身的战略作用。蒋介石也口头上应允西路军驻凉州以西。但是，由于西路军在军事上不断失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未能奏效。最后，西路军在创建地方政权的过程中，开展统战工作。在西征途中，西路军曾两次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地方革命政权，不断宣传"实行停止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汉、回、蒙、番联合抗同"、"联共、联苏、抗日救国"等口号，西路军红军指战员们的宣传和影响，使河西各族人民群众和各界进步人士了解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西路军失败后，有6500余将士因病因伤被俘。他们被押解到西宁后，不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在马步芳的陪同下，对服苦役的被俘红军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要坚持斗争，党会营救你们的。被俘的妇女独立团副营长胡秀英，在万人坑边痛斥敌人说："放着日本强盗不敢去打，却在妇女面前逞疯狂。""被编入"新剧团的被俘女

红军，不断把联合抗日的内容编成歌曲，使敌官兵深受教育。各族群众通过不同的方式冒着生命危险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掩护西路军官兵一直到青海解放。这些都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的结果。

（二）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建立了一条以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甘肃兰州、陕西西安为连接点，包括空中航行、陆路运输和通讯联系等功能的西北国际交通线

建立西北国际交通线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趋势，在世界范围内法西斯势力东西方相互策应、配合行动，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中国为基地，从东方进攻苏联，德、意法西斯企图从西方进攻苏联，这就给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特别是中苏两国提出了联合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迫切要求。从国内局势的发展来看，建立西北国际交通线也是十分必要的。国共两党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再度合作，共同抗日。因此，都主张中国政府积极开辟西北交通线，以取得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1937年4月，中共通过苏联的斡旋，派陈云、滕代远进入新疆迪化，与盛世才取得联系，成立八路军办事处，领导开展新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同年5月，中共派张文彬、彭加伦等七同志到达兰州，他们携带周恩来、叶剑英给国民党甘肃省代主席的亲笔信，协商建立八路军驻甘办事处。7月，为了进一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加强与国民党的联络，做好营救西路军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在西安建立办事处。该办事处不仅加强了兰州办事处同延安中共中央的联系，而且使延安、西安、兰州、迪化直至苏联的联系连成一线。国民党政府决定以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为基础，成立交通部西北公路局，修筑甘新公路。任命驻扎河西的骑五军军长马步青为甘新公路督办，于1938年5月动工。1939年9月全线通车。苏联同中国新疆的航空线，由于盛世才推行反帝亲苏政策在抗战爆发前就已开通。为了完善迪化到兰州及中国内地的航空运输线，中国政

府做了许多努力，保证了这条空中通道的畅通。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代主席贺耀祖也在抗战爆发后，组织动员了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日夜赶修兰州、武威、张掖、酒泉的四个飞机场，为完善国际航空线，保证国际通道的畅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建立通讯联络系统，完善西北国际通道问题上，新疆督办盛世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37年，他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协商，决定在迪化建立国际电台。苏联方面运来了天线、电杆、水泥和全部机器设备，并派出以乌索夫总工程师为首的10名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援建。国际电台于1938年竣工后投入使用，其联络点有苏联的阿拉木图，解放区的延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兰州、重庆等地，还负责收译塔斯社新闻稿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无线电工程的段子俊回国后带来了一批电讯器材，建立了一台功率较大的无线电台，开通了延安与莫斯科的直接联系。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开通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日益深入人心。青海各族人民也是通过这条国际交通线深入了解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

（三）“西北大联合”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两次打通国际路线，都是在西北大联合的建立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所谓“西北大联合”，是指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的联合，它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一环。红军长征达到西北根据地后，蒋介石歼灭红军之心不死。中国共产党为在西北立足，就必须争取张学良、杨虎城，粉碎蒋介石的阴谋，才能在西北实现抗日救国的方针。没有西北三股力量的大联合，就不可能实现逼蒋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就无从谈起。

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的联合。张学良在西北经过一个从反共到联共的转变过程。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代人受过，被迫辞职，出洋考察。1934年

初，蒋介石为了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驱使东北军反共，又电召张学良回国，委以“西北剿匪副司令”的要职。进攻红军失败后，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训斥张学良并取消一〇九、一一〇两个师番号，使张学良十分恼怒，促使其开始向联共方面转变。正在此时，中共中央抓住有利时机，开展对张学良的争取工作。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21名红军将领发出给东北军将士的公开信，坦诚相劝“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的唯一出路”，希望东北军能派代表与红军共同协商抗日大计。

早在1935年以前，十七路军就与共产党有过友好合作往来，《八一宣言》发表后，毛泽东曾派汪锋向杨虎城宣传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5月，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双方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站和准备抗日四项协定。为此，十七路军在陕北宜川和富田一线，与红军休战。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在《致杨虎城的信》中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①]党派张文彬作为中共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杨虎城也委任张文彬为少校秘书。为对十七路军官兵进行抗日救国教育，举办步兵训练班，由赵寿山负责，王炳南任政治教官。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的合作也是成功的。由于实现了“西北大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才有了可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青海的影响也才能发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二、青海各阶层人民对抗战的支援

九一八事变后，西宁地区各学校师生纷纷通过召开讨论会、出墙报等形式宣传抗日。1931年10月初，青海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生和部分教职员工首先发起组织成立了抗日义勇队，在成立宣言中讲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号召人们为祖国的命运而战，抗议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仅仅在一星期内，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职业学校的学生也分别成立了学生抗日义勇队，强烈要求到东北同日本帝国主义血战。此外，民和、乐都、互助、大通、贵德、循化、化隆、循化等县的47所学校也先后成立了抗日宣传队。总计当时全省的中小学生共组成抗日组织53个，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抗日义勇队的倡议下，于10月28日成立了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合处。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也不得不同意联络处的成立，还给予了每月补助30元经费的支持。

11月3日，西宁各校抗日义勇军在西宁小教场举行誓师大会，表明坚决抗日的态度。6日，西宁各校学生抗日义勇军又举行请愿大会，要求青海省政府和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发给他们枪械，开赴抗日前线。全省抗日义勇军联合处还出版《学生抗日旬刊》，登载省内外有关抗日的新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行径。各校学生还举办抗日讲演竞赛会，走上街头、奔赴乡村宣传抗日救国。各校学生一致要求，抗日义勇军联合处要拟订学生军事训练计划，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军事常识讲座和操场训练及野外实地演习。国难当头之际，青海各校学生爱国热情高涨，这是值得赞扬的。

抗战爆发后，西宁回中的一部分师生立即创办了《星月半月刊》，其宗旨是：爱国、爱教、大力宣传抗日救国。还登载了有关抗日言论和文艺作品，激发回族群众的爱国热情。此刊还寄送到西安、兰州、宁夏等地。1939年藏传佛教大师爱国人士喜饶嘉措前往蒙藏地区及各大寺院，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他利用青海湖"祭海"时机，对蒙藏王公、千百户宣传抗日。他还选出几名宗教界代表人士，赴青海蒙古族29个旗，进行抗日宣传。

国内知名人士也来到青海宣传抗日。抗战期间，每年由内地流入青海的人口较多，其中有不少是全国知名人士，包括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的精英。他们在青海兴办教育或帮助地方兴办企业，对提高青海作为全国抗日大后方的地位起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文艺界人士则以宣传抗日和培养文艺人才为己任。著名作曲家王洛宾先生，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音乐家王云阶、陈大铮、王海天，舞蹈家吴晓邦，歌唱家吴樾萌，戏剧家李朴园、崔超等均来青海演出。尤其是王洛宾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来西宁后，公演了宣传抗日的进步话剧。他还组织了"青海抗战剧团"宣传抗日。画家兼戏剧家、杭州艺专教授李朴园率领西北抗日戏剧宣传队第八队在西宁公演抗日剧目，给青海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著名文艺工作者的影响下，西宁街头宣传抗日的气氛十分热烈。《打回老家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抗日游击队歌》、《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响彻西宁上空。"国民党国民参政会"出面组织若干个慰问团赴全国各地慰问，来青海的是北路慰问团，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和著名作家老舍等组成，他们着重介绍海外华侨和青年学生对祖国抗战所表现出来的爱国行为。老舍以高昂的激情在西宁作宣传抗日的报告，使高原人民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青海各族人民多次发起献金、献机、捐寒衣等活动，以实际行动积极声援全民族抗战。1938年2月全省各界人士为慰问抗战将士搞献金竞赛活动，仅西宁共募集现金4889.56元，互助等六县也捐现金1973.54元。青海各校学生也响应"中国儿童号飞机"筹募总会发起的募捐活动，捐款3643.48元。全省还发起了为出征将士征募寒衣活动，征募大量寒衣布料和羊皮10万张，军马3500匹，军粮60多万担，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

1941年6月23日中午，日本侵略军派出27架飞机对西宁进行狂轰滥炸。公安街（今文化街）、饮马街、玉井巷、法院街、观门街，还有湟水南岸昆仑中学到韵家口、乐家湾、羊沟湾一带损失惨重。敌机共投下炸弹250余枚，燃烧弹30余枚，并以机枪进行低空扫射。这次空袭共炸死居民43人，伤28人，炸毁机关9处，房屋520余间，有160户居民无家可归。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更加激起了青海人民的无比愤慨和仇恨，使青海各族的抗日斗争出现了新高潮。《青海日报》发表《勿忘六二三》的社论。“在以往，居住在这湟水峡谷的我们，下意识中感觉这里是不要紧的，论在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观念上，以为西宁没有被炸的理由，所以我们也曾自私的歌颂过青海平静，因为我们太把暴日看的有人性了……但是六二三的炸弹，把我们从这个错误中拯救出来了。瓦砾场上陈列着数十具血肉模糊的残骸，这是血淋活现的现实，说明抗战并没有前方和后方的区别，日本兽兵的心目中并没有战斗人员和平民的分别。更说明距前线有数千里远的湟水峡谷，也不是安全地带。除了武装向前，退避是无处可以苟安的！这是血的启示！我们将永不忘六二三这天的赐予。”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进一步激起了青海人民的愤怒和觉醒，进一步坚定了他们支援与参加抗日的斗志。

后 记

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抗战大后方，是支持和支援抗战的重要战略区域，对抗日战争的持久坚持并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后方人民在浴血奋战的抗战历史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抗战历史文化。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地区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学术界对抗战大后方的研究严重滞后。抗战大后方研究是抗战历史研究中一个相当薄弱的部分。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中，历史价值最重要、研究现状最薄弱、抢救保护最紧迫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地区历史进行整体、全面、系统的研究，是学界需要长期努力的课题。

近年来，各省区市党史工作部门对中国共产党在本地区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资料整理和研究撰写，公开出版了一批经由各省区市党委审定、具有权威性的党史基本著作，其中就包括了对其辖区内抗战时期党的历史的记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还公开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增订本）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其中就包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大后方代表团的史料和代表名录。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著述显示了学界在这一领域有关研究和史料方面最新的阶段性成果。

为了全面系统地反映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各地区工作的历史全貌，凸显其艰难历程、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更充分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我们将上述各地党史著作中有关抗战时期党组织历史的篇章和出席中共七大的大后方代表团史料编纂成《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

本书选编的著作包括：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增订本）之大后方代表团部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之大后方代表团部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第一卷第三、四编有关章节，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由何蜀、文俊、简奕执笔。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第三、四编有关章节，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版。分别由刘全、杨萍、马睿、宋键执笔。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第九至十一章，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分别由魏先忠、杨伍荣执笔。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第二、三编有关章节，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分别由杜黔、杨建光、耿晓红、李朝贵执笔。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西历史》第一卷第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8月版。分别由苏上杰、姚蓝、沈奕巨执笔。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第二、三编有关章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版。分别由孙玲玲、梁星亮、杨忠虎、史向军、张培林、敖海波、陈瑶、贾自新、刘玉平等执笔。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第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2月版。分别由范圣予、王晋林执笔。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宁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由郭振伦执笔。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著:《中共新疆地方史》(1937年—1966年4月),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由朱培民执笔。

——《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抗日战争》之青海部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版。由孙欲声执笔。

以上著作的有关篇章在收入本书时,我们没有对其作实质性改动,只从统一全书体例的角度对书稿进行了技术性整理。

需要说明的是,抗战初期的四川省包括重庆市。1938年,国民政府设西康省(辖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一些地区);1939年,国民政府又将重庆市从四川省分出,重庆成为行政院院辖市。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并没有随之改变,重庆市的党组织仍在四川省的体系之中。按照中国共产党基本著作的规范,既以当时的党组织体系为对象范围(在四川省党组织的历史中包含重庆市、西康省,由四川省党史部门负责记述),又反映几十年中行政区划和党的组织体系的变化(重庆市党组织的历史单独成篇,由重庆市党史部门负责记述)。因此,本书的"重庆"和"四川"两部分在记述抗战时期党组织历史时,在某些内容上有些交叉。我们尊重规范,保持不动,以反映当时历史的原貌。

本书是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项目编号2012-ZDZX02)的最终成果,由中共重庆市委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和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共同管理。

本书的编辑工作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西南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承担,周勇主编,提出编辑方案、协调联系各方、文稿整理编辑。

本书中"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后方代表团"部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李蓉研究员编写和提供资料。在本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曾维伦、黄晓东、刘志平、潘洵等同志在项目立项、管理、协调等方面给予了支持

和帮助。张鲁鲁、黎余同志参加了资料搜集、文字录入等工作。郭金杭、周敏、周昌文等参加了内容选编、文字录入、编辑事务等技术和保障工作。特此致谢。

周 勇

2015年6月18日